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十三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册（19、20、21）；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册（22、23、24）；"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册（25、26、27）；实现历史性转变时期三册（28、29、30）；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二册（31、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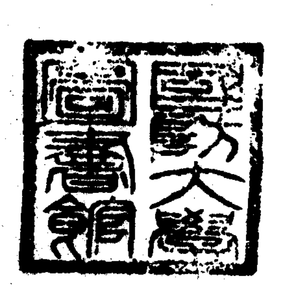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

第23册由丛进选编。

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

资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一 九 五 九 年

一九六〇年

一 九 六 一 年

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根据六中全会决议，并且经过最近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所拟定的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现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及其附件发给你们，作为党内安排本年度各方面工作的依据。至于对外公布的各项计划指标，将待人代会举行会议时另行拟定。

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更大、更好、更全面的一个跃进计划，是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总路线和“五个并举”的方针；只要全党全民继续鼓足干劲，采取积极措施，千方百计的克服困难，这个计划是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这个计划，虽然注意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随时注意调整。

各级党委应该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下，切实地部署各项工作，充分地发动群众，立即掀起一个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为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中　　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各部、委共同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多次的研究。随后，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必须确保党的六中全会公报所公布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完成，特别要确保二千万吨钢的任务的完成并力争超过，使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能够继续有一个大的跃进；同时，为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跃进中保持适当的比例，有必要对某

些生产、建设指标进行调整，使计划建立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在武昌会议后提出的有关生产、建设指标的调整方案，经过这次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有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的讨论，又进行了一些修改。现在我们把修改的情况和意见提请中央审查批准，把计划确定下来。

关于一九五九年的农业、轻工业、商业和劳动方面的安排意见，已经另有文件说明。这里着重说明重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一、如何保证钢产量跃进到二千万吨的问题

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今年的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从需要方面说，有了二千万吨钢和相应的钢材，才能适应一九五八年已经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局势，既可以保证今年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又可以为一九六零年新的跃进打下基础。我们从安排钢铁工业的生产、建设中体会到，在苦战三年期间，今年确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从可能方面说，去年炼铁炼钢能力已经大大增加，到年底炼铁能力达到了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五百万吨，炼钢能力达到了二千一百万吨。现在的薄弱环节是在采矿、洗煤、炼焦、轧钢、运输等方面。只要全党努力，依靠群众，并且把工作安排得当，千方百计地消除薄弱环节，今年生产二千万吨钢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为了使钢产量跃进到二千万吨，首先要解决的是采矿问题。生产二千万吨钢，加上铸铁和周转的需要，要相应地生产二千七百万吨铁，也就需要开采出九千万吨以上的矿石。现有的大型矿山的采矿能力是五千万吨，加以适当扩建后，可以把产量提高到六千八百万吨到七千万吨，还不足二千多万吨。这就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第一，努力扩大已经开始生产的五十多个中、小型矿山的开采量，保证采出一千万吨以至更多的矿石；第二，适当改进“小土群”采矿的方法，再开采一千万吨矿石。各部门、各地方在安排所属机械厂的生产任务的时候，应当保证完成采矿设备的制造任务，并且注意安排选矿设备的制造任务，以满足大型矿山和五十多个中、小型矿山的扩建需要；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劳动力的时候，应当把采矿的需要计算在内；各地方自己安排的小土炉的生产，不能挤掉国家统一安排生产的矿石。

其次要解决的是洗煤和炼焦的问题。生产二千万吨钢和二千七百万吨铁，相应地需要四千万吨焦炭，也就需要六千四百万吨洗煤。我们现有的机械化洗煤设备每年可以洗煤二千多万吨，机械化炼焦炉的生产能力是九百万吨。解决洗煤能力和炼焦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做了布置。办法是：在洗煤方面，第一，充分利用现有洗煤厂的能力，生产洗煤二千三百七十万吨；第二，使续建的八个机械化洗煤厂和四十几处简易洗煤厂迅速建成投入生产，生产洗煤五百八十多万吨；第三，新建简易洗煤厂，处理原煤能力为八千万吨，争取今年生产洗煤一千四百万吨左右。此外，为了适应目前急需，安排了一部分依靠土法生产的洗煤，但是要逐步用简易洗煤来代替土法洗煤。在炼焦方面，第一，发挥现有设备潜力和使新建机械化炼焦厂及时投入生产，力争生产焦炭一千五百万吨以上；第二，采取突击的办法，建设相当数量的半机械化的炼焦厂，争取生产焦炭一千五百万吨；第三，用提高土法炼焦的办法，生产焦炭一千万吨。有了好焦炭才能够炼好铁，因此，解决洗煤、炼焦问题，不但是完成今年钢铁生产指标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提高钢铁质量的重要保证。洗煤、炼焦的关键在设备，第一机械

工业部必须首先安排洗煤设备、炼焦设备的生产，抓紧时机，立即制造，保证及时供应。

再次要解决的是运输问题。按照这次拟定的生产、建设指标计算，铁路运输量约有六亿二千万吨，其中煤炭和铁矿石的运输量约占一半左右，而铁路运输能力约有五亿七千万吨。需要的运输量大而运力不足，这是一个必需解决的问题。现在看只靠增加机车、车辆还不足以解决这个矛盾，还必须采取以下办法：第一，在煤炭产地建设洗煤厂，并且提高煤炭的质量和降低煤炭的消耗定额，这样全年可以减少运输量二千万吨。第二，在缺煤的长江以南地区抓紧煤炭基地的建设，暂时适当地减少铁的生产任务，以减少不合理的长途运输，缩短货车的周转时间，减少放送空车的现象，这样全年可以增加运输力一千万吨以上。第三，加强运输组织工作，挖掘运输潜力，从铁道部的工程车、技术专用车和检修车中挤出二千辆作为货车，这样可以增加运输力一千二百万吨。实现以上措施，就可以避免运输方面异常紧张的状况，保证各项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

上面所说的一九五九年的运输总量，还没有包括煤、铁、钢等矿山基地和其他工矿企业新建专用线的运输量。武昌会议时，拟定新建专用线一千公里，现在计划新建二千公里，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在安排专用线的建设项目的时候，应当分别轻重缓急，首先保证煤、铁和其他重点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

为了减轻运输和洗煤、炼焦及劳动力方面的过重负担，同时考虑到适当减少铁的生产，仍然可以保证生产二千万吨钢和铸造的需要，因此，我们把今年铁的生产指标从武昌会议拟定的二千九百万吨降低为二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在减少的一百八十五万吨铁的生产任务中，华东减少八十万吨，华南减少四十万吨，西北减少二十五万吨，华中减少二十万吨，西南减少十万吨，华北减少十万吨。钢和钢材的分区数字，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们认为适当调整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布局，特别是减少长江以南的生铁任务和加强建设华东、华南的煤炭基地，是今年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不仅对缓和当前运输紧张状况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长江以南地区今后钢铁工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在解决采矿、选矿、洗煤、炼焦、运输这些重要问题以后，在钢铁工业本身还必须解决轧钢的问题。今年钢材的生产任务是一千四百万吨，而原有轧钢设备在采取措施（主要是换装和增加大型电动机）以后，可以生产九百万吨，其余五百万吨必须依靠新增能力来生产。为此，第一，在去年布置生产的二百六十一套中、小型轧钢机（生产能力共六百万吨），必须在第一季度内全部交货，争取迅速安装好，在今年生产钢材三百万吨。第二，在今年第一季度布置生产的九十八套大、中型轧钢机，也必须争取提前制造，迅速安装好，加上从国外进口的轧钢机，在今年生产钢材二百万吨；这九十八套大、中型轧钢机，对于完成钢材数量特别是品种的任务具有极重大的作用，机器制造部门必须把制造这些轧钢机当成目前一项重要任务，切实督促检查，并且注意配套问题。同时，基本建设部门必须注意轧钢机安装的进度和质量，生产部门必须及早做好生产准备工作。除了上述二百六十一套中、小型轧钢机以外，各省、市、自治区不要再布置小型轧钢机的生产，以避免占用更多的钢材和设备制造能力，而有利于集中力量制造九十八套大、中型的轧钢机。

上面所说的各项措施，我们在第一季度工作中已经作了安排，但是仍然需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认真抓紧，严格检查，以保证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二、对某些生产建设指标进行调整的问题

武昌会议确定的以二千万吨钢为纲的计划方案，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计算和研究不够，在生产、建设指标的具体安排上是有缺点的，是不全面的，主要是纲与目之间、目与目之间有一些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总起来看，是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了一些，某些重点建设过重了一些，项目布局过宽了一些，以及某些机械产品的指标过高了一些。按照当时的基本建设方案计算，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几个主要行业的建设规模（按照设计能力计算的年产量）是：铁四千一百万吨，钢三千九百万吨，重型设备一百六十八万吨，发电设备二千一百万瓩左右，铁路铺轨一万六千五百公里，等等。要实现这样规模的建设任务，各部门所需要的投资实际上不是三百六十亿元，而是四百八十多亿元。在建设项目的具体安排上，对于五个"并举"的方针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体现得不够。同时，当时按照基本建设的需要所拟定的许多主要机械产品（如重型设备、机车、货车、发电设备等）的生产指示，由于要靠当年新增生产能力来完成的比重很大，事实上是有困难的。这样的基本建设规模和机械产品的生产指标，又同今年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认为在确保生产二千万吨钢的前提下，应当对某些生产、建设指标首先是重工业部门的某些指标进行适当的调整。经过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对生产、建设指标又作了必要的修改。修改的结果，请参阅附表。这里只说明调整的主要情况。

在基本建设方面：

第一，主要是适当地减少了机械、电力、铁路、冶金、和"尖端"工业等部门的投资，增加了煤炭、化工、轻工、纺织、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的投资，并且补列了城市建设的投资。在重工业内部，主要是增加了某些原材料工业的投资，适当减少了某些加工工业的投资。其中，机械工业减少十一亿元，电力工业减少七亿元，铁路减少六亿元，冶金工业减少三亿元，"尖端"工业减少五亿元；煤炭工业增加九亿元，化学工业增加三亿元，轻工业增加八亿元，纺织工业增加五亿元，交通增加一亿一千万元，商业增加八千万元；文教增加五亿八千万元，城市建设增列四亿元。其他部门的投资也都稍有调整。这样，全部投资为三百六十三亿三千万元。经过上述调整，比武昌会议时计算的较为落实了。在全部投资中，中央部门的为一百九十一亿六千万元，地方的为一百七十一亿七千万元。我们认为这样调整以后，在重轻工业之间、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合理了一些。轻工业投资的增加，对于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是会起作用的。

这里要说明，地方交通运输除主要港口的建设以外，公路和水运都没有单列投资，请各地方在自筹资金中安排解决；个别自筹资金比较少而交通又不方便的省、自治区所需要的投资，已经列入计划。各地方自筹资金的使用，应当首先用于地方交通，以及城市建设、市场需要和配合重点建设所必需的中、小型项目。

第二，在投资和项目调整以后，某些重工业部门的建设规模也有一些变动，绝大多数是缩小的。例如：重型、矿山机器厂的建设规模由原定的一百六十八万吨减为一百二十一万吨；发电设备制造的建设规模由原定的二千一百万瓩左右减为一千二百四十万瓩；铁路的建设规模由原定铺轨一万六千五百公里减为一万四千八百公里，主要是推迟了兰新线、成昆

线、内昆线、平顶山到襄樊线的建设。这样调整以后，仍然可以基本上保证今年生产指标的实现，保证明年生产的继续跃进。拿重型设备的制造能力来说，一九五九年可以完成一百四十二万吨的制造任务，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一百七十万吨左右，可以保证每年增加一千万吨钢和相应的煤炭、石油、化工等部门对重型设备的需要。又如煤矿，现有矿井的生产能力加上一九五九年新增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小土群”采煤的能力，一九五九年可以生产四亿吨原煤，一九六零年可以生产五亿五千万吨原煤。

第三，为了充分发挥原有工业基地的潜力，并且适当缓和某些地区运输和电力过分紧张的状况，我们根据各地资源、交通等条件和经济特点，对于新建项目的地区布局，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如前所说，在长江以南地区将开辟一些新的煤炭基地，在东北地区将加快电站的建设。这样调整以后，虽然有一些省分和个别协作区的建设项目减少了，从局部看是发展慢了一点，但是，从总的看是更合理了，更有利于各地区今后的发展。

基本建设项目经过调整以后，现在拟定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共一千五百六十二个。这些项目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六十五。在一千五百六十二个项目中，工业项目有一千三百零五个，农林水利项目有二十八个，交通运输和邮电项目有二百一十一个，其他部门的项目有十八个。现在安排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中，冶金工业有一百三十四个，除了钢铁企业以外，还相应地安排了铁矿和炼焦的建设；机械工业有二百六十个，机械工业项目的安排，注意了解决设备配套的需要；电力工业有二百四十一个，注意安排了重点生产建设的电力供盐，也注意安排了二十万瓩以下的电站；化学工业有一百七十七个，多数是为了克服酸、应碱、氨和其他化工原料等薄弱环节而建设的；轻工业有二百一十个，主要是纺织、造纸、和糖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是地方建设项目。

经过调整以后，在全部限额以上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个建设项目中，属于中央部门建设的是五百零六个，属于地方建设的是一千零五十六个。这样安排，使得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合理了一些。在这次调整中，我们推迟了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进度：如四川西昌和湖北宜都的两个钢铁联合企业、安徽马鞍山和湖北宜都的两个重型机械厂、四川德阳水电设备制造厂、北京重型电工机械厂、陕西锅炉厂、宁夏银川综合电工厂、广西柳州车辆厂、芜湖长江大桥等项目，今年都暂不上马。

在武昌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的一九五八年施工的项目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个。这些项目，除已经建成的以外，大部分列入了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大约有四百个项目左右（其中工业企业大约有三百个项目左右）没有列在今年的限额以上的项目以内。这四百个项目的情况是：有些缩小了规模，变为限额以下的项目，仍然继续建设；有些已经部分建成，不再续建也可以进行生产；有些刚开始土方工程，停下来问题不大；还有少数项目已经完成了部分工程，暂时停建后，只要妥善处理，或者明年继续施工，或者把厂房改作其他用途，也不致有很大损失。因此，这些项目在缩小规模、推迟进度或减掉以后，并不影响今年主要生产指标的完成，而且将有利于必需建设的项目加快进度。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看来，这次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和项目的调整，是基本上符合五个“并举”的方针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的。

基本建设项目经过这次会议确定以后，凡是由地方建设的项目，各省、市、自治区认为有必要调整时可以自行调整，并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但是应当：第一，不影响国家计划所规定的新增生产能力；第二，不增加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材料和设备；第三，保证完成计划规

定的生产任务。凡是中央各部建设的项目，地方应当尽力保证完成；如果需要调整这些项目投资的时候，应当事先同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由于今年生产的全部材料和设备已经作了分配，今后再不要另加专案建设项目。

在生产方面：

重工业各部门由于基本建设指标的调整，生产指标也有了相应的变动。基本的情况是：某些加工工业的指标降低的幅度比较大；原材料工业的指标，除铜、铝以外，降低的幅度比较小，或者没有降低。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多数原材料的供应确实比较紧张，而且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原材料工业能够比较快地增长上去，一般的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要赶上去是并不很困难的。同时，在武昌会议拟定的方案中，对于加工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建设规模，也确实安排得大了一些，同原材料生产的情况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

生产指标调整的详细情况见附表。几种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的调整情况如下：

第一，铜、铝的生产指标，由原定的四十万吨减为二十八万吨。减少的原因是：第一，矿铜和铝依靠新增能力所生产的数量太大，矿铜和铝生产所需要的设备也供应不上；第二，杂铜收购的数量比原来预计的要少；第三，由于劳动力的紧张，"小土群"的炼铜不能多搞；第四，发电设备的制造任务减少。这样调整以后，铜、铝还有一些缺口，需要争取多进口一些来解决。

第二，重型设备的生产指标，由原定的一百五十五万吨减为一百四十二万吨。

第三，考虑到原材料供应和设备能力的可能条件，同时由于有关部门生产指标的降低，电的需要量也相应减少，因此，发电设备的生产指标已由原拟的九百万瓩减为六百万瓩。今年生产的发电设备加上进口的和去年结转的发电设备，预计共可安装六百万到六百五十万瓩。这样，今年的电力供应在多数地区是基本上有保证的。

第四，重新考虑了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标，我们安排了排灌设备三百万马力，动力脱粒机二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二千台，拖拉机七千台（另外进口八千多台），机引农具六万台，马拉收割机一万部，双轮双铧犁二十万部，化学肥料二百三十万吨。电犁准备经过试验定型以后，再布置成批生产。鉴于可能发生春旱，第一季度应当尽量多生产一些排灌设备。

第五，交通运输工具的生产指标，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重新进行了安排。由于今年计划生产钢轨一百二十五万吨，铁路铺轨里程相应地削减为一万四千八百公里。在此情况下，机车的生产由原定的二千一百台减为一千台，加上进口的机车一千台，可以基本上满足需要；货车的生产由原定的七万五千辆减为五万五千辆，在发挥原有货车潜力的条件下，可以大体上满足六亿吨运量的需要；汽车因燃料和轮胎的供应有限制，今年拟生产三万辆，另生产拖车二万辆，同时，增加汽车配件的生产，以便使现在因缺乏配件而不能运转的许多汽车参加运输。

在物资分配方面：

第一，生产需要的钢材，根据生产指标的变化，我们把主要机械产品用的钢材从原列的四百一十万吨中减少了八十六万吨，把一般机械、配套、市场、维修用的钢材增加了六十万吨左右。

第二，基本建设需要的钢材，从原列的五百六十五万吨中减少了三十三万吨。根据基本

建设投资的变化，我们适当减少了铁路、重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所用的钢材，同时适当增加了轻工、纺织的基本建设所用的钢材。

第三，武昌会议所拟定的方案中没有考虑增加库存的需要，是一个缺点。这次调整中增加了钢材库存八十万吨，增加了在制品三十万吨，合计一百一十万吨。这对于全年周转来说将有了很大的好处。

第四，武昌会议时分配给地方用于自筹资金的基本建设的钢材有四十万吨，由于地方有一部分项目已经列入国家计划，因此用于地方自筹资金的钢材减少为二十万吨。

经过上述调整，我们认为比原来的钢材分配方案是较为合理了。但是，今年钢材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仍然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在时间上和品种上还不能适应各地方、各部门的生产和建设的要求。除生产部门大力增产，并且尽可能增加适合需要的品种以外，使用部门应当厉行节约，规定节约指标，保证节约百分之五，争取节约百分之十。同时，对材料的分配应当按季度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适当集中使用，避免力量分散。特别在前两个季度，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原材料的设备所需要的钢材。钢材的使用，在基本建设和生产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首先满足必要的生产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为今年生产的部分和为明年生产的部分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首先满足为今年生产的部分的需要；在生产中，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首先满足必要的原材料工业生产的需要。

经过调整以后，一九五九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五十，农业增长百分之四十四；基本建设投资额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四。财政收入将可能达到六百零二亿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由此来看，一九五九年计划依然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

我们认为，经过这次调整，生产、建设同材料供应的矛盾，生产、建设同运输的矛盾，轻工业生产同市场需要的矛盾，以及劳动力分配方面的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是缩小了，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做到大体上的平衡。当然，这个调整方案也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铜、铝、石油、化工产品、电力和运输能力还感到很紧张，必须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从增产和节约两方面来消除这些薄弱环节。这个调整方案也还可能存在着一些缺点，可能有一些应当调整而没有加以调整的地方，或者应当安排而没有加以安排的事情，请各地方、各部门提出意见，以便在安排季度计划的时候加以调整。

三、保证计划实现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以二千万吨钢为纲的工业发展计划，只要全党全民继续鼓足革命干劲，集中力量，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最根本的保证是因为我们既有一条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有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物质基础和在这个跃进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计划，困难还是不少的。我们的工作还是很紧张的，在苦战三年期间，不可能设想我们的工作不紧张；在大跃进中间，也不可能设想我们不会遇到许多困难。我们的经验也还是不够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防止异常紧张和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的发生，这就需要重视困难，具体分析困难产生的原因，千方百计地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采取及时的有力的措施，一个一个的加以克服。

现在看来，今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全国一盘棋”

的精神，把全国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全国一盘棋”是实现全国统一计划，是贯彻执行党的“五个并举”的方针的最主要的措施。“全国一盘棋”就是把“条条”和“块块”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统一意志，分工负责，全党全民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共同为全局的胜利，全国计划的实现而奋斗。因此，凡是全国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和建设项目，各地方和各部门都应当全力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凡是全国计划规定的物资调拨任务，各地方和各部门都应当按期地如数地完成；凡是同全国计划有关的协作任务，各地方和各部门都应当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保证实现。如果不这样，就会分散力量，使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设备及运输力量不能合理地用在最迫切需要的方面，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甚至有可能打乱整个建设部署，影响国家计划的实现。正因为我们要继续大跃进，物资的供应比较紧张，要在跃进中不断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在当前一定的时期内，必须强调集中领导。不仅中央要集中指挥得多一点，各省、市，自治区也要集中指挥得多一点，其目的在于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迅速纳入“全国一盘棋”的轨道，更有利于今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由于今年的生产、建设任务比较繁重，抓紧第一季度的工作十分重要。从一月份前二十天的情况看，计划完成得并不好，生产不够正常，调度也不够灵活，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不要失去时机，立即把生产工作和建设工作安排好，并且具体地及时地解决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建设单位所发生的问题。最近几天来，生产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只要我们继续抓紧，情况是会进一步好转的。

总之，我们要使国民经济在今年能够继续跃进和跃进得更好，除了把计划安排得更加切合实际以外，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继续贯彻执行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整套方针，实行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在所有的经济部门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在一切企业中全面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掀起一个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同时，必须把经济工作越作越细，充分揭露事物发展中的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寻找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真正多快好省地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坚信，今年的计划，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提出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修改

郑州会议记录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二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象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

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

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在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

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象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帐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三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人民公社是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的地方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的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管理区之下的生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看到，目前人民公社内的生产队（或管理区）的小集体所有制发展到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应当肯定，生产队（或管理区）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正确处理公社内部的大集体和小集体的关系问题，亦即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区、生产队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整社工作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实行这样的管理体制，就可以避免公社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过多过死的缺点，就利于发挥管理委员会、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的积极性，首先是生产队的积极性，就利于在发展生产中发挥人民公社又大又公的优越性，就利于逐步地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利于使人民公社逐步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根据政社合一的原则，保证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

（2）统一制定全社的远景计划和年度计划。

（3）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经营和管理不宜于分散经营的全社性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信用、林业、畜牧业、水产以及其他经济事业。

（4）举办和管理全社性的水利工程和其他基本建设。

（5）统一管理大型农业机械和大型运输工具。

（6）保证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和上缴任务。

（7）统一地合理地制定全社的分配计划，安排和调剂全社的公共积累和公益金。

（8）根据按劳分配和承认差别的原则，制定工资和供给的标准，并且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

（9）根据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统一规划和有步骤地举办全社性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并且领导各个生产队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

（10）在节约劳动力和首先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原则下，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除国家规定的义务劳动以外，对于各种临时工人，必须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给以报酬，劳动所得应当按照合同规定，付给劳动者本人和生产队。

二、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或生产队的职权范围

（1）管理区（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除了按照规定交纳国家税收和向公社交纳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其余全部收入，归本单位所有。

（2）在本单位的收入中，除去按照公社规定的工资和供给标准进行分配，除去生产费用和其他各项开支以外，多余的部分，应当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和奖励，并且可以按照公社规定的比例进行必要的适当的积累。

（3）本单位的农副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统一的收购计划和按照规定留足自用部分之后，粮食的多余部分，可以多卖或自行储备；猪和其他副食品的多余部分，可以鼓励多卖，供应城市。公社和队（或管理区）之间，队和队（或管理区）之间，产品需要交换的时候，应当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买卖。

（4）当年的生产费用和小型的基本建设投资，由本单位自行筹集；对于底子薄、困难多的单位，由公社给以必要的补助。

（5）根据公社的计划，对于本单位的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和技术措施，进行具体安排。在保证完成主要农作物的种植计划和产量计划的条件下，对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本单位有机动权。

（6）举办和管理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具厂、土化肥厂、砖瓦厂、缝纫制鞋厂、粮食加工厂等小型工厂。同时可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组成和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各种副业生产和农副

产品加工生产。

(7)按照公社规定，经营所属的林业、畜牧业、水产和其它经济事业。

(8)举办和管理小型水利和小型水电站。

(9)负责办好本单位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小学校、各种业余学校、卫生保健站等等公共福利事业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10)保证国家和公社的劳动力调配计划的执行。负责本单位的劳动管理。在队与队(或管理区)之间进行协作的时候，实行换工办法，或者由用工单位付给工资。

三、不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或生产队的职权范围

(1)大型人民公社的管理区，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其性质基本上是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它的职权是，根据公社的决定，管理直属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对直属的经济事业进行核算。对于各个生产队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并且组织队与队之间的必要的协作。

(2)在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下面的生产队，其职权，基本上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的职权相同。除了仍然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财务包干的制度以外，应当把前面规定的"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或生产队的职权"下放一部分给本生产队。下放职权的范围，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党内通信*

——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毛　泽　东

中央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致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的一封信。

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大会的方针，讨论各县、社、队的具体执行方法。县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级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级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帐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余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个星期，留给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开展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象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帐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作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几天时间也就可以了。从三月四日至十日，有六、七天时间作准备，还不够吗？顶够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节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事也有利。

（《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已经多次指示，各地党政机关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目前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现象并未停止，春节以来某些地区甚至又有新的发展。这不仅影响城市社会秩序，而且妨害农业生产的进行。这种情况，如果不进一步积极设法扭转，则在夏收以前，某些容易被忽视的插花灾区还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劳动力外流。为了迅速停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必须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一、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部队、学校应该立即向所属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并且教育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此外，还要动员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九五八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职工，给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写信，广泛地宣传党和政府制止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方针，说明城市已经停止招工，并且正在节约劳力，动员多余人员回乡生产，劝告在乡的农民安心生产，不要盲目外流。

二、凡是发现农民盲目流动的地区，当地政府机关应当立即在铁路沿线及其他交通要道（如汽车站、港口等）派出专门人员负责进行检查，对盲目流动的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动员他们返回原籍。铁路和其他交通运输部门对于这项工作应当给予积极的协助。

三、凡有农民盲目流入的城市和工矿区，当地政府机关都应当根据情况，设置机构或者指定有关部门进行收容和遣返的工作。如果流入的人数较多，应当迅速通知流出地区的政府机关，立即派人前来共同进行说服、教育和遣返的工作。外流农民回家的路费，原则上应当由本人自理，如果确有困难的时候，可由流出地区政府机关酌予帮助。

四、外流农民回乡后，当地人民公社应当表示欢迎，并且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于返回的农民一律不许斗争、责罚或者加以任何歧视。对此，各有关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应当采取具体措施，保证执行。

五、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部队、学校都应当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对于今年以来本部门的招工情况认真地进行检查。所有招工机构，应当于接到本通知后，立即撤销。对于所属单位私招农民和乱挖职工的错误行为，必须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处理。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领导机关应当责成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节约劳动力的精神，对于现有工人职员，进行精简和调整，动员多余的人员，回乡参加生产。

七、某些城市还存在着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必须严加取缔。对于城市居民确实需要必不可少的各种临时工，各市、县人民委员会应当采取具体措施妥善安排，在本地区内自行调剂解决，不应当再向外地招收。

八、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郑州会议的精神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草稿）结合整社工作，进一步安排社员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并且对他们进行安心农业生产和积极建设农村的教育。人民公社不允许给外流人员随便开发证明信件，转移粮食和户口的关系。

九、流入内蒙、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和东北三省的农民，一般不要遣返，可以根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算作支援上述地区的任务。具体计算办法由农垦部同流出和流入的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协商解决。

十、凡是同农民流入或流出有关的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应当立即成立检查组，负责检查本通知及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的执行情况，并且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向国务院作一次报告。

党内通信*

——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毛泽东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的一封信。

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党内通信*

——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毛　泽　东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的一封信。

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的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3月19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22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它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为了保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3月28日发布命令，除了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的武装叛乱，3月10日就开始了。达赖喇嘛原定在3月10日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到军区礼堂看戏的事，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多

月以前提出的，3月10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

西藏叛国分子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这些叛乱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自从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以来，他们就蓄谋撕毁这一协议，准备武装叛变。由于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政策正确，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纪律严明，受到西藏各界人民热烈爱戴，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阴谋在藏族人民中得不到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1956年4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还在1956年底，就告诉他们，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

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为噶厦，委员六人，称为噶伦。在六个噶伦中，两个是爱国分子，即阿沛·阿旺晋美和在3月10日被叛匪打伤的桑颇·才旺仁增。其余四人中，宇妥·扎西顿珠已在1957年叛离祖国，逃往叛乱分子在国外活动中心的噶伦堡；另三人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在这次也已经公开叛变。在这以前，这些叛国分子即已利用他们在噶厦中的合法地位，纠集上层反动势力，勾结外敌，实际指挥康藏两地一些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若干地方，组织叛乱武装，反对中央，背叛祖国。他们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噶伦堡，其领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藏语称为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他们的武器，不少是从外国输入的。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叛乱根据地，就有多次接受蒋介石匪帮的空投接济，还设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的许多特务电台，进行阴谋活动。

从去年5、6月间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指示叛匪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并且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的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他们在拉萨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武力以后，终于在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

在3月10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中央代表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3月17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在3月19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放的希望破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3月20日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进行讨伐。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据初步统计，截至23日止，已俘获了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

拉萨叛乱的迅速平定，说明西藏叛国集团必然灭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国分子，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而叛匪只有两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骗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西藏人民绝大多数是极端贫苦的农民和牧民，他们迫切地希望从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也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他们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并且主张民主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西藏逐步地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地方。这样，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赞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间派人士。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平息叛乱，建立和平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于叛乱分子的方针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中央已指示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广泛团结一切没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负责保护西藏农牧工商政教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于俘虏和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许报复、伤害和侮辱。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3月23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它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

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偏僻的地区。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卓烈朗杰活佛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时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将逐步完全代替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新华社）〔3月29日《人民日报》〕

〔附〕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资料

（一）西藏叛乱事件的经过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了全面武装进攻。

这次武装叛乱，三月十日就开始了。达赖喇嘛原定三月十日到军区礼堂看戏。此事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多月前提出的，三月十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同时武装包围了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

在三月十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谭冠三将军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且在三月十九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放的希望消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对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进行讨伐。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据初步统计，截至三月二十三日止，已俘获了叛军四千余名，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二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为了彻底肃清叛匪，西藏各地除了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以外，都

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平叛部队在迅速平定拉萨叛乱之后，于四月八日挥师南下，又在山南地区（位于拉萨东南，在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是我国和印度、不丹接壤的边境地区）荡平了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匪的老巢，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至四月二十一日，我军已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和这个地区的所有边境国防要点，现在只有少数残匪窜入偏僻山区，不日即可彻底肃清。

西藏叛国分子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这些叛乱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自从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驻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以来，他们就蓄谋撕毁这一协议，准备武装叛变。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西藏地方政府六个成员，有两个是爱国分子，其余四人已公开叛变。），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从去年五、六月间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指使叛匪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并且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这次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挥的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其领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鲁康娃·泽旺饶登。他们的武器，不少是从外国输入的。叛匪约二万人左右（西藏共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骗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同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他们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二） 我方论点

一、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

人民日报四月一日“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社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五日“欢呼讨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一心想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人民变成它们的

奴隶牛马。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为了攫取我国西藏，一直在西藏统治集团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以便为它们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最后把西藏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这次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就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的唆使和策动的。

西藏叛国集团根本不代表西藏人民，他们只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是西藏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力图把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里通外国、祸国殃民的叛乱，说成什么“民族独立运动”，实在是无耻的谎言。

二、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华社政治记者在四月二十一日“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指出：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纪至十八纪的几百年间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规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这个声明从所谓西藏独立开始，证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一九五一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协议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谓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话，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满人、维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于汉人。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们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近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认为西藏是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说要独立了，所谓独立者也，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三、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

周总理在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团结和藏族人民本身的团结，主张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我们曾经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一些，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却继续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他们根本不想实行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一贯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行。

人民日报四月一日“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社论中指出：从西藏和平解放回到祖国大家庭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一贯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实现民主改革的政策。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促进汉藏两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中央也尽力促进藏族内部、首先是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进驻

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四、违反“十七条协议”的，不是中央人民政府而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

新华社政治记者在四月二十一日“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指出：这个声明硬说一九五一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下旬经过多次谈判和充分协商然后达成的。达赖喇嘛在协议签订后的一九五一年十月间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说到这个协议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履行十七条协议。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钞也继续流通。协议中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军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进行。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话，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哪一件不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负责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1956年成立，4月间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协议，从指使康巴叛匪骚扰一直到他们自己在三月十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没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协议的事实，也没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一九五五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属于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属于四川省。人们知道，正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达赖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途经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他们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他们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险阻。所以他们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计的。事实与他们的设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除此以外，根本没有所谓许多喇嘛被杀、许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属于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协议，不但反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协议，而且恰恰证明了西藏的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挥者。

五、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一）种种迹象使人怀疑究竟是不是达赖的声明。新华社政治记者四月二十一日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指出：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

明。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赖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许多谈话和文章，直到三月十日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一九五六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决没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的说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创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字样。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分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词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谈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词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根据印度“思潮”周刊透露，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梅农和尼赫鲁起草的”。）

（二）说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欺人之谈。新华社政治记者四月二十一日“评论”中指出：声明中关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说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说，“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这一段话表明，并不是达赖喇嘛本人而是所谓“顾问们”认识到要离开拉萨。这是关于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的真相的无法掩饰的流露。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的信中曾说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又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这说明三月十日以后达赖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三月十七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谓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谈。

4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恳切地希望，所有印度的朋友，包括我们尊敬的尼赫鲁总理，终于能够达到同我们一样的结论，即：既然达赖喇嘛亲自证实了他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他就是确实被劫持了，而提斯浦尔的声明就仍然是被劫持的产物，完全不能代表达赖喇嘛的意志，完全不能反映西藏叛乱的真实情况。

（三）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不敢面对事实。新华社政治记者4月21日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说：这个声明在谈到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赖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否认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说什么达赖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3月10日这个日期又说是“突然规定”的，是谁规定的，声明可不敢讲。但是，达赖喇嘛在3月11日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声明避而不谈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证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

玉

实。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四）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新华社政治记者4月21日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指出，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说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结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线。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六、我们对达赖喇嘛的苦衷和处境表示深切的关怀

四月十五周总理在欢迎班禅额尔德尼的宴会上说：“当我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达赖喇嘛却已经被叛乱分子劫出国外。从达赖喇嘛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苦衷和处境。我们同西藏全体人民一样，对达赖喇嘛表示深切的关怀。”

七、我们对尼赫鲁发表不干涉我国内政的声明表示欢迎，但对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对我国不友好的言行表示义愤

（一）我们希望印度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巩固中印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以及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往印度境内以后，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印度尼赫鲁总理连续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继续巩固中印友好关系的声明，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印两国有二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并且同是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两国都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西藏的一小撮叛乱分子而动摇互相间的友谊和两国共同遵守的外交原则。的确，在西藏叛乱失败以前，西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外国反动分子，曾经利用中印边界的某些地区，进行破坏我国统一和中印友好的活动。”

在这个报告中，周总理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那一部分人。是同情一百一十几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朋友（这里所说的好心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些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如果人们认识了西藏内部的真实情况，就应当同情受旧制度压迫的绝大多数的西藏劳动人民，同

情他们的社会改革要求。"

（二）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干预中国在西藏的内政的言行，是极不友好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遗憾地注意到，最近在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这种言行不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只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利益，会议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迅速消除，中印两国之间的伟大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中指出：印度政府再三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对西藏决没有领土和政治的野心。但是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对于中国在西藏的内政如此热心于干预，却远远超过了一个耐心的友好的邻人所能忍受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严肃的国家，它对于它所宣布要实行的东西持有郑重的态度。中国和印度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其中首先规定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就果然严格遵守这个协定，严格执行五项原则，不干涉印度的内政，也拒绝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印度朋友熟知中国的这种态度，而且没有理由非难中国的态度。既然如此，印度的某些政界人士为什么硬要在西藏问题上怀疑中国政府的正式文告，硬要进行不信任中国和干预中国内政的宣传，因而自寻烦恼呢？

（三）中印两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所受到的损害，不是中国方面的过错。

四月二十七"人民日报"评论员"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中指出：尼赫鲁总理说：我们对别人说我们的一切话不能充耳不闻。这大概是指中国人民近日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击。诚然，中印两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受到了损害，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方面的过错。谁都知道，中国并没有干涉印度的内政，而西藏并不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前，从今年二月开始，印度的一些报纸上就散布了许多预告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而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的许多报纸简直就象遇到了节庆一般，连篇累牍地发出了大量的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据对二十九家印度报刊从二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七日（没有包括最近更高涨的二十天）前统计，就发表了有关西藏叛乱的新闻和评论三十一万多余字。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反应在长时间内是异常克制的。甚至有人在印度的国会中诽谤中国政府，并且在中国驻印度的使馆和领事馆门前组织了反华示威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并没有对这些极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谴责。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印度的那些扩张主义分子知所检点。他们利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对中国大肆攻击，公然要求"西藏独立"，要求召集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面的圆桌会议，在报纸上发表污辱中国元首的漫画，甚至组织污辱中国国家元首的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直到这时，中国人民才表示了不能抑止的义愤。虽然如此，珍惜中印友谊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象一些蓄意破坏中印友谊的印度人那样的行动。相反，我们的斗争限于反对印度的干涉者和扩张主义分子，对于这些人的回击是必要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既然在中印友好关系上下了倾盆毒雨，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消毒工作。否则，中印的友谊就无法巩固。

八、西藏叛国集团的叛乱，证明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是必要的。这种改革仍将经充分协商和充分照顾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

四月十五日周总理在欢迎班禅额尔德尼的宴会上说："西藏绝大多数人民需要从残酷的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的许多爱国进步人士，深明大义，也主张民主地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从民族团结的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对于西藏的改革，一直采取放慢步骤和耐心等待的方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社论指出：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实行改革，要使西藏繁荣进步是不可能的。……西藏叛国集团的叛乱，证明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关于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中央仍将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

周总理在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关于西藏今后的社会改革，将由中央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方法。无论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扬西藏的优秀文化。达赖喇嘛虽然已经被劫往印度，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摆脱叛乱分子的挟持，回到祖国来。"

（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论点

这次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唆使和策动下进行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叛乱以后，疯狂叫嚷，暴露了他们的扩张主义的野心。下面就是他们的主要论点：

一、西藏的地位问题

（一）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四月二十二日在"印度支援西藏委员会"在孟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公然宣称，印度应当"异口同声地宣布西藏应当是独立的国家"。他说"中国违背了他们所作的关于西藏自治的诺言"，因此"关于西藏实行全部自治的方案在情况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是没有价值的"。他并不掩饰印度扩张主义者的野心，说根据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旧协定，后者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前者享有发展那个国家的垄断权利"，"在独立以后，印度成为这个垄断权利的继承者"。他宣扬，在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能以所谓"符合西藏人利益的方式"来帮助西藏实现和平的改革。他主张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员梅达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文章声称西藏过去一直是独立的，"因此决不可能同意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同意前英国在西藏的特务理查逊的说法，即中国同西藏的关系是"已经失效的宗主权"他还说，如果不给西藏"自治"，那么主张西藏独立的要求将得到本能的支持，印度"对西藏的支持"同它对阿尔及利亚的自由的支持相似。国大党主席、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担心在目前情况下，印度不能够给西藏这个"国家"很大的帮助。尼赫鲁的妹妹、印度驻英高级官员潘

迪特夫人答复英报记者所谓"红色中国对西藏的统治问题"时说："我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我的意见是，任何国家都不得受另一外国统治。我关心的是西藏、印度和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来抵抗想进行统治的国家。"所谓"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在"帮助在印度寻找政治避难的西藏人"的呼吁书中，竟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说成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德里市政机构在四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说："达赖喇嘛是印度伟大邻国——西藏——的精神领袖和伟大的自由战士。"这里竟然把西藏作为印度的"邻国"！

印度外交部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也说什么"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也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这个声明还硬说"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十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

（二）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或宗主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的历次讲话中，承认西藏不是独立的，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或宗主权。但是究竟是"主权"还是"宗主权"，前后说法不一。三月十七日，他在人民院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曾承认过西藏独立"，"我们一贯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我们承认宗主权是不可避免的事"。三月三十日，他在人民院讲话时表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他口口声声表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说"中印友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他总是把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和西藏的自治同时并提，一再强调"关心"西藏"自治"，而且暗示中国未给自治。三月三十日，他在人民院说：印度历史上都承认中国对西藏和"西藏的自治"享有"某种"主权和宗主权，接着下一句就是"我很高兴听到周恩来这样强调西藏自治"。他又说，周总理曾强调自治，如果我们"充分实现"西藏自治，并向西藏人"表明这一点，可能困难要少些"。四月十四日他在马德拉斯群众大会上说：虽然印度仍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是它"肯定希望西藏人民能够保持和享有他们的自治""我们希望，他们将不受别人的压迫和镇压"。假如西藏人民没有自治，他不能想象西藏问题会得到"任何行得通的或者实际的或者愉快的解决办法"。西藏问题应当根据"中国人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以及西藏人民完全自治"的方针去解决。然而，尽管尼赫鲁十分谨慎，也掩饰不了他所以强调"自治"的真正目的。就在这个群众大会上，他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被称为汉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他们组成一个单一的邦（STATE）。在四月五日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西藏或者国家，并不成为一种事业。它是国家。"

印度"政治家报"还要人们不要注意达赖，而多注意西藏"自治问题"。

在印度的人民社会党领导人中间，还有一些怪论调。象阿索卡·梅达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西藏应当拥有内政方面的自治权，外交和国防应由中国管理。"

（三）印度和西藏有"特殊关系"。尼赫鲁与印度的其他一些扩张分子特别强调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三月三十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时表示，"印度非常同情西藏"，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是对印度"感情的伤害"，印度对西藏问题不能抱"无视"态度，这是因为印度和西藏有着"由来已久的联系"和"某种亲属感情"，不仅表现在"地理和贸易"关系方面，更重要得多的是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每年都有大批香客从印度到西藏去，也有人从西藏到印度去；印度有很多人崇拜达赖喇嘛，对他非常尊敬。这种联系是"比不断改变着的政局更为深刻"。因此，印度对西藏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反映"必定是深刻的"。

四月五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再三强调：印度不想干涉西藏问题，但是不放弃

“感情方面的利益”。他详细地谈了印度对西藏的根深蒂固的感情——“深厚的民族感情”，并说西藏问题及其政治发展对印度有“利害关系”。他还强调指出，“西藏在文化方面是印度的分枝”，因为释迦是一个伟大的印度人。因此，“西藏的事态发展激起了最深切的感情和民族情感”。

“印度斯坦旗报”认为，印度在西藏有“不可放弃的利益——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利益”，中国应“衡量”印度对西藏的感情，在西藏问题上应作“某种妥协”，以避免中印两国“最为尴尬的甚至危险的局面”。印度人民社会党阿索卡·梅达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

二、叛乱事件的本身

（一）把叛乱说成是“起义”“反殖民主义”“民族斗争”“人民革命”“正义事业”。印度报业托辣斯称：人民社会党大多数领袖正式表示：西藏起义“是对中国殖民主义进行的民族斗争”。“人民社会党领袖从一开始就把西藏的起义看作，对中国殖民主义和反对残暴地企图将西藏并入中共帝国的民族斗争。”“印度教徒报”四月十九日说：“西藏的起义是一次整个民族的起义。”人民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四月十七日通过决议，说西藏叛乱是“人民革命”，对叛匪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它的失败使他们“眼泪夺眶而出”。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尼夫人说，印度对西藏人的“正义事业”表示“完全同情”。

（二）把叛乱的原因归咎于我方。四月十三日，尼赫鲁发表的演说中说：西藏发生骚乱的原因是由于有些人颇为坚决地要坚持旧传统和制度，而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实行新的制度。正确的政策将是二者结合的政策。四月十六日“印度教徒报”说：“中国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在西藏人民的头上，但是遭到了失败。”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还说什么西藏叛乱的原因是“中国当局一直进行干涉”，“中国武装部队摧毁了许多寺院”，“许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员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

（三）否认噶伦堡是叛乱的指挥中心。四月十一日在我使馆“示威”的反动分子领袖说：“中国关于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的说法是对印度的侮辱”。四月二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否认“噶伦堡被说成是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说“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他又承认噶伦堡“一直是纠纷的中心”，“是间谍的巢穴”“那里有从西藏来的移民”，“他们的感情也许是反对中国政府的”。

（四）否认达赖喇嘛被劫持。

（1）出于本人自愿。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说：“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

（2）为达赖回中国留后路。“印度教徒报”四月十六日说：所谓“劫持”的说法是中国为了将来达赖回来时顺水推舟的一条退路。

（3）是指责印度。四月十六日“印度斯坦旗报”要政府“抗义”说周总理把达赖避难说成劫持对印度不礼貌。这家报纸四月十九日社论还说：北京坚持关于被劫持的指责，这“将是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谴责印度政府不诚实。”

（4）所谓“放逐”。人民社会党领袖梅达竟然说我国“放逐了”达赖喇嘛。

（5）梅农：“没有任何印度政府的官员和达赖喇嘛的声明有任何关系。”他在第二次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后说：“由于新华通讯社希望达赖喇嘛发表第一人称的声明，因此以第一人称发表了这项声明。”

（五）尼赫鲁承认达赖给谭冠三写过信。尼赫鲁曾在人民院和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公开表示，他怀疑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他在四月五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说达赖被迫做某种事情，说达赖事实上在埋怨他自己非常崇敬他的人，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但在四月二十四日，尼赫鲁会见达赖以后，承认这三封信是真的，说达赖告诉他曾给“西藏的中国军事司令写了几封信”。他并且猜测说，达赖写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一方面达赖希望避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的西藏感情把他朝另外一个方向拉”。

对于达赖离开拉萨一事，尼赫鲁解释说，到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钟，达赖一行人还没有离开拉萨的明确想法，只是到“炮弹或者什么东西落在他的宫殿上”时，“才对他们的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决定离开拉萨。

尼赫鲁还说，达赖告诉他“希望在西藏实行改革”，西藏在精神方面是个先进的国家”，但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三、关于我军平定叛乱问题

（一）诬蔑平定叛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野蛮做法”。四月十一日，印度大约有四十个反动分子在我使馆门前“示威”，喊了二十五分钟的口号：“西藏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西藏独立”；“停止镇压西藏”；“人道主义万岁”；“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去”。二十日，大约有一百名人民社会党工作人员在我使馆门前举行“示威”，高呼“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他们在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诬蔑我们“军事干涉”说中国“无权用武力维护它对西藏的‘宗主权’”，并向贴在领事馆墙上的毛主席像扔西红柿。社会党领袖纳拉扬要尼赫鲁向世界宣布，中国“对西藏进行了侵略，中国人没有权利镇压西藏人民”。“印度快报”四月十九日以“国家安全”为题发表的社论，也说平定叛乱是“中国对西藏的侵略”。印度的三个佛教组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使西藏殖民地化和奴役化”。印度报业托辣斯说，人民社会党大多数领袖认为，科伦坡国家应当表示“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把西藏吞入中国共产党的野蛮做法感到愤怒”。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之一克里帕拉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没有历史根据”，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动。”

（二）诽谤我们是“扩张主义”。国大党执委、上届主席德巴发表文章把叛乱的失败说成是“西藏的悲剧”，说什么“一个世界大国再一次没有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它的软弱的邻居”。他竟然要求中国“主张重新考虑它在西藏的措施”。他还恶毒地说，“社会主义的哲学并不是防止扩张主义倾向的保证”。

（三）尼赫鲁的论点是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对于北平没有履行保持西藏自治的诺言感到遗憾。”

四、竭力挑拨中国和印度等国关系

（一）说中国“破坏中印协定”。印度扩张主义者诬蔑并攻击我们在西藏的行动“违反中印协定”、“违反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印度快报”、“印度箴言报”等捏造说中印关于西藏的协定是“根据中国和西藏签订的协议缔结的”，后者“保证西藏自治”。现在中国和

西藏之间的协议被撕毁了，因此中印协定就“失去存在的基础”，中国破坏了中印协定。

（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西藏协议破裂了，但这“说不上会怎样影响中印协定”；西藏事件“不直接发生违反潘查希拉原则问题”。）

（二）说中国有“侵略野心”。他们特别宣传“西藏叛乱将使中国与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对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侵略野心”等问题，“印度教徒报”说，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前已经有摩擦，例如：中国不顾印度政府的抗议，在地图上一再把印度的某些地方划入中国境内；中国军队占领了印度的一些领土；中国不准印度重建它在亚东的办事处；中国政府没有答应尼赫鲁在去年希望访问拉萨的要求；等等。西藏叛乱事件“伤害了印度的感情”，表明“中印关系中的蜜月已经结束”（印度时报）。印度向来重视西藏的“缓冲价值”，不愿意在它的北边邻邦出现“任何变化”（印度斯坦旗报）。西藏事态的发展“给印度北部带来了不安全”（印度人民同盟领袖瓦吉帕伊）。“印度教徒报”还认为，由于西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边境、印度和达赖同一教派的人可能参加叛乱等种种原因，很可能“导致共产党人的入侵”。国大党议员达尔尚甚至叫喊中国有“野心”，想把它的影响扩大到其他邻国去，“证据”是中国占领了印度阿尔摩拉地区的一块领土以及中国地图把不丹、尼泊尔、拉达克包括在中国地图内。印度“邮报”甚至说，今天是西藏受到压制，明天就可以轮到不丹、锡金，然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能受到威胁。“印度快报”还追溯了历史，以孙中山曾宣称朝鲜、台湾、安南、缅甸为我“失地”，琉球、爪哇、锡兰、尼泊尔、不丹都是中国从属国的事实，说明中国“从来没有以平等对待其他民族”。因此，达尔尚要印度政府在北部边境保持“高度的戒备”。瓦吉帕伊也叫嚣，要使国家“处于军事准备状态”，以防万一。

五、他们以后的打算

（一）想把达赖作人质对我们进行要挟。四月二十一日，印度“甘露市场报”竟要周总理访问印度，以便在印度“帮助下”举行谈判，使达赖返国。

（二）举行圆桌会议。“箴言报”四月二十一日叫嚷由印度召集友好的圆桌会议，“说服中国总理和达赖都参加会议”。

（三）恐吓威胁，希望我让步。“印度斯坦旗报”十九日社论说：“如果中国在西藏继续采取暴力政策，这必定会招致各种冷战的麻烦。”“印度快报”四月十九日的社论说：“如果中国要在西藏和国际中争取朋友，它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服从西藏领袖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人民那种和平发展。”

（四）主张提到联合国，借助西方力量。人民社会党领袖纳拉扬主张把“西藏问题”提到联合国。印度驻美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里·查格还埋怨“自由世界”没有“承认北平”。他说，“假如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西方就可以站在世界舆论的前面，并谴责它的行动”。

（五）妄想东山再起。人民社会党全国通过的决议希望西藏人有“英勇决心”以及“他们在亚洲和全世界引起的深切同情会帮助结束他们重新有机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四）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叫嚷

一、竟称西藏为"独立国家"

英国"每日电讯"报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和中国作战不仅因为中国是共产党，主要是由于他们是殖民者，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和英国在印度的权利、日本在朝鲜的权利一样是不充分的。

南斯拉夫"战斗报"在介绍西藏地理情况时，把西藏说成"是一个为群山周围的国家"。"新闻晚报"则说，"西藏是一个喇嘛和牧师的国家。"

二、竟称西藏叛乱为"革命"、"起义"

开罗"晚报"在四月七日刊载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说，"尽管人们在西藏事件上有着不同看法，不能否认的真理是："这个革命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一部分。"

南斯拉夫"解放报"竟把西藏叛乱竟称为"起义"，污蔑中国军队是"占领军"。四月七日"解放报"副刊发表评论说，西藏是一个不同于寻常的国家。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西藏叛乱是我国的内政。

三、诬蔑我平叛是"侵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在三月二十四日说，"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又污蔑周总理的命令是"摧毁西藏人民的历史性的自治，这悍然违反了北平一九五一年五月所宣布的保障西藏人的政治和宗教自治的庄严保证。"并且污蔑我们是共产帝国主义，说什么"中国共产帝国主义者对西藏进行野蛮干涉，企图剥削这个光荣的、勇敢的民族所珍视的宗教和政治自治，并败坏他们的制度，以达到共产党的目的。对于受到这种野蛮干涉的西藏人民，美国寄于深切的同情。"

亚盟缅甸支部主席德欣巴盛在四月九日污蔑我国镇压叛乱是中国共产党侵略西藏，并且还鼓励缅甸人民支持西藏叛匪。

三月三十一日合众国际社电讯竟说，中国人在西藏是殖民者，中国人口增长快，"正在鼓励把人口扩张到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不想把自己只限于中国本土"。

美国驻日本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竟说，"共产党中国，打算镇压西藏人民的粗暴企图，证明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和侵略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远自列宁共产党人，就认为武力是达到他们统治世界这个最后目标的合法手段。"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达在参议院演说中说：在亚洲的广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因为佛教堡垒西藏由于争取赤色中国所答应给予的自治而遭到它的赤色中国主子的野蛮镇压，同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还粗暴地违反了他自己在一九五五年在亚洲国家万隆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不侵犯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四、诬蔑我平叛是"史无前例的一种残酷镇压"

美国国务卿赫脱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声明诬蔑"我镇压西藏叛乱是'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是消灭他们帝国主义以内的一切个性和人类价值的残酷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又

一次表现了共产党的伪善。他们指责别人侵略和干涉，但是，当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一个勇敢的民族寻求自由的时候，他们却报之以残酷的镇压”。在这个声明中，他还污蔑我“残酷地压制人类自由和为了摧残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美国国务院二十八日的声明则污蔑我“野蛮地干涉”西藏人民。

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叫嚷：共产党中国对西藏的进攻是“史无前例的一种残酷镇压”。东南亚条约组织秘书长沙拉信竟说：最近发生的压制自由的事件记忆犹新。这是一个没有威胁别人、而仅仅希望表示对宗教的虔诚的小国遭到残酷的武力镇压的典型例子。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帝国主义是什么——武力共处。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还污蔑西藏事件是共产党压迫另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自由和宗教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五、挑拨我国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

“美国人报”污蔑我威胁印度，说什么“一旦西藏被征服，下一阶段大跃进的步骤就会制订出来，那就是印度”。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竟说“西藏如果驻的是不友好军队，那么这种军队就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从山路入印度。扰乱印度的安逸和安全。”

“美国之音”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说，“班禅喇嘛和中共周恩来总理都指责达赖喇嘛是在印度反叛分子的强迫之下被拘禁的。”美国通讯社和报纸挑拨说：“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印度人民对中国‘已经越来越怀疑’，印度政府和舆论从西藏问题发生以来就转而反对中国。”

英国“每日邮报”在四月四日刊登了一篇“为什么尼赫鲁动摇，但是这甚至使他垮台”的文章，文章说：“为了他自己，为了印度，我希望他能够断然站到西藏一边，假如他不这样，他也许会发现他不仅必须面临感到愤怒的世界的呼声，这个呼声他是假装不知道的，而且还必须面临他自己的极为失望的共产党人”。

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分子不但如此，而且还进一步地妄想煽动其他国家反对我国。美国两位前驻印度大使竭力煽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反对我国。他们叫嚣：“亚洲人已经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亚洲许多领导人过去信赖关于和平共处的诺言，现在他们已经看出这种诺言破产了。”“亚洲人已经知道帝国主义不仅会来自西方，也会来自东方。”

阿联的“共和国报”也说什么“中国的侵略使尼泊尔和印度的一些保护国受到威胁”。

六、利用宗教煽动人们反对我国

帝国主义和外国的反动分子，挑拨离间的花样是很多的，他们还利用本国的宗教来煽动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来反对我国。

锡兰等某些国家鼓吹“佛教国家”和“佛教世界”应出面干涉我国。

缅甸共和国民党最近通过一次决议，污蔑我“对于手无寸铁的西藏人民和毫无防御的寺院的攻击是对佛教世界和佛教的一个攻击。要求联合国组织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步骤：“红色中国军队撤出西藏”。缅甸和锡兰的某些反动报纸也污蔑我破坏了西藏的宗教。

开罗“消息报”主编在四月十一日发表文章说：阿拉伯民族主义信仰宗教，并且尊敬所有的宗教，而共产主义不仅反对伊斯兰教，也反对基督教、佛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他最后

还说，共产主义并吞少数民族，它同样反对所有的道德原则和理想。它是要让人处于奴役、失望和屈辱的地位。

蒋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四佛教团体发表声明说，西藏人惟有反抗共产党的压迫，佛教不能与共产主义共存。

蒋帮“全国各界援助铁幕内人民争取自由委员会”在三月二十七日致电东京亚洲佛教释尊赞颂会，要求该会支援并呼吁亚洲各国佛教“支援”西藏叛匪。同日道教头目“张天师”叫嚷西藏叛乱是宗教界“大规模反共开始”，要各宗教徒全力支援。

（五）世界进步舆论的正义呼声

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世界进步舆论一致认为，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莫斯科电台指出，西藏局势，“纯粹是中国的内政”，东南亚条约参加国想使西藏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的。

印尼“人民日报”社论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干涉它的内政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将违背万隆会议精神。印尼驻华大使说：“西藏事件纯粹是中国的内政”，“按照万隆亚非会议的精神以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采取不干涉的立场。”这位大使对新加坡的记者说，印尼完全同意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事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印尼本国在不久以前也曾经验过内部叛乱的痛苦。

棉兰“希望报”说，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进行干涉。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毫无问题，人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伊拉克共和国电台广播说，西藏是人民中国的一个自治地方。

印度的公正舆论一致指出，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印中友好协会通过关于西藏的决议说，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九五一年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定的协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和宗主权。

声明说，这些分子既不是争取民主，也不是争取自由。他们获得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反动的。实际上，这些分子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他们是不能够发动反革命叛乱的。

英共“工人日报”认为，西藏的反叛，“原来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反叛，而是一小撮希望把大多数西藏人永远置于农奴制度的一伙封建分子的一种不顾死活的、疯狂的挣扎”。“封建主们在外界（其中包括蒋介石）的怂恿下，起来实行武装叛乱。如果制止他们想把时钟倒拨，把西藏再度交给国内外反动派，那不是一个道义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首先符合于绝大多数西藏人本身利益的行动。”

捷“红色权利报”指出，西藏叛乱不是某种民族间的冲突，而是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是进步和倒退之间的斗争。任何把叛乱说成是争取西藏自治的斗争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注定要失败。

二、西藏叛乱是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策动的

莫斯科电台广播说，西藏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阴谋的一部分”，那里发生这次叛乱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者怂恿下组织的。

苏联“红星报”指出，西藏的叛乱是西藏的反动上层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策动的。但是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失败了。

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发表声明说，在西藏制造这种巨大的、无谓的苦难的人，是不愿跟着时代前进的反动派，是想阻止现代文明以及平等的曙光在西藏出现的农奴主。这些分子不正当地使用中国人民民主政府给予他们的信任，利用了中国政府尊重西藏自治情况，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策动叛乱。

印度“国民先驱报”记者揭露：西藏“是一个馅饼”，许多人“想捞一口吃”。美国安慰和援助当地反动派，零星运军火去西藏，还通过蒋帮向西藏空投。英国在西藏境内或周围进行阴谋活动。

锡兰“锡兰之光报”发表专文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叛乱是从康巴族人开始的，这些康巴族人是一伙不遵守法律的人。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进步活动成为对地主和印度商人的一个莫大打击，由于印度商人的贸易遭到了打击，他们开始散布各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印度人开始把各种凶器，包括机关枪，卖给康巴人以及其他无法无天的实力贩子。印度商人的这些行动的后果就造成了目前西藏的叛乱。

加拿大“论坛报”记者指出，美国支持叛变企图分裂中国，其目的是：“（1）保证农奴主们牢牢地控制西藏。（2）强使西藏脱离祖国，借以分裂中国。（3）按照台湾的样子，把西藏变成外国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陆上军事基地来反对中国。（4）挑起在中国其他部分的叛乱。（5）使中国卷入同它的邻国，首先是印度的摩擦和冲突中去。”

澳大利亚“论坛报”说，西藏叛乱是帝国主义策动的，叛乱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政府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而宣告失败。“这次叛乱遭到跟反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伊拉克政府的叛乱相同的悲惨命运”。

三、所谓达赖声明是缺乏真凭实据的

英共“工人日报”说，所谓达赖声明是“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发表的。“这肯定不能证明，现达赖喇嘛在摆脱了封建反叛分子的挟持”。

印度“论坛报”认为，达赖的声明和周恩来的报告，“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声明总有一个是不真实的”，而“中国领导不至于天真到捏造关于达赖的消息”。印度“划时代报”认为，所谓声明起草得很巧妙，但却很难令人接受。印度“自由新闻”说，达赖的戏正被西方用来达到冷战的目的，印度舆论如果追随西方的话将是可悲的错误。

四、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谋

莫斯科电台评论指出，人们正在发动一次运动来破坏人民中国在亚洲的声誉和损害它在印度的威望。“西藏的这次叛乱被用来作为挑起印度和人民中国争吵的借口”。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发表斯特朗的文章指出：英国抱骑墙态度说：“我们久已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是根据这样的谅解：西藏有自治权，”这是巧妙地为伦敦留下将可以采取

任何行动的余地。尼赫鲁效法英国，提醒北京关于西藏的“自治”，然而他坚决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提醒的话缓和了些。赫脱还是用国务院一贯的办法，硬说西藏最反动的农奴主要使农奴制度的最坏的弊端永存的那种企图，是“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

印度的公正舆论纷纷指责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谋。

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不应当准许把我们的领土用来对中国采取敌视和有害的行动。”声明指责印度社会党和右翼党派希望印度同人民中国的关系恶化，“使帝国主义更加有利可图”。声明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对噶伦堡的情况进行调查。

印共书记处发表声明说，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我们关于西藏的协议中诞生的，这些原则要求我们严格遵守中立，互不干涉内政。

许多报纸警告印度某些政界人士说，假如我们真诚地维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就“必须谨慎”（“联合报”），“提防西方国家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挑起争吵的企图”（“团结报”），“必须极端克制”（“今天报”），“不要对中国使用什么不客气的字句”（“甘露市场报”），“印度如果进行任何干涉，都将违反潘查希拉，并将引起危险的问题”（“印度时报”）。印度的进步舆论还指责印度反动分子“就西藏独立进行叫喊”是“利用印度的情绪来在反共的火上加油”（“闪电”周刊），指责尼赫鲁的“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只会为反和平的阴谋者壮胆（“自由报”），并且呼吁全国人民及各政党和领袖为发展中印友谊而奋斗（印中友协通过的决议）。

五、平定西藏叛乱将加速西藏民主化

捷“人民防线报”说，“反动封建势力的失败，加快了西藏的民主化和它的民族团结，并且在西藏历史上打开了新的进步的一页。”

印尼“人民日报”说，西藏的黑暗无疑已经永远过去了，因为反革命分子在西藏发动的叛乱现在已经被平定。

印度“划时代报”说，西藏人民普遍向往美好生活，维持农奴制的势力不会持续很久的。那里的普通人民盼望进入新民主和更美好的现代生活世界。

希腊“黎明日报”说，叛乱被镇压下去了，筹备委员会掌握了政权。毫无疑问，在平定了武装叛乱以后，发展将会加速，西藏民主化将会加快步伐，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

法国“解放报”说，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始终是联系人民群众，以便和平地、平静地进行必要地改革。他们没有做过任何违反西藏人的愿望、宗教和风俗习惯的事情。“所以叛乱是毫无道理的。”“叛变行动，将加速西藏政治社会的转变”。

〔附〕 西 藏 概 况

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位于我国西南部，面积一百二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共一百二十万。居民的民族成分，百分之九十是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只占少数。

西藏地势高峻，向有“世界屋脊”之称。全区均为高山环绕，喜马拉雅山在本区南缘国境线上，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接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八千八百四十公尺，是世界第

一高峰。主要大河为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前藏拉萨是政教经济文化中心，城内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坐床的地方；后藏大城日喀则有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喇嘛坐床的地方；江孜和亚东是对印度贸易的中心。

西藏物产丰富，矿产资源中金矿分布很广。水力资源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居民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

西藏地方很早就和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往来，到唐朝时，除经济、文化、交流之外，在政治上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唐廷曾先后以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给吐蕃国王。西藏地方到唐廷的使者也不绝于途，直到吐蕃衰亡，每代赞普死时，都要向唐廷报丧；新立赞普，都要向唐廷报聘。每代唐皇继位，吐蕃皆奉表祝贺。此外，吐蕃向唐求互市、贡献礼物的使臣亦很多。

唐朝末年（九世纪中叶），西藏内部发生了混乱和分裂。宗教徒刺杀了吐蕃王朗达马，全藏大乱。吐蕃王室崩溃，许多王室臣属纷纷投向唐廷。这以后西藏分裂为无数的小部落，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年（九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

公元一二五三年，元宪宗蒙哥派遣军队进入西藏，结束了西藏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西藏地方。从此，西藏地方便归入大元帝国的版图之内，西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一二七五年，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因为西藏萨迦派（花教）法王八思巴创造蒙文有功，封他为"大元帝师"，并把西藏地方交给萨迦法王统治，这就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开端。

元朝统治崩溃以后，萨迦法王王朝在西藏的统治也随之垮台，噶举派（白教）法王帕莫主巴取而代之。但是西藏地方与祖国的隶属关系，并未因为大元帝国的崩溃和萨迦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垮台而有所改变，在明朝，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明朝统治趋于崩溃的时候，西藏噶举派法王在西藏的统治也发生动摇，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西藏格鲁派（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借青海蒙古酋长固始汗的兵力，推翻了噶举派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从那时起，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领导集团掌管了西藏人民，由清乾隆皇帝规定的"噶厦"为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

清朝末年和民国成立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加紧策动西藏反动分子进行种种反对祖国的活动，曾使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蒙受严重损害。但是中国始终保持着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以及西藏民族内部达赖和班禅之间，三十年久悬未决的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介绍山西经验

——毛泽东同志批转陶鲁笳同志关于山西省各县人民公社问题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愈头昏。

陶鲁笳同志关于山西省各县人民公社问题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

主席：

最近几天，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一下各县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一般都开的极为生动活泼，解决问题又快又深又透。开会的方法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也有了新的发展。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一、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毛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种形势逼着县委不能关起门来开五级干部会，而不注意领导全民讨论。怎样使这二者结合进行呢？一般有三种方法：（1）开全县性的电话会议或者有线广播会议。（2）各个公社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人，一部分人是固定的（每县平均四、五千人），另一部分是不固定的。会内会外，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利用大字报，内外交流，互通情报。大字报的内容，有批评、自我批评的，有建议或表示不同意见的，有报喜的……。（3）县委临时派出工作组帮助领导较薄弱的公社。（毛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

二、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毛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有二、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各种各色的对立面的意见，畅所欲言的放出来了。有的人指住公社党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的鼻子大发牢骚，甚至有破口大骂的。有的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掉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有的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还有的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真容，跑

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各县都按照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坚持的采用了自上而下的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和群众性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相结合的说服方法。这样作，效果极好。不但基层干部有瞒产私分、本位主义、弄虚作假等缺点、错误的纷纷作了自我批评，而有观潮派、算账派言论的人，极大多数也作了自我批评，最后，极个别的有反动言论的人彻底地孤立起来了。从而使大家心情舒畅地、由浅入深地达到了统一的认识。有的同志说，过去几个月，上下之间有怨气，现在化为和气了。

三、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五级干部会议的时间，一般是七、八天，最多九天。三分之二的时间着重解决思想问题，其余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解决公社体制问题以及若干具体政策问题。但是，在解决思想问题的过程中，公社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迫切的要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其中，以劳动力问题、粮食问题和去年秋季大炼钢铁以来的经济账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针对群众的这些迫切要求，坚决的、迅速的处理一些可能办到的实际问题，对于鼓舞干部和群众的情绪，进一步推动思想运动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例如：忻定县在会议过程中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在不多几天之内，就从全县大小城镇中动员回乡两万多人，其中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一万余人。同时，在粮食问题上，根据不同来源、不咎既往、现款交易、谁卖谁得的政策，和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指在同一个生产队内，劳动成绩好的人比落后的人，分得的口粮可以多一点）、多产多吃（指超产的生产队比没有完成包产的生产队，可以从超产部分中分得一定比例的粮食）、多产多卖、多卖多得、多得多分的原则，明确地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当此项办法向会内会外的干部和群众宣布了之后，在几天之内，全县尚欠八百万斤粮食收购任务，很快的完成了。有些公社闹“缺粮”风潮的不闹了。又如运城县五级干部会议在解决思想问题的过程中，宣布了将过去一个时期公社一级扣用原高级合作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六十四万元全部退还给原高级合作社。许多社员听到了情不自禁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毛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四、全民大讨论和当前的生产运动相结合。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期间，从县委到公社各级组织，都有专人分工负责领导生产。群众白天生产，利用空隙，分头酝酿，或出大字报，晚上开会讨论。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毛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

看来，农村出现的一片新气象，对于城市的工业生产运动，将又一次的起着促进的作用。最近，在工业生产方面，群众运动的高潮，也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

附上材料二件：

一、山西省委关于榆次市、太谷县五级干部会议开会方法的通报；

二、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同志关于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

陶 鲁 笳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四月）

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毛泽东同志给谭震林同志的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象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

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全国的人民公社普遍地进行了整顿工作。对于整社中间发现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一个多月来，郑州会议的决定下达到广大的农村，得到了公社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围绕着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原则的规定。这个会议纪要就是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意见。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这个纪要不能把一切情况都包括进去。各省可以根据这个纪要所规定的原则，作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具体规定。

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

现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制；而且基本上是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总之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要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许多时间，急是不行的。要向广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讲明，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在将来，在把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时候，必须经济上不使任何一个生产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变而对于所有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有利就变，变而对于某些生产队和某些个人有损就不变，除了这个经济条件以外，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就是社员群众的自愿。群众要求变就变，群众不愿意变就不变。改变的步骤还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为基本上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所有制，即是以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大队统一计算盈亏，统一分配；第二步，再由基本上生产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即是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全社统一计算盈亏，统一分配。当然，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基本上是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所有制的，那就没有分两步走的问题。在将来，实现了基本上公社所有制以后，生产队还是一级核算单位，还有一定范围的管理权限，还保持部分所有制。

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

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时候，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相当于原高级社的单位，有些地方是生产队，有些地方是

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做法。这种做法符合于郑州会议的规定，得到原高级社的干部和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因而是适宜的。也有少数地区，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做法，如果群众确实同意，也是可以的；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改变，千万不可勉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即使勉强实行，终久是行不通的。

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在少数地区，是以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下面的生产队是包产单位。这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队，同样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生产小队向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的部分，按照过去高级社实行的办法，上缴一定的比例给生产队，其余部分归本小队所有；节约下来的生产费用，全部归本小队支配。在保证完成生产队布置的农业和副业的生产任务、服从国家市场管理的条件下，生产小队可以经营各种小型副业生产，在不影响包产任务完成的条件下，生产小队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可以利用的零星土地，应当尽量利用；所有这些经营的收入，都归本小队所有。归生产小队所有的全部收入，如果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要调动给别的单位，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归生产小队所有的全部收入，生产小队除了可以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作本小队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应当把绝大部分，不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的部分，分配给社员。

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对于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的使用权，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不能轻易调动，如果必要抽调的时候，一定要在不影响本小队完成包产任务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必须商得本小队的同意。生产小队在安排作物种植面积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地必须按照生产队布置的计划安排，百分之三到五的土地（包括生产小队的蔬菜地和饲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机动使用。

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核算以后，公社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是它的组成部分。公社管理委员会仍然有很多工作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做好。

公社管理委员会必须把全社的生产领导好，不能和过去区、乡两级的党政组织一样，只泛泛地管生产。不只是要抓生产计划，还要抓先进技术措施的推广，抓生产资料的供应，抓劳动力的规划，抓生产部署。在取得生产大队的同意下，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和生产大队联合经营高产示范田，借以取得经验，指导全社的农业生产。

公社管理委员会必须办好属于自己直接掌握的各种企业，如工厂、矿山、农业机器站、抽水机站、畜牧场，果园、林场、渔场等等，使这些企业成为扩大公社积累的重要来源。公社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公积金和从国家得到的投资，除了用来帮助穷队以外，主要部分应当用来发展这些企业；用于社办学校、医院等文化福利事业的，只能占一小部分。

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

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这是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上，过去的账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代。对干部来说，算账，一方面可以使广大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干部中占小便宜、超支工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揭露出来，可以挽救一批干部。算账还可以教会农民管理自己的公社，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公社和基本核算单位应当成立有负责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算账小组 实行发动群众和专门小组相结合的方法，同群众商量办事。那些账必须细算，那些账可以粗算，那些先算，那些后算，算清之后如何处理，都要经过群众讨论决定。

在算账中间，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在财务上的问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性质，划清贪污和非贪污的界限，分别加以处理。要教育犯了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主动"下楼"。要做到少处分人，把处分的面缩小到最小限度。贪小便宜、超支工资、挪用公款的干部，只要愿意检讨，并且愿意退出不该自己所得的那些东西(一时退不出的可以分期付还)，应当一律不予追究。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要愿意坦白，决心改正错误，除了必须追回贪污的东西以外，也应当从宽处理。

下面是几笔大账的处理原则：

（一）县联社、公社在大办钢铁、修公路、铁路，兴建工厂的时候，从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调用的劳动力，以及大办钢铁和工具改革运动中群众捐献的废铁、砖、木等，账目无法弄清和无法处理的，应当向群众解释清楚。县联社、公社向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调出的机器、农具和运输工具，都要清理出来，如数归还；用坏了的要负责修好。

（二）公路、铁路、工厂、矿山和其他基本建设占用的土地，除了公社自己兴办的由公社合理调剂以外，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办理，不能够无代价地随意占用。征用单位目前暂不需要的土地，应当退归给原单位继续耕种。

（三）公社把某些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粮食、猪、羊和其他农牧产品，调给别的生产队、生产大队，或者调到公社的，这些账都应当结算清楚，由公社或者调入的单位归还实物或者作价归还现金，现在还不起或者一次还不清的，可以延期或者分期付还。

（四）队与队、社与社之间，支援的劳动力，也应当结算清楚，如果细账算不清，可以由双方协商，估算出一个大概数目，以后采取换工的办法，由使用劳动力的单位还工给出劳动力的单位，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补偿。公社和生产大队直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从生产队调用的劳动力，如果没有付给报酬的，应当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付给应得的报酬，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给以补偿。

（五）县、公社和生产大队曾经把原高级社经营的一些企业单位调来归自己经营。这些企业单位，按照新规定的管理体制仍然可以由高级社（现在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应当发还；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比较适宜的，应当把原有的资材设备合理作价，向生产队偿还价款，或者作为合营的企业，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同生产队按比例分配企业利

润。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抽调出土地和劳力，种植的大片小麦和其他春熟作物，应当继续好好经营，同生产队商定一定的比例，分配收益。

（六）原高级社一九五八年的各项财务账目，包括收入、支出、资产、负债、公共积累和社员的工分、工资等账目，都要结算清楚，向社员公布。

（七）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集中饲养的原属社员私有的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除了能够退回的退回以外，其余的都要合理作价，由集中饲养的单位负责还清价款。

（八）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向社员借用的房屋、家具等，可以归还的应当归还，还要继续借用的，应当开给借条，承认原主的所有权，或者订立租约，付给低额的租金。

六、国家银行和社会间的信贷关系问题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有一部分是没有到期而收回了的，应当一律退回。原来高级社所欠的贷款和私人所欠的贷款，都应当谁欠谁还，不能一律以公社为单位扣还，凡是从公社统一扣还了的也应当一律退回。

今后在农村中取消存贷合一，存款和贷款仍然分开。强迫储蓄、实物存款、代扣各种欠款、非现金结算等等做法，一律停止。

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

人民公社收入和分配的比例，今年三月的郑州会议已经有一个大体规定。最近各省各县召开的干部会议，反映出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不仅要求确定比例，而且要求确定公粮和统购的绝对数。这次上海会议已经把全国的公粮总数和分配给各省的绝对数（包括地方附加在内）定下来了，各省也要逐级分配下去，一直分配到公社和基层核算单位，并且及早向群众宣布。要使群众知道，在这个数字之外，增产的部分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央和地方都在内）不加征农业税，除了国内发生特殊重大的灾情以外，也不增加统购任务。当然，如果他们要求多卖，国家可以多购。

人民公社把今年的生产指标和包产指标定下来以后，也要把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定下来。必须厉行节约，不要把开支打得过大，要根据可靠的收入，也就是根据包产指标，来定各项开支。如果以今年的包产指标作为一百，生产费用一般不宜超过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四，经济作物区可以定得高些；管理费用（包括干部的补贴）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公积金不要超过百分之八到十八；公益金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五到七十，扣去国家的公粮和税收，就是分配给社员的部分，这个部分大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到六十左右。所有的这些比例，都要定出绝对数字，向群众宣布。各个公社在决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数目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必须使社员的收入比上一年有适当的增加。

在一个公社内，各个基本核算单位如果穷富差别较大，它们的公积金占收入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但也不要过分悬殊，不要变相地把穷富队的工资和供给水平拉平。各个基本核算

单位的公积金，一般应当上缴给公社和管理区六、七成，自己积三、四成；个别较穷的单位，也可以自己得六、七成，上缴三、四成。公益金的主要部分，应该归基本核算单位支配。县联社今年一般不向人民公社提公积金，如果必要提的，也不能超过公社一级所收到的公积金的百分之十。

今年秋收以后，要召开一次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讨论公社的年终分配和明年的生产计划、增产措施。除了个别省可以先开以外，一般省的开会时间大体上可以在十月中旬。

八、关于工资制

评定社员的工资，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应当办得更好。各地许多人民公社都实行了评定工资级别，按照级别发固定工资。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完善的。为了促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现在有些地方的公社实行了“死级活评”，即是把工资级别作为基础，类似过去实行“死分活评”时的劳动底分，根据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按所得的工分多少多发或者少发工资。还有些地方的公社采用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动日分配的办法。评工记分是从办合作社以来群众就熟悉的办法，看来把这个办法和评定工资级别的办法结合起来，是适宜的。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地公社应当根据这个原则，征求群众的意见，制定出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把工资制度加以改善。必须使每个社员都感到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合理的报酬，有利于劳动积极性的发扬。

九、关于供给制

各地人民公社，根据自己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分别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包括油盐菜蔬等）或者粮食供给制（不包括油盐菜蔬等）。还有少数生产水平低、收入少的公社，实行了粮食半供给制，即是一部分口粮实行供给制，另一部分口粮的代价在工资中扣除。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符合于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因此必须坚持下去。为了约束农村中的二流子和懒汉，人民公社应当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使供给制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现在有的公社，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还有的公社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都是经过群众的民主评议，对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评定一定的劳动日或者劳动工分。完成这些劳动日或者劳动工分，作为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条件，做不到的要补缴伙食费。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则仍然给以供给制的待遇。这些办法，既保持了供给制的优越性，使一些不能劳动的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保障，又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办法，对于维护劳动纪律和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有利的，各地可以研究推行。

外出人员（机关干部、军人、职工、华侨等）的家属，原来是由外出人员负担生活费用的，他们的伙食供给不能由公社负担，应当由外出人员寄钱回来，向公社缴伙食费，或者按照家属参加公社劳动的情况，缴一部分伙食费。外出人员寄给家属的钱，除了应当缴纳的伙食费以外，其余的全部归他们的家属支配，公社或者生产队都不得扣留或者挪用。如果外出

人员的收入很少，确实无力养家，经过所在单位的证明和社员的评议，伙食费可以酌情减免。外出人员的家属，如果不参加公社劳动的，自己愿意在家里作饭，不参加食堂的伙食，公社应当允许。家中有赡养人口，本人没有经过公社准许，私自外出流动的，家中人口的伙食供给也不能由公社负担，应当由个人自理。

为了节约粮食，公社的食堂可以在口粮依人定量的基础上实行饭票制度，每月结算一次，社员节余的粮票可以从食堂换出粮票或者现金，归自己所有。

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

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两项指标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完成。稻、麦和玉米等在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例需要提高，薯类产量的绝对数，除了薯类种植过分集中的地区以外，一般也不宜降低，并且还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多种一些晚薯。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在全国平均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没有达到一千斤以前，不能轻易缩减。

各地各级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指标的时候，应当注意留有余地，以便使下面能够超额完成。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产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包产指标一般要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百分之十到二十，使包产单位和社员群众可以从超产部分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样才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

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是和先进技术措施的推广分不开的。在推广增产技术措施的工作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得到一些失败的教训。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增产技术措施的推广，必须通过群众，经过试验。从中央管理农业工作的部门，地方各级管理农业工作的部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管理机构，在提出增产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具体情况，使下面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管具体的情况如何，由上面强制规定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那是很危险的。一切增产技术措施的推行，都应当经过典型试验，凡是没有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的，不要急于推广；一些有特殊条件的小面积试验，即使成功了，如果在大面积推广的时候还难以具备同样的条件，也不要贸然推广。一切增产技术措施的实行，都应当经过当地群众的充分讨论，在群众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时候，可以进行小面积试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

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是包产的单位，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对于增产技术措施的采取，生产小队有权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共同意见作出决定。凡是生产小队认为没有把握的技术措施，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不能勉强它们实行。

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的全部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包括用于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生产方面的，一般应当不少于百分八十，经常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卫生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在农忙季节，水利、交通等基本建设，林业和副业

等生产，都要同农事季节相结合。农忙时少办，农闲时再多办现。在有些县和公社使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多了一些，应当认真地加以整顿和紧缩。公社和生产队的生活服务人员，也应当认真实行精简，并且应当尽量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少用强壮的劳动力。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外调的劳动力确实多了一些，还有一批劳力盲目外流，城市和工矿区应当停止向农村招收职工，进行清理，把可以缩减的临时工退回农村。

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根本途径，是技术革命，实行工具改革、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建议工业计划部门在一九六〇年度拿出一百万吨左右的钢材来制造农业机械，并且争取有一部分机械在明年春耕时即可投入生产。同时，还建议多生产一部分手推胶轮车，解决当前的农村运输和由农村到车站码头的短途运输的紧迫需要。

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

遵照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国家每年拿出十亿元投资，来扶助穷队和帮助公社。在目前，这笔钱的大部分，不少于百分之七十，要保证用在穷队；一部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用在公社。公社不能把应当用在穷队的钱截留下来。这笔钱既然是投资性质，它的用途，应当主要用于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周转金。

一九五九年的十亿元投资，百分之九十按各省农业人口多少进行分配，百分之十调剂给某些人口少，土地多、劳动力不足、土地贫瘠、生产水平和群众收入水平较低的省份。

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

抓住重点，带动一般，这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抓先进、带落后，是这种工作方法的一个方面。抓落后、赶先进，是这种工作方法的另一个方面。抓中间，带两头，又是这种工作方法的另一个方面。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总是对富社、富队和工作先进的社、队抓得多，上面干部总是往这些地方跑得多，而对于穷社、落后社和穷队、落后队，就抓得少，跑得少，甚至不抓不跑。事实说明，许多富社、富队和工作先进的社、队本来也是穷的和工作较差的，其所以工作搞好了，上面抓得多、跑得多、照顾得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富社、富队其所以富裕起来，除了自然条件以外，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同时与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和社队之间的互相帮助，也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许多穷社、穷队和工作较差的社、队，其所以较穷和工作较差，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上面抓得少，跑得少，甚至不抓不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后地方各级在工作上抓重点，应当首先抓穷社、穷队和工作较差的社、队，使他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早日得到提高。其次是抓中间状况的。中间状况的社、队是大量的．抓住了，搞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当然富社、富队和工作较好的社和队也要抓，也不可以置之不理，否则，它又会变成落后的。

十五、关于开会方法

今年三月以来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证明，开这样的会，能够集中智慧、暴露矛盾，便于改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省开的各级干部会，最好每一个公社来

七、八人，其中穷队、富队和中间的队，穷大队、富大队和中间的大队各来一人，而公社级只来一、二人，否则，队和大队的干部太少，他们在会上就说不上话。县开的各级干部会，每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队长、总支书记、支部书记都要到，小队长也要到，还要有一批社员（包括积极分子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物）参加。在会上要尽力使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对于他们的意见要细心听取，有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也只辩论说理，而不要扣帽子，并且要允许他们保留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矛盾才能揭露，解决矛盾的办法才能找到。我们有些干部，在许多问题上，总是不大爱听群众意见，总是固执己见，仅仅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用这种办法，就可以纠正这些干部的错误观点，推动这些干部非走群众路线不可。这种会，以后每年要开两次，大事都在这种会上议，重大的技术措施（例如密植）也要在这种会上议，省会上议的东西，如果县会上不同意，可以建议省委修改。要把开这种会形成为一种制度，用这种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

人民公社的各级管理机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应当交付给各地公社的社员大会讨论，经过讨论，把意见集中起来，再作规定。现在的初步设想是，公社管理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到五人，委员十一到十九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的队管理委员会，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二到三人，委员七到十五人，分工管理各项工作。公社各级的办事机构和人员必须保持精干，除了原来由国家供给的区、乡干部和下放干部照旧由国家供给以外，由公社自己供给的人员的工资和供给，同行政管理费加在一起，不要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

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的总支或者支部，分别相当于区或者乡的党的委员会。这些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人数职权等事项，按照党章关于区、乡组织的规定办理。

现在公社党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原来的县、区、乡干部，他们对各个生产队的情况一般地不够熟悉。在今年五月进行选举的时候，应当吸收一些原来高级社的优秀干部参加公社党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他们的主要时间还是在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工作，不一定要负责公社一级的日常工作，但是，公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开会决定问题，必须通知他们出席，共同讨论。今后公社管理委员会决定重大事项，都应当吸收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党的和生产管理方面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没有他们参加，不能决定大事。如果是决定生产方面的重大事项，包括决定增产的重要技术措施，还应当吸收一些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参加。

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

在今年四月下旬到五月底的一个多月内，各地的人民公社都要召开一次公社的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除了进一步检查生产，讨论夏收分配等问题以外，要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并且选举公社的党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最好到县上开，因为这次会上要讨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算账问题，都是

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县的直接领导是不能解决的。全县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可以分做三批或者四批召开。如果人数太多，县里容纳不下，可以分片召开。

公社的党代表大会，除了担任管理工作的党员必须全部参加以外，还应当邀请担任管理工作的非党人员和一些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列席。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妨多一点，除了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负责干部以外，一定要每一个生产小队、作业小组都有代表。代表中要有适当数量的（大体是十分之一左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物。

在召开公社一级的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以前，要先开好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本单位的党支部（或者总支）委员会和队的（或者大队的）管理委员会，并且选举出席全公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人民公社还没有一个示范章程。三月初中央政治局的郑州会议以后，全国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都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预定在五月间各公社还要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这一系列会议就是对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次全民讨论。应当在这次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出人民公社的章程。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会议的讲话、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和这次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于人民公社章程应当包括的主要问题，都有了方针性的提示和原则规定。要求各省根据这些文件和这次全民讨论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底以前，每省提出一个示范章程草案，报送中央，作为中央起草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公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

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草案将由国务院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央委员会深信，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继续鼓足干劲，继续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一定能够

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全体会议检查了上次全会以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全会指出，三个多月来的整社工作是良好的、有成绩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会对于在整社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全会相信，农村人民公社经过一个时期的继续整顿之后，必将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

全体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这些候选人的提名将在同各方面协商之后，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

这次全体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七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这次全会作了准备工作。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各位代表：

我现在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的伟大成就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年多的任期中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

当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并且大量地存在着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农村中劳动互助运动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参加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农户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左右，但是，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在那时候，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这样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来，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而现在呢？大家看到，只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鼓掌）

在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手工业进行了全面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现在，除了个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我国基本上只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又进行了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样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就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鼓掌）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跟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和互相促进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帝国主义者曾经宣称那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幻想。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超额完成了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执行更加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鼓掌）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在一九五七年达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七亿四千万元，比一九五二年的八百一十七亿一千万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了六百五十亿二千万元，比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七十亿一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三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二年的七十三亿一千万元增长百分之八十三；农业总产值达到了六百零三亿五千万元，比一九五二年的四百八十三亿九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产值，是以一九五二年的价格作为不变价格计算的。这里列举的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工农业产值，就是这样计算的。

由于一九五七年调整了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产值，都改以一九五七年的价格作为不变价格计算。因此，一九五七年同第二个五年各年相比的时候，就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价格计算。这样，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就应当是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是七百零四亿元，农业总产值是五百三十七亿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共为四百九十三亿元，超过原定计划四百二十七亿四千万元的百分之十五点三。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有一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有九百二十一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多二百二十七个；到一九五七年底，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单位有五百三十七个。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们不仅大大加强了原有的工业部门，而且开始建立了过去没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如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冶炼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等。技术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十七万五千人，比一九五二年的五万八千人增长两倍；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职工达到一千零一十九万人，比一九五二年的六百一十五万人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由于工业产量的增长和品种的增加，工业材料和设备的自给率也有了提高，如一九五七年钢材的自给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六，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同时，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七年上升为百分之五十六点五。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一九五七年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二点八。

因此，可以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初步基础。（**鼓掌**）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八年，出现了一个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的大跃进。（**鼓掌**）

一九五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千零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千一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百零四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生铁、钢、煤炭、发电设备、机车、汽车、动力机械等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以上，其中生铁和钢包括一部分土铁土钢。农业总产值达到了八百八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七亿元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四；粮食、棉花、烤烟等产品的产量，也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以上。通过国家预算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二百一十四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七十。

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一年增加的数量，超过了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的数量。例如，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钢增加了四百万吨，煤增加了六千四百万吨。机床（不包括简易机床，下同）增加了一万四千三百台，粮食增加了六百一十二亿斤，棉花增加了六百七十三万担；而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钢增加了五百七十三万吨，煤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吨，机床增加了二万二千台，粮食增加了三千八百亿斤，棉花增加了三千三百五十八万担。

跟工业和农业的跃进同时，在运输邮电方面，商业方面，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都出现了巨大的跃进。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国人民在社会组织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创造，这就是全国农村中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而建立的人民公社。（**热烈鼓掌**）全国一亿二千万户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条件下，它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热烈鼓掌**）

显然，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前进，而是一个巨大的、全面的跃进。（**热烈鼓掌**）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拿钢来说，英国早在一八八〇年，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一万吨，到一九三五年，年产量才增加到一千零二万吨。我国的钢产量在一九五二年是一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五八年就增加到一千一百零八万吨。这就是说，在钢产量上，英国走了五十多年的路，我们只花了六年。（**鼓掌**）拿煤来说，英国早在一八五四年就已经能够生产六千五百七十万吨，同我国一九五二年生产六千六百四十九万吨的水平大体相等。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到一九〇七年，英国的煤产量才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而我国也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八年达到了这个水平。（**鼓掌**）英国的煤产量在二十世纪初期曾经两次接近三亿吨，但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和停滞的状态，到一九五八年只有二亿二千万吨左右，已经落在我国的后边。（**热烈鼓掌**）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曾经竭力抹煞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不可免地要增强全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加深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当他们无法否认大跃进的事实的时候，又对我们的大跃进进行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诬蔑。他们尽管绞尽脑汁，终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说我们这里实行了奴隶劳动。原

来，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什么"自由劳动"。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广大的所谓"自由"劳动者中间充满了忧愁和痛苦，而社会主义的所谓"奴隶"劳动者中间却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呢？他们说我们这里牺牲了广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当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闹着失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却不仅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并且还保证我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生产；可是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而我国机械化的进度又不可能那样快，因而使得城乡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我国人民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们的大跃进的原因，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够了解和不愿意了解的。我们的大跃进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我国长时期以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一穷二白"，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人力和自然资源，而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社会制度。大家知道，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气候条件良好，这些对于发展生产力都极为有利。但是，同样的人口条件和地理条件，不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跃进；就是在解放以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胜利以前，也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式的大跃进。同时，由于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一批大规模的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能够掌握新技术的人材，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和建设一些比较大型的和技术比较复杂的工业企业，象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二百四十万吨煤的煤矿，设备总容量为一百万瓩的水电站和六十五万瓩的火电站，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也就不能够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春季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开始找到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好的方法，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一条充分估计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动员起来的路线。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出现的。（**鼓掌**）

根据总路线，在工业方面，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实行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钢是目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我国钢产量的不足、妨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动员全民的力量增产钢铁，使钢产量由一九五九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到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产量的跃进直接促进了煤炭工业的跃进，并且造成了机械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同时跃进的条件。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为什么能够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工业战线上实行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

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为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找到了具体的道路。

在一九五八年，我们扩大了地方管理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权限，从而大大提高了各级地方组织和劳动群众大办工业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建设的进度，迅速提高了工业的产量。一九五八年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举办的限额以上的新建和扩建的工矿企业共有一千多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约有七百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工矿企业的总和五百三十七个还多；由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兴办了大量的限额以下的洋土结合的工矿单位，这些工矿单位绝大部分在一九五八年内已经建成或者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此外，人民公社还举办了很多基本上是采用土法生产的工矿单位。由于这些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迅速地增长起来了。

当然，一九五八年工业的跃进，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企业的增产。在原有企业中，经过扩充设备、增加人力、改进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产量大大增长。大量的企业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互相结合的办法，展开了改进操作技术、改良设备、改进产品设计、合理利用原料、材料、充分利用原有设备、试制和生产新产品、改进生产组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从而大大地发挥了原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

一九五八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就，同样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威力，证明了工业和农业应当同时并举，可以同时并举，证明了农业和工业同样可以高速度地发展。事实上，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的跃进，还是由农业开始的。我国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还很少，但是，在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动以后，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却仍然可以迅速地提高。一九五七年修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到一九六七年在全国三类地区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分别达到六十斤、八八斤、一百斤的指标。实际上，一九五八年全国多数县市就提前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生产指标，全国大部分的产棉地区也提前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棉花生产指标。一九五八年粮食和棉花都出现了不少的大面积高额丰产田。（鼓掌）

农民群众采取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措施，包括土（土壤）、肥（肥料）、水(水利)、种（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个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土壤方面，进行了深翻、改良土质和平整土地的大量工作。在肥料方面，去年比过去更加广泛地开辟了肥料来源，并且大量地建立了制造和加工各种肥料的小型工厂和作坊。在水利方面，一九五八年全国灌溉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亿八千万亩，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种子方面，稻谷、大麦、棉花等几种主要作物基本上普及了良种，并且在各个地区之间进行了良种交流。在密植方面，广泛地实行了程度不同的密植，并且在合理密植的实验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在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田间管理在一九五八年有显著的成就；各地推广了丰产田、试验田，某些地方试行了耕作园田化，这些都在农业技术革新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工具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初步的进展；运输车子化和滚珠轴承的推广，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各种新农具的发明创造大量地涌现出来。

工农业方面的各种增产措施所以能够推广和奏效，是同整风运动所造成的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分不开的。党委领导、政治挂帅的原则，已经为广大群众

所接受。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干部种试验田、干部下放、干部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项办法，大大鼓舞了工人和农民的干劲。在各个战线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大胆发明创造，进行参观评比，开展社会主义的竞赛和协作。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的高潮，保证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实现。（**鼓掌**）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援助。苏联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我们建设的一百六十六个重大建设项目，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苏联建国以来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制订和实现经济建设计划的一项重要的依据。（**热烈鼓掌**）

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对于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说来，我国工农业现在达到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巨大需要，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奋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实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经验还很不足，工作中的缺点还不少，必须继续虚心地学习，没有任何理由自满。我们应当在一九五八年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二、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经济战线上的任务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曾经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提出了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的四项指标。今年四月初，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这些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草案，已经由国务院通过，提请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我们认为，今年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努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鼓掌**）

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大家从计划草案中可以看到：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五八的二千零五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四十，达到二千八百七十亿元；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一千六百五十亿元，农业总产值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在三十二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将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有生铁、钢、原油、硫酸、化学肥料、抗菌素、发电设备、机车、货车、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动力机械、棉纺机、造纸设备、制糖设备、糖等十七种；其他的产品，除很少数的几种以外，产量也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一些产品的产量将成倍地以至几倍地增长。如发电设备，一九五八年我国只生产八十万瓩，一九五九年将生产二百八十万到三百万瓩，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到二百七十五。在主要的农业产品中，产量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有粮食、棉花、黄麻、洋麻、甘蔗、甜菜、花生、油菜子以及猪的饲养头数。

一九五九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通过国家预算的部分，拟定为二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在今年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共有一千零九

十二个，其中包括五十一个钢铁企业，三十三个有色金属企业，一百五十四个机械制造企业，一百八十四个电站，八十三个煤炭企业，十九个采油和炼油企业、五十三个化学工业企业、一百零五个建筑材料企业和木材采伐企业，一百六十一个轻工业企业，二十八个水利工程，五千五百公里的铁路新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等等。这些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额，约占全年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其余的投资，将用来建设大量的限额以下的项目。

为了给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输条件，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的铁路货物运输量将达到五亿二千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三亿八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六；交通部直属企业的货物运输量将达到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二千八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在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到六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五百四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九。

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是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拟定的，是根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拟定的。这个计划既考虑了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也考虑了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既考虑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运输在发展中必须互相适应的要求，也坚持了建设必须有重点、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原料、材料工业和以钢为纲的方针。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这是工业战线上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实这现个任务，在计划中，已经根据可能的条件，努力提高了生铁、煤炭、电力的生产指标和运输的指标，并且对机械工业规定了迅速制造采矿设备、洗煤设备、炼焦设备、轧钢设备、发电设备和运输设备的任务。为了改变原料、材料工业和动力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状况，我们提高了钢材、铜、铝、硫酸、电力等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按照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要求，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生活资料的生产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对于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特别是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生产不足的某些日用工业品的增产，在计划中都作了规定。按照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要求，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的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为了使各种农产品和畜产品的增产同轻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情况相适应，一九五九年在保证粮食和棉花生产继续大跃进的前提下，提高了麻类、甘蔗、油菜子等作物和猪、牛、马等牲畜的增长速度。工业也将加强对于农业的支援，给农业提供更多的排灌机械、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胶轮手推车、化学肥料和农药。

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将继续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将为我国工业的不断跃进和农业的机械化准备更多的条件，将提前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粮棉增产的要求，将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鼓掌）

一九五九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数，有不少高于一九五八年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数，如发电量、硫酸、化学肥料、货车、棉纺机、棉纱、棉布、纸、食用植物油、糖等工业产品，和黄麻、洋麻、甘蔗、油菜子、大家畜、猪等农业产品，都是这样。也有一些产品，一九五九年计划产量增长的百分数比一九五八年低，但是，增加的绝对数却比一九五八年高。例如，钢的产量，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即增加了五百七十三万吨；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计划增长百分之六十二，增长的绝对数却是六百九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即增加

了八百零九亿元；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计划增长百分之四十，增长的绝对数却是八百二十亿元。可见，观察增长的速度不能只看百分比，必须同时看绝对数。如果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以及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都必须高于前一年才算是跃进，那是不切实际的。

不但如此，有一些工农业产品，特别是有一些农业产品，在跃进的过程中，后一年增加的产量也可能低于前一年增加的产量。一九五九年计划要求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高的、在历史上少见的速度。应当看到，粮食的增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很大限制，年复一年地成倍地增长，或者都按一九五八年的增长绝对数增长，是不可能的。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即使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一九五九年粮食增加的绝对数将达到三千亿斤，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大家知道，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在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九三六年，只有二千七百七十四亿斤。在解放以后经济得到恢复的一九五二年，也还只有三千零八十八亿斤。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努力，一九五七年才达到了三千七百亿斤。现在我们要在一九五八年增产三千八百亿斤的基础上，再使粮食产量增加三千亿斤，这当然是一个要用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跃进计划。

〔注〕这里列举的各年粮食总产量，都扣除了大豆的产量。

为了实现速度很高、规模宏大的一九五九年计划，全国人民必须继续英勇奋斗，苦干实干巧干，努力克服困难。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中，不可能没有困难，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底子薄的国家中更加是如此。在目前一段时期内，许多重要的原料、材料、电力和运输能力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还不可能很快得到彻底改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此外，我们也还可能遇到某些难于预料的困难，例如在农业上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这些困难，我们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应当用充分的努力去克服。只要我们有准备，并且努力去克服，那么，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取得胜利。（**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有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许多有利条件。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了我们继续大跃进的总前提。我们有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有了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六亿多人民由于一九五八年各个战线上的胜利，已经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干劲，更多的经验和办法。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实践，已经为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鼓掌**）

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我们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集中领导，全面安排，抓紧各项组织工作和具体措施，大力开展各个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

在工业战线上，特别需要加强集中领导，以便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的要求，进行全面安排，首先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保证全局性任务的完成。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和人民公社化的成功，各个地方、各个战线上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都要求迅速地发展自己所需要的建设事业。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蒸蒸日上的兴旺气象。但是，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的物质技术基础毕竟还很薄弱。我们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满足了一定的重点方面的需要，就不可能同样地满足其他各个方面的需要。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采取局部服从整体、首先保证重点的原则。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一九

五九年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计划，我们也必须根据这个原则执行这个计划。凡是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务的调整，重要的原料、材料、设备的分配和调度，企业职工的增加和调配，劳动工资制度的改变，以及技术力量的安排，都应当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切实掌握，统一指挥。对于各项生产、建设的具体任务，都应当按照轻重缓急的情况，并且按照原料、材料和设备供应的可能，自上而下地进行排队。例如，机械工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于迅速地把计划规定的采矿设备、洗煤设备、炼焦设备、轧钢设备、电站设备、排灌设备和机车车辆制造出来。国家统一调度的原料、材料，就应当首先保证制造这些设备的需要，机器制造部门在具体安排这些设备的制造任务的时候，也应当排定先生产什么设备和什么样型号的设备，以便在时间上和品种上保证重点部门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为了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巨大任务，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对于生产和建设中的各个环节，经常地进行切实的检查。重要的产品和建设项目，应当排定按旬、按月或者按季的进度表，并且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机关，指定专人，深入到车间或者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保证计划指标准确地实现。

如同历年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所证明的，完成工业计划的最基本的保证，就是要在工作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方法，要使集中领导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都必须认真遵守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生产中和建设中无人负责和违背必要的规章制度的现象是不容许的。但是，我们所需要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领导不应当妨碍发动群众，而应当保证放手发动群众。应当积极领导职工群众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讨论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出主意，想办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而奋斗。企业的重要会议，应当广泛地吸收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一切重大事情的决定，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凡是一九五八年已经行之有效的发展群众运动的各种方法，例如党委书记挂帅、领导干部搞"试验田"、召集现场会议、参观评比、开展红旗竞赛的方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方法，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互相结合的方法，都必须坚持下去，并且继续加以发展和提高。

工业战线上的小型企业、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应当继续开展，逐步提高。这种小型企业的土法生产，在今年的工业生产中，例如，在采矿、洗煤、炼焦、炼铜、建筑材料的生产中，仍然担负着重大的任务；在炼铁、炼钢方面，经过提高技术以后，也仍将占有一定的比重。有些土铁土钢和其他土法生产的产品，虽然质量不够好，成本比较高，但是它们适合于我国目前某些范围内的需要，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需要。因此，千万不可以小看了他们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洋土并举"，这是我们发展工业的长远的方针。"洋土结合"这种事情，是永远存在的，不过将来的"洋"和"土"，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是跟现在不同罢了。当然，无论是那个行业，小型企业的土法生产，都应当注意改进技术、改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小型企业的土法生产逐步采取某些现代化的技术，向所谓洋法生产转化，这是一项必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对于那些占用劳动力和原料比较多的土法生产，应当更快地解决。

同在工业战线上一样，在农业、运输邮电和商业的战线上，为了完成一九五九年的计划，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在农业战线方面，广大农民已经在去年秋季和冬季，为今年的生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但是，为了实现今年的跃进计划，还必须继续动员群众，开展大面积丰产的群众运动。公社的干部和县的干部必须深入田间，同社员打成一片，为今年夏季和秋季的大丰收而斗争，为实现今年一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十大倡议而斗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麻类作物、糖料作物、各类副食品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项生产计划而斗争。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提供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的增产技术措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使我们看到，适应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不同的作物，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应当千篇一律；各种措施又是互相关连互相依靠的，不能够满足于仅仅采取某一种或某几种措施。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使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确定各种适当的增产技术措施，认真执行。

农业继续大跃进，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公共食堂、托儿所的建立，虽然从家务劳动中把成千成万的妇女解放出来了，但是，由于生产任务大大增加了，所以农村劳动力仍感不足。在目前条件下，从事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应当不少于百分之八十。为了满足农村劳动力的需要，城市的工矿企业在一个时期内应当停止从农村招工，并且让从农村中招来的多余的临时工回到农村去。县和人民公社举办工矿企业和其他的基本建设，一般要适应于农事季节，农闲时多办，农忙时少办。公社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生活服务人员也必须厉行精简，凡是可以利用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的，都应当少用或者不用强壮的劳力。

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逐步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逐步实现农具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在一九五八年开展的农具改革运动，必须继续进行，并且把已经证明合用的改良农具认真地推广和普及。

人民公社的巩固，是农业生产顺利发展的前提。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地认识了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认识了人民公社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必须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这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近几个月的整社工作，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健全起来，干部的作风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在最近期间，全国的人民公社都应当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总结整社工作，检查和布置生产，整理公社账目，讨论夏收分配，并且选举公社的管理机构。我们相信，人民公社在做好这些整顿和建设工作以后，一定会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起来，人们的干劲会更足，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增产任务的完成也就会更有保证。（鼓掌）

在运输方面，首先是铁路运输方面，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应当努力加强运输组织工作，有效地发挥现有各种运输设备的潜力，同时有计划地完成基本建设的任务。

运输部门应当提高运输工作的计划性，力求缩短货物装卸时间，加速车辆和船舶的周转，节约燃料的消耗，以现有的运输设备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对于运输任务，应当分别轻重缓急，适当安排，首先保证钢铁、煤炭等重要生产资料和粮食、副食品等重要生活资料的及时调运。应当特别注意长途运输和短途运输相结合，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相结合。为了加强短途运输，应当大力组织农村人民公社中的车辆和船只，以补充现代运输设备的不足。各个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应当积极地帮助运输部门合理地组织运输，减少以至消除对流运输、过远运输、重复运输等不合理现象。

为了保证必要的物资供应，保证市场的继续稳定，商业部门在一九五九年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如前所说，一九五九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到六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如果同建国初期的一九五零年的一百七十亿元作比较，则增长二点八倍；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的三百四十八亿元作比较，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由于我国人口很多，每人多消费一点，合起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数量。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一种物资或者那一种物资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全国市场进行全面安排，尽力做好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尽力防止和减少供求脱节的现象，是当前商业部门的重要任务。

各级商业机构，应当努力加强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做好作为工业原料的各种“废品”的收购工作，应当通过购销合同制度，推动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同时，还应当加强出口贸易的管理，使国家的出口计划能够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

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或者商业战线上，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都应当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改良工具，改善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率，改进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改进操作方法和施工方法，节约劳动力和原料、材料，利用各种代用品和各种“废品”，提高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降低废品次品率，所有这些，都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只要我们坚决地实行政治挂帅，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使大家认识一九五九年计划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当前问题所在，放手发动群众，那末，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增产节约的千方百计。例如，全国煤炭在一二两月份平均的日产量是九十六万吨，三月初在广大的职工群众中开展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竞赛运动以后，三月份的平均日产量迅速上升到一百一十三万吨，从而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计划规定的任务。这样的群众运动，不仅在煤炭工业方面，而且在其他工业方面，在农业和运输方面，也都在开始出现。现在是第二个季度的开始，正是完成年度计划的关键性时机。我们应当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积极性，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我们相信，只要大家能够认真地把这个运动开展起来，坚持到底，我们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就一定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三、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

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来，在我国开始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中间，确立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使文化教育的高涨获得了政治的保证。在一九五八年，不但国家举办的各种文教事业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且广大的工人、农民由于迫切地感到掌握文化的需要，也用自己的力量办学校、办科学、办文化，进行各种业余的文艺活动，造成了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文化革命的局面。文教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中，多数人都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了同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在文化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方面积极地发挥了作用。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

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鼓掌）

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一九五二年有十九万人，到了一九五七年已经有四十四万人，即增加一倍多；一九五八年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达到六十六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一九五二年有三百多万人，一九五七年已经有七百多万人，也增加一倍多，一九五八年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万人。小学生，一九五二年有五千一百多万人，一九五七年已经有六千四百多万人，增加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五八年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达到了八千六百万人。工人和农民中的业余文化技术政治教育，在一九五八年采取了多种形式，发展很大。扫除文盲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

教育事业的成就不只是表现在数量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在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的条件下，我们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的巨大深刻的革命。

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我们的教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在我们的学校里必须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必须使我们的儿童和青年有系统地一步步地掌握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成就，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使我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抱着旧社会中剥削阶级办教育的观点的人，当然要反对我们的方针。其实，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都在他们的学校中，进行维护他们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产阶级社会只给工人以一些粗浅的狭隘的知识，而在思想政治上竭力地蒙蔽、麻痹和腐蚀他们。资产阶级一贯地用理论和实际相脱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脱离的精神，去培养为剥削制度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和资产阶级的这种方针根本对立的。我们的方针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来武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扫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要使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使文化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

在我们的学校中，已经开始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按照不同的情况，组织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广大师生更多地掌握了实际生产知识，树立了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者的风气。在高等学校中，生产实践还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事实证明，教育和生产劳动实行正确的结合，能够有助于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有助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有助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步结合，能够使得学校日益发展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新型学校。当然，对于教育事业上的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我们现在还只具有初步的经验，工作中还有缺点，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继续积累和总结经验，不断地改进工作，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个方针。

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办法。为了实现文化的普及，为了能够适应当前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除了各级全日制正规学校以外，还应当根据实际可能，继续发展半日制学校、农村和厂矿的业余学校。群众性的扫盲工作应当积极推行。同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提高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以除四害、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以增强人民体质为目的的体育运动，一九五八年有了很大的成绩，今后必须继续开展。在卫生工作中，应当继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使专家和群众结合起来，迅速有效地改进我国人民的卫生面貌。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

一九五八年，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开始形成了千军万马向科学进军的群众运动，获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学技术工作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中和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许多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中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

在科学技术上，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必须加紧努力。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技术课题，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分工协作，为解决这些课题而努力。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对于条件还不具备的，目前应当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当积极发展，加强领导。忽视它的重要性是不允许的。应当鼓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在文学艺术战线上，无论是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还是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学艺术活动，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我们应当鼓励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同时，应当积极地领导群众的文学艺术活动，注意培养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人才。

为了科学和艺术的健全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指出了我国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给了整个科学界和文化界以巨大的鼓舞。在一九五六年党提出这个方针以后不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歪曲这个方针，冒充社会主义的"香花"，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企图夺取文化事业上的领导权。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粉碎了他们的反动企图。这就造成了执行这个方针的有利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群众性文化革命的高涨，为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相信，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不要很久，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获得伟大的成就。（**热烈鼓掌**）

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

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近来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但认真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开始深入群众，定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取得了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新经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有些资阶产级知识分子在长期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以后，已经开始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一些先进分子陆续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都证明，党和国家一贯执行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站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来，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就能够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发挥他们的

专长，受到人民的欢迎。当然，他们要进一步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真正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以为旧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再进行自我改造，或者以为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彻底的改造，否则就不能做工作，都是不对的。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都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我们应当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作出更多的成绩来。同时，要帮助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且根据自愿，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

大量的年青的知识分子，正在象雨后春笋一样地生长起来。他们向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勇敢地前进，并且已经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初步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应当引导他们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鼓励他们不断地攀登科学知识的高峰，教育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自满。年青的知识分子也有经常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他们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应当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同时，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群众的生产和斗争的实践，参加体力劳动，在政治思想上和在工作中严格地要求自己。年青的知识分子要虚心地向有学问的前辈学习，年长的知识分子也要学习年青知识分子的长处。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面团结起来，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热烈鼓掌**）

四、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内部的团结，在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了。（**鼓掌**）这是因为，第一，在工商业方面，我们基本上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同时付给资本家以定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劳动人民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上的矛盾；第二，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我们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代替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从而解决了由于个体所有制而产生的农民内部和手工业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第三，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我们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右派分子在人民群众中间完全孤立；第四，我们在人民群众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的队伍中进行了整风运动，展开了两条道路问题的辩论和教育，展开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斗争，大大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

我国已经基本上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社会秩序的安定更加有了保障；但是，现在还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加以肃清。对于被查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将继续执行在过去几年中行之有效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采取了帮助他们进行改造的宽大处理办法，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并且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便把一切可以改造的人尽可能地逐步地改造成为新人。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西太平洋占领了许多地方，并且占领了我国台湾，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国防，加强国防建设，来保卫我国人民的和平建设。（**热烈鼓掌**）

在我国人民内部，如上所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由于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逐步贯彻执行，人民民主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今后，应当把整风运动中的一切好办法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固定下来，有事要

同群众商量，有不同的意见要进行充分讨论。要定期召开干部会、群众会，贴大字报，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使人们畅所欲言，不要怕“唱对台戏”，因为只有矛盾充分暴露出来，问题才容易比较迅速、比较妥当地得到解决。无论农村城市，一定要利用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干部会议的形式，利用有基层干部参加的、有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非先进分子参加的干部会议的形式，使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上级的决定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使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直接同上级见面。经验证明，这种会议最便于集中群众智慧，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在过去一年中，国家工作人员在深入群众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广大干部纠正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克服了从旧社会沾染来的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并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全国县级以上的各级国家机关中，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到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同时，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定期到公社当社员，工厂的领导干部定期到车间当工人，部队的指挥员定期到连队当兵，一切有体力条件的领导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正在形成新的风气。这是一种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风气。这不但给干部和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全国的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总结一九五八年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干部有计划地，定期地下放和参加体力劳动。

我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这一联盟是愈来愈巩固了。现在也还有某些不属于工人农民的阶层。在继续加强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将继续保持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整风运动。他们中许多人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锻炼，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参加国家工作的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除了一小撮右派分子以外，多数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了他们的职责。各民主党派在整风中都整顿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在团结不同的社会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业中，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今后在我国仍然需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人民事业仍然是有益的。对于资本家，国家将按照原定的期限付给定息，并且将积极地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在民族工作方面，过去四年中，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在保证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下，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除了原有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并且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此外，还在青海、甘肃、新疆、云南、四川、贵州和其他若干省、自治区内成立了二十九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包括三十几个民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内，除了西藏和其他很少一些地方以外，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许多少数民族昨天还受着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的束缚，今天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他们真正是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也有了巨大的跃进。据统计，内蒙古、新疆、

广西、宁夏四个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粮食产量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三。全国少数民族的学生数目增长得很快。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小学生有三百一十九万人，中等学校学生三十一万人，高等学校学生一万六千人。在全国的三千六百万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学生总数达到三百五十一万人。同解放前比较，小学生增加了六倍以上，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七十九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七倍。有许多过去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现在已经制定了文字方案，有了用自己的文字出版的书籍和报纸。

由于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以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已经大大加强了。（**鼓掌**）在汉族干部中，多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的斗争。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整风运动中，也进行了反对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经过整风运动的锻炼和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实践，觉悟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在他们中间，大批的先进分子正在生长起来。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可靠力量。（**鼓掌**）

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开始侵略中国以后，一贯企图瓦解中国的统一，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使中国各民族的最大多数人民深切感到他们的共同命运，感到统一的国家的可贵。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把国内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各族的爱国人民从历史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在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各民族才能兴旺起来。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民族压迫，并且正在努力消除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残余心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较发达的、强大的民族总是竭力使别的民族保持落后状态，以便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形恰恰相反。在我们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不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比较先进的、居于多数地位的民族有责任帮助互比较落后的、居于少数地位的民族，使大家一起进步，共同发展。（**热烈鼓掌**）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政府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措施，受到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主张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据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我们曾经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一些，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继续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他们根本不想实行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一贯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国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的叛乱行为立即遭到全国

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且首先遭到西藏的广大人民、包括许多爱国的进步的上层分子的坚决反对。（**鼓掌**）这些反动分子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帝国主义摆布中国内政的时代早已过去了。（**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现在，西藏的局势已经完全在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正在继续扫荡一些流窜在偏僻地区的残余叛乱分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开始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关于西藏今后的社会改革，将由中央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无论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扬藏族的优秀文化。达赖喇嘛虽然已经被劫往印度，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摆脱叛乱分子的挟持，回到祖国来。（**鼓掌**）

西藏反动分子常常装出一付虔诚的模样，说是希望人们同登天堂，但是，他们自己却把西藏变成人间地狱，并且想使西藏人民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陷于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野蛮、更加残酷的黑暗深渊。他们也常常装出爱好和平的模样，但是，他们实际上却指使匪徒烧杀淫掠，残害群众，并且到了最后，他们自己竟敢疯狂地发动武装叛乱，因而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两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而且还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谓康巴人。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共有一百一十几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那一部分人。是同情一百一十几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所说的好心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全场活跃**）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如果人们认识了西藏内部的真实情况，就应当同情受旧制度压迫的绝大多数的西藏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社会改革的要求。由于西藏反动叛乱的失败，西藏人民现在已经有可能摆脱农奴制度的枷锁，实现民主自治和社会进步的愿望。他们将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逐步地把西藏高原建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热烈鼓掌**）这对于西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藏族人民的真正同情者，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鼓掌**）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这一叛乱的平定，是中国的内政，甚至力图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以及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往印度境内以后，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印度尼赫鲁总理连续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继续巩固中印友好关系的声明，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热烈鼓掌**）中印两国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并且同是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两国都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西藏的一小撮叛乱分子而动摇互相间的友谊和两国共同遵守的外交原则。的确，在西藏叛乱失败以前，西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外国的反动分子，曾经利用中印边界的某些地区，进行破坏我国统一和中印友好的活动。但是，这些反动分子的打算现在已经落空了。我们希望，随着西藏叛乱的平定，通过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亚洲两个共有人口超过十亿的伟大的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获得更加巩固的基础和更好的发展。那些蓄意破坏中印友谊的人们的一切恶意挑拨，不过是枉费心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五、关于对外政策

在国内各个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我们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有了重要的进展。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一起，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了巨大的努力。四年来，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国家，已经由二十个增加到三十三个；同我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九十三个；建立文化联系和进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一百零四个。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孤立和排斥新中国的企图，已经一天一天遭到了失败。（**经久不息的掌声**）

目前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迅速发展，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则陷入重重困难之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福利、加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得取了伟大的成就。苏联在首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行星。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的七年计划。这个计划，标志着苏联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全人类面前预告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经久不息的掌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迅速地发展着自己的国民经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都处在经济建设的高潮中。完全可以肯定，在一个不很长的时期内，苏联将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水平方面超过美国，中国也将变成一个先进的大工业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将在物质生产方面显著地超过帝国主义阵营，从而使得世界和平得到充分的保障。（**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鼓掌**）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几年来，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互助的兄弟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中，团结一致地紧密合作。一年多以来，我国同苏联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我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帮助我国建设四十七项企业、帮助我国建设七十八项企业的三个协定和通商航海条约，我国同阿尔巴尼亚、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也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发展友好合作和加强经济、贸易、文化联系的协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给了巨大的援助。我在这里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感谢。（**热烈鼓掌**）我们根据亲身的经验深深地感到，社会主义各国互相间的支援和协作，是社会主义各国顺利发展的重条件。在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地加强我国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并且继续在人民中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从来害怕各国人民的团结，尤其害怕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团结。近来，他们想出各种卑鄙的主意，企图挑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他们仇视中苏两国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好团结，因为这种友好团结是保卫人类的和平事业和进步事业的强大堡垒，它有利于全世界的人民、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仅仅不

利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各国反动派。但是，中苏两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钢铁堡垒，是以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任何人冲不破的，是永远冲不破的。（**热烈鼓掌**）敌人愈是要破坏它，就只能使全世界人民更加认识它是人类光明前途的依靠，使全世界更多的人民在这个堡垒的周围团结起来。（**鼓掌**）

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一贯地声援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维护和平的努力，声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声援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很明显，侵略的势力越是受到抑制，和平的事业就越是有保证。（**鼓掌**）

几年来，民族独立运动愈来愈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在继续瓦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后方，现在已经成为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前线。美国政府的发言人也承认，现代殖民主义的支柱美帝国主义已经处在"真正的旋风里"。正象帝国主义过去对埃及的侵略和对叙利亚的威胁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一样，在一九五八年，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颠复活动，对黎巴嫩、约旦的武装侵略，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伊拉克的民族革命运动，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重重压迫，获得了辉煌的胜利。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非洲人民，正在迅速地觉醒起来。非洲大陆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英勇战斗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刚果、喀麦隆、尼亚萨兰以及非洲其他地区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非洲人民重新成为非洲大陆主人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临近了。（**热烈鼓掌**）在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同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古巴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之后，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这是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涨的标志。（**鼓掌**）

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力求继续保持或者恢复对于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控制。他们在直接进行武力威胁和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拼凑军事集团，缔结军事条约，建立军事基地，加紧经济侵略，策动军事政变，组织颠复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最近正在用一切办法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破坏这些国家互相之间的团结，破坏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以达到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目的。因此，一切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为了取得完全的胜利，就不但需要打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侵略，而且需要击破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诡计。（**鼓掌**）

中国人民一向同情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反干涉的斗争，因为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就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而现在帝国主义的势力也还盘据在我国的领土台湾。我们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民族独立运动，都愿意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在近几年阿拉伯民族的反帝斗争中，我们始终是站在阿拉伯各国人民一边的。最近，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了某种复杂的情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些当权人物发动了对于伊拉克共和国的攻击，并且接着发动了对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的攻击。很明显，这种行动不利于阿拉伯民族的独立事业，因而不可能获得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同情。我们同阿拉伯民族的一切朋友一样，希望阿拉伯民族独立事业所遇的这个困难能够找到克服的方法，使帝国主义者陷害阿拉伯民族的恶毒的阴谋不能得逞。（**鼓掌**）

我国同亚洲和非洲的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发展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尼泊尔、阿富汗，一些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执行着和平中立的政策。他们反对战争，拒绝被拖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

策和战争政策的共同斗争中，在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共同努力中，我国同这些国家广泛地建立了友谊。我们很珍视这种友谊，并且很感谢许多友好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对于我国的支持。（**热烈鼓掌**）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同也门、缅甸、印度尼西亚、阿联、锡兰、突尼斯、摩洛哥、伊拉克等国先后签订了加强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合作的协定，同时也扩大了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是同我国接壤或者靠近的，我国同这些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不能和平解决的争端，因此，我们同这些国家能够而且已经形成亚洲的和平地区。我们希望，这种和平地区将持久地存在下去，并且一直扩大到整个亚洲。（**热烈鼓掌**）

美帝国主义为了挑拨许多东南亚国家同我国的关系，来掩盖它自己对这些国家的侵略活动，故意散布谣言，说什么我国对于东南亚邻国将是“可怕的威胁”。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挑拨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活动遭到失败以后，也在竭力破坏亚非国家同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挑拨离间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鼓掌**）人们知道，我国从来没有侵犯过任何邻国的领土，没有干涉过任何邻国的内政，今后也永远是这样。逃窜缅甸的国民党残匪十年来不断骚扰我国边境，威胁我国安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只是严守边防，仍然耐心地等待我们的友好邻邦缅甸政府自行处理。我国和某些东南亚邻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和海外华侨的国籍问题，曾经被挑拨者当做宣传资料。但是，人们知道，我国同一些邻国的未定的边界，是许多历史原因、首先是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所造成的。我国一向主张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同有关的国家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我们认为，维持现状，不让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得逞，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至于华侨问题，我国政府一向劝告海外华侨尊重侨居国的法令和习惯，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努力帮助当地的人民发展经济；对于华侨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侨居国的国籍，我国政府也采取赞助的态度。有些东南亚国家采取了错误的排华政策，这完全是中了帝国主义造谣挑拨的奸计。我们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得到纠正，华侨的正当利益能够得到保护。此外，帝国主义还大肆宣传我国在东南亚的所谓“倾销”和“经济扩张”。但是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经济扩张”和什么“倾销”。我国国内市场十分广阔，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只占资本主义世界进出口总额的千分之五，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在这些国家的进口额中也只占百分之一，根本谈不到什么“倾销”，什么“争夺国外市场”。当然，我国和这些国家在自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在今后，我们将继续发展这种对双方有益的合作。

帝国主义者总是忙着要干涉一切外国的内政，忙着要把整个地球甚至要把月球放在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笑声**）但是，他们却不能管好自己的家务。（**笑声**）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受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他们互相间的冲突正在表面化。尽管帝国主义各国还在寻找某些妥协的办法，暂时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得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走向四分五裂这一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片暗淡和混乱的景象笼罩着整个帝国主义阵营，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于明天的信心。（**鼓掌**）

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四年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作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关于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举行东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建立欧洲

的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无原子区和集体安全体系等重大的和平倡议。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和平努力和倡议，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成为推动国际局势趋向和缓的决定因素。但是，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却一直反对这些和平倡议，他们企图用新的战争来扭转历史发展的车轮。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巴格达条约集团、东南亚条约集团还在积极活动，美国还在全世界继续扩展它的军事基地网，还在继续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且用这种武器去武装一系列国家的军队。战争的危险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继续警惕地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甚至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也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和各国广大人民坚决反对战争的条件下，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决不会带来对帝国主义有利的结局，相反，这只会加速整个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热烈鼓掌**）

美帝国主义特别致力于复活德国的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指望通过欧洲的和亚洲的这两个老的战争策源地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注意。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长时期以来，一直执行分裂德国和复活西德军国主义的政策。为了消除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胁，促进两个德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德意志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任务，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建议，并且作了不懈的努力。不久以前，苏联政府又提出了结束西柏林的占领制度和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的建议，以及由有关国家召开和会讨论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我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由于苏联政府的一贯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的强烈要求，美、英、法三国已经不得不同意苏联关于召开外长会议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些会议将有助于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首先是对德和约问题和柏林问题，从而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打开道路。

在东方，美帝国主义一贯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也指望依靠美国，实现其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最近，岸信介政府又积极准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同美国进行新的军事勾结，并且企图用原子武器装备日本军队。这对于亚洲各国的安全，特别是我国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一向支持日本人民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国家的正当愿望。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处理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绝大部分战争犯罪分子，并且对于日侨的遣返、两国民间贸易的开展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给予了积极的协助，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就是在我国政府的这种协助下，冲破种种障碍，在去年三月五日签订的。但是，岸信介政府却拒绝给予应有的保证，致使协定无法实施。去年五月，在岸信介政府的纵容下，长崎发生了侮辱我国国旗的事件。去年十月，我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以后，岸信介本人又公然诬蔑我国是“侵略者”，叫嚣什么不能让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样，就使得中日关系陷于几乎完全中断的状态。岸信介政府这种反动政策，激起了日本人民极大的愤怒。岸信介政府现在虽然为了应付日本人民的压力，不能不在口头上表示愿意恢复中日贸易，实际上却继续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继续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致使中日两国人民改善两国关系、恢复两国贸易的愿望至今不能实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不能坐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也不能容忍岸信介政府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欢迎日本人民为了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所作的巨大努力。我们认为，最近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的代表团在先后访华期间所提出的关于改善中

日关系、恢复中日邦交的一系列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相信，日本人民终将冲破一切障碍，发展同中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热烈鼓掌**）

美帝国主义在进一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加紧了它在东南亚的侵略和备战的活动。最近，美国纠集东南亚条约集团，举行惠灵顿会议，就是为了在东亚地区策划新的侵略和颠复活动，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并且进一步加紧对于东南亚条约集团的亚洲成员国的控制。美帝国主义竭力阻挠越南的统一，加强在南越的军事部署，唆使老挝当局毁弃日内瓦协议，企图把老挝变为它的军事基地。美国利用它所控制的国家，对柬埔寨王国进行露骨的颠复活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去年主动地全部撤出了朝鲜以后，美帝国主义不但拒绝从南朝鲜撤走它的侵略军队，而且变本加厉地向南朝鲜运进包括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在内的大批军事装备，支持李承晚集团发动完全撕毁朝鲜停战协定的叫嚣。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些侵略活动，严重地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东亚的和平。作为日内瓦协议和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美国破坏这些协议和实现它扩大侵略的阴谋。我们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所有邻邦建立和发展友好的睦邻关系。我们主张在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建立和平地区。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于东亚和太平洋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不想威胁任何人，不想损害任何人，不要求任何人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我们也要提醒那些追随美帝国主义、敌视我国和威胁我国的人们，如果他们坚持这种做法，他们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鼓掌**）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现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关系很恶劣。全世界都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方面。我们并没有跑到美国去耀武扬威，封锁它，占领它的领土，或者制造两个美国。（**笑声**）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同样，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暴风雨般的掌声**）台湾地区的一切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走。（**鼓掌**）任何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鼓掌**）根据这个原则，一切愿意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就必须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尊重我国的合法权利。我们愿意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和进行合作，但是，凡是有可能出现所谓“两个中国”局面的国际活动，我们决不参加。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途径是堵塞不了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制造所谓“两个中国”的把戏，同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一样，只能把他们自己带进死胡同。（**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 * * *

各位代表！对于我们的事业，无论在国内方面，或者是在国际方面，形势都是好的。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事业。（**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的国家在今年十月一日将渡过它的光荣的十周年。（**鼓掌**）当我们回顾十年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愉快和信念。（**鼓掌**）我们的一切成就是我国全体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创造的。（**鼓掌**）在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在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的这次大会将通过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宏伟的计划需要动员全国一切的力量来完成。（**鼓掌**）在我们这次大会期间，同时举行着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我们相信，这两个会议一定能够对于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任务作出重大的贡献。（**鼓掌**）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鼓掌**）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积极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十周年！（**全体起立，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　富　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提出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九五八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指示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大家已经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中看到，在这一年，无论是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或者是运输业和商业，或者是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卫生事业，都得到了跃进的发展。在农业大跃进和农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一个全民的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关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意义和原因，周总理的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中共中央根据一九五八年形势的发展，在当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总结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经验，并且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提出了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产量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一亿担的四项指标。这是我们编制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的主要依据。这个计划草案，在本月初和本月中，先后经过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为二千八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二千零五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四十，即增加八百二十亿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计划为一千六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业总产值计划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八百八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九。计划规定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体现了党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工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首先注意了原料、材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因为只有有了更多的原料、材料、特别是钢铁，才能制造更多的机器；有了更多

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和机器，才能使工业各部门以至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更快的发展。同一千八百万吨钢和三亿八千万吨煤的指标相适应，计划规定：生铁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增加到二千三百万吨，发电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七十五亿度增加到四百亿度，水泥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九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其他重要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如原油、木材、硫酸、烧碱、纯碱等产品的产量也将有很大的增长。上述这些产品在一九五九年增加的产量，都将比一九五八年所增加的产量为高。例如，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生铁产量增加了七百七十五万吨，发电量增加了八十二亿度，水泥产量增加了二百四十四万吨；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生铁产量将增加九百三十一万吨，发电量将增加一百二十五亿度，水泥产量将增加三百二十万吨。应当说明，在今年生铁和钢的计划产量中，包括一小部分土铁土钢在内。

一九五九年机器制造工业的生产计划，是按照首先保证原料、材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保证运输业和农业发展的需要，适当照顾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方针进行安排的。一九五九年，采矿设备、洗煤设备，炼焦设备、轧钢设备和发电设备的产量，都将成倍地增长。例如，发电设备的产量将由一五八年的八十万瓩增加到二百八十万至三百万瓩，即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至百分之二百七十五。水泥设备、化工设备和炼油设备的产量也将有相当大的增长。为了保证运输业发展的需要，计划规定：机车的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三百五十台增加到五百五十台，货车的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万一千辆增加到二万七千至二万八千五百辆，汽车和民用船舶的产量也将有相当大的增长。为了支援农业的发展，计划除了规定化学肥料的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八十一万一千吨增加到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吨以外，机器制造工业将提供二百万马力的排灌机械，三千台拖拉机，一千一百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三千台机动脱粒机。为了适应轻工业发展的要求，一九五九年计划生产棉纺机二百五十万锭，以及必要的造纸设备和制糖设备。为机器制造工业本身所需要的金属切削机床，计划产量为七万至七万五千台(不包括简易机床)，比一九五八年的五万台增长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由于农业和重工业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有可能也有必要较快地发展轻工业。计划规定，棉纱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一十万件增加到八百五十万件，棉布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五十七亿公尺增加到七十二亿公尺，纸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百六十三万吨增加到二百二十万吨，食用植物油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百二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吨，糖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吨，原盐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三百万吨。这些产品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六十七。

根据上述安排，一九五九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将达到九百八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将达到六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五百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可见，一九五九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贯彻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贯彻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原料、材料工业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

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发展农业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努力，争取粮食产量跃进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跃进到一亿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粮棉增产的要求，并且使各类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都得到普遍的发展。

按照增产的可能性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计划规定：黄麻和洋麻的产量达到一千万担，比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五十万担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甘蔗的产量达到四亿担，比一九五八年的

二亿七千零五十万担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甜菜的产量达到一亿一千担，比一九五八年的五千八百万担增长百分之九十；大豆的产量达到三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五十亿斤增长百分之二十；花生的产量达到一亿二千万担，比一九五八年的八千万担增长百分之五十；油菜子的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八年的二千二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四十五。

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增产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必须保持一定的播种面积，并且有计划地扩大国营农牧场的耕地。一九五九年全国的播种面积计划为二十一亿亩，其中粮食的播种面积为十六亿亩，棉花的播种面积为一亿亩。计划还规定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亩。

为了增加农业中的畜力，计划规定各种大家畜的饲养总数达到九千万头，比一九五八年的八千五百零六万头增长百分之六。为了增加副食品的供应和增加肥料，计划要求猪的饲养数达到二亿八千万头，比一九五八年的一亿八千万头增长百分之五十六；羊的饲养数达到一亿二千万头，比一九五八年的一亿零八百八十六万头增长百分之十。此外，要求扩大蔬菜的播种面积和积极发展水产事业；在城市和厂矿区附近，应当建立和扩大副食品的生产基地。

在大力增产粮食和棉花的基础上，应当实行农业的多种经营，发展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

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九年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计划为二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在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为一百七十七亿四千万元，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为十九亿二千万元，运输和邮电部门为五十五亿五千万元，商业、粮食、物资储备部门为三亿元，文教卫生部门为六亿五千万元，城市建设为四亿八千万元，其他为三亿六千万元。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较多地集中在工业和运输部门，一方面是为着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公社对农业的基本建设将有比较多的投资，国家还将从预算中另外拨出十亿元帮助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其中大部分也将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在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学、木材、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的投资为一百二十四亿九千万元，占百分之七十，这是为了使原料、材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的生产能力在近期内有较大的增长。

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分配给中央各部门直属企业和直属单位的为一百五十四亿七千万元，分配给各地方所属企业和所属单位的为一百一十五亿三千万元。今年分配给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七，比往年有了显著的提高。

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有一千零九十二个，其中：重工业的建设项目为六百九十三个，轻工业的建设项目为一百六十一个，水利的建设项目为二十八个，运输和邮电的建设项目为一百八十六个，商业的建设项目为九个，文化教育的建设项目为十五个。上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建设项目，计划在今年内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六百七十个。

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建设的铁路，包括新的干线、支线、企业专用线和复线在内，共有五千五百公里。因为一九五九年增加的货运量主要集中在现有铁路，因此，铁路的建设，将首先加强原有的线路。

运输方面：为了保证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继续跃进，一九五九年的铁路货运量计划为五亿二千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三亿八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六；交通部直属企业的货运量计划为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二千八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此外，各地方还

分别规定了发展公路和水路运输的指标。

商业方面：一九五九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划为六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五百四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九。通过商业机构供应给人民的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水产品，盐、棉布、针织品、呢绒、卷烟和其他日用品，都将比一九五八年有所增长。

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计划规定，一九五九年高等学校招生二十五万人，在校学生达到八十三万人，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七十万人，在校学生达到一百八十二万人，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八；高级中学招生六十五万人，在校学生达到一百五十二万人，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一九五九年的初中教育、小学教育、业余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工作，都将由各地方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规定适当的指标。一九五九年的文化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都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实现这样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是必要的。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工农业的大跃进，钢、煤、粮食、棉花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以上，但是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说来，仍然是很低的。一九五八年的产量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钢三十多斤，煤将近九百斤，粮食一千二百多斤，棉花十一斤。显然，这离开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很远。这也就是这些产品以及其他的许多产品虽然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供应仍然显得紧张的基本原因。正因为这样，如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说，我们必须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才能使全国的经济面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实现这样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也是可能的。

首先，一九五八年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一九五八年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三；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钢、生铁、煤炭、发电设备、机车、汽车、动力机械、谷物联合收割机等等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五八年，全国约有七百个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单位全部建成或者部分建成投入了生产；此外，还有大量的限额以下的工矿建设单位建成而投入了生产。我国过去不能生产的容积为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公尺的大高炉、板面宽度为二千三百公厘的中厚钢板的轧机、容量为二万五千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压力为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都在一九五八年试制成功了。在农业的基本建设方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灌溉面积四亿八千万亩。在铁路运输方面，我们修建了三千五百六十四公里的铁路；铁路货运量也由一九五七年的二亿七千多万吨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这些重大的成就都将对今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发生巨大的作用。

其次，由于农业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广大的农村妇女减少了家务拖累，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同时，几百万劳动力从农业战线转到了工业战线。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量。生产战线上的这部分生力军，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劳动的熟练程度将很快地得到提高。

再次，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战线上，都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和组织经验。广大的劳动群众学会了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和施工的有效办法，展开了不断改进工作和大胆发明创造的群众运动。许多在一九五八年还不成熟、还没有经过考验的措施，在一九五九年将有可能通过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得到比较完

善和比较广泛的应用。

实现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政治团结，掌握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家有了坚强的信心：只要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国就一定能够提前实现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任务，一定能够较快地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和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九五九年，我们将继续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政府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我国建设的重大项目共有二百一十一个；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苏联援助的项目总数改变为一百六十六个。这些项目，在今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一百一十三个。从今年开始，苏联除了继续帮助我国建设过去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以外，根据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定的两次协议，还将帮助我国进行一百二十五个企业的建设。

总之，今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计划规定的钢、煤、粮食、棉花的生产指标，都等于一九五七年实际产量的三倍左右。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合计的钢的总产量不过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吨，而一九五九年一年内就将生产一千八百万吨。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粮食和棉花的生产，目前我们还缺乏必需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抵抗自然灾害侵袭的力量还不强，要在一九五八年产量增长一倍的基础上，再增产粮食三千亿斤和棉花三千三百六十二万担，任务的艰巨性也很明显。我们对于农业上可能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困难，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必须首先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继续跃进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以后，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战术上充分重视困难，克服麻痹大意和自满的倾向，抓紧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去认真战胜困难。

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我们以为，在当前必须采取的各项组织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立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开展一个全民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去年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决不能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工作已经“到了顶”。拿钢铁工业来说。今年第一季度，本溪第一炼铁厂的高炉，每一立方公尺容积每昼夜的产铁量已经达到二点一五吨，鞍钢的九号高炉和三号高炉在四月初也已经跃进到二吨以上，而全国大高炉的平均数却是一点四吨。上海第三炼钢厂的平炉，每一平方公尺的炉底面积每一昼夜的产钢量已经达到十三吨，而全国平炉的平均数却是七点三吨。可见，提高高炉和平炉利用效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按照现有的设备能力，全国大中型的钢铁厂，高炉的利用效率每提高零点一吨，全年就可以增产生铁六十多万吨；平炉的利用效率每提高一吨 全年就可以增产钢六十多万吨。再拿铁路运输来说。今年第一季度，阜新车站和阜新煤矿密切合作，实行了铁路和矿山运输统一指挥的办法以后，每一列车的装车时间从原来的十四小时多缩短到六小时以内，从而大大节约了货车周转的时间。按照今年的情况，全国铁路货车的周转时间每缩短一小时，全年就可以多运输货物一千万吨左右。这两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增产节约方面还拥有很大的潜力。

因此，我们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单位、各个人民公社，都要迅速地充分地动员群众，通过技术革新和其他的有效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提高质

量，反对浪费，降低成本，掀起一个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热潮。

在工业战线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任务，是发扬职工群众的创造精神，革新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改善生产工艺和操作方法，改进产品的设计，以便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节约原料、材料、节约劳动力，克服大跃进中某些原料、材料、设备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广大职工群众对于他们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最熟悉的，也是最乐于加以革新的。从去年以来，许多企业的职工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创造。有的职工在一台车床上装两付刀架，有的职工在一台钻床上装几个钻头，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机械设备的能力；有的职工把小的机床加以改装，生产大的产品，使小机床顶大机床用，也就是所谓"蚂蚁啃骨头"。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规模不大，设备很旧，今年初经过全体职工四十多天的苦干、巧干，利用旧料革新设备和工具，使全厂三道主要生产工序做到了连续化，使六个重要的生产环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就使劳动生产率比革新前提高了二点四倍，同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我们希望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都能够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根据需要，依靠企业本身的力量，使旧设备"返老还童"，使新设备"锦上添花"，积极挖掘现有生产设备的潜力。

在工业企业的技术革新中，应当一切经过试验，广泛地改善生产工艺和操作方法，合理地简化工序，缩短加工过程，用新的加工方法来代替旧的加工方法。在进行技术革新的过程中，企业的领导必须努力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特别是提高新工人的熟练程度，改善劳动组织和加强生产管理。

改进产品的设计，合理地简化产品的结构，减少不必要的部件和零件，不仅可以节约原料、材料，节省工时，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使用效能。各个企业应当有领导地进行改进产品设计的工业。

不但是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应当加紧进行技术革新，土法生产的小型企业尤其应当加紧进行技术革新。在目前，有一部分土法生产的小型企业，占用的劳动力和消耗的原料、材料都比较少，产品的质量也不够好，这种情况，采取技术革新的方法，是完全可以逐步改变的。例如，四川省开县的白玉钢铁厂，原是一个土炉群，资源的条件也不大好，自从去年十二月发展成为小型钢铁联合企业以后，由于抓紧了技术革新这一中心环节，开展了高产优质的群众运动，就改变了过去生产比较落后的状况。今年二月中旬，这个厂减少了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反而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生铁的含硫量降低到零点零五以下，成本也降低了百分之十一。

无论是重工业产品，或者是轻工业产品，都必须保证优良的质量。这是增产节约的一项重要任务。所有企业，都应当经常地注意增加技术管理，遵守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消灭废品，减少次品，严格执行从原料、材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的检验制度，努力争取每一件出厂的产品都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工业企业中增产节约的门路很多。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在加强原料、材料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非生产人员、节约管理费用等方面，也都应当加以重视，做出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在农业战线上，应当开展大面积丰产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农业的"八字宪法"，争取实现今年一月间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提出的"十大倡议"。在目前，应当着重做好春耕播种工作，提高播种质量，按照不同的土地条件，进行合理的深耕，合理密

植。我国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的计划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争取夏收作物的大丰收，对今年农业的继续跃进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冬小麦、早稻、油菜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及时地防止倒伏和防治病虫害，并且及早地准备收割的农具。

实行深耕和密植，需要大量的肥料。所有的人民公社都要认真做好积肥和造肥的工作，并且注意增加效率高的肥料，注意合理施肥。

一九五八年和今年春季，各地方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这是今年农业增产的一个有利条件。为了发挥这些工程的作用，应当修好或者改善渠道，平整土地，加强蓄水和保水的工作，提高现有提水工具的效能，做到修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灌溉技术也应当注意改进，普遍推广浅水勤灌和沟灌、畦灌的方法，作到合理灌溉，节约用水。

无论是深耕密植，积肥运肥，或者是发挥水利工程作用，加强田间管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的劳动力是不足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不但要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改善劳动组织，精简公社非生产人员，而且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继续开展工具改革运动，特别是注意改革那些能够节约劳动力比较多的工具，如修水利的工具和耕作、运输等方面的工具。贵州铜仁县由于从耕地、运肥到播种，全面地实行了春耕工具的改革，工效提高了一倍以上。各地方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和农活的需要，切实做好改革工具的工作。每个公社要尽可能建立修配和制造农具的工厂。每个专区以至每个县要尽可能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研究、试制和推广改良农具。在改革农具的同时，必须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训练的工作。

在农业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切实地加强生产责任制。生产队、生产小队或者作业组，要实行包产量、包成本、包工的“三包”办法，经过群众充分地讨论，把生产指标和生产措施规定到每一块田地，把责任规定到每个社员，以充分发挥生产队、生产小队、作业组和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应当努力促进农业的增产，同时应当注意节约。勤俭办公社，反对对公社人力、物力、财力作任何的浪费，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重要条件。无论我们得到了多大的丰收，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应当有计划地使用粮食和反对浪费粮食。

在基本建设战线上，广大职工在一九五八创造了多快好省的施工方法，即快速施工方法。这种方法的内容是：对施工项目进行排队，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使用；改善劳动组织，把单工种的工作队改变为多工种的工作队，实行所谓“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大量改革工具，制造土机械和半洋半土的机械，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施工，并且使用预制构件。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劳动力，并且使工人成了“多面手”。这种施工方法，对于保证工程质量和降低工程成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应当继续推广和提高这种施工方法。

在基本建设工作中，要切实注意质量的问题。工程质量不好，有的要返工，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拖延工程的进度；有的还会造成工程事故，或者造成生产上的长期不合理现象。用同样的人力物力时间而保证了优良的工程质量，就是建设工作中的最大的节约。为提高工程质量而斗争，是基本建设部门全体职工一项经常的基本建设的任务。在建设中，应当保证建筑结构的质量。在施工中，应当严格遵守设计的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并且健全检验制度，发动广大群众实行监督。

基本建设方面的增产节约运动，不但要注意加快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量，保证安全，

而且要注意节约建筑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程成本。

在运输战线上，广大职工群众在加速车辆和船只的周转、提高运输效率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广泛地推广这些经验，对于完成今年繁重的运输任务有极重要的作用。在铁路运输方面，各地正在推广高站台、低货位以及滑坡式装卸等先进方法。黑龙江省鹤岗煤矿的一个矿井，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装车时间从三小时缩短到二十分钟。如果全国普遍推行这项经验，就可以大大加快车辆的周转，从而增加铁路的货运量。有些铁路单位实行了“捎脚”运输。如西安铁路局的职工，在托运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充分利用每一辆回送的空车、载重不足的货车等，在保证行车安全、保证正点的前提下，从去年十一月初到今年三月二十日共捎运货物九万六千吨，等于节省货车四千六百多辆。这一经验，应当大力推广。

在公路运输方面，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合理地推行汽车列车化，大力节约油料的使用，采用代用燃料，加强车辆的维修、保养工作。

在水路运输方面，应当加强港口的装卸能力，缩短船只在港停留的时间。在内河航线，应当继续推广顶推运输的方法；在沿海航线，应当推广拖驳运输和拖排运输的方法。

目前，短途运输是运输战线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加强短途运输，必须大搞民间运输工具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应当根据条件，逐步推广四轮马车、机动木帆船，在山区推行滑道和索道运输，在运输量大而且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轻便的土铁路和木轨道运输。

在商业战线上，增产节约的主要务任，是作好农副产品、工业产品和废品的收购工作，作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服务。同时，应当加强经济核算和改善经营管理，从减少商品的损耗和节约运杂费、保管费、包装费等方面，来降低商品的流通费用，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

无论在那个战线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要求都必须是多快好省的统一，都必须是数量、质量和安全的统一，决不要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忽视另一个侧面。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经常地认真地注意提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保证生产、建设和运输的安全。

目前，工业战线上的高产优质的社会主义红旗竞赛运动，农业战线上的大面积丰产的竞赛运动，运输战线上以合理的多拉多载、快卸快装、安全正点为主要内容的竞赛运动，商业战线上的以促进生产、执行政策、完成计划、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向红专进军为内容的“六好”红旗运动，在全国各地正在开始发展。这些不同形式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九五八年各个经济战线上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继续，是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主要保证。现在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许多地方对于运动的领导还抓得不紧。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些薄弱环节，使运动普遍地发动起来和深入下去。

要把全民的增产节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必须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项工作任务的内容，提出任务的理由，可能出现的困难，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基本途径，向群众交待清楚，并且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倾听各方面群众的意见。要召集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会议，使上情充分下达，下情充分上达，以便通过活泼的、切实的讨论，充分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许多困难在摆到群众面前讨论以后，常常很快地就迎刃而解。宝鸡市宝成仪表厂，一部分干部本来对于实现今年大跃进计划的信心不大，但是，把计划交给全厂职工讨论，干部深入车间和小组，参加生产，搞“试验田”以后，干部和职工的信心和干劲大增，措施也越来越具体。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实行任务到班，零件过关，就产品的每一个零件议出结论：需要改设计的，

就革新设计；需要改工艺的，就革新工艺；需要改工具的，就革新工具。结果，今年一月份的总产值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三十六，二月份总产值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八。这种把任务向群众交底，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应当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间普及起来。

经济战线上的一切领导工作人员，不仅要关心生产的状况，而且要关心群众的思想政治状况。要继续贯彻执行干部下放、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办法，巩固干部和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注意使群众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改善，使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得到贯彻，使苦战和休息有适当的结合。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发挥最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事业也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向前发展。

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方针。群众运动的大规模开展，要求我们加强集中领导，以便把中央、地方和企业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心协力，扭成一股劲，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对于各项任务，应当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排队”，首先保证完成主要的任务。在各个经济战线上都应当抓紧组织工作和具体措施，使各个方面的工作得到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向前发展。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各个人民公社、各个事业单位，对于国家规定的生产、建设、运输、协作、调拨、收购等方面的任务，都必须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在国家企业中，要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且确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各种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生产建设工作在统一的指挥下有秩序地进行。在人民公社中，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相结合的方针，迅速地把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

各位代表！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艰巨的、但是可以完成的计划。让我们动员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运用和发扬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功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为实现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而斗争！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计划，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计划！

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先念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

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收入和支出，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收支规模和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这是我国人民奋战一年的胜利。这个胜利的基础，是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空前伟大的跃进，这个胜利进一步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伟大生命力。

下面，我就来谈谈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收支决算的具体情况。

一九五八年国家收入四百一十八亿六千万元，相当于原预算数三百三十二亿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一。这一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一百零八亿五千万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只增加一百三十四亿元。这一年财政收入比上年财政收入三百一十亿一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五，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十二，即使增长最快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十六。一九五八年收入决算中，各项税收一百八十七亿四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之一百一十三点三；企业和事业收入二百二十亿二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之一百三十九点三，公债收入七亿九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四；其他收入三亿一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四十点七。

一九五八年支出四百零九亿六千万元，相当于原预算三百三十二亿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点四。一九五八年支出同一九五七年支出三百零四亿二千万元比较，增加一百零五亿四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五八年支出决算中，经济建设费二百六十二亿七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九点七；社会文教费四十三亿五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国防费五十亿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行政管理费二十二亿七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七。此外，还有归还内债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十一亿八千万元；其他支出二亿四千万元，增拨给银行作为发放贷款的资金十六亿五千万元。一九五八年支出超过预算的部分主要是用来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一九五八年上述经济、社会文教等各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总计为二百一十四亿元，比上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七十。各地方各部门在预算以外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由于精打细算，降低工程造价，用同样资金办更多事情等因素，一九五八年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就大于过去用同样投资所能完成的工作量。一九五八年文化、教育、科学和卫生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经费所以没有用完，主要是由于执行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执行了勤工俭学和勤俭办事业的方针。一九五八年行政管理费所以超过原定预算，主要是由于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

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收入相抵，结余九亿元。这是属于地方预算的结余，将要由地方结转到一九五九年继续使用。

由于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于各企业、事业单位存款和人民储蓄的增加，这一年人民银行发放的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商业贷款，都比上年增加很多。这些贷款的发放，有力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转的扩大。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市场货币流通量有了相应的增加。同时，国家商品物资库存也有了相当的增加。总起来说，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财政战线上的情况是十分良好的。

党的领导，政治挂帅，这是一九五八年生产跃进、经济高涨的根本保证。没有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没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取得一九五八年经济财政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同时，我们的跃进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大力援助分不开的。

一九五八年是党的群众路线大发展的一年。在工业、农业、商业、运输邮电和文化教育的各个战线上，都展开了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财政工作也是如此。在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提出了改进财政管理体制、改进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和改进农业贷款管理的办法，接着，又先后制定了改进税收管理体制、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办法，等等。这些办法有利于更好地把统一计划同因地制宜的原则相结合，把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从而为努力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创造条件。例如，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制度实行以后，许多企业的职工就在投资不增加的条件下，扩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是依靠少数人办财政，而是依靠有关单位和广大群众办财政；不是单纯在表报堆里从数字上打圈子，而是深入企业和事业单位，同群众一起进行财务核算和财政监督。这就使我们的财政工作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新局面。

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归根到底，是来自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一九五八年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厂矿约有七百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投入生产和部分投入生产的厂矿还多一百六十多个。限额以下的中小型厂矿和人民公社举办的小型企业，更如雨后春笋。这一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六十四。这一年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央各工业部直属工业企业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五。上述这些，当然都相应地增大了国家财政的收入。这一年，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也根据收入不断增长的新情况，一次又一地增加生产建设的经费。生产发展充裕了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收入和支出是相互促进的，只有生意兴隆，才能财源茂盛。可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伟大跃进和财政收支的巨大增长，人民是看得清楚的，是欢欣鼓舞的。我们的朋友也为我们这种成就感到高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不管怎样诬蔑和攻击，也无法否认我们大跃进的事实。有一些好心肠的人，怀疑财政收入增长得这样快，是不是由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有这样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对于这样的新事物，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实际。一九五八年财政收入增长得这么快，绝不是由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大家知道，人民负担加重与否，主要看税收的增加是不是超过了生产增长和人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要看市场物价是不是稳定。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收入四百一十八亿六千万元当中，来自国营企业事业所缴纳的税收和利润，共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九，而来自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七，来自其他方面的缴款占百分之二点四。这一年国家向农村征收的农业税全部只有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同上年的征收数字二十九亿七千万元比较，增加了二亿九千万元；这一年国家在农村征收的工商业税，由于农村工商业和农副业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相应地增加到二十一亿五千万元，比上年征收数字十八亿元增加了三亿五千万元；这一年国家在农村发行的公债和其他收入三亿二千万元，比上年的二亿九千万元增加了三千万元；三项合计共五十七亿三千万元，再加上各地方在预算以外征收

的农业税附加四亿四千万元，合计为六十一亿七千万元。农民负担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十，一九五八年下降为百分之七。这就是说，尽管一九五八年农副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仍然执行了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农民的负担是相对地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市场物价是稳定的。从市场供应来看，一九五八年秋季以来，城市中一部分副食品和某些日用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略有紧张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就业面扩大，职工人数增加，需要量增大。这一年全国兴办了许多新的企业和事业，全年平均，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同时，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公社举办公共食堂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农村副食品消费量增大了，因而供应城市的部分相对地减少了；由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对日用工业品的需要也增加了。因此，尽管一九五八年工农业产品是增加的，市场商品供应数量是扩大的，仍然赶不上各方面需要的增长。当然商品调拨、运输及其他方面也有一些缺点，我们正在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加以改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需要量很大的国家中，在国民经济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当中，经济生活发生某些暂时的困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尽管发生了某些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仍然维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我国人民深深了解，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必须克勤克俭，渡过某些暂时的困难。经济发展了，事业前进了，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营经济，增加收入是依靠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依靠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依靠发展生产，而不是依靠发行货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这是我们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中历来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国家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币值稳定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原因就在这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需要的不断增长，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自己的幸福而生产，因此他们能够干劲十足地从事劳动。我们国家所以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原因也在这里。

（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安排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九年要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上年获得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

适应这种情况，现在编成的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是一个挖掘潜力，支持全面跃进的预算；是一个贯彻“全国一盘棋”精神，在集中领导的原则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的预算；也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可靠的预算。

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收入五百二十亿零一千万元，预算支出五百二十亿零一千万元，收支平衡。同一九五八年决算数比较，收入增加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支出增加一百一十亿零五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一九五九年预算收入的增长，是充分考虑了客观可能性的。按照计划草案，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总值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业生产总值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同上述国民经济指标的增长基本上相适应的。我们考虑到一九五九年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些好条件，例如：第一，轻工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上年收获的农产品作原料，一九

五八年农业的空前丰收，给一九五九年轻工业生产提供了远比上年为好的条件，而轻工业生产是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的；第二，一九五八年大量投入生产的厂矿将要在一九五九年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还将有一批新建的厂矿投入生产，设备增加了，生产的规模更大了；第三，还由于经过一九五八年，我们开始有了大跃进的经验，有了在生产建设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我们的人民公社经过去冬今春的整顿工作，将要更加发挥它的优越性；等等。因此，尽管预算收入的增长幅度很大，但这是有根据的，是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

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各类收入如下：

一、各项税收一百九十九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其中，工商业税一百五十二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农业税三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三。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三百一十八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一，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四。

三、其他收入三亿一千万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和上年相等。

一九五八年六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从一九五九年起，全国性经济建设公债停止发行。同时国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发行比较短期的地方性的公债。但是，除了个别省份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决定今年暂不发行公债。

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收入，按不同经济成分的缴款来划分，则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缴款将为四百五十七亿三千万元，比上年增加一百零六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将为五十八亿七千万元，比上年增加一亿四千万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一十一点三；其他方面的缴款将为四亿一千万元，比上年减少五亿九千万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可以看出，一九五九年预算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将是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上缴部分的增加，农村人民公社的负担是基本上保持上年水平的。一九五九年国家征收农业税三十三亿元，同上年的征收数字大体相等；农村工商业税二十四亿五千万元，比上年增加三亿元，这是根据上年征收情况参照今年计划产值计算的；农村其他收入一亿二千万元，比上年减少二亿元，这是因为今年绝大部分地区不发行公债了。此外，一九五九年还有农业税附加四亿四千万元，也同上年的数字相等。农村人民公社各项负担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一九五八年为百分之七，一九五九年将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二。

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各类支出如下：

一、经济建设费三百一十七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九。

二、社会文教费五十七亿三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十一，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

三、国防费五十八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二，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

四、行政管理费二十六亿九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二，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

五、债务支出十一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二，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六、对外援助支出六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八。

七、其他支出二亿七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十三点三。

八、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三十一亿七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一。

九、总预备费九亿五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八。

上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支出，如果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则中央预算二百七十九亿一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地方预算二百四十一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三。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支出的安排，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费所占的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二，仍然保持一九五八的水平；国防费和行政费所占的比例却进一步有所降低，一九五八年为百分之十七点八，一九五九年将下降为百分之十六点四。国家机关所需费用的比重进一步缩小了。

（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二百七十亿元，比上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元增加五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基本建设投资两年来增加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基本建设投资大体上占国家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只有一九五六年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而一九五八年则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九年仍然是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九年除了预算所列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外，还将有各地方、各部门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了充分发挥各建设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他们在既定投资的范围内，精打细算，少花钱，多办事。一九五九年将继续实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制度，即是：在保证工程质量，保证不降低生产能力，不推迟交工日期，不突破投资总额，不增加非生产性建设比重的条件下，把年度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所规定的基本建设投资，交由有关建设单位统一掌握，包干使用，以便有效地发挥建设单位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当然，今年还要根据实际执行中的经验，在某些方面对包干办法作若干补充。

（三）一九五九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增加了对人民公社的投资十亿元，作为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这笔资金主要地将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他们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比较富裕的公社的水平。当然,国家拨给的资金是有限度的，人民公社发展经济主要还是依靠本身的积累，正如毛主席说过的，一切经济比较落后的公社和生产队，应当象河北省遵化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现在经济上落后的面貌。

（四）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三十一亿七千万元。过去几年，国营企业需要的流动资金，一部分由预算拨款，一部分由银行贷款。为了及时保证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克服过去分别供应资金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脱节、重复和手续繁杂现象，已经规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将国营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全部改为由银行统一贷放；国营企业原有的自有流动资金，也一并划归银行统一管理；并且规定今后企业需要经常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仍然由各级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适当加以安排,作为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交由银行统一贷放。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和商品流转都将有巨大的增长，国家财政给银行增拨这样一笔信贷资金是完全必要的。

（三）为实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而奋斗

各位代表！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实践，我国人民更加增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前面说过，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是有根据的，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但是完成这样一个预算，实现预定计划，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鼓足干劲，共同努力。

为了圆满地实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实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把集中领导同分级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把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企业同群众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整体和局部、重点和一般、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是对立的统一体，不注意局部，不照顾一般，不设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各种建设事业；但是，分级管理必须是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积极性必须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积极性，一般必须服从重点，局部必须服从整体。从经济部署来说是如此，从财政安排来说也是如此。各地方各部门不论使用预算拨给的资金，或者使用自筹资金进行建设，都应当从整体出发，尽一切力量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圆满实现，使自己这个局部为整体的胜利作出最大的贡献。

为了圆满地实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我们还必须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在国家预算当中，国营企业收入和基本建设支出占着很大的比重，国家预算是否顺利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国家企业和建设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由于一九五九年生产和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各种原料、材料的供应整个说来并不宽裕，同时，劳动力在工业、农业等各经济部门中也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如何挖掘内部潜力，节约原料、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实现今年大跃进计划的主要途径。我们有许多中小企业是去年大跃进当中建设起来的，技术基础较差，管理经验不足，原料、材料使用和劳动力组织方面难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而经过去年的生产实践，在原有基础上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是十分必要的。许多原有的大型和中小型企业，只要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技术改革，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工作，各级商业部门只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改善经营管理，节约资金，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也大有潜力可挖。发动广大群众为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而进行的斗争，是增加企业收入、增大国家积累的重要源泉。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中，要在统一领导、统一经营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相结合的原则下，建立各种管理制度和办法，努力加强计划管理和财务管理。

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的方针。一九五九年我们要继续开展更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一切经济部门，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人民公社，都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设备，尽可能地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切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尽可能地节约开支。总之，必须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反对铺张浪费，使每一文资金在建设中都能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在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各位代表！目前的形势对实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是十分有利的。今年年初以来，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已经捷报频传。农村人民公社经过去冬今春的整顿和巩固，经营管理和

财务工作都提高了一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一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都显示：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为今年的新的大跃进而英勇奋斗。我们相信，一九五九年我国国家预算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一九五九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党内通信

——关于农业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

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党内通信*

——关于《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毛　泽　东

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河北省昌黎县
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

现在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生产运动，县、社干部大部分下到生产队。体制变化后，群众的干劲较公社化初期大为提高，出勤率提高。但和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比较，出勤率超过，干劲不大。同时，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表示不很关心。因而从各方面解决群众自觉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是当前农村中迫不及待的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的一封信。

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影响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而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如何，对巩固人民公社是一个关键。最近公社几个书记一起开了个研究会，研究了一下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大家认为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分配问题：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分散，帐目算不清了。地委最近规定了三道防线，一是扣留部分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五，二是消费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即余下的百分之五十五的一半，即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作工资（按劳动日分配），三是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但实际上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把实际花出去的钱作为扣留部分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只有百分之四十八可以作为消费。这百分之四十八有了吃饭没有工资，有了工资即不能保证吃饭(供给)。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群众对一九五九年的分配也产生了怀疑。同时，群众还有这样一种顾虑，“现在说按劳分配，谁知秋后又怎样变。”因而在生产上产生了消极情绪，出勤率虽高，但劳动效率很低。

(二)生产指标：包括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对农业生产有科学的估计，人人心中有数。从果乡公社来看，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用最大的努力可以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七十（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每亩可产四百五十——五百斤（一九五八年三百零八斤），再多没有可能，但上面分配产量指标是一千二百斤，距实际很远。公社按县的指标包产百分之七十，即亩产七百多斤，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生产情绪的作用。群众认为：“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要多少，不干也少不了三百六十斤的定量供应”。他们对“没有千斤思想，不打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则有这样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一千五百斤，我说二千斤，“法不责众”，省得被批判右倾保守。

公社书记们研究，为了鼓起群众的干劲，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产量问题，使群众心中有数，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讨论中，我想了个意见，对上吹，对群众实事求是。上面规定的产量指标给多少，认多少。但对生产队必须是既先进而又可以达到的目标，以鼓励生产积极性。讨论了两个小时，不敢这样做，怕被发觉后受批评。最后讨论了一种和农民达成协议的办法，这就是硬着头皮包产量，但在征购数字上和农民达成协议，即把征购任务固定下来，除交征购任务外，其余粮食归生产队。这实际上就是将亩产指标变成一个不起作用的东西，使它不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看来，指标脱离实际太远，比没有指标要坏得多，因为它要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究竟是谁规定的这样的指标呢，谁也不知道，县委书记们清楚的知道，达到产量指标根本不可能，也要硬着头皮分下去。而地委规定小麦亩产五百斤。但一到会上都吹三千斤，五千斤，看来有些糊涂。

(三)粮食问题：食粮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顿稀饭(施各庄段店等)难以支持劳动，也影响干劲。据谈最严重者为乐亭县，每日只能供半斤粮，现在吃白薯秧的叶子，有些人到果乡公社的地方拣白薯干。

由于粮食问题，牲畜和猪只的发展受很大影响。

(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所谓大集体和小集体利益的兼顾，就是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公社和管理区这一级的关系基本解决，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待研究。管理区的手有些过长，抓得过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

积极性。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已被人们发现，并且逐渐提出来研究解决，公社走向巩固，但要把群众的干劲提高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水平，麦收将起决定作用。

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假和粮食问题，基层干部不敢向上反映，大家心中清楚，背后方知真心话。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　王　绍　飞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

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周　恩　来

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这本来是老问题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常常强调这一方面，忘记那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

在大跃进中，产生一些缺点，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接受教训，继续跃进。

在文艺工作方面，一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缺点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

文化艺术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既要结合，又有主导。

一、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去年大跃进，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过分紧张，就不能心情舒畅了。写东西不能天天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去催，精神搞得太紧张了，写不出好东西来。好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陈毅同志在参加宴会后写诗十章，说明心有所感，心情舒畅，写了好诗。我怎么不能偶然得之呢？没有长期修养也。我希望大家精神松弛一下，就可能有好作品出现。当然，一定要鼓足干劲，但一定也要心情舒畅；鼓足干劲是主导的方面，但不要过分的紧张。在这个方面，文化部急了一些。这并不是给大家泄气，而是为了更好的跃进。戏剧、美术等作品，不一定都在十月一日前搞出来，十月底、年底搞出来

* 周总理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也可以，只要是好作品。

二、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工作任务的力争完成和留有余地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订任务的时候，不要订得太高、太紧，要留有余地，不要层层加码。订的指标要是高了，也可以低一些，退一步，若超额完成了，不是很好吗？主导方面是力争完成，留有余地是为了保证质量。任务订得低一些，超额完成，也很好，也不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所谓“卫星”，不能自封，要人家看了之后都说好，才能算是“卫星”。

三、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不是不讲艺术性，思想性是要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否则还叫什么艺术品。现在好多东西（特别是地方戏）单纯要求思想性，不讲艺术性，实际上，思想并没有通，艺术上搞得比较粗糙，地方戏的特点也没有了，使人看了很难过。今后对于艺术性，一定要要求得严格一些。

四、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说，既要有理想，又要是现实的。没有理想的艺术作品，干巴巴的，和照像一样。况且照像也还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理想，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更美，思想情操更崇高。现在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够，尤其是浪漫主义更差一些。毛主席就说过话剧在舞台上和生活一样，没看头。我看话剧也要有浪漫主义。

五、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学习政治，又要和生活实践相结合。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时刻不能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脱离。学习马列主义不要干巴巴地学，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到处可以学到马列主义的真理。

六、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在业务上，首先要有基本训练，同时要有其它文艺修养。既要精通一行，又要有多方面修养。精通一行是主导方面，艺术家可贵的就是专一行。但演员的才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演员很少全才。特别是年轻的演员，更要努力学习。文艺修养是多方面的，文学、音乐、美术等等，都需要懂一点。譬如搞戏剧的也可以学学绘画，作作诗。当然不能一律都要求如此。但艺术修养多一些，总是好的。

七、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在生活上，主导方面是政治挂帅，否则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艺术家，但同时要注意物质福利。对于工资、稿酬等问题，应该研究、总结。有些同志提出戏曲演员要减薪，减得和行政人员一样，这是不必要的。当然，过高的高薪也可以考虑。稿酬问题也是如此。对待成名作家，稿酬应与青年作家有所区别，稿酬应分成几等。因为其中还有个劳动保护精神。

八、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是好的，尽管某些艺术也有部分体力劳动，但与工农业生产劳动是不同的。劳动锻炼不要一般化，年老多病的可以不劳动。要因事制宜，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作具体的规定。譬如，芭蕾舞演员由于参加不适当的体力劳动而不能跳芭蕾舞，这也是个损失。在文学艺术劳动上，也要注意保护演员、作家的身体健康。作家、画家在生病时，演员嗓子不好或女演员来例假的时候，有权利不接受演唱、写作任务，可以顶上来，可以把意见一直提到国务院。要教育群众爱护演员身体健康，繁重的演出不要老是“再来一次”。京剧的乐队也不要放在台前的乐池里，以免演员唱起来很吃力，台下观众还听不到。这件事北京说通了，还要向外地剧团作说服工作。戏曲演出时要打字幕。这些事情，文化部要掌握起来，要负责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健康，可以发通知，下命令，改变这种情况。

九、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客观的可能性要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十、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采)。独特风格是主导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个性，譬如京剧，就有梅派、程派、谭派、麒派等区别。学人家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

总之，要从思想到工作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以便作好我们的工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不断前进。

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中　　央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

根据十一个省市小麦会议的材料，一九五九年夏收作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一亿一千多万亩，即减少百分之二十。因此，单产虽然可能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总产只能增加百分之几（其中小麦总产可能增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七）。春播正在进行，但是约有百分之三十

的春播地缺乏底肥，有的地方进度稍慢，运动的劲头比去年同期稍差，由此说明，今年的农业生产务任很有完不成的危险。

目前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春播、夏收、夏种挤在一起、切实做好春播、夏收和夏种工作，对于实现全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具有决定意义，为此，提出如下的要求：

一、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第一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地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省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以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抓农业生产。

二、小麦一般还没有定局，只要继续努一把力，增产几十亿甚至成百亿斤是可能的，必须加强后期管理，保证增产。同时从劳力及工具等方面作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

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是完成今年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计划的决定条件。凡是一切可以春播的土地，只要力所能及的都要种上。麦收以后，凡是不影响秋季种麦，不影响种绿肥的麦茬地都要力争全部再种上一季庄稼。在布置夏收的同时要安排好夏种的准备工作。

四、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必须迅速扭转，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应当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放到承包单位和私人喂养，基本核算单位只能养少数才有利于生产。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现在正是大牲口配种的最好季节，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好配种工作，力争满怀，并且切实注意保护孕畜。

五、主席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应当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和执行，真正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并且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继续采取现场会议、评比竞赛等方法，把群众动员起来，干劲鼓足，迅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播、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

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

中　央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中央转发李先念同志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李先念同志五月三日在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的批示一并发给你们。

中　央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小平同志：

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

五月三日下午，我在财贸书记会议上讲了一下粮食问题，首先谈了夏季粮食和油菜籽的征购指标问题，另外还谈到粮食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关于夏季粮食和油菜籽征购指标，已经中央批转各地执行。关于粮食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现在送请审阅。

李　先　念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个问题　关于粮食调运问题

三季度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现在有一种向后推的思想，七月应该调的，想推迟到八月、九月，三季度应调的，想推迟到四季度，好像推迟了时间，日子就好过。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在运输越来越紧张和城市粮食库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时间愈是推迟，工作愈加被动。因为事情总是后浪紧跟前浪，决不允许人们稍有等待和迟疑。

大米是当前最紧张的品种，特别需要按期完成。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城市供应和出口，粮食战线就会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

大豆，东北同志提出完成调出任务有困难，可以考虑适当少调一点，但是必须坚决调。东北少调一点，关内应该增调一点。增减的具体数字，由粮食部和有关省的同志协商确定。

杂粮，不要以为是宽裕的，实际是很紧张的，必须切实掌握杂粮的计划供应，必须坚决完成杂粮的调运计划，并且还要用一切办法渡过杂粮的青黄不接季节。

小麦，一经收购起来，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保证完成调出计划，不准推迟。这是今年决定性的第一着。

目前粮食供应很紧张，粮食调运肯定不能让路，不只是秋粮登场以前不能让路，而且在今冬明春，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也不能让路。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毛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　关于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

搞好农村粮食分配，是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基础，是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过去我们一再说，粮食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今年仍然适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央只管购销差额好了，其它可以不管。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生活往往告诉我们，仅仅管差额是管不好的。今年经验证明这个道理，有些省、区粮食一紧张，自顾不暇，结果中央差额调拨就不能保证。因此，要把差额管好，必须以搞好粮食购销为基础，必须以搞好农村粮食分配为基础。这是保证中央差额调拨的先决条件。今年粮食生产大

跃进，有些省、区没有保证中央差额调拨就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根据这些经验，在秋粮收获以前，农村平均每人留用夏粮，一般应该按照一百斤左右计算。接新秋粮迟的地区，可以多留一些，但不得超过一百二十斤；接新秋粮早的地区，可以只留八十、九十斤，总而言之，秋冬稳一点，春夏才好过。

第三个问题 关于夏季粮食收购问题

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除了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切实安排农村接新秋粮以前必不可少的需要以外，国家还应当尽可能多购一些粮食。这绝不是说，去收购过头粮。有人说，少购就可以少销。乍看起来有道理。但是，实际生活并不如此。少购是容易的，而少销历来就没有做到。因此，我们认为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因此，那一年丰收，那一年就应当多购一些，那一季丰收，那一季就应当多购一些，那一个地区丰收，那一个地区就应当多购一些，哪一个品种丰收，那一个品种就应当多购一些。

第四个问题 关于粮食销售问题

城市：经过这次压缩以后的粮食销售水平，在秋收以前不再提高。重工业工人（如矿井、钢铁工人）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予调整，以免影响生产。秋收以后，根据年景丰歉和国家收购情况，城市销量如何安排，再作考虑。

农村：在新粮登场以后，国家基本上不向农村销售粮食。在粮食销售方面，历年的经验是：放易、收难。销量放宽很容易，收缩很困难。放了再收，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转不过来。秋冬紧一点，青黄不接季节就好过，工作就主动。否则日子困难，一年被动。这是粮食工作上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五个问题 关于粮食库存问题

省里挖了中央的库存粮食补不补？要补，并且要用中央规定的包干差额以外的粮食弥补。当然，如果一年补不足，可以分两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补足。

中央规定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度的包干差额没有完成的，下一年度补不补？由有关省向中央报告，另行商定。

有些省份调出数量超过包干差额的怎么办？可以过得去的，作为调出中央库存粮食处理；过不去的，可以抵算下一年度的中央包干差额。

第六个问题 关于储备问题

现有的商业库存作为商品周转还不够，根本不能算是储备。今后，除正常的周转库存以外，中央和省都必须搞点储备。所谓商业正常周转库存，从全国来说，到六月底要有四百亿斤以上，并且在品种上，有足够数额，才能周转得过来。因此，除了这个四百亿斤之外，还要搞点机动储备。我们现在是既无后手，又无余地，稍稍遇着一点风险，工作就很吃力。不

搞一定的粮食储备，就要犯错误。

第七个问题　关于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

究竟是向生产队收购粮食呢？还是向公社收购呢？粮食销售给生产队呢？还是销售给公社呢？应该是购销都通过公社，指标基本分配到队，公社保证完成国家任务。

第八个问题　关于出口问题

粮食出口任务一、二季度没有完成的，要加在三季度的任务内一并完成。不能躺下，躺下不对。至于出口计划大了还是小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此外，关于粮食工作上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抓紧收购季节，趁热打铁，及时收购"；"瞻前顾后，以丰补欠"；"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细水长流，计划用粮"，"品种搭配、有啥吃啥"；最近主席指示"农忙多吃一点，农闲少吃一点，农忙吃干点，农闲吃稀点"，这也是很为重要的。只是"先少吃一点，后多吃一点"的提法改为"秋冬紧一些，春夏即好过"比较好，因为"后多吃一点"的说法，在实际工作中可能被理解为放宽供应、放开肚子吃，造成工作上的被动。此外还要再加上一条"放易收难"。

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总支委、生产队支部委员会：

中央五月七日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曾经指出，发展猪、鸡、鸭、鹅的生产，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也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保护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鼓励私人植树，中央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

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是，私养家畜家禽的社员要保证不耽误对集体生产应该担负的出工数。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天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

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百分之五，也不少于百分之五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①

把这四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长个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了，可能同集体生产发生某些矛盾，同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这应该从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地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央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

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现在发给你们，望立即抓紧时间，依靠群众，本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这个方案安排和组织今年下半年的生产和基

---

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留地问题的补充指示，指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对上述四条规定，作出适当的修改。

本建设工作。

上海会议以后两个多月以来，由于钢材和其他一些重要原料、材料的生产指标和分配计划仍然偏高，有些重要的原料、材料不能按时、按量、按质、按品种分配，以至许多单位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能摆脱缺原料、等材料、无法正常工作的被动局面。最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有关部、委，在中央财经小组指导下，根据一月到五月实际的生产情况，根据现有的和可能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以及其他的条件，重新计算了今年钢材和一些其他主要物资的产量。按照这次计算的产量，加上现在可靠的进口量，今年全年可供分配的钢材资源为九百零二万吨，比上海会议时计算的少了二百九十三万吨。中央认为，把钢材和其他主要物资的分配方案放在比较落实的基础上，并且根据物资分配方案，把基本建设计划加以调整，这是完全必要的措施。这样将有利于各部门、各地区有秩序地安排工作，有利于各部门、各地区更好地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中央要求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在保证完成物资调出计划和不增加调入物资的条件下，在不增加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并且减少职工总数的条件下，在首先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内的生产和基建项目的条件下，积极发掘潜力，努力增产节约，保证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中央认为，全国的基本建设项目，无论属于中央或地方，无论在限额以上或以下，都必须立即毫不迟疑地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报告中所提出各项原则，加以削减，以便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完成和提前完成那些最重要的基建项目。凡是应当停建缓建的，要坚决地及时地停建缓建。凡是应当保留的，包括限额以下的项目，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过去几个月中由于对基建项目控制不严，收缩不力，已经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损失和被动。现在已经是六月，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否则必然严重地影响全年的工业生产，影响全年的农业生产，影响全国的市场供应，也影响真正重要的基建项目的建设进度。这方面的任务，除直接属于中央的建设项目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外，其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现在各地施工的限额以下项目数以万计，各省、市、自治区必须认真检查，统筹安排，迅速削减，并且由省、地、县三级党委分别负责加以执行。此外，鉴于材料紧张，基建预备费十八亿元必须严格控制，不得轻易动用。

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原来所定的一些指标偏高和物资分配计划的修改，也不能不作某些相应的实事求是的调整。但是在这一方面，态度必须是完全积极的并且必须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步骤。有些企业的指标，原来就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企业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实现指标的各种具体措施，保证原定指标的超额完成。也有少数企业的指标，不是定得过高，而是定得过低，这些企业的指标落实工作，就不是把指标再降低，而是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调高。至于指标定得偏高的企业，生产指标，应该迅速地调低落实，在进行指标落实的时候，也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该落而不肯下落的偏向；另一种是落得过火，或者不按计划、不按比例地下落的偏向。在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生产的调整工作中，还应当注意使这些企业不要同现代化的大企业争原料、材料、燃料，不要同农业争劳动力、短途运输力和燃料，注意使这些企业的生产尽量为市场的迫切需要服务。如果这些企业的工人原来是现在迫切需要的维修工人、配件制造工人、日用百货制造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除了绝对不能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的以外，应当有计划地动员他们赶快归队。总之，工业生产指标的调整工作，必须按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反对千篇一律。明知做不到而又勉强去做，致使产品质量不合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安全无保证，职工再努力

也不能完成计划，是不对的；但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而不千方百计地努力加强各种组织措施，也是不对的。决不应当把指标落实和留有余地错误地理解为把指标压得愈小愈好，理解为不鼓足干劲、不积极采取措施就能够完成任务。相反，只要不在国家分配计划以外向国家再要求增加物资，并且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减少职工的指示，各地方、各企业在实现国家规定的生产和建设计划方面，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增产节约、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任何松劲情绪都是完全错误的，绝对不允许的。

在物资分配计划和各企业生产计划调整以后，虽然一部分产品产量将达不到人代会通过的指标，但是必须指出：只要全国工业战线鼓足干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原料、材料、燃料，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将仍然很高，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跃进。以钢为例，去年生产的好钢约为八百多万吨，比前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二百六十多万吨，增长速度约为百分之五十；今年即使只生产与九百万吨钢材的指标相适应的一千三百万吨好钢，就比去年增加约五百万吨，增长速度将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种增长速度无疑是一个特大跃进的速度。

今年一月到五月的生产、建设情况总的是好的，但是由于工业计划几次变动，材料供应又不落实，因此，人心思定，生产思常，这是目前广大群众的心情，也完全符合于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现在把基建战线缩短，材料分配和工业生产的指标落实，同时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市场状况，必将有利于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鼓舞群众的生产热情。许多企业在指标修改以后，由于政治工作和组织措施抓得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生产计划超额完成，群众情绪大大好转，就是证明。群众现在迫切要求知道当前生产和整个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各级领导机关应当充分满足群众的这个要求，以便同广大群众一起，来设法解决当前生产和建设中的各个问题。所有的工厂、矿山、运输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当迅速向职工群众说明真相，正确地说明当前的有利形势和当前的暂时困难，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单位保证完成的生产指标和争取完成的生产指标，动员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实行苦干、实干、巧干，在现有的原料、材料、燃料、设备的条件下，努力挖掘潜在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计划。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的建议，即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六种主要产品的指标，必须保证完成，并且应当力争超过。凡超额生产的部分，中央直属企业按中央七成地方三成分配，地方企业按中央三成地方七成分配。中央分配给各地的物资应当按时分配；万一有了延误，仍按原分配计划顺延到下月或下年分配，不予改变。地方分成所得的原料、材料、应当首先用于生产设备的维修和市场急需物资的生产方面。

在指标落实以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党委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帮助各企业及时解决问题。各部门、各地方要特别注意抓紧那些重点企业，因为这些重点企业不仅产品数量大，质量好，而且潜力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大。各企业都应当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迅速整顿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普遍实行经济核算，提高产品质量，注意设备的维护检修，注意必要的配件、备件的安排，注意安全措施，改善劳动组织，坚决减少企业中的多余人员，力争多快好省地完成今年的任务。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数量，这在当前经济工作中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目前许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改变，这种情况仍然是工业生产战线上

的最严重问题。所有企业，都必须立即恢复或建立质量的检查制和责任制。对产品质量的好坏，各单位必须说真话，切不可把不合格的产品说成是合格的产品，贻害国家和人民。忽视质量，这是对于目前已很紧张的原料、材料、燃料、运输力、劳动力的最大浪费，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克服。

以上各点，望迅速认真讨论执行。

附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主要物资分配的调整方案；基本建设项目的调整方案；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的预计完成数。

〔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中央、主席：

上海会议所决定的钢材、煤炭、铜、铝、木材、水泥等六种主要物资一九五九年的分配计划，以及同这些物资有直接关系的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根据最近两个多月的实践，由于这些物资的生产不可能达到上海会议所要求的水平，必须加以调整。现在根据中央指示，对一九五九年主要原料、材料、燃料生产的实际可能作了反复的讨论和计算，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九五九年六种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调整方案，请中央审查批准。

为什么许多工业产品达不到上海会议所要求的水平呢？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一般仍然是很高的。根据初步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生铁的产量达到七百八十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点七倍；钢的产量达到四百三十二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钢材的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五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煤的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其他工业产品的产量如电力、原油、机床、棉纱、糖、食盐、卷烟等，也都有很大的增长（详见附表三）。工业总产值按可比口径估算为六百三十一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其中生活资料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约计完成七十二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左右。全国货物运输总量达到八亿八千二百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左右；其中铁路货物运输量二亿零三百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农作物的产量虽然受到播种面积减少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夏收预计仍可相当于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实际产量，或者还可能有所超过。今年一月到五月，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为二百四十五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上述情况表明，我国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仍然很足，整个局势仍然是跃进的局势。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问题是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了很大的增长，却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指标。例如，钢的产量，第一季度只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只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二；钢材的产量，第一季度只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七十六，四月份只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四。由于钢材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就使钢材的分配计划有不少部分

落空。第一季度原计划分配钢材二百三十三万吨，实际生产和进口的只有一百七十一万吨，有六十二万吨要拖到第二季度供应。第二季度计划分配钢材二百三十七万吨，预计只能生产和进口二百零二万吨。除去还第一季度的欠帐六十二万吨外，有九十七万吨要拖到第三季度供应。其他物资如木材、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石油等的分配也有类似情况。同时，轻工业原料如棉花、油料、烤烟等的供应情况也不够好。物资分配计划不能完全兑现，加上有些产品质量较差、品种不全，就使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不能按原定计划进行，使一些企业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使一些基本建设工程陷于半建半停的状态，欲进不能，欲退不甘；使市场的供应也发生困难。许多部门、许多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都迫切希望把今年本单位确实可以分配到的钢材和其他材料的数量，赶快定下来，使生产和建设赶快正常起来，这样他们才好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精打细算地、踏踏实实地安排今年的生产、建设工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千方百计地争取今年调整后的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应当迅速加以解决。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所以完成得不好，主要原因是原来的生产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客观的可能。因此，必须按照生产的客观可能对原定的物资分配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它能够确实实现，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

最近，我们根据一至五月份的生产实绩和六至十二月份的生产预计，重新计算了今年的钢材和其他主要材料的可供分配的物质资源。计算的结果，今年比较落实的可供分配的钢材资源是九百零二万吨（国内生产预计为九百万吨，扣除其中以大材轧成小材重复计算的五十万吨，可供分配的是八百五十万吨；加上目前已经定到的进口钢材五十二万吨）。这个数量，比上海会议安排的方案一千一百九十五万吨（包括扣除重复计算的钢材和加上进口的钢材），减少了二百九十三万吨。其他主要材料、燃料的预计可供分配的资源是：煤炭三亿四千万吨，木材三千五百一十一万立方公尺（国内生产预计为三千八百万立方公尺，折合合用的"等内材"为三千五百万立方公尺，加上进口十一万立方公尺），水泥九百八十万零八千吨（国内生产预计为一千一百万吨，扣除地方自产自用的一百三十二万六千吨，加上进口十三万四千吨），也都比原来计划分配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原来的分配指标定得过高，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国内的生产能力估计得过高了，对国内物资出口换得国外物资进口的可能也估计得过高了。这说明我们在计划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片面性。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原来的计划已经偏高，再加上生产任务和基本建设任务层层加码，这就使材料不足的情况更显得紧张了。

为了使计划落实，有必要把今年的钢材和其他主要材料、燃料的分配计划，根据上述可供分配的物质资源进行重新安排。在安排的时候，为了力求合理地使用这些物资力量，并且使目前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某些失调现象得到适当的调整，我们采取了以下几个原则：

（1）贯彻执行中央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的方针尽可能地安排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注意解决纺织工业、轻工业和其他市场物资的迫切需要，同时照顾到农业上的某些需要，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和运输、积累和消费能够逐步获得比较协调的发展。

（2）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两者之间，首先照顾生产和维修的需要，以便从材料的供

应上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然后照顾必要的基本建设的需要，尽量使生产和基本建设、今年和明年能够有所兼顾。

（3） 在工业生产用料中，首先满足经营、维修和配件、备品制造的需要，照顾机械的配套的需要，然后照顾必要的主机制造的需要。

（4） 在安排基本建设材料的时候，既要适当满足重点部门的需要，又要不使重点部门占用的材料过多，以免妨碍一般部门的必要发展。

（5） 必须保证出口和援外的需要。

（6） 尽可能做到留有余地，适当地补充一些库存。

根据上述分配原则，今年拟分配给基本建设用的钢材为二百五十万吨（上海会议方案为三百八十万吨），木材七百八十六万立方公尺，水泥七百一十九万八千吨。有多少米，只能做多少饭。材料既然只有这么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就必须作相应的调整。我们建议把基本建设的投资由原定的二百八十亿元调整为二百四十亿元（其中留预备费十八亿元），主要是减少了工业部门的投资（减少四十五亿元），而酌量增加了农业、林业、地方交通的投资，因为增加这些投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用的材料很少。

对于基本建设项目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原则是：（1） 优先保证那些担负今年生产任务的项目的建设；（2） 适当照顾为增加明年生产所必需的重点工程和薄弱部门的建设；（3）尽可能地利用已经盖起来的厂房，稍加设备，使其迅速投入生产。根据这些原则，拟将今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由原定的一千零九十二个缩减为七百八十八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的项目是三百六十二个，属于地方的项目是四百二十六个。对于中央各部的建设项目，今后原则上一律不再变动。对于地方的建设项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是调整的幅度不宜过大，调整的意见应当报告中央。至于限额以下的建设项目，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负责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在调整地方建设项目的时候（包括中央各部安排的和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安排的），对于那些产品供应全国需要的建设项目，应当首先予以保证；如果必需调整的时候，应当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对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计划外的项目，凡是同农业争劳动力、争短途运输力、争燃料的项目，以及同现代工业在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上有很大矛盾的项目，都应当坚决地停下来；对于在计划内的，应当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统筹兼顾，合理调整。地方的基本建设规模，应当按分配到的基本建设材料办事，不要把生产维修和市场用的材料挪用于基本建设。计划外的高炉和转炉应当暂行停止配套，简易机床应当暂行停止生产。为了节省建筑材料，应当尽可能地实行"鹊巢鸠占"的办法，充分利用已经建好的厂房，不要把已经建好的房子空在那里，另外又去新建厂房。实行这个办法，今年就可能节约一些材料，多做一些事情。基本建设项目经过这次调整以后，情况肯定会好转，但是有些项目由于材料和设备不能如期到达，仍有可能推迟建设进度，这种情况仍然要估计到。

在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时候，应当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妥善地处理遣散的人员。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应当归队，一般工人应当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战线和必要的采掘部门。

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以后，就有可能使建设力量更加集中地、更有效地使用，就可以把大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送回农村，而有利于缓和目前国民经济某些环节的紧张情况，特别是缓和运输和市场方面的紧张局面。同时，也就有可能使各级领导以更多的力量去抓当前的生产，把生产搞得更好。只有生产搞好了，才能把基本建设搞好。

按照调整后的基本建设计划，某些材料的供应还是相当紧的，特别是木材数量不足，钢材品种不全。为了弥补钢材品种不全，我们准备再争取从国外进口二十万吨最迫切需要的钢材（约值六千万美元）。今年橡胶资源比去年减少，而工业、农业、运输和市场对于橡胶的需要都大大增加，准备再争取进口一万至二万吨橡胶(约值大米八千万斤至一亿六千万斤)。

钢材和其他原材料分配数量减少以后，基本建设规模缩减以后，某些生产指标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认为，现在不需要修改全国的工业生产计划。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原则，统筹安排各地的生产指标。如果各地安排的指标同中央各部的要求有冲突，则应当商得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生产指标应当落实，所谓落实，就是根据可能的原料、材料、燃料，已有的设备能力，加上可靠的措施和群众的干劲，所能达到的指标。落实应当在省、市、自治区统筹安排下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不能单纯由一个个企业孤立地去搞，更不能认为落得愈低愈好。各地区、各部门在国家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的指标下，在保证如质、如量、如期地完成调出计划和不增加物资调入的情况下，应当鼓足干劲，想尽一切办法挖掘潜力，增产节约，特别要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原料、材料、燃料的生产，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节约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总之，凡是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能够多做一些的，我们就应当尽量做到，尽量多做。我们现在以年产一千三百万吨好钢和九百万吨钢材为基数，并且根据其他各部门今年头五月生产和基建的完成情况，试算出一个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的预计完成数（见附件三），供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安排生产指标时参考；这些参考指标应当分别下达，而不要以全部数字下达。表中所列各省、市、自治区六种主要物资的预计完成数，则是必须完成的数字，各地应当努力超额完成。凡是超额生产的部分，中央企业按中央七成地方三成分成，地方企业按地方七成中央三成分成。中央分配给各地的物资，应当做到按时分配。万一没有做到，那么也应当顺延到下月或下年仍按原计划分配，而不应当改变分配计划。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

（附件一、二、三略）

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预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

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　德　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和生产指标比较落实之后，在六亿多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的战役胜利之后，经过适当休整，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伟大干劲，又在新的基础上日益高涨起来，为新的跃进而英勇奋斗；可是另一方面，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并且以各色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去年以来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迅速获得解决的事实，熟视无睹，不感兴趣；而且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不管是否已经克服，都如获至宝一般地广为搜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积极分子的武器。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站

在一起，而是站在群众运动外边，指手划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实际是要把这些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有右倾情绪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同群众商定可能实现的先进指标，而是把生产指标大大落在实际可能完成和必须完成的水平以下，而且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仿佛只有这样，才不是虚报浮夸，才不是主观片面。

还有一小部分干部，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不反对大跃进，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朝气，缺乏干劲。他们对于工作中所发生的困难和问题，不是迅速抓住加以解决，而是畏难苟安，互相推诿，或者马马虎虎，拖一天算一天。

上述这些思想、情绪和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

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

中共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现在将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发给你们，请根据当地情况和主席批示参照办理。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

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

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气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　泽　东

八月十二日

辽宁省委关于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

主席并中央：

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我们昨天上午接到。昨天晚间，省委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在这以前，省委接到黄火青同志从庐山打来的电话，传达了主席七月三十一日对于鞍山市委七月二十七日报告的批示和主席对一封信的评论。在接到主席的这两个指示之后，省委即在八月三日至五日召开了有各市委第一书记和省直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八十余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作了一次讨论并部署了工作。现将这两次会议所反映的情况、我们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报告如下：两次会议一致认为，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我省当前的情况，而且恰合时机，给了我们反对右倾，鼓干劲以巨大的力量和锐利的武器。

会议认为，去年在党领导下掀起的全国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必须肯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正确性，已被大跃进的事实所证明，绝不容丝毫怀疑。我省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干劲冲天，克服重重困难，今年上半年又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至七月份，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有很大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三。钢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六，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生铁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三，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二；钢材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九；煤炭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七；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九，公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八。今年一至六月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去年七——十二月特大跃进时期的产量比较，也是增长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二，发电量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五，原煤增长百分之三点三，，生铁增长百分之八点一，钢增长百分之一点七，钢材增长百分之一点一，原油增长百分之零点三。目前我省的经济形势是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形势。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中央指示所指出的，在我省部分干部中，右倾保守思想有所抬头，畏难松劲情绪有所滋长。

这种右倾思想已成为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在今年年初，松劲情绪在一部分干部中就有了滋长，他们认为大干了一冬，该喘口气，松松劲了。因而造成生产水平的显著下降。经过省、市委召开各种会议，采取各种措施，对右倾松劲情绪进行了斗争，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出现了三月份夺煤大战及整个经济战线上的新高潮。在从五月开始的计划落实过程中，右倾思想又有了抬头，特别突出的是煤炭部门，冷风吹得很厉害。这股冷风，抓住了三月份夺煤大战中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根本否定职工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奋力苦战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大泼其冷水。以煤炭带头，其它工业也有些松劲，生产都有显著下降。正在这时，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同志来到我省，对我省工作进行了正确的指示，薄一波同志在钢铁、煤炭两次电话会议上做了报告。省委根据这些指示，针对当时右倾松劲情绪，进行了一些工作，并在六月中旬召开了工业会议，七月十四日发出了紧急指示，局面开始有了好转，现在工业生产又已上升。半年多来发生的两次右倾思想的逆流，经过两次斗争，形成了工业生产上的两伏两起。从这里可以看出：右倾松劲情绪抬头生产就要下降，鼓足了干劲生产就会上升；这个事实充分地证明了气可鼓不可泄的真理。对今年发生的这两次逆流，省委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虽然基本上顶住了，但是认识还不够明确、深刻。最近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帮助我们更加明确深刻地认识了右倾思想乃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和彻底克服，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才能继续跃进。

会议认为，右倾思想在我省的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怀疑、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攻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们夸大工作中的缺点，污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冒进”，是“吹牛”；胡说“党的以钢为纲的方针错了，今年市场紧张是一切为了钢的结果”，大搞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规律”，是“拔苗助长”；一九五八年的成绩与缺点是“倒一九”“倒二八”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极少数人，甚至悲观地认为“一年不如一年”，“中国经济会愈来愈坏”，完全丧失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二是害怕困难，缺乏干劲，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巨大威力，不敢继续大跃进。他们夸大工作中的缺点，给干部和群众泼冷水；过分强调困难，消极等待，而不去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消极态度对待计划落实，认为计划落实就是指标越低越好，企图借以“换换空气”，“轻松愉快”等等。结果造成群众情绪低落，生产下降，影响极坏。这种右倾情绪与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充沛的革命热情是根本对立的。

我省工业生产在大跃进中遇到的设备失修，产品质量下降，企业管理上某些混乱等现象，已经引起注意并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大部分已有很大改进，正在继续努力，不久将得到彻底解决，绝不象消极分子叫喊的那样严重。设备维修工作，从五月开始注意以来，进展很快，目前沈阳市已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应该维修的设备修好了，到八月底即可全部修好，估计全省九月底可基本上解决，设备损坏最严重的抚顺煤矿，八月底即可修好。产品的质量已经有了显著提高，机械产品的质量到国庆节前主要产品都可以提高到过去的最高质量水平。钢铁的质量也可以很快地提高。企业管理正在整顿加强。总之，所有这些前进中的困难，只要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地采取有效措施，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省担负着支援全国建设的光荣任务。钢、铁、有色金属、煤、重化工、机械、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都占全国很大比重，我省的任务能否完成，将对全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决心以保证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实际行动来保卫党的鼓足干劲，力争大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保证今年大跃进的胜利，这两次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中央和主席指示及八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组织学习，并遵照中央指示，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立即学习，立即行动。

二、根据中央和主席指示精神，召开了全省重点企业党政领导干部及市委书记的紧急会议，在正在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了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前一个会议已在五日下午至八日上午开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写了专门报告与此同时报告。基本建设会议已经开了二十天，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确定把今年下半年地方基本建设计划缩减投资二点六亿元，以便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入生产。这个会议将在明后日结束后另写专门报告。

三、定于八月十日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群众参加的广播大会，依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高潮。

通过以上的几项措施，要在全省造成如同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那样的群众运动声势，使全党全民都以十足的干劲、实事求是的精神，投入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中去。

四、在上述的工作完成以后，立即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七月份省委已组织了检查团下去，现已回来，近日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同他们研究重新部署后就下去）。同时，象去年下半年那样，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中共辽宁省委

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

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在类而及其他部门。

（录自《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枪。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们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象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的、正确的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恰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做为人民内部矛盾，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

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明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往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是有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了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

八届八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七十五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七十四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十四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八中全会详细地检查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充分地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且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今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经国务院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接受的。

八届八中全会满意地指出：由于全党全民贯彻地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已经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比较，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铁路货运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农业方面虽然去年冬季播种面积有些减少，有不少地区遭受了严重水旱灾害，但是夏季作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都有所提高，小麦、早稻、油菜籽的总产量也比去年的特大丰收有所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虽然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很快，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更快，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由于中央和地方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努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加以夏粮上市，供应情况已经好转。总的说来，一九五

九年上半年的经济情况是良好的。

八届八中全会认为，根据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已经获得的成就，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九六二年）完成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应当把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作为今年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光荣的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将使我国国民经济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八届八中全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去年国民经济统计的核实数字，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最近以来出现的大面积的严重水旱灾害，重新审查了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认为这个计划的原定指标有些偏高，需要加以适当的调整。

经过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实，过去发表的一九五八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农业统计机关由于对这个空前大丰收的产量估算缺乏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是估得多了；同时由于对秋季大丰收缺乏适当的劳动力安排，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的有些粗糙。经过核实，一九五八年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实际收获量为四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显然，这是巨大的跃进。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原定的今年粮食和棉花的计划指标，就需要加以调整。同时，去年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中，有三百零八万吨是土法生产的、合于农村需要的“土钢”；由新式设备生产的、合于工业需要的钢（即所谓“洋钢”）的产量为八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鉴于今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紧张，所有土钢的生产，建议由各地方按照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自产自用，不再列入国家计划。煤的产量也决定作相应的调整。因此，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应该作如下的调整：钢的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各增产百分之十左右。全会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些指标，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钢的产量将比去年的八百万吨增加四百万吨，即增长百分之五十；煤的产量将比去年增加六千五百万吨，即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都将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每年平均递增速度(即粮食为百分之三点七，棉花为百分之四点七)。调整后的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将使我们在钢、原煤、原木、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机制纸、原盐、粮食、棉花等方面，完成、超额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今后三年中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腾出手来，用较多的力量来加强国民经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从而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并且使原定在一九六七年实现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可以争取大大提前超额完成。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目前国内外形势对于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在国内方面，工农业生产正在进一步增长；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整顿之后，已经走上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工农群众的劳动热情正在进一步高涨；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正在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正在进一步发展。在国际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和它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增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人民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困难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

矛盾日益增加。全会完全支持苏联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中的努力，并且对苏联和美国宣布两国首脑将互相进行访问一事表示欢迎。全会认为，这对于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是有益的。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越来越大地发挥它的威力。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不但在去年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在今年继续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显著地发挥它的优越性。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八届八中全会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后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为了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下半年经济战线上的各项任务是很繁重的，全会要求各级党委抓紧第三季度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战线上大力领导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用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接建国十周年。

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提前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勇前进！

（转自《红旗》杂志1959年第17期）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结论。

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期间，由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他还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同志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彭德怀同志虽然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

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所召集的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彭德怀同志既然实质上是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积极的，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掌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害怕民主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对于民主革命的方法也经常犯错误，包括几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情形就不同了。他对于社会主义虽然由于党的长期教育也有某种愿望，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精神准备。当社会主义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起而反抗。因此、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同时,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即既有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也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模模糊糊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一面，因而他在过去几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中到了某种时机，由于党的帮助，还可以回过头来；鉴于他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同志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党仍然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希望在彭德怀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于其他跟着彭德怀同志一起犯了错误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党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

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一

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空前大跃进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巨大胜利。去年和今年的胜利充分证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今后四个多月仍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认为：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展开轰轰烈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特别要抓紧今后一个多月的宝贵时机，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使工业、农业、运输业在第三季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用这个胜利来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周年。

二

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生铁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万吨，煤产量达到一亿七千四百万吨，金属切削机床产量达到四万五千台，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钢产量（不包括土钢）达到五百三十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棉纱达到四百一十四万七千件，糖达到七十八万吨，都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他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也都有很大的增产。各种工业品的质量逐月上升。特别是在钢铁战线上，炼铁的中小高炉，已经迅速地代替了去年冬季适应当时情况建立起来的小土炉的地位，并且迅速地提高了技术水平，因而不但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使总产量增加到几乎相当于大高炉的总产量，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降低了煤耗。铁路货运量达到二亿四千七百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九。

在农业方面，虽然今年夏收作物的播种面积有些减少，并且遇到水旱灾害，但是小麦、早稻和油菜籽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都比去年有很大提高，总产量也都超过了去年。

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根据去年十二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今年二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以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进行了整社。在整社中，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在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除了现有的社办的公共经济以外，还可以逐年从各生产队提取适当的积累），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这样，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克服了初办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集中过多的倾向、某些平均主义的倾向以及某些浪费现象，迅速地走上了健全的、巩固的道路。这样，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包括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的综合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进步，便于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在分配中可以有一定的供给制成分，等等，所有这些优越性，将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

在商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二百九十六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其中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其他如蔬菜、卷烟、棉布、针织品、皮鞋、肥皂、文具、药品等类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也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得更快，市场供应的一小部分商品，曾经显得有一些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必然会有根本的改变。

总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半年以来的情况是良好的，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形势是有利的。

三

根据去年农业产量的核实情况、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和最近时期的灾害情况，八届八中全会建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提出适当的调整：把不包括土钢的钢产量定为一千二百万吨（比去年不包括土钢的钢产量八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五十；今年土钢的生产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建议由各地按照情况自行决定，不列入国家计划）；煤的产量定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去年的煤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粮食的产量比去年核实的产量五千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的产量比去年核实的产量四千二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很明显，调整以后的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并且是一个能够超额完成、因现更能够提高劳动人民积极性的计划。

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我们已经提前四年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原煤、原木、原盐、粮食的指标。在实现了今年的继续跃进计划以后，我们又将在钢、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机制纸、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生产指标方面，提前三年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五八年算起），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且有可能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而且，今年的工业生产和建设计划完成得好，今年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能够得到丰收，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明年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鼓足干劲，在今后四

个多月内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继续跃进的计划而奋斗。

四

工业、农业、运输业都要努力增产，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这是全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当前的无上光荣的使命。

在工业方面，首先要大力抓紧原料、材料、燃料、电力的生产，特别是铁、钢、钢材、煤炭、木材、水泥、化工原料的生产，力争超额完成任务。机械工业要首先保证今年急需的设备的生产，按时成套供应，并且迅速地妥善地处理各种半成品。一切重点企业都应该按质、按量、按品种地，并且按月、按旬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地方中小型企业，也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在完成数量指标的同时，完成质量指标，努力降低次品率，消灭废品，特别是要继续大力提高中小高炉生铁和转炉钢的质量。人民日用必需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必须尽速增加生产，并且挖掘各种潜力来扩大原料来源。所有企业都要加强管理，加强设备维修，保证安全生产。基本建设战线必须集中力量，保证重要项目，首先是今年需要投入生产的项目，加快建设进度，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全国劳动力必须进一步地合理安排，把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多余的劳动力继续尽可能地调回农村，或者调到其他迫切需要劳动力的方面，并且继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农业方面，必须抓紧今后两个月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锄草，追肥，防治病虫，争取丰收。今年秋季作物早期生长状况一般很好。但是在南方大水灾以后，目前我国中部地区又遭受严重的旱灾，北部某些地区发生洪水和涝灾。必须战胜这些灾害，才能完成今年的增产计划。人定胜天。凡是发生灾害的地区，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领导全体人民，紧急组织人力物力，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水利设备，为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力争保住秋收和开展生产救灾工作，而顽强地斗争到底。在今后两个月中，还必须作好秋收、秋耕、秋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准备好劳动力、准备好工具和秋季压肥、沤肥等项工作。秋收必须接受去年的教训，作到割好、打好、收好、交售好、分配好、保管好，丝毫不要损失。在秋后必须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加强林、牧、副、渔等业的多种经营。同时，应该抓紧完成整社工作，解决好各项遗留问题，把人民公社建设得更好。

在运输业方面，当前必须首先抓紧煤炭、木材、粮食、矿石、建筑材料等项物资的运输，在秋收以后要同时抓紧秋季农产品的运输，并且尽量把可以提前运输的货物提前在第三季度运输，以减轻第四季度的货运负担。为了加强短途运输，各地应该利用农事间隙，积极组织农村的人力和运输工具，开展一个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

在商业方面，应该积极配合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增产运动，大力组织城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轻工业品、手工业品的收购，并且认真清理仓库，合理地调拨商品，有计划地组织生活资料的供应。

五

在厉行增产的同时，必须厉行节约。一面增产，一面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勤俭持家，这是我们国家的富强之道，这也是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的关键。

一切工业企业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冶金部门、电力部门、铁道部门、航运部门和其他工业部门，都必须严格定出节约煤炭的计划，并且坚决执行。重工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大力节约钢材和木材的消耗，轻工业企业必须大力节约农产品原料的消耗。在农业生产中，必须认真爱护牲畜，爱护工具，不要浪费水、肥料和种子。在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其他各项企业事业中，都必须注意节约劳动力和节约流动资金。

在全国城乡，应该广泛地进行节约的教育。国家机关应该首先作模范，克勤克俭，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对于粮食、煤炭和其他供应还不算富裕的消费品，一定要在一切居民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对鱼、肉、鸡、鸭、蛋、食油等副食品，应该努力增加其中的商品部分，以便保证增加社员收入，增加城市供应和出口，支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在城乡居民中都要大力提倡储蓄，使个人暂时可以不用的现金，在建设事业中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家。要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不但要善于安排生产，而且要善于安排生活，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留有后备。只要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厉行增产节约，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而蒸蒸日上，并且使我们全体人民的生活欣欣向荣。

六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的胜利的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的经验特别明显地证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智慧和力量，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启发和领导，由于党的总路线的鼓舞和组织，有如千军万马，所向无前，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我国人民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在前进过程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难，产生一些缺点。但是人民群众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密切指导下，迅速地解决了或者正在迅速地解决着这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问题。仇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内外敌对分子乘机污蔑我们，企图影响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但是任何反动派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党和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

大意志。相反，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满信心地看到，我们成就是异常伟大的，我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一致，坚决地克服我们工作中的任何困难和缺点，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为在两年内（即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第三季度是一个关键。一寸光阴一寸金。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用新 生产大高潮来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的计划，来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原载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周　恩　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根据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情况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调整今年经济指标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今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国务院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了全体会议，一致同意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建议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我现在代表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一、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形势

在一九五八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我们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

工业方面。今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完成了七百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同期的四百四十三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五。从最重要的一些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的百分比为："洋铁"九百五十万吨，增长一点六倍；"洋钢"五百三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原煤一亿七千四百万吨，增长一倍以上；发电一百八十四亿度，增长百分之五十五；金属切削机床四万五千台，增长一倍多；棉纱四百一十四万七千件，增长百分之

四十六；糖七十八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其它产品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长速度低于百分之二十的只是很少几种产品。

农业方面。夏收作物虽然播种面积有所减少，今年春季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更好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麦子、杂粮、早稻的总收获量达到了一千三百九十亿斤，比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一千三百六十五亿斤还增加了二十五亿斤。

运输方面。今年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完成了二亿四千七百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九；输驳船货运量完成了五千五百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五；汽车货运量完成了一亿四千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十四。

基本建设方面。今年上半年完成投资额一百零七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由于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进行，许多工程部分地或者全部地投入生产，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

商业方面。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了二百九十六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大多数商品的供应量，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由此可见，在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基本建设和商业，都继续以很高的速度发展。总的看来，我国的经济情况是良好的，成绩是伟大的，是继续跃进的局面。广大人民对于这种形势是满意的，对于我们的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

但是，同绝大多数人民充满信心和干劲的情况相反，有很少数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无动于衷，他们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表示悲观，甚至力图散布他们的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会泄群众的气，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错误的有害的观点。在这里，我只就这些人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加以驳斥。

第一、关于大炼钢铁问题。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鼓舞下，六亿多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热情奔放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中去，这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几千万人上山采矿挖煤，大炼钢铁，是这个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群众懂得，经济战线上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从而较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因此，他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冲天的干劲，甚至废寝忘食。国内外反动分子说这是“强迫劳动”，“使人丧失自由”，那完全是一种无耻的造谣。帝国主义老爷们才是惯于使人丧失自由的，但是在西方世界，在何年何月出现过几千万人上山去采矿挖煤、大炼钢铁的壮举呢？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产生这种劳动人民的自觉自愿的生产积极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真正代表着全国劳动人民的意志，所以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能形成这样伟大无比的力量。这是国内外反动分子所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也不愿意理解的。

有人认为，在去年大炼钢铁用了很多人力，花了很多的钱，而产品中间有一部分是土铁土钢，因此是“得不偿失”，至多是“得失相当”。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生产了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生铁（另有四、五百万吨不能用来炼钢

而可以用来制造简单的农具和工具的生铁，还没有计算在内），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点三倍；生产了钢一千一百零八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多。钢铁方面的小型企业、小型设备、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大型企业、大型设备、洋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整个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以钢为纲，这就出现了工业的大跃进，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成倍地以至几倍地增长，一九五八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不仅如此，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还为今后钢铁工业及整个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去年建立起来的土高炉和小高炉，经过去冬今春合理定点、增加设备和提高技术，许多资源条件适当的地方就建立起小高炉群，大大地提高了生铁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开工生产的小高炉（从六点五立方米至一百立方米）总容积已达四万三千立方米，几乎等于全国大高炉总容积二万四千立方米的两倍，今年可以生产生铁一千万吨左右。这些小高炉在第二个五年内将总共生产生铁五千五百万吨左右；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将每年生产生铁一千五百万吨以上。在第五年当中，我们对于小高炉的生产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完全值得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我们只采取建设大高炉的办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由于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使花同样的乃至更多的投资，也决不可能在五年内生产出这样多的生铁。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整个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对于去年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大批小高炉在今后钢铁生产中的伟大意义，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

至于说到小高炉生产的质量和煤耗，最近几个月来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到七月份，小高炉生铁的合格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煤耗率已经降低到四吨左右，利用系数（即每一立方米容积在每一昼夜的生产量）已经接近零点七吨。这证明钢铁工业的群众运动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并且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可以预料，在今后不长的时期内，小高炉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煤耗等方面将获得更大进步。大炼钢铁运动，还起了"炼人"的作用，使广大群众学到了技术和知识，使广大干部取得了经验。

事实证明，工业方面采取大中小型企业并举、洋土结合的方法，具有布点广、建设快、对原料和材料要求低、供应便利等等优点，这极其有利于我们广泛地勘探资源，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充分地利用资源和节约运输力量。当然，在我国工业建设中，必须积极地建设大中型的洋法生产的企业，这是主导方面；但是，决不应该忽视小型的、土法生产或洋土结合的企业的建设。我们必须用“两条腿走路”，而不能只用一条腿走路。

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我们必须肯定地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所得极大，决不是“得失相当”，更不是“得不偿失”。大炼钢铁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进行的那些歪曲事实的攻击，实际上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于这种攻击，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驳斥。

第二、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问题。

同国民经济大跃进一起出现的，是我国农村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公社化。组织人民公社是几亿农民的要求。广大农民为了更快地更有效地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不满足于已有的高级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要求组织规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的公社。还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河南省和其它一些省份的好些地方，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就实际上出现了。它一出

现，就一呼百应，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正是由于人民公社表达了最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伟大的作用，即使在它的初期也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大家知道，去年秋、冬两季国民经济特别巨大的跃进，是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分不开的。

公社化既然是广大的群众运动，既然是一个崭新的事物，那就不能设想它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一点缺点一点困难也没有。在公社化运动初期，由于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经验，的确曾经出现过某些管理权力集中过多、分配上某些平均主义和某些浪费的现象。但是，这些缺点，很快就被党中央发觉和纠正了。去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就讨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问题。随后，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和今年二、三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整顿人民公社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各级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根据这些决定，从去年冬季起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整社工作，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在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并且规定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和巩固，它在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生活、发展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集体事业诸方面的优越性，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今后还将得到更显著的发挥。人民公社现在仍然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它在公社一级所有权中已经有一些全民所有制的萌芽。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对于将来农村中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过程，将提供良好的组织形式和宝贵的经验。

人民公社的出现，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是“好得很”而决不是“糟得很”。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兴起并不“过早”。说人民公社“糟得很”的，只是那些极端仇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一些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还有一些人，他们口头上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对于有几亿人民积极支持的人民公社运动却这也指责，那也指责，认为办早了，办坏了。我们要问：你们难道就不怕被抛到资产阶级右派的边缘上去吗？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公共食堂问题。广大农村和一些城市街道举办的公共食堂，同样是由群众创办的，许多农村食堂已经有几年的历史，而在去年夏季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它适合群众的需要，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它尤其受到劳动妇女的热烈欢迎，因为食堂大大地减轻了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便于她们同男人一样去参加生产。公共食堂对于老年和小孩还带有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性质。在建立的初期，由于管理经验不够，又遇到丰收年成和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运动，有一些食堂对粮食和副食安排不当，因而多吃了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缺点，现在已经得到改正。今年夏收以后，各地方采取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等办法，就使大多数食堂巩固起来了。我们认为，对食堂只要采取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就可以达到便利生产、便利群众的目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会热烈拥护的。因此，夸大公共食堂在初办时的某些缺点，加以指责和反对，甚至不顾群众的愿望而强迫解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第三、关于市场问题。

今年上半年，大多数重要的商品的供应量比去年同期有很大增加。根据统计数字，供应量增长百分之十到三十的商品有粮食、煤炭、绸缎、酒、火柴等，增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有棉布、食盐、肥皂、自行车、卷烟等，增长百分之五十直到一倍多的有针织品、毛线、呢绒、胶鞋、金笔、钢笔等，增长不到百分之十的有食油、纸、煤油、茶叶等。上半年供应量减少的商品不过十来种，即猪肉、牛羊肉、蛋品、水产品、糖、絮棉、皮鞋、电灯泡，手表等、这些商品供应量减少，也并不都是因为生产减少。象肉类、蛋品、水产品、絮棉等供应量减少、是因为农村自己消费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消费水平一向比较低的我国农民，在生产大发展以后，一个时期自吃自用多了一些，城市人口是没有多少理由加以指责的。

总的看来，今年上半年属于穿的和多数用的商品，粮食和一部分副食品，供应并不紧张；比较紧张的只是一小部分副食品和少数日用品。而且，有些上半年感到紧张的日用品和副食品，供应的情况在六、七月已经有了好转，有些人说什么市场全面紧张，这是故意歪曲事实。有极少数人甚至说解放前什么都能买到，现在什么都买不到。谁都知道这完全不是事实，而是恶意的歪曲。对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劳动者来说，事实正好同这些人的说法相反，他们在解放前是要什么没什么，现在凡是必需的都可以买到。说这种话的人，只是表明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满意劳动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仍然留恋旧社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那种贵族、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奢华腐烂的生活。这样的人居心何在，不是非常明白的吗？

我们还应该看到，某些商品供应一时比较紧张，是由于去年生产、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发展得快，因而社会就业面迅速扩大，职工人数增加比较多，使城市购买力增加的特别快。根据计算，去年新增加的职工，除去一部分转业的人员，到今年每月增加购买力四亿多元。这样，今年上半年城市的购买力（包括社会集团购买力在内）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亿元，比去年同期的一百一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城市中某些商品特别是副食品在一个时期内供应比较紧张，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人怀疑市场某些商品供应紧张是因为出口多了，这更加不合乎事实。今年出口的总额，只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点八。而且，粮食和国内需要的副食品，出口数量并不比去年多，或者只比去年略为增加。例如到今年八月十五日为止，我国出口大米的总额不过七十九万二千吨，出口猪肉的总额不过相当于一百四十万头猪，都不足去年大米产量和去年年底生猪总数的百分之一。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用农产品去换回我国需要的物资，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工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今年春季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全国不到百分之五的地方由于去年有灾情，而且没有安排好过日子，收割粮食有些粗糙，在使用上也缺乏计划，吃得多了一些，加上今年春季又有新的灾荒，因此，曾经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不足的状况。但是，这完全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援下，这些地区缺粮的问题很快地解决了。象广东省那样受严重水、旱灾害的地方，也胜利地克服了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确定无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是伟大的，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绝不容许反动分子和人民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利用实际工作中局部的、暂时的、已经纠正了的缺点，来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来动摇和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必须指出，无论是大跃进或者是公社化，都是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怎样对待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充满热情，同群众共呼吸，采取积极支持和积极领导的态度，去鼓舞他们前进呢？还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或者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去反对他们呢？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根本区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十分错误，正是因为他们对群众运动采取了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二、调整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

根据今年上半年计划执行中发现的问题，根据去年粮、棉等农业生产数字核实的情况和今年自然灾害很严重的情况，需要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进行调整。

首先，如前所说，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是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工业总产值完成了七百二十九亿元。但是，这个总产值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全年计划指标的百分之四十四，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一般地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至百分之四十八。同时，去年下半年工业生产发展得特别快，比上半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四，主要是因为县、社大办工业；现在由于要统一安排劳动力以加强农业战线，县、社工业需要整顿和巩固，而且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供应的增长也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今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就不可能用跟去年下半年一样高的速度增长。

从三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完成计划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有十九种，即："洋铁"、电、原煤、原油、木材、纯碱、烧碱、抗菌素、金属切削机床、船舶、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动力机械、棉纱、棉布、纸、糖、盐、卷烟；完成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有十四种，即："洋钢"、钢材、水泥、硫酸、化肥、发电设备、机车、货车、汽车、拖拉机、造纸设备、制糖设备、棉纺机、食用植物油。这十四种产品，由于原料或者材料的供应受着一些限制，在下半年要增产很多，实际上存在着困难。

其次，去年的农业产量，由于我们在大面积丰产和单位面积产量陡然大增的情况下缺乏估算经验，由于秋收的时候没有把劳动力安排好，割、打、收、藏都比较粗糙，还由于对去年四亿亩耕地因受灾而减产的情况估计不足，因此，计算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核实，去年粮食产量为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产量为四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其它一些农、副产品也有一些估算偏高的情况，这次同样进行了核实。按照核实的产量计算，去年农业总产值为六百七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七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从去年农业产品产量和产值核实后的增长速度看，虽然原来估产确有偏高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动摇去年农业大跃进的事实。去年的农业生产从总产值的增长上看仍然是一个空前的大跃进。

去年的工业产量核实无误，工业总产值仍为一千一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百零四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去年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里面，"洋钢"是八百万吨、土钢是三百零八万吨；"洋钢"八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在去年列入统计的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生铁里面，"洋铁"是九

百五十三万吨，土铁是四百一十六万吨；"洋铁"九百五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九十四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大跃进的速度。

再次，据最近计算，今年农田受到水旱虫灾的面积已经达到五亿一千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在受到旱灾的三亿二千万亩农田中，约有二亿亩，已经由于几千万人的坚决抗旱而得到程度不同灌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威力。这几年广大农民兴修的水利工程，对今年抗旱防涝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的水利工程，约可灌溉农田十亿亩左右。其中能够充分得到灌溉效益的有五亿亩，能够部分得到灌溉效益的有三亿多亩，还有约二亿亩在平整土地，修筑沟渠以后，也将得到灌溉效益。如果没有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大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今年旱灾的情况必然要严重许多倍。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考虑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建议国务院对今年的计划指标进行一次调整。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九十一次会议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并且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我现在将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调整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主要指标的调整情况如下：

工业：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包括土钢）调整为一千二百万吨（不包括土钢，土钢由各地方自产自用）；原煤产量由原定的三亿八千万吨调整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其它工业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亿元调整为一千四百七十亿元。

农业：粮食产量由原定的一万零五百亿斤调整为五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由原定的一亿担调整为四千六百二十万担；其它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农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二百二十亿元调整为七百三十八亿元。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原定的二百七十亿元调整为二百四十八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由一千零九十二个调整为七百八十八个。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现有企业生产所需要的材料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使重要项目提早投入生产。

应该指出，指标调整以后，今年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洋钢"的产量将增长百分之五十，原煤的产量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十，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也都将增长百分之十。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我在今年四月十八日向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说过：粮食的产量，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即使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因此，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农业生产指标，仍然保持着跃进的速度。

还要指出，今年工业增产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和农业增产百分之十，是在去年工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不同于平常年分。大家都知道，基数大了，每增长百分之一的数值也就扩大了，完成它就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调整后的指标，在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条件下，工业生产有可能超额完成；农业

生产只要今后不再遇到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有可能争取超额完成的。

完成调整后的计划，我们就将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提前三年实现国务院接受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四大指标为例，中共八大的建议规定，一九六二年的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原煤产量达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棉花产量达到四千八百万担；而在今年，洋钢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煤产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粮食产量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四千六百二十万担，都将达到、超过或者接近中共八大建议的指标。此外，今年达到或者超过中共八大建议指标的主要工业品，还有原木、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机制纸、原盐等七种。

我们既然用两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五年计划，也就可以使工农业生产在以后三年内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腾出手来加强某些薄弱的环节。完全可以预料，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都将大大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达到的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必然是一个大跃进的五年计划。而我们完成了大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就有可能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争取在十年左右时间内基本实现；并且使原定在一九六七年实现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可以争取大大提前超额完成。

三、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为了坚持总路线、保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为了争取今后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必须反对一切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

我们在拟定和执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生产指标定得高了一些，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宽了一些，职工人数增加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在劳动力的安排、物资的分配、资金的使用、产品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国民经济在个别环节上出现了某些失调现象。它表明我们的计划工作机关和经济工作机关还不善于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情况下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我们必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记取这个教训，把不利的因素转化为有利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的缺点是在大发展中产生的，主要是缺乏大跃进的经验造成的。这些缺点是在具体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际工作中发生的，而不是总路线本身的缺点。总路线本身就要求我们根据客观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遵从客观经济规律，注意各种比例关系。在一年多来的实践中，无论是正面的经验，或者是反面的经验，都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它们就将越加显出灿烂的光辉。这些缺点和错误又是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一经发现，就立即改正。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我们认为，既严肃地纠正缺点，又热情地保护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指导群众运动必须遵循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向群众泼冷水，泄群众的气。

就在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的过程中，在经济指标落实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过低估计以至否定去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局部当成整体，把支流说成主流，并且认为经济指标越低越好。这种思想和

和情绪，近两个月来已经有所发展。实际上，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他们根本怀疑六亿多人口为改变“一穷二白”状况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怀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怀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甚至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很明显，如果我们听任这种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不加以坚决的纠正，那么，我们就会大大地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继续跃进，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这当然只有利于国内外的敌人，而不利于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多人口的前途的问题，我们必须提出反对右倾的任务，必须同一切实际存在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严肃的斗争。

在克服右倾的基础上，在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鼓足群众革命干劲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再接再厉，把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全面地超额地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保证。当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很短时间内，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出现新的局面。在工业战线上，八月上半月的钢的日产量已经提高到三万四千一百吨（其中八月十三日已经达到三万八千八百吨），比上半年平均日产量二万九千多吨增长了百分之十七。在农业战线上，抗旱、防洪、防涝、灭虫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到七月底止，已经有四百多万职工回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在商业战线上，七月份的商品库存比六月份增加了五亿元。在财政方面，一月至八月上旬国家预算收多于支二十亿元。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不少的企业中，已经开展了比数量、比质量、比劳动生产率、比成本、比安全的劳动竞赛，干劲冲天、热气腾腾。工厂中和农村中的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踏踏实实地领导生产，并且同群众一起“冲锋陷阵”。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开始出现。这就证明，经济形势正在继续健康地发展，六亿多人民满怀着信心，我们的前途充满着光明。

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要求：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部门和其他的部门，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一切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按质、按量、按品种地和按月、按旬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一切公社都要努力战胜自然灾害，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加强田间管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争取秋季丰收。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和各个公社在努力增产的同时，必须注意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倡储蓄，使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事业、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学会过日子的口号变为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抓紧九月份的工作，以出色的成绩来迎接我们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我们坚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六亿多人民，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新的胜利。

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一九五八年农业统计数字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农业统计机关由于对这个空前大丰收的产量估算缺乏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是估得高了；同时由于对秋季大丰收的劳动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这就抛撒了一些，与估算数字有了距离。经过今年上半年反复核实，过去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农业统计数字，有几项是偏高的。现将修订的一九五八年几项农业统计数字，公布如下：

粮食总产量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总产量四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其它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的百分比是：大豆四，花生九，烤烟四十八，黄麻、洋麻三。

一九五八年底，全国猪的头数为一·六亿头，比一九五七年底增长百分之十。

一九五八年春秋两季群众造林面积共为二·六亿亩，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三倍。

由于以上农业产品产量的修订，一九五八年的农业总产值修订为六百七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为一千八百四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

（新华社）
（8月27日《人民日报》）

“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是九月一日。去年今日，报纸上公布了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关于把钢的产量翻一番，在年内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号召。从那一天开始，举国上下，全民奋起，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大大小小的钢铁厂和炼铁基点遍布全国各省，铁水滚滚，钢花四溅，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正以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的高速度继续跃进。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尽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的胜利。如所周知，一九五八年，我国包括

土钢在内的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零八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107%；如果不包括土钢在内，洋钢的产量也达到八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49.5%。这是空前的高速度。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这个速度同旧中国钢铁生产的速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旧中国从一八九〇年张之洞在湖北大冶开办第一个钢铁厂起，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五十九年间累计的钢产量只有七百六十万吨，平均每年钢产量十二万八千吨。而我国人民去年奋战一年，就生产了比旧中国五十九年还要多得多的钢。这个速度还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钢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1.7%的速度。在这五年间，我国的钢产增长了四百万吨，而去年一年间，仅洋钢就增长了二百六十五万吨，连土钢就增长了五百七十三万吨。去年我国钢产的增长速度，也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高速度。拿绝对产量的增长来说，美国的钢产量从五百多万吨增长到七百二十七万吨左右，用了五年的时间，从五百多万吨增长到一千零三十多万吨，用了八年的时间。英国从一九〇三年的年产五百一十一万吨到一九一四年的七百九十七万吨共用了十一年时间，从一九一四年的年产七百九十七万吨钢到一九三六年的年产钢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吨，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也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

由于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变。在去年以前，我国只有辽宁、黑龙江、河北、山西、湖北、四川和北京、上海等八、九个省市有一些钢铁工业。经过去年全民大炼钢铁，几乎全国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建立了或大或小的钢铁工业的基础；特别是经过去冬今春的整顿、巩固和提高后，现在除了原有十八个重点钢铁企业以外，我国又逐步形成了二十多个中型钢铁厂的基础和三百多个炼铁的基点。在那里，已建设起容积达四万多立方米、现在能够年产生铁一千万吨的小高炉，和可以年产四百万吨钢、在达到设计能力后可以年产七百万吨钢的小转炉，这就使今年钢铁工业的继续跃进有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小转炉已经成为今年炼钢生产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小高炉更担负着全国半数的生铁生产任务。并且，利用这个基础，经过今明两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我们就可能建成年产三十万吨左右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十多个和年产十五万吨左右规模的钢铁厂十多个。这样，中小型的钢铁企业，将同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组成一个遍布全国各个省和自治区的钢铁工业网。这是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我国人民怀着无限的喜悦，欢呼大炼钢铁的伟大成就。我国人民深深知道，有了强大的钢铁工业，我国的工业化就有指望了，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也有指望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也就有指望了，总之，我国的富强和繁荣，我国人民的幸福和安乐，也就有保障了。

但是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一年间的巨大的变化，对于国内外的反动派来说，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他们不断地咒骂我们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污蔑我国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的伟大创举失败了，讥笑我们的土高炉和小高炉是一种浪费的无效的劳动。难道这些反动派的先生们真的关心我国人民么？当然不是。他们污蔑和讥笑我们的大炼钢铁，只是因为他们仇视我们。他们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仇视我们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仇视我们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必然导致中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必然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但是，任凭这些反动派怎样咒骂、讥笑，都不能有损于我们已经夺得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的毫毛，更不能阻挡我国人民的继续跃进。

除了国内外的反动派咒骂以外，在我们的队伍内部，有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去

年以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也是极端不满的。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是“得不偿失”、甚至“有失无得”的。究竟怎样来认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怎样来估价这个群众运动的得失，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每一个参加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人，每一个在这个运动中出过力、流过汗的人，都深深地体会到：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我国人民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发挥高度积极性、创造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几千万人参加的一次宏伟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祖祖辈辈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摆脱这种“一穷二白”的状况，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热烈愿望。正是这种热烈的愿望，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史无前例大炼钢铁的高潮。这个高潮是在各地兴修水利的高潮、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下形成的。那时候，人们普遍感到：办工厂，要钢铁；运输车辆滚珠轴承化，要钢铁；推广新式农具，要钢铁；而人民公社的兴起则为大炼钢铁创造了有利条件。党中央关于钢产加番的号召，反应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广大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开始了一个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的伟大航程。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和真正关心祖国富强的人，都不能不为几千万人“上山取宝”的热情所感动。国内外反动派污蔑我国几千万人上山是“强迫劳动”固然是无稽之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也正表明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远远站在人民群众的外面，根本不理解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状况的热烈的愿望和奋发的热情。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一个最大污蔑，就是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现在我们就来好好算一下这笔得失的账。

“钱花得太多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一个“论据”。发展小高炉是要花钱的，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必须对小高炉生产给予一笔补贴。但是，这笔账应当怎样算呢？我们从眼前的支出来算？还是从长远的所得来算？我们认为应当从发展小高炉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所发生的长远的效果来算总账。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建设起四万多立方米的小高炉，这些小高炉今年内将生产一千万吨左右的生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将生产五千五百万吨左右的生铁。到一九六三年，小高炉的生产能力将达到年产生铁一千五百万吨。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增加了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给以一定的投资，有什么划不来的呢？如果不是“两条腿走路”，不是在建设大高炉的同时发展小高炉，而是仅仅建设现代化的大高炉，那么，我们要增加一千五百万吨的炼铁能力，就要再建设二十多座容积达一千多立方米的大高炉，这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能吗？绝不可能。建设二十几座大高炉的钱和补贴小高炉的钱是差不多的，但是，目前无论从我们的技术力量、我们的设备制造能力、或者从国外进口设备，都不可能同时建设这样多的大高炉。退一步说，即便假定能够建设起这样多的大高炉，也由于大高炉建设的时间长，在五年内也绝不可能生产出五千五百万吨生铁。而且，小高炉可以利用分散的、储量较少的矿藏，而大高炉没有储量达几亿吨的矿产基地是不能动工的；小高炉可以利用一部分民间运输工具，而要建设二十多座大高炉，为了集中供应铁矿、焦炭等原料，仅厂内运输就需要建设几千公里铁路，这也是短时间内办不到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国家花费了较建设大高炉相等的甚至更少的资金，却能在比建设大高炉早得多的时间内拿到五千五百万吨生铁，赢得了高速度，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创造了重要条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鼠目寸光，他们根本不会算账，却装

成很懂得经济核算。

“质量太坏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又一个“论据”。一九五八年生产的土铁、土钢比用现代设备生产的“洋铁”“洋钢”，质量上差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土铁、土钢本来主要就是供农村使用的。事实证明，去年的土铁、土钢在今年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农村用的简易机械和农具都是用土铁、土钢制造的，没有这批土铁、土钢，仅靠洋铁、洋钢，就不能供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去年大炼钢铁运动中生产的土铁，在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全国各大钢厂都使用了土铁炼钢。去年第四季度调给鞍钢等重点企业的土铁计七十万零四百吨，今年上半年共一百一十万吨。土铁与“洋铁”并驾齐驱，炼出了好钢。由于我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今年以来，代替小土炉发展起来的小高炉生产的铁和小转炉生产的钢，在质量方面都有了迅速的提高。生铁的质量合格率已达到75%以上，一些大型钢厂都用小高炉生铁炼出很好的钢，许多机械厂也用小高炉生铁作铸造生铁。转炉钢的质量合格率也达到了90%以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闭着眼睛不看这些事实。他们大肆叫嚣质量不好，其目的并不是真正想提高质量，而是根本反对大炼钢铁，反对用两条腿走路办工业的方针。

“‘小土群’搞错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另一个“论据”。他们说：“既然今日‘小洋群’，何必当初‘小土群’”。是的，去冬的“小土群”今春以来已相继被“小洋群”代替了。但是，这丝毫也不能说明“小土群”搞错了，相反地，却恰恰证明“小土群”搞对了。由“小土群”到“小洋群”，这是一个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没有当初的“小土群”，也就没有今天的“小洋群”。正是由于当初大搞“小土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炼铁资源的普查、才为今天“小洋群”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地质资料；正是由于当初大搞“小土群”，使千百万人上了一次钢铁学校，才为今天“小洋群”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力量；也正是由于当初大搞“小土群”，使钢铁产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才为今天“小洋群”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械设备。试想：如果不是当初大搞“小土群”，我们怎么可能在地质资源不明、技术力量不足、机械设备不够的情况下发展“小洋群”？这是一种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恰恰就无视这种常识。

“大炼钢铁挤掉了一切。”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不偿失”论的再一个“论据”。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八年，由于以钢为纲，出现了工业大跃进，煤炭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各行各业都在钢铁加番的带动下实现了全面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煤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4.5%，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108%。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21.6%，一九五八年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42%。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22%，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79%。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棉纱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5.2%，一九五八年的产量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31%。请看！究竟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挤掉了一切，还是带动了一切？如果是挤掉了一切，我们又怎样解释煤炭、电力、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各种工业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呢？当然，在局部的范围内，在一个短时期里，由于大炼钢铁影响了某些部门的煤炭供应和设备供应，多占用了一些农业劳动力，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只是局部范围的缺点，是暂时性的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已经克服或者正在克服。实际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生产出这么多的钢铁，我们今年的整个工业建设包括基本建设在内将遇到的困难，比起上面所说的

这些局部的困难，将不知要大多少倍。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带动一切。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有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整个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也才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个论调实际上是反对党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是反对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方针。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辉煌成就，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造谣污蔑，也驳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谬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完全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所得极大。我们的钢铁工业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正在继续向前跃进。在纪念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钢铁战线上几百万英雄儿女，正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钢铁，力争超额完成一千二百万吨钢的任务，为在今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生产指标而奋勇前进。让我们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荣旗帜，坚决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更大的生产成就向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

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毛　泽　东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着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介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指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和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登庐山作七律）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

（一九五九年九月）

本刊讯* 本刊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泽东同志：

九月六日指示敬悉。当晚即请国家统计局的同志继续准备材料。七日上午，统计局的同志们讨论过一次。下午在红旗杂志社开座谈会，到会的，除了统计局五位同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

在座谈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

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座谈会上提到以下几点意见：

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积累的增长和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扩大再生产和决定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条件；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比例关系，也可以从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得到说明。但是，从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材料，可能说明问题。因此，统计局讨论记录中关于"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的提法，可以考虑作适当的修改，并且可以考虑，按照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把材料再适当料理一下。

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

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实际上，这是很难于完全避免的，以前有过，以后还可能有。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过，苏联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并不能说都完全反映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

* 《内部参考》

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也说过，我们的计划经济，“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所以，对于我们说来，主要的，是要能够及时地进行调整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发生个别或局部的暂时失调的问题。

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大家觉得，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例如某些副食品和少数日用品的供应不足，某些土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产量有所减少，所有这些，是我们在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年春季市场上一度有某些紧张，重要的原因，是去年增加二千多万工人，几乎同过去的职工总数相等，城市的购买力一下子增长很多。

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完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在这个问题上，那些把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夸大为全面的经济紧张和政治紧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

昨天座谈会只是初步地交换意见。我们打算还再开几次，把问题弄得更清楚些。此后座谈的结果，将陆续向您报告。

谨致

敬　礼！

陈　伯　达

九月八日下午

附上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座谈会后重新整理过的一分材料，请您参考。（从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的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9月7日向印度议会提出了白皮书，其中公布了尼赫鲁总理在今年3月22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已在9月8日写信答复尼赫鲁总理。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如下：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我已经仔细地阅读了阁下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从来信中我发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两国政府的立场有着基本的分歧。这使我有点惊异，同时也使我不得不用较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你的来信。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

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从1959年3月22日阁下来信看来，似乎你并不完全反对这一原则。

现在，我愿意就阁下来信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并且结合最近中印边境的形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一、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阁下的信中曾经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阁下在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中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且力图证明中印边界的绝大部分是由过去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所确认的。为了证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我愿意提供以下的事实：

（1）关于中国的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

1842年，以中国的西藏地方当局为一方和克什米尔当局为另一方，的确订立过一个和约。但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派人参加这个条约的签订，事后也有批准这个条约。而且这个条约也只是泛泛地提到拉达克和西藏将恪守各自的疆界，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显然，不能用这个条约来证明双方正式划定了这段边界，更不能据此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印度政府对这段边界的片面主张。至于1847年中国政府官员向英国代表表示这段边界是明确的，这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段边界有它自己的明确的看法，而并不能作为双方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证明。事实上，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同中国政府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今年8月28日，阁下在印度人民院也说过："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由此可见，这段边界是始终没有划定的。但是，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由于历史的传统，确实存在着一条习惯线，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都是按照这条线标明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这个地图附在1854年出版的英国人亚历山大·克宁汉少校所著的"拉达克"一书之内），对这段边界的标法，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当接近。后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把大片中

国领土划入拉达克境内，这是既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双方历来行政管辖的实际情况的。

（2）关于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

从你的来信看出，你也同意这段边界是未经两国正式划定的。不仅如此，事实上双方对于这一地区许多地点的归属，历史上就有争执。例如在西藏札布兰宗西南的桑、葱莎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三、四十年以前逐渐为英国人所侵占，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几度同英国交涉，均无结果，成为历史悬案。

（3）关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

印度政府坚持这段边界是早已明确划定了的，所提出的根据是，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共同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我曾经多次向阁下说明，西姆拉会议是英国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步骤。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所谓内藏、外藏的界线和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以后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既不敢公布有关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这段边界历来的画法。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界线表示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九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对不丹以东中印边界的画法、真实地反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出以前的传统边界的实际情况。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图和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印度军队也只是在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后，才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推进。因此，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阁下在来信中还提到中国和锡金的边界。这个问题象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样，并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说明，中国愿意同锡金和不丹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而且一向尊重它们同印度的正当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对中印边界的画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最初也同中国出版的地图大体一致。事实上，不是中国出版的地图，而是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后来对于中印边界的画法作了片面的修改。虽然如此，但是，由于中印两国还没有通过友好谈判和共同勘察划定边界，因此，中国并没有要求印度修改地图。1954年，我也曾根据同样理由，向阁下说明，中国政府在目前修订旧的地图，是不适宜的。但是，印度国内却有一些人对中国出版的地图大肆喧嚷，企图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用不着说，这种做法是既不明智、又不足取的。

二、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

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极积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在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鉴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中国严格遵守传统的习惯线，对于印军一再侵入或者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件，中国政府始终以友好的态度，采取不同方式，分别地加以处理。例如对于印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侵入乌热的问题，中国政府力求同印度政府谈判解决，避免冲突。对于侵入中国新疆西南部地区和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班公湖地区的印军，中国边防部队依照国际惯例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后，采取了说理的态度，要求他们离境，并且发还他们的武器。对于印军先后侵占什普奇山口、巴里加斯、桑、葱莎、波林三多、巨哇、曲惹、香扎、拉不底等地区，中国政府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总是进行彻底的详细的调查，而不是立即激动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指责。这些措施证明，中国政府是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中印友谊的。

尽管发生了上述的全部由于印军越境而引起的边界事件，但是，直到今年年初为止，中印边界的气氛总的说来还是良好的。在大约两千公里全部未定的中印边界上，始终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事件，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两国边界尚未划定以前，只要双方采取友好和合理的态度，在边境地区是可以保持和睦而不出现紧张局势的。

三、但是，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境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界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的方面负完全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四、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

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了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致亲切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　恩　来

1959年9月8日于北京

〔附〕 尼赫鲁总理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

一、谢谢你1月23日的来信，这封信我已经用它所应得的细心和注意读过了。

二、贵国政府对我们访问中国去考察你们的水利方法和计划的小代表团给予了便利，为此我对你很感激。还有两个代表团——一个去考察农业增产的方法，另一个去考察你们的钢铁计划——不久也将抵达中国。我毫不怀疑，这次考察贵国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的机会，将会给他们教益。

三、我们很高兴地在印度接待了章汉夫先生，我希望他的短暂的访问很愉快，并且使他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在开发我国资源方面的努力。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双方的这种相互访问能够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两国在努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各自所面临的有些类似的问题。

四、接到你的来信，我又查考了确定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疆界的基础。诚然这条疆界的所有各段并没有都在地面上加以标定，但是听到说这条疆界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却使我有点惊异。你也许知道，传统的疆界是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峰顶的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的，但是除此以外，它的大多数部分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确认的。如果我提请你注意这些协定中的几项，也许是有利的：

（1）锡金——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专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

（2）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区——1842年克什米尔为一方与中国皇帝和拉萨古鲁喇嘛为另一方之间的一项条约提到印中在拉达克区的边界。1847年中国政府承认这段边界是充分而明确地确定了的。现在中国主张属它的地区，在官方地图上一向被描述为印度的一部

分，曾由印度官员测量过，而且连1893年的一种中国地图也标明它是印度的领土。

（3）麦克马洪线——如你所知，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从不丹的东部边界东迤，划定了中国同印缅的边界。和你所听到报告的情况相反，事实上这条线是在1913—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在接受这段疆界的画法的时候，西藏全权代表伦兴夏托拉在换文中曾明白地说，他已经从拉萨奉到训令，同意专约附图上所标明的疆界。这条线是在充分讨论之后划出，其后为正式换文所肯定；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说明西藏当局在任何方面不满于协议的边界。再者，虽然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对内、外藏之间和西藏、中国之间的界线表示反对，无论在讨论期间或者在他们在专约上画押时，都没有提到中国方面对印藏疆界有任何保留。这条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它是沿着形成北边的西藏高原与南边的山麓地区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喜马拉雅山脉的峰顶走的。以前我们讨论时，特别是1957 1月你访问印度时，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而且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

五、这样，就占我国同中国的边界的大部分的这三段来说，我们出版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剩下的从尼泊尔、印度、西藏三方交界处到拉达克的一段也是传统的，并且是沿着明显的地理特点的。在这里，边界也是沿着处于南面和西面的水系与北面和东面的水系之间的明显的分水岭走的。老的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几十年来印度行使行政权力及到边界一事，肯定了这种画法。

六、至于巴拉霍蒂（你们称乌热），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它的合法归属问题。在去年进行的谈判中，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文件证据，说明这个地区一直在印度管辖之下，并且深处在我们的边疆之内。在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以前，实地调查很难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虽然如此，我们同意双方协议不派民政或军事官员到该区去。不幸，你们的代表团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我得悉，由于在我们的民政人员在去冬之初撤走之后，带有武器的中国民政和军事人员成批地派入该区扎营，从那时以来情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所接到的关于冬天有一批武装的中国人员在霍蒂扎营和建立永久性建筑物的报告是正确的话，看来正在采取不合习惯的片面行动，来支持你们对争执中的地区所提出的要求。

七、我很希望，研究了上面各段以后，你会信服，我们的地图所发表的我们疆界的画法不仅是根据天然的和地理的特点，而且也符合传统，并且一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所肯定的。我不需要赘言，独立的印度将是最后一个国家在它的确定的疆界以外进行任何侵占。正是基于相信我们两国共同疆界的总的问题业已得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我才几次公开地和在议会里宣布，对于出版了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我国疆界，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我们原以为我们的立场已经为贵国政府所明白了解和接受。然而，由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不幸对疆界的画法在几处地方存在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八、你会理解，继续出版把大块印度和不丹的领土划入中国的中国地图，是不符合长期确立的习惯和条约的，这并且是引起我们极大关切的事。正如我在前次信中说过的，我们很珍视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我们两国制定了潘查希拉原则，这些原则现在已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得到广泛的接受。要是这些边疆问题现在影响到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会是极

其不幸的。因此我希望在这件事上能早日达成谅解。

致亲切的敬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签字）

1959年3月22日于新德里

（新华社）

（9月10日《人民日报》）

（附）中印边界问题资料

中印边界共长约二千公里，全部未经划定。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抱有侵略野心，极力制造西藏的“独立”或者半“独立”状态，以便把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英国并不断篡改地图，致使中国和英、印出版的地图对中印疆界画法的出入越来越大。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坚持继承英国片面宣布的疆界线，坚持印度出版的地图对于中印边界传统的画法所作的片面修改，并且强要中国加以接受。印度政府这种不合理态度使中印边界问题非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导致许多新的纠纷，并使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

现将中印边界自西向东分为三段说明边界的历史背景和现存问题如下：

（一）关于中国的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印度的拉达克一段边界。这段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中国出版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一贯画法是根据实际存在的传统习惯线，这符合于中国历来行政管辖所到达的范围。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却深入中国境内约三万八千平方公里，印度把这些地方硬算作印度领土。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英国和印度的行政管辖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些地方。印度政府坚持，印度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是根据1842年西藏和克什米尔的一项条约，而且1847年中国政府确认过这段边界线。但是，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说法。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同克什米尔当局在双方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之后，签订过一项和约，但是，和约中只泛泛提到双方将恪守各自的疆界，而且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1847年两广总督耆英在答复英国驻广东代表要求划定这一段界址的时候，也只表示既有传统的边界可循，无用勘定。答复中既未提到什么边界条约，也未同意英方的任何边界主张。由此可见，所谓这段边界曾由条约确定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最近，尼赫鲁总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

还须指出，印度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也同早期英国出版的许多地图（例如，1854年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极不一致。这些地图对边界的标法是更接近于中国地图，不是更接近于现行的印度地图。因此，印度只是继承英国后期为进行领土扩张而凭空臆造出来的边界线，英国的边界主张既无法理根据又不符合边界的历来实际情况。

印度政府为了侵占印度片面划入自己版图的中国领土，近年来竟多次派遣武装人员非法窜入我国境内进行侦察和勘查活动。1958年9月和1959年7月，印度军两批，第一批十五人，

第二批六人，分别在南疆大红柳滩和西藏班公湖地区为我边防部队捕获，并且被遣送出境。事后印方反诬我非法侵占印度领土，并且说我新疆—西藏公路修筑在印度境内，向我提出抗议。我当即严加驳斥，并且警告印军不得再行侵入。

（二）关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省、北方省接壤的一段边界。这一段边界也是未经两国正式划定的，印度政府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有习惯线可循。我国地图对这段边界线一向是按习惯线画的，而印度目前出版的地图对这段界线的画法同我国地图画法在许多地点有不同程度的出入。双方对许多地点的归属问题历来就有争执。例如，在西藏扎布兰宗西南、历来属于中国的桑、葱莎地区，三四十年以前就为英印方面侵占，西藏地方当局几度同英方交涉均无结果，成为历史悬案。和平解放西藏后，印军又先后侵占我国境内的巴里加斯、巨哇、曲惹、什普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地，至今未退。另乌热一地，也是我国领土，历来受我行政管辖，1954年后，印军两次侵入并同我军形成尖独对峙。为避免冲突，双方曾达成互不驻军的临时协议，以便通过谈判解决。但由于印方的阻挠，谈判迄无结果。而印方于1958、1959两年仍以“民政人员”侵入。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对印方上述侵占我领土的事件，我过去尽量采取克制态度，从未向外披露。

（三）关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这段边界也是未经正式划定，但是有传统疆界可循的。我国地图所画的这段边界线是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为界，南麓以北地区，过去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权，这样画法是完全符合两国的传统边界线的。三十年以前，英、印出版的地图一般也采取这种画法。后来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却以喜马拉雅山山脊为界，竟把大约九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中国领土，画入印度版图之内。

印度政府坚持，它所主张的印界线是早经通过条约、正式、明确划定了的。它所提出的根据是，1913年—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由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代表所举行的会议上共同划定了这段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按麦克马洪是英国代表的名字）。印度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西姆拉会议是英国为胁迫中国承认西藏的半独立状态、把中国内地的许多地方划入西藏和加强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而策划的一次会议，英国鉴于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没有敢把它的另一阴谋即划定印藏边界问题提到会议上讨论，其他两方也根本没有提过印藏边界问题。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在西姆拉会议以外由英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瞒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也就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前三个多月，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所确定的。这个换文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西姆拉条约的约文也根本没有提到印藏边界问题。只是在条约的附图中，把这条麦克马洪线偷偷地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图上，根据这种标法，这条线也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国界线。而且就是这个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的代表也没有签字，中国当时的以及以后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都始终拒绝承认，因此这个条约也是非法的，无效的。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隔了十多年还迟迟不敢公布上述秘密换文和西姆拉条约的全文，英印地图也不敢采用“麦克马洪线”的画法。例如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和1929年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第二十四卷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都仍然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麦克马洪线”以南历来属于我国的地区基本上也还是由我国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着，直到1940年以后，英国军队才侵占这一地区的若干地点。中国人民自然对麦克马洪线感到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后来也对此公开表示强烈不满。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西藏地方当局先后同英印方交涉并曾致电尼赫鲁总

理，要求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历来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地区。当时印度政府在答复中提出“在现存基础上维持双方关系，直到双方均愿接受的新协定达成为止。”这说明印度政府当时并没有排除达成新的协议的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军队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中国政府以后向印度政府说明，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中印友谊和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也不越过这条线，以利于以后通过谈判谋求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由于中国的这种友好态度，若干年来这一带边境基本相安无事。但是，自从今年西藏叛乱发生以后，大批西藏叛乱分子越过这条线逃入印度，印度军队就继续向北进逼。印军不仅超越了上述秘密换文附图中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超越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在这两条线以北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印军还对我国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而派驻到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警戒部队进行挑衅。

1959年8月25日，侵入朗久的印军对我驻马及敦的部队无端开火，挑起了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8月26日该处印军再次向我军进行射击，我未置理，印军心虚，始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

最近印度政府配合边境上的军事进逼，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就边界问题不断对我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我国接受印度政府从英帝国主义承袭下来的关于中印边界的非法界线。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公众舆论以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我国侵略了印度，诬蔑我国是帝国主义，并且在印度挑起一个新的反华高潮。帝国主义也正借机煽风点火，竭力挑拨中印关系。为了明辨是非和责任，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已于1959年9月8日致函尼赫鲁总理，系统地说明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和我国为维护中印友好和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

(新 华 社)

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一)

一九五七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

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1）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2）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二）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设、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三）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百分之十。

（四）

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五）

审查和批准的手续，应该是，由右派分子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研究讨论，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单和对他们的鉴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吸收群众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要开群众大会。名单和鉴定，经过现在所在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查

批准、取得原机关的同意以后，在有关单位中公布。在国庆节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根据九月十八日公布的“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使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措施的意义。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党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对右派分子继续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给他们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来，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重新作人。

（六）

现在，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节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一九五七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七）

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中央将另有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部分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现在，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已经发布。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对反革命和其他罪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在押的各种罪犯，经过劳动改造，多数正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不少已经确实改恶从善。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庆祝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分化瓦解残余的反动势力，现在，对一部分在押罪犯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同时，对于当前的反右倾、鼓干劲也是有利的。这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措施。

我们这次对罪犯的特赦，不同于我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赦，也不同于近代各国的大赦。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造好了为主要标准。这是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

育相结合的政策，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二）罪犯确实改恶从善的具体内容是：一、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服法，向人民低头并且在劳动生产和政治改造中，确有良好的实际表现；二、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凡是没有确实改恶从善的，一律不赦。那些虽然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但是由于罪恶严重、民愤很大，估计苦主和群众不能谅解的，不要赦。罪犯中的惯匪、惯盗和大流氓，一般地也不赦，个别赦的，一般应当留场就业。

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应当根据他们在服刑期间的一贯表现去考察。因此，对于被特赦罪犯的具体条件，规定如下：

一、战争罪犯，关押已经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

四、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经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经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具体掌握上，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上的，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十年以上的，应当少赦；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的，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十年以下的，应当多赦。

（三）特赦罪犯服刑时间的计算问题。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服刑时间从判决之日算起；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按实际关押时间计算。原判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凡减为有期徒刑的，新的刑期，一律从减刑之日起算，减刑以前已经关押的时间不予折抵。

（四）现在全国在押犯罪约二百万名（未决犯不在内），其中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战争罪犯八百五十八名，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各约一百万名。根据初步统计，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在经过改造之后，表现较好；有百分之五十，表现一般；表现不好、甚至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二十。从这种情况出发，中央认为这次特赦的面，以占在押罪犯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为适宜，即约赦十万名。这个比例，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掌握。一般说来，内地可以略多于百分之五，边疆地区可以略少于百分之五。普通刑事罪犯可以多赦一些，反革命罪犯应当少赦一些。普通刑事罪犯中的少年犯、妇女犯和病残犯较多的地方，特赦的比例可以略多于百分之五。

（五）特赦的罪犯，多数应当释放回家。自愿留场就业，或者因无家可归而愿意留场的，可以留场安置。对于那些有家可归而又自愿留场就业的，除在边疆地区离家太远以的外，一般应当让他们先回家看看，然后再回场就业。惯匪、惯盗和大流氓中，个别确实改恶从善的，可以特赦，在特赦以后，一律留场就业，不要放到社会上去。由内地送往边疆地区的罪犯，特赦后应当尽量争取多数留场就业，但也要有计划地释放一些回家。特赦释放的罪犯，绝大多数应当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这样既可以扩大特赦的政治影响，也便于群众对特赦的

罪犯继续监督改造。安置在大、中城市的，数量不可过多，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八大城市，应当更少一些。安置在大城市的罪犯，必须是群众可以谅解，生活有着落，对社会治安确实没有危害的，并且要特别注意加强监督。处理和安置这一批人是一件大事。释放罪犯地区的公安机关应当同安置罪犯地区的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妥善加以安置。特赦的首要战争罪犯，由中央专门安置。

由于时间紧迫，工作繁重，特赦工作可以分期分批进行。但是，各地应当抓紧做好第一批特赦罪犯的审查准备工作，在国庆节以前予以处理，并在报纸上报导（不讲特赦人数）。第一批特赦释放罪犯的数目多少，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来不及的可先少赦一些。其余的特赦罪犯，应当在一九五九年内陆续处理完毕。

（六）特赦的罪犯，有一部分原判决剥夺了政治权利。这次不准备恢复这些人的政治权利，目的是为了留有余地，以利于对这部分人的继续监督和考察。如果有必要恢复政治权利的，可以个别处理。

（七）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特赦工作的领导。应当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吸收公安、检察、法院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负责对特赦罪犯的审核、处理等工作，保证特赦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准确地进行。

特赦罪犯的批准权限：战争罪犯的特赦，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小组审核，提交中央批准；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特赦，原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原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由地、市委批准报省委备案。特赦的罪犯应当由法院发给通知书。军队关押的罪犯，由大军区党委批准，由军事法院发给通知书。

各地对特赦的罪犯，应当逐个进行严格审查，不得草率从事。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左”的或右的偏向，不要不该赦的赦了，而该赦的又没有赦。

（八）应当适当地进行宣传工作。宣传我们国家的巩固和强大，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十年来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的正确和成功，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特赦的意义，并且进一步分化残余的反动势力。各地报纸可根据特赦令和人民日报社论组织评论和报道，还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特赦罪犯，组织记者采访报道，并且可组织一些广播录音和拍摄一些记录影片。特赦罪犯的总人数是否公布，以后再定。

（九）这次特赦必然会在对敌斗争战线上发生巨大的有利影响。各地应当善于抓住时机，对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展开政治攻势。加强在押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改造工作，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家属的争取教育工作，以利于进一步缩小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活动的条件。同时，应当估计到，敌人还可能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各地应当保持警惕，防止和克服右倾麻痹情绪。现在有的地方，由于有右倾松劲情绪，对于应当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也不捕办，这是错误的。凡是应当捕办而没有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必须坚决捕办。各地可以在放一批罪犯之后，捕一批必须捕办的罪犯。

对于特赦释放的罪犯，各地公安机关和人民公社，或者被赦罪犯所在的其他单位应当注意继续对他们加以考察并且由他们的所在单位和地方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在特赦以后继续犯罪的，应当本着再犯再办和累犯从严的原则，依法惩办。

根据各地反映，在押罪犯很多在盼望大赦，特赦消息公布后，一定会在在押犯中发生很大反应，一部分罪犯可能发生若干思想混乱。各地应当针对罪犯的思想情况，向罪犯讲明：只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前途总是光明的，政府特赦的，是那些确实改造好了的，没有确实改造好，是不会得到赦免的，把在押罪犯切实引导到积极接受改造方面来。

（十）劳动教养分子不是罪犯，不属特赦的范围，劳动教养分子中确实改造好的，可以参照“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精神，处理释放一些，但不能太多。究竟多少为宜，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接到指示后，当应根据对在押罪犯的调查摸底，开始处理第一批特赦罪犯，并且提出特赦的计划数字，以便中央最后确定各省、市、自治区特赦罪犯的控制数字。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城乡人民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集市贸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济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领导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应当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懂得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便于组织短途运输，便于管理市场价格；便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进行商品的交换和调剂；同时也便于为商业部门开辟货源。人民公社、生产队对农村集市贸易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员进行有关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在参加集市贸易当中，作到买卖公平、不抬价、不抢购、不贩运、不弃农经商。

在开展农村集市贸易之初，为了积累经验，避免发生混乱，应该对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价格等方面作出规定，以利于稳步前进，健全发展。

现将有关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参加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

第一类物资（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物资）和第二类物资（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人民公社、生产队应该首先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

剩余的部分，可以到农村集市进行交易，如果国家需要，应该尽先卖给国营商业部门。至于哪些品种、在什么时间、在哪些集市交易等，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自行规定。第三类物资（一、二两类以外的其他物资），凡是国家规定有交售任务，或者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同国家签订有合同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一定要保证完成规定的交售任务；在完成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剩余的部分、可以到农村集市进行交易；凡是没有同国家签订合同的零星品种，人民公社、生产队可以在集市出售。

人民公社社员家庭和个人生产的副业产品、手工业品，不论属于第一类、第二类或者第三类物资，都可以在集市出售。但是，第一、第二类物资中的某些品种如生猪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的需要，规定人民公社社员一定的交售任务，人民公社社员应该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

二、集市市场内的价格问题

集市的交易价格，应该本着有利于多种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市场物价的精神，根据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管理。对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应该按照以下规定管理和掌握：

（一）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出售第一、第二类物资的时候，必须一律执行国家的收购牌价。

（二）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在市场上出售第三类物资时候，必须服从市场物价的管理。国家对于第三类物资市场价格的管理，应该分别品种采取不同的方针。第三类物资中的主要商品，一般地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进行交易；有些品种也可以根据物价管理权限，由主管部门规定最高和最低的限价。对于那些零星细小的商品，可以在市场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交易双方公平议价。

市场价格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分配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关系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因此，市场物价必须保持稳定。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前，第三类物资的价格一般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不宜轻易变动。如果第三类物资中有的品种由于一时求过于供、市价超过了合理程度的时候 必须加以管理，制止抢购，实行议价，分配货源。对于在短期内供过于求的商品，如果价格过低，以致影响生产的时候，可以由主管商业部门以适当的价格收购起来。

三、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形式

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形式，应该以有利于生产，满足社员购销要求、节省社员时间为原则；并且应该根据公社化以后农村经济生活的变化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定期集市，应该结合社员的公休、节日和历史习惯来规定。不定期的小型物资交流会和庙会，以及经常性的交易所、货栈、农民服务部等形式，也都可以继续采取。

四、参加集市贸易的对象

参加集市贸易的，主要是公社、生产队和社员，以及当地的国营商业部门。公社、生产队和社员，都不得进行商品贩运和开设店铺。

公社所属的生产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和生产的产品，属于第一、第二类商品的，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统一供应和收购，不得在市场上自行采购或销售。经过市场管理部门同意，允许他们在市场上直接进行收购某些原料、材料和销售某些产品的时候，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收购和销售。

外地的厂矿、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等采购人员，须持有原地县以上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介绍信件，并经当地市场的管理机构批准，才能进入市场交易。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上述采购人员，可以持本单位的介绍信经过市场管理机构的同意参加集市贸易。以上各种采购人员，都必须服从当地的市场管理。

经过国营商业组织起来的小商贩，按照批准的经营范围，可以赶集串乡，进行贩运，通过地区差价取得合理的收入。但是不准远途贩运，也不准在同一集市作转手买卖，投机取利，并且要严格遵守市场管理。

五、加强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领导与管理

为了加强集市市场的领导和管理，在交易上，应该把人民公社的物资交流会，同市场贸易结合起来进行。在组织上，应该在县委镇委公社党委领导下设立县、集镇市场管理委员会。已经设有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地区，应该加强领导。没有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地区，应该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商业、粮食、银行、税务、工业、农业等有关部门组成。市场管理委员会应该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以便更好地组织集市贸易。

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市场管理办法，监督价格政策的执行；保障合法贸易，指导市场交易；组织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领导交易所和服务部；取缔市场上一切违法活动；处理和解决市场上发生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将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转发你们，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材料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同志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同志，借着整社和实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牌，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等，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不成群”的单干景象。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这里明显地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

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转发给你们。我们认为江苏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江苏省委指出的，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检查纠正。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

江苏省委的通知

各地、市、县委、公社党委并报中央农村工业部：

最近发现有些地方把全部农活都包到户；少数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的办法，或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包产到户，但采取

了所谓“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等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做法；还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土地分到户，耕牛农具回老家”。必须指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不论是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各种形式包产到户，它们和田间管理部分农活包到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田间管理部分农活包到户，这是劳动管理的一种方法。为了加强田间管理，把一部分零星分散的、不容易进行统一安排、不需要组织集体劳动的农活包到户，可以健全责任制，调动积极性，正如在集体化的同时，仍然保留一些社员家庭副业的道理一样，田间管理部分农活包到户，可以补集体劳动之不足，但是，决不能用它来全部代替集体劳动。如果把全部农活都包到户，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个体分散劳动的老路。如果把产量也包到户，这就更加错误了，产量包到户，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到单干。这些做法，就会使人民公社无法统一安排劳动力组织生产，就会使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发展起来。采取这些做法，显然不是广大基本群众的意志，只能是少数富农或富裕中农的要求。这说明了，当前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存在的，防止领导上在这些方面的右倾思想极为必要。为此，省委特作如下通知：

一、凡是发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

二、生产队组织劳动的基本形式，应当是集体劳动，包工到户的办法可以实行，但只能限于田间管理方面部分零星分散、不容易统一安排、包工到户比集体劳动更加有利的农活，这一部分农活，只占整个生产用工的一小部分，不可能是大部或全部。究竟那些农活需要包工到户，必须从有利生产、有利巩固集体出发，凡是不应当包到户而已经包到户的农活，都应当纠正过来。为了防止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误解，今后一律不提田间管理包到户，还是提建立全面的生产责任制和“几定”为好。

三、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集体劳动还是分散劳动，“三包”到那一级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加强这一方面工作的领导。在当前，特别要注意批判和防止右倾思想。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提出：在今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内，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收割、农产品加工、手工编织以及挖矿石等等方面，在切实做好“三秋

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扩大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三十三亿五千万元以上的产值，使一九五九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各地必须立即抓紧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产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农副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十五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只在群众中动员，切实努力去做，埋头苦干，力争实现，没有实现以前不要登报。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节录)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央、主席：

汇报三个问题：(一)庐山会议以来的农村形势；(二)灾情和抗灾斗争；(三)一九五九年农作物产量的预计。

(一)庐山会议以来的农村形势

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的指示传达到农村以后，人心振奋，情绪高昂，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农民和基层干部说：“眼睛亮了，方向明了，劲头大了”；“贯彻总路线，一日千里，丢掉总路线，寸步难行。”在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方面都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形势。

第一，在农业生产方面：1、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许多公社、生产队出满勤。例如，河北省投入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八月底达到一千二百九十多万人，比八月初增加三百九十万人，大部分生产队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以至百分之百。广东省投入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九月初达到八百多万人，比八月下旬增加二百八十万人，比反右倾以前约增加一倍。很多地方，群众要求早出工、晚收工，并且实际这样做了，一九五八年的高潮再度出现(当然要注意劳逸结合)。2、普遍展开了超产运动。例如，江苏省的“三超五比”(实产超包产、项项超指标、人人超定额；比田间管理、比秋收、比秋种、比征购、比分配)，河北省的“五赶竞赛”(山地赶平原、涝地赶好地、弱苗赶壮苗、晚田赶早田、三类苗赶一类苗)，江西省的“三超两加番”(晚稻赶早稻、杂粮超主粮、总产超去年，产量加番、措施加番)，山西省的“五补”(旱地丢了水地补、早秋丢了晚秋补、粮食丢了蔬菜补、伏桃丢了秋桃补、农业丢了副业补)，四川省的“五种”(增种、补种、改种、套种、

（间种）运动等等，的确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而又比较扎的生产高潮。3、秋收的工效提高（例如辽宁岫岩县展开割高粱竞赛，效率实提高一倍），进度加快（例如内蒙古乌盟的秋收进度提高百分之二十，锡盟提高百分之四十）。“收好、打好、售好、分好、管好、用好”的六好号召已见显著的成效。据四川省材料，一九五八年秋收的抛撒损失率是百分之五到八，今年下降到百分之一到三；云南早稻收割的损失，一九五八年每亩合二、三十斤，今年不超过五斤。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征购入库量比去年同期都有增加。粮食的吃用，看来鉴于已得的教训，一般做到了有计划有控制，个别大吃和浪费的，也被县社干部及早发现和制止。许多地方，成立秋收指挥部，订立秋收公约，推行验收制度，秋收安排有序。4、秋种面积各地安排了六亿四千六百万亩，比一九五八年大大增加，比一九五七年的秋种面积（最高水平）还多二千万亩左右。秋种计划一般已经落实到队，有一半以上已经落实到田。河南、河北等八个主要产麦省市，深耕的冬麦田已达八千九百多万亩，已积的底肥平均每亩合三千斤，麦种准备一般是每亩二十到三十斤，少数是十五到二十斤，个别缺种的可以调剂解决。秋种比较好，这是一九六〇年夏季丰收的有利基础。

第二，表现在人民公社方面：在五、六、七几个月内，农村中也有局部地方曾经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1、改变了“基本队有制”，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名义上保持“基本队有制”，而实际上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六十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2、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例如甘肃省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并且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实际是采取富农路线重新分配土地），富裕中农积极赞成，贫农说是开倒车，坚决不同意；说是“泰山压在头上，又喘不过气来了！”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3、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小私有”变成了“大私有”，“小自由”变成了“大自由”，有的甚至一个月只有四、五天参加集体劳动，成为挂名社员。4、吹掉部分供给制。5、吹掉公共食堂，例如，山西公共食堂一度剩下的不到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二十；青海也曾有诉食堂的苦，刮了解散食堂的风。上述这些右倾的事例，全国说来总数不多，但是各省都有这类的例子。庐山会议后，各省都在批判这些东西，有些事例，就是在批判右倾中揭发出来的。这股邪气，现在已经抬不起头了。不过仍有引起各地注意，进一步加以揭发和批判之必要。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经验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十月十二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象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五月间就开过三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和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动摇的，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减少到百分之八点五；反对的，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五。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个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象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　　央

（附件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附彭德怀同志的批注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陈　伯　达

我们全党现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中央到各地方，在这个斗争中都分别揭发出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彭德怀同志一样进行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党活动。他们所以同彭德怀同志共鸣，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由于彭德怀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集中代言人，所以，揭露和解剖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认识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潮和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参加党三十多年的彭德怀同志常常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闹对立，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参加高饶的反党联盟？去年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又亲自挂帅，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重新搞起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彭德怀批**：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左”的东西，正在破坏它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

彭德怀同志在加入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人们把他看作功臣，为什么象彭德怀这样的人，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

（**彭德怀批**：从来也不是“功臣”，但也不一定就是“祸首”。）

我们必须从社会阶级斗争的现象来看待问题，必须从彭德怀同志参加党以后的历史来看待问题。

这几年来彭德怀同志所参加的和带头的两次反党联盟，是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向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么，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护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内部进行分裂的活动。建国以来，我们这里出现两次企图分裂党的事件，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同志都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参与者，而彭德怀同志还是这个反党联盟的一个头头。高饶反党活动被揭穿了、被粉碎了。但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并没有死心，他们没有悬崖勒马，继续走上了高饶的老路。资产阶级复辟的欲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使他们，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斗争是他们挑起的，但结果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党在这次斗争中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象高饶反党联盟的命运一样，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同志的反党联盟又被粉碎了。

（**彭德怀批**：“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矛盾是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阶级关系紧张，它将破坏总路线、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将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一个大马鞍型，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饿，甚至要饿死一些人。）

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这些反党分子，都是在民主革命中带着资产阶级要求加入党的。正如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所说的，他们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久以前，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犯错误的几个同志，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带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带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的很浓厚，有的少一点。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去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盟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可是，从彭德怀同志来说，他有没有接受党的纲领呢？由于他没有抛弃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即使对党的最低纲领，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资产阶级革命家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实际上，他们自己的一套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资产阶级纲领。

彭德怀同志长期坚持着同党对抗的纲领是什么呢？最清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言论中所表达的资产阶级观念，当时他离开了党中央所在地，把他所主持的华北根据地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他就放肆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在1941年作了《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讲演，1942年作了《1943年要贯彻民主精神》的报告。1943年2月作了《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发言，同年4月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这四篇东西（**彭德怀批**：这四篇东西是有错误的，但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我已作了检讨，已经过去20年了，而且毛主席给我们信以后，再没有提过这四篇文章的内容了，现在是右倾，纠正办法，就算个账，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误，这能实事求是吗？而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这种左倾的危害性是多么严重、多么啊！脱离实际的同志牵强附会是多么危害党的事业。）都是在华北《新华日报》或华北党内刊物登载的。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都是相类似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反复地郑重其事地把些观点啃住不放，并且努力地向党员向人民推销出去。

在彭德怀同志不经过党中央的同意，擅自公开发表《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批判。现在将毛泽东同志给他的原信全录如下：

彭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如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争取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地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的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帮，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段的绝对的阶级互帮（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民主运动是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诉你。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毛泽东同志的信，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深刻的唯物史观的分析，用无产阶级对当时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

观点同彭德怀同志观点的对立，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在毛泽东同志指出批评以后，彭德怀同志并没有接受批评，没有声明自己的观点。相反地，他所领导的华北“新华日报”还擅自对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观点和不合他的想法的部分加以删削和篡改。（**彭德怀批**：我没有这样作过，应当归当事者负责。）这些都证明当时他的错误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他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而是由于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的这些观点直到现在，没有看见他放弃过。他在庐山会议上还公开声称，他根本不同意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届七次大会前后，由中央召集的，由中央和地方同志参加的，以批判彭德怀同志错误路线为目的的“华北工作会议”。

以下我准备就彭德怀同志四篇东西的基本观点加以解剖。

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纲领的问题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即集中到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段的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但是彭德怀同志在他那四篇东西集中表达的，恰恰是反对这些纲领。他有自己的同党不同的纲领。

彭德怀同志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演讲里说过，“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点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映，我们共产党内不赞成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办法，……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党治国。”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背道而驰。

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需要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宁老早驳斥过那种所谓“是一党专政呢，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提法。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们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作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革命推翻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绝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少数人的专政。这一种革命专政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专政，同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阶级根本不同，性质根本不同，目的根本不同，一切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怎样能够因为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就认为不能实行共产党对于革命政权的领导，并且把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实行专政说成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呢？，怎样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把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新中国，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彭德怀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主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目的就是不要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因而也就是否认人民民主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资产阶级右派也是借口不要“以党治国”而反

对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彭德怀同志所用的语言同资产阶级右派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

只能有一种解释,彭德怀同志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不过是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批**：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很对。这就是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本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进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通过阶级专政达到彻底消灭阶级，但是党是领导而不是代替，是通过而不是直接，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正确的。如果代替（包办）而不是通过即是党直接代替和包办国家一切行政事务，这必然降低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将失去先锋队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战斗作用。党政不分的混乱概念，不仅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将失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上述是正确的前提作了错误的解释。）

彭德怀同志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信仰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而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也是这种口号。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总是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彭德怀同志在一九四三年那个所谓"民主教育谈话"中说："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正义、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主张的。"他又说："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是民主的精神。但是，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彭德怀同志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完全是一片胡说。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在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把他们的剥削触角能够无限制的伸张到他们一切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难道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引入社会主义纲领而且也不会把它们引入民主革命的纲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设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

统治，推翻封建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论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纲领。而实际上，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也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纲领，而总是把那一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纲领，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纲领。至于资产阶级政治家，除了叛卖革命以外，象国民党人孙中山，当他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也不把这些口号列入自己的纲领里面。因为法国资产阶级这些抽象的老口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远远的不能够动员群众来进行斗争，如果资产阶级还有点革命性，还想同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作斗争的话。

看吧，彭德怀同志说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呀！说什么“这些口号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呀，这些不就是无稽之谈吗？

彭德怀同志所说的“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士”？什么叫“进步”？什么叫“正义”？这些对彭德怀同志说来，都是一堆糊涂观念。离开了具体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而谈什么人士，空谈什么进步和正义，除了自欺欺人以外，还会有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说得很好，如果把彭德怀同志重复法国资产阶级老口号的事实来同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所通过的纲领作一比较。也就显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彭德怀比起当时革命的国民党人孙中山来反而是向后倒退了。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造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按指当时革命的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当时就是这样把中国民主革命和过去的欧州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而彭德怀同志却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做一切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孙中山还把资产阶级和“一般平民”加以区别，看出“民主”具有阶级性看出中国必须建立和资产阶级专政不同的民主制度。可是彭德怀同志却抹杀了这种阶级性，抹杀了由于不同阶级性而产生的民主的区别，抹杀了人民群众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政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彭德怀同孙中山的这个区别，就是孙中山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时候，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在实际上，也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彭德怀同志在加入党之后，对于我们党的领导，还一直采取怀疑甚至抹杀的态度。

彭德怀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那个报告里面，主要的就是讲他的所谓“各阶级平等”的一套。他说：“今天中国的民主就是要求国内阶级平等”。虽则彭德怀同志在他自己的言论中，也偶尔提到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在实际上，彭德怀同志提出了自己同毛泽东同志完全不同和完全相反的论点，他发展了王明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继续否认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阶级分析，否认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关于发展进步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别的，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然有一个是领导阶级，和一些是被领导的阶级，就这点来说，就不能说是什么各阶级是平等的，既然有专政的革命阶级和作为专政镇压对象的反革命阶级，就这来说，更不能够说什么“阶级的平等”。这样，彭德怀同志的所谓阶级平等论，就在民主革命中也完全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提法是根本对立的。在他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所谓“联合平等的专

政”。不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所谓“各阶级平等”的专政是什么呢？或者是原来的封建买办阶级的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专政，除此以外难道还会有什么旁的专政吗？不管彭德怀口头上怎么讲，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阶级社会中，或者当阶级存在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所谓阶级平等，在实际要求的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平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平等，这种说法本来是资产阶级为着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他们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骗。

马克思早已驳斥过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饰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资本与劳动的调和。”列宁在驳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说的时候，这样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不喜欢，但他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事情很清楚：只要阶级还存在那就谈不上什么阶级平等”。而到阶级消灭以后就不会存在什么阶级平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是阶级平等化——这是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无稽之谈——而相反地是阶级的消灭。”

彭德怀同志的提法是：“共产党员自己要没有阶级平等的民主精神与实质，我们就不能打破统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把劳动阶级从政治上提到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地位，就不能实现民主的新中国。”

一种提法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出发，另一种提法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这是两种不能相容的提法。

按照彭德怀同志的提法看来，阶级平等问题似乎就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他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在它领导下的革命专政，不要推翻剥削阶级，而只要劳动阶级能够在政治上“提到”同资产阶级一样的“平等地位”，他就觉得满足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老调子，更荒谬的，彭德怀同志认为，要得到“阶级平等”首先就要向共产党员本身去要求，首先要在共产党员中“与一切危害民主的、平等的思想习惯、行为作不调和的坚决斗争。”在要求“阶级平等”这个题目上，彭德怀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把他的斗争锋芒引到共产党员身上。他完全走上迷路了。

（**彭德怀批**：上述这一段是在三三制联合政权上走上迷路了。）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彭德怀同志所谓“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这种口号提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话，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各个国家，省分甚至各个地方之间，在生产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成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适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则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他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彭德怀批**：这是对的。）

彭德怀同志在宣传他那一套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的时候，还宣传了中国封建时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他说“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对人要有高度的同志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这就是民主精神。”这些话当然都是活见鬼，难道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阶级关系吗？（**彭德怀批**：这是对的。）除了“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列宁）是能够互爱、互敬互助以外，难道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能够互敬、互助、互爱吗？难道我们可以要求被剥削阶级去爱去敬剥削阶级吗？剥削阶级是不愿意被剥削的，这就是他们的“己所不欲”，难道他们就会“勿施于人”不去剥削劳动者吗？被剥削阶级是不愿意被剥削的，这也就是他们的“己所不欲”，难道他们也就要“勿施于人”，不去进行斗争、进行革命，去剥夺剥削者吗？难道剥削阶级不正是“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吗？难道剥削阶级能够“对人有高度的同志心吗”？剥削阶级和各种反动派当被革命推翻的时候，他们是痛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是人民群众的快乐。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们的痛苦，就不去革命，不去推翻他们吗？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而是相反。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恰恰是我们不愿接受压迫，而要压迫外来的侵略者和国内的剥削者，恰恰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而不是相反。

资产阶级反动性这一面，使他们的代表要重复封建阶级一些愚民的说教，彭德怀同志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过是重复了过去封建阶级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不要人民起来革命。（**彭德怀批**：逻辑上是这样的。是反动的。）

彭德怀同志还津津有味地谈到过去中国封建时代一种骗人的说教。即所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王子和庶民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彭德怀同志却把他们说成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说成“法”是没有阶级的，是超阶级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彭德怀同志偏偏忘记了，在我国封建时代的真实情况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资产阶级总是把那一种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法律说成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平等的。彭德怀同志关于“法”的观点，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观点，并且带着这种所谓阶级平等的资产阶级偏见，完全曲解了历史。

总之，彭德怀同志在革命的长时期中，满脑子都堆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是封建阶级的观点。他所以对这些观点特别感兴趣，并且反复宣传这些观点，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适用于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伪君子的政治活动的需要，适应于一个民主革命时期混入无产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需要。我们对于彭德怀同志的伪君子的社会本质和政治本质。正应该从这里去观察。

（**彭德怀批**：应当这样去批判才是对的。）

由于彭德怀同志在我们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分进行活动。所以，在实际上，他向来有以下三种很突出的表现：

第一，他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对党中央的领导，在大部分场合总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第二，他又要群众，又非常害怕群众。他在华北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农民运动曾经“三起三落”。就是说，当群众起来以后，他又给群众泼冷水，把运动压下去。这样反复了三次。

第三，他对于中国革命要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些模模糊糊的认识，但是，他认为在

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将仅仅是"和平和民主"。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竟然这样武断地和狂妄地说，"我可以肯定地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经济制度仍然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由此可见，他对于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两大著作几乎毫无所知。他对于毛泽东同志这两大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二者的联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级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关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关于"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这些极其根本的、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命运的指示几乎毫无所知，或许他也读过，但是一个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如果没有彻底改造，没有真正脱胎换骨。即使读过了也不能理解，也不过是枉然的。

根据前面所说三点，我们对彭德怀同志在工作中常常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照顾党的团结和大局，常常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擅发一些违背党中央根本方针的指示，并且不经过党中央的同意，在公开场合，对国内国际问题，随便发表有害的谈话，把党中央委任他主持的工作岗位，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一切事实，也就容易了解了。他在那篇大讲特讲"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中，有一段批评别人的话这样说过："自以为是，不能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夸大一面，学习文件断章取义，对上级文件采取不尊重不严肃的态度，在对内对外关系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对自己宽恕，对他人苛求，对同志关系挑拨离间，对同志犯错误采取幸灾乐祸的心理，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窥视他人的权力企图取而代之，把自己领导的工作看做自己个人的私产。"所有这些话，都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彭德怀同志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在平常的时候，他要闹别扭，而一遇到紧要关头，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就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要那么热衷的、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前一次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之一，而在这一次，又乘机亲自挂帅，组织反党集团。

彭德怀同志所说的"左"比右更难纠正，他的本意就是右比左好，所谓右是什么呢？国际上马列主义的斗争史告诉我们，在工人阶级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总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倾向，总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在我们党历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也都说明了这点。我们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彭德怀同志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说明了这点。

（**彭德怀批**：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当时国内情况是"左"。而不是右。）

彭德怀同志这次提出的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说来说去，不外两条：第一条，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第二条，反对群众运动。这两条都是重复了他的老观念。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原来所说的，不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至于对群众运动，如果说彭德怀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惊慌失措，那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更加惊慌失措了。

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彭德怀同志的反党活动，是在灭亡中

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一种绝望的进攻。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妄图抵抗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同时对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对于自己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集团力量估计过高，而对于党中央和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对于党中央及地方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在政治路线上坚定的意见一致，对于全党绝大多数的团结一致，对于我国伟大人民的觉悟和信心，则估计过低。实际上，同党一经较量，他们便感到自己没有一点招架的可能。右有什么好呢？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在无产阶级内部搞分裂，反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反对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高度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所产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伟大新事物，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变成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当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应声虫，结果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右有什么好呢？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彭德怀同志除了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以外，还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他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是三次（1）拥护王明抗日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拥护高、饶的反党路线；（3）最近以他自己为主要代表人的反党路线。此外在十年内战时期中，他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李立三和王明路线的拥护者。总之，一共是五次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都同他作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不宽容的，对他的“左”倾机会主义也并不宽容。但是，彭德怀同志对自己却有一套宽容的哲学：当他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时候也就觉得“左”比右好，那里并没有什么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当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他又觉得右比“左”好，从而把正确路线叫做“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个人野心作怪常常“扶得东来西又倒”，“左”倾冒险主义可以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可以变为“左”倾冒险主义，而“左”的形式不过是掩盖他的右的实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分歧是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但是，还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彭德怀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同志在最近几年来，两次反党路线的错误性质最为严重。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这样指出过：“有大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响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党内必须对于象彭德怀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经过这次党中央和全党同志的批判，彭德怀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盖子全被揭开了。他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教导，接受全党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路线上来，这是彭德怀同志和其它犯错误的同志的出路。

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目前，各地正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在最近期间，全国约有四万五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对于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学习等问题，应该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予以处理。

一、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问题，按以下办法处理：

（1）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过去没有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的，一般地都应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技术专长，分配以适当的工作。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摘掉帽子以前，已有工作职务的，现在一般不必变动。如果现任职务极不适当的，可以各别地予以调整。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

（2）凡是过去已经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或者自谋生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应该帮助他们就业。

（3）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以前，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现在应该根据分配的工作职务，来评定工资级别。原来受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现在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高于现任职务的不予降低；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个别调整。

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等问题，按以下办法处理：

（1）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学籍一律不予恢复，可以帮助他们就业。有人坚持要求进高等学校学习的，可以允许他们重新报名投考。

（2）凡保留学籍、实行劳动考察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可以允许回校学习（根据其原来学习情况，插入适当年级），回校学习后，停发劳动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困难的，按助学金办法处理。

（3）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性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再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

（4）毕业生中已分配了工作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根据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考察时间的长短，有的需要再给予一年左右的见习期，并发给见习期间的工资；有的可以正式分配工作，并根据其所任职务和工作表现评定工资。

（5）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凡是没有发给毕业证书的，应予补充。

三、军队中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问题，由军委另行规定。

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总政并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很好。除部队由总政照所拟计划下达外，地方可以印发到县级以上干部阅读。

中　　央

中央书记处：

为了在军队干部中进一步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决议的精神，我们拟在党内思想斗争告一段落后，按照军队干部的思想情况和需要，把一些带根本性理论性的问题（归纳为八个），在全军排以上干部和所有学校中（包括学校中的学员，包括青年团员及非党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学习，使他们从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上获得更大的提高。现在将八个问题的纲要（修正稿）送上，请审查批示。这个纲要拟发给团级以上的学习组织和团职以上干部。纲要后面所列阅读文件，除党内文件只发给团以上党员干部阅读，其余文件准备印成一小册子发给一切有阅读能力的干部阅读。是否可以，请一并批示。

总政治部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此提纲供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决议的参考）

总政治部宣传部编

一、保卫党的总路线，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发挥了我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经济观律，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气概。实现总路线的基本方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

2、总路线的实质，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头等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高速度（国家一穷二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威胁；在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也能够高速度（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就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也就不需要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有些同志赞成好省，不赞成多快，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总路线。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反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总路线，实质上也就是反对群众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3、速度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也是许多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所不了解的问题。有些同志口头上赞成总路线，实际上却干劲不足，安居中游。这是小生产者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求上进的精神状态在党内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坚持不断革命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早日把中国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水平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是不相容的。要坚持总路线、力争高速度，就必须克服这种思想。有些同志害怕速度快了，会造成“紧张”。其实放慢建设速度，人们长期在穷困和落后的状况下、在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下生活，这样的紧张才真正可怕。相反，几万万人鼓起干劲，投入热烈的斗争，这种“紧张”不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会迅速换得长远的幸福。在高速度发展中，当然可能遇到一些曲折和困难（不是高速度发展，曲折和困难只会更多），我们应当准备去渡过波折，克服困难，而不应畏缩不前，甚至遇到一些问题就怨天尤人，发生摇摆。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有决心，有志气，奋发图强，克服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

（二）大跃进运动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1、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证明党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总路线，也就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除了在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以外，在经济战线上，至少解决了如下六个问题：（1）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基本解决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2）许多过去我国不能制造、依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都能开始制造，使我国在自力更生为主，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3）工业遍地开花，使生产力在各个地区向合理的分布大进了一步，几乎在所有省份都建立了或大或小的钢铁基地，几乎在所有的县镇和大多数公社都建立了一些工业；（4）大大加快了工业的技术力量和工人阶级队伍的生长；（5）大大促进了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6）由于采取了群众运动办工业、办农业的方针，因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就业问题。现在劳动力不是多余，而是普遍不足。这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各个战线上的全面的大跃进，这个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把党领导的这个全民运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完全是恶毒的诬蔑。

2、认为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和“挤掉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办钢铁的意义异常巨大：（1）迅速增加了钢铁产量和生产设备，提高了技术水平，为我国钢铁工业高速度发展奠定了基础；（2）普查了全国矿产资源，扩大和新建了许多钢铁基点；（3）既炼了钢

又炼了人，并在短期内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4）以钢为纲，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

3、在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国民经济两大部类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协调的、正常的。把在某些环节上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的不协调现象，夸大为"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全面紧张"，是完全错误的。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不仅可以保证不致发生长时期的、全面性的比例失调现象，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适合于国民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去年发生的某些不相适应和紧张的现象，并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我们从这些局部性的暂时性的缺点中取得了经验，就会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顺利地发展。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适合最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它不但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是将来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1、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中国几亿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最后在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大发展、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必然产物。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举。人民公社巩固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是少数人轰起来的"等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有些同志所以形成这些错误观点，是因为他们不从发展生产这个根本观点上去看问题，对于我国农民要求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贫穷和落后面貌的愿望体会不深，或者是直接反映了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不愿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情绪。

2、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一出现，就表现出了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和分配，可以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可以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建设，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的综合发展，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便于实现农民的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加快农村整个生活的进步，便于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在分配中可以有一定的供给制成份，等等。

全国的人民公社建立一年多以来，经过整顿后，正在巩固地、健全地向前发展。人民公社在工农业大跃进中，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中，在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中，在克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大办钢铁和兴办公社工业中，在生产和供应副食品、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完成农产品的交售任务中，在发展农村科学和文化中，在保证农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中，在巩固农村的治安中，都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在今后，它的优越性还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硬说"人民公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没有人民公社，去年一样跃进"、"公社破坏了生产力"、"人民生活反而不如以前"，是完全错误的。

3、现阶段的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上是与高级社相同的，但两者在许多方面有区别：高级社比较起来是小集体，人民公社是大得多的集体；高级社只经营农业，人民公社是多种经济事业的综合经营者；高级社只是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一组织；高级社只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人民公社同时又是集体生活的组织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人民公社中，虽然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基本的，但是，已经有了目前过去所没有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正是这一部分的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远

大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所有制中，在某些方面已经孕育着全民所有制的成份，随着生产的发展，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必将逐步生长。同时，人民公社虽然在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其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过去高级社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共产主义萌芽。可以肯定，人民公社不但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将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有些同志看不到人民公社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看不到它和高级社的重大区别，认为“人民公社和高级社差不多，不要这个空名称也可以”，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公社化运动的初期，由于没有经验，曾经出现过某些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缺点，党中央随即对这些问题作了彻底的解决，但这只是为了克服缺点继续前进，而并不是象我们某些同志所说的“权力下放是倒退”，是“恢复到高级社”。在初期的缺点早已克服，农村早已出现了一个澎湃的生产高潮以后，我们有些同志却仍然对这些老问题津津乐道，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

4、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与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大有前途的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但是它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粮食供给制是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社会救济和集体互助办法的革新和发展，实行这个制度既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推卸的职责，也适合于广大农民当前实际生活的需要。这个制度保证农民有饭吃，使广大贫苦农民解除了“终年愁吃”的负担，能够心情舒畅地参加劳动，因而获得了他们热忱的拥护。供给制部分只占公社收入分配给社员的部分中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五分之一左右），实际上是起了多子女补贴、养老金和对其他丧失劳动力者的补贴等社会保险的作用，并不改变公社分配制度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社会主义性质。有些同志看不到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重大意义，对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漠不关心，认为这个制度“使劳动力多的户吃了亏，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并不是说，在整个公社工作中可以放松政治挂帅，可以不提倡先进分子的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党的政治挂帅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决定意义，有些同志不强调这个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工作中斤斤计较个人物质待遇的多少，是完全错误的。

5、在公社化运动中，为了解决集体劳动和分散生活的矛盾，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愿地、积极地成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组织，这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公共食堂的成立，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赞扬。有些食堂开始时因为缺乏经验，产生了一些缺点。但经过整顿，贯彻实行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和“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等等办法以后，现在多数都已巩固起来。有些同志片面强调或夸大食堂工作中难以避免的某些缺点，不积极赞助军人家属参加食堂，认为“食堂吃饭不自由”、“应该解散”，这是完全错误的。逐步创造条件，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彻底解放妇女，这是共产主义者历来的主张，决不可有所动摇。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一）贯彻执行总路线，实现高速度，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都必须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最根本的路线。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时期需要放手发动群众，现在建设时期就不需要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十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党所领导的群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党的总路线基本出发点，就是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搞群众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总路线。

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是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它呢？还是站在运动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它呢？还是站在运动的对面反对它呢？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自己阶级的试金石。

（二）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发生一点“左”的或右的偏差是难免的，只要一经发现就被及时纠正，这就是正常的。因此，在运动中有时反“左”、有时反右，也是合乎规律的。我们的党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尽量减少和尽快纠正运动中的缺点和偏差，但要求群众运动不发生一点偏差，却是一种幻想。有些同志要求群众运动“四平八稳”、不出一点“乱子”，实际上就是不要群众运动，不再继续前进，这是与总路线的精神完全违背的。至于对群众运动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采取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指手划脚，百般挑剔，大泼冷水，更是不能容许的。看待群众运动，也如看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决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地方党和部队党是一个整体，地方干部是群众运动的骨干和直接领导者。建国以来，各次革命和建设运动的胜利，都是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他们绝大多数立场坚定，联系群众，作风朴素，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为群众所爱戴的；少数同志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或错误，也是难免的。真正犯有严重的错误，必须撤换的，只是个别现象。能不能正确地看待地方干部，也是能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工作也和部队工作一样，会有一些错误缺点，部队的干部看到地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告给有关的地方领导同志注意改进，这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可是有些同志却骄傲自满，看不起地方干部，把群众运动中某些难免的缺点(甚至有些是正常现象，并不是什么缺点)和个别的现象加以夸大，予以责难，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些同志对地方干部的种种不满，实质上是反映了部分富裕中农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政策的抵触情绪。这是尤其危险的，必须彻底醒悟。

（四）我军是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而要重视政治和学习政治。群众运动、社会斗争的实践，就是丰富的政治。我军全体人员必须积极参加各种群众运动，支援国家建设，并从火热的斗争中来吸取养料，提高觉悟，锻炼自己。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认为“群众运动与军队无关”，把军队参加群众运动看成额外负担，“得不偿失”，是十分错误的。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

（一）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

这种斗争是长期的，不仅因为阶级依然存在，旧的经济制度的改造还没有全部完成，而且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以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服。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起来进行垂死抵抗的。有些同志在整风、反右以后，由于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过时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斗争是曲折的，它的发展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最后消灭，这种斗争才会熄灭。

这种斗争是复杂的，有敌我矛盾的问题，又有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既要严肃对待，又要区别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虽然还是积极的，但在革命的方法上也经常犯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的时候，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能不起而反抗。他们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有些同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错误感觉不能理解，这是缺乏阶级观点，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去分析问题的一种表现。

（三）当前农村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小部分富裕中农，他们还抱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他们仍然怀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等类的"自由"，对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集体劳动总觉得过不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向党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象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目前在农村中正在展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这是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很明显，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粹，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

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散布在广大农民中间，他们代表着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而他们又不属于地富反坏右的范围，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还有市场。因而人数虽少，危害作用却很大。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四）划清思想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坚决做革命的左派。

我军大多数官兵在去年以来大跃进中的表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思想麻痹，认识糊涂，或者惑于私利，当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一小部分富裕中农利用我们前进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认识不到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在大风浪中，立场摇摆。还有少数同志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思想，甚至和他们滚在一起，变成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认清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认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做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做党的同路人。坚定地站稳立场，不断地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之中，坚决做革命的左派。

四、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有自己的领袖。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和自己的领袖。否认革命领袖的重大作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

1、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2、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革命就胜利；当着革命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同各式各样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也就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3、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建国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不仅正确地领导了历次政治运动，而且正确地领导了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以他为首的中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方针和政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极其迅速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提出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它的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不仅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4、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最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是我国革命战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它正确反映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规律，它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最宝贵的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是在毛泽东同志英明指挥下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5、毛泽东同志最善于发现群众运动中的新问题，和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将大跃进说成漆黑一团，认为毛泽东同志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污蔑。

6、毛泽东同志具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一切优点。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谙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无限的忠心。有毛泽东同志这样英明的领袖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三）革命是最有权威的。在革命队伍中，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没有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要想团结全国人民去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并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对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

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就是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热爱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与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致的。反对党的领袖，破坏党的领袖的威信，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有维护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威信，向一切损害他们威信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的神圣责任。

五、人民解放军是党和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

（一）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军的崇高目的。我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妄图把我军变成他们个人的反党工具，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二）我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党论”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各个方面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党的总路线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军队同样必须贯彻执行。一九五八年以来军队工作的全面大跃进，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认为总路线“是地方的事，不一定适合军队工作”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我军必须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模范。军队干部和党员，对于保卫党的路线、政策，不使它遭受任何削弱和破坏，负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责任。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提高政治嗅觉，对于一切反党言行，必须及时向党的组织反映，并进行严肃的斗争，绝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六、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党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巩固了党的团结，才能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违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在我们党内搞分裂活动，比任何其他错误的损失都要大些。

（二）维护党的团结，首先必须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这是全党团结的基础。每个同志都要从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事件中取得教训，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要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要把任何一个地区和部门的工作都看做是整个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反对闹独立性，反对一切派别思想、本位主义及一切危害统一领导、损害党的威信和团结的言论和行动。要做到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才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骄傲和代表一部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思想，是当前妨碍党的团结的主要因素。不及时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就无法从政治上思想上达到真诚的团结。

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就是在个人主义这个根子上产生的；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同志也就或多或少在政治上或工作上有右倾思想、右倾情绪。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中最核心、最本质的表现，它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居功骄傲更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就不会安分守己，他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在最后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必须认真检查和迅速纠正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那怕只是微小的萌芽状态的错误，也要引起警惕。个人的工作应该由党决定，听党安排，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决不可存有私心，另打算盘。

（四）党的团结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建立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每个党员必须向所属党的组织如实地反映自己的政治意见和思想情况，讳病忌医，不讲心里话或者采取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而有效的方针。但对于那种坚持错误与党对抗，甚至进行危害党的活动的分子，则必须给以严肃的纪律制裁。

七、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不但要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右倾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他们在参加我党后的长期斗争中没有改变他们原来的这种立场和世界观。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虽然他们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性，在党的教育下也有模糊的社会主义愿望，但是，他们没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所以当着要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他们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面貌就暴露了出来。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分歧，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世界观的分歧的基础上的。

（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彻底革命的世界观，来研究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和决定党的政策时，从来不是凭想象，而是精辟地分析客观情况；不是静止地看，而是在运动中看；不只是看过去，还要看到将来；不是按照缓慢进化的庸俗观点，而是按照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

右倾机会主义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不是根据客观分析得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愿望去判断事物。一切事物，凡是合乎他们主观意愿的就赞成，不合乎他们主观意愿的就反对。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自己的错误思想是"经验主义"的。其实，他们的这种经验主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只相信自己的经验，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将"一孔之见"，当作普遍真理。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唯我主义。

（三）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增强党性的根本问题。离开世界观的改造，就不能很好地增强党性锻炼。去年以来，不少同志在大风浪中发生错误认识甚至立场摇摆，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树立起坚强的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些同志所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思想，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还有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和观点。而大量存在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更是相当多的同志造成错误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一个干部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坚定地站稳立场，正确地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才能作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八、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从来就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条件，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重要武器。我党历来就是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的。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团结，是一切更加广泛的国际团结的核心，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核心，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才能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它们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各国共产党相互间必须是平等的，通过真正的协商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或用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来代替同志式建议和批评，必然使团结受到损害。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是相互尊重，相互鼓舞和相互援助的平等的兄弟关系。

（三）反对大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一致的。大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必须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并和一切妨害国际团结的言行进行斗争。

〔附〕阅读文件

一、保卫党的总路线，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2）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党内文件）

（3）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党内文件）

（4）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人民日报社整理，内部文件）

（5）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九期）

（6）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

（7）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

（8）李富春：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九期）

（9）胡乔木：剥开皮来看（党内文件）

（10）人民公社万岁（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11）“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12）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一九五九年十八期《红旗》杂志社论）

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见一九五九年十七期《红旗》杂志）和毛主席对该文的批语

（2）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党内文件）

（3）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内文件）

（4）刘少奇：《论党》第二部分第四节：关于党的群众路线

（5）林　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第三部分第一、二段（《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九期）

（6）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二节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

（1）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党内文件）

（2）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党内文件）

（3）毛主席对全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问题的批语（党内文件）

（4）毛主席的批语：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党内文件）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第八两节

（6）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的第一部分第十七段

四、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1）《马克思主义论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人民日报社整理，内部文件）

（2）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内文件）

（3）林　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内文件）

（4）胡乔木：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诬蔑（党内文件）

五、人民解放军是党和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

（1）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个人主义”两节

（2）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二部分最后一段

（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第二节

（4）林　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六、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毛主席：对彭德怀同志九月九日的信的批语（党内文件）

（2）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党内文件）

（3）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党内文件）

（4）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党内文件）

（5）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党内文件）

（6）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三、四部分

七、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1）毛泽东：实践论

（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第四节

（3）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党内文件）

（4）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内文件）

（5）陈伯达：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党内文件）

（6）陈伯达：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

（7）康　生：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八、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1）邓小平：《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

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各省、市、区委，各部委、党组：

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现在发给你们参考。

中　　央

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一、凡是党员干部，在言论、行动上，属于下列性质的，都应当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经过充分的揭发和批判，查明情节确实严重的，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

（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

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

（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

凡所犯错误的性质属于以上各类，但情节较轻，在揭发和批判中态度老实，认真检讨，决心悔改的，可以不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二、凡是党员干部，基本上拥护党的总路线，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拥护党中央对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处理，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不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若干怀疑、抵触，发表过若干右倾言论，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主动检讨，或者经过批评，表示决心改正的；

（2）在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初期，对彭德怀等同志的反党错误一时认识不清，怀疑中央对他们的分析和处理的正确性，甚至为他们的某些错误言行作过辩解，但不是有意支持反党集团，一经教育就坚决同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并积极参加斗争的；

（3）对地方工作的某些缺点缺乏正确分析，进行过不适当的批评，甚至片面夸大，指手划脚，滥加指责，但不是有意对党进行攻击，并在事后或这次反右倾斗争中承认错误，认真检讨的；

（4）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某些问题，有过比较严重的错误认识，但没有公开散布，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自己主动检讨交代的；

（5）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表过右倾言论或者犯过错误，已作过批判和处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只有轻微的错误言论的；

（6）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但由于政治水平低，思想方法片面，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个别问题上发过牢骚，讲过怪话，其错误属于偶犯和不自觉的性质，一经指出，就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

犯有以上错误不作认真检讨的，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端正立场。

三、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处理办法：

（1）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撤销其行政职务，党内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另行分配次要工作；个别品质恶劣，坚持错误，顽抗到底的，开除党籍，作转业处理。

（2）情节较重，但检讨较好的，或情节虽然较轻，但态度恶劣的，酌情撤销其党和行政的职务或者部分职务。如果这种人现在还在重要工作岗位和要害部门，应当予以调离，改作其他工作。

四、确定重点批判对象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准权限：

（1）凡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应当事先报经本人所在单位的上两级党委批准；

（2）凡需要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处理的，上校以上军官，由总政治部批准；大尉至中校军官，由军区、军种、兵种一级党委批准。少尉至上尉军官，由军或省军区一级党委批准。

五、对于反右倾斗争中揭发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应当另列专案，把材料查对确实，报经军区、军种、兵种一级机关审查批准后，按照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

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和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补充解释”等文件，分别作出结论（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交给省、市、区有关机关接收处理，不要同批判和处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混淆。

总政治部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刘少奇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会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薛暮桥整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去海南岛休养，他利用休养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邀薛暮桥、王学文两同志去伴同学习。参加学习的还有陶铸、林李明、林树兰和王光美同志。我们上午阅读，下午讨论，在讨论时少奇同志讲了许多他的学习心得。我们学习共一个月，开了十几次讨论会。

当年底，李富春同志在上海组织读书会，要我去传达少奇同志在海南岛读书会的发言，我把十几次会上的发言归纳成十八个问题，并印发了书面稿。次年二月，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会，除传达了这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读这书的讲话外，又印发了少奇同志的发言记录。最近找到这份记录，又按当时笔记稍作补充。

薛暮桥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全书来看，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的国家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当警惕。谁把自己的经验看成是普遍的真理，而把别人的经验看成是特殊情况，这样的看法是片面性的。如果把自己的经验看成顶峰，那就不是发展的了。政治经济学也是不断发展的，不断丰富内容的。

一、关于军事共产主义问题

我们在战争时的经济政策没有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只有对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一方面是有苏联经验，一方面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被

迫的，同时估计战争不会很长。我们从游击队开始，准备长期游击战争，这一条有关系。他们在战争中没有提出恢复经济的任务，一切服从战争。我们在战争中提出发展经济的任务。一手抓战争，一手搞生产。主要根据自己的战略方针，不是根据外国的经验。我们的战争，主要看谁能坚持最久，谁就能取得胜利，因此不能采取余粮征收制，只能实行农业税制。供给制是干不干，两斤半，有平均主义。但两斤半也有人来。农民愿意革命。知识分子想革命的，也愿意接受供给制。后来的供给标准有些差别，是群众赞成的。到北京后的一大套制度，就不对头了，系统化、制度化，所以从供给制变为工资制。这个改变基本上是对的，不可能长期如此。

苏联能不能一面打仗，一面经济建设，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党在农村中没有基础，就可能拿不到粮食，城里没有饭吃。农民在战争中是能够谅解余粮征集制的，战争胜利后就不行了。

二、关于过渡时期问题

什么叫过渡时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教科书认为所有制变化了，技术改造（工业化）完成了，过渡时期就结束了，社会主义就建成了。另一个解释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也是过渡，是第二个过渡阶段，两个阶段都叫过渡时期，哥达纲领批判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时期。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

两次过渡，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在两个过渡之间，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好象不在过渡。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说一个过渡，还是两个过渡？可以几种说法。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究竟在社会主义时期完成，还是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一起过渡？我们可以考虑前一办法，即先完成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再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苏联好象倾向后一办法，一次过渡，前一办法到了全民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要一次过渡。集体所有制的收入达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可以过渡。早了国家背包袱，迟了他们就不愿意过渡了。

在过渡时期要做几件事：夺取政权，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三大改造，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工作，是扫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扫清障碍。我们是边改边建，边扫清，边建设。在一九五七年以前，主要是扫清道路。到一九五八年提出总路线以后，才大搞社会主义建设。

把社会主义定型化，无冲突论，有形而上学味道。只有一致，没有矛盾。工农知识分子是一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致的，实际不断发生冲突。经济斗争以外，还要强调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三、关于国家的性质问题

列宁讲十月革命前一天还是资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就是工农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尚未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只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是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事物的质由什么规定？由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社会性质，决定于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如果矛盾主导方面是资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是无产阶级，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成为主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主要矛盾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因此，发生了两种变化，即主要矛盾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分析事物要分析矛盾，分析社会要分析阶级，才深、才透，才能掌握本质。苏联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变化，二月革命改变矛盾的性质，十月革命改变矛盾的主要方面。平常说辨别风向，就是要辨别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和平取得政权是否可能？这是修主义思想。要粉碎旧的政权，才能建立工人阶级政权。

承认和平过渡在策略上有必要性，资产阶级说我们用暴力，所以他们要用暴力来反共。我们强调愿意和平过渡，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我们也用暴力，不是我们不愿意和平。这是对敌人讲的。和平的可能性要提两个，可能和不可能，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可能性。将来社会主义包围资本主义，还是两个可能性，西藏就不能和平过渡，必须较量一下。现在提两个可能，在宣传上有利，这是策略，仍要做不能和平过渡的准备。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409页）的实质是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这不是专政，而是民主。对剥削阶级是专政，对劳动人民是民主，不是专政。把这当做专政的主要作用是不妥当的。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这里把专政和民主，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了。反革命愈少，专政也愈少，民主也愈大。组织教育群众到共产主义还要，这样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专政了。

四、关于工业化问题

我们在完成三大改造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还有技术改造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先完成所有制的改造，然后再进行技术改造。鼓足干劲和技术改造是密切联系的。鼓足干劲之后，技术改造就是重要的问题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一条腿走路，对农业注意不够。我们过去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农轻重。过去大家强调重工业，我们也有类似的毛病，迅速纠正可以避免长期性、全面性的比例失调。东欧各兄弟国家就发生这个问题。部分失调容易纠正，以后仍然会有，可以随时调节。长期不能纠正的是工农、重轻比例，生产地区配置不合理，一下子难于纠正。苏联正在纠正这个问题。我们五个并举，比较全面，用两条腿走路。多搞农业和轻工业不会妨碍重工业的发展，从长期看还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列宁讲资本主义农业落后于工业，引起经济危机。美国工业发展快的原因之一是农业发展快。我们不是先农后工，先轻后重，而是工农并举，重轻并举。中国这样多的人搞农业，这是基本问题。马克思讲，看花多少劳动力搞粮食、肉类的生产，能腾出多少劳动力做其他工作。农业四化可以腾出很多劳动力搞工业，农业发展了，大搞工业不愁没饭吃，不愁没有劳动力，不愁没有市场。东欧犯的错误，我们也犯过，不要笑别人。

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发展工业，实行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园林化相结合。教科书说中国的大中小并举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不对（468页），但大中小并举，同就业问题也有一点关系。要把六亿多人口展开，都有用武之地，必须大中小并举。一踊而上可能出现一个时

期混乱，需要调整，经过调整，就会自然产生规律。将来的大中小同现在的大中小就不同了，要发展。建设中小的企业速度快。要普遍化，就只能利用目前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要迅速提高就不能普遍化。从肩挑到车子化，已经是很大的提高。滚珠轴承就是更大的提高。任何国家都曾走过这个道路，因而是普遍规律。

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社会改造走在技术改造前面。实际上苏联1937年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社会改造走在前面，能够促进技术改造。列宁说可以先夺取政权，再提高无产阶级文化程度。农民走在前面，先革命，对工人阶级革命更有帮助。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们搞土地改革三年，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有了群众基础，就易于社会主义改造。前面时间长一点，后面时间就短一点。在土地改革中打败了富农，在合作化中富农阻力不大，主要的阻碍是富裕中农的动摇，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对付富裕中农的动摇，是严重问题。

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同贫民联盟，这点很重要。不能联合全部中农，只能联合下中农。第二个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包括富裕中农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在资本家，而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合作化的特点，一个是土改后立即搞合作化，一个是逐步过渡，一个是把富裕中农和下中农分开，对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给以代价。苏联十月革命是广大群众运动，合作化也搞群众运动，后来不注意了。合作化、机械化苏联同时进行（实际上也是先完成合作化，后完成机械化），我们先合作化，这对机械化有好处。

苏联农业积累转到国家手里过多，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交给国家，农庄自己没有积累，不能扩大再生产，实际上一半是全民所制有了，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大约有半数来自家庭副业，这又象是半社会主义。我们让人民公社积累，公社发展了就可以变全民所有制，这样对发展生产有利。苏联1954年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超过1913年水平，这样合作化和机械化就没有优越性了。现在有所改正。

六、关于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从资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无非：（一）夺取政权，（二）没收大工业，（三）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四）土地改革，（五）农业的合作化，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些都讲得不错，是一般的规律。此外（六）还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边改边建，我国也是如此。已经工业化的国家，革命后就不要工业化了。如果农业机械化了，是否还要合作化就不一定，英国可能不需要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配置可能也要调整一下。这本书是值得看的，也有一些好东西。

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一面扫除，改造，一面建设。扫完以后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建设。我们过去八年大部分是做扫除工作，最近两年集中精力来建设。道路扫清，建设差不多了，就叫社会主义建成。

道路扫得怎样，教科书只讲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提出还有政治战线和思想

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两类世界观的斗争，现在还没有解决。反右派斗争证明这点，匈牙利事件更证明这点。苏联没有提思想革命，所以教科书没有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也要扫清，这是思想上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提了在人们意识中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但没有采取整风运动，不如此社会主义就不巩固。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现在捷、德、保、罗等在搞思想工作，越南也在整风。

七、关于经济规律问题

人类运用客观规律的程度，可大可小，决定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它的能力，因此犯错误仍然不能避免，小错误是免不了的，大错误也有犯的可能。妨碍认识规律的东西是否完全不存在了？如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不能一下子完全认识客观规律。对必然性的认识是逐步的。要熟练地运用经济规律，这里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地搞。

客观规律是必然的，认识了必然就有自由。实现基本经济规律，大家要求满足需要，没有方法不行，于是大家亮底、算账，只好鼓足干劲，"发展生产、满足需要"，这就成为必然性。群众掌握规律，就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成为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靠人去实现。

教科书讲苏联的经验都是普遍规律，讲其它国家好象都是特殊的。中国对资本主义和平改造，教科书承认了，但说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我们利用、限制、改造，他们的办法是限制和排挤（419页）。其实列宁就要搞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来恢复国民经济。排挤与改造不同，排挤要破坏生产力。

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苏联是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一套自己的经验。中国是第二个，相隔几十年，总有一点改进和发展。将来又有新的国家，我们的经验又落后了。决不能把第一个经验当作最完整的经验。比较起来，苏联是老经验，我国是新验经，将来还有更加新的经验。历史是发展的，方法是需要变化的。当然，基本原理可以大体不变，具体方法总是要变化的。

教科书接受新鲜事物不敏感。原因是除老大哥的包袱放不下外，辩证法的水平不高也有关系。苏联多年来受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解放思想非常重要。

八、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社会主义不是独立的、固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基本上与共产主义相同，但还要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

把社会主义当做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不把它当作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看法是好的。既然是过渡阶段，就既要区别于资本主义，又要区别于共产主义，在本质上与共产主义相同，是共产主义范畴。因为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出来，还不能很快脱掉旧社会的痕迹，要充分成熟才能脱掉，不能心急。所以既要说明基本特点（共产主义），又要说明旧社会的痕迹，形式上有许多资本主义东西，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因此很复杂，容易迷惑人家，使人家看不清本质。我们是在共产主义未成熟时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写资本论不同，所以有困难。

社会主义社会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带着旧社会残余（或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旧社会残余，包括资产阶级残余，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和习惯势力（还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此外，还要利用旧社会的一些形式（痕迹），如商品、货币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还有阶级性的差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社会的斑痕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的，如货币、价值规律、政党、国家等等。但是，国家、政党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变化。为了消灭国家，我们应该强化国家，为了消灭政党而巩固政党，为了消灭货币而利用货币，为了消灭商品而运用商品。

九、关于矛盾问题

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站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社会主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斗争，到建成社会主义以后，两条道路矛盾还存在，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逐渐占主要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但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此外，三个差别没有消灭，还有商品、按劳分配等等，所以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其次是正在成长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旧社会的残余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现在还很激烈，将来逐渐减少，到共产主义时代只有前一种矛盾。生产和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基本规律如何表述，最好不要作一个固定的表述方法。提还可以提，讲清道理，不固执字句。

苏联现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进步。但他们了解的非对抗性矛盾，实际上等于没有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是比较缓和，也可以比较激烈，也有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从矛盾的性质讲是非对抗性的，从矛盾的斗争形式看，也可能是对抗的。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采取对抗的形式解决，非对抗性矛盾采取非对抗性的形式解决。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当，也可以采取非对抗的形式解决（如中国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不当，也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夫妻之间也会打架，甚至闹离婚）。对抗的形式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战争后订和约）的形式，对抗性的矛盾也不是天天采取对抗形式（如英美国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能把问题看得很简单。

十、关于所有制问题

生产关系首先一个方面是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有没有问题？有的。教科书说，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石景山钢铁厂原投资二亿四千万元，建设规模六十万吨钢，一百二十万吨铁，五年完成。下放给厂自己管理，还是二亿四千万元投资，变成一百二十万吨钢，二百四十万吨铁，时间二年半。这个生产力从那里来的？原来就有，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

工厂掌握使用。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也提高了生产力。将来集体所有制都变全民所有制，是否还要不断调整，是否还要发展。还要、还有。可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还大有文章，不断调整内部关系就能使生产力更好发展。

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走向共产主义不一定要两种所有制，可以走向共产主义以前就变为全面的全民的所有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两种所有制也是机械的。两种所有制的共同性和差别性，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讲共同性是对的，讲差别性也讲得很好。公有化程度不同，产品分配方式不同（过去低价收购，侵犯了集体所有制，不让合作社多积累，这个缺点影响了集体农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报酬形式不同，管理体制不同。不但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别，一个是高级，一个是低级。下面一段把两种所有制固定下来了，说是“神圣不可侵犯”，把两种所有制长期固定下来，不讲两者间的矛盾，不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错误的。

苏联国民财富中集体农庄只占10%，但又不能过渡，原因是集体农庄积累太少，太少了不能很快发展，很快过渡。对农民不信任，不让他们多积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求共产主义的，少数人不赞成，一辩论就解决了。不准集体农庄办工厂，怕他们赚钱多了，不肯把农产品卖给国家。其实集体农庄的财产越大，就越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教科书把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固定化，甚至把家庭副业也固定下来，说受宪法保护。家庭副业同集体经济之间有矛盾，要逐步缩小家庭副业，扩大集体经济。

十一、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以后，分配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分配适当，就能够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物质刺激是必要的，但不能只靠物质刺激。应该强调树立共产主义道德，为社会主义而做好工作。做好了工作，物质就自然跟着来了。首先是“我为人人”，后来是“人人为我”。物质利益和政治思想工作是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物质刺激不应成为教育群众和宣传的口号。

政治挂帅要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真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从而提高觉悟。问题是生产发展的速度要求快一点，而不是慢一点。积累多，发展就快；但当前消费就要少一点。这要依靠劳动人民的觉悟，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干劲不仅来自物质鼓励，而且来自政治思想教育，来自干部的模范作用，提高群众觉悟水平。

按劳分配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按资分配，但为剥削工人也用物质鼓励，用“按劳分配”的假象来欺骗工人。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还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本质上是变了，是为自己生产而不是为剥削阶级。集体所有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比较多一点，级差地租有一部分要归国家，要用国家的帮助来逐渐缩小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是对的。缩小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太急，要产品能够满足需要。首先是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留一点个人副业还有好处，但不能让它自由发展。消灭两种所有制差别后，还是按劳分配。将来或者缩小高工资与低工资的差别，或者不缩小

差别，增加集体福利，逐渐过渡到以按需分配为主。

十二、关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教科书对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友好互助一句，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互助合作，但仍要有领导与被领导，有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普通工人。但应建立平等关系，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搞得很好，还不一定。经济学要把这作为重点之一。如何使关系融洽，大家心情愉快，干劲十足。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各个环节是重要问题，苏联的所谓两个"革命措施"（工业管理体制下放和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实际上只是领导的某些环节的变更。至于厂长、车间主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厂长下车间，生产就大大提高，这就关系更大。没有改变所有制，没有改变分配制度，只是改变生产中的互相关系，真正建立平等互助关系，这也是生产关系的改变。

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有三点，最基本的是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只讲了一致，没有讲矛盾，好象只有所有制改变，一切都改变了。公有制只造成平等合作的可能性，要实现同志式的合作，还要做许多工作，还要经过斗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矛盾。教科书讲了一大段一致，好象都没有矛盾了，不需要做工作了。

在我们看来，在所有制解决以后，人们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解决矛盾，真正实现平等合作关系。我们写书要大大发挥这一部分。我们要主动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要闹事。列宁说改变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比打倒资产阶级更困难。

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经济关系的阶级，但还有阶级残余，还有保守集团。教科书说没有革命，但又有两项革命措施，自相矛盾。

十三、关于商品交换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即所谓旧形式新内容问题。这些旧形式已有不同的新内容，它是作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些旧形式不是一下子便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要看条件。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商品的特点，为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生产，价格是由计划规定的。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也不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的性质基本上改变了，所以要利用商品和价值规律，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它，是为消灭它。要把它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两种所有制和按劳分配，都是商品存在原因。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单有社会分工不能产生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产生交换，交换可以是商品，可以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因，是两种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交换，已与两种所有制的商品交换性质不同（在程度上不同），是特殊的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中事实上还有大全民、小全民。全民所有制内部只要还有按劳分配，就还有商品交换。只要有按劳分配存在，哪怕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我以为只要不消灭按劳分配，

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商品的定义有几种说法：存在私有制、存在两种所有制、为交换的就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的就是商品。为交换而生产到共产主义还有，那时不是商品交换。许多争论只抓到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如有人说目前的消费品已经不是商品，有人说到共产主义还有商品。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性质已经变化，但有些机能仍起作用。将来还要计算劳动消耗，但生产关系比现在简单，因此不一定要采取现在的迂回曲折办法。将来共产主义大家庭，大家仍有分工，互相交换劳动，但没有等价交换，不同劳动同样满足需要。旧社会的痕迹不会很快消失，但最后还是要消灭的。各人根据片面的理由争论也有好处，可把各人的理由说出来。但必须综合起来，有的理由不是充分的。我们要预见到将来商品怎样消灭。但消灭还是将来很久的事。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十四、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形式问题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不同，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苏联好象主张一次过渡，我们可以两次过渡，先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再过若干年，然后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还要几个条件。新生的东西，都要在前一段中作好准备，社会主义时期要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准备好一切必要条件，即产品的极大丰富，道德水平（不偷懒），消灭三个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按需分配。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也是逐步过渡的，将来也不是什么都按需分配，先从重要生活资料开始，吃饭、穿衣、住宅等，其他还可以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国家的对内作用消失，经济职能还是存在，还有上层建筑，还有先进和落后，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和党是没有了，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那时管理众人的事也是必要的，非阶级斗争的“政治”和“党”可能还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准备这些条件，特别注意不要造成障碍。如工资差距过大，就有人不赞成过渡到按需分配。

教科书讲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和干部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包括政治思想关系。但未讲清走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质变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但要扩大，而且要提高，不但要量变，而且要质变。所有制要从集体提高到全民，同志关系也要不断改进（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分配制度也要变化。

消灭城乡差别，要乡村工业化，城市园林化，教科书不提乡村工业化，也不提城市的改造，好象工业在城市，农业在乡村的情况要续继存在下去。

如何消灭脑力、体力劳动差别，单靠提高文化水平不够，还要采取其它许多措施，如两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将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逐渐接近，但体力劳动永远不会消灭，如果大学毕业就不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

国家要消亡社会却不能消亡，要组织生产和分配，国家组织变成社会组织。还可能有先进人民的组织。

过渡到共产主义，总的来讲，到底经过什么道路 采取什么形式，教科书还是没有解决。

找到适当的形式很重要。教科书说按人口平均产量超过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国家，然后才能发展到共产主义，又把全面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电气化当做共产主义基础，这样就会搞得很久。只要基本生活资料能包下来，就可以基本上按需分配。标准太高，就把共产主义推迟到遥遥无期。

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几个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以分几个小阶段。每一个社会制度的变化，总是有激烈争论的，它的变化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就不会自觉地赞成。

广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现在一般讲共产主义是指高级阶段，是狭义的。从广义讲，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有共产主义因素，讲因素是指高级阶段的因素，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广义的。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除低级阶段外，还可能有中级阶段，如基本上是按需分配了，但还有一点按劳分配的尾巴；城乡、脑体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消失了，但还有一些非本质性的差别。以国家为范围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实现了，但以世界为范围的全民所有制还没有实现。

人类有历史大约已有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其中四十九万几千年或九十九万几千年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几千年是阶级社会；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又是几十万年、可能几百万年，不可能再恢复私有制度。其中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只有几十年，中级阶段可能长一点。

十五、速度、比例关系问题

高速度与按比例是矛盾的，但也是统一的，是矛盾的统一。有人要百废俱兴，什么都需要，结果什么都满足不了。平均分配结果搞不快，搞不好。因此，势必要有轻重缓急，主要次要。抓对了，抓住主要环节，就可以很快地前进了。

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这种计划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资本主义经济也要按比例发展的，但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资产阶级也懂得要比例关系，但不能有计划地调节比例关系。社会主义不但了解要比例关系，而且由于公有制而可以有计划地调节比例关系。

资本家也想搞计划经济，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我们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比例也有摆不准的时候，但我们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计划的，比例不恰当，很快就会得到调整。按比例发展是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的，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计划自觉调节，在比例破坏前就预先调整。计划本身就是主观的，有计划要经过主观努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了用计划来调节比例关系的客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按比例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计划来调节。计划本身是经过人们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

比例同速度有没有矛盾？有矛盾，有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比例要抓主要环节，平均分

配力量是一种搞法，抓主要环节，分别轻重缓急又是一种搞法。前者慢，后者快。速度同比例的矛盾包括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长远利益同目前利益的矛盾。有主要环节，又有两条腿走路，这样就既高速度，又按比例。

速度与比例有矛盾，要提高速度就要多积累，就要同消费发生矛盾，这样就发生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通过主观努力，矛盾可以得到解决。

过去几年，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并不错。但工业搞得多了一些，重工业比重也多了一些，失去了合理的比例（不多又为什么下马？），因此现在就要提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搞重工业的方针。比例恰当或者失调，是工业和农业的比重问题，轻重工业的比重问题，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重问题。看来发展农业是很重要的。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落后于工业，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

速度递增还是递减？搞得好可以增，搞得不好就要减，总的来讲递增的可能性是有的。积累愈来愈多，技术进步愈来愈快，再加不断革命，社会关系不断调整，就能递增。还有劳动组织，动员一切积极因素。问题是在做法。农业高速度增产，轻工业、重工业就可以多搞，这就可以高速度，又有比例。速度是可以递增的，但必须搞得好，否则也会递减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总的来讲是规律，一定时期可以农业、轻工业高一点。要技术改进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点不能动摇，但要照顾其它方面。从中国看来，大力发展农业，是既保证高速度，又保证按比例的最好办法。即使不机械化，农业还有很大潜力，劳动力还没有充分利用，或者利用而不节约。使用改良农具，还有很大潜力。节约不仅是少吃少穿，更重要的是生产中的节约。将来机械化，就有更大的跃进。

苏联速度递减，客观原因是战争和军备，主观原因是农业落后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继续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生产力发展。现在教育人民关心个人利益，事实上个人需要又不可能充分满足，这样人民的积极性就愈来愈低。政策可以是按劳付酬，教育群众应当是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

能否在十年、二十年内保持大跃进的高速度？速度不可能年年递增，也不会年年递减，是波浪式前进。能不能高速度，在于能否创造先进经验。社主义还只搞了不久，经验不多，还有许多文章好做。积累的比例可以提高，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组织不断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我们国内的条件（土地、人口、资源），速度可以不会下降，第二五年高于第一五年，第三五年不会降低，可能更高。

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客观规律，重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重、轻、农的速度就比较接近。现在我国积累增加，技术革命，重工业必然增长较快。

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一）机器设备增加、改进，技术进步，（二）各种物资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三）改进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四）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文化水平和熟练程度。在四条上面还要加上一条，即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觉悟高了，干劲大，可以更合理利用和节约物资，技术熟练程度提高得更快。

鼓足干劲，人的干劲是有个限度的。一个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最多十小时，再多了，就不行，单纯增加劳动强度，这是有限度的。但提高技术是无限度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是无限度的。鼓足干劲之后，技术革新就是重要的问题了。

十六、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问题

学完教科书以后，对计划工作、经济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央做了几年计划，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已学到一点经验。不但中央要学，而且地方要学，地方也要学计划和核算。地方、企业都要做经济活动的分析。地方、企业要有创造性，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计算。统计局应当用各种指标进行比较，各地方、企业互相比较。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纯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地方和企业也要计算纯产值。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计划平衡、经济核算，两面都有。账，两面都要算，所谓经济工作越作越细，就是要加强计算工作，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账，那是错误的。大账、小账都要算。总之，读这本书，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帮助。

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同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联系起来。我们过去讲节约多是讲节衣缩食，这是消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应是节约劳动力，节约原材料。这样的节约意义更大，今后应更多从这方面来宣传。

十七、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

教科书（531页）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基本上是对的，但回避讲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和斗争，好象生产关系会自发地改进。必须说生产关系有时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必须自觉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解决这个矛盾。教科书只提相互作用，不提矛盾和斗争。生产关系的改进是经过斗争的，不是自发地、自流地改变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保守势力，改进生产关系还要经过斗争。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一定”两字有问题（教科书第三版已取消），可以不适合，不适合就矛盾，就要改革，就要适合。要经过不适合，经过斗争，才达到适合。过一时期又不适合，又要斗争，教科书没有说明这点。上层建筑也是如此，有旧社会的残余，资产阶级思想，习惯势力，要经过不适合，妨碍基础发展，这时就有人起来反对，起来斗争，改变落后部分，每次改革都要经过斗争。

斯大林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性质”两字究竟什么意义？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手工业生产还是机器生产），生产力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程度，还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讲过生产力的性质，而讲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没有弄清楚以前，最好勿用性质两字。

生活方式这个名字是否可用？美国人常宣传“美国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宣传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宣传的是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我们提倡的是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到将来家庭还会存在，但它不但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不再成为一个消费单位。所以生活资料是否都要成为“个人财产”，也值得研究。（马克思曾说过“生活方式”，但他所说“生活方式”好象就是生产方式。恩格斯讲过共产主义时代的集体生活，但未用生活方式这个名字。）

十八、国家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有作为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国家。不讲前者是不对的。前者随着阶级消灭而缩小，后者逐渐扩大，国家的性质就起变化。

教科书讲民主集中制不彻底，只限于国家管理（中央与地方），企业中还是一长制，不发扬群众的主动性。

在国家消亡过程中，政治职能越来越少，经济组织职能越来越多。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就不存在镇压剥削阶级的问题。所有制改变后，农民变为工人，两个阶级合为一个阶级。这时先进与落后还会有，先进群众的组织可能还要。经济职能越搞越多，逐渐交给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变为社会机构，变为人民公社代表大会。对外职能，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不能消亡。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大民主，扩大到全民，我们理解的国家就没有了。

国家怎样消亡？

（一）随着剥削阶级残余的消灭，作为阶级斗争重要手段（包括对剥削阶级的强制改造）的专政的职能，也将要消灭。

（二）农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农民变为工人，工农两个阶级就要消亡，作为领导工农联盟的国家的职能也就随之消失。

（三）随着工农文化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失，多数人民都有能力担负经济管理工作，国家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也随之消亡，这部分职能由社会来行使。这时国家消亡，社会依然存在，继续发展。

（四）国家对外的职能要保存到世界革命胜利为止，要全世界的国家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国家才能逐步消亡。

政治经济学是党的纲领的理论基础，是党纲的理论性的解释。学习政治经济学有重大意义。

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

康　　生

今天同同志们交谈一下在研究工作和在学习工作上，用一种什么思想作为指导方向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同一种材料，思想上可能有两种看法，甚至还可以得出两种结论，同样的一种客观事物的存在，你可以有这么一个看法，我可以有那么一种看法，同样一个人民大会堂，或者是一个历史博物馆，咱们看的时候心里很高兴，但龙云

说咱们是在筑长城，秦始皇筑长城垮了台，大概中国共产党快要垮台了。大礼堂它是客观存在，完全是一样的，也不会因为你的观点看来多一根柱子，他的观点看少一根柱子，但是对它可以有两种看法。就是在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对大礼堂的看法与我们的看法也不一样，就是那么一个客观存在的一所房子，也可能有另外一个看法。所以研究工作常常是这样，同样的一个材料可以得到两种看法，两种结论的。读书也是如此，譬如，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现在各地方也读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但是我介绍同志们一个经验，也是一样。从今年春天到现在都在读政治经济学，一本政治经济学，算一个客观存在吧，但读的时候可以有两个观点、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一种观点就是毛主席教我们读书的那个观点，读了这个书，更加认识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总路线的重要，同时也提高自己关于经济理论的认识，那末另外一种立场，则认为你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就证明你的中国共产党、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不行了。从这两种观点出发，读书必然产生两种方法、两种结果。一种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好的地方，我们就学习，不好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够学习，甚至于在我们自己思想中间对那种思想进行批判，用这种分析的方法读书，应该是正确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或者象张闻天同志所讲的"拿来主义"的方法，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拿来就是了，政治经济学上边有很多毛病的地方，譬如谈和平过渡，那就是一个同莫斯科宣言的观点不相符合的嘛，那末如果统统用"拿来主义"，教条主义那就必然会得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从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必然可以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正确的，在研究了这本书以后，更能了解主席的思想，更能去执行党的总路线，更能去推进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另外一种结果就是用这个否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必然会用书中的某些问题作为反党的工具。所以无论作研究工作也好（军事研究工作也包括在内），我们学习也好，军事也好，哲学也好，政治经济学也好，都需要一种明确的立场、明确的思想方向来作指导，没有这样一种立场．思想方向作指导的时候，研究工作做不好，教学工作也教不好，学习工作也学不好。

同志们在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讨论过学习过关于党的八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时在各机关也开展过整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从总政治部听到：军事机关的学习整风搞的很好，最近总政治部搞了系统地进行理论学习分八条，这八条很好嘛！是经过中央看了的。大概看起来就是军事机关的这个整风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开始进入到用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提高我们的觉悟，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那许多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样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毛主席八月十日所写的那个一篇短文，就是一个批语，就是建议学习这个两本书的批语，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批语上特别讲了，我们现在要作战，要在三个方向战胜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这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就是在理论方面。现在进一步的学习主席所指定的书籍，以及学习总政治部的八条以及八条中间所指定的文件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同志们谈谈，当前学习研究这一方面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坚定的方向，这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也就是我们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学习工作的指导方向。离开这个方向就必然会犯错误，坚持这个方向就必然得到成绩的。历史上证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革命证明了这个问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证明了这个问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将近十亿人口的地区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

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这一个阵营不断的巩固、发展和壮大。这样使得国际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主席所讲的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着压倒的优势。这是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中间所反复阐述的观点。同志们试想一想，在这样一种国际的形势下面，在这样一种新的转折点，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面，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十亿人口的地区中得到的胜利的情况下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必然随着历史的、社会的、革命的发展，这个理论也就会得到新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在东风压倒西风，这样一种新形势下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必然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各国兄弟党，在这个问题上，在那个问题上都是有所贡献的 但是我认为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想同同志们商量一下，我自己现在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能力来概括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共同研究研究，尤其是你们科学机关，更应研究研究。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再说一下，我这个概括的语言并没有概括好，这并没有经过中央讨论的，这个观点有错误，我个人负责就是了。当然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思想是世界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或者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们，话到底怎么说法，请同志们共同研究研究。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用一种概括的语言能够把它概括起来，我现在用一种不科学的语言，就是我说的"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不可以这么说，用更好的概括的语言那会更好一些。科学研究机关负有此任务。出个题目，同志们讨论讨论，看看怎么说法好。但是我看虽然我的语言不科学，没有概括好，但是，我觉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样一个前提去衡量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轻视这一点就不能够全盘地认识主席的著作，主席的思想，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重大意义。

这样说是不是有根据呢？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我看是有充分根据的。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看就是说从两个革命阶段三条总路线来看，也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党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面就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民主革命阶段如此，就是说民主阶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就得到了发展。再看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央在五三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制定了一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在执行毛主席这条总路线中，党一方面反对了否认社会主义过渡必要性的思想，反对了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维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的种种的右倾思想；又反对了一部分同志思想中，企图在一个早上把资本主义消灭的干干净净的那种左倾的倾向。这样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的领导下，就迅速完成了三大改造，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接着，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五三年这一条总路线执行中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又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党在这个基础上，在五八年春天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毛主席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面，很快的在全国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在文化教育、科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各方面的战线上，出现了大的跃进的局面，全面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纠正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左的倾向，特别是在彻底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的形势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跃进的高潮，这里现在同志们所看到的，用不着多说。总之，毛泽东思想引导了中国人民，从一个革命发展到另一个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的发展，在实践的斗争中，就不断地取得了胜利。正如少奇同志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而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面，在不断革命取得不断胜利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发展，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代表，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中国革命证明毛主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个问题是很多方面的，我只是从两个革命阶段、三条总路线这方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来看，同样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主席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并且把修正主义作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经常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既反对大国主义，又反对民族的沙文主义。毛主席坚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说，既不放弃争取和平过渡的可能；又坚持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战争的过渡手段。在国际关系上，毛主席坚持了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既要争取和平，以便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但又不要忘掉了阶级斗争，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又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对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的看法，毛主席是既把他们与帝国主义集团加以区别，以便团结他们来反对垄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对那些国家应该看到他的两面性，他有反帝国主义的进步的一方面，还有资产阶级反人民、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的一方面。我们团结发展他们的进步性，反对和批评他的反动性。毛主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方面：他主张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便消灭阶级剥削的这种经济基础，但同时又主张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没有这个革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得不到巩固的。毛泽东同志对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他主张既坚持国际主义的团结，发展这一团结，巩固这一团结，把这一种团结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人民的最大的利益；但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也不可免地存在着某一些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这一种属于一个指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还记得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在讲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就曾经把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指出过。从上面所说到的毛主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清楚地看到都充分表现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上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实践中更加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路线，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离开了这个方向，离开了这样一个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必须会犯错误。

所以无论从中国革命的实践，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或者将要取得更

大的胜利。因此，我这样一个想法，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是说世界上分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样一个思想去看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认为不是没有理由的。我这个语言虽然不是那么准确，但我觉得用这么一种思想去看问题，对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方向，对坚定我们的信心，扩大我们的眼界是有好处的。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论述了领袖的重要作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重要作用。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以及庐山会议以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反复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个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个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把斯大林完全否定了。这样实际上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错误；不可避免地对于各国共产党发生不利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掀起的反共高潮；有利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斯大林主义来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影响，为帝国主义服务；也有利于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的暴动；也必然会发生在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某些共产党员思想上发生混乱。当然，这些缺点后来为苏共中央逐渐纠正。同时，事实证明斯大林并不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讲的全盘否定，而是像毛主席所讲的斯大林的错误和他的功绩是三七开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样一个口号，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的。我们在那个时候，也不只是那个时候，在民主革命阶段中间，我们感觉到斯大林在晚期的思想、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是我们看到斯大林在保卫列宁主义，在实行列宁主义上是有巨大的功绩的，所以我们对他的估价还是三七开。这种观点表现在我们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里面。但是我们应当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以后，在我们国家内，某些党员中，是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呢？在我看完全没有一点影响不是事实。有许多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过："为什么中国人不反对个人崇拜？"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某些没有改造的共产党员，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的共产党员，对于这一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表现动摇的。彭德怀同志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修改党章的时候，就表现过他的思想。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义务的第一条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和毛泽东思想，那个时候，他是反对的。八次大会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时彭德怀同志反要提出来了，他的意思是要证明他过去是对的，"过去你们不是以为不对吗？怎么你们现在又不提了呢？还是提提好吧。"他大概以为一九五六年正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党章不提这一句话，大概是多少有些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吧！当然这是我的推测，不是彭德怀声明的，但是我看应该有这样一种看法。因此，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论述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领袖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从少奇同志的讲话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领袖的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能够集中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能够创造性地实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口号是不确切的。他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不是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论述更加看到领袖的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能够实行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列宁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团体、一个部队、一个音乐队必须有一个指挥，一个领袖。一个班也需要一个班长，这是对的。但领袖的重要，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需要一个指挥，需要一个领袖，比如说陈独秀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时候的领导人吧，再比如说南斯拉夫的铁托现在也还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一个领袖吧，但是他们是被人们所藐视的。他们所以被藐视是因为他们领导党和人民走向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的道路。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们的毛主席，所以受人们的尊敬爱戴，是因为他们实行、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从马克思死了以后，恩格斯死了以后，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歪曲、修正以至叛变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因而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死了以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叛徒们，攻击、歪曲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虽然是在晚年犯了许多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并且也部分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斯大林死了以后，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力图修正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着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无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都表现了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全党的同志，尤其是我们高级干部、科学研究机关，和象高级党校性质的机关应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哲学方面，主席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著作中，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有关哲学的讲演报告中，把哲学运用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胜利，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同样我们看到无论在军事方面，政治方面，阶级斗争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在思想改造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一句话，在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实践中都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它不仅能够精确地说明世界，而且能够胜利地改造世界。特别我们要看到，是他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方面，更加突出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这是哲学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我们看到有关十大关系的演讲，当然十大关系又是政治经济学，又是哲学。我们先把它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考察他。从十大关系的发展，从总路线几个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丰富了新的内容，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是经济学方面。

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方面，我们看到毛主席对于阶级的分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分析，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分析，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于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论的阐明，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明，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理论的阐述，对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结合的理论，对于教育方面，教育生产与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等等，都看到了毛泽东同

志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之，就是说，在哲学方面、政治经济学方面、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方面，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思想都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我再三说，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这个重大的问题，由于我自己缺乏研究，现在还不能明确系统地来说明这个问题。无论用历史的方法来概括，或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概括，我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只能是零零星星，挂一漏万，难免没有错误。主要是说明这个意思。这是很大的科学理论工作，要求一下子系统说明很不容易。要求我们共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更好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今天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希望同志们把这个当作是重大的任务，把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任务。

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第一次整风以来，在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逐步的承认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指导一切工作的指针载入了我们的党章，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以未写，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全党承认毛主席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导的方向，这对我们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关系。

但是在少数党的干部中，包括军队党的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存在有各种不同看法呢？应该说过去有，现在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机会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抵抗。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才得到发展。分析一下在这个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现象：

1． 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少数人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是公开反对过的、如在党的第五次大会的时候，陈独秀就反对过主席的思想。特别是在土地革命这一方面。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曾经有人污蔑毛泽东同志是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王明公开拒绝过在新华月报上刊登主席的“论持久战”。并且以后也狂妄地要求主席修改新民主主义论，这都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又看到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都为历史的现实的斗争所粉碎。但说明党内过去和今年庐山会议是出现过这一类现象。

2． 公开并不反对，而是在各种借口下面，采取隐蔽的形式来反对；或者主观上也不反对，但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这些人有各种借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强调毛泽东思想理论重要性的时候，有人就认为他们不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谁说以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为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种人说我们叫“不尊重马克思”，自封为马克思的卫道者。散布这么一种观点，说什么现在，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有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歪风，这完全是虚构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提倡以实践论、矛盾论为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不赞成。

还有一种借口，是不能超过马克思。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讲过：我们学习马克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发展的观点，学习马克思，要超过马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成为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借口，说我们太骄傲了，提出要

超过马克思。实际上是他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停止，看成是形而上学的，永远不发展的。他们虽然也不反对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但是如果把实践论、矛盾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或者是费尔巴哈论提纲，反杜林论，用天平来一称，你实践论、矛盾论就差得很多。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不看成是科学的东西。当然在公开的报纸上讲，超过马克思，为了避免误解，不如用发展马克思好些。但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发展规律。

还有没有借口？在军事理论方面，曾经听说过：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论"。你那个时代是小米加步枪打游击战争，小块根据地的时代，现在是原子时代，你没有指导过飞机、坦克、海军，你那一套吃不开了。在庐山会议上讲，毛主席指导民主革命阶段是对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你毛泽东同志也没经验，这也是"过时论"。

还有一种，并不是说毛主席著作、言论"过时"，但只当作时事政策之类，一看就懂，没有理论价值。不系统、不全面、不完整、不科学。课外学习学习是可以的，系统地学习理论，那你请出去好了。在一九五七年整风时，在高级党校、中央团校是遇到过坚决的抵抗的。高级党校许多教研室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是课外学习，不作为正课。什么是正式功课呢？是教研室编的教学大纲，这是正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曾几次要们他停止教学大纲，立刻转到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一个时候，有些教员不愿意执行，张如心同志就是一个，还不止他一个。这件事情高级党校欠了我的账，他们总结时就不讲这个问题，我总不舒服。不错，他们批判过张如心、陈仲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团校也是这个情况，当时我采取了一点粗暴的态度，我下命令停止他们的教学大纲，只能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种现象不是没有的。当来运动时都承认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向，可是当运动刚过去一下提出要读点书，读些经典著作时，老毛病又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又丢了，规律总是这样，几次反复都是这样。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当然，经过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觉悟，看不到这种进步和觉悟是不对的，应该充分估计我们的理论队伍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过去不大清楚的，现在逐渐清楚了；过去不大对的，现在基本对头了。否认他们的进步，我们也会犯错误。

但清醒的看一看上述这些借口，某些地方或者个别人现在还有，将来也还会有。因为这个斗争不是一次运动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把持种种借口的这些人分析一下，他有各种性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论的。有的用借口作掩护，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巧妙一点，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装着不反对的样子。这次整风反右看得很清楚。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了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着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有些同志主观上并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也承认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以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更不认识发展到新的阶段，因而，低估毛主席理论的重要意义。第三种人承认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但到底怎么样的理论算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他们思想上是糊涂的。现在铁托说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干部可以看得清楚。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某一种教科书上说："和平过渡"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和平共处，并不符合列宁所讲的和平共处的观点，也是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如说，反对“个人崇拜”，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看到底是发展了还是没有发展，就弄不清楚。这种同志有种种思想原因，其中有一种是妄自菲薄，贾桂思想。这种人看不见毛主席思想才是真正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三个组成部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因此，在理论、学习、研究工作中要坚持贯彻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指导方向，不仅要和公开的、隐蔽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作斗争，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要和教条主义、形而上学、贾桂思想作斗争。向他们作说服教育。把毛主席思想在理论、学习、研究工作中坚持贯彻，在一切工中坚持贯彻，取得胜利。离开毛主席思想方向，就要犯“左”右倾，甚至反党反人民的错误。研究、教学、学习、工作，以至读一本政治经济学、哲学教课书、哲学小辞典，都必须把毛主席思想作为指导方向，离开这个方向，工作做不好，而且必然要犯错误，过去证明，今天证明，今后还要证明这个真理。

军事科学院研究军事史，政治学院研究党史，各个学院教党史。军事博物馆我没有去看。革命历史博物馆看了，缺点就是没有突出毛主席思想作为党的历史指导方向，一件事如此，何况是国家大事，研究马列主义的大事。

坚持毛主席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方向，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关键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如不把这个问题明确起来，我们就不能达到主席要求我们的，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思想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有力地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也就不能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经典著作、教科书等等；因而也就不能做好科学研究、教学和学习工作。

如何坚持贯彻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指导方向，研究学习毛主席著作，需要明确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识毛主席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党的理论学习必须和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整风反右运动结合起来。在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方面，党中央、各省市、各系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在庐山会议以后，利用庆祝建国十周年，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许多同志写了文章，如少奇同志、周总理、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等都写了文章，这对宣传和研究毛主席思想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研究机关、学习机关必须继续努力，进行研究、学习、工作。所以重要，因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是最后消灭资本主义阵地和个体生产的经济关系。我们党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改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斗争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比较少。有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和家庭政治、经济、思想关系割断了。因此，老干部革命是愉快的，革命是革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工商业家的命。和自己本身经济、思想关系比较少。但革命深入到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情况不同了，许多干部，包括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没有或很少，但和小生产者经济、富裕中农关系比较多，某些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人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和革命深入有关系。所以，过去的功臣，今天成为祸首。这和革命深入、阶级斗争深入有关。有些老干部、老战友，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现在暴露出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路人。这和当前革命深入有很大关系。这次整风，和右倾机会主义反

党的斗争，根本性质和一九五七年是一样的，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可是表现形式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表现在干部中，更主要是老干部，因而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联系到有许多理论问题，反对党的人也必然套上马列主义外衣。因此，当前理论工作很重要，要宣传和保卫总路线，宣传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思想，揭破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理论工作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许多机关，有的单位成立了思想小组，从理论上教育和反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理论工作联系到当前实际斗争中来，使绝大多数干部更能拥护总路线、拥护毛主席思想这样才能提高理论水平，提高觉悟程度，更坚定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因此对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就有特别的重要性。对一部分暂时动摇的干部，进行理论工作，使他们逐渐觉悟起来 坚定起来，和党一起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理论上揭破他们马列主义的伪装，使同志们看到他们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

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系统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很高的程度，干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于这些反党怨言，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全党全军的反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做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进一步从世界观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去揭发对种种借口反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议论进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装成是唯物主义者来反对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他们反党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对此要进行理论的揭发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承认，而且首先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问题仅仅承这一点，仅仅认为这一点就解决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沾沾自喜了，不去研究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物质第一性，由此自满，而且从这出发否定、轻视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代表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物质第一性，又承认思想意识，科学理论的重大作用、既承认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又承认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的重大作用，既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又承认政治挂帅的巨大作用。既承认在经济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存在，又承认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因而，毛主席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不是随着经济上消灭剥削制，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后，象斯大林所说的阶级就消灭了，主席的回答不是这样的。因为阶级消灭了、还必须注意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这个范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不因经济问题消灭了就全部消灭了。这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阶级斗争消灭了，它是曲折的(高一阵，低一阵)，复杂的(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直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完全消灭，那时阶级才真正消灭了。同样，主席根据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领导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既是高速度的，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其中重要关键之一，是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这些问题证明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党和毛主席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

的世界观，违反了科学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洛甫发言的第六条，反对主观能动性，我们要从理论上很好地回答，必须从系统的理论上反驳。开文教会议时，北京市的一个同志反映了一个材料，说张闻天曾叫一个右派分子到国际关系学院去教马列主义课。他的理由是：学生只听你讲的，并不看你怎么做的。因此，右派分子可以教政治课，似乎一个人可以讲马列主义，行动实践不要马列主义，对待马列主义可以言行不符，言行相反的。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谬论。但抱这种思想的不是一个，在某些教学、理论队伍中的甚至党政工作干部中确存在过言行相反的人。有人说只要维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坚决不让步，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在阶级关系上，在实际行动上，可以和帝国主义迁就、让步、迎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完全割裂，和实践完全割裂。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支配政治行动、实际行动，那么敌人也乐于我们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实际行动，政治上可以让步、迁就、迎合，敌人就只要这一条，意识形态与政治无关，这种意识形态，你要保持，帝国主义就让你保持嘛！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这种谬论要弄清楚，必须反驳这种谬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不是系统地讲这些问题，只是举两个例子说明理论工作必须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作斗争相结合，和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作相结合。最近文教书记会议时，根据中央、小平同志的指示，要在这些问题上出一系列题目写文章，进行理论上的反驳。现在正在议题目，进行写文章的组织，希望军事部门同志能够参加。和实践斗争结合发展理论，建立工作，锻炼理论队伍，这是我们如何在实践中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指导方向，必须把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相结合，如果离开这个方向，也就离开毛主席思想方向了。

其次必须认识到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在斗争中发展。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和巩固，必须引起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每次经过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反而是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更为强大，帝国主义陷于困难和破产的经济，所以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更富侵略性的政策，推行它侵略和扩展的野心。建议同志们看一下美国死去的杜勒斯的三个文件。一个是去年十二月四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的一个演说，这个演说表达了他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要用渗透、颠复种种办法进行"和平取胜"的政策；第二个是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中说，美国必须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使他们不去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用毒化、阴谋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复辟；第三个是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律师协会受奖宴会上的演说，他说对付共产党、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转变，所谓转变要适合他帝国主义的目的。这些材料内部参考都有的。目前艾森豪威尔表示虚伪的和平姿态，为了拿着和平的王牌，争取时间，麻痹人民，以便自己的导弹技术赶上苏联。为了达到他侵略的目的，美帝国主义放出了糖衣炮弹，麻痹无产阶级，麻痹群众，腐蚀我们，为此，美帝国主义集中挑拨中苏关系，把中国说成是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最好战的分子。利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企图达到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主席讲反华浪潮的统一战线，从帝国主义到印度，我们要顶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说明我们是革命的、反帝的、支持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我们毫不妥协，永不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力量面前屈服。这是给我们一个检验。帝国主义挑拨社会主义阵营

的团结，特别是中苏两大国的团结，企图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正是适合帝国主义阴谋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他们跟着美国一样叫喊，用各种办法挑拨中苏关系，孤立中国，宣传中国是好战分子。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着危险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想作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团结了，莫斯科会议的召开，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的发表，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的标志。但是这种斗争也是曲折的、复杂的、反复的，不是一次斗争就可以把修正主义思潮肃清了。修正主义思潮也有程度不同，有的是公开的，完整的，是新伯恩施坦主义，如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新的伯恩施坦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已经完全有些离开了共产主义原则，投靠到帝国主义阴谋糖衣炮弹的手里去了。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党人犯错误的。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修正主义的倾向，某些问题政策上犯错误的。在某些问题上据我看类似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真诚的机会主义。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一年纲领草案时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是"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同一篇文章，他在批判德国的真诚机会主义者说，"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这是恩格斯在六十八年前讲的话，今天在反修正主义中还有现实意义。关于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意义，主席在莫斯科会议的讲话，小平同志在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很详细。伯达同志报告时也讲过这个问题。关于这方面我不多重复，只谈谈如何反对修正主义。

首先要持这么个信心，帝国主义总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忽然变成和平民主人士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不管多大能力，忽然到南斯拉夫去跑了一趟，和铁托谈了几句话，铁托就忽然变成了社会主义；到印度去跑了一趟，和尼赫鲁谈了几句话，尼赫鲁也就忽然变成要社会主义，到美国跑了一趟，和艾森豪威尔谈了几句话，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也就忽然变成了和平民主人士，如果相信了这个，那只有唯神论了。世界观是唯神论，才能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奇迹，在社会科学中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抗战初期，王明同志从苏联回来了，他一定要见蒋委员长，我们延安留他留不住，他认为日本很快就会打出去，打日本主要靠国民党，不顾我们的挽留，最后还是出去了，和民主人士、国民党人员什么张冲、陈立夫谈谈满舒服，过去说共产党是土匪，现在很看得起呀！幻想很大。问中央在那里？是在武汉，还是在延安？好象和蒋委员长一谈，日本人马上就会走了。可是只愉快了一两个月。蒋介石也太小气，到四月间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要封闭新华日报。蒋介石没有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那么大的资本，如果蒋介石高明一点，给王明一个小官做一做，一九三八年王明还回来不回来开六中全会还是个问题呢！这是蒋介石犯了错误。主席常说我们党的干部还有一教员，就是蒋介石，的确，这个教员是很有作用的。

美帝国主义的花头多，比蒋介石高明一些，资本比蒋介石大一些，但狐狸尾巴总会暴露，而且已经暴露出来，事实会教训人的。说是美国也爱好和平了，可是艾赫会谈以后，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个声明，说是阿尔巴尼亚在苏联统治之下，真理报回答了一下，并不很有力，可是这个报又犯了错误。真理报讲："和平共处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什么妥协"，这本来是对的，可是最后修正为："和平共处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调和为前提。”昨天人民日报讲了，前天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过了一次“缓兵之计”，讲美国人扩大导弹基地。昨天比较系统的讲了美国要加强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是从三十个师要扩大到六十个师。在中东拼凑中央条约，代替巴格达条约。美国正和岸信介政府商定明年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并在菲律宾开会，有日、蒋代表参加，要拼凑东北亚联盟。美帝国主义举行了一连串的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扩大军事援助，今年给亚洲国家所谓军援是十八亿美元，明年要扩大到二十一亿美元。总之，要使人民看到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是伪装的和平，是缓兵之计。揭露这些阴谋，对反对修正主义是很重要的事情。幻想帝国主义会变成和平民主人士，是违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第二，反对修正主义要正面宣传列宁主义，要坚持列宁反修正主义的原则性，保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修正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利用列宁，歪曲列宁，曲解列宁的灵活性，抽掉列宁的斗争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惯会玩弄这套手段。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篇文章中，揭露修正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政策方面的实质，列宁系统地批判修正主义。列宁说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是“用‘简单的’，而且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列宁批评修正主义者是拿着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资料”（新资料是伯恩施坦拿的）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把某一些随便抽出的片面的事实，加以普遍化，不顾及这些片面的事实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在政治上，列宁说：“‘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这句流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议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细小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上的利益或想象中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系统地批判修正主义，揭穿修正主义的实质。所以，反对修正主义，要大力地宣传列宁，宣传列宁灵活性和斗争性的统一，不是可以分割的，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

第三，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正面宣传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大家熟悉的。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现代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宣言指出：“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是多样化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莫斯科会议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巩固。莫斯科会议的宣言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的通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大胜利，必须加紧宣传；但不是通过了宣言，斗争就结束了，某些具有修正主义的人，就会改变其观点了。因此必须以宣言为武器，大力宣传，反对修正主义。

第四，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思想、路线。在莫斯科会议以前，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就指出过：“修正主义是当前

的主要危险，它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莫斯科会议上主席讲了国际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指出了要准备要警惕战争疯子发动战争，两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在解释什么叫东风压倒西风时，主席说，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力量对比不能仅仅从钢铁数量多少决定，首先是人心的向背决定，全世界人心向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粉饰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麻痹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危险就在这里。只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忽略了人心向背，忽略了全世界人民和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群众运动。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麻痹人民，会犯政治错误，甚至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我们这样提，指出和平、非和平两种可能，而不是单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我们代表团认为：从目前策略出发，提出可以，但不能过分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过多强调争取议会的多数，会损害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的战斗意志，使他们在思想上解除武装。这样并不会减少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不能起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相反会麻痹自己。争取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的国家机器的摧毁，新的国家机器的建立。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武装不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在议会取得多数来掌握政权，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看到议会选举对他不利时，他会修改宪法，对他有利。靠不住，是他会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名言，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于社会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个别左翼分子以外，社会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我们和社会党的立场根本不同，不能模糊这种界线。模糊了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当然我们要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还是要争取他们的左翼和中间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含糊。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我们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除了在我提到的各种共同规律以外，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共同规律提出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我们也表示了意见。主席讲，各国共产党对于学习研究运用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干部和人民，有重大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我们党和毛主席的这些观点，得到其他兄弟党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同意，同意把这些观点，写进宣言中去。这是我们党和毛主席对宣言的重大贡献，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党的贡献。因此，在当前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离开这种思想、路线，就会犯错误。这些思想是反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要坚持它，打败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

所以我们要和帝国主义的虚伪和平作斗争，宣传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宣传莫斯科会议宣言，坚持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在国际运动的斗争中就必然会象列宁和毛主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必定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更加发展，更加生动，生气勃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离开主席这个马列主义的原

则，理论工作、学习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就会得不到成果。

贯彻毛主席思想的方向，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最后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还必须是系统的学习、研究毛主席思想与普遍的广泛的宣传学习毛主席思想结合起来，提高研究和普及宣传结合起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结合起来。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党委必须认识系统地学习毛主席思想是当前党的理论工作的首要任务。理论工作包括军事理论工作，必须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向。过去做的很不够，现在要迅速采取具体的步骤做这个理论研究工作。为了加强这个工作，中央成立了一个理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计划开始时迅速整理主席的一些报告、文件，争取明年春天出版 毛 泽 东 选集第四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列宁全集的出版，在干部中要开展深入地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对一些不能公开发表的主席著作、文献，进行整理工作，经过中央审阅以后，发到党内一定的干部中研究。肖华同志在沈阳发现部队里有随便翻印毛主席讲话记录的现象，中央要收回处理，这是正确的。据说各省都翻印了，河南的印得最漂亮。处理是对的，但私盐不准贩了，官盐再不卖就困难了。除了防止的办法以外，要采取积极的办法。这个工作量相当巨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明年三月间可以出版。为了系统研究理论，发展理论工作，中央理论小组明年准备召开一个理论工作会议，把学习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这个会要开好，要求各省、市党委、各部门党组、各学校党委很好学习研究毛主席思想。各省市委先开会，也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重要内容。各省、市来中央参加理论工作会议时要带一些礼物来，或者是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和思想的报告，或者是科学论文。会议要请军委的宣传、教育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参加，也要带礼物，也要有论文报告，如果没有礼物，是不受欢迎的。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各种的方法，可以学习少奇同志的方法，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从两个革命阶段、三条总路线系统地说明毛主席思想。这是很好的办法，或者叫做历史的方法，同时也是现实的方法。少奇同志的文章给我们做了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思想的范例。也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如可以学习列宁同志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也可以说是逻辑的方法，这带有很大的概括性。也可以学习林彪同志发表的文章的方法，做专题研究的方法，从毛主席军事路线专题中间研究，也是很重要 的 一 种 方法。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建筑在专题研究上。也可以用陈伯达同志过去在民主革命阶段研究毛主席思想分阶段分问题的方法。也可以用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军事学、文学、教育学、语言学，找出一些问题作专题的研究，如研究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也可以同时组织力量，又用专题分工，相互结合的办法，方法多种多样，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是在党的四十周年，即一九六一年七一时，各省、市、各部门都能拿出研究的成果，作为对党的四十周年的献礼。献礼的礼品从一本小册子到几十本书，总是要有书为证。军委、总政也要计划一下，时间很快，应该献礼的。

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辩证法要广泛宣传，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群众中去。相信工人、农民懂得辩证法，能学习政治经济学。去年在这方面曾经做了一 些 工 作。在 工人、农民中学哲学，在庐山会议时主席是表示赞同的。必须打破认为只有知识分子、高级干部才能学理论、毛主席思想的著作，这是错误的观点。必须对去年、今年工、农、兵学哲学

的经验，很好地整理，加以总结。部队里的战士、下级干部学哲学、学毛主席著作只要组织的好，不会低于还会超过在工厂、农村学哲学。要求各省、市委、各工业部门党组，把普及宣传和提高研究当作同样重要的任务。相信在毛主席思想方向指导下，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在明年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理论工作应该怎样估计它？应该说在主席的指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在整风、反右以后，大跃进以后，理论工作有很大提高。去年一年各省都建立了理论刊物，更不要说去年主席从南宁会议开始，第二个成都会议，第三个八大第二次会议，第四个北戴河会议，第五个郑州会议，第六个武昌会议和六中全会，第七个今年一月的北京会议，第八个二月郑州会议，第九个上海会议和七中全会，第十个庐山会议，这十大会议中间，主席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揭示了伟大的前景。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应该得到发展，的确得到很大的发展。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的执行，主席在十个会议上的指示，如果我们再加以努力，特别在反对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国际反修正主义思潮斗争中，明年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使学习、研究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会取得很大的成果。这是很大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任务。

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

——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纪要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会议认真讨论了谭震林同志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和分配问题若干意见的报告（草稿），并着重讨论了过渡条件和时间问题，公社、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包产单位）三级经济的问题，分配问题，公共积累问题和发展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问题。现将讨论情况，纪要如下：

（一）过渡条件和时间问题

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做到生产基本稳定，队与队之间基本平衡，产量和产值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会议完全同意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的过渡条件。会议研究，要每人分到二百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一般要达到六百元到八百元。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就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江苏为例，如按每人平均总产值六百元到八百元计算，全省人民公社总产值就要达到二百五十亿元到三百亿元左右。一九五九年全省预计总产值为五十六亿元，平均每人只有一百五十四元，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三、四倍。安徽一九五九年总产值为五十七亿三千六百万元，平均每人一百八十八元，要达到六百元到八百元，也要提高三、四倍。上海现在的基础比各省好的多，一九五九年总产值为十亿一千四百万元，平均每人三百二十五元，但提的标准也高些（平均每人总产值要求达到一千一百元到一千三百元）。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

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

会议认为，要把农副业总产值再提高三、四倍，就必须生产多样化。不仅农业生产要有很大的发展，林牧渔副和社办工业也要有更大的跃进。

一九五九年，四省市的经济比重是：

	浙江	江苏	上海	安徽
总产值	42.45亿元	56亿元	约9亿元	57.36亿元
粮食	42.23%	48.6%	25%	70%（粮食、经济作物合计）
经济作物	15.88%	17.1%	55%（经济作物、林牧渔副合计）	
林牧渔副	28.33%	24.5%		24.5%
社办工业	13.56%	9.8%	约20%	5.5%

在公社工农业生产产值的比例安排上，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的意见是：上海提出，农业（粮、棉、油）、林牧渔副和蔬菜、工业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江苏提出，粮油棉、林牧渔副、社办工业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各省、市具体规划意见如下：

上海：一九五九年农业（粮、棉、油）占百分之四十四，林牧渔副和蔬菜占百分之三十六，社办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当总产值达到每户平均四千五百元时，农业（粮、棉、油）、林牧渔副和蔬菜、工业各约占三分之一。

江苏：一九五九年农业占百分之六十五，林牧渔副占百分之二十五，社办工业占百分之十；当每人平均总产值达到六百元到八百元的时候，农业、林牧渔副和社办工业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大搞社办工业，大力发展农林牧渔副；否则，收入不能迅速增长。

会议研究，过渡的时间虽然有一个大致的杠子，但过渡必须根据各个公社的情况，有先有后。渔业区、林业区、经济作物区可能快一些，粮区可能慢一些。但在前三种地区，也应当发展粮食生产，做到粮食自给或者自给有余，并应完成国家交给的粮食统购任务。在一个公社来说、各个生产大队的发展情况也不可能是一样的，有些大队的过渡条件可能成熟得早一些，有些大队的过渡条件可能成熟得晚一些。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二）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的问题

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当然，目前说来，队为基础是肯定的，它的经济现在还是人民公社经济的基本部分，因此，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

四个省、市一九五九年公社三级经济比重的情况是：

上海：社有经济产值占总产值百分之二十以上（社办工业产值按老办法算的），生产大

队产值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生产小队产值和家庭副业产值占百分之十左右。

安徽：社有经济产值占总产值百分之十点四，生产大队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二，生产小队占百分之七点九，家麻副业占百分之六点五。

江苏：社有经济产值占总产值百分之十一点二，大队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五，小队占百分之四点五，家庭副业占百分之十点七。另外，国营农场产值占百分之二点一。

浙江：按纯收入加固定资产计算，比重是：公社（包括社办企业利润、大队上交积累、生产设备和固定资产）占集体纯收入加固定资产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队（纯收入，扣除上交积累）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小队占百分之十左右。

一、积极发展社有经济

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城市近郊或者发展林牧渔副业的条件较好或者手工业生产基础较好的地方，社有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基本上是纯农作物地区，社有经济发展就比较慢。这说明了，要大量发展社有经济，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大搞社办工业，大量发展林牧渔副业。

上海计划用三年时间，最多不超过五年，使社有经济在公社经济中占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江苏计划用五年左右或者稍长一些时间，使社有经济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发展社有经济，主要有五个方面：

（1）社办工业。

（2）每个公社办一个或几个综合的或单一的农、林、牧、渔的种、苗场。抓好这一条，可以加快公社经济发展，增加公社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

（3）每个公社办一个或几个综合的或单一的林、牧、渔、经济作物场。

（4）建立专业运输队。

（5）发展拖拉机站、戽水机站、发电站等。

经营方式，采取四种形式：

（1）社办社有社营。

（2）直属队。结合扶持穷队翻身，把穷队做为公社直属队或者由公社投资，把一个整队建成综合性的或单一的农、林、牧、渔场。

（3）社有社营队管或社队合营。

（4）国家和公社合营。

发展社有经济，必须解决劳动力、资金和原材料，主要的又是劳动力。根据江苏调查，目前社有经济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左右，计划在一九六〇年增加到百分之八至十，一九六二年增加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发展社有经济，要防止再刮“共产风”。公社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可以向大队抽调。向大队抽调劳动力，首先要帮助他们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劳动力。这样就不致于因为抽调劳动力而影响大队的生产。对抽调到公社的劳动力，公社要给予合理的劳动报酬，并且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公社需要的土地，在有荒地的地方，要尽可能用开荒的办法解决，没有荒地或单靠开荒不能解决的，也可以向土地较多的大队抽调，但数量不能过多，并且要帮助抽出土地的大队安排其他生产门路，使他们不致减少收入。生产大队多余的工具、设备和苗猪、苗禽，鱼种、树苗等等，公社可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购买或租用，决不可无偿调拨。公社需要的生产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和提留生产大队的积累解

决，辅之以国家的支持。

二、发展大队经济和准备过渡

（1）会议认为，生产大队的任务，是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主要又是农业生产。生产大队也要办一些工厂，但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影响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第二，所办的工厂要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第三，不与国家、公社工厂争原料。

（2）在发展大队经济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扶持穷队发展生产，这是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

各省穷队赶富队的情况和今后打算是：

上海：一九五八年有穷队四百二十二个，占总队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一一。公社化一年来，已经有三百一十个队基本赶上了富队，占原有穷队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其余的穷队，打算在一九六〇年帮助他们都基本上赶上富队。

安徽：一九五八年有穷队二千九百三十二个，占总队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一年来，已经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个穷队赶上了一般队或富队，占原有穷队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江苏：一九五八年有穷队七千一百九十二个，占总队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一年来，已经有二千八百八十一个穷队赶上了一般队，占原有穷队数的百分之四十。有九百零四个穷队赶上了富队，占原有穷队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六。打算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帮助穷队全部翻身。

扶持穷队翻身，采取两种形式：

1. 穷队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由国家、公社在基本建设、生产资金、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2. 把部分穷队转为公社直属队。

（3）会议认为，对于增产幅度特大收入水平特高的富队，社员的收入，必须进行适当控制。（具体意见，整理在下边分配问题当中）

三、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生产小队的组织规模

（1）会议认为，目前保留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今年有些地方曾出现了，生产小队不恰当地发展小部分所有制而影响大集体生产的情况。江苏省江宁县东山公社翻身大队，有的生产小队随便把"三包"内的粮田改种蔬菜，用这个办法来增加生产小队的收入。安徽也有类似情况，有些生产小队用荒田种大队包产的粮食作物，用熟田种队营的经济作物。这些情况是不正常的，要切实加以解决。

会议认为，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除超产奖励外，主要是经营"十边"隙地和零星水面；食堂养猪、种菜等。对于以下几项，要加以限制：

1. 开荒问题。开荒权只放到生产大队一级。生产大队可以统一组织开垦，也可以采取包工的办法交生产小队开垦。开垦出来的荒地，生产大队需要，就由生产大队直接使用；生产大队不需要或者不便使用的，实行"三包"，交生产小队使用。生产小队已经开的荒地，由生产大队付给开荒报酬，收归生产大队。

2. 不准挪用"三包"内的大田，不准随便改变"三包"规定的作物品种。已经挪用或改变品种的按实种作物包产。

3. 养猪，主要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经营，生产小队也可以以公共食堂为主，养一定数量的猪。

（2）安徽和江苏反映，现在生产小队的规模，一般都是三、四十户。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农业机械的逐步增加，有些生产小队规模与生产需要已经不相适应。特别是在组织生产时，感到劳动力太少，支配不开。会议认为：生产小队规模可以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作适当的调整；但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因为牵扯到所有制的问题，目前一般不宜变动。

（三）分配问题

一、现行的按比例进行分配的方法，在生产水平还不很高和社员收入水平还没有赶上原来富裕中农收入水平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社队的生产水平发展得较高，每人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原来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在一九五九年的收益分配中，社员每人平均收入超过一百元以上的基本核算单位，安徽占百分之十七点六，江苏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七，上海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具体分级比例列表如下：

	100—150元队数占总队数%	150—200元队数占总队数%	200元以上队数占总队数%
安徽省	15.3	2.0	0.3
江苏省	17.91	0.42	0.04
上海市	29.6	4.0	0.7

现在，有些生产大队生产发展得很快，采取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扣留比例虽然愈来愈大，但社员收入仍然增长很快。江苏省洞庭公社庆丰生产大队，今年全队总收入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四，分给社员部分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但每人平均分配收入仍从一九五八年的一百零六元增加到一百八十五元，增长百分之七十四，超过了当地国营企业工人平均收入水平。这个大队，公社向他们调工人调不动，在外做工的要跑回来当农民。象生产发展到这样水平的队，有必要改变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推行固定劳动分值的办法。

实行按比例分配的办法，社员消费水平的增长，应控制在每人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在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增产部分提留作积累的比例应大于社员消费的比例。

二、关于社办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问题。

江苏反映，有些社办工业，是从手工业社转过来的，原来的工资水平较高。据武进县湖塘公社调查，社办工业工人平均每年工资四百三十六元，比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每人平均工资二百五十七元高百分之七十。这样，有些农民就不安心于农业生产，工业积累也受到了影响；社办工业工资过高，也增加了将来过渡的困难。因此，社办工业工人工资，必须作合理的安排。会议认为，除原来老工人和技术工人，原工资不能减少外，新吸收的工人，工资应当不高于或略高于农业劳动的收入，大家同意上海提出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的幅度。对于已经规定得过高的，一般不要去降低，应随着今后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使两者之间逐渐趋于基本平衡。工资制度，不应采取过去手工业社所用的“水涨船高”的比例分配方法，而应当采取基本工资加奖励或计件工资的方法。

三、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的收入，多数地方采取按劳分配的方法，分给社员。也有一些地方主要用于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如江苏省江心洲人民公社典型调查，在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收入中，百分之四十用于集体福利事业，百分之一点二用于添置小农具，百分之二十四点三留作积累，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分给社员消费。浙江提出，小队的纯收入，百分之十

五留作积累，百分之三十五作为储备和公共福利开支，百分之五十分给社员。这种做法会，议认为是比较适宜的。这样做，既有利于鼓励生产小队的积极性，又有利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并可避免产生只追求小队所有制收入而影响大集体生产的消极因素。

（四）公共积累问题

一、一九五九年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有很大增长。

上海：积累八千零五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十八点五倍。

江苏：积累六亿七千一百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其中，属于公社所有三亿二千六百万元（企业利润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大队上交二亿元），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属于大队所有三亿二千万元，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属于小队所有二千五百万元，占百分之三点七。

二、随着生产的发展，今后积累要不断扩大，必须找个出路。会议研究，建立农业机械化基金，是一个较好的办法。这样可以鼓励干部、社员增加积累的积极性。

三、为了保证公社各级积累的正确使用，必须加强对积累使用的管理。公社各级积累的使用，都要制订规划，交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经上一级党委批准。所有公共积累，要一律存入上一级银行，由银行监督使用。公社一级的积累，不能用于公社的行政费用开支，这一条，必须严加控制，防止铺张浪费。

（五）发展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问题

一、会议建议，对公社工业化，由中央统一规定一个标准，以便遵循；并酝酿以下四点意见：

（1） 公社工业产值达到占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2） 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

（3） 公社的工业生产能力要达到：能够修配大型农具（包括机械农具）和制造中小型农具，土化肥、土农药做到自给，农副产品的商品部分一般都能由公社进行初步加工然后出售。

（4） 公社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如：劳动生产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三倍到五倍，产品商品率达到占产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二、会议认为，人民公社工业化，应当根据公社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分批分期地实现，有些公社可能快一些，有些公社可能慢一些。发展社办工业，应当以二就（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四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和为市场、出口的需要服务）为原则，首先发展农具的制造修配工业，土化肥、土农药的制造工业和必要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根据可能和需要，发展砖瓦、石灰、土水泥等建筑材料工业，小型采矿，以及当地传统的或者有条件经营的手工业。

三、从四省、市当前发展社办工业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1） 少数公社在发展社办工业中，仍然存在和大工业争原料的现象。上海、浙江有些公社自己造土纸，不肯把造纸原料卖给国家。安徽有一个三界公社积存了几万斤羊毛，不肯卖给国家，自己纺土绒线。各省、市反映，在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和油料加工方面，由

于原料不足，设备过剩，国营工业、县办工业和社办工业三者之间都有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城乡兼顾、有利生产的原则加以解决，有些生产项目，如纺织、造纸、制革等等，城市工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用同样的原料，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如果交给公社生产，就会造成城市工业停工待料，影响产品的质量和造成原料的浪费。属于这种情况，就应当首先满足城市工业的需要，公社不能盲目发展。有些生产项目，如口粮、油料等加工，技术要求并不高，由公社经营，既可以就地利用其副产品，又可以大大减少城乡间的运输量。属于这种情况，可以交公社经营。现在城市工业中，除大型的高度机械化的加工厂外，一般小型的简单的加工厂，建议下放给人民公社，发展人民公社的加工工业。

（2）发展社办工业，要安排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但也不能安排过多，影响农业生产。为了节省劳动力，公社工业要讲究经济核算，要积极进行工具改革，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公社要采取农闲大办，农忙小办，工农结合，亦工亦农的方法发展社办工业。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要逐步增加社办工业的劳动力。

（3）发展社办工业，要合理解决资金问题。要在不影响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妥善安排资金。公社部分所有的公共积累，应当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发展社办工业。

（4）社办工业的利润，应当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筹统支，各厂基本建设由公社统一计划、统一安排。在目前条件下，县里不要抽调公社的工业利润。

（5）各地在恢复手工业管理机构的过程中，都发现有些地方在建立手工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建立了联社或类似联社的组织，把已经属于人民公社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的手工业生产，重新划出来单独经营。会议认为，为了加强手工业生产的专业领导，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但恢复联社的组织形式，把人民公社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的手工业生产划出来单独经营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影响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削弱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不利于公社工业的发展。

四、为了加强社办工业的领导，会议认为：

（1）各级党委有必要建立一个领导社办工业的机构，例如，社办工业办公室，专门管理社办工业的发展规划、劳力安排、资金使用、劳动工资和部门协作等问题。

（2）社办工业的生产计划、财物管理、技术指导、原料供应、产品分配、产品销售等工作，应分别由各有关业务部门负责。

（3）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有一个书记或社长专管社办工业。

（4）社办工业要纳入国家计划，从上到下建立健全的计划管理。

对归国留苏学生讲十年历史（记录稿）

（一九五九年底）

康　　生

十年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52年恢复时期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8——1960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恢复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以及各方面进行了严重的阶级斗争。

1． 首先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进行斗争。

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后，以美帝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对我们在经济上采取封锁政策，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政策，在军事上利用蒋匪帮对我们进行严重的轰炸。大家还记得，在1950年2月美蒋对上海的严重轰炸，这时我们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反封锁、反轰炸的斗争，中国人民没有在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轰炸面前低头，相反，1950年6月25日美国在朝鲜发动侵朝战争，一方面侵略朝鲜，一方面又准备打过鸭绿江向中国进攻，鉴于这种情况，党和毛主席下定了抗援决心，进行了这一场严重的斗争。10月25日在美帝开始向朝鲜侵略四个月以后，我人民志愿军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11月4日以我党为首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这斗争从1950年10月起——1953年7月20日，战胜了美帝，迫使它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场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三年之久，占了十年中整三分之一的时间。

同时，国内也进行了斗争，我们坚决地肃清了以美国津贴的或者世界各帝国主义津贴的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团体。1950年11月政务院已发布了没收这些团体的决定。另一方面，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以后，他们就利用残余土匪武装进行骚扰，在解放初进行剿匪斗争，1950年消灭土匪的队伍、地主武装将近二百多万人，举此例是为了说明建国初期阶级斗争是多么严重。

在这些阶级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时在内部，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抗援问题进行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进行反对右倾，如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头号帝国国主义，认为中国军队可以打败蒋介石，不能打败头号帝国主义，不敢碰美国，在美帝侵略面前，惊慌失措，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长期战争，国民经济残破不堪，需要经济恢复，进行战争，就没法进行建设。这种看法，就是在美帝侵略面前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党战胜了这些右倾思想，坚决采取了抗援的斗争方针。另一方面，党也反对了"左"倾思想，认为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进行冒险行动，或者不赞成停战协定，认为战争可以长期打下去，不去争取世界和平。党也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结果战胜了帝国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

当时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着恐美，崇美，亲美等思想，抗美的大胜利，彻底地粉碎了这种思想，这对

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有关系。

2．恢复时期阶级斗争表现的另一方面，就是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大家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就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恢复时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相当尖锐的。建国后不久，1950年春天，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破坏金融，搞乱市场，投机倒把，搞许多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活动，当时很普遍，阻碍我们经济建设工作，如在上海的许多交易所，帝国主义、私人资本家银行特别猖狂。当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金融不稳，货币贬值。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就用这些经济机关和投机倒把等手段来破坏经济建设。

我们在解放后，首先搞恢复，就是对投机倒把进行稳定物价、金融的斗争。这是一个群众运动。大家记得，上海群众包围资产阶级交易所的事件。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统一国家财政金融的决定，那时资产阶级认为我党能搞政治、军事，打败了蒋介石，搞经济没有办法的。我党领导人民在1950年春天经过反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的斗争，迅速地统一了国家财政金融，稳定了物价，平衡了财政收支，直到今天，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长期没有作到的事，我们几个月就作到了，如果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

接着，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销包销等种种形式，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就是说在建国初期就把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加以贯彻。那次会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纲领、路线、方针都提出来了，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基本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是不满意的，他们采取了五毒进攻，用五毒进攻的办法，反抗我们要把它纳入国家计划的政策，反抗我们的限制与改造。五毒进攻的办法之一，就是用金钱、美女、贿赂收买我们的干部以及部分革命群众，确实有人被收买。在二中全会中主席就提出：我们有些干部可能不怕敌人的飞机大炮，但是可能对敌人的糖衣炮弹投降。资产阶级就是用这个办法向我们进攻，一部分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等是老干部，经过阶级斗争，还是被枪毙了。第二是偷税、漏税，第三是盗窃国家资财，第四是加工订货中偷工减料，第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个进攻斗争，从1951年12月激烈地继续到1952年上半年。这是恢复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公开地、大规模地和我们进行的斗争。

在对资产阶级问题上，主席和中央也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右倾，即反对资产阶级投降主义和经不起糖衣炮弹所收买。另一方面，也反对了“左”的偏向，即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甚至在恢复时期，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看不到它积极性的一方面，即反帝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恢复后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它是由两面性变为一面性。这种倾向对当时恢复经济和改造资产阶级也是不利的。党仍然贯彻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是完全胜利了。

3．恢复时期遇到的阶级斗争，第三方面是与农村地主富农的斗争。

1950年初，在新区发动了减租反霸斗争，经过半年，在6月间公布了土地法令，展开了反对地富的土地革命，这本来是民主革命时期应完成的任务，在老区民主革命的确完成了，但在新区还没有完成。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常常要顺便完成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因此，在建国以后，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仍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一些任务。1952年底，全国土改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基本完成。这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

斗争。地富反坏他们结合起来进行反抗，破坏土改运动，地主、国民党、土匪甚至采取武装斗争形式进行反抗。为了对付地、富、反、坏的反抗，党中央于1950年10月发布了镇反的指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镇反条例，这样，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工作就大规模开始，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1950年10月——1951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彻底粉碎了地、富、反、坏破坏土改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反映。

4. 恢复时期阶级斗争表现的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这个斗争是从1951年——1952年，大部分是结合抗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进行的。同时，关于思想改造是在1950年6月政协二次会议时主席向各界人士提出了进行自我改造的问题。1951年政协三次会议上主席又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个会议并通过了一个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决议。1951年中央发出了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这时期思想改造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划清敌我界限，肃清封建思想，是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为主的。同时，1951年间利用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知识分子中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思想教育。接着在1952年实行教育改革，进行院系调整。1952年底，又进行司法改革，肃清旧法观点，以及清除国民党暗藏分子的斗争。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国内的反动派、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这些都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也都是在党的正确政策领导下进行的。因此，1950年3月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一面讨论了争取经济上好转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讨论展开全国土改斗争的问题，会上主席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党一方面向资产阶级作斗争，一方面在农村展开斗争。

为了进行坚决的斗争，就必须整顿党自己的队伍，因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斗争，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要更坚决，更一致，才能去进行斗争。1951年4月党作了正确的决定，整顿基层组织，在党内反对一部分党员满足于民主革命胜利的思想，走下坡路的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差不多了，就不想走了。这就要在党员中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教育。

这时在工人中，在工矿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也反对在工会、青年团工作中脱离党的统一领导、脱离政治倾向的斗争。

由于在主席、中央的领导下进行这一系列的斗争，因而我国的恢复工作进行得很快，在这样的大国中，很快完成了恢复工作。从而进入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见在社会主义开始时期，还在恢复时期．即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斗争。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由于党恢复了经济，战胜了美帝侵略，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党就在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1953年国庆节公开公布，同时又宣布了1949年10月1日建国起，革命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宣布，使资产阶级大吃一惊，(恐怕共产党员也大吃一惊)，我们是有意晚宣布一点，早宣布没有好处。资产阶级要反抗，这样，叫他们糊涂几年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没有作思想准备的，有的共产党员也糊里糊涂了。资产阶级大吃一惊，他们说：“上了共产党的‘贼船’，汪洋大海，走也走不了，逃也逃不了”。加上他们没有武器和政权，第一次反抗又使他们吃败仗，他们无法反抗，上了这个船，就只能跟着这个船走。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共产党员，思想上也有些抵触，他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

党一方面宣布了总路线，同时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9月）；同时，党又紧紧地抓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公布了第一个农业合作化决议，12月又公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0月又宣布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接着又宣布棉油的统购统销。对工商业从1953年底——1954年初开始实行私营工商业个别的公私合营，1954年9月底公布了公私合营条例。

这次革命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入了。在宣布这些政策后，因为经过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在公开的经济斗争中遭到了失败，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规模就改变了，转为从内部来进攻。资产阶级没有武装，蒋介石又到台湾去了，帝国主义也不行了，经济进攻也失败了，公开的土匪反革命活动也镇压下去了，所以从内部来进攻。联共党史曾经写道：堡垒要从内部来夺取。这个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发展到这个时期，必然要采取这个方法。

这时党内有些人也对社会主义有抵触，他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党内也有一些论调，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说社会主义太快了，应先把新民主主义秩序巩固起来。也有人提出保护四大自由，（土地买卖、租佃自由，是代表地主利益；雇工自由，是代表富农利益；借贷自由是代表高利贷者的利益；贸易自由，是代表富裕商人的利益。）还有提出要"确保土地所有权"。对这些主张，在1953年5月中央会议上作过严肃的批判，主席指出了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主张。但斗争还不是这么简单，当我们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时，也遇到一部分党员的反对，其中就有河北省省委委员这样的干部，粮食斗争成为当时的严重斗争，很尖锐。

这个时候，梁漱溟就自称是农民的代表，就在政协常委会上出来和毛主席公开作斗争，这个右派在1953年就打头阵的，同时在个别政策上的斗争，更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严重斗争。

1953年就爆发了高饶反党联盟。资产阶级公开进行斗争在各个战线上都惨败了，按照阶级斗争规律的发展，一定要转到内部来夺取堡垒，高饶反党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开始时，有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觉得共产党里面不好了，实际上，是他根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内部斗争，在党内，在马列主义外衣的掩护下来夺取党的领导权。资产阶级越是没有公开的武装活动权，就越是利用党内的合法代理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规律。但是高饶联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体党员和人民粉碎了这个可耻的联盟，如果他们的阴谋胜利的话，就不是回到资产阶级道路，实际上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

紧接着1954年人大第一次开会，通过了宪法，把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54年，中央和毛主席对合作化运动给予极大的、特别的注意。这个问题就不详细讲。讲一下为什么特别注意？要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同志们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农民和农业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依我看，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苏联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提出过，1928年对布哈林右派斗争时，实际上也是这一问题。斯大林当时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后来没有研究和发展，斯大林在理论上是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回避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就是因为农业问题未解决。我党和毛主席根据斯大林的经验，觉得工农业平衡是个战略问题。1927年斯大林提出过工农业的问题，当时讲得很好，主张合作化，主张国家给农民机器，但以后没有继续，后来合作化了，也给农民机器了，但社会主义农业为什

么长期落后，影响到工业发展速度，这是为什么？政经教科书没有总结经验。

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大国，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什么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大问题，在理论上是个大问题。主席和中央是懂得这个问题的，因此，在宣布总路线，开始建设时就应该抓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5年7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5年12月，主席又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6年1月27日，主席把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正式向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运动，就在1955年形成了全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如果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忽视了这阶段历史的研究是不行的。1956年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大事。

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如果学习历史的话，这十年历史很有味道）。

农村合作化斩断了资产阶级的根，资产阶级孤立了，这种发展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资本家说："我们过资本主义生活"，农村也有广大的资本主义，现在农村也有社会主义了，这就挖掉了资本主义的老根。

1955年10月，主席在中南海和全国工商联的执委会开座谈会，要他们不要害怕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出路。群众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的改造。1955年底、1956年初，北京城敲锣打鼓，举双喜牌子，天安门示威游行，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经过这一段，一切都变了，公私合营从个别企业到全行业合营，党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采取了一种具体的定息办法，这种形式现在还存在着，七年不变。进入1956年后，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即生产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这时期阶级斗争的另一方面，在思想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1954年10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并且联系批判学术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接着转入还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这种斗争表现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深入了一步。从划清敌我界限到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一个树立社会主义思想阶段，就是兴无灭资的斗争。

接着在1954年底到1955年5、6月间，进行了与长期隐蔽在文化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个斗争，又发展为第二次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1955年7月发布肃反指示。

经过这些斗争，三大改造得到胜利，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是十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年，因为无论在国际国内都出现许多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国内有：1956年1月，党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是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4月间，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讲了"十大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报告，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有重要发展。）这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个报告谈的是经济建设，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对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大关系从经济建设讲起，也有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在新的时期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在这个会议上，还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理论上除了主席的十大关系外，就是4月5日发表的"一论"和12日发

表的“再论”。

这两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一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问题（此文发表那天我正从德国回来，经过莫斯科，真理报发表了此文，前面申明有删节，回国后找我们的报纸，原文一对，删去的是主要问题——社会主义的矛盾，这是个大问题）。12月的“再论”更提出了有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矛盾可以转化；五条普遍真理；以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两篇文章都谈到南斯拉夫问题。十大关系和这两文章，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1956年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教育战线上也有很大发展，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虽然敲锣打鼓，但并不心服，阶级斗争在党内又有反映。1956年下半年召开了“八大”，实际上是将毛主席的“十大关系”精神贯彻到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去了。报告讲到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即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具体发展。报告还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再来看，那是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结果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就可以完成。

教育部原定1962年高等学校学生是82万，现（1959年）整达到83万，这说明当时的方向是对的。这时党内发生一股逆流，出现了右倾保守思想，认为工农业冒进了，1956年出现了一股反冒进的逆流，这是错误的。1958年的南宁会议就严格地进行了批判。

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错误，紧接着就来了个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进攻。我们在4月发表“一论”一文，接着是“五一”发生了挂不挂斯大林像的问题，我们在天安门仍然挂了，直到这一次（十周年），外国党的同志还觉得奇怪。主席说，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以后又接着发生匈波事件，匈甚至发生了紊乱，我国资产阶级也有人跃跃欲试，党内也有些干部发生反冒进思想，有人看到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也想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坚决予以反击，反对这个口号，（个人崇拜），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的分析。有人问为什么还唱“东方红”？这是列宁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问题，笼统地讲个人崇拜，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问题是个人是代表了党的个人,代表群众的个人,代表马列主义的个人，还是违反了党、群众、马列主义？前者是马列主义的领袖，后者才是不好的。

这就是1956年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关系”的报告,“二论”打下了1957年斗争的基础。

1957年,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意见,在2月29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作了报告，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各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作了系统的分析，发展了马列主义。接着3月间就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从这两次报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几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波匈事件的经验，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时代中有个主要问题——思想革命的问题。在“再论”的五条经验中也笼统地提出，没有专门去分析，我们知道。至于阶级、阶级斗争决不象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说的消灭，人剥削人就消灭了。我们认为没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为此，我们就决定要整风，学习毛主席报告，统一思想。

1957年4月27日，党作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顿党的作风的指示。在延安进行的整风，在思想上奠定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经过整风，就不能统一党的思想。这次整风以学习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开始，也没有估计到

后来的发展，没让民主党派参加，怕他们受不了。但当我们进行的自我检查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打了个败仗，在政治上向我们来了个大举进攻，专门攻击我们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当时导致了乌烟瘴气，这时党中央是清醒的，知道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转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让他们大鸣大放。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我们就在报纸上登出右派的大部分文章，那时人民对党极不满，不了解中央的意图。在党内，中央也叫党员硬着头皮去听。那时在学校中党员是不好受，党告诉党员不准讲话。有人说，毛泽东犯右倾错误，有人晚上蒙着被子哭。整个5月间，资产阶级拿出了全部炮弹。6月8日开始反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主席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领导干部准备在适当时候反击。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就交械投降了。接着几个社论就全面反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就全部垮台了。“七一”主席写了一篇社论，青岛会议上又讲了夏季形势，9月间开三中全会，小平作了整风报告，9、10月间反右派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1957年10月又回头转入全民大整风。

党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下面，在党内阶级斗争也不是没反映。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主要是在各省。在这个斗争中，省委一级干部变成右派的有99人，（包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主席沙文汉这样的干部）。这一仗打结束，总共有右派45万人，其中党内有38,000人，高级党校地委以上学员中右派占5%。这个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非常严重。中央机关也有右派，如中监部王翰、司法部也有。

全民整风是一场大胜利，把工人、农民、各级党组织的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军队也提高了觉悟。这种社会主义觉悟大提高，首先反映在经济战线上。1957年年底，农民们积极起来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的运动，这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当时已感到高级社组织范围不适应需要了，有的地方是自动合并成大社。195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的社论，因而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偶然的。

1957年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莫斯科会议，这是世界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表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会议，一方面是团结的，另一方面是明确了一些观点，如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等等。和平取得政权和和平过渡，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全面。现在苏联政治经济学、哲学教科书中还有这样的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取得政权，可以通过议会取得政权，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关于这个问题，1936年我在巴黎亲眼看到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过胜利，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政权。争取和平是对的，但是有两个方面，还要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进攻的一方面。我们必须争取武装、政权以及国家机器，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如意大利，原来情况很好，但没有武装的话，什么时候都可能被人家搞掉，印度喀拉拉邦还不是这样？莫斯科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是辩证的，反对了单纯和平观点，缓和国际局势，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对的，但也必须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团结，客观经济规律必须遵守，但是，革命必须有斗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必须进行。

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几条共同规律，其中根据我们提议搞上去的一条就是思想革命，作为普遍规律，这一条很重要。宣言还提出了马列主义哲学对实践斗争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建议写上去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人说，我们把哲学庸俗化。相反，我们是把哲学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其实危险的是哲学脱离实践。斯大林后期的错误，就是严重的形而上学。莫斯科会议就明确了苏共二十大不明确的问题。

这样，到1957年底，就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就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从第二个阶段的事实可以看出，阶级斗争，无论在经济战线上、思想战线上革命是非常激烈的，并不是在所有制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基本解决后，阶级斗争就结束了。

1958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1958年1月，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央召开南宁会议，解决了许多问题，主要是批判了1956年反冒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主席又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谓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思想方法，里面包括许多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六十条中还具体确定了1957年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教育方针问题，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南宁会议后，3、4月间又召开了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总路线。同时，鉴于很多地方在兴修水利，小社并大社的趋势，而且提出了合并大社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以后，接着召开武汉会议，这是成都会议的继续，会上还讨论到鼓足干劲，还要留有余地。估计到各地的生产运动，会有一个生产建设高潮的到来。

这年四月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南斯拉夫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向社会主义展开了各方面的进攻。我党严肃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在全党展开了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指出这实际上是新伯恩斯坦主义。

在这一系列方面，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在群众生产热情蓬勃高涨的基础上，在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还通过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一方面拥护莫斯科宣言，另一方面严正地、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大大地发展了，小社并大社的运动到处发生了，农村中的公共食堂，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了。这是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从生产关系、生产组织上都适应生产高潮的形势，党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此在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这当然可以成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很好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会议还提出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这两个问题提出后，就促进了工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

有的人不懂得什么叫综合平衡，用综合平衡来进攻大跃进。综合平衡有几种，首先是全国工农业的综合平衡，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个部类的平衡，这是战略平衡。还有一种是工业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各种工业产品之间的平衡，还有一种是经济部门内部的平衡，这是生产技术方面的平衡，也称技术平衡。有的人不加具体分析，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如何使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因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平衡是和工农业的平衡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过去的工农业的关系。过去城乡是对立的关系，过去城市主要是供应农村生活资料，而现在是互助关系，工业不仅要供应给农村生活资料，而且要供给农村生产资料——机器、化肥、排灌设备、农具等等。农业向工业要求这些东西，只有供给这些东西，才能使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从而也使工业迅速发展。而这，首先是钢铁问题，首先得发展钢铁部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发展，必然向农村要求大量的粮

食，经济作物、油料作物、棉、麻、烟草等等，还要大量的劳动力。今后的趋势，总是工业向农业要劳动力，如果农村不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不更加集体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就不能适应工业的要求，这是一个大的平衡问题。平衡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抓的主要问题，抓了钢铁和人民公社这样两个主要方面，这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大平衡问题。有人说平衡问题，攻击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这是没有起码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不知道什么叫平衡，什么叫最主要的平衡，只是在工业技术上打圈子，而钢铁和人民公社这两样东西，正是中国情况下的战略性的问题。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往往片面考虑工业技术部门，忽视战略性的平衡问题。

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教育方针的决定。这个教育方针的确定，也是空前未有的大事。如果同志们参加教育事业的话，要看这件事并不是没有争论和反对的意见的。由于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一下子改变人们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缺乏经验，如何搞好这个方针，尚待长期摸索。但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教育方针，无论如何不能动摇，碰到任何困难都要坚持这一点。去年，我是准备有些学生跑到我家来闹，准备出乱子的。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但并没有展开，其中一点，是是否降低教育质量？但短短一年中，许多材料可以回答质量问题。密云水库是个大工程，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搞的；历史博物馆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毕业设计；北京车站有一部分是南京（？）工学院学生的毕业设计。这一类事情各省都有。质量的问题，不能光看字面上的，而应该表现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建设上。学生的政治质量是大大地提高了，到教育部门工作的同志，也应该多听反面意见。这个问题，从孔夫子以来就有争论。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个圣贤，一般人都认为颜渊比较好，但依我看，范迟比他好，因为他问孔圣人：田应该怎么种？就把孔夫子考住了。又问：怎么种菜？孔夫子又被考住了。所以孔圣人下结论："小人者，范迟也。"世界上也是这样，列宁提倡了一下，苏联也是去年才搞 .当然，缺点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方针一定要坚持。

去年（58年）秋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炮击金门的斗争。

今年二、三月间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制。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了七中全会，我党中央一方面积极领导，一方面纠正缺点，到七月间庐山会议时，实际上这些缺点主席已经基本上纠正了。

八月间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原来是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发现党内出现了新事物，就是在大跃进中，特别是农村中消灭资产阶级的根子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进行攻击。这是大跃进中的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的进攻在党内的反映。这场斗争，实际上是1953年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我们需要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日益削弱，不是斯大林说的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尖锐，也不是直线向下，而是曲线发展，时高时低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特别是在紧急关头，在党内表现出来。右倾机会主义集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把跃进中几亿人民的建设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大炼钢铁污蔑为"得不偿失"；把总路线污蔑为□□；把人民公社污蔑为"早生的儿子"。他们对群众运动的缺点特别有兴趣，他们表现为惧怕群众运动，实际是惧怕革命。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以后，党内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又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没有消灭，常常反映在党内。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后，生产战线上又出

现了新高潮。

客观经济规律必须遵守，但是，人们适合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动性也必须发挥，干劲必须鼓足。南宁会议主席就指出：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容易见物不见人。搞政治经济学、搞计划工作的人员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向同志们介绍十年来阶级斗争的情况，主要地说明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并不因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而结束，也不因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结束了。这些就给我们一个经验，必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在报告中，谈到国内情况时说：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个报告一出来，在学校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章伯钧说：我不开工厂，薪金是国务院供给，为什么成了剥削阶级？他和我们争论，还引了马列主义的话，说我们也反对列宁的原则。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连升三级，开始是小资产阶级，以后成为资产阶级，现在又成了剥削阶级。有的大学教授说：我是靠脑力劳动吃饭，参加工会，为什么是剥削阶级？有些好心的党外人士替我们解释：因为你薪水太高了。其实人家不服，这是教育部定的。当然，象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至今还拿定息，当然不会讲话。其实少奇同志是从政治思想范畴谈的，不是从经济范畴上说的。从经济范畴上说，还找不到一个地主呢。为什么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不仅是还没有完成政治改造，还有定息，而且还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习惯势力的影响，不能在短期内消灭，还要长期存在。少奇同志特别讲到，这还要长期的斗争。有人认为阶级斗争很快消灭，这种天真想法是不对的。57年右派的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主席在六中全会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像斯大林那样过早地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为什么说它是复杂的？因为它有的表现为敌我矛盾，有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会有阶级斗争；而且两类矛盾又相互转化，因此是复杂的。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是曲折的？因为总趋势是逐步削弱，而且是时起时伏，时高时低，高一阵，低一阵，直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完全消灭为止。总趋势向下，但有起有伏，波浪式的，有时缓和，有时激烈。认为阶级斗争消灭了的观点，在右派进攻受到了一次教训，这次右倾机会主义进攻又是一次教训。阶级斗争到处都有，如果中国没有阶级斗争的话，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这些都不是从阶级斗争出发去看问题。

主席要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集中了八百个教师，八十个宣传部长学习过。但学习有两种出发点，两种方法。一种出发点是主席思想，学习为了更好提高理论水平，更好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经验，更好地贯彻总路线；另一种出发点，认为既然学习苏联教科书，可见你们的一套不行了，垮了。两种出发点，就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拿来"主义的方法。我们认为整个教科书是好的，但有些问题不对。如和平取得政权问题；有些根本没有讲到，如回避了速度问题；有的问题要讨论的，还要研究的，如说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这讲法也许在苏联对，在中国我们觉得毛主席讲得对。按主席的说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如工业是全民所有制，但仍然是按劳分配。总之，这需要分析。

苏联农业长期不发展，我个人认为有如下几个问题：

①在经济上，斯大林后期，在农业问题上长期不遵守按劳取酬、等价交换的原则；他认

为价值法则不适用于农业。在具体工作方面，在农业税收上，也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②长期内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脱节，集体农庄是农民的，而拖拉机站是国家的，二者脱节，使生产者不能自由地支配生产工具。56年我在德国，感到这个问题严重，一个拖拉机站的站长，常常和合作社社长发生争论，如双方规定，为了激发拖拉机站的积极性，规定拖拉机站可以从增加生产量中分得一定的部分。实际上却常有争论。农业社员认为自己积极劳动增产，拖拉机站认为是用机器耕作增产。又如拖拉机站的确亏本，而合作社仍说太多。增产后，农民说管理的好，不是机耕的好。看来赫鲁晓夫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拖拉机站下放到集体农庄。过去一种说法，认为拖拉机站是全民所有制，下放给农民是集体所有制，是退步。这种说法是不相信农民，是不好的。

③物质奖励必须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农村中一方面要进行物质奖励，等价交换，同时又要经常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经常注意农民的私有观念，特别是在农民共产党员中间。

在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引起共产党员的警惕，是及时的。我认为，这仍是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但分配方面仍不是按需分配，这里就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矛盾，否定这个矛盾是无法解释的。

总之，在农民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必须经常进行，不然，怎么了解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呢？

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跃进

（一九六〇年一月）

李　富　春

一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根据初步统计的材料，在工业方面，八届八中全会所提出、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几项主要指标，都已经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八中全会所提出的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的指标，钢产量超额完成了一千二百万吨的计划指标，达到一千三百万吨以上，煤产量也显著地超过了计划指标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的数字。一九五九年我国的农业遇到了几十年来仅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到了六亿多亩，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我们在农业战线上还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农业总产值较计划指标超过很多。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也完成了预计的投资总额。这样，我们接着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在一九五九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仍然是一个全面的跃进，而且是一个更好的跃进。无论哪一个部

门，哪一个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工业方面，产品的品种有了很大的增加，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成本也有很多的降低。拿小洋高炉为例，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设备利用系数达到了平均每立方米日产零点九吨左右，生铁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左右，成本比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约降低百分之四十。在农业方面，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到了互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粮食、棉花、油料、麻类、茶叶、烟叶、糖料、蚕丝、果类、蔬菜，药材、杂品各项农作物都毫无例外地有了很大的增产。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地更好地发展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取得了比其他部门更高的发展速度，市场呈现了一片新的繁荣景象。

经过一九五九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又高速度、又按比例的跃进局面，已经完全奠定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连续大跃进，使我们原来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在两年内完成了。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要求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要求到一九六二年，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煤产量达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发电量达到四百亿至四百三十亿度，机床产量达到六万至六万五千台，棉纱产量达到八百万至九百万件，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左右，棉花产量达到四千八百万担左右。上述主要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都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今后三年中把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提高，并且可以腾出手来，用较多的力量来加强国民经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继续高速度地、按比例地发展。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连续大跃进，这个初步基础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在这两年的连续大跃进中，几乎所有的重工业产品，产量都增长了一倍以上。除西藏以外，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以及其他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中，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一九五八年我国钢材和机器设备的自给率都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一九五九年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技术革命的口号的鼓舞下，所有的企业都提高了技术水平，扩大了技术队伍。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和自己建设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同时，人民公社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组织，它是动员我国五亿多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和经济互相结合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为迅速发展农业和在农村迅速发展工业及其他经济、文化事业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经过一年来的整顿和发展，它的优越性已经更加显示出来了。

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一九五九年夏季我们调整当年计划指标的时候，帝国主义散布谎言，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嚣来攻击我国，企图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混淆视听。但是历史的发展无情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谎言和叫嚣。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原来曾以为要五年才能够办完的事情。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是完全合乎我国经济的客观规律的。两年来的伟大实践，使我们从不断的巨大的胜利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也从某些暂时的、个别的、局部的困难和曲折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人们知道，任何新的

伟大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某些困难和曲折，并且总是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断前进。大跃进中各方面的经验，武装了我们的广大干部，也武装了全国的人民。我们有了这样的经验，就能够深刻地认识和更自觉地执行党的总路线，也就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更大得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有了前面所说的由两年连续大跃进所创造的物质和技术的条件，又有了这里所说的由于党的总路线深入人心而造成的政治和思想的条件，跃进的局面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是确定无疑的了。

二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又说："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 两年来连续大跃进中所取得的成就，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解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的总路线，就是我们党找到了一条经过实践考验而证明完全正确的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无论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两年来的经验一再证明：我们的农业发展了，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就更好办了。不但轻工业更好办，而且重工业也更好办了，加快农业的发展，这是高速度地、按比例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同志多年来阐明了农业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② 在全国解放以后，当我国的工业已经得到恢复并且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随即指出，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适应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他领导了全国农民群众合作化的革命运动。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十大关系"的演说中，指出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以后又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已经作为一条重要的方针包括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点中。

在这样的方针的指导下，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农业的一倍半；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三，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重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轻工业的两倍。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工农业总产值和重工业、轻工业的总产值继续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已经接近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一半，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和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的距离也大为缩短。这样，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时跃进中，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更加协调了。

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也有利于

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我国的工农联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的联盟。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个阶段就是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现在我国的工农联盟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就是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同时，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由于人民公社化和生产迅速发展，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公共积累正在大大增加；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和经营项目增多，也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重工业由于实现了连续的大跃进，为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钢铁和机械的产量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地方工业特别是县、社工业的普遍发展，能够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逐步地把工农联盟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农业现代化的新阶段。

有的同志认为，迅速发展农业是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不相容的。这种意见，当然是错误的。迅速发展农业，不但不妨碍，相反地会大大地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③ 我国的农业是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不但对于轻工业，而且对于重工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随着农业技术改造的日益推进，它要求重工业每年提供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从长期来看，我国需要有几百万台拖拉机，几百万辆载重汽车，几千万吨化学肥料，大量的电力、燃料、建筑材料和其它各种农业机械，以及大量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满足这种需要，我国的重工业就不能只是几倍地发展，而必须十几倍、几十倍地发展。重工业用这样多农业生产资料把农业装备起来以后，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就可以大量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的总产量就可以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几十倍、成百倍地提高，农业就可以提供极为丰富的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就可以为工业和其它事业输送成亿的劳动力。

由此看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这两件事情是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可以高速地发展。国内有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一直认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消极因素，五亿多农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压力。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愈发展，农业技术改造愈发展，农村就会有很多的劳动力没有事做，国家也无法安置。尽管几年来的事实驳斥了他们这样的陈词滥调，可是他们却还是继续向人民散布毒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和利己主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五亿多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伟大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就一点也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点也看不到我国众多人口在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伟大作用。

三

一九六〇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总的来说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根本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续继跃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着实现这个任务，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

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对我们的整个计划工作说来，是一个突出的新问题。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新内容，就是要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来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前进。

在一九六〇年，要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同时，积极地、逐步地推进农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着这个目的，国家要大大地增加农业所需要的机械、钢铁材料、化学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各地方要开展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水利建设运动。在我国目前，兴修水利是增加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条件。一九五九年我们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和水灾，如果不是在合作化、公社化的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使灌溉面积大大增加，使防旱、防涝的能力大大提高，要在一九五九年出现不但不减产而且能够继续大跃进的奇迹，那是不可能设想的。在一九六〇年，我们要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所开展起来的有几千万劳动力参加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这项工作，增加新的灌溉面积，增加排灌设备的供应，提高灌溉面积的使用效益，使农业产量不断地稳定地上升。

实现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另一个重要的办法，是要大量地发展养猪事业，增加有机肥料。我国化学肥料的产量还不大，在最近一个时期，还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以便提高这类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即使化学肥料大量增产了，我国肥料的主要来源，将还是养猪和饲养其他牲畜。如果像有些生产队、有些人民公社和个别的县所做到的那样，全国各地第一步在几年之内做到一人一口猪，第二步再用几年时间做到一亩地一口猪，加上化学肥料的大量增产，那么，我国的肥料问题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猪肥和其它畜肥是有机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好得多。可以说，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有机肥料工厂。而且猪肉可以吃，猪鬃，猪皮是日用工业品的原料，猪的内脏是贵重药品的原料。猪浑身是宝，它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只要充分地利用，都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此，不重视养猪事业，不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不对的。

实现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再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继续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一九五九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预计增长百分之十的指标，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九五九年春季开始，各地方都普遍地注意了农业的多种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在一九六〇年，我们应当在保证粮食有较多增产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同时并举，实行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同时并举，要特别抓住农业，抓住畜牧业。粮食大大增产了，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饲料、饲草来饲养更多的牲畜。反过来。畜牧业大大发展了，我们就有更多的肥料来大大发展农

业。我们的方针，是要使粮食、棉花、油料、麻类、茶叶、烟叶、糖料、蚕丝、果类、蔬菜、药材、杂品得到共同发展。

农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将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将向重工业提出愈来愈大的供应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从而促进重工业的大发展。

一九六〇年发展轻工业的中心问题，是要从多方面扩大原料来源。我们的轻工业设备，利用率历年都不断提高，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为着充分利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进一步增加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应当在增加农作物原料的生产和收购的同时，多方找寻新的原料。广泛收集各种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轻工业原料，如棉秆皮、烟秆皮、芝麻秆、包谷秆等等。同时，重工业部门也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增产生活资料生产的原料。为着适应今后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我们还应当适当进行轻工业的基本建设，建设一些人民生活迫切需要而原料供应又有保证的轻工业企业，如糖厂、纸厂、棉纺织厂、化学纤维厂等。

一九六〇年重工业在优先发展中，应当继续以钢为纲，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薄弱环节，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并且适当进行新的建设。支援农业技术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的各个重工业部门，都应当树立为农业服务的观点，把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所有生产农业资料的企业，都要具体研究当地当时的实际需要，尽可能使自己的生产适应于这种需要，并且做出以后年份发展的规划。由于在最近几年内，我们的农业将大量地采用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因此，各级地方工业和社办工业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采取洋土结合的办法，从多方面推进农业技术的改造。我们的重工业经过两年来的连续大跃进，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加趋于协调，某些原来薄弱的部门已经很快地赶上来了。但是，也还有一些部门比较薄弱，如动力工业、某些采掘工业、石油工业等。重工业在继续优先发展中，应当努力加强这些部门的建设，使它们更好地适应于整个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需要。所有的重工业企业，首先是中小型的企业，在生产的继续跃进中，都要用很大的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争取数量、质量和品种同时继续跃进。为了保证重工业在一九六〇年和以后的年份能够连续不断地跃进，更好地为农业建设、轻工业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国防建设服务，重工业各部门在一九六〇年将要继续进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在建设中，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合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和积极建设内地新工业基地相结合的方针，以便更加妥善地处理企业建设规模和工业合理步局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加强运输的建设，使交通运输同生产和建设继续跃进的需要相适应。铁路建设是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一九六〇年新建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将比往年多得多，我们应当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以来，许多地方修建了不少的简易铁路和轻轨铁路，这是工业上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在交通运输部门的具体化。现在已经看到，在铁路建设中，建设重轨铁路和建设轻轨铁路同时并举，建设现代化铁路和建设简易铁路同时并举，建设干线和建设支线、专用线同时并举，以及建设新线和加强旧线同时并举，这一系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六〇年应当继续执行这些方针。并且应当根据具体条件，把这样的经验应用到所有的交通运输部门中去。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一九六〇年都应当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更

加广泛地、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事实很明显，革新技术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使劳动热情同革新技术相结合，就可以愈来愈多地发挥人和物的潜在力量，使生产不断跃进。在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和技术比较落后的老企业中，固然应当广泛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是在大型现代化的新建企业中，也有可能和必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今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应当依靠两个来源：一个是进行基本建设，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另一个是原有的企业中，在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地挖掘潜力，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发展技术方面，我们应当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并且按照自力更生的精神，迎头赶上，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为了这个目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坚决走群众路线，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精神，支持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和创造，推广先进经验。企业部门要加强职工的文化、技术教育，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并且配合教育部门，培养高级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为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的强大队伍而斗争。在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法上，应当抓住两头，带动中间，即一手抓技术先进的单位，一手抓技术落后的单位；一手抓尖端的技术，一手抓简易的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

要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的继续跃进的任务，要广泛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决定的问题还是要坚持集中领导和开展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继续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增产节约运动。只有大规模地开展群众运动，并且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才能更好地把苦干、实干和巧干结合起来，使群众的劳动热情愈来愈高涨。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使群众自己得到锻炼，大大发挥集体的智慧；才能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学习群众的干劲和创造，从而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

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要在所有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中，在所有部门和所有地方，把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彻底地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我们所取得的非常丰富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真正领会和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紧紧地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使国民经济持续地、全面地和愈来愈好地跃进。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16、36—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107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37页。

（《红旗》1960年第1期）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〇春）

毛　泽　东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1． 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新理论。

哲学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2．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因此能够被认识。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3． 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否认二者有同一性，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4．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变化、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

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教科书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5．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象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

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

6.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促进大量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

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

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教科书说"设备现代化就是经常更新和改进所使用的设备，办法是用新部件替换机床和机器的旧部件，安装更完善的发动机和各种装备"，这就是部分质变。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7. 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

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

展水平的德国。

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8. 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9.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进行反复实践，认真研究。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10.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真理要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我们自己提出两条腿走路才有两年的时间，尽管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少人今天还不相信，这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跃进，取得了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战国时，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又把他的右脚砍断了。卞和坚信真理，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玉是好的，第三次献上去，确实证明了这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人们的信任。

所以，任何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11．相对真理的积累，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12．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13．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

关于人们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们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2. 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3. 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本教科书就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教科书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

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研究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产值和品种，都没有当作对立的统一来研究，这表明他们没有运用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教科书有的地方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4. 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本教科书总是从概念、规律、原则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这本教科书有点象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大扩展劳动协作的范围，使人们的共同劳动能达到资本主义所远远不能达到的规模”。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

5.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成仿吾曾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鲁迅当时是向封建主义、买办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创造社的成仿吾等很幼稚，这样批评他是不对的。鲁迅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出了一本书，就叫《三闲集》，并且写了一篇序，说这是为了对付成仿吾的。鲁迅总是抓住成仿吾，一有机会就向他进攻。有时攻一下潘汉年或李初黎，主要是攻成仿吾，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教科书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

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象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

结合起来。

6．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7．现在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

8．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这本教科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缺少集中，常常前后矛盾。

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

9．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

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象《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三、民 主 革 命

1．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帝国主义者，例如邱吉尔，当时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

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为什么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

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印度没有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印度是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由英国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而中国，则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这些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分割的局面。

尼赫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这对印度工人有欺骗作用。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对印度工人有麻痹作用。印度还没有象蒋介石那样的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这些都是印度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

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

2.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3. 无产阶级政党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土匪运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一九二四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印度没有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4.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5. 我们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

教科书说，我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算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6.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7. 关于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

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

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我国地少人多，解放初期如果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因此，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随着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只要政策对了，中国的农民是好讲话的，他们并不是那么保守的。当然，如果政策错了，就一定要受到农民的抵抗。

土地国有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口号，就是因为实行土地国有，消灭绝对地租，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8.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

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根据地的经验。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要纯洁得多。

9. 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三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说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才对，要好好研究。

2. 革命转变后附带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

3. 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索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4.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5.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同时要讲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

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6.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教科书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那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教科书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

东欧各国一九四四年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并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

教科书说：“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没有这样讲过。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主国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不能改变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7.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观点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很大的缺点。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代表，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象是和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要纯洁得多。

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8. 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

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那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9.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 没收官僚资本，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

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教科书说，“把国民经济命脉即主导的经济部门转到劳动者手中”，应当是转到劳动者的国家手中。

2. 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逼出来的，是经过尖锐斗争的。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

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们根据每个时期的情况，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使资产阶级无路可走，不能不接受改造。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断定无产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抗，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垮台。他们进行怠工破坏，一直到武装暴动。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

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3. 中国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前进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教科书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

4. 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政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的小农经济基本上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同一类型的经济形式。”这点上，小私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教科书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5.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在我国是通过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教科书说，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到了初级社，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回到原始公社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是集体所有，也是集体劳动。如果那个时候不集体劳动，靠个人劳动，老虎就会吃掉你。

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在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下创造出来的。

现在全国的农民，都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但是，他们还有一点自留地。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归农民自己消费，也还有一小部分是出售的，属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有的富裕农民还采用一些办法进行剥削。凡是富裕中农，都是有点剥削的。

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 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在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收入靠集体，从个人所有制方面得到的收入只占一部分。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他们同我们相反，不敢讲矛盾和斗争。

"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这点很值得注意。就他们来说，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农民富，另一方面表现他们那里个人副业经济还相当强。就我们来说，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有的材料说占百分之五十。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教科书提到在苏联一些地区曾经成立过的农业公社时，说"这些公社在当时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是一笔抹杀。

教科书这段讲阶级斗争，很好。讲到富农进行各种破坏，应该说是许多富农，不是全体富农。

列宁的合作化的基本原则，主要的就是集体化（合作化），机械化，按劳分配，分配中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6. 自愿也要引导

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自愿也要引导。我们在合作化中间，先引导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农村有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入社，合作化就是势不可挡了 任何运动中，总有一部分人是随大流的。造成了形势，他们就可以跟上来。

7. 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他们要看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们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们才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两重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说，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

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又各有新、老的区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一些。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老下中农、新下中农，政治上好，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化。上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反对人民公社。

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我们认为，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从一九五〇年起，到一九五五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些同志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了富裕中农想“冒尖”的心理，他们认为合作社可以搞，但是要慢一些。经过批判，很多同志已经转变过来，积极赞成合作化。

教科书说：中国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我们已经把地主富农搞臭了，现在敢于出来发表反对公社化的议论的，只有富裕中农。

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8． 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教科书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是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

9． 工农联盟的三个阶段。

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段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将来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所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这样，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俄国国内战争的时候，实行余粮征集制，势必要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根据地的经验，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使我们有可能不走苏联那样的弯路。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

工人和农民在价格问题上、税率问题上的矛盾，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比较起来，我们在

税率问题上的矛盾比价格问题上的矛盾要小一些。同苏联比较，我们在价格问题上的矛盾也没有他们那么大。

10．“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教科书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地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而是因为他们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不大合乎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现在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机耕地的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

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 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教科书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教科书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而且斗争是很尖锐的。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把彭德怀那条路线打下去，我们的总路线就不能巩固，那是不行的。

2．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教科书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教科书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完全不对。

教科书说，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一九五七年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将来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一次进攻。

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教科书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同时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或者改变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的个别观点。教科书却不提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改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这里还有敌对势力，在农村，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还有一部分坚决反对公社化的富裕中农，我们没有把他们当做右派分子处理，而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农村情况的叙述，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不讲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我国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变化进行抵抗。

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是有不少人“极其关心”自己的卢布。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时候就不适合了。例如，我国全国一完成高级合作化，当时每个专区、每个县就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

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3. 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4.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影响束缚下解放出来。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但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改造，而且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需要半个世纪。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

5. 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在有了知识以后，就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美国不少搞文化的人，干的是反共。对于苏联在科学、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的人，也要看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干些什么事。

6. 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

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7.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这句话对。我们现在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就是对农民群众所进行的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教育。在城市，我们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工人。

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

8. 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之类的迷信。

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 社会主义社会服从于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

2. 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列宁说："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列宁这段话很对。

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

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

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

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无机肥不如有机肥好。

地球是有限的。到了全地球的荒地都开完了，那时只能够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利用海藻这些方面发展。

3. 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教科书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象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4.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一九五八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全国大跃进，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又经过一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曲折，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

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出来反"左"。如果不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那条路线打下去，我们的总路线就不能巩固。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5.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

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蒙古革命是一九二一年成功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人口和牲畜都增长得很慢，同农业没有得到发展有很大关系。波兰有三千万人口，只有猪四十万头，闹得现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兰现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在议事日程上来。

这里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讲是对农业大量投资，但实在说还不象样子，拿一九五九年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五十多万吨。原因是我们过去重工业底子太小，钢的产量太少。一九六〇年开始，给农业的钢材增加了，以后，还将逐年增加。这才可以说是开始大量投资。想多搞一点，"犯罪"不那么严重吧。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

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

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现在我们有些城市办了人民公社，吸收了大批的人员参加生产，这就增加了劳动力。现在我们还要逐步地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有了人民公社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我们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第一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人一头猪，第二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亩耕地一头猪。城市要在所属的郊区、县大量发展养猪，争取猪肉基本自给，不能只是指靠乡村农民供应，这样做，会反过来促进全国农村大大发展养猪。

教科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以狭隘的消费观点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现为……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必须以同样的速度发展……"，是对我们的并举方针的歪曲和攻击。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这一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并不排斥下列情况：在个别时期，为了提高落后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消除它们的落后现象和克服因此而造成的局部比例失调现象，加速这些部门的发展在实际上可能是必要的和适当的。"他们作的这个补充，看来不加不行。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

教科书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中，曾经说过，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用脚走路的。看起来，炼钢也有这两个问题，它吃饭就是吃矿石，它走路要靠铁路。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们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

教科书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就使地方党组织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

教科书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分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分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就全国来说，能够大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由于要增加很多新的生产单位，也就要吸收很多新的劳动力。

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6. 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教科书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高速度呢？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他们也有大跃进，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但是，新的增订本又改成了“巨大的发展”。

7． 实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象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会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8． 自力更生、厉行节约。

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

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今天看来是合理的、节约的事情，过一个时期，由于新的条件，又成为不合理，不节约的事情了。

9. 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

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对我们一九五九年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象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10.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劳动生产率都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提高的。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同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有时下降，有时中断，有时上升。而在社主义社会中，如果不遇到特殊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下降的现象。

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当工人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庄员提高到农艺师的水平时，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达到能保证一切物质资料十分丰富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高涨。"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运输的合理或不合理，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很重要的影响。

11． 合理安排劳动力，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合理的使用”，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休，这个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岁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时候，退休了，一点工作也不做，对自己身体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体支持不下来，可以少做些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

“人口总数迅速增加。”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12． 计划是意识形态，它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作用。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作用。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列宁的这段话，讲得很好：“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实现，在每个阶段上取决于业已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现有的物力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遵照这一点并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并确定国民经济的比例。”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

合同就是计划。

13． 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教科书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

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表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适用的。

不能完全否定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统一。否定了突击，实际上是不承认高潮。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

14．对必要比例关系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15．计划工作上的两种错误做法。

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八、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1．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

直接的影响。

2． 企业管理制度。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教科书这里讲工艺规程的不断改进，当然是对的，但是没有讲其他规章制度也要不断改进。而且，不断改进的话好讲，真正做起来就难了。

规章制度的问题，有许多是同生产关系有关系的。这本书里面不大讲生产管理、规章制度需要改进。他们的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改进。

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3． 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社会主义竞赛要讲政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

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

开展竞赛，还是靠精神起作用。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多和生产少，是矛盾。这里生产这个，那里生产那个，也是矛盾。如果没有矛盾，还要什么竞赛？

4． 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

教科书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和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

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

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

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1.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商品流转，就是产品进入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2. 商业和市场管理。

他们是国营、合作社营两套系统。我们实际上是一套，即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这不仅好办事，而且比较节省。

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必要保守"营业秘密"。

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对三类不同的物资采取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三类物资，允许人民公社和农民在集市上出卖，价格由国家管理，规定一定的幅度。这种办法，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有好处。

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

3. 商品首先要有使用价值，当然，价值过高，也卖不出去。

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先要有使用价值，要产品质量高，否则卖不出去，价值不能实现。当然，价值过高了也卖不出去。

现在计算劳动，采取实物计算和价值计算两种形式。实物计算形式，例如多少万吨钢，多少千匹布，多少立方土，等等，比价值计算形式，更易为人们所了解。

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

4.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要相当地等价。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农民自己已经

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

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教科书说，“生产单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量。”长春汽车厂现在能够生产二、三万辆，将来能够生产十几万辆。从使用价值来看，每辆汽车都是一样的。但是从价值来看，将来生产多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辆汽车所包含的价值量就比现在大大降低了。

苏联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工人和农民在价格问题上、税率问题上的矛盾，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比较起来我们在税率问题上的矛盾比价格问题上的矛盾要小一些。同苏联比较，我们在价格问题上的矛盾也没有他们那么大。

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5．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

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6．教科书对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批判，不足以服人。

教科书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7. 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计盈利。

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8. 没有运输，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

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

运输的合理或不合理，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要争取用一段时间，在山东、徐州、长江以南有煤炭资源的地方，建设新煤井，逐步做到不再从北方向南方运煤。

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 积累、扩大再生产

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这句话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

所谓后备，就是除了正常的供应以外，还有剩余的物资。

我们过去多年中，曾经发生结余过多了也不好的问题。

储备过少不好。我们过去曾因"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引起两次所谓反"冒进"。

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

2. 企业纯收入的分配

教科书说："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利润）当中，归企业自行支配的部分不断增加。这样，企业纯收入（利润）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资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种办法搞不好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

3.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

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4．**批判个人物质刺激**

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不象样子。

教科书说，个人利益和全民利益的“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象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

哥穆尔卡上台时，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结果工资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他们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工人只想多要钱，不好好干，生产情绪不高，造成了吃老本、不能增加积累的严重状况。

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

教科书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减少一些物质刺激，

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这是解释不通的。

教科书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

教科书说：“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5. 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象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

6. 实行“个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教科书说：“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个原则对。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消费品，只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在国民经济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

7. “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危险；我们的工资制度，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教科书说：“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苏联的工资政策是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我们则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

我们是实行计时工资制加奖励。一九五八、五九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少数人如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不发以外，其他职工普遍发。按照劳动的多少、好坏，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

8. 教育人民，要把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服从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象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提高工资。

9. 供给制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的脱产人员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统统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

很多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1.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

2. 批判"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

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对敌对势力来讲，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就它们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3. 全民所有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

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那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

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

4. 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

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公社里各个生产队向社有过渡，不是一个早晨全部过渡，而是一个队、一个队有先有后的过渡。

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

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苏联两种所有制长期同时并存，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矛盾。

在所有制的变革上，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们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接近”、“融合”的模糊观点，来代替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要进行变革的观点。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方面和领导经济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教科书说：“把小农经济逐步联合成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下一步还有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

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教科书说，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现在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

5. 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将来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象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象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6. 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长。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7．每一个时期总有人反对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建立共产主义。

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将来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但是，过去的剥削者，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愿意建立共产主义。

8．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主义要经过革命

教科书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我国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9．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10．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11．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线是反动的。但是，将来民族界线总有一天要消灭。

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现在，区别是民族界线，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

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线，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线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溶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12．共产主义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13．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尚贤”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

14．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发展的。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十二、国际问题

1．国际资产阶级处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独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赫鲁晓夫说，“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句话说得真没有意思。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会用武力去试探，而且资本主义已经不稳定，何必我们去试探呢？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情况变了，但危机规律依然存在。

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不同，有了变化。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3．战争与和平。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么？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么？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

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帮助南越打北越，都没有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文章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

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目前的国际形势，仅仅是没有打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过，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各方面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

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社会主义各国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现在有人大肆宣传战争的毁灭性，对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我们现在有些军区，觉得没有事做，可是他们又不想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4.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

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

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5.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教科书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外蒙古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说：“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这个理论、这种提法，都不对。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拉平”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事实上有。教科书又说：“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

政治性的贸易。

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苏联帮助印度建设钢铁厂这类企业，赫鲁晓夫有他们的打算，尼赫鲁也有他们的打算，现在得利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和印度大资产阶级。但是这个工厂建成以后可以成为印度无产阶级积累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从长远看，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这个钢厂、这类企业，将来总是人民的财产。

十三、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

1. 人物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肖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二十四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象蝗虫一样，飞到那里就把那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曾国藩恐怕是一个富农。他所提出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是一种富农思想。

2. 著作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

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

象《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拢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么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已于二月二十六日批发给各地。现再将毛主席三月四日关于转发这个报告代中央所拟的批语，发给各地。批文如下：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〇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

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原载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

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简报

（第2期）

今天各地区普遍分组讨论舒同同志的报告。讨论之前，一般由地委召集县委第一书记，就如何组织讨论做了研究部署，一致强调要明确重点，摆出问题、敞开思想，虚实并举，搞深搞透。为了保证小组讨论达到上述要求，荷泽、烟台等地都确定地、县负责同志，深入各组、重点掌握。章丘县为了便于使下面的干部敞开思想，提出三条规定：一领导带头摆问题；二细心倾听下面的意见；三不反驳、不戴帽子。今天各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形势问题、过渡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讨论的方法，大体有三种，一种是对照文件，进行座谈，领会报告的精神；一种是按报告几部分，分题讨论，摆问题，鸣放辩论；再一种是边讨论、边检查工作、边行动（如省直）。山东大学小组在讨论报告的基础上，已就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技术革命以及组织家属生产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作好准备等问题作了研究安排。另省直为了深入了解情况，还派出六十九名厅、局长和部分处级干部参加地区组听取讨论。各单位在分组讨论中，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高涨，发言热烈，表示决心把思想摊开，把问题解决透。但也有少数同志由于对会议目的认识仍不明确（如历城有的同志说，这次会议是来纠偏，反冒进），因而存有顾虑，发言不大胆，谈情况多，不敢摆问题，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对讨论干部作风问题，存有某些顾虑，极少数存有紧张心理。临沂地区还反映，在讨论中，富队表现活跃，发言积极，但穷队发言较少，情绪有些沉默。

明天，各组仍将继续进行讨论，临沂地区提出，在进一步讨论中，要普遍摆问题、摆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分别不同办法加以解决。

今天讨论中，反映的几点情况是：

关于当前人民公社的形势问题。讨论中一般通过联系实际、回忆对比，说明了当前形势无限好。有些社、队干部联系本社、本队的情况，总结了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或几大变

化。如历城平原公社大张庄大队支书徐明贞说，我队今年形势很好，主要表现有八个方面：一是今天积累两千元，去年只十八元；二是今年小麦种的多，管得好；三是每人口粮四百余斤；四是办起了食堂；五肥料多，现有化肥四万斤，圈肥三千七百车；六水利条件比去年好；七春播种子准备足，去年仅买地瓜秧子就花了一千七百元；八“三整”后，干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

但在讨论形势问题中，仍有些到会同志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聊城地区反映：有的同志只谈形势无限好，对当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某些不利方面，谈得更少。

关于过渡问题。听了报告后，初步明确了三级所有制的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是必然趋势，必须具备条件，初步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如惠民县桑洛墅公社胡家大队支书胡连法同志说：“我未参加会前，认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快啦！时间不会长了，最多是在秋后，不懂什么是过渡的条件。社员们也这样反映，看苗头这又要大呼隆起来啦，又要变啦！”胡集公社财贸委员刘建龙同志说：“过去认为早晚是过渡，早将生产队合并就好办了，省得落后单位难办事。听了报告后，认识到主要是创造条件，只要条件成熟，自然就会过渡的，条件不成熟急着过渡，就会影响生产。”在讨论中还反映了以下几种思想情况：

1、公社干部有的存有急于过渡的苗头。如惠民县桑洛墅公社副书记杨秀荣同志说：“我认为今天小合并，明年来个大合并，走到社有制”。曲阜县陈庄公社作为省、地委的过渡试点，其他社干部知道后认为，“普遍过渡的时候快到了”。该县多数公社的领导干部打算“秋后搞过渡”认为“核算单位越大越好；并的大，单位少；干部多，好领导，好办事“。滕县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可以过渡了。如岗头公社刘进善同志说：“来开会前认为通过整风后，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该实行一级核算了”。夏津县张庄党委书记宋玉林说：“三级核算太麻烦，公社难领导，包产单位不听话，逐步过渡不如走近路好”。寿张县马楼公社已经过渡了，在讨论中提出过渡有五大好处：（1）土地便于统一规划和扩大耕地面积；（2）劳力便于安排，组成专业队伍，对发展多种经济有重大作用；（3）固定搞丰产田，对加强领导有很大好处；（4）进一步树立了集体思想；（5）能集中把物力、人力、财力用到生产最需要的地方。

2、穷队和富队对过渡问题有不同的反映，穷队盼过渡，要求快过渡。如临沂地区莒县纸房公社纸房大队书记说：“过渡的条件太高了，什么时候达到二百元”。安庄公社柳石大队支书孙荣成说：“开会以前认为一年半载就合了，跟着富队沾点光”。有些穷队代表有抵触情绪，如莱阳西由公社南马庄大队支书邢保德说：“根据四个条件，俺队至少得十年后才能过渡。”海阳朱吴公社莱格队支书说：“收入二百元，俺五、八年也达不到。”历城北园公社鹊山农场支书说：“听了报告后，认为鹊山的大队（已过渡为社有制）过渡不够条件，如果这次散了，没法向群众解释，要求社党委千万不要散了”。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如沂水县构庄公社北庄子队支书认为，到秋就合大社了，怕吃亏，因此，猪羊也不发展了。邹县太平公社一队干部说：“开会前听说生产队快合并公社了，原打算买辆大车也不买了，光等着合并啦！基本建设搞的也不多。”海阳留格公社下河队支书说：“不论怎么搞，反正发展发展都是公社的”。莱阳大夼公社孙格庄大队支书说：“穷赶富跑，穷高一尺，富高一丈，穷队一辈子也赶不上富队。”

3、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海莱东村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那里有四十六个核算单位，想把它合并成八个核算单位，也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有的生产队干部不知道什么叫过渡，泰安市有的队干部说："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的说："是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邹县田黄公社生产小队支书说："我原来认为三级所有制是不动的，听了报告后才明白队有制必须得向社有制过渡。"山东大学有的同志提出：既然要按客观规律进行过渡，为什么过渡还要领导批准，这是否会阻碍过渡？

关于发展社有经济的问题。通过学习舒同同志报告后，一般的明确了发展社有经济，必须以整个公社经济为基础，逐步扩大社有经济比重，不能孤立地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更不能用"一平二调"的办法。但过去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也发生了一些不合政策的做法，影响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主要表现有：

范县新城公社干路生产队支书于保清说："现在劳力牲畜随便调，土地随便占，树也随便刨。五九年社员一年未分到钱，谁余谁缺也不知道，不清不混。"观城公社韩学兴说："他队在今春整地中，将未整完的六十亩地，谎报为二百亩，主要怕和别的队搞协作，不给报酬吃了亏。"惠民县姜楼公社副书记吕振清同志说："俺社三千六百亩经济林，已宣布归社所有，公社搞了一万亩林场，也是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石庙公社将生产队的一部分羊群收归公社所有、也不给代价。乐陵县沙河公社第一书记刘文同志说："全社二十多辆马车全部集中公社所有了。"淄博市张店区房镇公社生产大队支书房久亮说："公社把俺队的马车都集中起来"，我们运肥运煤，都得交脚力，大队支不起运费，现在谁也不想买马车了。"胶南县红石崖公社，向生产队要劳力，竟占队里劳力的百分之二十。公社划了生产队一百亩地建木厂，地里有三十亩小麦公社也要收。生产队不满，夜间放水把麦子冲毁了。海崖公社，调生产队劳力修养猪场，调不上来，公社认为整风不透，把干部找来辩论，结果还是调不上来。牟平观水公社北石疃生产队支书王文奎说："俺村九个木匠全被调走了，我们修车子都没有木匠，我们要也不给。我们认为不用要了，共产主义是快了。"五莲县石场公社党委书记说："去年上半年还不敢乱抓乱调，怕违反党的政策。下半年看到别的公社社有经济很多，觉得自己落后啦，于是就决心大搞。开始时用工调料都给钱，后来钱花光了，又听说别社都不给钱，于是也就开始无偿抽调。思想上也矛盾，一方面认为这样作不对，另方面又想反正不是我贪污了。"汪湖公社党委书记说："为了抢先过渡，乱抓乱调，我们搞的很多。不用等到秋就好合到一块了，因此，搞生产嘴上有劲，身上不积极，对群众没话说。"蓬莱城关公社城前大队王洪玉说："公社建学校、工厂、猪舍用了大队八百亩地。"掖县柞村公社党委书记肖福祥说："县林场到大队划了八百亩地育苗，不经公社党委他们就办了。"肥城算了一下：调大队的东西，有劳动力、工具、树苗、砖瓦等十几种。仪阳公社王庄大队共一百五十二名劳动力，外调一百三十四人，家中只剩下十八人，并且多为妇女半劳动力。莒县爱国公社党委书记张相坤说："我对发展社有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凡是生产队经营的生产，费用小、收益大的即收归公社。因此将大队的石灰窑、纸厂、林场、果园全归公社统一经营。"

但在讨论一平二调问题时，社干部和队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新泰有的社长和书记曾对批评者提出质问和反驳。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不少公社干部强调是：顶公积金的，算总账大队还是欠社里的。有的有抵触情绪，如泰安道阴公社书记杨玉章同志说"发展社有经济问题，理论问题解决了，实际问题可难办了。"该市丘家店公社王传裙同志说："不叫调地，怎能开花结果。"也有的社干部顾虑算账问题，如泰安市峪峪公社社长说、"调这么些东西，要还能还起吗？"

关于作风问题。畜牧厅肖焕章、李俊英同志反映聊城地区有些县有虚报浮夸现象。寿张县上报全县养猪七十一万头，据几个公社摸底，最多也不超过四十万头。聊城地区从未报告死了多少牲口，但收购的牲口皮占全省第一位。上报大家畜怀孕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六，据三个队调查多的百分之六十，少的占百分之三十。上报种棉花三百九十万亩，省里去调棉种时却说已种四百五十万亩。冠县桑阿镇是财贸系统技术革新的一面红旗，最近试制成功用麦糠酿酒，每百斤出酒八至十斤，为了多报成绩，在酿酒时把麦糠里掺上酒。平邑县柏林公社左城管理区书记说："过去向公社报告浇小麦三千亩，实际只浇六百亩。"海阳县邢村公社夼里生产队支书盖明月说：浇麦数字虚报占百分之三十。

农业厅反映：历城县平原公社用三万元盖了一个大礼堂，还准备再盖办公室、宿舍。商业厅反映：滕县盖服务大楼一座，需开支一百二十万元，现在已开支四十万元，并动用了水利工程的物料。工业生产委员会孙景武同志反映：沂源县芦芽店铁矿去年盈利一百四十万元，被县抽去一百三十万元，修建了办公室大楼和宾馆。民政厅反映：茌平县陈集公社陈集大队，把六百元救济款，全部吃喝浪费了。荣城县十五个公社有七个公社打算盖大礼堂，有三个已经打好了地基。胶南县红石崖公社，自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今年三月开支招待费三千六百元，开了一个小麦现场会就花一千元。该社党委书记马忠儒同志检讨说："没来开会前心里就嘀咕，盖了大楼，本来请示县里修理修理，以后又盖了个新的，这次来省开会非点名不可。这次会议挽救了我，不然非犯错误不可。"泰安市崅峪公社杨楼大队原来准备盖大楼的物料，现在改为修建猪圈二百间。

无棣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说："常委苏保德看到社员干活打盹，他要用铁锨铲。"（已作了处理）车镇公社党委书记刘旺青同志反映：有一个生产队长用枪打死了社员的猪，还说："谁要来认，就得赔八亩麦子，群众不敢认，他就吃猪肉"。

财贸部反映：财贸系统的贪污分子中百分之七十是小业主。肥城县安站公社财贸部长朱成吉贪污一千多元，正在查处。范县魏马厂生产队书记魏增练在安排生活时留出粮食一千四百斤，作为干部开会用粮，有八个干部以开会为名多占粮食二十——六十斤，公款四十元。有些手头不干净的人，思想上有压力。沂水县蒲汪区公社岔河生产队支书借公款三十元，怕以贪污对待。姚店子公社生产队干部张怀德借公款三十元，听了报告后对公社党委书记说："我犯错误了，没法说了"。

其他方面的问题：1、某些基层单位组织不纯。汶上县开河公社党委书记刘彬同志说，该社原党委副书记季景新是小商人成份、富裕中农出身，他贪污浪费二万多元，其中有救济款二千多元。并且公开对抗党的指示，党号召"广种多收"，他则主张"少种不收"，致使去年荒芜土地五千多亩（已畏罪自杀）。该社赵庙大队原副支书高玉祥，是漏网地主分子，现已开除党籍。金乡县羊山公社高洼大队支书高树珍说，该大队六个干部中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两个富农分子、一个坏分子。该队土质很好，每人平均四亩多地，但由于组织不纯，成了穷队。该队去年荒地有一百二十多亩，已播种的土地也大量减产（他队邻地高粱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该队亩产只有二十斤），致使今春缺粮四万多斤。该社大队干部有问题的约占二分之一，会计有问题的占三分之二，全社从干部中清除出去的地富反坏分子达一百多人。

2、关于对公社财务工作的领导与监督问题。省农业厅反映：现在对公社财务工作的领导与监督，财政部门和农业部门各有一套机构、一套制度，但没有分工。建议省委明确规定：上级财政部门管公社财务工作，农业部门管公社分配工作。

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李　富　春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提出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

一九五九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坚持了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坚持了人民公社，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超额完成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的调整指标。这样，我们就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九年继续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并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这是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一九五九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千四百一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八百四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千六百三十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七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六百七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七。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完成了二百六十七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的投资约五十亿元不在此数之内），比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施工的限额（注）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共有一千三百四十一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有六百七十一个；县一级以上兴办的限额以下的基本建设项目共有七万五千个，其中建设完工的有五万四千个。各种运输工具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了二十二亿一千二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十三亿二千四百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七；其中铁路货物运输量达到了五亿四千二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的三亿八千一百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六百三十八亿元，比一

（注）国家为了便于分级分类管理基本建设单位，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例如：钢铁联合企业的投资限额为两千万元；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采煤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造纸工业、食盐工业、制糖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水库的投资限额为两千万元；等等，一个建设单位的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九五八年的五百四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四。这一年的国民收入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这些数字表明，所有的经济部门在一九五九年都继续取得了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在经济事业大发展的同时，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也都得到了大发展。

在一九五九年，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继续给了我国以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国民经济的连续大跃进，我们就提前三年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主要指标。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一九五六年九月由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规定，工农业总产值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要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七年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工业总产值要增长一倍左右，而一九五九年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农业总产值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一九五九年已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国民收入要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而一九五九年已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六。

就主要工农业产品来说，其中的多数，一九五九年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六二年的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规定的工农业产品共有二十四种，而在一九五九年达到或者超过原定指标的已经有十三种，接近原定指标的还有两种。这十五种产品，计划要求的一九六二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九年的实际产量比较如下：钢（不包括土钢），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至一千二百万吨，实际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原煤，计划达到一亿九千万吨至二亿一千万吨，实际达到三亿四千七百八十万吨；发电量，计划达到四百亿度至四百三十亿度，实际达到四百一十五亿度；冶金设备，计划达到三万吨至四万吨，实际达到二十万五千吨；发电设备，计划达到一百四十万瓩至一百五十万瓩，实际达到二百一十五万瓩；金属切削机床，计划达到六万台至六万五千台，实际达到七万台；原木，计划达到三千一百万立方米至三千四百万立方米，实际达到四千一百二十万立方米；水泥，计划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至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实际达到一千二百二十七万吨；棉纱，计划达到八百万件至九百万件，实际达到八百二十五万件；棉布，计划达到七十二亿九千万米至八十亿六千万米，实际达到七十五亿米；盐，计划达到一千万吨至一千一百万吨，实际达到一千一百零四万吨；机制纸，计划达到一百五十万吨至一百六十万吨，实际达到一百七十万吨；粮食，计划达到五千亿斤左右，实际达到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棉花，计划达到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实际达到四千八百二十万担；大豆，计划达到二百五十亿斤左右，实际达到二百三十亿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没有达到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六二年指标的有九种，即：原油、铝锭、化学肥料、食用植物油、糖、猪、牛、马、羊，但是，除糖和牲畜以外，它们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超过了计划的要求。

我们在两年内完成了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争取了三年的时间，这就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现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正会同各部门和各地区，根据前两年大跃进的实际经验，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草案。

两年的连续大跃进，证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烈愿望，也确切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和高速度发展的必然性。这条总路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都调动

起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大跃进的情况。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着极丰富的内容。它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从旧社会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主人，就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建设得到高速度的发展。

为了不断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遵循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于关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我们不断地合理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当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我们接着在一九五七年进行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全民的整风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决地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决地不断地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影响，破除各色各样的迷信，把人从各方面解放出来，这是一九五八年开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跃进的新局面的重要原因。由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由于大跃进形势的开展，我国广大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种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在将来，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进一步地把我国五亿多农民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一九五九年在全国播种面积有百分之三十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大跃进的发展，证明了人民公社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郊区农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这一切，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我们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在国家机关中，在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劳动关系、领导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除了一部分带全国性的重大企业以外，我们把原来由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许多企业，也下放给专区或县管理，实行了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在资金和物资的使用等方面，扩大了企业的管理权限。在广大的企业中，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并且在生产活动中采用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在国家机关中，我们也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下放锻炼的制度，同时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在工资福利制度方面，我们实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原则，实行了增加集体福利和增加个人收入相结合而逐步提高集体福利比重的原则，实行了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为辅的原则。所有这些，就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人与人在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也就进一步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觉性。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

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贯彻执行了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一套方针，不仅调动了广大城市人民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五亿多农民又发展农业又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不仅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广大职工家属的积极性；不仅调动了中央各部门办工业和其他企业、事业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各级地方以及人民公社办工业和其他企业、事业的积极性；不仅调动了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人们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技术水平比较低以至没有技术的人们的积极性。这就是说，这一套方针，可以把我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面地充分地调动起来，互相协调地有计划地从各方面进行努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面。

实行这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有可能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就既可以保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又可以保证消费资料的迅速增长，也就既可以保证国家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又可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两年的大跃进中，我国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在工业中，重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点九，轻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一。这就说明，在重工业大跃进的同时，农业和轻工业也取得了大跃进，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也更加协调了。

由于我们在工业方面执行了这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我国工业的分布进一步合理了，资源的利用更扩大了，并且使一部分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也赶上来了。在短短的两年中，我们就建设起一千三百多个“小洋群”炼铁企业，其中有二百个左右可以发展成为中型的或小型的钢铁联合企业。现在钢铁工业的布局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除西藏地方外，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规模不同的钢铁企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各个地区按照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兴办了各种各样的工业。这样就能够一步一步地使工业同农业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使我国工业形成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局面。在两年的大跃进中，大型的洋法生产的企业起了骨干的作用，中小型的洋法、土法或洋土结合的生产企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五九年生产的二千零五十万吨的生铁（不包括土铁）中，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为一千一百零五万吨，占二分之一以上；在一九五九年生产的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钢（不包括土钢）中，由中小型转炉生产的为四百七十二万吨，占三分之一以上。应当指出，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建立起来的“小土群”企业，特别是炼铁、炼钢和采煤的企业，经过整顿、提高，绝大多数生产规模扩大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变成了洋法生产或者洋土结合的企业，它们在生产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一切经济工作中，我们不断地加强了党的领导，实行了政治挂帅，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事业轰轰烈烈地和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一切事业的胜利都要依靠群众，一切工作的进行都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各个经济战线上，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打破了妨碍生产发展的旧制度，建立了有利生产

发展的新制度。在运动中，锻炼了广大干部，也锻炼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了人们的苦干、实干的精神，也发挥了人们巧干的智慧。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帮后进、大协作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在各地各种企业中开展起来，形成了热潮。这种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并且有效地进行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国民经济更能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是以政治为统帅的，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号召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精神。党和政府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教育人民群众为远大的目标而艰苦奋斗，不斤斤计较个人的报酬。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在人民公社中，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样就保证了每个劳动者能够经常地保持着充沛的热情和干劲，能够顽强地克服困难，能够大胆地创造。

一九五九年党内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线、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运动，他们进行宗派组织，实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内向党的大多数举行猖狂的进攻。这是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国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社会上总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满意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党内的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社会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代言人。他们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彻底地粉碎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实现了一九五九年的连续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伟大实践，使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大跃进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完全可能的，是客观的必然性。国民经济总是经历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而每一次反复，也就把生产水平提高一步，国民经济就在这样的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两年来，由于我们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这样的规律，我们既抓紧关键性的生产部门，使它首先跃进，同时不断地使落后部门赶上先进的部门，因而也就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的跃进。这种全面跃进，不但保证了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的协调，而且保证了某些局部的比例关系的失调现象得到迅速克服。正是因为这样，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局面必将持续地发展下去，并且将跃进得愈来愈好。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三个法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制定了党的总路线和有关的一套方针，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总路线和有关的一套方针，充分地全面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改革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且使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高速度发展和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能够统一地结合起来。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沿着正确的轨道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认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今后取得愈来愈大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

一九六〇年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为重要的一年。全国人民努力争取这一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就将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至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奠定基础。

一九六〇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总的说来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过去两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全面的更好的跃进。为着实现这个任务，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以便更加适当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部门之间及各部门内部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使国民经济跃进得更好。

农业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更快地发展了，不但可以保证轻工业更快的发展，而且可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快农业的发展，认真地贯彻实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中心环节。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是完全合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必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为了更快地发展农业，在一九六〇年，要在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同时，积极地推进农业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一方面对农业的技术改造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另一方面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的工业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接着又实现了两年的连续大跃进，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创立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合作化时期，我们曾经批判了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的观点，那是完全必要的。在当时，如果我们坐待机械化而延缓农业的合作化，就不能保证农业的增产，也就不能保证工业的发展，也就不能保证工农联盟的巩固。现在，当农业技术改造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积极地推进农业技术的改造，使农业的发展能够适应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能够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我们就要犯错误。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工农联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土地改革阶段和合作化阶段。在农村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把工农联盟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工业积极支援农业，使农业逐步地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现实的情况，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从一九五九年起，争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并且实现相当程度的电气化。我们的方针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并举，洋的和土的同时并举，在最近三年内还要以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为主。这就要求国营工业努力增产农业机械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同时要求全国农民群众大搞改良农具和工具的技术革新运动。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就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在农业的技术改造中，应当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同时必须和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办法密切结合，和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密切结合，使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最大的效果。

为了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工业、运输、商业、金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当做自己的重要任务，并且适应这个任务的要求，具体安排本部门的

工作。

一九六〇年的农业生产，应当继续以粮为纲，在保证粮食增产的条件下，全面安排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各类农作物的生产，并且实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争取农业的全面大发展。在畜牧业的发展中，应当把养猪放在首要地位，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养猪运动，掀起一个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新高潮；使农、林、牧三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了保证农业的增产，除了积极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以外，各地方还应当继续开展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水利建设运动，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提高防旱、防涝、防洪的能力。

在争取农业全面地、迅速地发展的基础上，一九六〇年应当努力从多方面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以保证各种轻工业品有更多的供应。

一九六〇年重工业在优先发展中，应当努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这是工业战线的一项光荣任务。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就将加快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将加快工业本身的发展。我们的各个重工业部门，都应当树立为农业服务的观点，把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中央管理的大型现代化的有关的工业企业，应当努力增产适合于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各级地方工业和社办工业更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采取洋土结合的办法，从多方面推进农业的技术改造。

重工业的发展，应当继续执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在过去两年的连续大跃进中，各个重工业部门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更加趋于协调了，某些原来薄弱的部门正在很快地赶上来。但是，也还有一些薄弱部门需要继续努力加强。在一九六〇年的重工业建设中，应当继续抓紧钢铁工业的建设，同时努力加强动力工业、采掘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工业、合成橡胶工业等这些部门的建设，使它们更好地适应于整个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需要。一九六〇年各个重工业部门都应当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一九六〇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发挥现有交通运输设备潜力的同时，要努力加强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继续以铁路为重点，增加机车和车辆，增建新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同时加强公路和港口的建设，努力实现装卸搬运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和改造民间的运输工具。

一九六〇年将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建设计划的安排中，必须更好地体现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在注意安排工业投资的比重的同时，适当提高水利、农业和林业投资的比重，提高运输业投资的比重。各项建设，除了继续注意必要的大型项目的建设以外，应当特别注意增加中小型项目的建设。各个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各个地方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〇年都应当继续积极地发展一批“小洋群”企业和“小土群”企业，同时提高原有的“小洋群”企业和“小土群”企业的生产水平。在有煤有铁的地方，都要积极建立一批新的采煤、炼焦、炼铁、炼钢的“小洋群”企业，或者“小土群”企业，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小洋群”或“小土群”企业的发展，并且适应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根据各地自己的可能条件，建设必要数量的小洋铁路或者小土铁路。为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投资安排上应当给地方以必要的机动权，并且推广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的办法。在项目的安排上，要注意遍地开花，合理布局，更好地贯彻执行合理利用老工业基地和积极建设新工业基地相结合的方针。一九六〇年要适当增加学校校舍、职工宿舍的建设，增加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

一九六〇年，无论那一个部门，都必须把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积极发展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群众运动，鼓励和支持劳动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发明的积极性，继续推广有效的先进经验，努力节约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降低成本，改革企业管理和劳动组织。

根据上述任务、方针以及可能的条件，一九六〇年计划草案拟定的主要指标如下：工农业总产值为二千九百八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其中，工业总产值为二千一百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农业总产值为八百八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十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三百二十五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的投资约六十亿元不在此数之内），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在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三，农业、水利、林业、气象部门占百分之十二，运输邮电部门占百分之二十点九，科学研究和文教卫生部门占百分之三点五，商业部门占百分之一点三，城市建设占百分之二点八，其他占百分之一点二。在投资总额中，分配给中央各部门直属企业的投资是一百六十三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分配给地方企业的投资是一百六十一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

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是继续跃进的计划，又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胜利地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就可能争取用比十年更少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提前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三

现在，我就重工业，重工业支援农业，农业，轻工业，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城市街道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劳动工资，科学研究和文教卫生事业等九个方面，来分别地说明一九六〇年计划指标安排情况。

（一）重工业

一九六〇年的重工业总产值拟定为一千二百七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

为了进一步扩大重工业的基础，更有力地支援农业、运输业和轻工业的建设，今年将继续发展钢铁、有色金属、酸、碱、水泥、木材、合成橡胶等原料材料工业的生产。计划拟定，生铁（不包括土铁）的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五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钢（不包括土钢）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硫酸一百五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二；水泥一千六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木材四千七百万立方米，增长百分之十四。同时，将更多地发展电力、煤炭、石油等燃料、动力工业的生产，计划拟定，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五亿至五百八十亿度，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至百分之四十；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原油五百二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在机械制造方面，计划拟定生产发电设备三百三十万瓩，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生产金属切削机床九万台，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并且尽可能提高了农业机械的增长速度，拖拉机将增产两倍以上，机引农具、动力脱粒机将增产一倍半左右。大力提高运输设备的增长速度，铁路机车、货车和载重汽车等都将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轮驳船将增产百分之三十七。轻工业所需设备的生产，也根据实际的需要作

了安排。

一九六〇年重工业各部门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要努力挖掘潜力，增加品种和提高质量，争取在数量上、品种上和质量上都继续跃进。钢铁工业要努力提高高炉和转炉的利用系数，降低矿石、生铁和煤炭的消耗，提高优质钢和合金钢的比重，并且增加钢轨、钢板、钢管和优质钢材的产量和新品种。煤炭工业要更多地增产主焦煤和洗煤，降低煤炭的灰分。机械工业要增加大型的和精密的产品的生产，等等。

一九六〇年重工业各部门基本建设的安排情况如下：

钢铁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共七十三个，包括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基地的续建工程，和分布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大型的及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各地方在有计划地建设一批新的"小洋群"钢铁企业的同时，要积极地加强矿山、炼焦、运输等环节，使它们同冶炼能力相适应。

有色金属工业，在保证必要的大型有色金属项目的建设以外，积极地建设地方中小型的有色金属企业，大力发展有色金属的"小洋群"和"小土群"企业。

电力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一百九十二个，其中火力电站一百一十五个，水力电站四十九个，输电变电工程二十八个。一九六〇年新安装的发电设备安排为四百二十万瓩。

煤炭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八十一个。在计划中，着重地安排了华东以及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地区的新煤矿基地的建设，并且注意小型煤矿的发展，以便逐步实现煤炭生产的合理的分布，减少北煤南运的数量。

石油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十七个。建设的重点是：继续进行各地区天然油田的建设和勘探工作，继续加强人造石油的建设。为了迅速地增加原油的产量，一九六〇年将积极建设中小型人造石油厂。各地方和人民公社还应当根据资源和其他条件的可能，举办土法的简易的煤炼油厂。

机械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二百零三个。其中，农业机械的建设项目五十五个，主要的有：洛阳拖拉机厂第二期，天津拖拉机厂，北京农业机械厂等。农业机械投资的百分之四十八用之于限额以下项目，这些建设项目统由地方安排，以便使产品适合于当地的具体需要。在安排中，还注意了配套项目和修配厂的建设。机械工业的建设，除了加强农业机械以外，主要是增加铸造和锻压的能力，增加大型和精密机械的制造能力，以及增加通用机械、电器和仪器仪表等配套设备的制造能力。

化学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六十七个。建设的重点是化肥、酸、碱和合成橡胶。化学肥料工业，将继续建设十七个大型企业，并且在全国各地建设一百四十多个中小型企业。积极发展合成橡胶。

建筑材料工业和森林工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一百二十九个。建筑材料工业将加强水泥、玻璃、陶瓷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非金属矿的建设。森林工业除了继续开发东北和内蒙林区以外，将开发四川、福建等地的新林区。同时，增加锯材的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以人造板为主的木材综合利用。

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重工业基本建设计划，各部门应当首先抓紧续建工程，使这些工程及早建成投入生产。各部门都应当加强对设计工作的领导，提高设计人员的政治、技术水平，鼓励设计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使各方面的设计吸取先进经验，更好地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所有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当积极采用快速施工方法。

（二）重工业支援农业

在各部门普遍地支援农业的中间，重工业负有特别重要的任务。

为着加速农业技术的改造，计划草案规定一九六〇年由国家分配的用于制造农业机械和农具的钢材为一百一十万吨，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一倍左右。由国内生产的、为农业直接提供的产品，有拖拉机二万二千台，联合收割机二千台，排灌机械二百五十万马力，载重汽车八千五百辆，化肥二百八十万吨，农药十八万吨，胶轮手推车一千万辆，小型水力发电设备二十万瓩至三十万瓩。此外，半机械化的农具和小农具将有更多的增加。

一九六〇年农业方面将增加机械动力五百多万马力。在这一年，机耕面积将达到一亿亩以上，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机械灌溉面积将达到二亿亩以上，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一倍。

随着农业技术改造的加速进行，需要及时着手解决农业机械修配站的建立、技术人材的培养、新式农业机械的试验研究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各个地方正在进行具体规划和着手解决。

工业企业除了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外，还应当组织服务队传授技术，帮助公社培养技术干部，帮助公社办工厂，给农业多方面的支援。为了做好这些支援工作，要提倡工厂和公社直接“挂钩”、办“试验田”、分片“包干”的办法。

（三）农业

计划拟定，一九六〇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粮食、棉花的产量各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猪的饲养头数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各地方在安排农业生产的时候，应当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的要求，切实注意：1．首先保证粮食的增产，并且掌握主粮、杂粮和饲料的适当比例。2．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同时，使经济作物获得较快的发展。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五项主要经济作物要有较多的增产，蔬菜的生产仍然要继续抓紧，茶叶、蚕茧、药材、果品和其他农产品也要积极发展。3．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认真解决牲畜的饲料、饲草问题，并且建立和健全对牲畜的繁殖、饲养、使用的责任制度和奖励办法，加强防治牲畜疾病的工作。4．积极组织劳动力，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发展各类副业和土特产品的生产。5．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加强农产品商品基地的建设，争取在这些地方先一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6．发挥国营农场的优越性，使国营农场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和畜产品。

把畜牧业放在种植业的同等地位，而在畜牧业中又把养猪放在首要地位，这是促进农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步骤。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抓住了养猪问题，就抓住了多快好省地增产肥料的关键。猪大量地增加起来，畜牧业大量发展起来，也就解决了肉食的供应，并且扩大了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在一九六〇年开展大规模养猪运动的同时，要积极发展牛、羊、驴、骡、马、鸡、鸭、鹅、兔等家畜和家禽，要注意发展养蜂。

为了保证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计划的胜利实现，就要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在抓紧农业技术改造的同时，要继续执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八字宪法”的更好运用，农业技术改造的逐步实现，这三者结合起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能够稳定而迅速地向前发展。

各地方、各农村人民公社在抓紧农业生产建设的同时，要妥善地安排农村人民的生活，大力办好公共食堂。

一九六〇年农业、水利、林业和气象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拟定为三十九亿一千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九。要求在一九六〇年改善灌溉面积二亿亩，扩大灌溉面积六千万亩，增加治涝面积六千万亩，造林二亿亩，初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面积增加十万至十五万平方公里。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一九六〇年的水利建设，按照"蓄、小、群"为主和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方针，除兴修大型水库以外，还将兴修大量的中小型防洪、灌溉和水力综合利用工程。河南三门峡、湖北丹江口、河北岳城镇等大型水利工程都将进行大规模施工。在农业的基本建设方面，将扩大国营农场的垦荒面积，加强橡胶农场的建设。

（四）轻工业

一九六〇年的轻工业总产值拟定为八百三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

根据原料供应的可能，各种主要轻工业产品的指标如下：

棉纱，九百万件，增长百分之九。

棉布，七十六亿米，增长百分之一点三。

针织品，用纱一百五十万件，增长百分之二十。

纸，二百八十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一。

糖，一百三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十五。

食用植物油，一百七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十六。

盐，一千四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水产品，五百八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十六。

卷烟，六百万箱，增长百分之九。

轻工业增产的关键仍然在于扩大原料来源，这就需要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多方面同时努力。一九六〇年，在农业方面，应当保证完成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为经济作物调配较多的化肥和农药，以争取增产更多的轻工业原料；还应当大量地组织群众，采集野生植物，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轻工业原料。在重工业方面，应当增加基本化学产品的生产，尽可能实行煤炭、木材的综合利用，增加轻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应当生产一些小型的加工机械，供应人民公社的需要；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供应应当尽可能地照顾轻工业的需要。在商业方面，应当加强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废品、废料的回收工作。

轻工业部门除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外，应当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材料，提高出品率，特别是提高植物油和糖的出品率；加强农业原料的综合利用，推广甘蔗渣造纸、棉子剥绒、米糠榨油、多穗高粱秆制糖等措施。

一九六〇年纺织、轻工、水产三个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十四亿七千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地方所属企业的投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共二百二十七个，其中纺织一百零五个，造纸四十个，制糖二十三个，制盐二十个，水产十个。全部建设的规模是：新增棉纺锭二百四十万枚，造纸能力一百一十万吨，制糖能力九十四万吨。

在轻工业建设中，应当尽量照顾轻工业比较少而又有条件发展的地区；应当适应农业原料的分散性，多安排中小型的项目，使加工工厂尽量接近原料产地。

（五）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城市街道工业

两年的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城市街道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产值为一百亿元左右，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城市街道工业的产值为二十亿元左右，比一九五八年约增长四倍。一九六〇年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的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在一九六〇年要努力提高原有城乡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并且积极地发展一批新的“小土群”、“小洋群”或者土洋结合的企业。

城乡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应当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继续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农村人民公社工业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原料材料，积极发展小型农具、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的制造和修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发展建筑材料的生产，为农业生产、为大工业、为市场和社员生活服务。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应当充分利用大工厂的边角废料和城市废品废料，生产为人民生活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同时，应当积极承制大工厂的来料加工，为大工业服务。

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国家企业，应当在技术传授、技术人员的训练和设备供应等方面，积极支援城乡人民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的合理发展。

为加速城乡人民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的发展，各地区应当加强对城乡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的领导，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把它们逐级纳入地方计划，并且逐步纳入国家计划。

（六）交通运输业

一九六〇年各种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计划拟定为十四亿三千万吨，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铁路货运量七亿二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三；汽车货运量五亿四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五十七；轮船驳船货运量一亿七千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八。民间运输工具的货运量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在过去两年中，交通运输业获得了连续的大跃进，但是仍然赶不上工农业生产以及商品流转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交通运输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千方百计地来发挥潜力，同时加快交通运输的建设。

在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运输的组织工作，进一步规划和组织铁路、公路、水路和工矿企业之间的“一条龙”大协作，改进装卸工作，加速车船周转，加强厂矿内部的运输。大力组织机关、企业的汽车参加运输。充分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适当加强人民公社的专业运输队伍，结合农业生产，利用农闲季节，继续开展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同时，应当加强通信的组织工作，提高电信的传送效能，提高通信工作的全程效率。

一九六〇年运输和邮电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六十八亿一千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中，铁道部门五十亿元，交通部门十五亿七千万元，邮电部门二亿四千万元。

铁路建设。在安排中，执行了建设线路和增加车辆同时并举的方针，执行了建设新线和加强旧线同时并举，建设干线和建设支线、专用线同时并举，重轨铁路和轻轨铁路同时并举，洋铁路和土铁路同时并举的方针。

计划拟定建设铁路干线二千零六十八公里，铁路支线二千零五十三公里，铁路复线一千二百二十三公里，铁路专用线二千公里，轻轨铁路一千零四十五公里．以上共计八千三百八十九公里，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二．此外，改建铁路四百二十一公里，各地方还将根据需要和可能大量地修建铁轨铁路。计划继续建设的铁路干线，有兰新线，内昆线，成昆线，川黔线，滇黔线，湘黔线，兰青线，侯马——西安线等．

全年将增加机车八百台，货车三万二千辆，客车一千辆，

公路建设。新建主要公路六千五百公里，改建主要公路一万九千公里．增加公路运输汽车九千辆，挂车二万辆。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将由地方和人民公社修建简易公路。

水路建设。结合水利建设，增加主要内河通航里程八千公里以上。进行上海、天津、广州、秦皇岛、汉口等十六个主要港口的建设，增加装卸设备。增加轮船和驳船共二十万吨，增加动力机械十万马力以改造木帆船。

民航建设。开辟国内航空线一万一千公里，增加各种新式客机。增加农业用飞机一百架左右，为农业服务。

邮电建设。一九六〇年继续加强干线的通讯建设，重点改造山西、山东等八个省市的长途电话线路。全年架设铜线一万三千余对公里。

（七）商业

一九六〇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拟定为七百二十五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四。

一九六〇年主要副食品供应总值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针织品的品种和数量将有增加；日用工业品将有较多的增加，供应总值拟定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

一九六〇年供应农业的生产资料总值将达一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商业工作，要进一步为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积极组织适应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并且妥善地安排城市的商品供应，大力支援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作。要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各种商品的收购任务，特别是农产品的收购任务。

鉴于一九六〇年社会购买力的增加部分主要在农村，地方工业企业和人民公社工业在安排生产的时候，应当注意多安排适合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的产品．

随着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一九六〇年的对外贸易也将继续增长。对外贸易的工作，应当更好地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跃进的总方针。在这总方针下，根据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促进彼此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愿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同它们发展贸易关系，但是必须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国家在贸易上歧视我国的各种措施。

一九六〇年各商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四亿三千三百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主要是进行仓库、油库和加工厂的建设。

（八）劳动工资

一九六〇年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做到老厂增产不增人，并且尽可能抽出人来支援新厂；新厂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生产工人，但是应当尽量降低辅助工人和非直接生产人员

的比重。

计划拟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铁路运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建筑安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

由于许多企业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以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将抽出一部分职工支援新建的企业，因此一九六〇年计划拟只增加职工一百八十万人。为了适应生产建设继续跃进的需要，必须加强新工人的培养训练工作。

一九六〇年职工平均工资拟增加百分之六，工资总额增加二十六亿元。增加的工资，主要用于职工升级和必要的奖励，工资标准基本不动。一九六〇年国家用于职工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的开支，拟增加百分之十左右。由于就业面的扩大和集体福利的增加，职工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将有较多的提高。

一切企业都要加强劳动保护工作，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九）科学研究和文教卫生事业

在教育事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各类学校的招生数拟定为：高等学校二十八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六十万人，高中八十万人，初中四百万人，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二百八十万人。为适应农业大发展的需要，计划拟定高等农业学校招生二万四千人，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招生八万人。

一九六〇年小学招生二千一百万人。

在发展全日制、半日制学校教育的同时，一九六〇年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各人民公社还要大力发展业余教育。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应当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的条件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充分调动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办学的积极性。在发展教育事业中，必须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和县，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都要积极地发展为本地方生产建设服务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在科学研究事业方面，积极增加研究人员，增设研究机构，增加必要的设备和仪器。要进一步密切科学研究、教育、生产三者之间的结合，即：在科学研究机关中，以科学研究为主，同时进行培养干部和小规模的生产；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以培养干部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小规模的生产；在生产企业中，以生产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努力学习、研究和掌握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群众实践的丰富经验，为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而奋斗。

在文化事业方面，实行“全面规划，积极发展，重点建设，提高质量”的方针，以保证文化事业更好地配合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高潮。在电影方面，一九六〇年摄制电影故事片八十部，发展放映单位（主要是农村放映队）四千个左右；要注意加强科学教育影片的摄制和放映工作。在出版方面，要特别注意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供应，加强课本、扫盲读物和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工作。继续努力发展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农村文化活动。加强干部培养和文化艺术队伍的改造和提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文化事业。

在卫生事业方面，继续大力开展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的群众卫生运动，推广

山西省稷山县和广东省佛山市的卫生运动的经验。应当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作宣传，使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并且使卫生运动与生产大跃进和文化、技术革命互相结合。要以县医院为中心加强农村医疗预防工作，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一九六〇年计划发展医院病床四万五千张，并且大力发展简易病床。

继续大力开展城乡的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要提倡做操、打球、赛跑、爬山、游水、射击、打拳及各色各样的体育活动，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运动水平。

一九六〇年科学研究和文教卫生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十一亿二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其中教育部门的投资增长将近一倍。

四

为了胜利地实现一九六〇年的跃进计划，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在以破竹之势，开展着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新人新事层出不穷，革新创举到处开花，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发扬。由于这个运动广泛的深入的开展，我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就出现了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候那样的沸腾景象，

当前各个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心内容是与生产密切结合，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伟大运动。现在，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职工参加到运动中来，积极地提出和实现技术革新的建议。在农村，在商业、财政、金融部门和科学文教卫生部门，广大群众都参加了改革工具和改进操作方法的斗争，把实干、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在许多地方、许多企业中，已经由单项技术的革新发展成为成套技术的革新，由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革新发展成为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一条龙"的大协作。这些特点表明，我国人民征服落后技术的伟大进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动起来了。当然，这只是事情的开端，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开端。

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不断进行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必然结果，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必然产物。凡是认真开展了这个运动的单位，就能够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国家计划，而且群众的思想觉悟也就不断提高。在许多单位中，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更为发扬，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迅速减少；先进分子大大增加，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大大减少。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帮后进、抢困难、让方便，正在成为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这个运动必将加快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我们应当把这个运动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开展起来，使它不断地巩固、发展和提高，使它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道路前进。

在运动中，我们长期坚持的方向是：要普遍地使单项技术的革新发展成为成套技术的革新，使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革新互相配合，形成系统。就一个企业的范围来说，要把单个工序、单个车间的技术革新发展成为整个工序、整个企业的技术革新，并且使原料材料供应、生产、运输等各个环节彼此衔接。就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的范围来说，要把

同类企业的各种技术革新的经验"配起套"来，形成成套的经验，形成系统的经验，使技术革新系列化。在有关的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要组织"一条龙"的大协作，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要互相支援，生产部门和运输、流通部门要互相支援、企业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要互相支援，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成为国民经济全面的系统的互相配合的活动。在目前，采掘工业部门、原料材料工业部门、动力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尤其应当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创造和推广能够大大增产节约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以适应加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发展，势必要求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取得某些重要的成就以后，紧跟着就要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改革那些已经不适用的规章制度，适当调整工资、奖励制度，等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都要及时地加强工作，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相适应，促进运动的继续发展。

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各个人民公社，对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既要进行短期安排，又要进行长期规划。在每个时期内，都要有明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地规定具体的任务，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同增产节约的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集中力量，突破重点，解决关键问题，使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向前发展。

在运动中，我们创造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应当普遍加以推广。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各个事业单位、各个人民公社、各个街道企业的领导人员，对于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创造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以及群众的一切合理倡议，都应当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加以试验，加以总结，加以应用；对于别的地方、别的部门、别的单位创造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也应当加以研究，加以推广。在推广中，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许多地方采取的现场会议的形式，鞍钢创造的技术表演赛、黑龙江省创造的生产运动会等形式，都是好办法，可以普遍采用。

在运动中，要采取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互相结合的方针。大跃进以来建立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和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多的新创造。可以预料，通过这些企业的创造性活动，不仅有可能使它们在很短的时期内提高技术水平，而且将使我们找到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技术的道路。全国各地出现的大量的生动事例，都可证明这一点。例如，河北、安徽、山东、山西等省各有一批三立方米、八立方米、十三立方米的小高炉，每立方米容积每昼夜的出铁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连续达到了两吨以上，有一些达到了三吨以上。我们应当继续发动"小土群""小洋群"企业和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的职工群众，把运动不断地推向高潮。现代化大型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也已经普遍地开展起来，并且有了很多出色的创造。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部分企业还发动得不够。我们应当批判那种认为现代化大型企业可以不搞或不能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错误观点，而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这类企业的职工群众，破除迷信，打破清规戒律，改革生产设备和工具，改进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改善操作方法，使它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运动中，还应当采取洋土并举的方针。目前无论在农业、工业、运输业中，都有许多先进生产单位采取土办法，实现了手工操作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就是在新技术的采用中间，也有许多是用土办法来完成的。事实证明，如同在生产中一样，在技术的改革中，可以

而且也必须洋土并举，互相结合。能采取洋办法的就采取洋办法，能采取土办法的就采取土办法，或者采取半洋半土的办法。采取这样的办法，就可以在一个企业的范围内有效地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来克服原料、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应当同目前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运动结合起来，使运动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为了使运动不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应当坚持政治挂帅，坚决走群众路线，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形势和运动的重大意义，鼓舞他们的冲天干劲和雄心壮志，并且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扬敢想敢做、互相帮助、不怕困难的精神。从无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专家和技术人员可以改革旧技术和创造新技术，有生产实践经验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甚至更可以改革旧技术和创造新技术。领导人员、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三者密切结合，同心协力，千方百计，就一定能够在技术上创造出奇迹。我们应当重视前人所取得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应当努力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我们应当把敢想敢做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而不应当被已有的成就所束缚。任何新技术，往往是经过多次的试验才能成功的，应当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而不应当被暂时的困难，失败所吓倒。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大跃进的速度，在技术改进上也应当争取大跃进的速度。生产的大跃进，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必将把生产引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各位代表，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即将过去了。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继续跃进的胜利。第一季度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农业战线上的情况也很好，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建设的工作量，预计可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种胜利的形势，使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愈来愈高涨，创造精神愈来愈发扬。当然，在胜利的前进中不会是没有困难的，目前有些省份出现了春旱现象，有些地区的运输比较紧张，这些都需要我们努力克服。帝国主义分子和敌特分子经常采取阴谋的手段，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需要我们随时随地提高警惕。我们相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旗帜，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并且继续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协作，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超额地完成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更加多快好省地继续大跃进！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李 先 念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

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良好的。执行結果，收入和支出都超过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预算，并且收入大于支出，略有结余。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是胜利实现国家预算的基础；预算的顺利执行，又促进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超额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财政决算是国家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九五九年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全正确；跃进的速度肯定能够长期持续；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一切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多么伟大和正确，它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一九五九年国家财政收支决算的数字如下。

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收入五百四十一亿六千万元，相当于原预算数五百二十亿零一千万元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一。同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一十八亿六千万元比较，收入增加一百二十三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一九五九年决算收入中，企业和事业收入三百三十三亿六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九；各项税收二百零四亿七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九；其他收入三亿三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七。

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支出五百二十七亿七千万元，相当于原预算五百二十亿一千万元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一九五九年支出同一九五八年的四百零九亿六千万元比较，增加一百一十八亿一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一九五九年支出决算中，经济建设费三百二十一亿七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社会文教费五十八亿六千万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国防费五十八亿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行政管理费二十九亿元，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七。此外，还有债务支出九亿七千万元，对外援助支出三亿五千万元，其他支出二亿九千万元，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四十四亿三千万元。

一九五九年上述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各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共计二百

六十七亿元，占决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点六，比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此外各地方各部门用自有资金进行基本建设的部分约五十亿元，还没有包括在内。一九五九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注）共有一千三百四十一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六百七十一个，即是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大型企业投入生产。县以上各级所兴办的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共有七万五千个，其中建设完工投入生产的有五万四千个，平均每天有一百五十个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此外，人民公社还兴办了大量的小型建设项目，没有计算在内。

一九五九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结余十三亿九千万元。这些结余是地方预算的结余，连同一九五八年滚存下来的地方结余十七亿七千万元共为三十一亿六千万元，将由地方结转到一九六〇年安排使用，不列入国家预算。

适应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一九五九年银行的信贷收支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信贷收入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信贷支出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在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同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是适应的。一九五九年商业部门收购总值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四。商业各部门年末商品库存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工业各部门物资库存也有了相当的增加。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一度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全国物价继续保持稳定，市场更趋繁荣。

一句话，一九五九年经济兴隆，财源茂盛，物价稳定，库存增加。这是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大跃进的结果，也为一九六〇国民年经济的继续跃进，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应当说明，一九五九年八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若干调整的时候，没有同时调整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这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只要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积累，原订的国家预算收入是能够完成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上很快出现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生产逐月上升，质量显著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战线上尽管遇到建国以来未有的旱灾和其他灾害，受灾面积达六亿五千万亩，相当于全国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努力，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大优越性，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在一九五九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实现了。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预算也超额地完成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和财政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效果。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超额完成，是我国人民奋战一年的胜利。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支援分不开的。一九五九年八月当我们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时

（注）国家为了区分各类基本建设单位规模的大小，便于分级分类进行管理，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例如，钢铁联合企业的投资限额为两千万元；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采煤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造纸工业、食盐工业、制糖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水库的投资限额为两千万元；等等。一个建设单位的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的，就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候，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诋毁和叫嚣。但是烟雾遮不住太阳，曾几何时，这些宣传家的预言完全落空了，他们的叫嚣彻底地被粉碎了。在当时，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实际是社会上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此外，在党内外还有少数看不清大势的人，由于调整指标，也曾对大跃进发生若干怀疑。事实很快地作了肯定的结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结果表明，他们的反对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经过一九五九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现的既有高速度又有按比例发展的跃进局面，已经奠定下来了。我国的财政工作随着生产的跃进，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地收入，更多地支出，更多地建设；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既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国家财政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来就是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一九五八年以来则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度的连续跃进的新阶段。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财政收入更高速度地增长。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一百一十五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只增加二十七亿元，每年收入增加的数额提高了三点三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二，收入增长的速度提高了一点七倍。第二，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更加扩大。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四百八十一亿元，接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预算内投资四百九十二亿七千万元的总数。如果加上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共计达到五百八十四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投资总数五百五十亿元还多三十四亿元。第三，建设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和节约。以钢、煤、铁道的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平均投资二万五千元，现在只需要一万六千元左右，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平均投资三十三元，现在只需要二十二元，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过去建设铁路，每公里平均造价五十四万四千元，现在只需要三十八万元，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点一。这就是说，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的大量事实看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过去用三块钱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大体上用两块钱就可以办到了。而且，建设的时间比以前更短了，建设的速度更快了。第四、财政支出的构成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九；国防费和行政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平均为百分之十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百分之三十点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经提出，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使军费和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要求已经提前三年并且更好地实现了。从财政工作本身来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财政工作人员的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大加强了，财政战线上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经过这两年，我们找到了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财政工作的更好的道路。这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道路。

我国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关于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用"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发展生产，以百分之十的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思想；关于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坚定地相信群众，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思想；以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给我国的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就无往而不胜，这一点已经为我国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的实践所证明，也必然为将来的继续实践所证明。

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的安排

一九六〇年，我国人民要在已经提前完成原定的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基础上，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的更好的跃进，并且为以后年份的不断跃进创造条件。为此，一九六〇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应当动员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各个系统的力量，无例外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应当积极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进程，在各行各业中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当贯彻实行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积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全面组织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和发展公共食堂；应当厉行增产节约，发动广大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切实整顿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用比十年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提前实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

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上述要求编制的。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收入七百亿二千万元，预算支出七百亿二千万元，收支平衡。同一九五九年决算比较，收入增加一百五十八亿六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支出增加一百七十二亿五千万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七。一九六〇年预算收支的增长，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生产增长的指标是基本上适应的。尽管收支增长的幅度较大，但这是有根据的，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各类收入如下：

（一）企业和事业收入四百五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二）各项税收二百四十三亿六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其中，工商税收一百九十四亿五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农业税三十三亿元，继续稳定在一九五八年的水平上，没有增加。

（三）其他收入三亿六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九，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

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国营经济缴款的增加。一九六〇年整个预算收入，按不同经济成分的缴款来划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缴款，包括利润和税收为六百五十四亿三千万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比上年增加一百五十七亿元；来自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包括农业税和农村工商税为四十一亿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九，同上年大体相等；来自其他方面的缴款为四亿九千万元，占预算收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七，也同上年大体相等。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的一百五十八亿六千万元当中，有一百五十七亿元，即几乎全部是来自国营企业缴款的增加。这是我国财政基础固若磐石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农业生产连年跃进，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负担仍然继续保持稳定。一九六〇年农村人民公社各项负担，包括农业税、农村工商税和农业税附加在内，占农副业总产值的比例，将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五点八降低到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五点三。这是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极为有利的一种政策。

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各类支出如下：

（一）经济建设费四百二十九亿一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三。

（二）社会文教和科学费八十六亿二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三。

（三）国防费五十八亿元，同上年相等，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三。

（四）行政管理费三十一亿七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

(五)债务支出十二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

（六）对外援助支出五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五，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七。

（七）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五十八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三。

（八）此外，还有其他支出三亿二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总预备费十七亿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四。

上述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支出，如果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则中央预算三百三十八亿八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地方预算三百六十一亿四千万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六。

关于一九六〇年预算支出的安排，说明以下各点：

（一）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科学费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三点六，如果把增拨银行信贷资金的款项（用于流动资金，也属于经济建设的性质）加在一起，那么所占比重达百分之八十一点九。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开支，这是我们国家预算的重要特点。人们都知道，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美国政府预算支出中军费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一。同这种情况根本相反，我国预算支出中国防费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八点三，而且国防费的比重几年来是逐年降低的。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充分

说明了我国人民从事和平劳动的热烈愿望和节减国防经费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决心。同时，这个事实也充分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美国在扩军备战方面的支出，比他们预算中公布的数字还要多。一个是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建设，一个是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军费，究竟谁致力于和平和造福人民的事业，谁热衷于扩军备战和侵略政策，难道还不明显吗？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我国人民，对于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帝国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帝国主义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手法，是无论如何骗不了人的。

（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三百二十五亿元，比上年的二百六十七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各地方、各部门在预算以外动用上年结余和用自有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六十亿元，还没有计算在内。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进一步注意了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注意了大中小型企业的合理安排，既要有重点地建设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又要大量发展"小洋群""小土群"企业。整个基本建设投资当中，中央直属企业的投资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地方企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在工业、交通运输各部门投资当中，进一步注意了铁道、电力、有色金属等薄弱环节的加强。同上年的投资额比较，铁路增长百分之四十点八，电力工业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有色金属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九六〇年基本建设的规模是很大的，在继续贯彻执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办法，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情况下，投资效果将会进一步扩大实际的建设将会超过上述投资数字所表明的规模。

（三）一九六〇年国家在加速工业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的支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对于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各地方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结合当地情况，合理布局，全面安排，积极发展。一九六〇年国家对人民公社的投资十五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农林水利和气象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三十九亿一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九；农林水利和气象方面的事业费（推广农业技术、推广良种、培训干部、发展畜牧兽医等）十九亿四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六；国营农垦场增拨流动资金五亿四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十点二。此外，地方自有资金用于农业的支出约有十五亿元；人民银行除了以前各年发放的农业贷款四十一亿九千万元仍然继续周转发放以外，本年新增农贷五亿元。一九六〇年国家对农村仍然执行稳定负担的政策，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国家拨给的资金是有限的，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主要地还是依靠人民公社本身的积累，依靠自力更生，忘我劳动，勤俭办社。一九六〇年人民公社将会有更多的积累，再加上国家的积极支援，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是可以解决的。

（四）在支持高速度发展生产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持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持续跃进，迫切要求更多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要求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毛主席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一九六〇年在全国范围内，将掀起一个更大的文化建设高潮，将更加广泛地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移风移俗、改造世界的运动。为了迎接这个高潮，国家对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科学事业拨款八十六亿二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

一，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部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七。为了高速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完全必要的。应当指出，国家预算拨款发展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依靠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企业和各人民公社，大家动手，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展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只有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和因地制宜相结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才有利于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资金，发展更多的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不断地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的需要。

还需要说明，在国家预算以外，各地方、各部门还有一部分自有资金，包括地方的自筹收入和附加收入，包括企业的利润留成收入和大修理基金等，这一笔资金大约有一百二十亿元，按照规定的范围和用途，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管理收入，自行安排支出。随着各方面经济事业的发展，各地方、各部门的自有资金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好事。为了更合理地使用这一部分资金，为了加强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综合平衡，国务院已经作出了关于加强综合财政计划的决定，把预算外资金的使用，不仅纳入地方计划，而且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使整个国家资金的运用，同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相适应。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是一个全面支持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预算，是一个加速发展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预算，也是一个瞻前顾后，既积极而又可靠的预算。

三、为实现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而奋斗

各位代表！实现国家预算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才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党的一贯方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作过这样的指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大跃进以来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顺利实现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经济战线上的形势好得很。经过去年的反右倾斗争和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共产主义思想蓬勃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已经掀起了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广大群众表现了更高的雄心壮志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一步发扬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精神，协作成风，送宝上门，助人为乐。运动的洪流日新月异地刷新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目前的增产节约运动，不论从组织性、计划性来说，不论从规模的广度、深度和运动的实际效果来说，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不仅大量的手

工操作和笨重的体力劳动正在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而许多现代化企业也正在进一步实现机械操作的自动化和生产过程的连续化；不仅工业部门在生产技术、工艺程序、劳动组织、产品设计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而且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牲畜饲养、加工运输等方面也正在大量改革工具，逐步实现半机机化和机械化；不仅所有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千方百计地革新技术，而且商业部门和生活服务部门比如仓储保管、门市售货、作饭洗衣等等，也在大闹技术革新。

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产品成本和经营管理费用，增加生产不增加人或者少增加人，扩大经营不增加费用或者少增加费用，这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建筑为百分之二十左右，铁道运输为百分之二十左右。成本费用的降低，工业为百分之八，交通运输为百分之六点九，商业为百分之五点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费用对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按照一九六〇的计划指标计算，工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就相当于增加产值约十五亿元；工业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为国家增加收入六亿多元；商品流转费每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收入一亿多元；交通运输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收入两千多万元。全力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促进工业方面的高产、优质、多品种、低成本和安全生产的全面跃进，促进农业方面的粮食、棉花和各种经济作物以及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这是全民的任务，也是财政经济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也影响经济。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财政预算完满实现的基础；财政部门深入地开展群众运动也是推动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部门必须积极地主动地支援生产，参与和组织生产，充分发挥本部门在促进生产，保证需要，调剂分配，增加积累，支援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在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中，在基本建设单位中，应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运动，把经济核算交给群众，把群众性的核算同专业人员的核算结合起来，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发动工人参加管理，更全面地实现多快好省。工人说得好："当家必管家，管家必核算，管家不核算，当的糊涂家"。作为国家主人的我国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企业的经济核算，这是工人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的标志之一。工人最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最关心全面的增产节约，把工人参加管理同参加核算结合起来，使他们知道自己每天劳动的效果如何，是否增产，有无节约，就能够大大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和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把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结合起来，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使件件工作有检查，条条建议有交代，个个环节有核算，这样逐步形成群众性的管理网、核算网、检查网。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质量，使经济工作愈作愈细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农村人民公社，财政金融部门必须通过国家的财政投资，通过农业贷款的发放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积极支持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积极指导人民公社加强经济核算，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求经济效果，做好经济工作；积极帮助人民公社改善财务管理，健全财务制度，反对铺张浪费，严守财政纪律，实行勤俭办社；积极帮助社员安排生活，发展农村储蓄，扩大农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来源；积极同有关部门配合，帮助穷队穷社赶上富队富社，并且努力壮大公社经济。在这方

面，有些地方已经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学习和推广这些经验，将会使财政金融工作在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

在一切经济事业单位中，在一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保健、社会福利等事业单位中，在一切国家机关、行政管理部门中，都必须进一步执行厉行节约的原则，都必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

近两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来说，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必须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反对贪污浪费，以便把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节约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是全体人民的任务。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必须提倡勤俭持家的风气。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这同合理消费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正当愿望是一致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积累资金，加速建设，而且在于移风易俗，养成全国人民优良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进一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之一。把人民生活组织得更好，就可以使人们鼓起更大的干劲，专心一意地从事生产劳动，就可以把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建设事业。财政金融部门应当通过自己的活动，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个工作。

财政金融部门必须进一步发展协作之风，搞好同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的协作。财政、银行同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离开协作就无法做好工作。财政、银行的任务须要由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财政、银行的联系面很广，四面挂钩，同各方协作，出主意，当参谋，也可以帮助有关部门解决许多困难，办许多好事。无论在地区性的生产协作和物资交流当中，无论在有关各部门之间的大协作和同行业之间的大协作当中，财政、银行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的岗位，都应当很好地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都应当把帮助完成生产计划当作自己的事，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共同为发展经济而努力。把财政金融部门的力量同有关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内外结合，大搞协作，从经济上来说，是全面实现计划，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方法；从政治上来说，是共产主义精神的表现，是社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发扬这种同志式的休戚相关、互相帮助、互相协作的精神，是财政金融部门大搞群众运动、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顺利实现国家预算的重要条件。

各位代表！目前的形势对于实现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是十分有利的。在工业战线上，我们已经争得了年初的“开门红”，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在农业战线上，已经争得了水利建设和养猪积肥等方面的新的胜利，现在正在为战胜部分地区的春旱，争取春耕春种和夏季丰收的更大胜利而奋斗。其他基建、交通、财贸、文教等战线上的工作也都在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改变落后技术，实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伟大进军，正在十分广阔的战线上展开。形势无限美好。让我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增产增节约运动，胜利实现一九六〇年的持续跃进，来迎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们的任务是伟大的、艰巨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当中的任何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国民经济持续跃进服务的一六九〇年的国家预算。

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一九六〇年四月六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谭 震 林

各位代表：

我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向大会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执行情况和争取提前实现这个纲要的报告。

一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提出的，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以草案形式公布。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根据草案公布以后将近两年中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发展，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在同年十月间公布了纲要的修正草案。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为执行农业发展纲要而努力，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大大提高我国农、林、牧、副、渔生产的要求。规定了达到这个要求的各种有效措施，制定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划，它向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改变我国农村面貌的伟大目标。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这个纲要草案第一次公布以后，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高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九五七年十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再一次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事实完全证明，这个纲要是一个群众性的纲领，它能够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发展我国的农业，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不但造成了农业战线上的跃进形势，而且通过农业的跃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形势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号召，从此就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全国农村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普遍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群众根据实际需要所作出的伟大创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

视并且及时抓住了群众的这个创举，把它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用正确的方针指导它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规模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一九五八年初全国有七十四万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经合并改组成为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平均一个人民公社拥有六万四千亩耕地，五千农户、一万个劳动力，相当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规模的三十倍。过去绝大多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范围比较狭窄，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但是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人民公社现阶段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制，而以生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但是它的公有化程度已经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高，已经存在着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所没有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而且这部分公社所有制，随着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逐步扩大。在将来，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

人民公社由于具备了一大二公的优点，就能够在比高级社更大的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和分配，能够比高级社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能够进行大协作，能够举办过去高级社无力举办的建设。适应于生产集体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生活的集体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普遍地举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普遍地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成千成万的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生产。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同时也实行带有按需分配萌芽性质的供给制度，这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很好地解决了多子女家庭以及其他负担较多的家庭的困难，使老有所归，使儿童得到更好的教养，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保障。

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为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取得了农业生产的连续大跃进，粮食两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棉花两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在这两年大跃进中，农、林、牧、副、渔和社办工业生产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农田水利、农村的交通运输建设大大地发展了，农业增产措施在实践中更加丰富了，资金积累增加了，农民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加快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进程。充分发挥农村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优越性，动员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从各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农业生产和建设的跃进速度，也就完全有可能提早两年或者三年实现原定在十二年内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

二

下面我首先说一下农业发展纲要在过去四年中执行的情况。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这是四十条纲要的中心。一九五九年，达到和超过纲要这个规定的，已经有五百零四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的旗、市和大市辖的区，下同），占全国一千七百八十六个县的百分之二十八，已经有二亿八千六百七十七万亩粮食耕地，占全国现有十二亿亩粮食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四。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棉花的亩产量在十二内，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达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一九五九年，亩产皮棉达到一百斤以上的有四十五个县、七百六十一万三千亩棉田；八十斤到九十九斤的有五十五个县、一千零四十四万八千亩棉田；六十斤到七十九斤的有一百零四个县、一千八百四十二万三千亩棉田；至于六十斤以下的，许多地方都没有以四十斤为界分别统计。因为绝大多数棉田的亩产量都超过四十斤，四十斤以下的主要是新发展的棉田。总计亩产皮棉六十斤、八十斤或者一百斤以上的，共有二百零四个县，占全国一千零二十七个植棉县的百分之二十；共有三千六百四十八万四千亩棉田，占棉田实收面积八千五百多万亩的百分之四十二。

除了粮、棉以外，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种农作物，几年来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九五九年全年养猪二亿七千万头，年底存栏一亿八千万头；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按年底存栏数平均每户一头半，按全年饲养量平均每户两头以上，提前达到了纲要要求在一九六二年达到的标准。去年十月以来，全国各地又普遍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养猪运动，并且以养猪为首，掀起了一个全面发展畜牧业的高潮。据今年三月初的统计，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头怀孕的大家畜，这就是今年牛、马、驴、骡等家畜大发展的基础。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造林五亿四千万亩。山区生产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农、林、牧相结合的范围，有些地方利用山谷水库在山区发展了渔业生产，还有些地方兴办了小型的土法生产的或者土洋结合的林产化学工业和其他工业，开展了“万宝山”运动，人民公社的副业生产也比过去合作社时代发展得快，一些久已停止生产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产品已经恢复起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在去年冬季的“小秋收”运动和短途运输运动中，取得了几十亿元的收入。海洋和淡水的渔业生产，一九五九年的产量达到五百零二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一十二万吨增加了一百九十万吨。人民公社兴办的农村工业，一九五九年的产值达到一百亿元左右。社办工业是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新兴的经济部门，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来没有规划的。

由于人民公社多种经营的大发展，一九五九年的农业产值达到七百八十三亿元（社办工业的产值一百亿元不包括在内），既增加了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增加了社员的个人收入。除了税收、公积金、公益金和各项生产费用以外，按全国农村人口平均，一九五九年每人收入八十五元左右，赶上了农业合作化以前富裕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每人八十元），提前达到了纲要要求在一九六二年前后达到的目标。这是全国平均的水平，有许多富庶的地区已经超过八十五元这个水平，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低于这个水平。

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应用先进农业科学原理，总结农民群众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八字宪法”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各项增产措施，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完整。两年来，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了“农业八字宪法”。从一九五七年冬季开始，几千万人上阵，大修水利，两年共增加灌溉面积五亿五千万亩，加上原有的溉灌面积，共达十亿零七千万亩。其中有六亿一千万亩，抗旱能力已经分别达到纲要规定的三十天，五十天和七十天的标准。在肥料方面，我们这几年发展了养猪，扩大了绿肥面积，公社举办了许多土化肥厂，有的公社还办了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合三千吨硫酸铵）的小洋化肥厂，国家投资兴办了一些现代化的化肥厂，使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有了很大的增加。在改良土壤方面，全国低洼易涝地和各种低产田有七亿多亩，初步改良了四亿五千万亩，占百分之六十。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面积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初步进行了保持水土措施的有六十万平方公里，占百分之

四十。两年以来还普遍展开了群众性的土壤普查运动，各地正在把普查所得的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研究因地改良、因地种植、因地施肥等措施，逐步按社按队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按地块建立土地档案。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既是群众性的，又是科学性的农田基本建设。各种农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一九五九年达到十八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棉、麦、稻、薯等主要农作物的良种已经基本普及。各地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合理密植已经广泛推行，过密过稀的毛病越来越少，合理密植的规律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的植物病害和虫害有十一种，其中的棉花虫和红蜘蛛，在集中的产棉区已经基本做到不卷叶， 不红叶， 达到消灭危害的要求；对于蝗虫和粘虫，也做到基本控制，不使为害；其他如麦类黑穗病、水稻螟虫等等的危害损失率一般已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许多地方还创造了几万亩、几十万亩耕地连片的无病虫害区。纲要要求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的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有八种，其中的牛瘟已经基本消灭，猪瘟、鸡瘟、牛肺疫等的发病率也已经显著降低。农业生产的工具改革运动，几年来也有很大的成绩，创造了水稻插秧机等多种多样的新农具，到一九五九年底共推广了各种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五亿二千多万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不小的作用。在田间管理和精耕细作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各地人民公社都在大搞丰产方，大搞园田化。农民们说：埂直如线，地平如镜，深耕，密植，种子好，合理施肥，合理灌溉，精耕细作，灭草，灭虫，灭病，把大田种得象菜园子一样。从群众中来的“农业八字宪法”，又回到群众中去，成了农业生产的经典。此外，纲要提出的多种高产作物，提高复种指数，扩大耕地面积和办好国营农场，四年以来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纲要要求在十二年内建成的为农业服务的气象台站网、水文观测站网和地方道路网，也已经粗具规模，许多地方已经提前实现。

纲要关于在农村中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要求，几年来执行的结果，成绩也很大。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有一亿一千多万青、壮年摆脱了文盲地位，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三分之二。社办小学，队也办小学 农村小学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各地人民公社还办了三万多所农业中学，在校学生二百九十六万人，平均每个公社有农业中学一点二所、学生约一百二十人，这是进一步在农村中普及中学教育的基础和开端。人民公社还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和红专学校。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已经成为农民的群众性的活动。社办的农业科学试验研究组织，据十二省的不完全统计，有七千六百九十个，从业人员有三万八千多人。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全国性的农业科学试验研究网已经基本上形成。许多农业劳模，本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现在却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或者省分院（所）的研究员，成为农学会的会员，或者被聘到大学去讲学。农村广播网和电话网、邮政网，除了少数边远地方以外，已经基本普及。

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成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有口皆碑的，山西省稷山县和广东省佛山市就是基本上除掉了四害的县、市的典型。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纲要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消灭和积极防治的疾病，有的已经基本消灭和防治住了（例如天花、鼠疫等），血吸虫病的患者已经治疗了百分之七十，其他一些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纲要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实行五保等要求，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

的分配制度，大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产妇院和敬老院等等，实际做的已经超过纲要的要求。

总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年来实际执行的结果是：纲要的某些内容已经被实际生活所超过，有些要求已经基本实现，大部实现，或者在部分地区实现了，这是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主要是近两年来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之下获得的。有了这些胜利，就奠定了我们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是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还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没有达到纲要要求的水平。全国粮食总产量，在过去四年中共增加了一千九百零五亿斤，即从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增加到了一九五九年的五千四百零一亿斤。但是按照纲要要求的水平计算，全国粮食总产量应该有七千二百亿斤到七千五百亿斤，还要在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千八百亿斤以上，即增长三分之一以上。这还要尽很大的努力。达到了七千二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斤或者稍多一点，同过去相比，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还应当进一步为争取每人平均至少一千五百斤粮食而奋斗。棉花的产量要达到纲要的要求，同样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同样要在达到纲要要求以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在增产措施方面，我们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水利灌溉，修好了水库，并不等于按工程计算的灌溉面积都已经收到实际效益，还必须蓄上水，修好渠道，平整好土地，准备好提水工具，才能实际发挥效益，有的工程，特别是大型工程，在当年并不能发挥效益，或者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往往要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才能充分发挥效益。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提前实现纲要所提出的能够充分发挥效益的灌溉面积在十二年内达到九亿亩的要求。但是实现了纲要的要求，也还只能象纲要所说的“避免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努力。做了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也不等于完全控制了水土流失，种的树和草要成活了，根系铺开了，树冠长起来了，才能收到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的实效。植树造林到实现绿化也还有个很长的过程。很多地方种的树现在还很少。种上了的也还要成活，抚育好，长起了树冠，才能真正实现绿化。

纲要提出的基本消灭和积极防治的植物病虫害，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基本上消灭和积极防治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等方面的要求，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经常的、反复的努力。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一次扑灭，永不再生，而是除了又生，生了又要除的。

纲要要求，国家、集体和个人分别储备起足够一年到两年食用的粮食。在粮食产量没有很大的提高以前，固然可以储备一部分，但是要储备这样多则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修缮和新建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这是一定要办的事，但是，在最近几年，公社的资金还是应该主要用于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新建社员住宅只能逐步进行。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还要作比较长期的努力，来实现纲要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还是全体农民和全国人民要继续完成的重大任务，而要提前实现，就必须再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再苦战几年。而且，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不等于农业就完全“过关”了。我们要走的路还是长的，必须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引导下，鼓足干劲，努力奋斗，完成一个任务，就提出

一个新的任务，不断地奋勇前进。

三

人民公社制度是我们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根本保障。我们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历次决议，使人民公不断地健全发展，应当大力发展生产队的经济，特别要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和帮助，使它们逐步赶上富队，同时，在坚持三级所有制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社有经济。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但是，要实现这个前途，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了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为了创造这些条件，我们就必须坚持三级所有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坚持等价交换等制度。坚持这些制度，不仅有利于当前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建设，也利于将来的逐步过渡；不仅符合于人民群众当前利益的要求，也符合于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要求。

我们要充分利用人民公社统一安排生产的优越性，更好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每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适应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要求，在农业方面，以粮为纲，适当安排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类农作物的生产布局。在畜牧业方面，应当把现在已经形成的养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并且以养猪为首，发展养牛、养羊、养马、养驴、养骡、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养蜂。在林、副、渔业等方面，也同样应当分门别类做出适当安排。很好地安排各个方面的生产布局，就可以使整个农业生产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得到普遍发展，发展速度也就能够更快。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积极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已经成为全党全民的重要任务。我们一方面要在先进农业科学和生产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容一天天地更加丰富起来，使农业耕作方法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加速进行农业生产工具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力求提早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即已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实现以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从一九五九年算起，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这个进度比原来农业发展纲要所设想的要快得多。我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是有步骤的，从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又是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逐步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业方面的耕作、排灌、防治病虫害、田间运输和农产品初步加工等也都要逐步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各地条件不同，应当先在那些方面实行机械化，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机械机器，都必须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我国的农业又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因此，农业机械化还必须与“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措施相结合，与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从而使实行农业机械化的结果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机械化和园田化相结合，就是我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标志。

为了促进整个农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争取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在大型现代化工业要生产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同时，必须继续大大发展社办工业。人民

公社不仅应当办各种农产品加工工业，而且应当按照本地资源条件，分别举办采煤、发电、冶炼、化工等企业，生产土铁、土钢，制造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制造土化肥、土农药。人民公社还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公路和土铁路的建设。发展社办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就能够更好地执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能够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更快地改变农村的经济和文化面貌。

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必须广泛动员一切方面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加快农业的发展，这是高速度地、按比例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关键；我们的农业发展了，不仅轻工业更好办，而且重工业也更好办。同时，对于农业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对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又必须有工业和其他部门的支援。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不仅是几亿农民的事情，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事情，而且是各个经济部门，各个文化教育部门的事情，工业、交通、财政、贸易、金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部门，都应当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对本部门的要求和农业生产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制定规划，以便更好地支援农业的生产和建设。并且应当切实检查执行的情况，随时解决发生的问题。

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农村中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各部门对农业的支援，都是必须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做好的事情。因此，在这些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要完全做到以平等态度待人，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和群众完全打成一片，善于发挥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经常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分析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公社的干部要善于抓生产，也要善于抓生活，应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公共食堂问题是现在抓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到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已经办起三百九十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有四亿人，占农村人民公社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所以，办好公共食堂是有关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情。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比较好的，群众是满意的，但是，有的地方食堂办得还不够多，有一部分食堂办得还不好，要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继续大办食堂，办好食堂。公社各级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加强对食堂工作的领导，不只是把这个工作交给次要的干部去管。食堂的管理要民主，账目要按期公布，所有的食堂都要养猪种菜，要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保证吃饱吃好。人民公社的其他福利事业，也应当积极办好。有的地区正准备在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组织的基础上，大办综合性的生活服务站，这是一个值得研究推广的新经验。办好这些福利事业，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就更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

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不但一九六〇年能够继续跃进，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也能够争取持续跃进。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正在全国城乡各个部门普遍发展，必将一浪接一浪地不断高涨。在六亿五千万人民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集体智慧，一定能够在比十年更少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也一定能够在比十二年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的原定要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使我国农村得到更大得多的发展。

四

各位代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反映了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纲要在这四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起了推动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虽然在这四年间，我国农村发生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为人民公社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个纲要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还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完全实现，所以，它现在仍然起着，而且以后还要继续起动员广大群众的伟大作用。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原文，除了对“除四害”的一条作个别修改外，不作其他修改，由本次大会予以通过和公布，并且建议大会号召全体农民和全国人民为提前两年或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努力奋斗。

列宁主义万岁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七一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①

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阐

①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①。

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辩驳的真理。

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本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摩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复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

① 《新民主主义论》。

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

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百分之四十，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复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

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正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

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

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铁托说：“今年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①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复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一九六〇年的将近百分之六十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战的危险呢？

---

① 铁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隆格勒布的讲话。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

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末快，有多末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①。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②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③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一九一八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

①《打着别人的旗帜》。

②《第二国际的破产》。

③《打着别人的旗帜》。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①。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

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过：

>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的新发现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① 铁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隆格勒布的讲话。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①。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

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民群

---

①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之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约束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

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

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①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一九二〇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

---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①。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复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②。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③

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

①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②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③ 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①；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

① 见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一文。

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

在一九一八年六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②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

①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② 见伯恩斯坦的《济经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①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

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②

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③

因此，我们怎样去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

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④。

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⑤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

---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④ 《预言》。

⑤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①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恩格斯答：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末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②。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七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③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

① 《给欧美工人的信》。

② 《革命的任务》。

③ 《论口号》。

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①。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②。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

---

① 《军队与革命》。

② 《国家与革命》。

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①。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拚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一九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②。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②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的利益。”①

什么叫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次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

①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蠢或欺骗工人”①。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末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胜利的。

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②

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

①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②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①。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

---

① 《共产党宣言》一八九〇年德文版序。

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六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旗帜下，在社会主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

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

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

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

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

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

自从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根据现有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它证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基本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中央在上述两个指示中已经有所规定。总的来说，就是：“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犯有错误而不严重

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错误极为严重、民愤极大的人则应该坚决惩办。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好地发展，中央再提出以下意见，请各地注意掌握：

（一）必须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忠心耿耿，朝气勃勃，艰苦朴素，敢想敢干，并且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正是这些同志，带领了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完成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种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只有这样，在开展“三反”运动时，才能避免发生偏差，才不至使打击面过宽，才能不让坏分子乘机钻空子，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所犯的这类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类错误所以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进行这种斗争，这类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在这方面，同样也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把运动搞深搞透；必须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更迅速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进行坚决地斗争。但对于犯错误的人，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的轻重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目的是团结和教育极大多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根据已有的材料，犯错误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共产主义觉悟不够，在经济手续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某些毛病。虽然他们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但是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好同志，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坚决地积极努力的，作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工作的。在犯错误的干部中间，这类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贪污的情况为例，湖北有个材料说，犯有这类错误的人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他们平均每人贪污四十几元；贪污一百元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几，多数是二、三十元。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一般不要给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主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使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工作。另外一类，是犯有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这类人比前一类的人数少得多，大体上只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对这些人则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其中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

在运动中，必然会揭发出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的分子。这些人都应该一律清除出去，已混入党内的，应该清除出党。罪行严重的，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这次三反运动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人，处分的面一般不宜太宽，大体上以控制在百分之三以下为宜。其中受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逮捕法办的更应该是极少数。

（二）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需要进行“三反”检查的，应该是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和财贸系统的基层干部，特别要注意公社一级和公社直接经营的企业单位。对他们，“三反”运动应该以反贪污为重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铺张浪费也必须反，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什么反什么。至于没有担任干部职务的农村党团员，需要作检查处理的，一般只在党团组织内部进行，不在群众中公开批判。某些社员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也应该另选时机，通过正面教育，引导他们自觉改正错误，不要把它同“三反”运动纠缠在一起。

对于那些犯有贪污、多占、挪用等错误的人，各地在处理时，还必须注意以下的方面：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回，对贪污数量大或贪污行为恶劣的人还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补偿；计算的时间，除了少数严重的大贪污犯以外，一般的从一九五九年算起，而不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处分面的控制比例，分别规定，一般不宜过低，大体上以二百元、三百元为宜。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三反”运动范围内清算。

（三）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因此，“三反”运动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使它成为推动生产的力量。各地在开展“三反”运动时，都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由各省（区）市自行安排，中央不作统一规定。

“三反”运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进行，要有始有终，不要一轰而起，一轰而散。在运动中，应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以当地的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依靠贫农、新老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并且广泛地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应该尽可能运用原有的社员代表会议，社员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同时，在运动中必须坚决防止任何违法乱纪的作法，反对逼供信；严格禁止干部压制群众，打击报复；不许打人骂人或采用其他变相肉刑，来对待犯错误的人。

（四）必须了解，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为此，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定期地开展“三反”运动。同时，还应该订立必要的制度，以加强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并且在工作中，加强群众性的监督。中央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地、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防止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此外，中央还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贯彻执行下列的规定：

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各级机关和党的组织，除招待外宾外，都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在最近几年以内，所有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得盖大礼堂、办公楼、招待所或进行其他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保粮，保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我国的粮食生产，十年来一直是上升的。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两年的粮食产量，按最近核实的数字计算，增产的幅度也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九年遭受到大面积的空前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今年又有五、六亿亩农田连续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和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损失，今年的夏季收成大体维持去年的水平，或者稍多于去年。事实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当前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是很好的。对于这个主要的方面认识不足，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的指标偏高，估产不实；又由于粮食消费安排得不好，主要是用粮计划太高，管理不善，浪费不少，前松后紧，“前方吃了后方粮”；因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而且，应该指出，今年的夏收已经到手，但是，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没有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粮食生产，并且做好粮食的征购调运工作，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发生严重的粮食问题，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计划的完成。为此，中央要求：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解决农业劳动力紧张的根本办法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应当加紧实行，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目前农业生产还几乎完全是手工劳动。由于两三年来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批劳动力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或者搞短途运输，一般是需要的，合理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又由于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战线拉的过长，占用的劳动力过多；社办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用人过多，又事事强调专业化，不按照农事忙闲灵活调配劳动力；财政贸易、生活服务、文教卫生和行政管理人员过多，脱产的青少年学生增加过猛；再加上强弱劳动力的搭配使用又有很多不合

理的地方，结果，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质量也降低了。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办法是：立即从县和人民公社着手，充分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实行精减，该停办的停办，该缓办的缓办，该减人的减人，该调换的调换（以女代男，以弱代强），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切实整顿县社工业、精减人员，一切县社工业都应当真正做到为农业生产服务。县社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的以外，一般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这才是最合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县、社办的文工团和球队等等，脱产的一律停办，业余的在农忙季节也一律根据需要可停止活动，全力搞农业生产。县以上各级办的文工团也要大减，文艺会演在两三年内停止举行。农村学校应当放农忙假。农业中学不要发展过快。农村小学根据需要可采取二部制。能够参加辅助劳动的少年，在劳动力紧张的地区，应当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已达劳动年龄的超龄小学生都应当回到生产岗位，参加业余学习。同时，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了，合同工和临时工应该精减一批回农村生产，运输砖瓦沙石占用的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都应该大减，常年的基建队伍也要精减，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在两三年内，各行各业都不允许在计划外到农村中私自招人，应当在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增加生产和新建厂矿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且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派到农村中去。中央、省、专、县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必须大刀阔斧地精减。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格控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首先从精减的职工中解决，不足之数，秋收以后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农村中临时调用一批。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除了为建立少数大豆、棉花和橡胶基地所必需的以外，一般暂停几年。总之，必须从城乡，从公社内外，尽可能地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根本讲，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同水旱灾害做斗争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上，水利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这应该首先肯定。水利建设一定要搞，但是，一定要分期分批，讲究质量，讲究实效，并且要同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统一安排。去冬今春水利战线拉的过长，三百个大型工程同时上马，材料分散使用，人力物力都来不及，许多工程搞了一半，有的主体工程完工了，不配套，不能发挥灌溉效益；还有少数工程因急于抢修，质量不好，被洪水冲垮了。这种做法并不是多快好省。而且，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七千万人，既增加了粮食消费，又影响了冬季积肥和田间管理，甚至到农忙季节，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还下不来，影响了春耕播种，影响了当前的粮食生产。基本建设必须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这一点，在农业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饭是天天要吃的，绝不能单纯强调水利等基本建设，而削弱当前的粮食生产。因此，中央决定，在今冬明春的一百天中，调离本包产单位、不在本食堂吃饭的参加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民工，全国总计不许超过一千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而且，续建和配套工程也要先后排队，能够早发挥效益的尽先施工，不能一齐都上。不脱离本食堂和本包产单位的施工力量，也要适当控制。公路、航道、土铁路等等基本建设，都必须按照同样的精神坚决压缩，在今冬明春的一百天中，上工人数最多不准超过三百万人，工程项目也要按轻重缓急排队，不能齐头并进。非生产性的农村基本建设，一律坚决停止。

（三）鼓足干劲，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现在正是大秋作物

的盛长期，田间管理的好坏在秋季收成影响甚大。锄草、除虫和追肥，是当务之急，必须集中力量抓紧进行。草荒现象必须消灭。大力开展夏季积肥运动，保证秋收作物的追肥，准备秋冬播种的基肥。商业部门应该协同工业和外贸部门把计划供应的化肥尽快地调拨下去。局部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另一部分地区又遭到涝灾和台风的袭击，必须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保证秋收。无论在遭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要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抢种荞麦等晚庄稼和秋菜，尽可能地减轻和弥补灾害的损失。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秋收、秋耕和秋冬播种的准备工作，广泛动员群众，认真讨论三秋工作的安排，按生产队按地块落实。安排好劳动力，准备好工具，保证精收细打，颗粒还家。还要准备好秋冬播种的种子和基肥，真正做到随收、随耕、随种，不违农时。必须估计到，今年秋收以后，将不得不抽调一批劳动力突击运粮，所以，更要及早做好三秋的准备工作，统一安排好三秋和运粮的劳动力，保证做到两不误。秋冬两季，各地就地开荒必须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多占地、早占地、占好地的现象必须制止。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保证明年春播用地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秋冬播种，多种一季。必须认识，就明年来说，小春和夏粮的丰收，对于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渡过粮食困难，关系特别紧要，所以，今年秋冬播种，特别是冬麦和夏收杂粮必须多种，种好，种得适时。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

（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烟、麻、糖等主要作物的集中产区，必须尽力增加这些作物的产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农业的“十二个字”要统一安排。林牧副渔也要发展。当前正是种植饲料和采集野生饲料的大好季节，一定要抓紧时机，大搞饲料，储藏青饲料，发展畜牧业，发展猪、羊和大家畜，特别是养猪积肥运动必须继续坚持下去。积极多种瓜菜，搞好副食品生产。还要做好准备，开展一个比去年规模更大的“小秋收”运动。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副业生产，今年冬季应当比往年搞得更多更好。这既有利于稳定市场，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也可以增加公社的收入和社员的收入。增加社员收入，也就更有利把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农业生产上。

（五）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应当成为全体干部全党全民一致的认识，并且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国家计划指定用于农业的钢材，应当由农业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掌握，不许挪用。尽可能地迅速提高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小合成氨厂的设备制造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制造农药和生物药品的重要原料也要列入国家计划，按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基础上，按照自觉自愿和不降低待遇的原则，动员一批技术工人下乡，把农机具的修配网迅速地建立起来，帮助农业技术改造，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在市委的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援农业，为农业、为粮食生产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的安排上，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妨害粮食生产的事，都必须禁止。

（六）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安排粮食，必须从六亿几千万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他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只有

如此，才能既保证吃好用好，又节约粮食，留有余地。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城乡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有调出粮食任务的省区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种子、口粮和饲料等留粮也必须落实，保证按低标准留够。国家、集体和个人，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三者的需要都必须落实。

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应当由基本核算单位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全面管好。积极办好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公社和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增产节约的粮食，也归社队储备，鼓励社队增产节约，储粮备荒。丰收地区，更要反对浪费粮食，努力增加粮食储备。食堂必须有自己的菜地，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菜吃。食堂必须养猪，每十人最少养一头。

城市人民生活也必须妥善安排。今明两年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因此，除了必须向城市人民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外，各城市党委还必须注意加强各伙食单位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尽可能地节约用粮用布，并且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解决一些副食品的困难。大的厂矿、机关、学校，应该有一个副职人员或者党委负责人管理生活。城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社办福利事业，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发展，不要一下子发展过多，以免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

（七）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须出口粮食按时供应。要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决不允许发生粮食脱销现象。必须努力做到，大中城市经常保持三个月，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周转库存。要求在征购粮食的同时，有计划地把准备外调的粮食集运到交通沿线。在今年秋收以后，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短途运粮运动，事先安排好人力、畜力和运输工具，到时候突击运输，保证粮食调运任务的及时完成。粮食部门要事先安排好粮食调运计划，并且对于粮食外调任务大而运输工具又很困难的地区，在运输工具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援。

（八）要保证搞好粮食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还必须坚决肃清官僚主义，首先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村中的“五多”，主要是从上面来的。表报已经成灾，有的公社甚至要用几十个人专填表报。开得好的现场会议本是一种好的领导方式，开得过多，则势必流于形式。有许多现场会议无准备，无领导，到会人数过多，大吃大喝，欢迎欢送，变成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典型，必须坚决纠正。不深入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徒尚空谈的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各级领导机关和农业部门，都要紧紧抓住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重点产区，首先是粮食的重点产区，了解它的情况，帮助它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各级干部都必须到第一线去，深入田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于生产领导的好坏，第一是不妨害下面，尽量不占用农作时间和睡眠时间；第二是帮下面的忙，要帮得好，帮得是“火候”，帮在“刀口上”，就是说，及时地帮助下面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就是好的领导。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在五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认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把劳动力组织好，使用好，做好秋收分配，继续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把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证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一定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保证粮食不脱销，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并且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出现粮食严重紧张的局面。中央尖锐地指出当前粮食困难的严重性，同时指出这种困难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大好形势对于搞好农业生产是十分有益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不松劲泄气，继续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更多地增产粮食，把人民生活安排得更好，更有力地支援工业，更好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证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继续跃进。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四日）

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国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李富春同志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意见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意见，各级党委应该立即根据这两个文件迅速地切实地布置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使所有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部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事业都在继续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钢、铁、煤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完成了全年生产指标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在去年的特大灾害之后，今年又遭了严重的旱灾和部分地区的水灾，但是由于全体农民的艰巨努力和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仍然取得了抗旱抢种的巨大胜利，并且使夏季作物保持或者略为超过去年的产量。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出它的优越性。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在稳步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增产原料、材料和燃料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们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在我们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年第二季度，在二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十八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十一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造成工业生产有某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

领导干部在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情况下，产生了盲目乐观和松劲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和一部分的工业力量，投入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影响了一部分小土群、小洋群的工业生产。由于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放松了生产管理工作，一部分生铁、转炉钢、煤炭等产品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不断发生。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不少地方、部门违背了中央多次强调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战线拉得过长，人为地造成了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没有在各个部门全面地认真贯彻，而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又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因此，完成今年农业生产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如果今后水旱灾情继续扩大，而我们的工作又没有充分抓紧，农业收成甚至还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此外，在连续取得两年大跃进的胜利之后，我们一部分干部中滋长了一种盲目乐观、不重视具体困难、不深入下层研究具体措施、不及时抓紧和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不良风气，滋长了一种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一部分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也有所增长。以上这些困难和缺点，虽然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但是，如果不认真努力加以克服，今年粮钢生产指标和其它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的增产问题。目前粮钢的供求之间的矛盾是很紧张的。在连续两年的大跃进中，粮食的产量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凡是能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紧张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建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一般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增加，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农业基本建设队伍用粮增加，种籽、饲料等也增加很多；特别是全民用粮计划定得太高，加以管理不善，前松后紧，浪费不少；因此，粮食供应仍然十分紧张。两年来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上，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钢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粮食”。因此，必须首先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保证粮钢的增产，并且厉行节约。这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地鼓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反对盲目乐观和右倾松劲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踏踏实实地、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除了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中央另有指示外，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方面，应该作好下列工作：

（一）立即发动群众检查今年前七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讨论今后五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和实现这些指标的具体措施。工业方面，必须把国家分配给各单位的具体计划告诉职工群众，使每一厂矿、车间、高炉、转炉、掌子面的职工，都在最近期间定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每月、每旬以至每天的具体指标和完成这些指标的具体措施，并且保证实现。这种讨论，应该包括产量、质量、品种、降低成本、安全生产等五方面。交通运输方面，也要使每一铁路局，每一车务段、车站，每一公路局、汽车站，每一航运局，每一条轮船，都要进行同样的讨论。经过群众讨论定出的指标，必须是积极的，又是实事求是的。总之，我们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要经过这次讨论，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发动起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首先是钢、铁、煤和运输的计划。

（二）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近两三年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广大工农群众干部、技术员作出了大批极有价值的创造发明。过去对这些创造发明虽然做了许多总结和推广的工作，但还是很不够的。在这次增产节约运动中，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用领导同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整理、审查和鉴定，把那些对于解决当前生产关键有直接作用的、收效最大的、和有普遍意义的革新项目，加以总结、提高，使之系统化，迅速普遍推广。对于那些还没有定型的、目前还没有把握确定能够收效的、或者原料材料还不能保证供应的项目，不要贸然推广，应当继续加紧典型试验，以便决定是否要加以推广。我国广大群众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花朵正在盛开，我们应当努力收获更丰硕的果实，使它在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

（三）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都要在省、市、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目前基本建设项目安排过多，生产任务层层加码，拉长了战线，分散了力量，推迟了许多建设项目投入生产的时间，推迟了许多国家计划内的机器设备制成交付使用的时间，积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能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少慢差费的错误作法，是不符合总路线的要求的。因此，必须坚决执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的方针。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排队的原则，是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先采掘工业和材料工业，后加工工业，先计划内的，后计划外的。一切非生产性的建设，除职工宿舍和一部分学校的基本建设外，今年下半年都不得开工。城市人民公社企业，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有步骤地发展，不要贪图在今年一年内上马，并且应该多多注意发展服务性行业，以免使国家计划内已经感到不足的原料、材料、设备、动力和运输力，又被分散使用，并且过多地增加城市购买力。否则就是不利于贯彻缩短战线、打歼灭战的方针的。不论生产或基本建设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包括中央直属企业和地方企业，全部由省、市、区党委按照国家计划统一进行分配和调剂。以物易物之风必须坚决制止。今后凡发现有在国家计划和省、市、自治区协作计划以外带料加工和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类物资应当经省、市、区党委审查、批准，由地方主管部门加以没收，统一支配。只有实现了以上的措施，我们才能真正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真正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

（四）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厂、矿山、车间去，到矿井中、高炉旁去，到交通线上、车站、码头上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参加和领导生产。基层干部要规定一定的时间深入群众，和群众一起商量问题，解决问题。中央各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应当深入到重点厂矿企业单位，协同地方党委和厂矿企业党委切实解决具体问题。那种浮在上层、不深入下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切实了解情况、只讲空话、不认真总结经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立即坚决地加以改变。

（五）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近年来企业、事业中非生产人员增加很多，很多行政机关和企业管理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必须在这次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加以精简。工厂、矿山中的直接生产人员，也要力求精简。县办和社办工业必须加以整顿，节约劳动力。精简下来的人员，应该组织起来，加强粮食，钢铁生产战线。基本建设中、生产企业中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凡可以精简的都应该尽量精简下来，回到农村生产中去。这样作不仅有利于增产节约，而且可以改进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的恶劣作风。

（六）加强企业管理。一切生产企业都应当根据国家需要和订货合同所规定的产品的品种、规格和数量、质量，具体安排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要努力挖掘潜力，增加生产，降低原料、材料的消耗，节约人力，降低成本，并且纠正那种片面追求产值的现象。特别要注意突破科学尖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弥补缺门。如果只完成产值指标，而产量、质量、品种、规格不能按计划完成，这不仅不能算做是完成计划，而且要受到批评。要保证正常生产，要按时检修设备，要注意生产安全。为了加强企业管理，应当认真地建立和健全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于确实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经过群众讨论后修改或废除，对于原有的规章制度，要加以分析，不要轻率的废止，已废止的合理规章制度，应该恢复。

必须指出，管好群众生活，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厂矿企业的党委和行政领导，必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否则就不可能是好的领导。各厂矿交通运输企业领导必须注意劳逸结合，保证职工劳动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应当向职工群众反复说明，虽然两三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跃进，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是由于我们的底子薄，要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我国人民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勤克俭，战胜暂时的困难。特别是今年，因为自然灾害又比较严重，为加速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出口任务也比较繁重，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还相当紧张。因此各厂矿、企业必须充分发挥本单位的积极性，搞好副食品的生产，利用一切空闲土地，多种瓜菜和饲料，多养猪、羊和家禽，并且办好公共食堂，在注意节约的原则下尽可能使职工吃饱、吃好、吃得干净卫生。对于从事高温、高空、严寒、井下作业或其他特别繁重劳动的职工，应当特别注意保证他们的营养。为了管好职工生活，各厂矿、企业应当指定一位党委副书记或副厂长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工会组织也应当在党委领导下发挥积极的作用。

（七）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今年上半年物资调拨计划完成得很不好，随便动用国家物资，不执行国家调拨计划的现象很普遍，这对于保证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全国一盘棋是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根本原则，决不容许破坏。为了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除了在计划中要注意全面安排，注意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打得过满过紧，要留有余地以外，要求各部门和各地区加强全局观点，先整体、后局部，反对本位主义。必须指出，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为了保证国家计划完成，应当忍受某些局部困难。只要国家计划完成了，局部困难是容易解决的。为了局部利益而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势必使整体和局部的困难都更难解决。所以，一切本位主义都是极端错误的，都必须立即坚决纠正。

（八）所有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进一步加强支援农业。国家规定拨给农业用的原料、材料，一律不得挪用。支援农业的机械设备，如排灌机械、拖拉机、牵引农具、喷雾器、化肥设备等（包括配套设备和配件），务必按计划如期制造出来并且运送到农村中去。各工矿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之间的协作，应当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特别要注意帮助农村培养技术力量，解决修理农业机械的困难；但是物资、器材必须根据计划调拨，并且做到等价交换，不得私相授受，劳动力也不得随便调用。

（九）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在发动群众讨论增产节约计划的基础上，凡是生产条件大体相同的工厂、矿山、车间、高炉、班组，以及车站、码头、轮船、汽车等生产单位，都要组织竞赛，定期进行评比，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使一般的和落后的生产单位能够

迅速赶上先进单位，把整个生产水平提高一步。这一竞赛不仅要收到增产节约的实际效果，而且要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大发扬勤俭建国的精神，进一步养成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的社会风气。竞赛中要大大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反对锦标主义，反对互相封锁、互相制造困难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现在已经是八月，今年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是紧迫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立刻行动起来，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保证在八、九两个月内钢产量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在第四季度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攻击和阻挠，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的义愤，使全党全民鼓起更大的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革命干劲，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成绩。中央深信，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团结一致，展开一个空前规模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本指示发到所有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并由党委在全体党员和群众中进行传达、动员和组织讨论，立即把群众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

中央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四川省委送来的《周颐同志关于南部、仪陇两地农村劳动力问题和“三反”情况的电话报告》和《南充地委、温江地委关于农村公社浪费劳动力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至县委，要他们仔细阅读，切实研究，如果本地也有类似现象，就应该象四川那样，派出专门的小组到公社去，加以检查和督促，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千万不可迟疑不决。

四川这几个材料说明，县、公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是极为严重的，甚至生产队本身也把许多应该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过多地使用于其他方面。四川省委和地委找到了这个窍门，进行了调查和清理，结果：在五十万人口的仪陇县，就可清出约四万人（约占全县总劳动力百分之十五以上）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南部县建兴公社就可挖出占全公

社总劳动力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郫县友爱公社在调整前，生产队一级使用的劳动力只有三千零三十五人，调整后增加到三千六百四十四人，即在农业第一线所增加的劳动力，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从这几个典型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没有希望的。

四川的材料还揭穿了一个“秘密”，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认为农村活路重，生活苦，场镇劳动轻松，又能拿现钱，便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农村劳动”。“场镇浪费占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基层领导干部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和舅子、老表、亲戚朋友，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使自己家庭生活舒适，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把他们的家属从农村搬到场镇，安插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逃避农业生产”。因此，“从这次清理劳动力的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指出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扫除某些干部包庇自己亲戚朋友逃避农业生产的障碍。上述这些分析是很生动的，是很正确的。中央还要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中，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形成一种特殊阶层，干部包庇亲戚朋友，安置较好位置，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的一种，也就是官僚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千万不要忽略在其萌芽时就要不断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不可任其滋长。

四川解决农业第一线劳动力的斗争，是结合农村三反进行的，其他各省区也可以结合三反进行，也可以先对农业第一线劳动力问题作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结合三反作深入的解决。总之，清出一切可能的劳动力去加强农业生产，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

（附件略）

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北方早秋已经开始收割，南方早稻和早熟杂粮已经收割完毕，中稻也接近收完。九月下旬和十月是北方地区进行三秋工作特别是大种冬麦的最忙时期，各地必须立即集中力量做好三秋和农产品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切实安排好全年的生活。有关国际问题的传达、学习和讨论，如果来不及开始和结束，可以推迟到秋收、秋耕和秋种以后再来补课。

（二）今年夏收以后，还有很少数的地方，生活没有安排好。据中央财贸部第二十五期工作简报反映，河北省新乐县灾区夏粮估产偏高，征购以后，留粮不足。又据新华社八月卅一日和九月二日的内部参考反映，山东某些地方在麦收以后，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在夏收以后仍然出现这种严重问题，是极不应该的。据我们所知，夏粮估产偏高、留粮不足、偷青吃青、人口外流的现象，在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也有发生；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在个别地方也发生过。发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主要是对灾区的灾害损失估计不足，估产偏高，留粮不落实，开始夏收时又多吃了一些，因而口粮接不上秋收了。今年夏收，绝大多数基本核算单位的估产是接近实际的，有的可能偏低一点，按照他们的估产来分配粮食，征购粮、种子、口粮和饲料都能够落实兑现。问题在于某些县和公社，特别是连续两年的重灾区的某些县、社，他们不听基本核算单位的话，主观主义地高估产量，结果粮食安排中的各种毛病和后果就不断出现。虽然在全国说来这是极少数的地区，在一个省来说也是很少数的县、社。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检查有无这种现象，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不容丝毫忽视。

（三）各地在安排全年生活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今年全国粮食生产的总情况：由于春旱严重，受旱面积有六亿亩，有的是从去冬以来一直干旱；入秋以来，部分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或者发生秋旱，另一部分地区又发生洪涝灾害，水灾面积达到一亿二千万亩；再加上虫、风、雹灾，全国总计，全年受灾面积达到九亿亩左右，其中减产三成以上的成灾面积约在三亿亩以上，比去年大得多，给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看来，某些省区，粮食势将比去年减产。全国夏收粮食和早稻的产量，包括春小麦在内，比去年还少一点。全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可能达不到北戴河所估计的四千五百亿斤（自留地等零星土地收获不包括在内）。面对这种情势，各地必须继续努力防止松劲，抓紧后期的田间管理，丰收区要力争更大丰收，灾区要力争弥补损失，减少损失。

正由于灾害的损失，夏粮征购和粮食销售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夏杂粮的征购超过一点，小麦的征购差得较多，从七月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征购粮入库一百三十九亿斤，比去年同期的一百九十亿斤减少五十一亿斤；在同时期内，销售一百五十二亿斤，比去年同期的一百三十九亿斤，增加十三亿斤；一出一入为六十四亿斤，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百亿斤（包括六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在内）。辽宁省要求增加粮食调入的数量，个别重灾省不仅不能调出，也要求调入一点。因此，全国必须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要求农村少吃，城市也要少吃，丰收区少吃，灾区更要少吃；灾区减少征购任务，丰收地区则必须多购，各个丰收的省分要比在北戴河所商定的全国上调粮一百九十亿斤的总盘子中所分摊的数量更多调出一点；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歉收省分的任务，而又保证上调粮一百九十亿斤任务如数完成。同样，在一省，一县、一社之内，都要实行丰收的单位多购一些原则，支援灾区。

（四）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的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原粮三百八十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四百斤。在吃的时候，还要厉行节约，应当采取湖南的经验，一年的粮食分做十三个月吃，以免在明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食紧张，使大家有备无患。凡是超过四百斤标准的要降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粮较多地区的商品供应工作，以便把余粮更多地卖给国家。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各地社办企业的职工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口粮应当同本社一般农民的标准完全一样，不能提高。如果全国农村不照这样做，丰收的地方不能多购，遭灾的地方又要多销，结果势必一方面完不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另一方面又突破粮食的销售指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在粮食工作上就一定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并在政治上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求全党立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些省区对农村口粮标准的安排是比较克己的，另一些省区则标准较高，必须下降。

当然，在农村中，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口粮，是完全必要的。在粮食安排中必须保证这种最低标准的落实。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零点八市斤原粮（全年合二百九十斤），加上二斤到二斤半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希望各地党委都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粮食安排的依据。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某些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分口粮。县级党政机关和社队的干部都应当同当地农民吃一样多的粮食，以身作则，带头压低口粮标准。社队干部必须在公共食堂入伙，干部小灶必须撤。在压低口粮标准的时候，这样做是尤其重要的。

（五）在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同时，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认真加以整顿，坚决消灭浮支冒领，取缔“黑人口”。城市近郊区和一般农村的口粮标准，差别不能大；远郊区应当向一般农村看齐。压低城市人口粮食供应标准的具体办法，由粮食部另行拟定。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机关正在带头节约用粮。

（六）实行压缩城乡粮食供应，必须走群众路线，做政治工作。在城市居民和职工中广泛进行口头的宣传教育，说明今年灾荒的损失、压低城市粮食供应、支援灾区的道理，说明城乡团结、工农联盟的大道理。在乡村中，特别要宣传以丰补歉，支援灾区，并且要把压低城市粮食供应这件事向农民讲清楚。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压低口粮标准的教育时，都必须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结合起来，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既讲清楚生产的增长，又说明灾情的影响，说明粮食生产的增长虽然还赶不上大多数人生活提高的需要，但是只要安排早，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仍然可以过的不坏。一九五七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三千七百亿斤，而日子过的还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在宣传解释工作中，应该注意提高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避免引起群众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怀疑和误解。尤其要防止松劲泄气的右倾思想的滋长。

最后，再重说一遍，各地应当抓紧全年生活的安排，通过全年生活的安排，带动三秋工作，首先带动当前的田间管理和新粮的收购工作。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

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望即遵照执行。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各地都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在全国四十四万名右派分子中，摘掉了约四万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左右，这对于右派分子的改造和分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半年来，各级党组织对改造右派工作的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右派有了更大的分化，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和悔改。根据各地摸底排队的情况，目前右派分子改造得好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表现一般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表现不好的百分之十左右，其中死顽固的分子约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为了进一步改造和分化右派，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分期分批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根据目前右派分子的表现，今年可以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

关于今后摘帽子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一般仍以每年国庆节前后集中地摘一批为宜。这样作，政治影响大一些，也便于安排工作。

二、在今年摘帽子的同时，对于一部分虽然不够摘帽子条件，但是参加体力劳动时间较长（已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并且悔改表现较好的，可以调他们回来，分配适当工作。对右派分子中的妇女和年老体弱、有病的，由于他们不适宜搞重劳动或长期体力劳动，也应该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或作轻微的劳动。这样作，既体现了党对他们的照顾，有利于改造和分化他们，也有利于进一步团结中间派。

三、要注意对右派分子的家属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并给他们以劳动生产的机会。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给以适当照顾。这样，可以使她们成为推动右派分子改造的助力。对于右派分子的子女入学、就业等，除机密的专业、单位外，不宜限制和排斥。

四、在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被开除公职或清洗回家的（约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目前还分散在城市街道或农村中，对他们的教育改造缺乏统一的系统的管理，希望各地区的主管部门协同所在地区的基层党的组织，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没有人管的，要指定专人管起来。各地党委应该责成一定的组织经常管理这项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监督。

五、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后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同时要注意克服和防止两方面的偏向。一方面是对右派分子丧失警惕，麻痹大意，界限不清，放松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是以简单生硬的方法对待，忽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与地、富、反、坏分子等同对待。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改造分化右派。

六、一九五七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反右运动，有一些人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另有一些人戴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帽子。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经过两年多的教育改造，也有少数人确有悔改，在摘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可以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参照具体情况，摘掉他们的帽子，以利进一步分化和改造他们。

我们希望各级党委抓紧时机，对改造右派分子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并通过检查，作好第二批摘帽子的准备工作。关于摘帽子的情况和对右派工作的经验总结，望各地及时送我们。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审查，如可行，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有计划地安排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

我们在九月七日起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文教书记、宣传（文教）部长和中央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约七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中讨论了即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

会议用四天时间阅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三天时间进行座谈，由陆定一、康生、陈迫达、田家英、许立群等同志就有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讲了话。会议最后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毛主席这本著作，读起来十分亲切。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把中国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究竟采

取革命的路线，坚决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反动派，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丢掉人民的胜利果实，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投降，这是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后来我们能否夺取全国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采取了革命的路线，使得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录，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好的教科书。大家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发生极其深远、极其广大的影响。它不仅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加强全党团结、发扬埋头苦干、勤俭建国的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认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本著作，必须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必须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极其曲折复杂的斗争中，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必须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着重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学习方法上，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会议认为，在宣传和学习时，还可以分别研究以下的一些专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关于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反革命武装力量；关于反动派的本性和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打倒反动派；关于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的敌人；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会议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四篇文章可以作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纲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大事。会议认为，必须积极宣传，写文章，做报告，号召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报刊发表的文章应力求有较高的质量，重要文章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审查。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后，应当召集报告会，由负责同志做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报告。学习方法应该多种多样，主要是自学。所有做宣传理论工作的干部（包括新闻工作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都一定要认真学好。各省、市、自治区还可以集中一部分理论宣传工作的骨干，举办短期读书会。在职干部、党校、高等学校和军队等系统和工农群众的学习办法，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由于目前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极为紧张，在布置学习时务须注意妥善安排。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〇年九月）

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好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他仗就打不好。

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原子弹、炮弹打过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进攻时，能上去占领阵地，才能取得胜利；防御时，能顶得住攻击，才能打垮敌人。这是决定胜利的关键问题。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重视，但是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掌握精神原子弹，只有我们办得到，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政治可以管人，思想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队就可以搞得好。毛泽东同志创建军队，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军队建立在政治基础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觉悟，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那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共产党要把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就要在群众中进行思想工作。政治部的主要部门是宣传部，宣传部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现成书本上没有的，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这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都作了透彻的说明，思想工作，主要是抓活的思想，抓下面的思想动态，按照党中央的思想来布置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回答问题。

政治工作要使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达，不要梗塞。要像打仗一样，集中兵力，突破口子。现在就是从政治工作领域内突破思想工作这个口子，使政治工作提高一步，做得好上加好。

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在把《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文件中所提出的关于农村人民生活的安排、劳动力的安排，冬季运粮、分配工作、当前农业机械化的措施、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整风整社和加强基层领导等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不仅对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适用，而且对全国各地都有参考价值，请你们加以研究，并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拟定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计划。

自从大跃进以来，我国农村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基本的方面，是事物的主流。但是同时，随着工作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认为，各地在今年冬季，除了应当注意休整民力，进行冬季生产，抓住副业生产，运粮工作和准备明年春耕生产等等之外。还必须继续完成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学习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学习主席在两次郑州会议、在去年四月和今年六月两次上海会议、在今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学习保粮保钢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两个指示。以上述这些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为武器，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清洗混入我们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务必做到，通过整风整社，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端正作风，贯彻政策，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彻底搞好，把农村必不可少的制度建立起来。其目的，在于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战胜目前的暂时困难，顺利地渡过灾荒，争取明年夏季大丰收，争取明年全年的大丰收。归根结底，在当前农村中，必须贯彻执行政策，切实整顿作风、整顿队伍。真正做到了这几件事，就会发挥无比强大的力量，暂时的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明年的丰收就有更多的保证。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

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

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从九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谭震林同志主持。这次会议，检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的情况，研究了当前的秋收秋种问题，并对农村人民生活安排、劳动力安排、今年的分配工作、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整风整社和加强基层领导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在讨论中所提出

的主要意见如下：

五省市今年农业生产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约占播种总面积一半以上。五个省市各级党委依靠人民公社，发动了广大群众，经过艰巨的抗灾斗争，预计今年的粮食总产量仍可以和一九五七年相仿。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严重灾害的影响，总的说来，今年的粮食情况是相当紧张的。根据预计，这五个省市今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最低的不到四百斤，最高的也只有四百四十多斤。同时，据气象预测，明年上半年仍可能有较大的旱情。因此，要安排好人民生活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为了继续发扬群众的革命干劲，保持饱满旺盛的劳动热情，以便在明年，即使春季遇到象今年一样严重的灾害，也能争取到比任何一年更大的夏季丰收，并且进一步争取到全年的大丰收。这就需要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并且切实作好明年的各项生产准备工作，五省市应该根据上述的精神和要求，对今后的农村工作，作适当的安排。

一、关于农村人民生活安排：

总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力争明年春季比今年春季过得好，而且好得多。只有搞好生活，才能真正搞好生产。今年各省市对生活安排都抓得早，抓得紧，只要继续抓紧，一直抓到明年麦收也不松劲，实现上述要求是完全可能的。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是：

（一）按照中央九月七日的指示，压低口粮标准。这样做是不会出危险的，关键在于粮食产量和群众口粮落实。粮食的分配产量必须以基本核算单位过秤入仓数为准。群众口粮要按照规定的低标准留足，也必须过秤入仓，并且把十二个月的口粮作十三个月安排。大队为主，小队参加，群众监督，共同管理。切实做到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规定每月的吃粮计划，不得超过。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明年春耕生产时，明年麦收时，群众仍有足够的口粮，避免麦收前吃青的损失。

（二）大种蔬菜。要在全年的各个季度连续抓紧种菜。除了力争秋菜丰收外，今年冬季还应当根据可能在麦田间作油菜、菠菜。要注意留菜种，要为明年种春菜准备好足够的种籽。要及早动手储备干菜。

（三）大搞代食品。凡是能够利用的家生和野生植物，包括秸、茎、果、根、叶等在内，都必须收集起来，除留下必要的饲料、燃料外，全部制成代食品。除了极少数必须调出的大豆、花生、芝麻以外，豆饼、棉饼、花生饼、芝麻饼在农村榨的应当全部留在农村，在大城市榨的也应当把绝大部分拨给农村使用。这不仅是很好的肥料和饲料，也是很好的代食品。

（四）切实办好公共食堂。加强食堂管理工作，堵塞各种漏洞，保证社员吃到规定的口粮。根据可能，组织捕鱼、打猎、采集野生植物等活动，力求在节约粮食的基础上吃得好一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闲时少吃粮食的目的。

充分发扬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是团结群众、渡过灾荒最有效的办法。所有在农村的干部，包括县委在内，口粮标准必须和农村一样。地委以上，包括中央机关在内，也应当降低供应标准。必须严禁任何干部采取“走后门”的办法，取得特殊供应。

（五）在今冬明春，必须划出一百天时间，在农村严格实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积极措施。因为经过三年苦战，去年和今年又连续遇到了严重灾荒，所有劳动力都需要有充分的休息，以便有更充沛的精力，进行春耕生产，迎接争取明年大丰收的战斗。同时，人民公社建立以来，各项制度的建设还不够系统，不够完整，有必要

利用今冬明春农闲时间，充分发动群众，经过群众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各项制度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这样，将使明年的农业大丰收获得更为可靠的保证。对于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五省市应当作出具体规定，并在食堂普遍张贴布告，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决保证执行。

半日劳动制度的要点是：每日午前劳动四小时，最多不得超过五小时，午后休息。在休息时间内，除有关三反整社、制订生产规划和四定的会议外，其它任何群众性的会议都不准召开。每天开会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两小时，在重灾区不得超过一小时。其余时间，由社员自行支配。在这一百天内，不进行民兵训练和体育比赛。

水利专业队和短途运输专业队也必须搞好劳逸结合，保证执行八小时劳动、八小时睡眠的制度。

在这段时间内，也必须给牲口以必要的休息。

（六）今冬明春要普遍开展群众性的保健运动，要突击治疗疾病，对体力虚弱的人进行体格检查，同时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二、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

近三年多以来，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力减少了许多，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工业建设迅速发展，必须多用一些劳动力；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也浪费了一些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则是由于农村水利等基本建设、县社工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占用劳动力过多。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之后，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已经从各个方面压缩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上来，目前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正在不断增加，情况正在继续好转。但是，要确保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力，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并将其稳定下来，坚持三年不变，仍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同时还需要努力作好一系列的具体工作。

（一）必须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在农忙季节，从每年四月到十月的七个月时间内，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必须用于种植业。其它各方面占用劳动力的比例，大体如下：社办工业性的短途运输为百分之五，林、牧、副、渔为百分之五，文化教育、生活福利为百分之十。上述几个方面，合计为百分之二十；在这个范围内，每个方面所占的比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适当调整。在农闲季节，从头年十一月到下一年三月的五个月时间内，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各方面使用劳动力的比例。保证粮食运输，并适当增加用于副业、农田基本建设的比例。但在农闲季节中的一百天时间内，用于冬作物的田间管理、积肥、冬耕、冬灌、保墒等方面的劳动力，仍不得少于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动力，最好不超过百分之十。

（二）社办工业必须坚决执行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主的方针。凡是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社办工业，在农忙季节，都要停办或者适当压缩。现由公社或生产大队为支援工业基本建设而举办的常年性的砖、瓦、灰、沙、石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原则上移交县以上的基本建设部门根据需要接管经营。其所需要的劳动力，由基本建设队伍所精简下来的人员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今后也可以生产一部分建筑材料，但必须在农闲季节进行。公社和生产大队，如果需要生产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应由县委作出规划，并且经过地委批准。这种生产应当遵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的原则。

（三）从农村调到基本建设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必须在这次缩短基建战线和精减人员的工作中，迅速地全部或大部退回农村。从农村调到钢、铁、煤、运等生产部

门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也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设备的改进，逐步地退回农村。劳动部门应当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切实保证上述任务的实现。

（四）今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应当大量发展业余教育和大办半年制学校。业余教育的师资可以吸收在农村的中学生、下放干部兼任，可以从公益金或地方经费中给他们以一定的补助。半年制学校的学生，在农闲时间集中学习五个月，其余时间回家参加农业劳动生产。

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全日制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应当把现行的放暑假、寒假的制度，改变为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时放两次农忙假的制度。假期长短，由五省、市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留给农村的小学生、中学生的比例，由五省市自行决定。留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可以经过业余学校或半年制学校继续提高。

（五）今年冬季，应该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做好四定工作。四定就是定劳动力、定土地、定畜力、定农具。四定后，三年不变，并且在已定的基础上进行包产。

（六）今年冬季，应当根据过去中央历次指示，发动群众，搞一次粮食运输运动，争取把全年应当运出的粮食大部分在冬闲时间运出来，以便在明年开春以后，能够更加专心致志进行农业生产。中央关于在城市保持一个月到三个月粮食库存的规定，必须贯彻执行。

对于种植计划，也要根据国家计划和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情况，经过群众讨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

三、关于分配工作：

人民公社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大力压缩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坚决停止一切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即使是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也必须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不要集中在一个短期内搞得过多过急。同时，应该努力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使积累与分配、供给制与工资制保持恰当的比例，才能有利于提高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一）根据今年的歉收情况和两年来的经验，最近一、二年内，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应该特别强调贯彻执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并且要全部落实兑现。今年扣留部分一般只应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社员分配部分一般应占到百分之七十。少数收入多、生产成本大的队，经县委批准，报地（市）委备案，扣留部分可以超过百分之三十，但最多也不要超过百分之四十。通过调整扣留与分配的比例，保证今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的收入，仍比一九五七年有所增加。

（二）工资制与供给制的比例。今年供给制部分，一般应不超过社员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三十。对困难户，应该从公益金和国家救济费中给予适当补助，以保障其生活。关于社员的工资，应坚决执行定期预支、年终结算的办法，废除临时借支办法。按月发工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凡有条件的，都应该尽早实行。必须严格执行评工记分制度，凡是废弃了这个制度的地方，应当迅速予以恢复；今后凡是擅自改变这个制度的单位，其负责人应受到处分。

（三）今年各县都不得从人民公社提取公积金，公社原则上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收

入特别多的社，为了购买农业机械及其他生产资料，需要从生产队提取一部分公积金的，必须经过地委批准，但最多不能超过公积金的百分之三十。穷队需要购买必要的农业机械和进行必要的农田水利建设而资金困难的，在可能范围内由国家投资和贷款适当解决。

（四）基本核算单位拖欠社员的工资，应该还清，一时无力全部还清的，也要分期还清。本队离家出外工作的脱产干部和职工等，他们的家属如果仍在本队食堂吃饭，原来已经规定应交清饭费的，必须按期交付，欠账的一定要还清。原来没有这种规定的，则不要作出新的规定。

分配账目要结算到十二月底，并且一定要在春节前结算清楚，张榜公布，落实兑现，不拖尾巴。

四、关于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

五省市今冬明春水利建设的安排，已经大体上定下来了。这次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水利专业机械施工队伍的建立，必须与国家的施工机械供应能力相适应，不能一下子搞得过多。这支队伍，应该从现有专业水利队伍中选拔，或从其他基本建设队伍中转移过来，不准另由农村招收工人。

（二）今冬明春一百天内，脱离原有食堂的水利专业队伍，还要尽可能压缩。它们的任务主要是修干渠等主要工程，施工要尽量利用机械和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工效。在原有食堂吃饭的水利队伍，主要搞田间工程，如修支渠、毛渠和平整土地，除坚持半日劳动制外，也要尽量搞技术措施，禁止单拚体力的蛮干办法。今冬明春所要进行的这些工程，应由各县、社切实周密计划，力求配套，以便在明年的生产中发挥作用。

（三）五省市的一切水利措施，要从大旱情况下力争丰收的要求出发。要大搞冬灌和保墒措施，以保证春播。要大力整修水利工具特别是排灌机械，以保证及时使用。凡用于工业的排灌机械实际上已不能归队的，应由省委正式决定调归工业。凡社办工业和生活福利事业占用的排灌动力，应设法调回农业上来。要积极制造改良水车，并且充分加以利用，这是当前主要的提水工具。

（四）为了迅速而有效地解决农村的动力问题，省（市）地县委都要成立一个三至五人的专门机构，扎扎实实地研究当地的动力资源。各地都要根据具体条件，积极地利用水力、风力、沼气、天然气、煤气、蒸气和电力，作为固定的动力机械的能源，以尽可能节省汽油、柴油用于拖拉机。对于利用各种动力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应当大力推广。

五，关于农业机械化：

五省市的农业机械和畜力都不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主要靠人力耕作。因此，必须特别抓紧农业机械的修配和农具改革工作。

（一）今冬明春，应该特别抓紧以下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抓紧现有农业机械的修理和配套。要求在明年春耕前，保证做到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机械能够经常使用。修理和配套所需要的零件、配件，原则上由各省、市自己生产解决，或由各省、市协作解决，不能单纯依靠中央。建议各省市拨出一批工厂，划归农业部门领导，专门担负这项生产任务。拨给农业方面的钢铁等材料，必须尽先用在这方面。

第二件是立即着手大搞小农具的修理、制造。在分配给农业使用的钢材里边，也要拨出一部分质量好的、用于小农具的修理制造，以保证小农具的质量。必须保证在明年春耕前，

把小农具（主要是锨、镢、锄、镰四大件）按劳动力配备齐。

小农具原则上由社员自己购置。在社员现金收入不多的地方，也可以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购买，发给社员，抵作工资。

（二）今后两、三年内，农业机械化和农具改革的方针，应该是着重解决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所需要的工具。无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以及改良农具的制造、修配、推广等等。都必须首先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安排，以便确保两个最忙季节的各项农活不误农时。

所有新式农业机械和改良农具，首先要求定型，再指定专厂制造，然后有步骤地推广。

各省市要利用今冬明春农闲时间，帮助每个县、社，根据上述要求，发动群众讨论，制订出工具改革的具体规划，并且按照规划来进行制造。

六、关于整风整社和加强基层领导：

（1）深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进一步树立干部和群众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

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学习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决议，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克服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要教育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切实做到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2）认真整顿干部队伍，纯洁党团组织，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特别要帮助每个生产队、食堂配备好为群众所信任的好当家人。

（3）大力整顿三类队，帮助穷队搞好生产，定期改变这些队的落后面貌。

（4）总结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经验，建立和健全各项必要的经营管理制度。训练小队以上的干部，以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五省市要选择几个公社制订社章。

（5）精简上层机构，下放干部，加强社、队领导。精简下来的干部，主要用于充实基层组织。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要选派相当于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担任，大队总支书记要选派一般县级干部担任。各级领导机关派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要定人、定点、包任务，一直搞到明年夏收夏种。

这个会议纪要只提供五省、市委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批转的两个文件极好。中央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的党委，要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

从一九五八年冬天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因为这种“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力。但是，从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例子看来，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如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事实所证明的，一经整顿之后，群众的生产情绪不仅马上扭转，并且出现了生产的高潮。

中央和毛主席几年以来也三令五申，不论什么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力求精简机构，节约人力，合理安排劳动力，反对铺张浪费。但是，福建闽侯县城门公社的材料反映，两年来社办企业、事业的摊子铺得过多、过大，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力的浪费非常严重，使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由七千七百多人减少为五千一百多人，并且增加了公社不应有的开支。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地方，同样地也绝对不能听任自流，而必须及时地加以清理。闽侯县城门公社一经整顿，就从各方面挤出了二千多个劳动力（占整顿前农业生产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使他们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被农民群众称为一件大喜事。

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解决了这类生产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就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须知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国还不能立即全面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只能够首先在一些局部的地方逐步实现这种机械化，因此，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头等要素。

现在中央发给你们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这个基本方针，就会使这个方针变为空谈。反之，如果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并且将同时有利于工业和其他经济部

门的继续跃进。

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地解决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看来不能够只依靠各级的干部会议，还必须由省、地、县和公社党委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并且明确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下达到公社的生产队和各经济部门的基层单位，使党的各种政策和方针直接同群众见面，用领导和群众的“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够如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那样，收到切实的效果。

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最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使自己取得具体的经验，然后继续按照不同公社的不同情况，对上述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全面的彻底的解决。各省的工作部署如何，请尽速报告中央。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越来越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公社在同连续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做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当前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所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为了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明年大丰收，为了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方针真正成为全党全民的实际行动，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继续大跃进，中央再次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在此期间，不再新办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试点。现有的试点和已经过渡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队，办得好的、群众拥护的，可以继续办下去；办得不好的、群众要求改变的，就停止试验，重新恢复基本队有制。七年以后是否需要改为基本社有制，还要看当时情况由中央统一规定。就是在将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批分期地变基本队有制为基本社有制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并不是“社共队的产”，更不是“共社员的产”。现在归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队营企业，到那时候也不转归社有，仍然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属于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所谓“队共社的产”，就是队共有由社经营的拖拉机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基本社有制，甚至象现在的国营工厂一样，变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即是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借用社员多余的房屋和家具，必须商得社员本人的同意，切实负责维修保管，承认社员的所有权，付给合理的租金。社员的住房因而发生困难的，必须坚决退回一部分借用的房屋，妥善安置。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理，给以补偿。除了一九五九年夏季已经清理退赔了的以外，凡是没有清理的，或者已经清理、算了账、打了欠条、拖延未付的，都必须在今年内，至迟在明年春耕以前，偿付清楚。社和队赔偿平调的财物所需要的款项，应该从公积金中开支，不能从今年的收入中开支，以免影响今年的收入分配。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应该抱定决心，首先清理自己的一平二调，随清随退，即时兑现，做出示范，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侵犯，侵犯了的必须坚决纠正。否则，就会打击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农业生产力。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管理区或者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做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的过死，不要乱加干涉。公社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计划的基础上。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公社有权根据国家计划向生产队提出建议，并且对生产队提出的计划做必要的平衡和调整，但是，公社不能不问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的意见，任意提高产量指标，机械安排作物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

社有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是，社有经济必须是依靠自已的经济力量逐步发展起来，绝不能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更不允许用一平二调的错误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凡是做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应该集中全力做好对生产队的检查督促工作，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已办的生产企业，分别下放给生产队或者上交给公社经营，以减少同生产队争劳力、争生产资料的纠纷，更有利于克服一平二调。

生产队是统一分配的单位。生产小队收获的农产品和其他经营的收入，凡是在包产任务以内的，都应该如实上缴给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也应该按照规定的比例，上缴小部分给生产队，统一分配。

公社和生产小队，都应该分别从上下两方面来维护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不能从两头去削弱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生产小队的利益是社员群众最直接关心的。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对于调动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

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小队与小队之间组织劳力协作的时候，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由受协作的单位以工换工或者评工记分，按劳付酬、组织生产和建立丰产方，应该以小队为单位进行。不要打乱生产小队的“四固定”，实行所谓“大兵团作战”，组织“大丰产方”。已经组织的“大丰产方”，今后也要以小队为单位分别算账。为了便于机耕，需要调整插花地的时候，也必须使小队与小队之间互不吃亏。耕畜固定给小队使用，繁殖也由小队负责，并由生产队给小队和饲养人员以适当的奖励。农具固定给小队使用，修补添置也由小队负责，所需费用应该计算在成本内。

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包产指标必须真正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小队有产可超。超产奖励主要是奖现金，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前提下，也可以奖励小部分粮食，鼓励超产的小队储存一点，也允许他们多吃一点。

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要乱干涉，乱指挥。执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必须因地制宜，

不违农时。

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应该充分利用田边地角和其它闲散的土地，多种多收，可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包产任务以外的经营收入，可以提出小部分上缴给生产队统一分配，绝大部分归小队所有；小队也可以从中提出一部分做为自己的公共积累，大部分分配给本小队的社员。

这样一来，在一个生产队里面，各小队之间的口粮标准、工资水平和劳动日的分值就会有高有低。这种差别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对于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现有的自留地，连同食堂的菜地加在一起计算，一般不要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超过的数量很少，或者数量虽然不及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而群众没有意见的，也不在抽补。在不影响集体劳动的前提下，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饲养少量的猪、羊和家禽，培育好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木，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公社和生产队现有的养猪场，应该继续保持和发展，但是，绝对不许采取向生产小队、食堂和社员个人征调猪、羊和家禽的办法，来发展公社和生产队的养猪场、养鸡场。社员家庭积肥，交队使用的，应该按质论价，付给报酬。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

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还应该实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过大，积累不能过多。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一般应该占总收入（指可分配的总收入，而不是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扣留部分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必须勤俭办社，大力节约管理费用和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的比例，一般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为宜。某些城市郊区、经济作物区和多种经营收入较多的富社富队、机耕面积较大的生产单位，公积金、公益金的比例和总扣留的比例可以稍高一些；收入很低的穷社穷队和因灾减产很多的社队，还可以再低一些。丰收的社队，公积金可以多留一点，歉收的少留，重灾的不留。今年歉收的地方和社队，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该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现在看来，一般应该大部分归队，小部分归社。对于收入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县一律不许从人民公社提取公积金。

公益金，社不提成，留给生产队，并且可以分给小队使用。集体福利事业的开支（包括集体福利事业服务人员的劳动工分），应该从公益金开支，反对把公益金挪做其他用途。

许多公社和队动员社员从事基本建设，对这一部分劳动不计报酬，或者从当年的生产收入中计工付酬，这实际上又是一种积累。今后，社队动员社员从事水利等基本建设，人数要

严格控制，除了当年直接受益的以外，劳动报酬要由主办的社队从自己的公共积累中开支。县以上各级兴办水利、公路、铁路等等基本建设，必须从公社抽调劳动力的时候，除了按照规定控制人数以外，还必须由办的单位发给应得的工资。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应该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供给部分应该占百分之三十，不要超过，在这个比例之内，能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伙食供给制，不能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就实行粮食供给制，不能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就实行粮食半供给制。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时候，口粮还是按标准全部发给食堂，在供给范围以外的那一部分口粮，价款由各人所得的工资中分别扣除，某些人口多、劳力少、生活确实困难的家庭，经过民主评议，可以从公益金中给以补助。工资部分应该占百分之七十，使劳动力强、出勤多的人除了吃饭以外还能得到较多的工资。这样做，对于把劳动力稳定在农业战线上，对于提高劳动出勤率和劳动效率，都是十分必要的。

按月发工资，坚决废除临时借支。暂时做不到按月发工资的，可以两个月发一次，至少要按季发。一定要按照各人实做多少劳动工分来发工资，多劳多得，不允许按人头平均发。为此，必须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工分账目必须按时公布，最好十天公布一次，至少每月公布一次。

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劳动。因此，一方面实行部分供给制，一方面分别规定各人必须做够多少劳动工分，这种办法，是合理的，应该坚决执行。

机关干部、军官、职工和华侨等外出人员的家属，凡是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参加公社劳动，才能享受公社的供给待遇；并且根据他们参加公社劳动的情况，决定他们是否需要补缴一部分伙食费和补缴多少。没有经过公社允许私自外出就业的人，他留在家中的赡养人口不能享受公社的供给待遇，当然不发口粮、不准吃饭，而是吃饭应该交伙食费。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劳动创造一切，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劳动力归谁所有，归谁支配，也是坚持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的基本环节。城乡各个战线，都必须继续精简，压缩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的力量。凡是应该压缩和可以压缩的，都必须坚决压缩。在农村举办各项事业和进行各种活动，都必须严格控制，并且必须深刻了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在不误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绝不能事事强调专业化，常年占用一大批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凡是能用半劳力和辅助劳动力的，都不应该用强劳动力，绝不能各行各业尽先挑选强劳动力，把剩下来的老弱妇孺用于农业生产。能用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做的事情，滥用强劳动力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经过这次精简和大调整以后，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不包括辅助劳动力），要达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三分之二。以农村中整、半劳动力的总数做为一百，公社和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两级占用的劳动

力，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左右，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都归生产小队支配；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农忙季节必须达到百分之八十，社办工业、短途运输、林、牧、副、渔、生活福利、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所用的劳动力，合计起来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在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没有根本的提高以前，这种比例维持不变。五年内，县以上各级各单位都不许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必要抽调的时候，必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公社一级动用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劳动力，必须经地委批准。生产队动用生产小队的劳动力，必须经县委批准。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今年有大面积的地区遭灾歉收，城乡人口的口粮标准都不得不有所降低。丰收地区应该以丰补歉，口粮标准可以略高于遭灾歉收地区，但是也要从低。国家征购任务必须完成，种子必须按计划留足，口粮和饲料的留量也必须按低标准落实。粮食必须严格实行过秤入仓的制度，彻底扫清浮夸风。在秋粮还没有完全收割、脱粒、过秤、入仓以前，吃用更要打紧一些。在秋收完全结束以后，要按队、按食堂为单位，一个一个地检查口粮、种子和饲料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早解决。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十二个月的口粮按十三个月安排，留有余地。必须算了再吃，绝不能吃了再算，严防明年青黄不接时陷于被动。

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食堂一定要由在食堂入伙的人民主管理。管理员、炊事员应该由品质好、作风好、成分好、办事公平的人担任，必须民主选举，并且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食堂账目必须按月公布。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各人节余的粮食，愿意要粮的发粮，愿意要钱的发钱，坚决兑现。

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

食堂必须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大搞副食品的生产，逐步做到：粮食由生产队供应，油盐柴菜从食堂自己生产和经营的副业收入中解决。食堂还必须大搞瓜菜和各种代食品，实行粮菜混吃，既节约粮食，又保证吃饱。

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和打的柴草等等，不能在食堂与食堂之间无偿调拨。必须进行调剂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食堂自给有余的蔬菜和柴草，可以到市场出售。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在农村里，应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组织集市贸易，便利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交换和调剂自己生产的商品，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但是不论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商品，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不许倒手转卖，从中赚钱。集市上买卖的价格，应该和国营商店的牌价大体相同，可以略高一点，也可以略低一点。对于那些国营商店没有牌价的小商品，由交

易双方公平议价。为了加强国家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应该由公社一级的商业、银行、税务等有关部门和集市所在地的社队负责干部，共同组织市场管理委员会，保障合法交易，取缔投机活动。必须在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坚决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既要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又要有利于完成国家的购销计划。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实行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八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遭灾歉收、口粮标准低和冬季农事活动较少的地区和社队，今年冬季应该实行每日劳动六小时、五小时，以至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的办法。并且要注意卫生，防治疾病，注意妇女劳动力的特殊保护。耕畜也应该劳逸结合，在冬季农闲季节，必须保证耕畜得到适当的休息。劳逸结合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并不是消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者恢复疲劳，恢复体力。今冬休息得好，才能保证明年春季兵强马壮地投入春耕生产，力争明年多打粮食，多增产各种农产品。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到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严禁干部用“不准打饭”和“不发口粮”的办法来处罚社员。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的，必须从严惩处。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同时，必须表扬好人好事，凡是顶住“共产风”的、作风好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都应该受到表扬。提倡干部说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遇事同群众商量，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绝对不能有官气。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严格执行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下放一批干部，长期留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带动群众安心农业生产；并且帮助社、队干部搞好生产，办好食堂，搞好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是，要严格注意防止包办代替。农村基层干部和一切在农村中工作的干部，都必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同群众商量，发扬我党群众路线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并且通过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地方和落后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

同志们！人民公社已经有将近三年的历史了，三年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经验，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三年来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平整土地、改良土

壤等农田基本建设，对于农业增产，一定会陆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三年来的大办钢铁，也大大增加了工业支援农业的物质力量。形势是好的，条件是有利的。中央号召全党一致努力，认真贯彻执行以上各项政策，特别是经过这次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纠正"共产风"，切实地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一系列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把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稳定下来，至少稳定七年不变，不去侵犯它，不乱出新花样，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一九六一年多打粮食，获得大丰收。并且力争以后几年，例如说，一连六、七年（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使粮食和农业作物得到大丰收，使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至少初步过关。中央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执行中央政策，端正工作作风，就可以做到。这样做的结果，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将得到更好更大的发挥，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必将获得更好更大的跃进，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必将取得更好更大的胜利。

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

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一）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已经于十一月三日发给你们。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的中心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县、社两级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在高举三面红旗、肯定三年来伟大成绩的前提下，认真地总结经验，使全体干部深刻认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严重性，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所造成的危害。组织他们重新学习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十月郑州会议、十一月武汉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郑州会议、四月上海会议的决议，重新学习毛主席一九五九年五月的六条指示和中央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历次指示。使全体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到共产主义，真正弄清楚在现阶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真正了解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政治挂帅和物质保证相结合的道理，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等问题。只有把干部中的一些错误思想澄清了，才能真正保证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也才能在今后少犯和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

（二）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整风整社，彻底改进干部作风，并且在组织上进行必要的调整。首先应该肯定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

好的。他们所以犯错误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和作风问题，对他们主要是加强教育，提高思想，严肃批判他们的错误，监督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是，也有一些干部，能力弱，不称职，无力推行党的政策，不得不把他们从主要负责的岗位上调开，另行分配工作。还有一些干部，不严肃对待党的政策，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标新立异，自以为是，他们应该受到批评和一定的纪律处分，严重的必须撤换。还有少数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行为恶劣，违法乱纪，借刮"共产风"的机会，徇私舞弊，混水摸鱼，甚至故意制造混乱，乘机破坏，对这种人必须坚决撤消职务，开除出党，罪恶严重的还必须依法制裁。只有这样，才能既教育了绝大多数干部，又清洗了很少数的坏分子，才能既从思想上又从组织上保证中央指示的彻底实行。

（三）在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共产风"的群众运动中，应该注意防止走到另一极端，犯右倾的错误。但是，只要领导干部的头脑是清醒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指导运动，既坚决纠正"共产风"，又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坚持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坚持部分供给制，坚决办好公共食堂，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就不会犯原则错误。不要在一开始就向下级干部和群众提出防右的任务，否则，运动就开展不起来，开展起来也没有力量。在这次运动中，还可能出现地富反坏分子、右倾分子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分子乘火打劫，借端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这也并不可怕，在运动初期不必忙于回击，三面红旗是吹不倒的，他们的歪风毒气，放出来总比藏起来好，可以在运动的后期，在他们的毒气已放得差不多的时候，在干部和群众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选择恰当的时机，予以反击。

（四）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进行赔偿时，可能出现某些社队一时赔不起，不能保证在明年春耕以前处理完毕。为此，省、专、县要准备拿出一笔钱，帮助社队解决困难。省、专、县财力不足的，中央准备给以必要的补助。但是、这一点决不要向下传达，以免社队干部扣着平调的东西，该退的不退，能赔的不赔，伸手向国家要钱。首先要逼他们退，逼他们赔。否则，他们就不能得到深刻的教训。同时，该退的东西不退下去，特别是某些生产资料不退下去，对于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

（五）中央紧急指示传达的时间，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秋收、秋种的进度，自行安排，但是至迟要在今年十二月中旬以前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大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包括第一书记在内，每个专、县来三人为好，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或县委为单位，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分头到公社去，帮助社干部向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传达，并且帮助社干部组织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根据中央的紧急指示，结合本省情况，做一些必要的补充规定，但是，中央的紧急指示，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传达，不折不扣地切实执行。

（六）各地方、各公社，"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已经基本克服，情况是好的；大部分是问题不少，但不太严重；还有一部分，问题十分严重，生产力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个县内，甚至在一个社内，也是不平衡的。必须分清情况，区别对待。有什么就反什么，有多少就反多少，不要一般化，尤其不

能在退赔数字上相互竞赛。运动搞得彻底的主要标志是：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都已经全部解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高；群众真心满意，情绪高，干劲足；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

（七）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不完全来自农村，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从上面来的，要求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和总政治部，接到中央的紧急指示以后，在干部中进行传达讨论，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再不容许由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起下面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各系统各部门都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彻底改进工作，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凡是自己有一平二调错误的和直属企业、事业单位有一平二调错误的，都必须彻底清理，坚决退赔，做出示范。

（八）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对中央紧急指示的传达讨论和执行的情况和问题，请随时报告中央。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声明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和今后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迫切问题。

会议表明，会议参加者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肯定它们忠于一九五七年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这两个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当代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立场，大大促进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把力量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进行斗争。这两个文件，仍然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

三年来事件的进程，证实了这两个文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前景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证实了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科学力量和积极作用。

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但是，帝国主义企图保持自己的阵地，阻挠裁军，力图延长和全力加剧“冷战”，顽固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因此，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一

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几十年来新旧两个世界间的巨大搏斗，证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及其急先锋——法西斯主义，想用战争来阻挠历史发展进程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帝国主义已经没有力量堵住欧亚两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体系。帝国主义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阴谋被粉碎了。帝国主义用尽一切办法想保持住殖民主义奴役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正在崩溃。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国际局势越来越肯定地发生着有利于争取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人民的变化。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帝国主义的任何挣扎都不能阻止历史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决定性胜利的巩固前提，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必不可免的。

社会发展的进程证实着列宁的预见：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通过经济建设给世界革命的发展以主要影响。社会主义在生产、科学和技术领域里，在建立人们新的、自由的、能日益更多地保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友爱大家庭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创造性成就。社会主义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方面，也占首位的时候已经不远了。资本主义将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里，即在物质生产领域里遭到失败。

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和发展给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以日益增长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其示范的力量，使资本主义世界劳动者的思想革命化，鼓舞他们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着这一斗争的条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保卫和平和民族独立、保证民主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内部力量，正在增长和加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在一个深刻的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的矛盾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以便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润。

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挽救资本主义。一小撮垄断组织的利益同全民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都急剧地尖锐化了。用军国主义来支撑资本主义的腐朽基础的企图，使这些矛盾更加紧张起来。

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刻过。资本主义越来越阻碍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来为社会进步的利益服务。资本主义用人类天才的发现来反对人类本身，把这些发现变成毁灭性战争的残酷手段。

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增长着。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无论在本国或国际范围内，都在不断地尖锐化。一系

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克服不久以前经济危机的全部后果，现在又面临着新的经济震荡的威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集中过程空前加剧，垄断组织的利润和超额利润在增长。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新形式，首先是通过加强劳动强度，无比地加重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自动化和“合理化”给劳动者带来新的灾难。在个别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依靠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的一些切身要求得到满足；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平。与资产阶级的诺言相反，只是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而且只是暂时地实现了充分就业。垄断组织的横暴给广大农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带来日益严重的损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不发达的、群众生活特别贫困的地区，这样的地区甚至还在扩大。

所有这一切，再一次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言，即现代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似乎建立了能够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能够保障全体劳动者福利的所谓“福利国家”。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地改变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越缩小，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就表现得越厉害。市场问题空前地尖锐化了。在“整体化”口号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在加深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组织是最大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瓜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新形式，是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向其软弱的伙伴实行经济渗透的新形式。

在现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得最明显。美国垄断资本暴露出它显然没有能力利用现有的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成了经常失业现象特别严重的国家。工业开工日益不足，成了那里的经常现象。在战后年代里，尽管靠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增加军事拨款，但是生产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勉强超过人口的增长。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频繁了。这个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一个最畸形的军事化经济的国家。美国比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厉害地榨取亚洲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的财富，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美国资本正加紧渗入非洲。**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的和经济“援助”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力图使许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统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镇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剥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挠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美国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拖入军备竞赛，拖着它们执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立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政策。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腐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许多国家中执政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和团结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帝国主义者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军事政治联盟，共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军事集团体系，正被这些集团的成员之间的斗争以及群众为取消这些集团的斗争所削弱。美国帝国主义者竭力加强侵略集团，这就引起群众的更大反抗。尽管美

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它仍然是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英法帝国主义者为保持自己的阵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已经恢复起自己力量的、同美国垄断组织有密切联系的西德和日本垄断组织，正在加紧向外扩张。西德垄断组织执行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剥削不发达的国家。

各国人民日益坚决地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劳动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自由力量和殖民主义力量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古巴的深刻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良好榜样。在非洲以不可抗拒之势展开了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伊拉克的反帝民族起义获得了成功。在日本展开了反对日美军事同盟、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意大利的人民群众保卫民主的积极行动证明了劳动者的战斗决心。在法国，争取民主、反对个人专权的反动制度的斗争正在加强。美国、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印度、英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美国黑人争取自身生活权利的行动正在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反对法西斯独裁的全民力量联合起来的趋向正在增长，希腊的民主运动正在加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暴虐制度已被推翻，南朝鲜和土耳其露骨的亲美傀儡政府受到打击。南越和老挝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发展。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铲除遗留在他们国内的帝国主义者的经济阵地，特别是荷兰殖民主义者的阵地。保卫和平的群众运动正在扩大，遍及所有大陆。这一切明显地证明，反帝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反战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浪潮正在日益高涨。

社会主义在占人类三分之一的欧亚许多国家的胜利；全世界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的蓬勃增长；帝国主义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阵地的不断削弱；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巨大高涨和殖民主义体系的迅速瓦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的增长；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军国主义的加强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垄断组织和全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的加深；资产阶级民主的缩小，采取专制和法西斯统治方法的趋势；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深刻危机——这一切都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两个体系的竞赛和斗争、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情况下，在爱好和平力量为实现和巩固和平共处的胜利斗争使帝国主义者未能以其侵略行动破坏普遍和平的条件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高涨的情况下产生的。

所有革命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们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二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苏联正在胜利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正在胜利地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其中某些国家已经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在它的整个体系的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些胜利向受资本压迫的各国人民明显地说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为保证人们的高度生活水平和和平幸福生活，开辟无限的可能。

苏联人民胜利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迅速地建设着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科学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奠定了征服宇宙的开端，从而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技术的力量。苏联第一个在历史上为全人类铺设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最光辉的榜样和最强大的堡垒。

中国的人民革命给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阵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它给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给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

同伟大的苏联一起构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人民民主共和国，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这些国家的人民政权证明了自己的不可动摇的巩固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中起着统治作用；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或者正在顺利地消灭着。由于胜利地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起来了。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发达的工业；过去的农业国家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工农业国家。

近年来，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已经解决或者正在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即农民自愿地从小私有经济的道路走上大规模社会主义合作化经济的道路。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无论对于那些长时期中农民土地私有观念很深的国家来说，或者对于那些不久以前消灭了封建关系的国家来说，都显示了它的伟大的生命力。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兄弟联盟巩固起来了，正如弗·伊·列宁所教导的，这个联盟的保持和巩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的两个劳动阶级的这一联盟不断地发展，它促进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促进农业在农民自愿合作化的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结构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主要力量，它的队伍在成长着，它的觉醒程度和政治成熟程度提高了。社会主义使农民摆脱了世世代代的贫困，使他们变成了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形成。全体公民都能够自由地获得知识和文化。这样，社会主义就为社会的文化发展，为人的天赋和才能的全面和充分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政治条件，而且创造了物质条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经济胜利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

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已经形成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以及它们的经济和文化的高涨，对于为反对民族压迫而斗争的人民来说，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社会主义思想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个斗争具有长期性，并且将一直继续到使人们的意识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为止。

社会在政治道义上的一致，是历史上首先在苏联产生和巩固了的，现在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加强起来了。这样，就为最有效地利用自由的劳动者的创造力，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创造了可能。

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完善，日益成熟。在这个社会中，不断产生着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方法和经济计划的方法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进一步地发展，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国家的个别职能逐渐转入社会组织手中。

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消灭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可靠地保障着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侵犯。这样，社会主义各国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阵营，这个阵营的日益加强的团结和不断增长的威力，保证社会主义在它的整个体系的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

在过去的年代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英勇劳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巨大工作，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各国在同资本主义和平经济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并取得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可能性。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善于正确地利用这些可能性是自己的责任。

获得了巨大胜利和经历了严重考验的各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获得成就，是由于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地运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努力，由于它们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和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援助。

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共同性结成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为了使这个体系胜利地发展，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在自愿、互利和全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实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配合，以及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来经常改进国际分工制度；研究集体经验；加强合作和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并且建立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体系的各国人民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经验。兄弟党全面研究这一经验，并且根据具体条件和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它，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确定不移的规律。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根据现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每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一切优越性和每个国家的国内资源，以便通过共同努力在最短期间解决一项历史任务，即在工农业生产绝对产量方面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

家，进而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超过经济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这项任务，必须不断改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经常改进国民经济的领导方法，必须有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经营方法，即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始终不渝地遵守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和通过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大力发展对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实行精神鼓励的原则，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监督。

社会主义各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物质基础是：在最新的先进技术、国民经济电气化、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创造高度的生产水平。没有这一切，就不能保证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丰富的消费品。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发展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全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培养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人。

社会主义阵营是由紧密的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以及共同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所联合起来的、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自由而享有主权的各国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结合。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不可破坏的准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参加这一阵营的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真正平等和独立自主。社会主义各国根据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相互援助的原则，使全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日益完善，这既符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又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它在实践中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对抗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而消失的原理。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对抗性的、导致军事冲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相反，社会主义体系在本质上没有能使这个体系的人民间或国家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原因。这个体系的发展，使各国和各民族越来越团结，使它们之间合作的各种形式越来越巩固。社会主义把本国的经济、文化、国家体制的发展，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和发展的利益，同各民族的日益团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人民在政治道义上的一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相互援助，代替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政治上的割裂和民族利己主义。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的利益，要求在政策上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原则正确地结合起来。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论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或者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都负有历史性的责任。

一九五七年宣言完全正确地指出，夸大民族特点的作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会使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遭受损失。同时，宣言也完全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

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的表现，不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自动消失。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者，为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倦地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决不调和的精神教育劳动者。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人民的团结一致，

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诚，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的主要源泉。

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正在铺设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为全人类创造新社会的雏形。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极其关心地注视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创造性活动。这使社会主义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人民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担负起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责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把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看成是自己的任务，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

社会主义各国组成了世界体系，成为对世界发展有强大影响的国际力量的时刻已经到来。用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的方式解决当代最重要问题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出现了。

三

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人剥削人的制度和人屠杀人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方面。帝国主义已经使人类遭受两次世界战争的浩劫，现在又使人类受到陷入更可怕的灾难的威胁。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武器已经造成。在新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会使整个整个的国家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把世界生产和世界文化的巨大中心变成废墟。这样的战争会给亿万人，其中也包括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的人们带来死亡和苦难。帝国主义给全人类带来严重的危险。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各国人民都清楚，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它的政策体现着好战的反动派的思想。在英、法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的参与下，在防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幌子下，美国帝国主义把许多国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其他军事集团，在整个所谓“自由世界”，即从属于它的资本主义国家，布满了它的首先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基地网。这些集团和基地的存在，威胁着普遍和平和安全，不仅侵犯那些把自己的领土供给美国黩武主义者作基地的国家的主权，而且也威胁着那些国家的生存。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西德帝国主义进行着罪恶的勾结。在西德，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由希特勒的将军们指挥的庞大正规军正在加紧重建。美国帝国主义者正以火箭核武器和其他最新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武装这支军队。这引起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日益增强的坚决反抗。在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内，正为这支侵略军队提供军事基地。来自西德帝国主义的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事业的威胁正在加剧。西德的复仇主义者公开宣称，他们打算重新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确定的边界。正如当年的希特勒匪帮一样，西德军国主义者正在准备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力图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西柏林变成了国际挑衅的策源地。波恩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和平共处、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敌人。

欧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用联合的力量来对付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在反对西德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斗争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会议参加者认为，保卫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前哨、德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的真正体现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义务。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也正在积极地复活战争策源地。他们侵犯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勾结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把新的军事条约强加于日本。这一条约以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进行侵略为目的。美国强盗霸占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霸占了南朝鲜，越来越多地干涉南越的事务，并把它们变成了危险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冒险的策源地。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古巴进行侵略威胁，干涉拉丁美洲、非洲和近东各国人民的内政，力图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用像美洲国家组织这种区域性同盟，保持他们对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并且裹胁这些国家来实现他们的侵略阴谋。

美国帝国主义建立了巨大的战争机构，不愿意缩减这些机构。帝国主义者破坏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旨在裁军的任何建设性的建议。军备竞赛在继续着。核武器储备惊人地增长着。法国统治集团不顾本国和其他各国、特别是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抗议，走上了制造和试验原子武器的道路。美国黩武主义者正在准备恢复有害的原子试验。蕴藏着严重国际冲突危险的军事挑衅正在继续。

美国统治集团用挑衅和侵略行动的政策破坏了巴黎的政府首脑会议，采取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使"冷战"尖锐化的方针。战争威胁加剧了。帝国主义对和平的挑衅，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更加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受到了新的严重打击。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形成了能够粉碎它的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意志，那么他们早就把人类推入新的世界战争的灾难和恐怖的深渊了。然而帝国主义者能够为所欲为地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近年来，帝国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发动局部战争，使人类处于世界灾难的边缘。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坚决立场，制止了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干涉，阻止了帝国主义者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侵犯。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继续英勇地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刚果和老挝的人民正在给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动以越来越坚决的反击。经验证明，可以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局部战争，胜利地消除这种战争的策源地。

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们的世界战争计划的时候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的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

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在进行着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些力量是：在决定性的科学技术部门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强大的苏联；用自己的强大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服务于和平事业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迫切关心维护和平的日益增多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各种组织，首先是共产党；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和平的世界运动；不同意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方针和主张和平共处的中立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清醒地估计力量对比和现代战争惨重后果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表示赞成和平共处政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现在，对于所有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来说，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现代军事技术的空前破坏性，迫切地要求把所有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力量的主要行动集中于防止战争。不能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拖延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那时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和那里的居民来说，进行斗争将会是太迟了。**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制服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愿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在帝国主义者建立了军事基地的国家中，必须加强取消这些军事基地的斗争，这是巩固民族独立、维护主权和防止战争的重要条件。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军国主义化的斗争，应当同反对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有联系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斗争结合起来。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维护和平的运动能在城市和乡村，企业和机关中不断加强和扩大。保卫和平的运动是当代最广泛的运动，它包括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属于不同社会阶级，但为防止新战争、保障持久和平的崇高愿望所联合起来的人们。

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维护持久和平具有首要的意义。在裁军没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各国仍然必须使自己的国防力量保持应有的水平。

共产党人认为，为了确保和平事业，首先必须解决下列任务：停止军备竞赛；禁止原子武器及其试验和生产；取消外国军事基地；从别国领土上撤退外国军队；解散军事集团；签订对德和约；使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制止西德复仇主义者的侵略阴谋；不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历史把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伟大责任，首先放在国际工人阶级肩上。帝国主义者正在为发动热核战争而勾结和联合起来。国际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自己的队伍，拯救人类免于新世界战争的灾难。**任何政治、宗教和其他问题方面的差别，都不应该妨碍团结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战争危险。用国际无产阶级一切队伍和组织的强大意志和统一行动来对抗战争势力，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来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各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它们号召工人阶级、工会、合作社、妇女和青年的团体和组织，全体劳动人民，不论其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如何，通过群众性的斗争给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行动以坚决的反击。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

的一切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日益广泛地表现出来。不久的未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苏联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取得新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将完全崩溃。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绝对的优势。**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全世界共产党人一致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共处，为防止战争而坚决斗争。共产党人应当在群众中进行不倦的工作，以免于低估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低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同时也免于低估战争的危险。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原则，都符合和平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是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共产党人坚决反对美国的“冷战”和“战争边缘”主义，因为它是导向热核灾难的政策。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共产党人争取完全停止“冷战”，解散军事集团取消军事基地，在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广泛发展各国人民间的贸易、文化和科学的联系。

和平共处政策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所有那些不要新的流血战争而争取持久和平的人们的根本利益。这一政策，有助于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有助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威望和国际影响的增长，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于资本主义不利。

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

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展开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加强人民群众对巩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信心，加强人民群众防止世界战争的决心。他们将竭力促进人民通过自己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日益削弱和缩小帝国主义的阵地。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但是，各国之间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争执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

会议认为，实现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对人类命运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实现

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消除各国间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实现这个计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遇到帝国主义者的顽强反抗。因此，就要为实现这一计划而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积极的坚决的斗争。应该日益广泛地进行这种斗争，坚持不懈地争取达到现实的结果——禁止试验和生产核武器，取消军事集团和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大大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从而为普遍裁军扫清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积极的坚决的斗争，就有可能孤立侵略集团，使扩军备战遭到挫败，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普遍裁军协定。

军备竞赛既不是抑制战争的因素，也不是人民高度就业和福利的因素。军备竞赛导向战争。只有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军火投机商才热中于军备竞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要求缩减军费，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金钱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是人民的经常要求。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必须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把裁军节省下来的金钱和物资用于和平生产、住宅建筑、保健事业、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发展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需要。现在裁军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战斗要求，成为业已成熟的历史的必需。必须用积极。坚决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者执行各国人民的这一要求！

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今后仍将始终不渝地执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路线，尽一切可能使各国人民免受新战争的恐怖和灾难。它们将对帝国主义表现最大的警惕性，全力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国防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维护和平。

共产党人认为自已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贫困，以及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永远消除任何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现时代使人类摆脱新的世界战争的惨祸。各国共产党将为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贡献出自已所有的力量和精力。

四

民族解放革命在世界的广大地区里取得了胜利。战后十五年来，在亚洲和非洲出现了将近四十个新的主权国家。古巴革命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人类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了独立的人民开始积极地参加国际政治。

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唤醒了东方，把殖民地人民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洪流。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获得了独立的人民实现独立自主的民族发展的可靠后盾。国际工人运动给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大的支持。

亚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非洲的殖民主义制度正在崩溃。在拉丁美洲开辟了积极进行反帝斗争的战线。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亿万人的独立，是他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残酷的搏斗中争取到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承认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他们是争取

民族独立的最积极的战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殖民地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通过武装斗争或者非战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他们要在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争取巩固的胜利。殖民主义国家不会把自由恩赐给殖民地人民，也不会自愿放弃被它们剥削的国家。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垄断组织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这种努力的目的，是想在经济"援助"的幌子下，在已经获得独立国家的经济中，维持原有的阵地并夺取新的阵地，是要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拉进军事集团，在这些国家中扶植军事独裁制度，建立军事基地。帝国主义者力图阉割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在这些国家中扶植自己傀儡执政，收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民族纠纷这个恶毒的武器来削弱这些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国家的力量。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和侵略性的双边军事同盟，正被积极利用来达到这些目的。当地剥削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是帝国主义者的同谋者。

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进行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根源，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并把它们从经济中排挤出去，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实行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这些全民性的民主任务，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各国民族进步力量能够联合起来、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联合起来的基础。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起了杰出作用的工人阶级，主张把民族、反帝、民主革命的任务坚持到底，反对反动势力阻挠社会进步事业的企图。

解决直接涉及大多数居民利益的农民问题，对这些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不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就不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够清除束缚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中世纪残余。在这些国家里，在民主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工业中不依赖外国垄断组织的和逐渐变成本国经济的决定性因素的国营成分，具有很大意义。

工农联盟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和保障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个联盟应该成为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解放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联盟的力量和巩固性。在这一斗争中，一切民族爱国力量，全国一切准备为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们，都能起很大的作用。

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参加革命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相同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取决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深度。

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就会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和巩固民族独立问题寻求答案。不同的阶级和政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这是各国人民自己内部的事情。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人民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摆脱剥削、贫困和饥饿。在解决这一根本的社会问题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的历史情况下，正在形成有利于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这种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就是：一贯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军事集团，反对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反对各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资本的渗透；拒绝专制独裁的管理方法；保证人民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示威游行、建立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自由），保证人民有可能争取进行土地改革和实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方面的其他要求以及参予决定国家的政策。民族民主国家的成立和巩固，使这些国家有可能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迅速发展，有可能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政策和争取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奴役的斗争中起积极的作用。

共产党为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为坚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积极进行斗争。它们支持民族政府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而采取的行动。同时，它们积极反对反民主、反人民的行动，反对统治集团危害民族独立的措施。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他们争取实现社会生活的真正民主化，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为反对独裁制度或者制止建立这种制度的趋向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目标符合民族的最高利益。反动集团企图在“反共主义”的旗帜下破坏民族战线，孤立解放运动的最先进部分——共产党人。这种企图削弱着民族运动的力量，违反人民的民族利益，使已经获得的民族成果有丧失的危险。

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在争取解放或者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人民的真诚的和忠实的朋友。它们根本反对任何干涉年轻的民族国家内政的行为，它们认为促进各国人民争取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它们对这些国家在沿着进步道路向前发展方面，在建立本国工业，在发展和巩固民族经济和培养本国干部方面给予大力的援助和支持，在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同这些国家合作。

宗主国觉悟的工人，一贯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获得自决进行斗争，他们认识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现在，当这些民族已经走上民族独立道路的时候，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国际义务，就是给这些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全力的支持，帮助它们顺利解决经济和文化复兴的任务。他们这样作，同时也是保卫本国人民群众的利益。

完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要求的。对于那些还处在殖民主义奴役下的所有人民，在他们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当给予全力的支持。必须废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压迫。消灭殖民主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普遍和平，也将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会议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澳洲所有进行英勇反帝斗争的人民表示支持。会议向年青的非洲国家人民致敬，他们获得了政治独立，这是他们走向彻底解放的重要步骤。会议对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表

示热烈的同情和支持，要求立即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战争。会议愤怒地谴责南非联邦的惨无人道的种族迫害和暴政，即“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呼吁国际民主舆论界积极支持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会议要求不干涉古巴、刚果和一切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的主权。

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给予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人民以道义上物质上的大力支援，是自己的义务。

五

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它们所面临的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提供新的可能性。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们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认识到，他们自己肩负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资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们将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创造着条件。

在目前条件下，正越来越坚决地把主要打击针对着作为军备竞赛的祸首和反动与侵略的堡垒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针对着保卫垄断组织利益的整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非欧洲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一切民主爱国的民族力量，也就是为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而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的取得，将为进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创造条件。

大垄断组织向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全线进攻。对劳动者的剥削正在加重，广大农民群众破产的过程也正在加速；同时，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遇到的困难正在增加。大垄断组织的压迫，对于民族中各个阶层人民来说都变得越来越沉重了。结果，在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的同时，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在目前阶段也在加深。

垄断组织力图消灭或者极度缩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在一些国家中，公开的法西斯恐怖继续猖狂肆虐。一些国家正在用下述新形式加强法西斯化的过程：独裁统治办法同虚伪的议会制度相结合，这种议会制度虚有其表，毫无民主内容。许多民主组织被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成千上万为工人阶级事业和和平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被抛进监狱。

会议以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名义，向在监狱里受折磨的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西德、希腊、伊朗、巴基斯坦、阿联、约旦、伊拉克、阿根廷、巴拉圭、多米尼加、墨西哥、南非联邦、苏丹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光荣儿女和民主主义者表示无产阶级的同情。会议号召展开强大的国际运动，争取释放为和平、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战士。

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都同消灭垄断组织的统治有切身利害

关系。团结这一切力量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

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团结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其基础是：争取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和发展民主；争取对最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和管理民主化；争取把整个经济用于和平目的，以满足居民的需要；争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争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免受垄断组织的危害。

实现这一切，将是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重要步骤，将符合民族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所有这些都带有民主性质，它们不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但是，这一切的实现，将限制垄断组织的力量，增强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威信和政治分量，将有助于孤立最反动的力量和联合一切进步的力量。广大居民阶层参加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会使他们确信同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必要性，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最重要的义务，是领导群众为实现民主改革、推翻垄断组织的统治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保证这个斗争取得成就。

共产党人主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一切行政、政治、文化组织和机构的普遍民主化。

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看作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共产党人经常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使群众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这一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真正出路。

现在，当居民中越来越多的阶层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工会、合作社、农民、青年、妇女、体育团体和没有组织的居民中加强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现在出现了吸收年青一代参加争取和平与民主、争取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斗争的新的可能性。列宁的伟大遗训——深入群众，哪里有群众，就在那里工作，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以便引导他们前进，应该成为每一个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

在工会运动遭到分裂的国家内和国际范围内，恢复工会运动的统一，对提高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和胜利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参加不同工会的劳动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近几年来最大的阶级战斗中，每当各种不同工会共同行动的时候，正是由于团结一致，它们才争取到劳动者的要求得到满足。共产党认为，现在存在着恢复工会统一的现实前提，并且将为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在那些实际上不存在工会民主的国家里，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要求经常进行工作，以便获得工会运动的独立，并且使一切劳动者的工会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而不受政治的或者任何其他的歧视。

和平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利益，还要求恢复其他一切群众性民主运动在国内的统一和在国际上的统一。在维护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和扩大民主权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扩大他们的社会权利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群众组织的统一。

作为社会革命主要动力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争取实现自己的任务的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仍然是工人阶级达到自己目的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统治阶级、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工会的反动领袖热中于在本国和在国际范围内保持这种分裂。共产党人

坚决主张克服这种分裂。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在使用镇压手段的同时，还采取欺骗和收买的办法。近几年来的事件再一次证明，这种分裂会破坏工人阶级的阵地，只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

某些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公开转向帝国主义立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分裂工人阶级。由于敌视共产主义，害怕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向反动保守势力投降。在一些国家里，右翼领导使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公开背弃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口号的纲领。他们以此再次向资产阶级效劳。社会民主党中对右翼领袖这一政策的反抗正在增长，它们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一反抗。赞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力量正在增长。社会民主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都拥护和平和社会进步。

共产党人将继续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立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践，并且将继续进行工作，促使社会民主党群众转到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共产党人坚信，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分歧，不应该妨碍对有关工人运动的已经成熟的问题，对共同斗争，特别是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交换意见。

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劳动者看作自己的阶级弟兄。共产党人常常同他们在工会和其他组织中一起进行工作，并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共同的斗争。

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共同行动，以争取立即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建立无原子区，在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取消设在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撤退外国军队，援助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保障国家主权，加强民主和反击法西斯威胁，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不减少工资的条件下缩短工作周等等。成百万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某些社会民主党，已经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示赞成解决这些任务。可以大胆地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如果克服了自己队伍的分裂，使自己的所有队伍统一行动，就能够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它们停止准备新战争，就能够击退垄断资本的进攻，就能够保证自己迫切的生活要求和民主要求得到满足。**

在争取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扩大和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争取各国人民间的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都主张同社会党建立合作。共产党人有严整的有科学根据的并由现实生活所证实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他们愿意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辩论，确信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把观点、思想和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比较，以便消除根深蒂固的成见，克服劳动者的分裂状态，建立合作。

帝国主义反动派力图引起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怀疑，继续吓唬群众，说什么共产党人需要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坚决驳斥这种诽谤。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认为，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一国家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不

能输入，也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它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结果。**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从来反对革命输出。同时，它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它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的一切内部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并且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防止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奋起革命的人民的事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发展道路，将取决于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取决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组织性和成熟程度，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反抗程度。不论建立什么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永远意味着扩大民主，意味着从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的民主。

各国共产党重申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形式问题的论点。

宣言指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

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只有广泛地不断地开展工农群众和城市等阶层反对大垄断资本、反对反动派、争取深刻的社会改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切。

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在我们的时代，当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最先进的学说，而且是实际存在的、已经证明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正在创造着特别有利的条件，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坚决揭露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共主义”，吸引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

反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早在工人运动的初期就已经产生。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反共主义变得更加恶毒和阴险了。反共主义反映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深刻的思想危机和极端严重的退化程度。它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粗暴地诬蔑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捏造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目的，迫害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和组织。

胜利地保卫劳动者的利益，维护和平事业，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一切都要求同反共主义——这个资产阶级用来把群众同社会主义隔离开来的恶毒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向群众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用革命精神教育劳动者，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并且根据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验向所有劳动者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向他们具体指明，社会主义给每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居民阶层带来那些实际利益。

共产主义使人们摆脱对战争的恐惧，保证持久和平；使人们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失业和贫穷，使人人生活有保障，保证他们有高度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他们摆脱对经济危机的恐惧，使生产力蓬勃发展，以造福整个社会；摆脱金钱对个性的压迫，使人们的精神得到全面发展，各种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在科学文化方面获得无限进步。除掉一小撮剥削者以外，居民的各个阶层都会从新社会制度的胜利中得到好处。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千百万群众了解这一点。

六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了我们时代影响最大的政治力量，成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共产主义运动在不断地前进，在团结起来和受到锻炼。

目前，世界八十七个国家中有共产党在活动。这些党的队伍中共有三千六百多万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辉煌胜利，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在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里，具有共同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继续联合起来。各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促进本国工人阶级同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巩固。

各国共产党队伍的成长和它们在组织上的巩固，一些国家共产党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加强，这一切都在为胜利地解决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开辟新的前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自己活动的确定不移的法则，必须像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统一，严格遵守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根据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重视党的领导机关在党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不倦地关心加强这些领导机关同党员以及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大力发扬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在自己队伍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自己队伍中企图使党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在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

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再一次光辉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和生命力，有力地驳倒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理论"。

正如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今后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

如果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它们使革命政党不能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根据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使共产党人脱离广大劳动人民阶层，使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消极等待或者采取左倾冒险行动，使他们不能及时地正确地估计变化中的局势和新的经验，使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不能利用一切可能性以有利于工人阶级和所有民主力量的胜利，从而妨碍各国人民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

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互相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

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全面共产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及其兄弟般的同情，鼓舞着所有共产党进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是在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表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联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学说的发展，都在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相互援助和支持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实际运用。

在目前条件下，思想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剥削阶级用日益加紧从思想上腐蚀群众的办法对抗社会主义的成就，竭力使群众继续作资产阶级思想精神俘虏。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思想战线上展开坚决的进攻，力求把人民群众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精神奴役下，其中包括从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力求在群众中传播保证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传播爱好自由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历史经验表明，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意识中还会有资本主义的残余。这就使党有必要展开巨大的全面的工作，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党和国家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和锻炼。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伟大的革命学说，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和平、自由和美好生活，争取建立最合理的社会——共产主义的伟大战斗的一切阶段上的指路明星。它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改造力量在于，它同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在全面分析现实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起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解决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切任务。

会议参加者认为，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团结，是联合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联合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它们争取全人类的光明未来、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的保证。

中央关于妥善安排
精简下来的职工的通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目前不少地方精简职工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一段的工作，一方面说明了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中，浪费劳动力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压缩出一批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战线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精简一批职工到农村中，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由国家工薪人员变成劳动农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搞得不好，就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波动和紧张，这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因此，这一次全面安排劳动力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劳动力；压缩各方面的民工；动员那些在城市还没有固定下来、容易回农村的劳动力（如临时工、自流农民和城市里的“黑人”，等等）到农村去。对于精简由国家开支工资的职工的工作，必须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该精简的必须精简，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做深做透，精简下来的人员必须妥善安排。各地精简下来的职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下处理办法：（一）一部分新吸收的职工不再由国家开支工资，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二）压缩县以上企业、事业的一部分职工到县办、社办企业顶替出一部分不熟练的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三）一部分较老的职工可以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但要切实注意不得与民争利；（四）一部分较老的职工可以仿照干部下放的办法，保留原工资，组织起来到农村人民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必要时经省（市、区）委批准再调回来。前两种人不可能很多，而且也不宜很多。

各地应该根据以上精神和中央五人小组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制定压缩职工加强农业生产的指标的通知”，对精简职工的工作，进行研究，提出精简指标和处理方案，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报中央五人小组。

中共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王任重同志的报告

陶铸同志并报主席：

（一）送上两个材料，一个是《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一个是《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沔阳县委在通海口公社搞好试点之后，全县其余的十个公社，分作两批，都搞了一遍，“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下一步将以抓生活、抓分配为中心，全面地贯彻政策，彻底地转变作风，整顿队伍，进一步扩大整风整社的成果。

（二）省委传播通海口公社的经验以后，全省大部分的县都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的县已经开始向面上铺开。全省试点和第一批铺开的公社，一共是一百五十七个，其中已经搞好的六十一个，正在搞的九十六个。这批公社，大部分是书记亲自动手，决心很强，放手发动了群众，所以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也有一部分是因为领导五心不定，方法不对，没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因而搞得不深不透。看来，要求各级领导都痛下决心，象通海口公社那样去干，并不简单，

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将进一步总结这批公社的经验教训，使今后的运动少走弯路。

（三）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的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十一日开始。这次会议，围绕着“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个内容，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整风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开始不作什么报告，不搞什么圈圈将大家的思想束缚住，而是让大家一起动脑筋，大家想，大家讲，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我们提出了“揭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的口号，要求大家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对三年来农业生产的评价问题，对三年来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价问题，对今冬明春如何过日子的问题，对明年的农业生产问题，对“三风一化”的问题，对从实际出发领导农业生产的问题，对党内的民主生活问题，对当前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问题，对农业第一，以及其他工作如何摆布的问题等等，都来一个畅所欲言，大鸣大放，把一切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端出来，实事求是地、大胆地揭发问题，首先是集中地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的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正确地接受三年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发愤图强，信心百倍地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去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真正放下包袱，我们宣布，凡是过去所说的，与这次中央的“十二条指示”有出入的，都不算数，可以一风吹，以中央的“十二条指示”为准则。我们宣布，过去三年所报的产量，凡是认为有问题的，都不算数，可以一风吹，照实重报。我们还宣布，这次会议，讲对讲错，一律不记账，一律不戴帽子。并且要求首先是地委、县委集中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省、地、县三级再作自我批评。总之，这次会议要打破老一套的开法，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党内的民主生活。会议打算开十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结果如何，容后再报。

此　致

敬　礼！

王　任　重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从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

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

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各县委）：

我省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也更进一步地检查了省委的领导工作。大家认为：自大跃进以来，省委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高举三面红旗，是坚定的、明确的。因而在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方面，在发展工、农、牧各业生产和发展财贸，文教、科学技术事业方面，在进行工矿交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在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缺点和错误，今年以来，在一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情况是严重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今年七月间，作过一番检查，向中央作了报告。十月初在省级机关集中进行"三反"时，又专门开了几天常委会，进行了检查。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省委先作了自我批评，地、县两级同志对省委领导也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大挖刮"共产风"的根源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地更加深化了。为什么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中央和主席三令五申也禁止不住呢？其根本原因，应当也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

我们检查，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刮“共产风”直接有关的，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

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从北戴河会议决议、武昌会议决议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所作出的十八个问题的规定，就已经明确地规定下来了。并且再三强调，必须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坚决贯彻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现在从全省工作状况来检查，省委领导上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是大大落后于中央的要求的。为什么落后呢？就是对中央的政策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

（一）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去年七月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求，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五年至七年内完成过渡。主要条件是迅速发展社有经济，使社有经济的收入超过队有经济的收入。办法是大量发展社营企业，主要是发展社办工业，也发展社办农、牧场和运输队等。要求到一九六三或一九六五年，全省社营企业、事业的纯收入达到二十亿元，公共积累提成五亿元，共二十五亿元。这个要求显然是很高很急的。到了下边，更是抢先求快，有些地方做出规划，要求一九六三年完成过渡，发展社营企业全面开花，片面追求产值，发生大量的“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在使用国家给予人民公社的投资上，今年二月省委曾决定，全部用于公社领导的水利建设和发展社办企业。这和中央规定百分之七十用于扶植穷队，百分之三十用于公社的精神，是不符合的。

（二）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省委对于小队工作，在很长时期内注意不够。地、县、社各级也普遍忽视。上海会议文件规定的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四固定和应有的管理权限，实际上没有贯彻下去。连省委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切实贯彻下去。如去年六月，省委转发了仲良同志“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种植密度、播种时间、施肥、灌水、调动劳力、耕畜等），就没有认真督促实行。高级合作社时候所形成的一套生产责任制吹掉了，又没有建立新的制度，就刮起了瞎指挥生产风。今年上半年，中央指示必须加强小队工作，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介绍了湖北省的经验，我们才逐渐重视起来。

（三）对于发展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重视不够，抓的不狠。由于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刮起了新的“共产风”，使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一直处在动荡不稳的状态中。省委曾指示底下合并较小的生产队，因为做得不是时候，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又由于吹掉了小队的生产责任制和小部分所有制，使生产经营指挥混乱，涣散无力。这样，就从上下两头削弱了生产队的经济，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

（四）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有两点定得不恰当。第一是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部分少。去年十一月，省委规定一九五九年收益分配，一般的扣留部分占百分之四十，社员分配部分占百分之六十，一部分收入较多的单位，社员分配部分可以占到百分之五十五；公共积累一般的占总收入百分之十五。因为没有详细规定总收入的计算方法，又存在估产偏高现象，实际执行结果，扣留部分高于账面数字，社员分配部分则低于账面数字，这是相当普遍的。第二，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工资、供给的比例，省委去年规定为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今年四月，省委又规定普遍实行粮食供给制，条件较好的地方实行伙食供给制。到八

月，看到有困难，才又改变过来，决定实行三七开，但仍然保留了实行四六开或对半开。由于这两点处理得不恰当，在目前生产水平下，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贯彻。同时，具体政策规定前后变动较多，对基层单位的执行也造成了一些困难。

另外，关于自留地问题变动也较多。一九五八年冬天全吹掉了。去年算账运动中一般的恢复了，个别社、队没有恢复。今年四月省委规定，将自留地收回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作为食堂菜地。下边执行情况很不一致，有的收回了一部分，有的全部收回了，有的把自留地上种的菜无偿地收归食堂。群众对于这件事意见很多。

为什么在执行中央政策中发生这些偏差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对于正确处理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革命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理解不深，对于不同发展阶段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区别这一点，是不够清醒的。在去年算账运动以前，是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而不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算账运动之后，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误认为基本队有制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因而在具体措施上，总想使社有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共产主义因素也多搞一点。再加在指导公社发展生产方面，有许多工作任务安排的不恰当。影响所及、底下的“共产风”就普遍地刮起来了。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之外，有些具体政策规定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在组织上也是有错误的。

二、关于工作任务的安排问题

去年以来，省委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有许多不够恰当的地方：

（一）关于劳力安排：去年冬季，省委要求各地抽调三十万人搞短途运输，动员二百万人大修水利，动员一百万人搞小秋收和多种经营。几项合计，约占全省农村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同一个时间内，这样大规模的动员，打乱了生产队、小队的劳动组织，很难实行正常的评工记分，就产生了许多“平调”现象。

（二）关于水利建设：今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二百零九座，一九六〇年完成一百九十一座，蓄水库容二十八亿立方米。到今年九月底，实际完成二十一座，占原计划的十分之一；蓄水库容三亿九千六百万立方米，占原计划的九分之一。动员劳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二百七十万人，除专区以上专业队七万五千人由国家发给工资以外，其余都是义务工，吃用由公社负担。

(三)关于发展养猪：去年十一月养猪会议提出发展养猪的数目，由当时的二百零三万头，至一九六〇年底发展到七百万头，增长二点四倍。甘肃日报社论表扬了办千头猪场、万头猪场。各地在执行中层层加码。甘南自治州提出办万头猪场二十个，千头猪场四百个。天水市提出，市办万头猪场，社办千头猪场，队办百头猪场。

（四）关于发展公社工业：去年十二月全省公社工业书记会议，要求一九六〇年每个公社建成九厂、一队，即农具制造厂、电（厂）、化肥厂、农药厂、综合加工厂、粮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瓦石灰厂、煤矿或采矿厂和建筑工程队。原来意图，是把已有的许多小厂子整顿

一番，加以提高，再求发展。但执行结果，公社乱调生产队的小厂子，调劳力调资材，大刮了一阵“共产风”。

（五）关于社办农牧场：今年三、四月各地召开六千会以后，各个公社纷纷办起农牧场。省委知道这种情况，没有抓紧研究，在政策上给以具体指导。发现有些地方调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劳力，提出了批评，但态度不坚决，没有认真纠正。结果办起来的农牧场，除少数是自己开荒和出价购买牛羊以外，绝大多数社办农牧场的土地、劳力、耕畜、羊群、都是“平调”来的。

（六）关于丰产方：今年二月，省委指示，要求队队（生产队）都搞丰产方，组织专业队。各地在执行中，又搞了不少新花样。定西地委提出，县办万亩丰产方，社办千亩丰产方。酒泉市搞了三个五千亩包谷丰产方，两个万亩棉花丰产方。青年团在全省抽调了七十多万青年、三百八十多万亩土地，组成了二万三千多个青年专业队。有的地方将青年妇女组成百花战斗团。有的地方以“农业大学”的形式办丰产方。这些组织，都是从各小队抽调得力干部、强劳力、好土地、好牲畜、好农具，甚至口粮标准还有优待。这种做法，很多社员不满意，有怨言，“他们是亲娘生的，我们是后娘养的。”

（七）关于建立商品基地：省委去年十月提出，在全省四十个县（市）的二百七十五个人民公社建立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商品基地，要求各地作出全面规划，逐步实现。但是对于土地、劳力、牲畜以及所有制问题应当怎样解决，都未作具体规定。西礼县用大量“平调”劳力、牲畜的办法，在一个月内建立商品基地二十七个。省委没有察觉这种错误作法，反而当作好的经验，批转各地参考。

（八）关于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建立副食品基地：这件事，省委去年就提出来，今年夏季又提出大办农场。在指示文件和会议上，曾再三指出，不能“平调”公社的土地、牲畜和劳力，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结果下面还是产生“平调”。有时省委机关在处理具体事情上也不够坚决，如省计委要求在榆中县拨给一些土地，省委办公厅就给县委打电话，给解决了。

上述工作任务，都是好事，也都有成绩，有的成绩很大；但也出了不少毛病，刮了很多“共产风”。原因何在？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中央和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把安排工作任务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热冷结合不够，有主观主义，对需要考虑的多，对可能考虑的少，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难以完成任务，就必然出现一些违犯政策的事。我们看问题常常带有片面性，看有利条件多，看困难因素少，向最好的方向努力想的多，从最坏的情况设想少。例如，我们掌握甘肃的特点，对更穷更白、干劲大这一面，是充分注意了，对于底子薄、困难多这一面，则注意不够。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铺开，给下面干部分派任务多，交代办法少，他们寻不上好办法，就想出坏办法，这就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多半是领导上逼着他们犯的。

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

各级干部作风有毛病，和省委的领导也很有关系。省委领导工作中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农业估产偏高。

有些地方的同志反映，从一九五六年起就有估产高于实产的现象。但影响大的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一九五八年原定估产一百八十五亿斤，去年秋季核实为一百二十亿斤，今年再次核定为一百一十亿斤，高估了七十五亿斤，为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九年原定估产一百三十二亿斤，今年核实为八十五亿斤，高估了四十七亿斤，为百分之五十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是一条客观规律。粮食估产偏高了，高得大大超过实际，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不利影响，使领导失去主动权。特别是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起了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以下六条：

（一）基数大，包产指标高，三包不能落实。去年五月下达包产指标二百亿斤，今年下达计划指标一百四十五亿斤，实际都没有包下去；

（二）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安排水利和农田基建任务过大；

（三）对农业生产盲目乐观，增加城市人口，从农村抽调劳力，数目都过多；

（四）粮食安排不落实，一方面，口粮指标高，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吃粮前松后紧。另一方面征购任务和水利建设用粮挤了口粮、饲料，这是今年一部分县、社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

（五）误认为农业增长很快，社员收入不低，就想多搞共产主义因素，快些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由于对客观情况的认识有片面性，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适当的宣传，作了一些不恰当的表扬，作了一些不很准确的批评。这些情况都助长了下面的"共产花"、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生产风，有些干部，不说老实话，不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很严重。也让某些不纯分子钻了空子，乘机违法乱纪，打击报复，陷害好人。

我们深深感到，正确地提出生产指标和严格核实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个严重问题，关系到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关系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关系到高举三面红旗。各项重要产品，都要切实注意核实产量，而特别重要的是粮食。粮食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估产有浮夸，盘子打的大，安排不当，牵涉各方，必然陷入被动境地。如果积极可靠，留有余地，藏一手，则立于不败之地，掌握主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去年主席写的那封党内通信，就是为的解决这个问题。今年六月北戴河会议时，主席又作了极为深刻的指示。我们对于主席指示的领会是很差的，贯彻执行也是很差的。

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十分严肃地执行党的政策，执行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对于党的政策，对于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不作认真的研究，不在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教育，不用全力去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思想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些都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对于一种带普遍性的缺点错误，没有十分坚决的态度，不用大力去抓，是纠正不过来的。对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去年十一月间开六千会时，就看到苗头，给各地同志打了招呼，提起注意，今年二月又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结果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领导机关对待政策的态度，领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被领导者，对于基层，是有重大影响的。必须肯定，在下面，有很好的党员，有很好的干部。去年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挂帅的地方，有些同志顶住了他们刮起的歪风。现在也检查出，在大刮"共产风"的地方，也有些同志坚决抵住了"一平二调"，不过，这样的同志的情况是少数。通常情况下，多数人是上行下效的。上边"失之毫厘"，下边"谬以千里"，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我们将深刻地记取这一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认真检查，努力改正。

现在看来，去年纠正"共产风"为什么不彻底？除了对党的政策钻研不透，贯彻不力而外，还由于没有联系到很好地安排各项工作任务，没有联系到改进领导作风。今年冬季的整

社就必须吸取这个经验。党的政策是统帅一切的，是为了调动全党全民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各项任务的。为了胜利地推进党的事业，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全党有一致的认识，用共同的语言，念一本经，而不是歪嘴和尚满天飞。其次，要很好地安排工作任务，使干部有高度的信心，旺盛的士气。否则，“政策是软的，任务是硬的”，丢了政策，也损害了任务。再次，要有良好的作风，也就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遇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艰苦朴素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样，才能使政策深入到群众中去，政策掌握了群众，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总之，必须使政策、任务和作风统一起来。在今冬整社，纠正“共产风”，一定要这样做。推而广之，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做。政策、任务和作风的统一，也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培养干部又红和又专的统一，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的统一。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这一条经验是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是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我们将用心地保存这项财富，充分地运用到今后工作中去，它的积极作用将是非常之大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检查和认识，是否妥当？请给予指示。

甘肃省委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党组：

我们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钢、铁、煤、运的生产一直都好。十一月中旬的平均日产量，钢达到了六万三千五百吨，铁达到了八万三千六百吨，煤（六十一个直属煤矿）达到了六十六万七千吨，铁路平均日装车达到了四万零六百辆，其中煤炭装车达到了一万五千五百辆。但是，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钢、铁、煤、运就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十一月下旬的平均日产量，钢为五万七千三百吨，铁为七万一千五百吨，煤为六十二万七千吨，铁路平均日装车为三万三千二百辆。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钢铁生产的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形，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上述生产的下降，虽然同气候寒冷、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短途运输和装卸力量不足等原因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在生产出现了一个高潮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组织管理工作，放松了具体措施，以致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出现了事故多、出勤率低、生产准备工作差、防寒、防冻工作不及时和检查不严等等问题。我们有一些负责管理生产的同志，没有预见到新的生产高潮出现以后可能产生的困难，没有及时地把这些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动员群众加以克服，这是我们主观上的缺点。

当前全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政策和安排好农民生活的同时，在工

业战线上防止松劲、畏难的情绪，鼓足干劲，加强组织管理工作。动员全体职工，战胜一切困难，为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任务而斗争。中央要求，十二月份的平均日产量：钢确保六万二千吨，争取达到六万三千吨，其中重点企业确保五万吨以上，争取达到五万二千吨；铁确保七万八千吨，争取达到八万吨，其中重点企业确保四万吨；煤（六十一个直属煤矿）确保六十六万吨，争取达到六十八万吨；铁路平均日装车确保四万一千辆，争取达到四万二千辆，其中煤的装车确保一万五千五百辆，争取达到一万六千辆。上述指标，大体上都是十一月上、中旬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的，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在当前的工业生产中，中心的环节是煤炭。煤炭的生产不仅决定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且关系到其他重工业生产、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我们必须首先紧紧抓住这个中心环节。中央要求所有的煤矿企业，都要在合理开采、保护资源、既注意采煤又注意掘进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争取超额完成上述指标。

为了实现上述钢、铁、煤、运的指标，为了保证今年工业生产的跃进，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当前必须抓紧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第一、抓统一调度。十二月份的煤、铁调拨计划，包括抢运存煤、调运高硫钢和硫铁的计划，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全局出发，按照先外后内、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保证实现。煤炭的分配，首先保证机车和轮船的需要，其次保证冶炼和发电的需要，其他由地方从全局考虑统一安排。生铁的分配，首先保证重点企业（包括非冶金部门的大平炉、大电炉）炼钢的需要，其次保证地方企业炼钢的需要，然后再供应重要机械铸造的需要和市场的需要。在目前煤炭、生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对于煤炭、生铁的使用，更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坚决把那些耗煤、耗铁高的高炉和转炉的生产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停下来，以保证生产条件较好的重点企业的需要。

第二、抓安全生产。所有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必须加强设备的维护和检修工作，并且准备必需的备品和配件，力争不出事故，保证正常生产。钢铁厂一定要保护好炉子，每个工作班都要有专门负责护炉的人。煤矿一定要注意搞好通风和支架，坚决防止发生煤尘、瓦斯爆炸和冒顶事故。所有的企业，都要加强保卫工作，严防敌人破坏。矿山、铁路、轮船和一切露天作业的单位，都必须认真做好对设备以及煤炭、矿石等物资运输的防寒、防冻工作。各企业防寒、防冻所需要的物资，必须保证及时供应。

第三、抓运输，特别要抓装卸、搬运、厂内运输和短途运输。为了改变目前厂矿、车站、码头物资积压的严重情况，必须首先加强装卸和搬运力量。这方面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设备，可以从建筑企业和水利建设单位抽调；仍然不足的劳动力，还可以请求当地驻军协助，或者调用准备下放农村的干部和工人。对此，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合理安排，避免浪费劳力。最近为保粮、保钢的短途运输所增拨的汽油，不许挪作别用。

第四、抓质量，抓节约。所有的企业都要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质量，特别要降低煤炭的灰分和含矸率，提高生铁和转炉钢的合格率，提高钢的出材率；并且节约原料、材料和燃料，特别要注意节约煤炭和生铁。一切用煤、用铁的单位都要努力降低消耗定额。在产煤、产铁地区更要节约用煤、用铁。所有冶金企业要力争用同样数量的煤、铁炼出更多、更好的钢来，并且为明年钢铁的增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第五、抓职工生活。在目前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生产任务繁重和气候寒冷的情况下，

必须十分注意职工的生活。灾区的工业生产要适当调整。对于在井下、高温、低温、高空中作业的特重体力劳动者和火车司机、司炉，必须按规定供应粮食和副食品；凡是不合理地降低了供应标准的，都应当恢复原来的供应水平和粮食品种。所有的厂矿都应当指定一个党委副书记和一个副厂长负责管理职工生活，首先要办好食堂，做到劳逸结合，要少开会议，少搞业余活动，控制加班加点，并且做好家属工作。所有企业都要在安排好职工生活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条件下，提高出勤率。在煤矿中，要把出勤率从现在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做好上述各项工作，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煤、运的生产任务的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各部门、各地区、各厂矿的党组织，在接到这个指示以后，应当把当前的生产情况和具体困难，把中央的要求和实现这个要求的紧急措施，都向全体职工讲清楚，使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并且为群众所掌握。只有这样，才能鼓起群众干劲，动员大家多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任务。

当前工业战线上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而时间又很短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每一个小时，把各项工作做好。我们既要抓得紧，又要抓得好。既要鼓足干劲，反对在困难面前低头，又要头脑冷静，讲究指挥生产的技能，坚决避免手忙脚乱，瞎指挥生产。在生产的安排上，我们必须维护全局的利益，集中主要力量抓煤、铁、钢、运，抓重点企业，又要全面安排，适当照顾其他重工业和轻工业，照顾一般企业。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努力，保证今年任务的完成，又要考虑到明年的需要，为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总之，我们要在今年保钢的最后战斗中，在总结经验、端正政策、改进作风的基础上，把我们领导工业生产的水平提高一步，把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提高一步，以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改变目前工业生产工作中某些被动的状态，而转入主动。我们的工作中是存在着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困难并不能阻挡我们前进，而恰恰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我们必须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始有终地取得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党委：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第215号① 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所述的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

① 即附件《贵州省遵义和毕节地区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略。

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还有百分之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要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各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继续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习惯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侵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或者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复辟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变化，经过一定时期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就会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革命衰退、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的党政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在现在所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当然，这不但在全国，就在山东、河南、甘肃、贵州说来，也还是部分现象，大好形势还占主要部分，但是，这部分现象却是大不好形势，性质极其严重。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更主要的是赶快将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抓生活、生产和劳动力安排，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先分是非，后清敌我。而党的政策真正为群众所掌握，局势就会扭转过来，工作也就会有所转变。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这一反映中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

中共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央看到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决议也写得很好。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十一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决议阐述了政治工

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强调指出在政治工作中要着重抓思想工作，而在思想工作中又要着重抓活的思想，指出在军队中贯彻“三八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把根子扎在基层的重要性。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林彪同志的提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会议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对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我军建设的方向，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所建立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永放光芒的。一九四四年，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继承了这个光荣传统，扫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全面地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工作更有显著的成就，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发扬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对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批判和纠正了以×××、×××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我军的政治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林彪同志提出的这四个关系问题，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这四个关系是：

第一，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对于革命军队来说，武器和人相较，人是主要的。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毛泽东同志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过去战争如此，在远程武器和核武器大大发展的现代条件下，仍然是如此。任何武器都要人来掌握，飞机要人驾驶，火炮要人操纵。从几千里外发射火箭、导弹虽然有重大作用，但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不在几千里，而是在几十米的搏斗，靠步枪、手榴弹，靠拼刺刀。进攻时，就要看在离敌人几十米时，能否冲上去，占得住；防御时，就要看在阵地前几十米能否大量杀伤敌人，顶得住。归根结蒂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看谁能过得硬。物质的原子弹是重要的，但精神的原子弹更重要。这种精神原子弹是我们独占的，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无法同我

们比赛的。

第二，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技术工作等等，但是领先的应当是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须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工作要渗透到各项业务中去，按照具体情况实行政治领导。要发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全体指战员都来做政治工作。

第三，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这两类工作都要做，但是重点应放在思想工作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要抓思想。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要在我们的军队中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应当把思想工作当作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人们的思想不同，工作的结果就不同。一切工作的收获，首先来源于认识的正确和思想的进步。

第四，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更要同实际结合。什么叫活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也就是说："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思想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抓两头：一头是抓党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的传达贯彻，一头是抓部队的思想动态。要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中间不要梗塞。要善于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各种现实问题，打好兴无灭资的思想仗，用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善于掌握群众生活的脉搏，掌握思想的变化规律，从现实情况出发进行思想工作。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大力扶植发扬；不良倾向一萌芽，就及时批判克服。

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当紧紧掌握这个方向。

会议认为，建国十一年来，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前进了，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在建军中，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整风运动，有效地进行了兴无灭资的斗争，保证了军队建设、作战、训练、海边防斗争、国防施工、参加国家建设等重大任务的完成。特别是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和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以来，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活跃了。但是，正如林彪同志和到会的同志们所指出的，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个时期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党中央、毛主席、军委的指示传达迟缓，贯彻执行不力，对下面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够，抓了许多业务性的工作，放松了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教育；工作浮在上面，没有面向连队，把根子扎在基层。政治工作的这些缺点和成绩相比，虽然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但是危害很大，必须坚决扭转，彻底改正。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敌

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依然存在。至于局部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作为世界上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军队，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的阴谋，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军全部工作的立脚点，必须放在准备应付新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这一方面，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同时，也要有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面临着同现代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在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中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些矛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在我军内部不断地反映出来。社会的不断革命，要求人们的思想不断革命。同时，解放以来部队成份有了很大变化，大批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成份加入我军，他们未经战争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思想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对老干部来说，也存在着需要继续提高和不断改造的问题。胜利的军队容易骄傲自满，贪图安逸。长期的和平环境又容易使人思想麻痹，放松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严重地侵入我军肌体，腐蚀人们斗志，败坏我军传统作风，损害我军战斗力。历史经验证明，对于革命军队来说，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威力巨大的武器，都是不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在政治上衰退，脱离人民群众，思想上解除武装，松懈以至丧失战斗意志。因此，在做好准备迎击帝国主义向我发动战争的一切工作中，首要的是政治思想准备。只有通过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鼓舞人们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意志，发挥人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军委扩大会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志们，必须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努力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加强革命化，加速现代化，坚持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准备解放我国领土台湾，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奋斗。为了坚持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把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提高一步，特作如下决议。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建国十一年来，全军在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但是由于认识不足，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措施不够有力，部队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

宣传，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入，学与用结合不紧。这些是必须纠正的。我们一定要领导全体官兵，首先是干部，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且把毛泽东思想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

二、主要的措施：

1．大张旗鼓地反复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通过作报告、报刊发表文章、编写通俗读物、召开学习心得会和讲演会等等，进行宣传。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同志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实践，处处可以作我们的榜样，作我们行动的典范。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他如何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永远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刻苦的学习精神。每个同志都必须以毛主席为榜样，彻底改造自己。

2．及时地传达党中央关于当前革命斗争的指示、决议，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重要的行动指南。政治挂帅，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当把传达和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作首要职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必须认真负责地、全面地、系统地逐级传达，一经下达，就应闻风而动，立即认真学习，认真研究，认真领会，结合实际情况，订出有效措施，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执行。

3．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方法，使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要全面改革军事、政治训练，教材中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的部分，必须彻底革除。

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经出版，这本书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纪录，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必须大力宣传和组织学习，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4．必须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锋利的战斗武器，发挥它的革命光芒，同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教育干部认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揭露其为帝国主义擦脂抹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阻挠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罪恶阴谋，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

5．学习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要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一切行动，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运用。

6．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具体指导，拟定学习计划，培养学习骨干，检查学习效果，总结学习经验，使学习步步深入，不断发展。

7．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研究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他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伟大成就（包括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战略战术和军事辩证法，军队政治工作等等）。要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引出科学的而不是臆造的结论，善于用实践的经验阐述和发挥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工作方面，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和科学研究机关要下决心作出成绩。

8．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这个结合的代表，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结合的产物。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我军中一切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理论知识的干部，都应当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研究的方法，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要“有的放矢”，努力学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不当作行动指南的教条主义态度。过去在我军中，曾经有人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为借口，来排除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性，这种荒谬的观点，必须坚决反对。在我军中，曾经有人提倡过的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脱离实际、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也必须彻底纠正。

（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路线。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体现。几年以来，我军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只靠少数政治工作干部、少数先进分子做工作，而不发动广大群众去做，使政治思想工作冷冷清清。三大民主的传统有所削弱。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特权思想，缺乏平等待人精神和民主作风，管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改进的办法：

1．发动全军上下，人人都做政治工作。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是党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是发动拿武器、穿军装的群众。政治工作要发动广大群众，依靠所有干部，动员全体党员、团员去做，人人开口、人人监督、互相鼓励、互相批评。政治工作是全体干部共同的责任。批判那种不问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单纯业务观点，彻底改变那种只依靠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做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政治工作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运动，使政治工作在广大群众中扎根，造成生动活泼、热气腾腾的局面。

2．重申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度。放手发动官兵群众，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发扬政治民主。保证每个革命军人都有同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及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的权利，都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或者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批评上级或越级向上级提出意见的权利，有建议推荐和撤换基层干部的权利。干部要接受战士群众的监督。要坚决同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行为作斗争，保障战士的民主权利。

发扬经济民主。健全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和农副业生产，监督经济开支，结算公布账目，办好食堂，改善生活，防止贪污、浪费、违反政策和干部侵占战士利益的现象发生。

发扬军事民主。训练中坚持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传统，提倡评教评学。担负战备和战斗任务的部队，对有关本连的作战计划，只要条件允许，都应发动群众讨论执行办法。

军队民主生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利于完成任务，有利于加强团结，巩固纪律，提高战斗力，防止极端民主化。

3．恢复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使之成为党支部领导下的、在连长和政治指导员指导下的连队统一的群众组织。革命军人委员会由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其中战士代表要占三分之二。下设经济委员会和俱乐部等组织。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领导之下开展三大民主，并组织群众的课外学习，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4．改善管理教育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切干部都要用平等待人的精神对待战士，把战士当作阶级兄弟，善于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提高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防止单纯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强制方法去推行工作和处理问题。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倡群众性的互助。对待落后战士，应当坚持教育改造的方针，耐心地帮助他们，决不可讽刺挖苦，侮辱人格，对于他们微小的进步也要热诚鼓励。战士犯有过失必须执行纪律的时候，也应讲清道理，真正达到教育同志改正错误的目的；决不许滥用职权，乱施惩罚。干部要爱护战士，如有虐待战士违法乱纪者，应受到处分；战士应当尊重干部，服从命令，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5．干部要跟战士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反对特权思想。基层干部和到连队工作的干部都应一律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处处作战士的表率；营、连、排干部除星期六、假日轮流回家住宿以外，其余时间应住在营部和连队。坚持干部下连当兵的制度，恢复和健全干部查铺、查哨制度，切实做到官兵一致。

6．坚持革命军人代表会议制度。团或相当团一级的单位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部队首长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反映战士的正当要求，调整官兵关系；报告和讨论形势，动员执行新任务；检查部队贯彻三八作风的情况。

7．大字报经常化，作为部队民主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大兴三八作风

一、我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一种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把这种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简称为“三八作风”。三八作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本质的集中表现，是我军训练、作战和一切行动的准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三八作风是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队的固有作风，这种作风是我军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一旦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就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有了这种优良作风，在战时，就能够压倒一切敌人，打不垮，拖不烂，攻必克，守必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平时，就能够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多快好省地完成各项任务，使我军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

二、培养三八作风的办法：

1．反复教育，启发自觉。三八作风的养成，主要靠政治思想教育，靠启发群众自觉。培养三八作风的过程，也是兴无灭资、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要经过思想教育，充分发动群众，造成群众舆论，养成习惯，形成风气。做到人人讲三八作风、事事讲三八作风、时时讲

三八作风。

2．干部带头，为人表率。培养三八作风，首先要从干部做起。干部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群众，对于培养优良作风有决定性的影响。各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把三八作风带起来、传下去。领导机关和学校要成为培养三八作风的模范。

3．经常培养，实际锻炼。好作风是靠平时炼出来的，靠战时打出来的。在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须经常提倡，经常检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抓紧三八作风的锻炼和养成。

4．抓住重点，边破边立。每年进行一次整顿作风的群众运动，联系实际，有重点地进行检查，表扬和推广好作风，批判和纠正坏作风。

（四）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

一、我军大多数成员政治坚定，思想健康，斗志旺盛，好学上进；但是在一部分人员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

1．政治上右倾。有些人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抵触态度。缺乏不断革命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遇到一些困难，就牢骚满腹，夸大和挑剔缺点，少数人甚至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

2．害怕战争。有些人被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所谓“现代战争要毁灭全人类”的谰言所吓倒，说什么“最坏的和平也比最好的战争好”等等。其中错误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是个别人，多数是政治落后，思想糊涂。

3．斗志衰退，贪图享受。有些干部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工作消极，不负责任，对部队管教不严，纪律松弛，部队责任事故不断发生，造成巨大损失。有些人追求名誉地位，关心个人和家庭比关心工作、关心集体为重；留恋城市，不愿到艰苦地方去工作；不爱学习，对政治不感兴趣。有些人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模仿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玩弄女性、违法乱纪。

4．无组织无纪律。有的干部不尊重甚至违抗党和上级的指示、命令，对下不及时传达党和上级的指示，对上不请示不报告，实行封锁。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目无组织纪律。

5．军阀主义残余。有些干部对战士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以特殊人物自居。公开侵占战士利益，不关心战士生活，管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工作中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弄虚作假。

6．腐朽的自由主义。有些人对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不揭发，不反映，不斗争，不制止。对原则问题不坚持，不争论；对非原则问题却斤斤计较，闹无原则纠纷。

不良倾向产生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少数品质恶劣、政治不纯的人混入部队，也带来了坏思想和坏作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缺乏无产阶级战斗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麻木不仁，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处理不及时，不坚决，放任迁就，助长了歪风邪气；领导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对基层单位的问题缺乏检查，对分散单位放松领导，等等。因此，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反对一切不良倾向。

二、克服的办法：

1．教育全体干部战士认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使他们在大风大浪中能够站稳立场，分清大是大非，永远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忠实于党，忠实于祖国和人民，忠实于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和人民的大事，关心公共事业，处处为人民着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着想。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从服长远利益。时时刻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有旺盛的战斗意志。永远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永远迈着革命步伐，决不在中途停顿下来。

2．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毛泽东同志《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为座右铭，为了革命的利益积极地拿起思想斗争的武器，敢于坚持正确的原则，敢于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斗争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一斗二帮，是按照问题的性质、程度和犯错误者的态度区别对待。对犯错误者的多数，是通过说服教育和思想批判，促使他们觉悟，自觉下楼梯，自已解包袱。但是，对少数情节严重、屡教不改、影响恶劣者，不论他们的功劳多大，职位多高，都必须严肃处理，给以应得的处分。

3．领导抓紧和群众监督。领导上发现了不良倾向的苗头，就及时抓住，进行纠正，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不使问题成堆。要依靠群众的监督，造成舆论力量，领导与群众结合，使坏人坏事和不良倾向站不住脚。

4．对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坚决抵制和加以肃清。严格禁止看黄色小说、反动书报和收听敌人的广播。对政治不纯的人员要认真审查、处理，对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清洗。

5．强调各级党组织管干部，任何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都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服从党组织的管理，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充分发挥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作用，使它真正成为党委反对不良倾向和维护纪律的有力助手。

（五）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

一、以革命斗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中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着重抓活的思想，抓实际的教育，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但是近几年来这方面有些削弱，在政治教育工作中尚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宣传、研究不及时，不深入，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教育不经常，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动态调查少、综合研究少，没有把抓活的思想摆在政治教育的第一位。理论教育有时片面地强调书本知识，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完整”和“系统”，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必须加以纠正。

二、改进的办法：

1．要抓两头。及时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组织学习党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领导干部定期地向部队作时事政策报告，并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经常了解部队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军委指示中的思想反映，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典型调查，抓住思想本质问题，对症下药，集中力量打好思想仗。

2．活的思想教育的内容：

（1）党的路线、政策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2）国际国内形势和斗争任务。

（3）不同部队（如各军种、兵种、边海防部队、人民武装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医院、兵站、仓库等等）的不同任务。

（4）不同类型的人(如老战士、新战士、伤病员、青年知识分子、受了处分的人等等）的不同思想问题。

（5）我军的光荣传统（我军建军宗旨、领导制度、政治工作制度、三大任务、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尊干爱兵、我军历史和英雄事迹）。

（6）革命节日。

（7）表扬好人好事，批判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

（8）各种现实思想问题。

3．活的思想教育的方法：

（1）政治运动和经常教育相结合，既要重视政治运动，又要抓紧经常教育。不要运动来时抓一下，运动过后万事大吉，思想工作要不间断地进行。

（2）师以上各级政治机关要随时随地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和任务，编写一些讲话材料和点名口号，或者召开教育准备会部署现实思想教育。

（3）通过参加国家建设和群众运动，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生产劳动、抢险救灾等活动，增强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提高阶级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开阔眼界，丰富头脑。

（4）广泛地又是灵活地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以理服人的原则。

（5）政治教育的方式要多样。除上课、集训、开讨论会以外，还有：首长讲话；回忆、对比；个别谈话；早晚点名呼口号；墙报、大字报；讲演会、展览会、晚会；请地方干部和群众作报告，等等。

（6）部队的文艺工作和文化活动，如文工的演出、业余文艺活动、电影、广播、美术、图书工作等，都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4．在干部中，特别在宣传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员中，必须对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继续进行检查和批判，全面彻底地贯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教育方针，着重抓活的思想，克服任何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兴无灭资，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增强斗志。因此，教育中要善于把革命斗争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来说明和解释。提倡抓活的思想，并不是可以忽视理论，不要读书。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好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用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六）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一、连队是执行战斗、训练和一切工作任务的基层单位，政治工作必须扎根于连队。加强连队工作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近年来，党支部工作基本状况是好的，但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表现在：

1．部分党支部的集体领导没有形成，少数干部把个人置于支部集体领导之上，往往个

人决定重大问题。

2．有些党支部对思想领导抓得不紧，支部会议很少讨论政治思想工作，党员之间思想斗争不开展，原则空气不高。一部分党员战斗性不强，对不良倾向抵制不力，发现了坏人坏事也不及时反映。

3．党员数量少。目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连队（基层单位）没有建立支部委员会，很多排没有党的小组，不少小的技术单位没有党员。

4．有些党员模范作用差，不能带领群众，不少党员干部不关心战士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疾苦，管理和教育方式不好，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5．党日时间常被侵占，党课上得很少，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全。

二．改进的方法：

1．加强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连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党的决议和上级的命令、指示、主要工作安排和检查总结，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动态，干部的提拔和配备，以及奖励和惩罚等等问题，都必须经过支部委员会讨论决定。支部书记应当依靠自己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行动，形成支部集体领导的核心。支部应经常研究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进行思想摸底，并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2．把反不良倾向斗争列为支部经常的战斗任务。教育党员坚持原则，敢于向坏人坏事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为了能够及时反映连队的真实情况，防止和克服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各种不良倾向，连队党支部委员会中应设一名联络委员，这个联络委员应当从最好的战士党员中选任，师、团政治机关可专门召集他们开会，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3．积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使连队经常保持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发展党员首先要注重政治质量，做好考察教育工作，成熟一个接受一个。义务兵只要具备入党条件，就应吸收入党，不应受服役年份的限制。要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建立支委会。并通过发展和调配，做到每门火炮、每辆坦克、每架飞机和其他技术小单位都有党员。连队至少经常保持十五名左右的党员。

4．健全党的生活。支部大会要真正成为连队的最高领导机关。支部大会的议程一般应包括：传达和布置执行党和上级的决议、指示；听取和讨论支委会和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报告；讨论形势和本连的政治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提出建议。每个党员必须经常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反映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干部党员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在党内进行检讨和批评，把干部置于党的严格管理之下。

5．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党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处处作群众的表率，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多做工作，不计报酬；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关心群众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疾苦，虚心向群众学习，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团结带领群众完成一切任务。支部应根据不同任务，对党员的模范作用提出具体要求，经常进行检查评比。

6．加强党的教育，坚持党课制度。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上级党的决议、指示，学习党章和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的文章，学习党员的模范事迹，结合检查党员的思想和工作，总结和学习支部工作的经验，以达到增强党员党性，提高党员活动能力的目的。党日制度必须坚

持。党日时间要用于召开党的会议，进行党内教育，并向非党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工作。师、团政治机关的党员干部应有组织地下到连队参加和指导党日活动。

7．军、师、团的党委委员和司、政、后机关的负责干部，都要直接联系一个或几个支部，经常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师、团政治机关要有计划地训练支部骨干，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和支部委员专业会议。经常针对支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小整风”的方法，边检查、边整顿、边教育，提高支部的战斗力。

（七）加强青年工作

一、青年工作在我军有着优良的传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部队领导上对青年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治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一般化；青年团的助手作用和青年的突击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二、改进的方法：

1．各级领导和全体干部要认清青年工作的重要性。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是我军源源不断的新血液，是部队工作的主要对象。必须把青年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在完成各项任务中，成为一支生龙活虎般的突击力量。各级党委和各级政治机关必须重视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动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来做青年工作。

2．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1）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的头脑。（2）在青年中要不断地进行我军优良传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维护党的利益，积极向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3）发动青年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熟练地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装备，精通业务。

3．围绕部队的中心任务，适应青年的特点，在青年中开展五好运动，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五好运动内容是：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4．加强团支部建设，积极作好发展团员的工作；坚持团课制度，提高团的骨干和团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活动能力，发挥团员的模范作用。经常地有计划地输送优秀团员到党的队伍里来，使团员真正成为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助手。各级党组织应当密切关怀共青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5．发动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卫生运动。青年团员要成为活跃部队的骨干。

6．为了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密切领导机关和广大青年的联系，培养青年工作干部，在团以上政治机关恢复青年工作部门。

（八）政治指导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连队政治指导员是政治机关派到连队进行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人员。目前连队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思想健康，干劲很大。存在的问题是：抓行政事务多，抓政治思想少，对我军指导员长期形成的以身作则、联系群众、说服教育等优良传统，体会不深，贯彻不够；不善于通过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工作，推行工作时使用行政手段多，启发引导少；个别人政

治不纯，品质不好。这些情况，急需改变。

二、今后的要求：

1．政治指导员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集中精力做好支部工作，搞好政治教育，领导好连队的群众组织，结合连队实际，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的贯彻执行。

2．指导员要起模范作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执行上级命令、指示，以及在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各方面都成为群众的榜样。指导员的模范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指导员的工作作风应当是：（1）依靠党团，联系群众；（2）思想领先，说服教育；（3）实事求是，雷厉风行；（4）三八作风，处处表率。

3．连队指导员必须坚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成为群众的知心人。要做到：

（1）经常深入班排，倾听战士的意见，进行个别谈话，组织群众性的思想互助。熟悉全连人员的姓名、籍贯、出身成分、社会经历、思想品质、特长和个性。对战士中的问题要知道得最早、最清楚，反映得最快、最准确，处理得最好、最及时。

（2）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支部决议，不断向领导反映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执行每一重要任务，都要向群众讲清目的和意义，交代政策和办法，指出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发动群众鸣放辩论，出主意，想办法，把领导意图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3）对落后的和有过失的战士，必须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热情帮助，说服教育，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反对打击、压服和一切简单化的做法。

（4）经常宣扬先进思想和好人好事，批判错误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提高思想工作的战斗性。

4．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否坚强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指导员的质量。政治指导员必须从经过实际锻炼和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连排干部和基层技术干部中挑选。条件是：阶级觉悟高、思想品质好、模范作用强，密切联系群众，又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政治工作能力的优秀党员。

（九）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一、加强我军现代化、革命化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必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我军贯彻执行了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培养了大批干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干部队伍更加纯洁；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军事素养和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大批新干部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缺乏战争锻炼和实际工作经验，其中大量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思想还没有彻底改造；还有不少没有当过战士的人，从学校出来就直接当了干部。有的单位配备干部中，重才轻德。在学校和在职干部的训练中，没有很好贯彻“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贪多求全，效果不好。

二、今后的办法：

1．选择和配备干部，必须注重政治条件，决不能只是看到文化高、技术好，而对政治

条件有所忽视。要特别注意从政治运动和实际斗争中去考查和鉴定干部。注意物色核心干部（党委书记、支部书记）。

2．基层干部应当着重从工农出身的优秀的战士（包括技术兵）中选拔，这是今后我军基层干部的主要来源。

3．大胆选拔新生力量，培养接班人。老干部应当亲自负起带徒弟的任务。认真地有步骤地选拔一批德才兼优并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年青干部和战斗骨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和其他重要岗位上，大胆使用，积极培养。

4．整顿政治干部队伍，提高政治干部的质量。思想作风上有缺点的，要加紧教育改造；品质恶劣、屡教不改的，应当坚决撤换。

5．对于没有当过战士的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要坚决下放到连队当兵，锻炼一个时期以后再当干部，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抓紧他们的改造和锻炼。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学校，应当把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列为学校的一项基本任务。

6．办好院校，使全军干部都轮番进学校学习。学制要短，除某些技术学校外，应多采用半年到一年的学制。教育内容要压缩，突出重点，抓住精华，使干部学得精通。教育计划要合乎实际的需要和可能，用得着的就学，用不着的就不学，把急需学的首先学到手。每天上课时间不要太长，要留出适当的复习的时间。要发动群众，不断地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制度，贯彻“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真正做到教学的多快好省。

7．在职干部应当边工作边学习，学习服从工作，学习为工作服务。一般情况下，除政治运动外，规定干部全年的军事、政治、文化、业务学习的时间（集训在内），不得超过干部全年工作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干部的文化教育也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时间不可过多。一般军事、政治、后勤干部主要是学习语文、算术；特种兵干部和技术干部除学习语文外，还可以学习其业务所需要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各种学习要统筹兼顾，统一安排。注意劳逸结合，使干部得到正常休息，有思考问题和业余活动的时间。

（十）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我军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提高我军的技术、业务水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加速现代化，这是我军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在坚强的政治基础上加上现代化，我军就将无敌于天下。现在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军种、兵种的合成军队。我军的技术装备，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必须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工作，充分做好人的工作，发挥人在掌握技术中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二、主要的办法：

1．政治工作人员应当深入到技术、业务的实际活动中去，研究和创造适合技术训练、工程作业、技术管理等特点的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要学习必要的技术、业务知识，摸清思想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政治工作的一般化，同时要发动广大技术干部做政治工作。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也要反对不问技术、业务的空头政治家。

2．加强科学研究部门和技术院校的政治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贯彻执行党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号召大家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向

"高、大、精、尖、新"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必须严格遵守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保密制度。科学研究人员应当埋头苦干，做国防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军队的政治机关要经常关心和帮助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单位的政治工作。

3．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提倡能者为师，组织技术协作，解决技术难点。贯彻专业研究与群众的发明创造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发明创造的鉴定和推广工作。

4．加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之又红又专。为了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应当适当减少他们一些社会活动，从各方面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5．发动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掀起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潮，努力学习射击，尤其是炮兵射击。举行射击比赛，有计划地培养特等射手。继续在部队中开展一专多能运动，做到一兵多用，在战斗中能够相互代替职务。

6．开展安全运动，动员群众坚决同事故作斗争，大大减少一般事故，消灭严重事故，防止职业病。发扬认真负责踏踏实实的精神，反对粗心大意，盲目蛮干，违反操作规程等无组织无纪律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加强教育和管理，建立按级负责制度；改进各种安全保险的技术措施；抓住重点和关键，深入检查，定期评比；发现征候，立即处理。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心，是防止事故发生的重要环节。

7．教育全体指战员爱护武器装备。提高战备观念和勤俭建军的思想，加强管理、维修和保养工作，使各种武器装备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年限，最充分地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作用。同时，要十分注意节约油料、器材和各种资财。

（十一）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民兵工作

一、我们军队，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既是社会主义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设建者。我们必须紧紧地同人民在一起，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我们必须做好民兵工作。根据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这个战略方针的需要，来加强我们的国防事业。

二、主要的工作：

1．根据国家建设不同时期的需要，从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和参加经济建设和群众运动，特别重要的是，在可能的条件下，从劳力和技术上大力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遇有紧急灾情，必须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军队应当积极参加地方工作，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在参加地方工作中向地方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作风。部队要利用训练和工作间隙，进行一定的农副业生产，做到菜蔬和肉食的自给或部分自给。

2．发动全军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发扬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在各项工作中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教育自己的家属努力生产，勤俭持家，不要特殊化。

3．坚持一年一次的拥政爱民运动，经常教育部队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定期检查驻地群众纪律和遵守法令政策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通过参观、访问与群众一起劳动等，提高阶级觉悟，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

4．加强民兵政治工作，贯彻党的全民皆兵方针。各省军区、军分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大

办民兵师，做好民兵工作，发挥民兵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教育组织、体育组织的作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建设。各部队、各院校，应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本着服从生产、围绕当地中心工作和便利群众的原则，采取分片负责的办法，帮助驻地党委和人民武装部门搞好民兵训练，向民兵宣传我军的优良传统，培植三八作风。加强征兵退伍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做好复员军人的教育工作，使之成为生产建设和民兵建设的骨干。民兵必须注意成份的纯洁。民兵必须放在可靠的党员干部的领导之下。

5．广大驻守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要成为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树立热爱边疆，以边疆为家，以艰苦为荣，长期建设边疆的思想，以最大决心和毅力把边疆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边疆，一切害怕艰苦，不安心边疆工作，要求"换班"等等错误思想，必须坚决克服。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鼓励复员军人就地安家，参加生产，并积极培养当地的民族干部。边防部队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贯彻中央、军委及上级机关有关边防斗争和边防建设的政策、指示，做到人人懂政策，个个遵守纪律。

6．守岛部队，要牢固地树立"依靠群众，以岛为家"的思想，实行军民联防，帮助居民发展生产，使每一个设防岛屿，战时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海上堡垒，平时成为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乐园。

（十二）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的领导

一、我军各级党委已经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在部队中有高度的威信，从而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军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我军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这种领导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目前在党委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以下缺点：

1．对行政、业务工作抓得多，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少。讨论工作往往偏重于研究指标、措施和一些事务性的问题，而很少着重讨论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问题。

2．在首长分工负责方面，存在"分工即分家"或者"分工不负责"的偏向；有些党委内部不够团结，集体领导不够健全；没有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3．没有充分发挥政治机关作为党的工作机关的作用；有些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没有以主要力量抓政治思想领导。

二、改进的方法：

1．党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方针、政策问题。党委讨论、布置各项工作，都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来指导具体工作；对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要经常从方针、政策方面进行检查；对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政策的思想行为，必须坚决进行斗争。

2．各级党委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到首要位置，经常对部队的思想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对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专门讨论，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行检查和指导。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要做到：看清形势，指明方向，提出任务，交代政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3．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切实执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除紧急情况由有关首长紧急处理外，都应由党委讨论决定，不允许个人包办和专断。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党委既要把军政首长和各部门置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之下，防止各自为政；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可包揽一切。各个首长和部

门，既要及时地将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向党委报告、请示，提交党委讨论决定；又要勇于负责，根据党委的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不应事事依赖党委，使党委精力分散，失去重点。党委内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互相之间的团结，做到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加强党委集体领导的根本保证。

4．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必须认真负责主持党的全盘工作，并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政治思想、抓方针政策。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党委作出决议以后，政治机关就要从政治思想、方针政策方面，检查和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5．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以取得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密切军队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加强工作上的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6．为了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集体领导，在军（省军区）以上各级司令部、政治部，建立党委会（其性质大体相当于地方机关中的党组）。

（十三）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

一、政治机关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指挥部。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讲究工作方法。我军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主要表现在：

1．工作的重点摆得不当，过多地忙于日常事务，忽视思想性的工作。

2．浮在上面，不是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会议多、文件多，上面的干部到基层少，下面的干部到机关多，形成机关和连队脱节、干部和士兵脱节的反常现象。

3．抓不住中心环节，布置工作往往并列平推，有目无纲，形不成拳头，打不了“歼灭战”。

4．有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对党和上级的指示不是立即研究执行，而是迟缓、拖拉，常常丧失时机。

5．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提任务、订指标，往往不照顾实际可能，不留余地，层层加码，规定过死。作风浮夸，赶进度，走过场，追求表面成绩，忽视实际效果，甚至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

二、改进的方法：

1．政治机关必须把主要力量用在思想工作上，及时传达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决议，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各项工作中实行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在各个思想领域里坚持兴无灭资斗争，打好思想仗。

2．提倡深入基层，反对高高在上。减少会议和其他上层活动，领导干部要带头下去，深入基层，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到落后的单位和偏僻的地区，亲手“解剖麻雀”，取得第一手经验，既“蹲点”，又“跑面”，就地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对第一线、边防、海岛分队，尤应给以特别的关怀，注意研究其工作特点，加强其政治思想领导。在分散执勤小单位较多的地区，应就地区划片，指定当地一个最高的政治机关统一进行政治思想领导。

3．提倡雷厉风行，反对拖拉作风。对党的决议、号召，必须闻风而动，说干就干。对下面的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地了解和掌握。提倡紧张、快干，又要注意劳逸结合。

4．提倡抓住中心，反对平推并列。对每个时期的工作，都要抓住主要矛盾，纲举目张，中心带动一般，用打“歼灭战”的方法，贯彻始终。业务工作必须服从中心工作，业务部门不得自成

系统，条条下达任务。政治机关的力量不要平均使用，宣传部门和组织部门的机构应适当加强。

5．提倡活的领导，反对文牍主义。要观察形势，辨别风向，与人通气，多谋善断。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不要专靠文件办事。发文件也要简明扼要，不要冗长空洞。上面来了任务要抢着干，检查和指导要及时，不要只是事后总结。对待群众运动要满腔热情，积极支持，新鲜事物一露苗头，就要立即抓住，扶植推广。

6．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提任务、订指标，要经过调查研究，多同群众商量，做到既先进又可靠，留有余地，不满打满算。各项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件件有措施，处处有着落。衡量成绩应以是否提高战斗力为标准，讲求质量，讲求实效。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要严肃地纠正偏差和缺点，做到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必须杜绝。

上述工作方法，不单是政治机关必须遵行的，其他领导机关和一切工作部门也应当采用。

（十四）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我军前进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必须迅速地深入地将这次会议的决议传达和贯彻下去，以达到统一认识，端正方向，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目的。今后，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军区、院校，每半年应将本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军委和总政治部。军委每年检查一次。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一）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有分析，有办法，有步骤。现在转发给你们，要好好认真读几遍，好好研究几遍。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

（二）事实告诉我们，对第三类的社、队只要领导上头脑清醒，认真宣传和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尤其是要信任和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敢于揭露情况，就能够迅速掀起整风整社的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完全扭转三类社的局面，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

（三）生产队成立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这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对一切的社、队，都有普遍的意义。中央建议一切公社和生产队都应该成立这样的代表会。公社一级的代表会，应该是由生产队社员选出的代表组成。具体办法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办理。

（四）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情况的报告》略）

中　　央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一年一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九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三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七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二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九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对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全会热烈欢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并且将坚决为实现会议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全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高举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团结，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的胜利。

八届九中全会还听取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在一九六〇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由于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钢产量已从一九五七年占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产量已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机床的拥有量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多。工业总产值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提高一倍多。农业方面，

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〇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但是，过去三年中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效的灌溉面积三年中增加了三亿多亩；农业技术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三年中排灌设备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但减轻了过去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八届九中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渡过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并且为今年农业的增产做好准备。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以便逐步改善供应状况。

八届九中全会建议国务院根据全会所决定的方针编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加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目前时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全国城乡居民中，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和政策的，他们知道党和政府将坚定地领导他们渡过目前的暂时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并且积极地热情地帮助党和政府这样作。但是也有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如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说，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中，百分之九十几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而百分之几却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一些坏分子，也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由于反动阶级的影响和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和城市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利益。此外，在好心好意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缺乏认识，对于党所反复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缺乏足够的了解。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在农村和城市的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成效。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这一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

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把经过认真考查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极少数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防止和制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这些工作，全会认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八届九中全会着重指出，一九六一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但是，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依靠三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依靠整风运动，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八届九中全会对于工农业战线上的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表示慰问，并且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争取在工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战线上完成新的任务。

八届九中全会考虑到过去三年中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即中央东北局、中央华北局、中央华东局、中央中南局、中央西南局和中央西北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

李 富 春

我现在向全会提出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请予审查。

一

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全国人民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一九六〇年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

根据初步统计，一九六〇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千一百四十亿元，超过计划四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实际数字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比一九五九年公布数字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合计，工业总产值增长二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一九六〇年，在三十六种主要重工业产品中，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钢、生铁、发电量、原油、水泥、冶金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机车、动力机械、机动脱粒机、汽车配件等十二种；达到原定产量计划的有原煤、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三种；完成产量计划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钢材、铜、原木、烧碱、发电设备、起重运输设备、货车、机引农具、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等九种；完成产量计划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有铝、硫酸、纯碱、化学肥料、小机车等五种；完成产量计划在百分之七十以下的有合成橡胶、化工设备、石油设备、汽车、棉纺设备、造纸设备、制糖设备等七种。三十六种主要重工业产品，三十种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九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有钢、铁、钢材、发电量、原油、水

泥、铝、硫酸、化肥、合成橡胶、机车、小机车、货车、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机引农具、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汽车配件等十九种。主要轻工业产品，如棉纱、棉布、针织品、纸、糖、食用植物油、盐、卷烟等，主要因为农业歉收，原料不足，都没有完成计划，其中比一九五九年产量增加的有盐和纸两种，其余六种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但是，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绝大多数都比一九五九年增产比较多，如人造纤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日用陶瓷增长百分之二十二，铝锅增长百分之六十一，抗菌素增长百分之三十七。从总的看，一九六〇年的工业生产仍然是跃进的局面。

工业的三年连续大跃进，使我国工业的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钢的产量，一九五七年为五百三十五万吨，一九六〇年达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三年增长了将近两倍半。平均每年增加四百四十五万吨，比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增加八十万吨高出四倍半。一九六〇年的钢产量同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比较，增长了一百一十多倍；同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比较，增长了将近十三倍。煤的产量，一九五七为一亿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达到了四亿二千五百万吨，三年增长了二点三倍，平均每年增加九千八百万吨，比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七十万吨高出六点七倍。一九六〇年的煤产量同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比较，增长了十二倍多；同一九五二年的六千六百四十九万吨比较，增长了五点四倍。一九五七年我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列第九位，煤产量在世界上列第五位，一九六〇年钢产量已经上升为第六位，煤产量已经上升为第二位。

在这期间，我国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加强了。拿机床的拥有量来说，一九六〇年达到了五十多万台，比一九五七年的二十四万六千台增长了一倍多，比一九五二年的十二万三千台增长了三点一倍，比一九四九年的九万四千五百台增长了四点三倍。我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总值，一九六〇年达到了六百九十亿元左右，比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五十二亿元增长了将近一倍，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五十八亿元增长了三点四倍，比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二十八亿元增长四点三倍。工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人数，一九六〇年达到了四十多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十七万五千人增长了一点三倍。三年来，特别是一九六〇年以来，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开展。工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状大，对于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对于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国防的现代化，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对于全国以至各大区经济体系的建立，都已经发生而且将继续发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在一九五九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后，在一九六〇年又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没有的更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到九亿亩，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遭到重灾，以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但是，在过去三年中，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大发展，有效的灌溉面积在三年内增加了三亿多亩，超过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所达到的总数；一九六〇年底有效的灌溉面积达到了八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将近一半。农业的技术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排灌设备在三年内增加了四百四十万马力，一九六〇年底达到了五百万马力（一九四九年只有九万八千马力）；拖拉机三年内增加了六万多台，一九六〇年底达到了八万六千多台（一九四九年只有四百零一台）。同时，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仅减轻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的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个伟大的力量，两年来严重的自然灾害对

农业所造成的损失一定还要大得多。

一九六〇年在其他经济战线上和文教战线上，也都取得了继续跃进的胜利。这一年的基本建设，预算内的投资完成了二百七十亿元，预算外的投资完成了六十亿元。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合计，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九百四十一亿元（其中预算内投资为七百五十一亿元，预算外投资为一百九十亿元），比第一个五年合计的五百四十九亿元多出三百九十二亿元。三年合计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到二千二百个左右，其中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有一千一百个左右，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约有九万多个，而第一个五年合计，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只有九百二十一个，其中完工和部分完工的为五百三十七个，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只有九千多个。

在交通运输方面。一九六〇年的铁路货运量达到了六亿七千一百万吨，比一九五九年的五亿四千四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比一九五七年的二亿七千四百万吨增长一点四倍，比一九五二年的一亿三千二百万吨增长四倍，比一九四九年的五千六百万吨增长十一倍。这一年铁路铺轨三千六百八十四公里，加上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铺轨里程，三年合计为一万一千八百公里，比第一个五年合计的九千三百多公里多出二千二百公里。

在商业方面。一九六〇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七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六百三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比一九五七年的四百七十四亿元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七，比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七十六亿元增长一点六倍。

在财政方面。一九六〇年的财政收入达到六百六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五百七十八亿元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比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一十亿元增长一点一倍，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八十四亿元增长二点六倍。

在文化教育方面。以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例，一九六〇年达到九十八万人，比一九五九年的八十一万人增长百分之二十一，比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四万人增长一点二倍，比一九五二年的十九万人增长四点一倍，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二万人增长七点四倍。

总之，我们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这三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而且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快得多。在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伟大跃进，我国的工业在产量上和技术上已经大体上达到了苏联一九四〇年的水平。这些伟大的成绩，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坚强意志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三面红旗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看到伟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当前存在的局部的暂时的困难，正视工作中“一个指头”的缺点。对于个别地区和少数企业、事业单位来说，工作中的缺点还不止是“一个指头”。当前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工业的原料材料、特别是煤炭和木材的供应也比较紧张。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某些环节，秩序有些不正常，某些工业品的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产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要作具体的分析。例如煤炭供应紧张的问题，一方面是使用部门的消耗增加了，另一方面是生产部门要维修设备，要赶掘进，有的煤矿对于职工的粮食安排不够好，生产管理还有问题，出勤率低，再加上有的地区运输阻塞，运量减少等等。产生上述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概括起来说：第一，农业连续两

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农产品都减产了。第二，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第三，由于我们对于大跃进的经验不足，某些工作安排不当，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第四，在经济管理工作上，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有些制度破而未立，有些制度，特别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各级负责制、技术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没有严格执行。第五，有少数作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拿计划工作来说，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深入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认识问题，来克服主观片面性。第六，干部队伍不纯，有的公社和企业、事业单位甚至被钻进来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分子窃夺了领导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有些同志对于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它的尖锐性，认识不够、警惕不高。对于上述问题和缺点，我们必须总结经验，贯彻政策，端正作风，整顿队伍，坚决地加以克服。我们相信，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局部的暂时的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我们决不应当夸大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和问题，看不到伟大成绩这个主要方面，决不应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决不应泄气，而陷到右倾悲观的错误中去。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正确估计三年来的工作同样是适用的。这三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十分珍贵的，对于我们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且从反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从经济计划工作来说，我们必须根据三年的实践，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结合起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一定阶段中有相对的稳定性，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七年不变，按劳分配制度至少二十年不变），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把冷和热结合起来，更好地遵守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以便进一步地掌握大跃进的高速度和有计划的按比例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处理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沿着总路线所指明的方向迅速前进。

二

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

几年来的经验愈来愈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加快发展农业是高速度、按比例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有了农业的跃进，就会有工业的跃进，也就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跃进。在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十二条政策全面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制度日益

健全、劳动力得到合理安排（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从各方面抽出约二千万个劳动力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和技术装备日益增加的条件下，我国农业是能够跃进的。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还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因此生产是不稳定的，一旦遇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可能减产（苏联农业生产也很不稳定，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了近十四亿普特，一九五八年比上年增加了二十二亿普特，一九五九年又比上年减少了十亿普特）。这就要求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各个部门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来保证农业产量在正常的年景下有较多的增产，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不减产或者少减产。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中，必须坚决地全面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提出的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的指示，这就是说，要先安排好农业，再安排工业；要根据农业发展的情况，先安排好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对于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金的分配，应当首先安排农业的需要，其次是安排轻工业的需要，然后再安排重工业和其他方面的需要。

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加快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必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支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应当重视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不断地加强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尤其应当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积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并且从企业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尽量节约劳动力和少占耕地。应当了解到，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给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国防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为了给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部门和国防部门提供现代化设备，推动它们更快地发展。重工业本身当然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但是这种扩大再生产，主要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和多少工业原料，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以及农业对于重工业产品的需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是辩证的统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年的伟大实践，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观点，来安排计划，指导工作。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的连续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例如，重工业发展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钢铁工业发展了，煤炭、运输的发展不相适应；加工工业发展了，采掘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等等。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九六一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的安排，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

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我们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采掘工业中要首先注意对煤炭、木材、铁矿的安排。这些安排方针，是多年来经验的总结，不仅一九六一年要贯彻执行，有的在两三年内、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也要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综合平衡工作，经常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不平衡转化为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要照顾全局，分别缓急，掌握各个方面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使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就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经济生活，也就能够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使国民经济经过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而不断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我们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正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这个方针是积极的，即有利于巩固三年连续跃进的伟大成绩，又有利于今后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执行上述方针，要求我们在一九六一年的计划中，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即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我们实事求是地自觉地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仅是为了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使重工业能够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今后实现更好、更大的跃进，使我们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毛泽东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正如打仗，在一个大的战役以后需要休整一样，国民经济在大发展以后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发展、巩固、再发展的过程，是扩大、提高、再扩大的过程，是跃进、调整、再跃进的过程。我们要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使国民经济有节奏地波浪式地前进。我们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只从一两个部门来看，而应当从国民经济的全体来看；不能只从一年两年来看，而应当从长远来看。如果想像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发展速度全都直线地上升，一年比一年高，那是不切实际的。

根据上述方针初步拟定的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如下。

（一）农业和工业支援农业

要求粮食的播种面积达到十八亿亩，产量达到四千一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万担左右，油料（包括花生、芝麻、油菜子）产量达到七千二百万担左右；猪的饲养头数达到一亿五千万头左右。这些指标，要等各省市区确定包产指标以后再定。

一九六一年的农业生产必须以粮食为中心，同时要注意全面安排各种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和油料。棉花的实收面积，要求不少于八千万亩。农作物的增产，要动员所有公社、所有生产队，认真采取增产措施，继续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要认真注意播种面积的扩大，尽可能多开垦一些荒地，把一切田边地角和一切零星的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要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社员个人经营的自留地，应当占当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左右；食堂经营的菜地，应当占当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左右。猪和家禽的饲养，应当公养和私养并举，有步骤地做到以私养为主，分别采取公养、私养、公私合养、私人合养的办法。为了使社员有时间种

植自留地、饲养家畜家禽和经营家庭副业，要实行放假制度，除了农忙季节以外，男劳动力每月放假四天，女劳动力每月放假六天到八天。要有领导地活跃农村初级市场，允许社员自由出售自己生产或从生产队分得的农副产品。在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方面，要采取计划指导和合同制度相结合的方法。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要合理地提高，作到买卖公平。

一九六一年重工业将尽可能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主要有：拨给农业的钢材定为一百三十一万吨，比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万吨增加五十一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四，其中约有七十万吨用来制造小农具、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生产拖拉机和内燃机的配件七亿元，分配给农业的将有四亿二千万元，比一九六〇年的二亿元增长一倍多，来保证农业机械维修和配套的需要。生产拖拉机四万三千标准台，分配给农业的将有四万台，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一万台左右。生产动力机械四百万马力，分配给农业的将有二百万马力，另外将为农业专门生产电动机一百万马力。在机床的分配中，将专门供应农业六千台，作为修配农业机械之用。供应农村手推车车轮一千二百万个，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五百万个。供应化肥四百二十万吨（包括进口的一百五十万吨在内），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一百万吨左右。供应农药十九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五千吨。农村所需的生产资料，如煤炭、木材，水泥、桐油等等，也将增加供应（煤炭的供应量初步安排五千二百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七百万吨）。对于水利建设工程所必需的配套设备，也将尽可能安排生产。

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一年将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为农村培训技术工人五十万人左右。农村中的手工业要大力恢复起来，铁、木、竹、皮四匠要归队。

（二）轻工业和市场

根据原料供应的可能，一九六一年轻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棉纱因为一九六〇年棉花减产只能生产四百五十万件，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百五十万件；棉布三十五亿米，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十九亿米；纸二百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十七万吨；食糖五十五万至六十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增加十二万至十七万吨；食用植物油七十五万至八十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二十二万至二十七万吨；盐一千三百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水平；卷烟二百八十万箱，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百七十万箱；水产品四百四十三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二十六万吨。

一九六一年不依靠农业原料的轻工业品的产量，一般都将有较多的增加。如合成纤维将增长二倍左右，人造纤维将增长半倍左右，用废次钢材制造的小商品将增长百分之九十左右，合成洗涤剂将增长一点三倍左右，过去没有生产的合成脂肪酸，将生产六千五百吨。

为了争取生产更多的轻工业产品，要从各方面努力，多增产重工业原料，多利用边角废料，多寻找代用原料，并且大力推广节约原料的加工方法。城乡公社工业，要特别注意增加小商品生产。

一九六一年计划供应市场的钢材一百零八万吨，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左右；生铁八十万吨，木材六百五十万立方米，煤炭一亿零五百万吨，都比一九六〇年有相当的增加。

按照上列轻工业和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商品供应量大约可以达到六百七十亿元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四十亿元左右，主要是粮、油、肉、烟、布、针织品的供应将减少约六十五亿元。而一九六一年的社会购买力，将可能达到七百二十亿元，即比一九六〇年增加十亿元。为了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准备再增拨一部分材料和进口一部分原料，增产商品四十亿元，还有十亿元的差额，将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继续加以解决。

（三）重工业和运输业

初步确定一九六一年原煤的生产指标为四亿三千六百万吨，铁的生产指标为二千七百五十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一千九百万吨。其他主要重工业品相应的生产指标为：

发电量六百六十亿度，增长百分之十一；

原油六百六十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矿产铜七万至八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七至四十五；

铝十三万至十四万吨，增长百分之十至十九；

原木三千九百零五万立方米，减少百分之六；

水泥一千六百万吨，维持一九六〇年的水平；

硫酸一百六十万至一百七十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至二十八；

纯碱八十三万至九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八；

重型设备四十五万至四十八万吨，减少百分之四十至四十四；

发电设备二百万瓩，减少百分之四十四；

机床五万六千台，减少百分之五十三；

机车七百台，减少百分之十三；

货车二万一千辆，减少百分之十九；

汽车一万六千辆，减少百分之二十三。

按照上列指标，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〇年，煤只增加一千一百万吨，但是煤炭部直属煤矿将增加一千五百万吨；钢只增加三十万吨。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给农业让路，特别是照顾到晋冀鲁豫辽五个受灾严重的省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调整重工业内部的关系，并且使我们能够用更多的力量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原料和燃料的消耗。计划要求：煤炭部直属企业的原煤灰分由一九六〇年百分之二十三点二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二。铁的合格率，重点企业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八十六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一般企业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六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每一吨生铁所消耗的焦炭，重点企业由一九六〇年的零点八吨降低到零点七五吨，一般企业由一九六〇年的二吨降低到一点七吨。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焦炭炼出更多更好的生铁，并且也有利于提高钢的质量和钢材的出材率。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应当加强生产技术的领导，有重点地对“小洋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计划要求，一九六一年生产合金钢一百二十万吨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占钢产量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左右，可供分配的钢材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左右，出材率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左右。

一九六一年，煤、铁、钢的增长速度虽然不高，但是发电量、石油、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仍将保持比较高的速度，这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产品在生产和需要上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一九六一年煤炭、木材和化工原料的供应还是紧张的，我们必须切实抓紧增产和节约的具体措施。

一九六一年主要机械产品的产量，将比一九六〇年有所减少，这是同我们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安排相适应的，一九六一年零件、配件的生产将比一九六〇年有较大的增长，如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的生产拟安排七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增长一点一倍；汽车配件的生产拟安排四亿五千万元，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三。同时，许多农业机械产品的产量都将比一九

六〇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按照上述轻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品的产量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将达到二千三百一十亿元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八（其中，生产资料工业增长百分之八点七，生活资料工业增长百分之六点六）。即使是这样，我国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还将是很高的。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一九六二年假定增长百分之十，第二个五年的工业总产值仍将增长二点六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这显然是大跃进的高速度。拿钢的产量来说，一九六一年达到一千九百万吨，一九六二年假定只增加一百万吨而达到二千万吨，仍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千四百六十五万吨，增长二点七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也还是大跃进的高速度。

一九六一年的铁路货运量计划为六亿七千五百万吨，水路和公路的货运量计划为二十四亿吨，都比一九六〇年略有增加。为了使运输同生产建设的需要相适应，一九六一年必须进一步加强铁路的建设，首先是支线和专用线的建设。要继续加强短途运输的组织工作。要切实把现有的运输工具维护好、修理好，把运行的秩序整顿好，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

（四）基本建设

按照先生产、后基建和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和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拟安排为一百六十七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百零三亿元；大中型的项目安排九百个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七百个左右。有些工程，特别是某些水利、钢铁、机械工程，必须坚决地暂时停下来。

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将首先安排能够迅速发挥生产效果的重要的收尾工程，和能够补充前后左右的配套项目，以及必需的续建工程。非生产性建设，除十分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以外，要一律停止。

在一九六一年的工业基本建设中，将首先加强采掘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建设。分配给煤炭工业的投资为二十二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一亿元，它在工业总投资中的比重将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三；矿井建设的总规模为二亿吨左右，当年移交生产的新井规模五千万吨左右，比一九六〇年增加四百万吨左右。分配给钢铁工业投资十五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十一亿元，这些投资将着重用于矿山的各项建设和能够增加品种、补充前后左右的建设。分配给有色金属工业投资九亿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八千万元，这些投资将主要用于铜铝矿山和稀有金属的建设。同时，将加强人造纤维工业，化学原料工业和东北石油工业的建设。

一九六一年将有重点地选择一批"小洋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一九六一年的铁路建设，计划铺轨四千公里左右，主要是支线和专用线。此外，还安排轻轨铁路一千公里，主要是解决矿山运输的问题。

一九六一年国防工业的投资也在可能的条件下作了适当的安排，主要是加强国防科学的研究和尖端产品的试制。

（五）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

一九六一年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各项事业，同样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适当控制发展数量，努力提高教学和工作的质量。

各类学校的招生数字拟定如下：

高等学校招生二十五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九万四千人；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五十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十一万人；

普通中学招生三百三十五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九十九万人。

农业中学必须实行农忙少办、大忙停办的办法，在教学上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六）劳动和工资

对劳动力必须根据中央的历次指示，加强计划管理，实行全面安排。一九六一年劳动力安排的原则是：首先保证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有余力再照顾其他。要进一步从各方面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要有计划地精简和下放国营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职工．一九六一年计划下放五百零二万人。

计划安排一九六一年国家支出的工资总额为二百六十五亿元，集体福利费总额为四十亿元左右，基本上维持一九六〇年的水平。城市人民公社企业、事业人员的工资总额也维持去年的水平，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要进行整顿和调整。

所有部门，不论城乡，都必须继续切实地执行劳逸结合和安全生产的方针，特别要保护劳动力，保护妇女和青少年的健康。

从上述具体安排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一年计划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贯彻执行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我们在计划中尽可能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压缩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在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中，尽可能保证了采掘工业的优先发展，适当放慢了加工工业的发展，而在加工工业中，又首先保证了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增长，保证了维修和配套产品的增长，同时充分注意了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合理地分配了物资和劳动力。这样安排，加上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政策的贯彻执行，价格政策、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劳动工资政策的改进，必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首先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协调，有利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从而有利于党领导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继续胜利前进。

三

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经过这次中央全会审查以后，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大区、各省市、各部门共同编制计划，下达到基层单位执行，在上半年暂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如果计划执行的情况好，下半年也不重定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也不要再层层加码，而争取超额完成。应当看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农业生产、整顿公社、人民生活和干部整风都抓得早，工业和农业的物资技术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劳动力作了全面安排，特别是加强了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广大群众特别是灾区群众得到休养生息，党对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政策已经开始贯彻执行，五种歪风正在被纠正，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正在开展，广大干部在过去三年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很丰富的经验，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提高了一步，以及计划指

标比较切合实际，等等。当然，也应当看到，各个方面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指标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抓紧有效的具体措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

为了保证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能够按照既定的方针顺利地发展，不仅在编制计划中间，而且在执行计划中间，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经济单位，都要按照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体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统一计划中来考虑，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全国统一计划的要求；都要严肃执行国家计划，积极努力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要在生产、基建、收购等方面层层加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完成当前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才能够真正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几年来的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积极性必须同计划性相结合。片面强调计划性而忽略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就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反过来，如果片面强调积极性而忽略全国统一的计划性，就会产生盲目性。为了把积极性同计划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全面地做到多快好省，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中，一方面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集中领导，使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

加强集中领导，有必要对经济管理的体制作适当的改进，把某些下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而在最近两年内，权力要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大区范围内的计划安排，应当根据国家统一计划，由各中央局统一安排。中央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职工调动的权力，今后统归中央主管部门。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对本地区中央直属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权进行必要的调剂，但是必须事先同主管部门商量。有关问题，中央各部门也应当主动地同中央局和省市商量。地方所属企业的上述有关权力，今后统归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问题，中央将做出若干规定，这里不再做详细说明了。

在执行计划中，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有问题就下决心解决。要抓紧经济的组织工作，有指标就要有措施，有措施就要有专人负责，就要经常检查，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当前生产和运输中某些秩序不正常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克服。企业部门的领导人员，还应当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福利，办好食堂，加强劳动保护。对于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跟班劳动的基层干部，在生活上应当给予必要的照顾，在劳动时间上应当严格遵守劳逸结合的原则。

一九六一年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我们应当通过整风，使所有干部提高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发扬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埋头苦干、民主团结的作风，从而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经济部门的整风，应当从部、局开始，然后再在企业单位进行。在普遍地开展整风运动以前，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员应当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解剖一两个“麻雀”，以便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并且应当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行分批地推广。整风应当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着手，密切地结合生产，边整边改，推动生产前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经过多

次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仍然是我们这次整风所必须采取的方法。对于那些钻进来的坏分子和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应当按照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在工作的安排上，第一季度在抓紧整风工作的同时，农业方面要着重做好春耕的各项准备工作，商业方面要着重做好粮食的调拨和运输工作，工业方面要着重做好煤炭、木材的生产、调拨和运输工作，抓紧各种设备的维护修理工作。煤炭和木材，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努力改善目前供应紧张的状况。这就必须立即动手，积极组织劳动力，加强生产的组织工作，争取多生产一些，并且多运出一些，及时供应各方面的需要。机械工业部门要抓紧煤炭工业和木材工业所需设备的制造和供应，以利于今后煤炭和木材的更多增产。现在看来，煤炭和木材是我们工业中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我们准备同有关部门、有关地区共同拟定煤炭、木材、铁矿的生产和运输的三年规划，以便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六一年是我们在农业上遭受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后的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但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只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旗帜，在实际工作中了解情况，鼓足干劲、贯彻政策、端正作风，坚决走群众路线，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一九六〇年九月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决议如下：

一、一九五四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撤消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

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的连续大跃进，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业；全国的经济布局也日益趋向合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合理地调动和利用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来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从战略上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基于以上的实际需要，从一九五八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又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区在拟订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

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三、上述六个新设立的中央局，都是中央的代表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领导下列各省、市、自治区：

中央华北局——北京、河北、内蒙、山西四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

中央华东局——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七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个省；

中央西南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它应当随时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同时，它应当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并按照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管理体制的调整，特作如下的暂行规定：

（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进两三年内，应该更多的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地区计划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大区为单位，由中央局进行统一安排。

中央局计委，在中央局各“口”和省（市、自治区）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在国务院各“口”和各中央局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全国计划草案。

（二）一九五八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

（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需要调整时，应当取得中央主管部的同意。

中央各部对直属企业下达计划时，应该同时抄送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中央各

部向直属企业调动干部和职工时，应该同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事先进行商量。

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国防工业企业专为民用服务的车间，在安排生产时，应与企业所在地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洽商。

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各级党委应保证完成铁道部运输计划。

（四）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凡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计划内应该调出的物资，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归口安排。统配物资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报请中央批准后下达；部管物资由主管部负责平衡，分别报送国家经委和财贸"口"批准下达。中央直属企业需要的物资分配给主管部，地方企业需要的物资分配给地方。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物资有权进行必要的调整；但调整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必须商得主管部门的同意。由地方管理的某些特殊物资，各中央局在本区内可以统一安排；必要的协作供应关系应当继续保持，已经中断的应当尽快恢复。

（五）财权必须集中。各级的预算收支必须平衡，不许有赤字预算。切实整顿预算外资金的收支。

企业利润的留成应按新规定的比例减少。并且只能用于"四项费用"（技术措施、新产品试制、劳保、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双革经费"、职工奖金和国家规定的福利开支。各部所提直属企业的利润留成数，应向国家计委提出使用计划，不能自由使用。

加强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管理。任何地区、任何部门都不得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准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开支，不准向商业部门赊购和挪用商品。

（六）货币发行权归中央。人民银行应该按期编制货币发行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经中央批准，严格执行。

（七）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不许突破。计划内规定增加的职工，应当首先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所属范围内进行调剂，不足时，再经劳动部门统一解决。计划外增加人，必须报经中央批准。各企业，各事业单位不得擅自招收工人。

除国防工业和铁路职工外，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劳动力，根据国家计划，统一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进行地区平衡。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需要由中央各部直属企业抽调工人时应该商得主管部同意。

（八）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都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管理体制调整后，地方党委更要加强对企业的党的领导，把企业的群众运动搞得更好。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可根据上述原则拟出改进管理体制的具体规定，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节录）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

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

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

群众所提的逐丘定产、逐丘定工，按劳动力的强弱承包一定数量的田亩，再以工除产，得出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以产量来计算工分，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这个办法。

我们承认群众所提的这个包产办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坏两面，我在小组发言中已讲过，这里再简单地重述一下：

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讨巧的空子（逐丘定产、逐丘定工与厂矿企业中的产品定额和劳动定额相类似）。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

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

* 这是曾希圣同志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开会时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

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我在上次小组发言中对五个统一没有多作解释，有些同志的误会可能是由此产生的。为了避免冗长，现在就"五统一"中两个最重要的统一说明一下。

第一个是分配统一。这就是说，生产队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应按照包产任务，上交给大队，由大队统一分配，这与以往的分配办法完全一样，根本没有变更所有制问题。

第二是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以水稻为例，就是犁耙、泡种、育秧、插秧和割稻、打场等统一，这些工都是以集体劳动来做的，只有剩下的田间管理工，实行责任到人，分散劳动。这与分段包工、季节包工以及高级社时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并没有改变公社时期和高级社时期的劳作方式。所不同者有二：1.现在把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搞得好的有专门奖励。2.这种奖励是根据产量来定的。具体做法是：先逐丘定产，逐丘定工，在定工中将大农活与零散农活（即田间管理）分别算清，譬如种一亩水稻需要二十个工，大农活和田间管理约各占一半，就把这部分田间管理工总包到户，超产部分即按各占一半的比例，分别奖给集体做活的人和负责田间管理的人。所以这个包产办法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再按产量给奖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集体农活与零散农活相结合的包产办法。我们估计这个办法即不会有单干思想，又可以提高个人生产积极性。困难户则由于有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所处环境仍和过去一样。

从现在已经包好的几个试点来看，这个包产办法的确有许多好处。看得比较明显的有这样几点：

1．包产比较落实。包产时都先由群众组成的评议小组逐丘定产，然后和每个社员商量确定，正式订立合同。这样包产，工作做得细致，指标比较实在。

2．包产指标增加。据几个试点统计包产指标均有所提高。如宣城县先进公社里桃小队，原包产九万一千七百五十斤，现包产十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五斤，增加百分之二十二。肥东县三十里埠公社马岗小队原包产七万四千斤，现包产七万九千斤，增加百分之六点九。合肥市蜀山公社候井小队原包亩产三百四十斤，现包亩产三百六十斤，提高百分之五点一，这个队超产潜力较大。全椒县古河公社西刘小队，原包亩产二百三十斤，现包亩产二百六十八斤，提高百分之十六点七。据社员与干部谈心，在这个包产基础上均有产可超，并估计可能超产百分之十左右。

3．出勤率大大提高。先进公社里桃小队以前出勤人数只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现在几乎达百分之百。晋节公社牌坊生产队有整半劳力一百二十四人，近来出工的达一百五十人，不少辅助劳力和以前不做农活的人也上了阵。

4．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增多。里桃小队有外流人员，迁居城镇的人以及超龄学生十人自动回家生产；牌坊生产队也有十个在外劳动回到本队。

5．麦田管理有显著加强。试点地方，麦田追肥和锄草都搞得比较好，牲畜家禽遭踏庄稼的现象已大为减少。

6．男女老少积极积肥。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原来只有三把屎刮子，已两三年没有用，现在大多数社员都添置了粪箕和屎刮子，积肥数量大大增加。

7．积极修添农具。园林公社谢岗小队社员自动找出木料做了四张犁，做到一牛一犁。

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社员清出过去丢失和私藏起来的农具共五十六件。

8．搞私有的减少。有些社员原来只顾种自留地，积的肥也不愿交队，有的甚至丢了农业搞投机。现在认为超产可以多得，把工夫和肥料使用在责任田里，态度有很大改变。

从上述这些试点来看，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干部和社员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办法能够增产。当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逆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曾布圣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全党同志们：

党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全国农村的形势，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央发出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广泛开展整社运动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凡是贯彻执行了十二条指示和认真整了社的地方，广大农民是积极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今年的春耕准备和春耕情况，在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好。但是，为了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还需要全党从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也还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问些题是：

第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

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原名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

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以上这些情况，都必须及时地适当地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郑州会议讲话和一九五九年四月党内通讯的精神，以及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

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

现在这个条例的草案，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提出来的。党中央认为，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是人民公社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通过这次讨论，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为了把这个讨论领导好，各地党委和全党同志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应该首先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二）要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三）省、地、县三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无论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上级领导下，先在党内和群众中定好新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允许有步骤、有秩序地改变老的办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有困难的，可以过一个时候再解决。公社各级的公共财产（牲畜、农具、粮食、蔬菜等），一定要注意保护，不许随便分散。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四）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省、地、县三级党委，要帮助和鼓励公社各级干部，继续积极负责地领导生产，领导各项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个条例草案是要他们正确地领导，不是要他们放弃领导。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对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可以拟订自己的补充条例。在牧区还需要拟订适合牧区情况的条例。这些补充文件在报请中央局批准以后，也应该发给党员和社员讨论，同时报告中央。在将来，各人民公社还可以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本省、市、自治区补充条例的原则。根据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条例。

（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该领导党员和适当范围的群众讨论这个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的时间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定。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

第一章　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

一、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二、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单位。

三、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计划。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必须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四、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生产队社员大会。

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

人民公社的监察机关是各级监察委员会。

五、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利于团结，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不要强求一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的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第二章　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

六、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人民公社各级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并且可以由他们随时罢免。

人民公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在选举管理机关和监察机关的成员的时候，

应该注意使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七、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都要定期开会。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每年至少开会四次。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

八、公社和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

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人员，有经验的老农，青年和妇女，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第三章　公社管理委员会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相当于原来的乡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在管理民政、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政府的职权。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对于生产大队的领导，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进行适合情况的正确的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在领导生产中，必须遵守下列的规定，不可管得太多太死。

（一）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二）对于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不违农时；但是，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发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三）推行已经试验成功的增产措施、改良工具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接受。

（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五）调剂种子，供应农具、肥料和农药，管好用好大型农业机械，从各方面帮助生产大队实现生产计划。供应这些生产资料，必须注意保证质量，讲求实效，不许粗制滥造，不许硬性摊派。对于一切不适用的、质量差的农具、肥料和农药，生产大队有权拒绝接受。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可能，经过上级批准和有关生产大队的同意，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兴办这些基本建设，必须不妨碍当年的生产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加，不可办得过多。

公社管理委员会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

十二、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有步骤地举办社办企业。社办企业，可以由公社单独投资举办，可以由公社和大队共同投资举办，也可以由几个公社联合投资举办。

社办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应该就地取材，不影响国家统购物资的收购，不和国营企业争原料。

一切社办企业的举办。都应该量力而行。公社和大队的投资，只能从社办企业的利润和公积金内开支。

一切社办企业的举办，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社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应该尽先使用城镇的非农业劳动力。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地不得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

一切社办企业，都应该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防止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凡是社队共同举办和公社联合举办的企业，都必须签订合同，保障双方享受合同规定的权益，分取应得的利润。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促进农村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对于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劳动者，按照不同的标准，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并且在口粮供应上给以适当的照顾。

十四、公社的公共积累，主要来源是社有企业的利润，也可以从生产大队提取一定的公积金。

公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举办集体福利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地应该少提或者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过县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十五、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财务工作，必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勤俭办社的原则。一切开支，都必须有预算和决算，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批准手续办事。严格限制非生产性的开支。财务必须公开，要按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财务工作。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领导和监督各生产大队的财务工作，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财务工作，接受县的财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第四章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

十六、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独立经营单位。它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又承认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一定的自主权。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分配，又承认各生产队的差别。

十七、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了生产队所有的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各生产队按包产计划上交的产品和收入，生产大队直接经营所得的产品和收入，也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分配。

十八、生产大队必须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不再变动。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必需调用的时候，一定要不妨碍生产队包产任务的完成，经过协商同意，严格遵守互利的原则。

凡是宜于生产队经营的荒地、山林、经济林木、水面等资源，都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

营，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和保护。

十九、生产大队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各生产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生产大队根据国家计划任务和各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对各生产队提出初步要求；然后，由各生产队发动社员充分讨论，拟定本队的生产计划；然后，由大队把各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大队企业的生产计划，加以综合，经过必要的协商调整，订出全大队的生产计划。

生产大队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农、林、牧、副、渔），对于粮食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都要根据当地生产习惯和可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二十、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一定要真正留有余地，使生产队经过努力有产可超，超产的大部或者全部，应该奖给生产队；对于超产粮食的生产队，要奖给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粮食。

在正常年景下，由于工作中的毛病，或者劳动不积极，没有完成包产任务的生产队，应该少得少分。

为了避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大队对于原来收入水平较高、现在由于统一分配收入减少的生产队，可以从包产、包工、奖励或者发展副业等方面，加以照顾，使他们的收入也有增加。

二十一、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生产计划，经常督促检查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帮助生产队及时总结生产经验，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能够超额完成包产计划。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推行先进经验和增产措施。在推行的时候，必须同生产队和社员充分商量，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不能强迫他们接受。

二十二、生产大队为了发展多种经营，适应各生产队发展生产的需要，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可以经营一定数量的大队企业。大队企业应该遵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或者不办的原则。在农忙的时候，要尽可能使劳动力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

生产大队兴办的企业和事业，从生产队占用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

二十三、生产大队在收益分配中，必须实行少扣多分，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的社员也尽可能不减少收入。

生产大队，在生产队完成三包任务的前提下，要保证包工的工分值不降低，保证分配计划兑现。

生产大队必须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反对铺张浪费和滥用劳动力，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减少非生产人员，控制公共积累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控制供给部分在社员分得的收入中的比例，从各方面来提高劳动工分的分值。

二十四、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起来，在目前时期，一般控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

生产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基本建设用工和生产用工，要分开计算。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经过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通过，可以规定他每年做一定数目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超过这个规定的基本建设用工，必须从公积金内发给应得的工资。

二十五、生产大队必须严格执行财务计划，严格遵守财务制度，防止贪污舞弊。一切开

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对于一切不合制度和手续的开支，会计员和出纳员有权拒绝。一切收支账目都要日清月结，按月向社员公布。会计员管账不管钱，出纳员管钱不管账。生产大队还必须经常督促、检查和帮助生产队作好财务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

第五章　生产队管理委员会

二十六、为了提高社员和生产队干部的积极性，必须确定和保障生产队一级的所有制。下列各项收入和资产，归生产队所有：

超产所得的奖励；

在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经营其他各种生产所得的收入；

节约下来的资金；

用自有资金购置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设备；

用自有资金兴办的基本建设；

包产任务以外扩种的果树、林木和其他多年生的作物；

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耕畜所繁殖的幼畜，或者幼畜分成部分。

所有这些资金、物资、设备、林木和牲畜，都归生产队全权支配，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能调动。在有必要进行适当调剂的时候，必须取得生产队的同意，实行等价交换。

二十七、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它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管理本队选留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在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一定要充分同社员商量，特别要听取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决不能任意决定。

二十八、生产队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除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以外，都应该以粮为纲，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同时，还要综合利用劳动力，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积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和繁殖耕畜和其他牲畜，特别要注意养好和保护好母畜和幼畜。生产队要切实加强领导，指定专人负责，进行饲养管理，保证饲草饲料的供应，并且及时防治各种疫病。对于繁殖和饲养牲畜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应该给以奖励。

二十九、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要划分临时的或者固定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季节的或者小段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耕畜、农具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小组和个人，不管本队是不是超产，都应该给以适当的奖励。

三十、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社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应该改为业余学校，学生都要参加劳动。同其他社员一样评工记分。生产队还要组织一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按劳付酬。

三十一、生产队必须实行严格的评工记分制度，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生产队要按照劳动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农活的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

农业、畜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

对于从事手工业、渔业、盐业等专业劳动的社员，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报酬。

每个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都要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账目要按月公布。

三十二、生产队必须争取超产，节约劳动力和生产费用，努力提高社员实作工分的分值。

生产队从包产中所得的收入，要全部分配给社员。包产以外经营其他各种生产的收入，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可以全部分配给社员，或者大部分分配给社员，扣留一小部分做为自己的积累。

三十三、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有些地方，还可以只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

达到一定年龄、脱离生产上学的社员的子女，都不能享受供给制的待遇。学生上学的费用，除了按照规定，享受国家的助学金以外，都应该由学生的家庭负担。个别困难的，可以从公益金中给以适当补助。

生产队在粮食分配上，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适当拿出一部分粮食，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超产奖励的粮食，应该完全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三十四、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

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社员的口粮，可以分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分期发，也可以一次发。

三十五、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管钱、管账、管物资，要有专人负责。属于生产队所有的或者负责保管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业产品，都要认真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应该有一个副队长分管财务工作。

第六章　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六、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三十七、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

耕种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长期归社

员家庭使用。

经过生产大队批准，开垦零星荒地。

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可以饲养一两头大牲畜。

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从事采集、渔猎等副业生产。

在屋前屋后种植果树、竹木和其他作物。这些作物永远归社员所有。

三十八、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除了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以外，其他的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

社员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

社员家庭积肥，按照规定交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使用的，应该按质论价，付给报酬。

三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生产方面多给一些便利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人民公社各级的集体经济单位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它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七章　社　　员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鼓励和帮助社员修建住宅。

要保障社员自用的小农具和工具等，永远归社员所有。

要认真执行放假制度，实行劳逸结合。男社员每月放假四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六天。可以分批轮流放假；在农事大忙的时候，也可以把放假的日子挪前挪后。

要关心社员的身体健康，保护社员劳动中的安全。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属，应该给予适当的抚恤。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和她们参加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要特别加以照顾。女社员在产假期间，应该酌量给以补贴。

要保障社员对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对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控告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四十一、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内必须履行自己一切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每一个社员都应该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必须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工分。每一个社员都要爱护国家和社、队的公共财产，积极地保护这些财产不受损害。

四十二、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当社员，并

且改变他们的成分。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当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分。表现坏的，不能当社员，由人民公社管制生产；有破坏行为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凡是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即使已经改变成分，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不能当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第八章　干　　部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保持精干，人数不可过多。公社一级干部的人数，应该按照编制配备，只许少不许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不能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

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会，除了负担伙食费和旅费以外，还应该发给他们适当的误工补贴。

四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公社一级的干部，应该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参加一定天数的劳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

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一般地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每一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

四十五、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执行上级的指示，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要盲目执行。

要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一是一，二是二，反对弄虚作假。

四十六、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一切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民主作风，不许压制民主，不许打击报复；要平等地和群众讨论问题，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能畅所欲言；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社员，只许采取商量的办法，不许采用强制的办法对待，不许乱扣帽子。严禁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多记工分，多吃多占。不许另设干部小灶。反对特殊化。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积极负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要有朝气，有干劲，不要疲疲沓沓。要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在人民公社各级干部中，应该定期进行检查评比，表扬好人好事。

五十、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规定手续的任免，一律无效。

第九章 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

五十一、生产队监察委员会，受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的领导。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受公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公社监察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的有关机关的领导。

五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

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

检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公民权利和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检查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

检查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检查公共食堂工作人员有没有徇私舞弊的行为。

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有下列权力：

受理社员的控告和检举；

审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和公共食堂的一切现金和实物的收支账目；

参加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向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别的组织和人员提出质问，受质问的单位和人员必须负责及时答复；

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专人进行检查和调查，一切有关的单位和人员都有义务提供材料。

监察委员会在工作中遇到阻碍和抗拒的时候，有权报请上级处理。

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担任会计、出纳、保管的人员和公共食堂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担任监察委员会的职务。

第十章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五十五、公社党委员会和它下面的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和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

人民公社各级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生产、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

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经常向党员、团员和群众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行时事政策的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人民公社。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经常关心群众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

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要不断地提高党员、团员和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领导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使它们真正发挥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支由贫农，下中农的骨干组成的积极分子队伍，依靠这支队伍，团结、带动广大群众，推进工作。

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民兵武装掌握在正直可靠的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手中。

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党的工作无人负责和组织生活涣散的现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要定期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检查党员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健全对党员的管理制度。吸收党员和处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手续。

公社党委员会要做好党员的审查工作，严密和纯洁党的组织，严防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

六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在讨论中间，要使到会的人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认真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党委集体决定以后，各有关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分头去办。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

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作好了，其他工作才能作好，调查工作作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作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纪念《农村调查》出版二十周年

《红旗》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社论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并且经常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同志到湖南作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调查，在掌握了系统的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分析写成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转战南北，他经常抓住机会动手作农村调查，积累了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校读了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农村调查》的出版，到现在整整二十周年了。

《农村调查》在当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①，换一句话说，就是为了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工作作风。1941年8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基本精神，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把《农村调查》的。

序言列为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全党干部结合实际认真地学习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深入了人心。那次整风收到了很大成效，“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② 从那次整风起，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大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大家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普遍真理，造成了一个良好的风气：人人以调查研究为荣，以“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的那种主观主义作风为耻。调查研究的作风的树立和发扬，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历史证明，《农村调查》这个榜样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意义和方法所作的理论的阐明，对于全党转变思想作风，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在各地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读起这些文件来，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这些文件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工作作风，是永远有效的，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工作指南。

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③ 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调查研究，真正地了解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也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不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的。对于执行机关说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经常地进行周密的调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调查》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辩证唯物主义。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从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否则，加强领导，正确贯彻执行政策，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等等，就无从说起。离开实际调查，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子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在政策上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的，都是不重视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凡是正确地掌握政策、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十分重视了解情况，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经常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的。

所以在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用加强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加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保证，这是一条真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④ 毛泽东同志非常善于从典型调查研究中概括出一般的结论。他说，比如要了解麻雀的结构，不必也不可能把天下的麻雀一一加以解剖，认真解剖几只就够了。

领导者作一些“走马看花”式的调查以及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统计数字，都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况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还是亲自动手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如果只

是“走马看花”，一般说来就只能看到表面的现象。现象是入门的向导，知道一些现象当然是有用处的。但是，只有亲自作了系统周密的典型调查，才能正确处理“走马看花”所看到的大略情况，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对于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也是这样，调查了几个典型材料，有了对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才能从书面报告中看出问题来，看出那些结论和建议是真知灼见，可以实行，那些结论和建议是“想当然”的，不能实行，那些情况是基本的，那些情况是次要的，等等，这样就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综合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材料。如果不作典型调查，对于确实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也会因为自已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具体了解而忽略过去。正确的统计数字，对于掌握全面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有具体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者，才能利用这些数字去引出一般的结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领导者要亲自作典型调查、亲自解剖几个麻雀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他屡屡告诫人们不要单是坐在屋子里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和统计表报的基本原因。

进行典型调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调查会，找了解情况的群众和中下级干部到会，“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⑤要开好调查会，必须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必须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否则到会的人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具体地说来，调查会怎么个开法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实际调查就是最好的榜样。

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兴国调查》。这个调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八个家庭的调查，一部分是对“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的调查。对于八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人口、劳动力、生活和他们的要求、愿望，调查得很详尽、很周密。对于“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调查了下面一些项目：（一）本区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和人口成份；（二）剥削状况，其中包括地租剥削、高利剥削（高利剥削中又包括“钱利”、“谷利”等六种）、税捐剥削；（三）斗争中的各阶级，其中包括八个阶级或阶层在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四）现在土地分配状况，其中包括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各村分田的数量，等等；（五）土地税；（六）苏维埃（当时的工农政权），其中包括区政府、乡政府、村政府、政府人员的弊病，等等。这次调查，毛泽东同志本来还准备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文化状况，因为敌人进攻，我军决定诱敌深入，没有来得及进行。从《兴国调查》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周密、详细，如孔夫子所说的“每事问”。（二）但又不是事无大小，现象罗列，而是贯串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的纲目也是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定出来的。(三)贯串了历史的方法，对于各个阶级是历史的调查，对于八个家庭也是历史的调查，即调查他们在土地改革前怎样，土地改革中怎样，土地改革后怎样。（四）贯串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典型调查对于全局说来是个别，而在典型调查中又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是一般，“八个家庭的调查”是个别。“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的调查，也包含着一般和个别，全乡的状况是一般，个别人物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具体表现、要求等等，又是个别。这样处处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对于情况的了解就能既全面、又深入。（五）着重调查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又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六）关心基本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要求。总之，在这个调查中全面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开调查会要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就是说调查必须是讨论式的调查。大体说来，讨论包括两种：一是某一个问题到会人说得不清楚，或者由于见闻所限、众口不一，主持调查会的人及时提问，展开讨论；二是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出结论。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实际调查，有些

问题和到会人共同讨论，作出了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结论；有些未作结论，仅记录了到会人对问题的答话。但作出结论来也好，由于材料所限暂时未作结论也好，他总是力求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在调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把调查过程同时作为研究过程，作为调查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调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在实际中，在群众中。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整理后记中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凭领导人的脑子想得出来的，要依靠在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经验。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群众观点。碰到了困难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把问题摸透，把问题的历史、产生的原因、周围的条件等等，弄个一清二楚，把群众的做法也调查明白，这样做得到了什么结果，那样做又得到了什么结果，并且和群众虚心地讨论，把他们的经验集中起来，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就有了。

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经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整理后记中说：许多基层政权的工作同志，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与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这些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收集、整理（也就是总结、提高）和传播群众的好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是领导者的责任；"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道理在那里？就在于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在于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我们作调查，万不可存着这样的想法：你们（群众）说情况，我出主意，材料在你们手里，办法在我脑子里；而要有拜群众做老师、向群众"取经"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一贯非常重视群众的经验。他告诉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⑥

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和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这是决定政策和斗争策略的基础。没有对各个阶级的动态的深入了解，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而调查分析各阶级的动态，又要以调查分析它们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毛泽东同志作实际调查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例如在《兴国调查》中，调查和分析了中农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六大基本利益：第一，中农人口占全人口20%，土地只占15%，在土地改革中大都分进了土地。第二，土地改革前，中农讨一次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讨亲很不容易，土地改革后，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第三，过去迷信，老人死了出丧要花很多钱，中农常常因此负债破产，土地改革后破除了迷信，不用那么破费。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南方山地，常常跌死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才能买回一条，土地改革后牛贱，跌死一条牛，再加三四元就可买回一条。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节省一点用项。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一项利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改革后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就得出了必须和能够巩固地团结中农以及怎样团结中农的普遍结论。

观察各个阶级的动向，要从它们的基本的经济利益出发；某一个阶级拥护还是反对某一

政策，最根本的就在于这一政策是增加还是损害它的利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团结同盟者一道去打击革命的敌人。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写道："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⑦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来确定对同盟者阶级的政策，实现对他们的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中还非常注意群众生活改善的状况，注意改善群众生活和发动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关系。长冈乡的工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当然那里有其自己特有的情况，那里的具体作法，别的地方不能完全照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长冈乡的工作情况做了周密的调查，从中引出了一条普遍的结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从典型调查中发现一般、抽出一般结论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⑧因此，各级领导者和领导机关，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经常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的。

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更复杂、更繁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就是因为对中国的情况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经验、要求而制定出来的。各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是以对本地情况的经常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复杂的，在每一项工作中，不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便不能彻底摸清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时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在总路线照耀下，我们的事业以不断跃进的姿态前进，情况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也就更需要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各地、各个部门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791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2页。

③④⑤⑥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790页。

⑦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3页。

⑧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页。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西藏工委、西南局并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中央最近讨论了西藏工作，着重研究了今后西藏工作的方针和若干重要问题。中央高兴地看到自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开始平息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西藏工委领导进藏部队同西藏干部和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工作成就是伟大的。现在，某些边远的农业区的民主改革和牧业区的“三反两利”运动虽然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些残余叛匪在那里活动，也有某些已经实行民主改革的地方，群众优势还没有完全树立，但是这种地区只占一小部分，从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说来，封建农奴制度是被推翻了，没收了农奴主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成为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百万农奴在这场激烈的民主革命斗争中站立起来了，他们的政治觉悟、爱国主义热情和劳动积极性都普遍地有了提高。这两年的生产是好的，农业获得了丰收。在平叛改革工作中发生的一些过左的错误以及其他的缺点，经过工委最近一个时期的认真检查，并且采取了适当措施，已经得到纠正或者正在纠正。所有这些，都为今后西藏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在民主改革基本上完成之后，西藏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让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稳定发展一个时期？还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认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五年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当前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左和急，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要使同志们知道，我们这样作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以便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还要知道，在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宗教关系很突出，经济、文化很落后，而又和印度等国为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了近两年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激烈斗争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使农民群众在自己得到的土地上安心生产，休养生息，并且通过实践接受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而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勉强去做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不仅不利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对上层的团结，也就不利于将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上述方针，今后西藏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集中力量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向群众深入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第三，肃清残余叛乱分子和其他

反革命分子；第四，做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第五，整顿干部作风，发展党的组织，培养藏族干部；第六，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区。只要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增强人民的团结和汉藏民族的团结，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西藏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可靠的条件。

（三）长期受农奴制度统治的西藏群众现在翻了身，迫切期望改变旧面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牧业，同时发展商业和为农、牧业服务的手工业。国营经济应该巩固和适当加强。工业方面，除了极个别确有必要的项目（例如开采硼砂和毛纺厂）以外，不要再扩大，职工人数一般不要增加。农业不发展，基础不打好，交通问题不解决，要想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不能设想靠内地运粮进去办工业。努力发展农业，使农（牧）民富裕，这是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祖国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根本问题。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农业提到首位，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并在牧区继续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和扶助贫苦牧民的政策，开展增畜保畜运动，促进牧业发展，力争农业丰收，多打粮食，牲畜兴旺。在西藏当前的具体情况下，所谓发展生产，主要的就是发展农（牧）民的个体经济，不要害怕农（牧）民富裕起来，现在的问题正是应该使农（牧）民富起来。因此，我们在西藏一切政策的基础，就需要放在使农（牧）民富裕之上。不管是发展农业、牧业，还是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各种措施，都要按照这个精神作安排，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勤俭建设。要按一家一户地算账，让每户农民都有存粮，每户农民、每户牧民都多养些牲畜，多盖些房子，生活天天向上。在发展农牧业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互助组，对于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要帮助巩固和发展，但对于某些“明组暗社”要坚决改过来，凡是土地、耕畜及其他生产资料按组分了的，要重新分配到户，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互助组。在领导农、牧业生产上，要照顾历史习惯，因地制宜，合乎实际。凡是新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措施，都要先试验，再推广，反对瞎指挥生产的作风。估计产量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偏高，坚决防止浮夸。粮食要少征购一些，留粮标准放宽一些。今后三年至五年，进藏部队和职工用粮仍由内地调运，专区和县的干部用粮为数不多，可以由当地解决。机关部队要种地，办农场，争取粮食部分自给，减少国家远程运粮的困难，并保证农民多存余粮，安心生产。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提倡节约，以备荒年。要看到西藏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假如一旦发生了大的灾荒，从内地运粮救济是很困难的。粮、毛、油、布等重要物资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要依据实际需要和当地条件逐步推行，不要企图把一切都管起来、包起来。贸易政策要适当，价格要公平合理，坚决防止和克服不等价交换现象，已经存在的这种现象，必须立即纠正。有些出售物资由于长途运输，售价太高的，可以采取补贴的办法适当调低；靠近边境的地区，更应该这样作。为了活跃农、牧业经济，便于农、牧产品的交换，可以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搞点自由贸易，对于某些习惯性的交换方法只要没有多大害处或者目前尚无法代替的都要保持下来。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商业和市场必须管好，但不要管得太死，对私营商业（包括外商）实行利用、限制政策（但也不要限制过多过严），这些地方管好了，就不怕自由市场的冲击。

在民主改革中曾经发生过侵犯中农利益的地方，要切实检查纠正，对中农的财产损失要坚决给予补偿，这笔款项可以由国家拿出钱来帮助解决。

（四）经过普选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基层的人民代表

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出选的人民委员会应该在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务必树立贫苦农民的优势，权力务必掌握在贫苦农民之手，并且真正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意志，成为当地人民的权力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基层代表大会建立起来以后，再建立县级的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基层代表大会中，要有中等农奴及其他劳动者的代表，在县级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中，要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要有上层爱国人士的代表（自治区一级要比县一级安排得宽一些）。基层的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在今年建立起来，争取明年至迟在后年召开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要认真地作好普选和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认真地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种实际教育使干部养成民主作风，把底子扎正，防止和克服独断专行、命令主义、瞎指挥等缺点。

（五）西藏的统一战线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了。改革以前，我们在西藏的上层当中只以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的政治要求，还不可能把赞成民主改革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要求。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工农联盟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巩固了，没有叛乱的几千个上层，也起重大的变化，大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在大势所趋和解放了的群众推动之下，或者表示赞成民主改革或者保持中立。现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把赞成民主改革也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要求，今后还要进一步以六条政治标准为统一战线共同的政治基础。西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今后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要求我们进一步把统一战线工作认真做好。对没有叛乱的上层分子，我们都要采取积极态度，把他们包下来，包到底，安排好生活，安排好职位，然后逐步实行改造。特别是对班禅的工作，更要根据中央历次指示聚精会神地去作好。班禅和跟随他的一些人，是我们扶持进藏的，又和我们有了十多年合作的历史，同达赖集团有着原则的区别，必须对他们坚持长期合作的方针。对阿沛、帕巴拉等人以及其他愿意跟着党走的上层分子，同样应该坚持这个方针。稳定地团结了这些人，无论对于团结整个藏族，或者是对国际斗争，都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要把班禅、阿沛、计晋美、拉敏等左派看成是我们上层工作中的依靠力量，并且要逐步扩大这种力量。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对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不满意，要求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创设必要的条件，改进这方面的缺点，让他们确实有职、有权、有工作做，帮助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在政治上逐步进步。有关西藏的情况，要让班禅、阿沛他们充分了解，对其他参加实际工作的上层分子，也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工作范围内有关的各种情况，同他们合作共事，商量解决问题，并且要采取适当方式，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不满，有牢骚也让他们说出来，引导他们自己分析，自我教育。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应该同他们协商，教育他们听党的话，跟党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作必要的批评和教育，但必须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要作必要的让步，如果他们的意见不对，又很坚持，可以让他们去办，办错了让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教训，然后去改正。

团结改造几千个没有叛乱的上层分子，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其中不愿意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定是有的，这种人虽然是少数，必须保持警惕。但对于大多数人说来，是可以改造的，也是必须改造的，要看到他们的改造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又团结又斗争的过程，不要性急，急了只会引起他们抵触和不满，反而不利于改造。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把一切需要安排的上层分子都安排起来，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作用。并且使那些能作实际工作的发挥所长。对于分散各地的上层分子，可以选择几个城市例如拉萨、日喀则、昌都

等，修一些房子，把他们养起来，组织学习，开“神仙会”，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帮助他们改造，但这个工作也必须逐步进行。目前应当认真贯彻赎买政策，克服乱搜乱斗的错误，和劳动过多等缺点，不要对他们开斗争会，对已经斗错了的上层人物，要在适当场合把错误谈清楚，使他们安稳下来。

（六）对待宗教问题更要慎重，更加不能性急。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是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应该完成。但是人民群众正当的宗教生活必须照顾。要知道西藏人民广泛信仰喇嘛教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同时，西藏的宗教在国外也还有着不少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适当，不仅会脱离一部分群众，而且不利于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发展生产上来。只要生产发展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宗教影响就会逐步削弱。在这方面，行政命令的办法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代庖丢菩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这个精神办事。在留多少寺庙的问题上，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和需要办事，一县留一个庙是太少了，群众会感到不方便、不习惯，可以多留一些，实行大、中、小结合，不一定只留大庙。在留多少喇嘛的问题上，要按喇嘛本人的自愿。班禅这次来京又谈到以下五条，即：（1）放弃剥削，（2）寺庙民主管理，（3）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4）喇嘛参加劳动，（5）老弱喇嘛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的生活由政府包起来等，可以照他的办。班禅还提到专门念经的喇嘛问题，他主张除了要留一些一般喇嘛以外，还要留三、四千能念经的喇嘛，脱离生产，专门念经、学习，不要多劳动。这个意见原则上可以同意，具体如何办，工委应同他商量处理。我们必须加强对寺庙的工作，特别是对能念经的这一部分喇嘛的工作。要让他们研究宗教经典，研究佛学，也学一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懂得一般的政治知识，成为宗教知识分子，同时要注意在这些人当中有计划地培养一些政治上靠拢我们又在宗教学识方面有造诣的进步喇嘛，以适应国内外斗争的需要。

为了熟悉业务，在我们担任宗教工作的专职党员干部中，也要有人注意学点宗教知识与宗教历史。

（七）边境地区的工作，要照顾当地的种种复杂情况，要很好地注意配合对外斗争，以便使我国的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对这类地区的民主改革，应该有意识地搞得更缓和、更稳妥。可以分期分批地去逐步完成，凡是不具备条件的，宁可缓后再改。在改革当中，要切实争取群众，分化上层，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分子。打击的范围，应该缩小，进行斗争要更策略更灵活，在划阶级成分问题上，农奴主可以有意识地少划一些，只要是可以不划为农奴主的就不要划。在戴不戴叛乱分子帽子问题上，可戴可不戴的不要戴。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的多余土地和其他财产坚决不动。对于没有叛乱的或者不是公然反抗改革的上层分子，一律实行和平改革，实行赎买政策。对其中多少有些代表性的人物都要作适当安排，并且要比一般地区安排得多一些。改革中采取背靠背诉苦的方式发动群众，对上层分子不要采取面对面的斗争方式。对于叛乱头子和其他罪恶昭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首先查实材料，经由上级党委批准，再由政府依法逮捕，并把他们的罪行在群众中公布，该判刑的可以按照他们的罪行轻重和具体表现，从宽处理，该处死刑的也可以暂时关而不杀。在押人犯可以允许他们的家属探视。严禁乱搜、乱捕、乱打，更不允许私自打死人。边境地区目前不要

搞群众镇反运动，镇反工作由公安部门去进行。在靠近边境线的地区内，要严格按照军委有关的规定办事，并且要安排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保护群众利益，同外国反动派和窜回骚扰的外逃叛匪作斗争，安定群众情绪，争取外逃的劳动群众回家生产。

（八）西藏现有的一部分残余叛匪，必须肃清。完全消灭这些残余的叛乱武装，主要的要靠政治，要靠群众，同时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西藏的边境线很长，国外敌人到处可以窜进来。敌人还可以空投，肃清残匪将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一定要打好政治仗。不做好政治争取、分化、瓦解的工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光靠军事打击是不行的。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对于归降分子一定要坚持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政策，并且要想各种办法，从叛匪中（包括逃出国外的）争取一些过来；同时对在押的犯人要审查，表现好的也可以陆续放一些出来，利用他们作些工作。

（九）挑选干部，培养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整顿干部队伍，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我们的基本任务。现有的干部队伍，干部作风，要认真整顿。除了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按政策办事、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以外，还需要反对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风，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外来干部必须本少而精的原则，凡是适宜留藏工作的要留下来长期工作，培养提高，并且坚决组织他们学习藏语藏文，五十岁以下的干部一定要学会使用（也要帮助藏族干部学好汉语汉文），为长期建设西藏努力奋斗。其中个别问题确实严重，不宜在西藏工作的，可以送回内地处理。西藏几年来的平叛、改革工作，主要是靠外来的领导骨干干部帮助完成的，今后也还要再派一些各级的领导骨干和农牧业生产技术人员等，这是必要的不可少的。但是，光靠这些干部，党在西藏的根基就还不是很稳固的。要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并在将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西藏自治区，必须在当地藏族劳动人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大批共产主义干部，同时注意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和各种科学技术干部。随着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许多工作逐渐由少数民族干部当家作主，更多的事情将逐渐由他们来办，这是符合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如果少数民族干部不是逐步增多，事情又不由他们自己办，那就不是自治，而是“代治”。汉族干部对于少数民族，绝不能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所有干部都要以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处于群众之上。鉴于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西藏自治区行将成立，必须更加重视培养藏族干部的工作，挑选干部，必须注意选择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觉悟较好、民主作风较好、群众观点较好、勤恳朴素、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就是说要能够忠实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在民主改革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农村积极分子干部，大多数肯定是好的，要爱护培养，训练提高，要向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这些干部中难免有一些作风不好的、脱离群众的“勇敢分子”，或其他不纯分子参杂其间，这种人是不能依靠的。但是对他们也要分别情况，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分子以外，都不要轻易抛弃，应该经过教育和实践，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分配适当的工作。

（十）要贯彻上述方针政策，应该严格要求西藏各级党委、驻藏部队和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要在此以外兴章程，出点子。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要通过调查研究，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不要机械搬用汉族地区的经验，必须坚决依靠群众，贯彻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处处看到群众的利益，发扬民主作风，贯彻民族平等政策，有事和藏族人民、藏族干部商量，并且同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团结起来，实行合作，踏踏实实地把西藏工作作好。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央、主席并华东局：

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三月六日开始的，到三月二十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全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

这个办法的基本内容是：（1）包工。首先按照不同作物和耕作难易，逐丘定工。然后根据自己地区的具体情况计算出大农活和小农活的用工比例，分别进行包工。凡是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如犁田、育苗、播种、收割、用几盘水车或大型水车车水等需要集体做的工都由生产队包给作业组。凡是小农活如追施肥料、锄草间苗、清沟沥水、用一盘手摇水车车水等便利于分散做的田间管理活，都按劳动定额包工到户，并按劳动底分承包田间管理工（也叫责任田）。

（2）包产。首先按照作物品种和土质、水利、劳力、耕畜等条件，逐丘定产，然后计算出生产队的包产指标。这个包产指标，由包大农活的作业组和承包田间管理工的社员保证完成。

（3）奖赔。超产按大小农活用工的比例分奖。减产要查明原因：如因田间管理没有搞好而减产的，应由承包田间管理活的社员负责赔偿；如因大农活没有搞好而减产的，应由承包大农活的社员负责赔偿；如大小农活都有责任的，则按用工比例赔偿。如因客观原因减产的由社员评议免赔。

在试行这个办法的地方，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大大加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主要表现在：（1）出勤增多，工效提高，做活质量好；（2）闲散在外的劳动力自动回乡生产；（3）积肥更加积极，户户打青草，家家修厕所；（4）田间管理做得更加认真细致，鸡猪糟踏庄稼的现象大大减少了；（5）对耕牛、农具更加爱护了，社员添置了不少小农具。如寿县城关公社二十里埠大队，在实行这个办法后，出勤人数由过去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社员添置小农具二千四百多件，新建厕所二百六十八个，午季追肥面积比原计划增加一倍。这种情况在试行这个办法的地方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至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我省的厂矿工人也有个别人因这个包产办法而要求回家生产的，但经讲清以后误解就澄清了。

为了避免影响邻省，请求中央把我们这个办法告知他们，以免在群众中发生误解。

安徽省委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

中央三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全国广大农村中讨论和在部分地区试行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应，证明这个条例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这个文件是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中央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召集了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农村进行调查、征求意见和试行的结果，对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其中包括一些重大的修改。现在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正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讨论和试行。

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抓紧农闲间隙，把这个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

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

在党内和党外的讨论中间，如果对于这个修正草案还有修改意见，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及时地收集起来，报告中央。

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其中有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的规定为准。

关于在各地全面实施这个条例的步骤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规定，报请中央局批准。

为了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各项规定得到正确地贯彻执行，使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巩固，使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央认为，各级党组织，必须吸取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继续改进领导作风，认真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

中央重申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规定，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地、县两级党委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从今年三月中央广州会议以来，各级党组织，一般地已经开始注重调查研究。这种风气，应该继续发扬。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要讲究实效，那种既不提出问题、又不解决问题的调

查，是没有用处的。不许滥派调查组。不要在一个地方，集中许多做调查研究的人，以致调查成灾。每个调查组，都应该有一定水平的负责干部率领。在派调查组下去之前，都应该先进行训练。毛泽东同志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下去做调查的同志，不许采取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态度，不许采取主观主义的方法，在生活上不许特殊化，不许增加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负担。被调查的单位，应该对调查研究工作给以协助，如实反映情况。现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应该注意纠正。

各级党组织，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懂得，群众的解放，要依靠群众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的恩赐；只有从群众中来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只有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才能把革命事业做好。所有这些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都要反复宣传，做到深入人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凡是不符合群众需要的事情，都是不会巩固的、不会持久的。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绝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也就绝不会是符合群众路线的。近几年来，在我们许多工作中出现过的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现象，应该尽力防止，不要再有发生。至于在许多基层组织中出现过的那种打人、捆人、扣口粮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是十分恶劣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更应该严厉禁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所规定的许多制度，例如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制度，监察委员会制度，在生产、分配、财务等等方面的民主管理制度，都是实行群众路线的重要的保证。中央提出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促使干部实行群众路线的。这些制度和纪律，一定都要认真实行。

农村中的退赔工作还做得很不彻底，这仍然是我党和广大农民群众关系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全部地彻底地进行退赔，并且要把退赔工作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剥夺农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刮“共产风”，违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侵犯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侵犯社员个人所有制，就是犯了剥夺农民性质的错误。只有认真彻底退赔，才能使干部受到教育，得到深刻的教训。才能使农民真正相信，属于公社各级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属于社员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有保障的；才能改变几年来农民在生活和生产上的不安定的状况。关于退赔工作的各项具体问题，中央已经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切实执行。

发扬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有力保证。近几年来，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方，由于缺少正常的民主生活，给工作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各级党组织，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在各个方面，广泛地造成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健全农村的民主生活，发扬党内、党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民主，已经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这些规定，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保证执行。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

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给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干部和党员中的极少数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贪污腐化分子，以及屡教不改、顽固地抗拒党的政策的分子，应该给以必要的处分，以平民愤。在处理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和组织手续办事。

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必须进行到底，不能草率结束。所有的人民公社，都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进行一次整顿。这项工作现在就要抓紧，但是可以分期分批进行，今年确实不能完成的，可以延至明年。对于参加整风整社工作队的成员，应该严加选择，经过训练。今后在整风整社中，不要预先划分社、队的类别，和干部的类别，也一般地不要在群众中重划阶级成份。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应该经过整风整社工作以后，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

半年多以来，全党同志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面貌，已经大大改变，或者说正在迅速改变。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切切实实地、兢兢业业地而又朝气勃勃地努力工作，把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坚决贯彻，经过两年三年的艰苦奋斗，我们面前存在的那些暂时的困难，一定能够一个一个地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仍然会是快的，而不会是慢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退赔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决心比较大，做得比较认真，但是，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关于退赔问题，中央进一步作如下的规定。

一

从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央各部门，省、市、自治区、专、县各级的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抽调或者占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地清算和退赔。过去没有清算的，或者处理不彻底的，必须重新算账，保证真正做到彻底退赔。

平调账，主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高级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社员折价入社的耕畜、农具、林木的欠款，和应该退还的社员的投资，虽然不属于平调问题的范围，也应该清算偿还。

二

从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到公社各级，都应该明确，谁平调的谁退赔，从那里平调的退赔给那里。平调单位不但要彻底退赔，而且应该向群众作检讨。

退赔应该以实物为主，一切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都应该毫不犹豫地退还原主，非不得已，不作价赔偿。

退赔的物资和价款，都必须保证归还到原主手里，不准挪用，不准克扣，已经这样做了的，必须纠正。

三

对于被平调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应该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一）农民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平调了的这种生产资料（如犁、耙、锄、锨、镢、刀斧、禾桶、晒席、水车、排灌设备、车、船、猪栏等）和生活资料（如房屋、家具、锅、碗、刀、灶、炕、床、被、衣、缸、桶等），应该首先退赔，并且主要用实物退赔。

（二）牲畜。被平调的牲畜，应该退还；已经变卖或者死亡了的，应该折价赔偿。在耕畜大量死亡，无法耕作的地方，应该由平调的部门负责，在一定的时期内，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耕畜或者其他农业动力。

（三）土地。国家平调集体的，或者大集体平调小集体的土地，以及鱼塘、苇地等，应该一律退还原集体单位。各项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占用土地过多的，应该退还其中多余的部分。占用的土地和这些土地上的附着物，以及无偿调用的木材、砖瓦等物资，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四）林木。对于大办钢铁和进行各项基本建设砍伐的林木，应该进行清理，给予赔偿。国家占了集体、大集体占了小集体的山林、果树和其他经济林木等，应该一律退还原集体单位；对于已经砍伐或者损坏了的林木和原单位在收益上受到的损失，应该认真清理，作价赔偿。

（五）劳动力。除了大炼钢铁所调用的劳动力，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再清算以外，其他方面所调用的劳动力，都应该清算和付给报酬。在兴修水利中调用的劳动力，凡属受益地区的，根据受益的多少，可以不给或者少给报酬；凡属非受益地区的，应该付给报酬。

（六）房屋。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公社各级占用社员的房屋，应该一律退还原主，并且付给占用期间的租金。如果原主房屋确实有余，在取得本人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租用一部分，所有权仍属原主。在退还的时候，遭到损坏的房屋应该由占用单位负责修缮。凡是在炼钢铁、修水利、办猪场、积肥料、集中居民点、办食堂、修公路铁路或者其他运动中拆毁的房屋，应该由当时布置任务的部门负责赔偿。原则上应该以重建新房来赔偿。凡是可以改建为住宅的公房和已经停办的工厂等，可以改建退赔。在原主的住房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得到本人同意，也可以作价赔偿。在赔偿的房屋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房屋被拆毁的社员的住房问题，应该由公社各级妥善安排。

（七）其他财物。属于社员所有的屋前屋后的竹木果树、自留地上的作物、家禽家畜、建筑材料、自行车、缝纫机、银行存款等，凡是被平调的，都应该赔偿。

四

退赔工作，要分批、分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地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计划。在今年内，要发动群众，彻底清算平调账，并且把一切可能解决的、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兑现。一两年退赔不完，三年基本解决，三年退赔不完，也必须在五年之内完全解决。

对于因为平调，使生产、生活发生困难的单位或者个人，应该首先退赔。

五

安排退赔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对于保证退赔兑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农具和用具等，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责成有关部门，组织生产。中央和地方的计划部门以及其他有关的经济部门，都应该把退赔的物资和原材料，如钢、铁、竹、木、煤等，纳入计划，保证供应。

六

设立领导退赔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央、省、市、自治区、专、县、公社、生产大队各级，都要成立退赔委员会或者退赔小组，还要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各项退赔工作的进行，督促退赔物资和原材料的调拨和生产，并且检查和处理退赔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退赔工作多的有关部门，也要成立退赔小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地方各级退赔委员会或者退赔小组的负责人，应该由本级党委的一个书记担任。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退赔委员会或者退赔小组，应该吸收同群众有联系的、公正的农民积极分子参加。

七

退赔工作，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一切有关退赔的事情，那些应该退赔，那些不应该退赔，那些必须退赔实物，那些可以作价赔偿，那些应该先退赔，那些可以后退赔，以及其他

一切有关退赔政策的贯彻执行，都要交给群众去讨论和评议。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充分讨论，民主决定。

平调物资和退赔物资的折价，都应该公平合理，不能由平调单位片面决定。价格的议定，可以在生产队成立议价小组，民主评议；也可以由原主聘请中间人，经过原主、平调单位和中间人三方议定。

对于平调问题的处理，不论是单位或者个人，如果有意见，都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申诉或者控告。

八

通过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才能使农民心情舒畅。要使干部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个人所有制，都不容许有任何侵犯。要通过这一次彻底退赔，来教会干部懂得等价交换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使他们真正学到，好象上了一次学校。

对于过去在平调中和退赔中混水摸鱼的干部，应该追回侵占或者贪污的财物，给以批评；情节严重的，还应该给以处分。对于抗拒执行退赔政策，或者继续犯平调错误的干部，要给以应得的处分。

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一）关于所有制

一、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对于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

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的组织形式，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手工业合作小组，手工业合作工厂；有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分社的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小组；有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社社联营工业和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手工业生产小组。

在目前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有些城市也可以以人民公社工业为主要组织形式。不论采取那种组织形式，原则上都要实行入社自

愿，退社自由，经济民主，自负盈亏，反对不讲经济核算的“吃大锅饭”做法，反对依赖国家包下来的“铁饭碗”思想。

二、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必须对目前手工业的所有制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

调整所有制的原则是：有利于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加产品品种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节约原料材料，降低成本；有利于适应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利于更好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手工业工人的收入。

调整手工业所有制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必须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必须对一切人员作妥善安排，必须使手工业工人的收入不致减少。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不同生产情况，区别对待。对于改变所有制、调整组织形式、确定经营方针、处理公共财产等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干部和群众的充分酝酿，反复讨论，民主决定。反对草率从事，防止发生新的命令主义和瞎指挥。

调整手工业所有制，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地必须先作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逐步推广。

三、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凡是不利于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不利于恢复和增加产品品种，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不便利群众的，都必须坚决采取适当的步骤，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凡是不改变所有制确实办得好，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就不再变动。

四、农村人民公社兴办的工业，如农业机械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开采和建筑材料工业等，凡是适宜于集中生产，又能办得好的，可以仍然保留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由公社继续经营，分别核算，各计盈亏。凡是不适宜于集中生产，不改变所有制就办不好的，应该经过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的同意，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或者改为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凡是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经营条件的，应该停办。

城市人民公社兴办的工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家庭妇女参加公社工业做工，要特别注意完全自愿，不得勉强。

五、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属于参加这些合作组织的手工业工人集体所有。在农村，它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是人民公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公社和手工业县联社双重领导。在城市和集镇，可以是人民公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是手工业联社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不作为人民公社经济的组成部分。

六、农村人民公社的手工业工人，同农业的关系特别密切，除了某些手工业集中地区以外，一般不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手工业工人，可以继续参加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的手工业生产小组。但是，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应该和农业劳动不同，可以按件计工，可以按产值计工，可以按收入比例分成，也可以让他们自负盈亏，交纳少量的公积金。

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手工业合作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手工业生产小组，除了某些必须常年生产的以外，都应该实行亦工亦农的原则，农闲多办，农忙少办或者不办。

七、某些适宜于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应该允许他们在手工业合作组织、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的领导管理下，进行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己。同时，向手工业合作组织、公

社或者生产大队交纳少量的公积金。

八、城乡家庭手工业，是整个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积极发展。家庭手工业，可以自产自销；可以由商业部门加工订货；可以由人民公社或者手工业联社，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或者生产小组，统一领导，分散生产，发原料，收成品。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

九、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现在确定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在国营和社营期间发生的盈亏和债权债务，由国营工业主管部门和人民公社负责处理。在这个期间新增加的设备和其他资产，凡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需要的，应该拨给他们继续使用，折价由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分期偿还，或者作为国家和人民公社的投资。

十、过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资产和社员股金，被无偿调用的，必须坚决退赔。谁调用，谁退赔。

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现在确定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应该把原来的社员股金和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资金，设备，厂房等全部退还他们，已经动用和损坏了的，必须如数赔偿。继续作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对于原来社员的股金和个人工具折价，也必须认真清理，如数退还给本人。

过去各级手工业联社的积累和资产，已经交给国家有关部门的，应该由有关部门负责退还。

（二）关于组织规模和手工业者的归队

十一、手工业企业的规模不宜过大，行业不宜混杂。规模过大的，应该坚决分小，行业混杂的，应该坚决划开。组织起来不等于集中生产，过份集中的应该坚决分散。但是，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要强求一律。

手工业行业复杂，小而灵活，经营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可以集中生产，可以分散生产；可以固定设点，可以流动服务；可以在当地串街串乡，可以到外地串街串乡。手工业工人到外地串街串乡，人民公社应该给予方便。

十二、恢复和充实手工业生产队伍。凡是原来生产手工业产品的企业和人员，特别是生产传统名牌手工业产品的企业和技术工人，已经改行转业的，除了少数特殊情况，都必须坚决归队。原来的手工业修理服务人员，也必须归队。

组织企业归队，要按行业、按产品分类排队，认真做好生产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十三、大力培养手工业的新生力量。提倡师傅带徒弟，提倡尊师爱徒。手工业部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要有计划地安排青年学艺。鼓励手工业工人带自己的子女进厂进社学艺。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己收徒弟。

师傅带徒弟，应该给师傅一定的津贴。带一个徒弟，给一个徒弟的津贴，带两个徒弟，给两个徒弟的津贴。带得好的，还应该给予奖励。农村中学徒的待遇，应该不低于当地同等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学徒的期限，一般仍以三年为原则。在实际执行中，要按照学徒实际达到的技术水平来决定，学得好的，提前转正，学得不好，适当延长。

（三）关于收益分配和工资福利

十四、手工业企业的收益分配，应该从有利于调动企业经营和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出发，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

继续保持全民所有制和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企业，以及手工业联社经营的合作工厂，都应该适当扩大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也可以试行包品种、包产量、包质量、包利润、超额奖励的“四包一奖”办法。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的利润分配，参照过去社章的规定执行。属于人民公社领导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应该向公社交纳公积金，交纳的比例最多不得超过利润的百分之十。

十五、手工业的工资制度，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手工业的工资形式，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情况，可以实行个人计件工资或者小组计件工资；可以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可以实行分成工资。实行计件工资，要特别注意防止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实行计时工资，要特别注意做好奖励工作，可以采取单项奖和综合奖相结合的办法。

现行工资制度、工资等级、工资标准、劳动定额等不合理的，应该经过职工民主讨论，有计划地予以调整。对于技术较高、年老体弱的老师傅，要适当加以照顾。

十六、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城市，应该大体相当于当地同工种、同等技术条件的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现在工资水平偏低的，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在农村，应该按照历史习惯，高于当地农民收入的水平。

十七、手工业企业职工的福利待遇，应该根据企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经营的好坏来决定。企业办得好的福利可以多一些；企业办得差的，福利应该少一些。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的老师傅、名艺人，应该给以帮助，保障他们的生活。

十八、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口粮，原则上应该与当地同行业同工种的国营工厂工人享受同等待遇，具体标准由各地自行规定。农村手工业工人的口粮，应该根据不同行业给予适当照顾；他们的家属的口粮和烧柴，应该和当地农民享受同等待遇，并且同样分给每人一份自留地。

（四）关于供产销和价格

十九、对于各种所有制的手工业的供产销，要统筹安排，分级管理。既要有中央和地方的统一计划，又要有企业安排生产的灵活性；既要使主要产品、名牌产品在中央和地方计划中能够站上队，又不要管得过多过细。

集体所有制手工业企业的生产计划，应该根据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工业建设服务的方针，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编制。计划需要调整的时候，国家计划部门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只准协商，不准强迫。

二十、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安排，要特别注意发挥传统产区的生产基地作用，保持和发扬传统名牌产品的特色，迅速恢复传统的合理的供销关系和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的需要。

手工业集中产区的名牌产品，必须兼顾当地和外地的需要，切实保证外调外销任务。生

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劳动力和口粮补助，各省、市、自治区应该进行全面安排。

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必须注意提高和保证产品的质量，不减少品种、花样，并且注意继承和发扬一切传统的优良的生产方法，已经行之有效的、群众公认的好的经验，应该肯定下来。今后制造新产品，必须经过试产试销，成功以后，再逐步扩大生产。

二十一、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应该根据国家分配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来解决。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一、二类主要物资和进口物资，由手工业部门提出申请，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计划，单列户头，由国家物资分配部门和有关部门拨交手工业部门安排使用。属于商业部门经营的一、二类物资，如纱布、丝绸、毛竹等，由商业部门负责供应。

二十二、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三类物资，一部分由商业部门负责供应，一部分由手工业部门和企业自购自用。到外县、外省采购三类物资，应该在县以上手工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进入集市贸易的二类物资，手工业部门和企业也可以进行采购。手工业部门和企业采购原料材料，必须服从当地市场管理，有关地区应该给以协助，不得阻拦。

地区之间传统的供销协作关系必须迅速恢复，新的供销协作关系应该积极建立。手工业部门和企业，可以向原料产地的供销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直接采购原料材料，可以用自销的产品换取所需要的原料材料。

二十三、手工业生产利用废品废料，对社会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工矿企业、铁道交通、基本建设等单位的边角下料和废品废料，原则上应该由手工业部门收购使用。有些工矿企业的边角下料有上交任务，或者要自己利用，应该由计划部门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适当确定上交、本厂留用和拨给手工业使用的比例。手工业企业可以和厂矿单位直接挂钩，固定边角下料的供应关系。

社会上的各种废品，由商业部门或者物资部门收购的，应该优先供应手工业使用。手工业企业可以按照传统习惯，接受来料加工和带料修理，实行以新换旧；也可以收购某些自用的废品。

二十四、过去手工业部门建立的原料生产企业和原料改制加工企业，应该尽可能交回手工业部门自产自用。过去手工业部门所属的机械厂，也应该拨回一部分，或者由国家另外拨给必要的机械厂。国营企业替换下来的旧设备，应该恢复过去作价拨给手工业部门使用的办法。

手工业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和设备，采取分级包干的办法，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计划。

二十五、手工业产品中，由国家供应原料材料的计划产品，原则上由商业部门包销，也可以留出一部分由手工业部门和企业自己销售；由手工业部门和企业自购原料材料的产品和由国家供应部分原料材料的非计划产品，原则上由手工业部门和企业自己销售，也可以由商业部门选购和推销一部分。提倡手工业企业同基层商店直接挂钩。提倡前门设店，后边设厂的传统经营方式。

二十六、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必须合理，保证生产有合理的利润。由于原料材料价格变动，成本提高或者降低的，应该适当地提高或者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而增加成本的，应该限期改进。

手工业产品的价格，由各地物价管理委员会负责掌握。商业部门包销和选购的产品的价格，由工商双方合理议定。手工业部门自产自销的产品，有的可以按照国营商业牌价，有的可以同行议价，某些零星产品也可以由买卖双方自行议价。

对手工业产品应该实行“优质优价，分等论价”的原则，不能不分好坏一个价，不能以次货顶好货。

（五）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二十七、必须坚持民主办社、民主办厂的方针。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制度，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定期向社员公布账目，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公社工业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好的民主管理的经验。国营的手工业企业，也要结合手工业的特点，扩大民主范围，可以试行民主选举厂长、经上级批准的办法。

二十八、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勤俭办厂的方针。一切手工业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发扬手工业因陋就简、精打细算的优良传统。认真控制一切非生产性开支，力求减少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员。

一切手工业企业，都必须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度，定额管理制度，产品检验制度和原料材料领发保管等制度。

切实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恢复和提倡包退、包换、包修的传统做法。

二十九、手工业企业的工作时间和营业时间，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特点和不同季节来规定。旺季可以延长一些，淡季可以缩短一些。修理服务业的营业时间，更要机动灵活，便利群众，服务周到。

三十、手工业干部必须发扬民主作风，处处为群众打算，遇事同群众商量，不许独断专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许弄虚作假；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特殊化，不许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要认真执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

（六）关于领导机构和政治工作

三十一、中央、省、市、自治区、专、县各级都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手工业和公社工业的管理机构，并且配备同它们任务相适应的干部，统一管理各种所有制的手工业企业。

恢复各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各级手工业联社和手工业、公社工业管理机构可以合署办公，只设一套人员。

三十二、各级手工业联社的主要任务是：

编制供产销计划，组织原料材料供应和产品推销；

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帮助技术改造，推广先进经验；

训练企业管理干部、财会人员和技术工人；

协同基层企业举办集体福利事业；

对个体手工业工人进行组织、教育和业务指导，并且在供销上给以必要的帮助。

各级手工业联社都要设立供销机构，这个供销机构，是整个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十三、各级手工业部门管理的行业范围，应该有一个大体的规定，以便上下对口，安

排供产销。从全国来看，主要应该包括：小农具，小工具，小五金，小百货，炊事用具，日用家俱，竹藤棕草编织，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土陶土瓷，日用杂品，房屋修建，工业性的修理服务等。各地手工业部门管理的行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上述范围，因地制宜，具体规定。

三十四、在一切手工业企业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领导的核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在各项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手工业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加强对这些企业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理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的日常业务工作。

手工业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和检查理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对于生产、财务、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先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职工群众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理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

三十五、在一切手工业企业中，都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采取适合职工群众生产的生活情况和政治文化水平的方式，经常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和时事政策的教育。要使职工群众充分理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手工业劳动和大工业劳动同样光荣。要教育职工群众进一步树立当家作主、关心企业的思想。加强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团结，充分发挥老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教育青年工人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学习老工人的长处。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一）商业工作的方针

一、社会主义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主要通过商业环节来实现。做好商业工作，是全党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我们经济工作的方针，同样也是商业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社会主义商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从这个方针出发，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三、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商业工作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经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四、目前，商业工作必须切实改进，正确地解决怎样向农民买东西、怎样卖给农民东西

的问题，正确地解决商品等价交换和物资交流的问题，正确地解决商业体制和农村的商业所有制问题，正确地解决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

（二）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

五、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是现阶段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农业同工业的经济联系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经济结合的唯一形式。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国家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必须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供应农民同等价值的商品。

六、国家收购农产品，必须从实际出发，实行"先留后购"的政策。凡是收购农民必需的产品，都应该规定合理的留购比例，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部分。贯彻执行多劳多产多留的原则，反对一律拉平的办法。

七、国家在工业生产的计划安排上，要千方百计地增产适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逐步满足农民的需要。

国家掌握的工业品，凡是农村需要的，应该优先供应农村。

目前农民十分需要的铁、钢、木材、竹子、煤炭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的计划分配上，必须首先注意对农村作必要的安排。

八、国家收购的各种农产品，根据它们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采取三种收购方法。

第一类是粮食、棉花，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同农民订立统购合同。

第二类是重要经济作物、重要畜产品、重要出口物资。国家按照计划价格，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同农民协商一致，订立定购合同，进行收购。对于这类物资，农民的自留量应该适当放宽，自留的部分完全由农民自由处理。

不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的农产品都是第三类物资，可以在集市上或者集市外自由购销。商业部门也可以采取同生产大队、生产队或者社员个人协商议价、订立议购合同的办法，组织生产，进行收购。

完成了定购合同以后的第二类物资，也可以在集市上或者集市外自由购销，商业部门也可以采用协商议价、订立议购合同的办法，再收购一部分。

九、在目前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部门在同农民订立收购农产品合同的时候，只能在合同中规定供应农民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商品，以后应该逐步满足农民的需要。对于向国家出售第一类和第二类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商业部门应该多供应一些商品。

十、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必须注意因地制宜，不误农时，保证质量，讲求实效，不许粗制滥造，不许硬性摊派。对于一切不适用的、质量差的农具、肥料和农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有权拒绝接受，商业部门有权拒绝收购和推销。

十一、为了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必要分期分批地适当地提高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和销售工业品，必须贯彻执行分等论价、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则，不准压级压价，提级提价。

商业部门同农民协商议价收购的物资和在集市上收购的物资，一般可以按照收购成本加合理利润出售。

商业部门收购手工业产品，凡是因为原料，材料价格变动，成本提高或者降低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

应该从有利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出发，对各种不同商品，分别确定合理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

十二、必须加强物价管理工作，从中央到县都要建立和健全物价委员会，规定掌握物价的具体权限，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物价委员会应该经常召开会议，及时解决物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三）改进国营商业工作

十三、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

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

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领导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场。

十四、国营商业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保持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不应该根据行政区划把这种经济联系硬性地加以割断。

十五、商业行政部门应该同商业企业分开。商业行政部门主管商业的方针、政策、计划、业务领导等项行政工作。国营商业企业在商业行政部门的领导下，主管具体业务。要因地制宜，恢复必要的专业公司。

十六、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要为零售企业服务。在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相互之间，在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应该实行按照计划规定的金额和商品数量选购商品的制度，反对硬性摊派商品的办法。零售商店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批发单位进货，有权在一定范围内直接向工厂进货。

十七、国营商业的零售企业，要为消费者服务。在城市，应该建立消费者代表会议制度，作为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消费者代表会议应该反映消费者的意见，有权审查商品进出账目，建议改进商品分配方法，监督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经营作风，监督商业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听取消费者的合理意见，切实改进工作。

十八、国营商业的利润收归中央财政。取消各级地方财政对商业利润的分成办法。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部分，由国家预算统一解决。

十九、合理调整工商关系。商业部门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工业部门要为市场服务。商业部门供应工业部门的商品，工业部门供应商业部门的商品，双方都有权选购，按质论价，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凡是不合对方需要的商品，双方都有权拒绝接收，分别自行处理。

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商业部门应该积极试销。在经过试销打开销路以后，再成批地进行生产。

（四）恢复供销合作社

二十、为了同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相适应，使农村商业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接受群众的监督，应该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

二十一、供销合作社的机构，可以按人民公社设置，也可以按区设置。但是，供销合作社的业务经营，必须根据传统的合理的经济流通关系进行，力求便利群众。

二十二、供销合作社的基层社和各级联社，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构，由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对社员负责。

供销合作社受上级供销合作社联社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或区政权机关)的双重领导。

二十三、供销合作社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接受国营商业的领导。国营商业应该积极扶助供销合作社业务的发展。

供销合作社在向国营商业进货的时候，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

二十四、供销合作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过去供销合作社的社员股金和积累基金，应该由国营商业退还。供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合并期间，凡是没有分发社员股金红利的，应该由国营商业补发。

供销合作社的利润，大体上按照以下几个方面分配：国家所得税，供销合作社公积金和公益金，供销合作社县联社为了调剂基层社的盈亏而提取的基金，供销合作社社员股金分红。

上级联社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或区政权机关），无权动用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和物资。供销合作社的利润，公社和生产大队是否提成，提成多少，完全由社员民主决定。

二十五、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有适当的分工：

（1） 关于农产品收购。除粮食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以外，其他由国家收购的重要物资，在集中产区，可以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也可以由国营商业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在分散产区，一般可以由国营商业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这些物资在国家收购以后的多余部分，供销合作社可以自己经营。

（2） 关于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国营商业的销售机构，一般可以设置到县城以下的重要集镇，可以专营批发，也可以兼营批发和零售。县城和重要集镇以外的集镇和广大农村，生活日用品零售业务完全由供销合作社经营。

（3） 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化肥、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由国营商业经营，可以直接供应人民公社的各个生产单位，也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供应。小型生产资料的供应，由供销合作社经营。

二十六、恢复供销合作社，安排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分工，是复杂细致的工作，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要有灵活性，因地制宜。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变更，财产的处理，制度的建立和调整，商业网的设置，都必须在群众中和商业工作人员中充分酝酿，反复讨论，民主决定。

（五）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二十七、为了发挥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有必要把许多原来的城乡小商小贩，仍旧分

行业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国营商业或者供销合作社领导下从事商业活动。在目前，应该特别注意在集镇和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饮食业的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

二十八、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主要为国营商业或者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商品，取得代购代销手续费或者批零差价，同时，他们也可以在集市上进行合法的购销活动。

二十九、继续发扬小商小贩的经营特点，在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组织下，恢复货郎担子和流动饮食业，恢复串街、串乡、摆摊、送货上门、夜间售货等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又买又卖便利群众。

三十、国营商业负责管理和改造城市和县城以下重要集镇的小商小贩，供销合作社负责管理和改造集镇和农村的小商小贩。应该配备必要的领导骨干，安排这些小商小贩的生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防止和取缔他们的投机倒把行为。

（六）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三十一、应该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除了粮食、棉花以外，凡是第三类物资和完成国家合同任务以后的第二类物资，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集市上买卖的价格，由交易双方自由议定。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倒手转卖，反对弃农经商。

三十二、参加农村集市贸易的成员包括：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人民公社各级生产单位，手工业单位，社员个人和消费者个人。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单位，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在集市上收购原料，出售成品。

三十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通过业务活动，吞吐商品，便利购销，平抑物价，从经济上促进集市贸易的正常发展。

国家税收机关应该在集市上收税。

应该建立和健全集市贸易管理委员会，保护正常的商业活动，取缔投机倒把。

三十四、对于品种繁多、来路分散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应该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物资交流会、庙会、合作货栈、信托货栈、骡马大店等传统的商品流通形式，积极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一切在地区之间互相封锁、管理过严过死的作法，都必须坚决纠正。

公社工业、手工业和工业企业，在参加物资交流活动的时候，可以在产销之间逐步建立固定的合同关系。

（七）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

三十五、农村原有的农产品加工作坊，例如油坊、豆腐坊、粉坊以及其他作坊，应该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起来，以便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克服商品倒流、往返运输、经营环节过多、人力物力浪费的现象。

三十六、国家在收购农产品的时候，对于农村需要的油、米、面、粉条、酱油、醋等食

品的原料，应该给农民留下适当数量，就地加工，自产自用。

（八）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三十七、必须认真整顿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一切商业企业单位，都应该坚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建立和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实行经济核算，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账货必须相符，既要有商品账，又要有金额账。坚决克服不讲核算、不计成本、铺张浪费的现象。要建立和健全奖惩制度，有赏有罚，赏罚分明。

三十八、必须认真清理仓库，充分利用仓库现存的商品。仓库积压的农业生产资料，凡是根本不能用的，应该改制；适合农民需要而又不成套的，应该修理配套。

三十九、国营商业企业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实行“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制度。定期召集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工作。

商店营业时间应该方便群众。商店经理和职员必须在柜台上轮流值班。

供销合作社要实行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过去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制度。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必须同农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了解农村的供求情况。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必须把限量供应商品的进出账目，定期向群众公布，依靠群众的监督，堵塞“开后门”的漏洞。

四十、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遵守以下规矩：

（1）买卖公平。　（2）实事求是。　（3）便利群众　（4）待人和气。
（5）勤劳节约。　（6）不“开后门”。　（7）钻研业务。　（8）学习政治。

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目前各地正在部署和进行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为了使各地在这一工作中，在处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时有所依据，除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已经规定的以外，现在再作如下的通知：

一、关于精减的对象

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然，在完成精减计划的前提下，新职工中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中的骨干和技术能手的，也可以不减。

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是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

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的都不精减。但是，某些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如其因为家务需要或者其他原因，确实自愿回家，回家之后生活又有保障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家；某些一九五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如其因为年老体弱，自愿退休或退职的，也可以准许退休或退职。

对于老弱残疾人员，不能采取甩包袱的态度，必须有了妥善的安置办法之后，才可以处理。

二、关于被精减人员的待遇

（一）这次精减的职工，都按照离职处理，一律不用带工资下放的办法。

（二）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被精减时，除了发给他们当月的工资以外（当月工资的发法：工作不满半个月的，发给半个月的工资；工作超过半个月的，发给全月的工资），另按照以下标准发给生产补助费：

（1）临时工和合同工：工作在半年以上不满二年的，发给半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二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三年以上的，发给一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不满半年的不享受生产补助费的待遇。

（2）正式职工和学徒：工作不满一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学徒为生活补贴）；工作在一年以上不满二年的，发给一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二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发给两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三年以上的，发给两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

（三）精减一九五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按照退休、退职办法处理。

（四）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所需的车旅费及途中伙食补助费，由原工作单位按照现行规定的标准发给。

（五）上述生产补助费和车旅费、途中伙食补助费，由各单位开支后，列入财务决算报销，国家财政不另拨专款。少数亏损企业没有钱开支这笔费用的，可以暂向银行贷款垫支，然后由财政上照数归还给银行。

（六）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的时候，原工作单位和当地管理户口的部门、粮食部门，应该帮助他们办好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并且按照以下标准发给他们回乡后一个月的口粮：原来粮食定量在三十斤以内的，按照原定量发给；原定量超过三十斤的，按照三十斤发给。另外，回乡途中需用的粮票，也根据上述标准按照旅途天数计算加发。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多发给一部分口粮，但供应时间，最迟不能超过今年九月底。

以上各项待遇的规定，适用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直属单位。各地现在自定的待遇标准如果低于以上规定的，是否改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如果高于以上决定的，应该改按以上规定执行。凡是过去精减的职工的待遇问题已经处理了的，不再重新处理。但是，对于那些符合这次精减的条件而现在仍是带工资下放农村的，则应该在做好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改按现定的办法处理。专（市）县所属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精减时的待遇问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另作规定。

三、关于回乡后的安置工作

对于精减回乡的职工，必须充分做好政治动员，要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讲清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使他们树立回乡生产发展农业光荣的思想。并且要向他们讲明，将来经济建设事业发展，需要从农村抽调劳动力时，他们可以被优先录用。对于回乡的职工，城乡两方面都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安排，负责到底。职工一回到家乡，当地党的组织和社、队干部就应该热情地、积极地帮助他们安家生产。回乡后第二个月起的口粮要安排落实，当地安排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立即报告上级处理。住房有困难的要给解决住房问题。过去没有分给自留地的要立即按照规定分给。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在小农具、自留地的种子以至生活用具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各地商业部门对此应有准备，有些小农具可以从城里带回去一点）。总之，应该切实负责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四、关于在精减人员以后应该注意的事情

各地区和较大的企业单位在精减一批人员以后，应该及时地派人到回乡职工较多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和协助当地解决安置中的问题。同时各单位都必须立即切实加强本单位内部的定员定额管理、粮食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防止发生人减粮不减、人减钱不减的现象。减少一个人，就必须减少一个人的粮食，减少一个人的工资，严格做到人、粮、钱三者相符，绝不允许虚报冒领粮食和工资。为此，各单位既要有减人的计划，也要有减粮和减钱的计划，同时贯彻实现。减人必须腾出房子，这些房子应该交给当地人民委员会统一处理。因减人而余下的设备、工具，原单位应该妥善保管，防止损毁，随后由主管部门统一处理。

五、关于加强领导

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为了协助党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具体领导，从省、市、自治区直至县（市）各级党委，都应该成立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工作的领导小组，并且设置办事机构，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各级有关部门如公安、劳动、粮食、财政、银行、铁道、交通、商业等部门，都应该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各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共同把从精减、到旅途照顾、到回乡安置等一系列的工作自始至终地切实做好。有关地区之间，还必须加强联系，特别是被减的人返回重灾区的时候，更须预先联系协商，作好各种安排，首先是粮食等生活方面的安排，而后才可以遣送。总之，减人的决心必须大，时间必须抓紧，但是工作必须作好，力戒草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刘少奇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曾经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前仆后继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直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人民才找到解放自己的最好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个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目标、方针和方法。从此，中国人民的节节胜利就成为不可抵抗的了。

在四十年中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这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有许多人，在很长时期内，企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但是，最后都破产了。在中国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党团结了全国人民，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一共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十二年，现在正在继续做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十二年来，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则需要经历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但是，谁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停滞不前的国家，而是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国家了。

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预言，中国革命和亚洲各国革命，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个预言，开始成为现实。毫无疑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因

此，它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欢迎，也受到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仇视。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过去和现在都恶毒地诅咒我们，将来还要继续诅咒我们，这是必然的，不足为奇。但是，这对我们丝毫也不会有所损害。

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忠贞不渝的。它对于国内国外的敌人是不屈不挠的。它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将要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我们回顾四十年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光荣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之中，许多是共产党员，许多是劳动人民，许多是党外人士。他们在斗争中，流尽了自己的鲜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宁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同志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在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站在我们最前头的，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面临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的情况，正确地提出了和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的问题，使中国革命能够绕过一个一个的暗礁，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毛泽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人民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人民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则是更强大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工人阶级同广大的农民建立了强固的工农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层的人民群众，就能够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民主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

在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的长时期中，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其中，以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以王明同志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为严重。这些错误，都违反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正确主张，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到损失。我们党在斗争中所积累的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同志们的觉悟。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从此以后，我们的革命事业就顺利得多了。

一九四二年在我们党内开始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使全党干部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更多地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真正为全党绝大多数干部所理解。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成为全党统一的作风。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结。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党能够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使人民民主革命迅速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

文。这篇论文，说明了自从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后，中国所发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这篇论文，总结了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经验。同时，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又在全国的新解放区内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同时还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地扫清了道路。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制订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示下，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迅速，比较顺利。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理论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通过各种过渡形式，使我国农业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总结了我党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工商业政策的经验，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改造。

在执行上述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及时地克服了某些右的和“左”的偏向。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规定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所必要的一整套具体政策。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五亿多农民就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由此而促进了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一九五七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我们应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指示，严格划清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线，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去继续解决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两类不同的矛盾。除开对于敌人应该采取专政的方法以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该坚决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在我们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从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

我国现在还处在经济落后的地位。帝国主义还在欺负我们。我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落后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符合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的。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同时，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这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面红旗。

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使基本工业的生产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文化教育事业，在这三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在大跃进运动中，发挥了创造新生活、新历史的伟大力量。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总路线，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备起来的，为实现总路线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也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的。在三年大跃进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具体办法都有了发展。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就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经济和文化都落后的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件新的事业，不遇到困难，不发生缺点，是不可想像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困难和缺点，不仅不能吓倒我们，相反地，我们总是在发扬成绩、克服各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正确的。我们完全相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党全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克服暂时困难，继续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四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是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是经过各种考验的，因而是最巩固的团结。

我们的一切成就，应该归功于全国各民族的人民群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各个战线上正在进行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教员、教授、科学家、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劳动人民表示敬意！我们向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们表示敬意！我们向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表示敬意！我们向在各个斗争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全体干部和党员表示敬意！

工人阶级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领导力量。我国工人将继续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先锋作用。工人阶级要继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是最能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阶级。

工农联盟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只有充分调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全面地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前提。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以

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根本方针。工业和其他有关部门都必须全力支援农业，尽可能地多生产农业生产资料，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都必须认真、彻底、全部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办法，健全和巩固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发挥人民公社制度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优越性。

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地扩大了，他们在思想的自我改造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要继续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继续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更加繁荣起来。

我国人民的大团结，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政治、思想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也有了新的进步。应该帮助他们，继续进行根本改造，使他们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为着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工作做好，为着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好，我们全党党员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

我们党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入党的，百分之七十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入党的，这是党的新的血液，但是他们缺少经验，许多人还没有受到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解放以前入党的党员，经历过流血的革命斗争，现在是我们党的骨干，他们对于革命是熟悉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多的。因而，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体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大量的新党员，还必须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全党干部都应该通过这个学习运动，自觉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这就是必须像毛泽东同志一贯所说的那样，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的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要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就一定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

中才能产生的。因为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有正确的阶级势力的估量，才能产生出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种作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作风的，更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作风的。在我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我们党内产生的脱离实际的右倾错误或者“左”倾错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忽视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以为凭主观想象、凭一时的感想、或者仅仅摘引某些书本上的个别语句就能指导中国革命。大家知道，这些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各种挫折。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这种教训，在工作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防止和克服各种主观主义的作风。

我们党是善于学习的。对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经验的，经过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我们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力戒自满。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地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我们知道，满足于一知半解，自以为懂得很多而懒于学习，就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缺少责任心的表现。这种错误态度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从来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一贯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紧紧地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进步的、正义的事业。这种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国际主义的团结，对于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兄弟党，向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向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方针是：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它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我国已经同四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遍布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的、文化的、友好的联系。我国建设的成就，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赞扬。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孤立我国的阴谋，已经被粉碎了。

坚决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至今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在我国附近的许多地方继续保持着军事基地，配备着庞大的军事力量，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威胁东方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正义完全在我们

这边，全世界人民同情和支持我们。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战争威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国人民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目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愈益深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堤防，不断地遭到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国同英、法之间，争吵和倾轧正在加剧。帝国主义的处境很不妙，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美帝国主义尽做坏事，充分表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至今顽固地坚持扩军备战政策，到处侵犯别国的主权，并且积极扶植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在西方和东方正在形成两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在亚洲的老挝和南越，在非洲的刚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都出现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战争势力，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面狡猾地使用"和平"手段，一面加紧推行战争政策。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懂得，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具有危险性。但是，不论美帝国主义玩弄什么手段，都不能阻止世界人民的觉悟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把已经解放的人民的手足重新捆缚起来。他们任意横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世界和平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莫斯科会议声明说："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的这种伟大团结，是全世界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它们所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普遍裁军、停止核试验和缔结对德和约等和平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

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日益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在亚洲，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追随它的日本反动派，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在非洲，一系列国家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屈地坚持着民族解放斗争；刚果、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正在继续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而斗争。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正在发展着，古巴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以后，继续胜利地巩固和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了反对垄断资本压迫、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行列。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是全世界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代最强大、最广泛的群众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世界人民日益团结，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力量为核心、包括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胜利。

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都在不断地证明着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人民的力量，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伟大的力量。归根到底，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在有了正确领导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的面前，任何困难都一定会被克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

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中央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应该把报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领导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向党外讲清楚。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各高等学校、大中厂矿、医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十四条意见"则作为草案，在中国科学院内公布试行，各部门、各地方也要选择一批研究机构试行，并继续加以充实修订。

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我们党历来很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

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做出成果。

几年来，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成绩就肯定，错误就改正。不要怕人家否定成绩，成绩是否定不了的；但是成绩一定要实在，真有几分就说几分，浮夸了的必须核实，主动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正视，有错就改，有偏就纠，不要回避问题，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

为了领导好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逐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这套东西我们党员干部懂得还不多。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不懂就要学，只要努力去学，一定能够学会。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谦虚好学的态度，我们就处于主动，就能够真正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巩固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三年来，在科学战线上，深入进行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执行了群众路线，坚持了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使我国科学事业开始走上了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大跃进。科学研究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开辟了许多新领域。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水平也有提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增强和改善了设备条件。这些都为我国科学技术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为走向自力更生的发展，争取了时间，打下了基础。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

但是，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近我们征求了许多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并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典型调查，看来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线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二、不少**

研究工作中有浮夸风，工作做得不够严格，不够踏实，加上研究时间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研究任务变动过多，真正拿到手的重要成果还不多，研究干部的成长也受到一定影响。**三**、有些研究机构中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得太多，发扬民主不够，有些工作没有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来进行，**有瞎指挥的现象**。

研究机构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有的则是主观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有的是属于我们领导上的缺点，有的则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对于领导上的缺点，我们准备通过机关整风和深入调查研究，切实纠正。目前，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工作的基层中去，帮助研究所把工作搞好。

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这个"意见"是准备作为草案同群众见面的。其中除了规定若干业务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一些属于政策界线的问题，是需要经中央批准后，向党内干部解释清楚的。现在将这些问题抽出来，分为七个方面，报告如下：

第一，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

又红又专的口号，给自然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对于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队伍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是从红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他们**。二、红的方面的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的毛病。三、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做法都影响了对科学工作者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妨碍更多地出研究成果和科学人才。

因此，我们考虑，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一）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中最根本的两条来确定的。**做到这两条，也就是达到现在左派的标准，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红的初步要求了**。对于大量中间分子来说，还需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克服政治立场的动摇，才能逐步达到这个要求。

当然，红不是到此为止的。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党组织要采取积极诚恳的态度，帮助他们；但是，又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一律要求。

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

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要注意吸收党员，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成为共产党员。有些同志往往用党员的标准、甚至比对党员还高的要求来衡量党外人士，用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家，用青年人的尺度来衡量老年人；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都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要求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修养和组织修养；甚至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主次不分，对于生活作风、脾气性格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求全责备。这样反而使不少人对自己的改造丧失信心，谨小慎微，顾虑多端，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一些人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两条政治要求，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如果我们不善于使用大量的在业务上有专长、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科学工作者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是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的。就是一些右派分子，如果确有一些科学本领，愿意工作，在教育改造他们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地使用他们。

（三）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目前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经过了十年八年的考验，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在研究工作中扎下根来，开花结果，就应当认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定表现，是红的一定表现。即便有少数人，例如某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有钻研科学的积极性，而缺乏社会主义觉悟，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应当帮助和鼓励他们，而不可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是需要很多知名科学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四）**关于批判"白专"的问题。**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政治上的右派，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右派，就不应当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我们提倡的是又红又专，我们要纠正的是只专不红和只红不专，这已经是很明确很全面的提法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的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大量的中间分子，既不能说已经红了，也不能说是白的，只有称之为中间分子才是合适的。对过去批判错了的人，应当区别情况，分清是非，采取适当方式，解释清楚，去掉帽子，解除他们思想上的疙瘩。

（五）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人们的政治态度是异常显明的。根据各人在这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政治排队，划分左、中（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政治排队是人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立场的如实反映，是我们党在阶级关系急剧变动时所必须采取的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地频繁地进行政治排队，同时又不以重大的政治动向为根据，而以某些人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一时的表现为根据，甚至以某些人随意说出的几句不恰当的话为根据，任意地轻率地进行这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其效果必定是不好的。它不仅不能如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向，确切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状况，便于我们党做好工作，帮助他们进步，而且还将引起许多人的误解和疑虑。**今后，各个研究机构在日常工作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当工作中有必要判断某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时，应当根据他几年来的变化和今天的实际表现，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作什么性质的结论。对于那些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不好的人，也要根据这几年来的变化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关心、帮助和欢迎他们那怕是微小的进步。

（六）对于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一代，和对于从旧社会来的老一辈人应有所不同，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一方面，在业务上要严格的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虚心地向老专家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力求成长得更快一些。另一方面，又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一项根本政策。这几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执行这个政策，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是，对于这个政策有利于更快地发展科学事业和更好地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重大作用，不少同志缺乏足够的认识，执行得不够主动、不够认真。而且，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

（一）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为此，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

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

（二）**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

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互相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

（三）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扣帽子的办法来解决。**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

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五）**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作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

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防止瞎指挥，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六）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国家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几年来，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始树立了一种新的风气，不但使研究工作和国家建设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而且对于各门学科的发展，对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都起了良好作用。根据几年来的经验，一方面要继续防止为科学而科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对理论联系实际作狭隘的、近视的了解。

（一）科学研究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不能有任何疑问的。**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凡是承担这些任务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要误大事的。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力争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重大关键问题过科学技术关。当前最要紧的是把研究任务稳定下来，强调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得出结果。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直接为近期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该多投入力量；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两者不可偏废。即使有一些探索性课题，目前还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投的力量可以少一些，但不能丢开不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每一个学科和学科的每一个分支，都要有人去做工作，逐步填补空白。

现代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没有理论研究，不把**

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忽视理论研究是要吃大亏的。开展理论研究，不但对于明天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就很需要。现在，许多尖端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理论研究已显得落后于实际需要。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安排，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狭隘地片面强调实用，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做出实际的安排。**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应该担负主要的责任。

（三）关于"以任务带学科"。几年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这个口号，意思是说：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运用这个方法组织科学研究，使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对于科学工作的跃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只提这个口号也有片面性的缺点。主要是，许多学科都有一些理论研究和基本研究不容易用"任务"带动起来，需要从"学科"的角度进行安排，只提"以任务带学科"，这部份工作容易被忽视或否定。事实上，某些科学工作者，从学科出发搞些理论研究，就曾经被不正确地批评为脱离实际。同时，这个口号本身，概念也不大清楚，如"任务"两字，即可以作多种解释。虽然我们曾经几次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具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的方法，在今后，它仍然是应当采取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提出进行。**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即曾专门做了基础学科的规划。以后历年的年度计划也都注意列入理论研究的课题。但是，这个口号已经在科学界广泛地传播开来，而这些说明并没有同样为人们所知晓和重视。因此，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由此而来的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理解，和忽视理论研究的危险。我们认为，今后应该使用"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准确的说法。至于"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一种方法，应该按照上述解释，加以全面的说明，以避免思想上的误解，和工作安排中的片面性。

（四）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应该有合理的分工配合。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这种大体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应当有所侧重，发挥特色，而又密切协作，相互配合。

研究工作和推广工作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研究机构要关心研究成果的推广，但是不能要求研究机构承担全部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工作。工农业部门，除研究机构以外，还应有从事推广试验的技术系统。有些部门，把原有的一些技术推广试验机构取消了，或一律改为研究机构，使这类工作无人负责，应当适当调整、恢复。

这些合理的分工配合搞好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力量的重复浪费，明确各个研究机构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全面安排、重点突出的要求。

（五）有少数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和新的学术见解，提出一些研究课题，有时和国家计划结合不上。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是，如何处理，很值得研究。进行这些工作一般只要很少的人力物力，不会影响整个计划的安排。让少数人在完成规定的计划之外，搞一点自由课题，不但能够进一步发挥这些学者的专长和积极性，而且对于科学探索、繁荣学术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利无害的。因此，拟明确规定：**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

小自由，对于这些国家计划以外的自由选题，应量力予以支持，或列入补充计划。

第四，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

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必须建立一支数量很大的，水平较高的，而且拥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科学技术队伍。几年来，在科学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批判迷信权威专家，倡导群众路线，对于培养这样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还要正确贯彻这些精神。但是过去有些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片面的理解，往往**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人才使用上有兵将不分，高低不分的现象。因为害怕个人突出，就放松了研究工作上的个人负责制度。发表论文报告常常不用个人名义，只用机构、集体的名义。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上，不承认个人之间才能、条件和努力程度的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进步快慢、成绩大小的差别。不了解在集体的进步之中有个人“冒尖”，更有利于带动集体的普遍提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当看到，**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选拔和培养杰出科学人才，需要：

（一）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开出名单，由相当的领导机关亲自掌握，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帮助他们继续作出工作成绩。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不要随便改行。要给他们配备好的助手和学生，把他们的专长继承下来。有些科学家过去在国外做出不少成绩，回国几年却没有多少工作成果，这种情况，虽有各种原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各研究机构都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和中年科学工作者，也要开出名单，由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亲自掌握，实行重点培养。在政治上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业务上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例如工作方向力求稳定，研究工作和自学的时间有切实保证，给予实习、考察、进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等等。

上述两项开名单的工作，每年要进行补充修订，以便不断发现和选拔新的人才。

（三）现在研究所里已经有一批党员科学工作者，有些同志在业务上已有相当的水平，是科学技术队伍的党的骨干。这些同志行政工作负担一般都很重，没有时间做研究工作，这样日子久了，专门业务就会逐渐荒疏。应该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下决心减免兼职，减少其他活动，使他们能安定下来搞研究工作。

（四）认真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机构。现在大学毕业生各方面需要量很大，分配上矛盾很多，但是从中分出一小部分优秀学生，加强一些重点研究机构的若干理论研究工作，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能的。这件事今年就要下决心办。拟在中国科学院和其它各个方面的研究机构中，确定一批重点研究所、重点理论学科。每年从重点大学挑选一定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分配给这些单位。请教育部和各有关学校的党委负责保证质量。

为了加速培养科学人才，必须健全现有的研究生制度。

（五）承认并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报告，一定要由参与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署名负责。鼓励科学工作者写文章，著书立说。集体写要鼓励，个人写也要鼓励。在登记创造发明、研究成果时，也要注意注明有关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报刊在公开报导

科学技术成果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报导科学工作者的姓名和他们的作用。

（六）五年来，由于工资调整面的限制，研究技术人员晋级面很小。许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七、八年，政治上业务上有很大进步，至今仍是一个级别很低的研究实习员，没有提升过。这些情况不利于科学技术队伍的生长。拟请中央批准，在今年内解决一批科学技术人员的升级问题，并在今后实行定期的考核晋级制度。

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级别的提升，和行政、党务工作干部的提升有所不同，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

第五，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

科学技术机密，必须确保。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发挥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如何促进学术交流，处理不妥善，会产生不利影响。科学研究中，为尖端技术和国民经济重大问题服务的课题日益增多，参与这些工作的人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过去曾经发生不少麻痹大意、泄露机密、用人不当的现象，这当然是错误的。今后仍然要继续纠正。但最近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保密范围过宽，用人条件要求过苛的情况。结果是，**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这就使得许多本来可用的力量闲置不用，不少重大课题只能由一两个水平较低的青年去攻坚，很久都过不了关。另外，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相互封锁、耳目闭塞的现象。

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到自力更生，就必须依靠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力量，尽可能多地调动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来参与工作。因此：

（一）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例如：尖端技术要分别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全面和局部，自己独创的和国外公开的，技术工艺性的和理论性的，运用兄弟国家机密资料的工作和自行设计的工作等等，以集中力量确保真正要保的机密。按密级的不同，分别吸收符合条件的人来参加工作。

为了正确划分密级，需要吸收有关专业人员参加商讨，并由有关领导机关决定和批准。

（二）要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旧社会出身的科学工作者，家庭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但是有些人又确有专长。各个研究机构，必须会同干部、保卫部门，根据“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的精神，对他们的情况作认真而有分寸的审查区别，以便安排适合的工作，使之各得其所。有些人，被怀疑有问题，但缺乏证据，应当积极进行调查，早予结案。有些人，经查明确不宜于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就应当调去做其他工作。对个别对象，各有关单位看法不一致时，应报上级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进行审查处理。

对于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的审查和使用问题，必须从速解决。应该由适当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把他们的问题抓紧弄清楚，认真作出判断，凡是能用的，应该大胆地加以使用。

（三）要妥善地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过分地扩大保密范围，提高保密等级的作法，往往封锁自己，妨碍科学进步，而且也不利于确保真正的机密。有些单位，借保密之名，行垄断之实，则应予以批评纠正。

上述三个问题的妥善解决，牵涉到一些具体的规定，准备由有关部门共同商讨，提出办

法，以便各研究机构遵循办理。

第六，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问题

一九五六年，中央即作出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去年年底，国务院又曾下达通知，重申这个规定。这个问题，确实关系重大，但又牵扯很多，始终没有切实解决。去年，在很多研究机构中，**只能有六分之三的时间做研究工作，有些人连六分之三的时间也保证不了。**工厂搞运动，不能停工停产，而研究所搞各种运动，却常常把研究工作停下来；研究工作完成与否，好象是无足轻重，不需要加以保证似的。这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不下最大决心彻底扭转，我们发展科学的其他一切措施都将成为空谈。

为此，一方面，研究机构的领导本身一定要首先关心保证研究任务的完成，克服工作方法上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缺点。要适应研究机构的特点来进行工作，不要简单地套用工厂、农村、行政机关或军队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在向研究机构布置各项活动时，照顾到研究机构的特点。**要允许研究机构对各方面布置的活动有机动安排的权力。**初步考虑，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经中央同意，由有关部门和地方配合执行。

（一）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研究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运动，除中央特别指示的以外，应该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不得中断研究工作。做法上，力求时间短而得实效。

（二）研究技术人员主要是结合专业实习考察等进行劳动，**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

（三）民兵训练在研究技术人员中间不必举行。

（四）地区性的社会公益劳动，群众性的欢迎外宾等活动，不得占用研究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文艺、体育活动，应完全自愿参加，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五）**研究技术人员的业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保证有必要的自修和休息时间。

（六）改善科学器材供应，力求避免停工待料现象，也不要让许多研究技术人员花很多时间去采购器材。

第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一九五七年以来，我们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思想。现在，在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已经进一步加强了。研究机构的党组织不仅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把业务工作的领导也抓起来了，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了。这是党在科学工作领域中所取得的最根本的胜利。

为了巩固既得的胜利，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力求把科学工作领导得更好。应当看到，我们领导科学工作虽然取得了若干经验，但还是很不够的。科学工作的规律，摸得还是很不深的。工作中的盲目性还是很不少的。我们还要承认是外行。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向专家学习，认真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而不要安于外行。

党组织在研究机构做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

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为了做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正确地执行政策，改进工作方法，进行一系列的艰巨的工作。

（一）**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在所内起领导核心作用。**它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抓大事情，善于发挥科学工作者和行政业务组织的作用，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等毛病。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的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

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拟先按现有的两种分别进行试验，然后总结经验，加以选定。一种是研究所内建立党组或分党组，同时另设机关党委性质的党委；一种是研究所内只设立党委，全面领导所的工作，不另设立党组。初步考虑，前一种做法，把对研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的领导，同党的日常工作适当分开，各有专责，似乎更有利些。

（二）**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或研究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地类似机关支部，**它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党员个人不允许超越自己的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党员应该首先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每一个党员对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人，不管是否党员，都应尊重他们的职权和领导。党员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指示，遵守党组织的决议，但是**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党员科学工作者同党外科学工作者一样，应当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平等地参加讨论。

（四）**研究机构内，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所内行政业务中的各项重大问题，一般都应通过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讨论决定，再交由有关行政业务机构去办理。这些问题的讨论研究，按照问题性质的不同，有时可以先党内后党外，有时可以先党外后党内，有时可以党内外一起讨论。要注意尊重各级行政领导人的职权，使之有职有权有责。行政业务工作，应当在所长领导下，由所室行政业务机构和行政负责人去处理。在正付所长之间，还可将学术领导和行政业务领导作适当的分工，使担任学术领导的科学家得以专心领导学术工作。

(五)**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在研究工作中，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民主，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单纯依靠少数专家，忽视集中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但是，有些同志把群众路线误解为研究工作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采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从而取消业务领导组织和学术领导人的责任和职权，这也是不对的。**目前必须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研究室、组在工作中发生重大争论时，应该提请研究所一级的领导讨论决定。

（六）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同志认为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因而有抵触情绪，不安心工作，或者看不起这种工作，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行政工作干部，使他们认识到：**为科学工作者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

义服务好。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并没有什么高下轻重之分。并且首先要求担负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安心做好服务工作。在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工作干部之间，还应当提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

（七）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必须不断加强。党组织在这方面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要求得更高了。

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讲究工作方法，更好地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第一，研究机构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大；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又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的知识和专长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第三，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我们面前突出的是团结和改造大量中间分子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在科学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思想斗争必须进行。但是，一定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政治反动和思想落后，区别大节和小节，区别主流和支流。**要学会细心地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 而不能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中间分子，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按照中央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的："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

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同时，要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科学工作者的具体思想状况，抓活的思想，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力戒空洞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作法。

上面这些看法，已和一些研究所的党员所长商量过。十四条意见的草稿，已和一些党内外科学工作者见过面，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并在京沪两地几个研究所中开始进行试点。党内外的科学工作者反映相当强烈，普遍欢迎，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具有诚意的。他们表示，党和国家对科学工作问题，考虑得这么周到，今后就要看科学工作者能不能拿出成果来了。有一些科学工作者对十四条意见能否真正付诸实现，仍是将信将疑，担心过几个月又给吹掉了。看来，只要我们正确地坚决地实行这些意见，就能够用事实打消疑虑，就能够进一步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研究所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也认为这两个文件是适合当前情况的，能够帮助他们明确若干重要的政策界线，有助于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助于改进工作，是积极的措施。但是，一部分同志还有些担心，怕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思想会重新抬头，不好领导。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欢迎这些措施，我们应该有所警惕。不过，现在形势同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党的领导权已经树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市场大为缩小，只要我们领导骨干头脑清醒，加强领导，坚持正确方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相反地，我们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采取各项措施来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能减少右翼分子可钻的空子，更好地争取和团结中间派，鼓舞和提高左派，从而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利于把工作搞得更好，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这是由于我们领导机关过去布置工作时确有许多简单、片面的毛病，政策交代不清楚，要求偏高偏急，对下面具体帮助不够，基层工作中的缺点很多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些同志也缺乏调查研究，不大明了实情。由于科学工作与经济工作不同，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不易很快暴露出来，加以目前许多科学工作者又不

大讲真心话，有些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认识不足的。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切实改进工作，提高水平，**凡是应该由上面担当起来的事情，领导机关就要主动地担当起来。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着重辨明是非，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不去追究责任**。对有关干部，除个别严重违法乱纪者以外，一般不作组织处理。既要保护基层工作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帮助干部深入到工作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实情，肯定成绩，纠正缺点，端正认识，改进方法。要反复地耐心地帮助干部学习政策，真正从思想上搞通，取得一致的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领导人要亲自到基层去试点，亲自贯彻这些措施，以取得经验，领导全局。

在实行十四条意见当中，还要继续鼓足干劲，注意防止畏难消极情绪。实行这些意见，是为了改进和加强领导，而不是放弃和削弱领导；是要加紧工作，保证重大的科学技术任务过关，而不是放松工作，遇难而退。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现在正处于攻坚的阶段，要攻破许多硬堡垒才能取得阵地。除此以外，目前还存在某些器材条件和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研究所的领导应该积极地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敢地承担各项艰难的研究任务，埋头苦干，自力更生，把工作做到家，成果拿到手**。我们要和广大科学工作者讲清楚，要攀登科学高峰，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的。这正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管来自那一方面的困难，都不能动摇我们的決心，都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审批。

聂　荣　臻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央、主席、华东局：

今年三月，我省开始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到四月下旬，就有百分之三十九点二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个办法。夏收以后，又有不少生产队自动采用这个办法。现在，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已经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五。看来，这个办法是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做法

概括起来说，这个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即小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具体做法是：

甲、包产

生产队的包产指标是根据逐丘定产确定的。各生产队由干部、老农和积极分子组成评产小组，按照土质、水利条件和不同的作物品种，逐丘评定产量，再分别定出夏季和秋季的产量任务，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任务，提交社员大会讨论通过。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包产指标更加落实。

逐丘定产以后，由生产队除去非包产部分（如生产队开垦荒山、荒地、利用空隙地种植的作物等），计算出包产总数，上报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组织评产委员会，对各个生产队的包产指标、作物品种加以审查，对指标偏高偏低的，作物品种安排得不合理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尽力做到队与队之间互不吃亏。然后，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以此作为今后的包产基数。

各生产队的包产任务，由生产队向大队签订合同，负责完成。包产以内的收入，按照大队统一规定的标准，扣留生产费用以后，其余全部上交大队统一分配。

生产队内逐丘定产的产量，则由担负大农活的作业组和承包小农活的社员共同保证完成。这样，可以把集体的责任心和个人的责任心结合起来，做到人人关心产量。

乙、包工

生产队的包工指标是根据逐丘定工确定的。生产队的评产小组根据劳动定额，按照田地的不同条件和不同作物所需要的大农活和小农活，逐丘把工定实。然后计算出属于向大队包产范围的用工数，再加上耕畜饲养工、农具保管工和其它不可少的包工，得出全生产队的包工总数，上报大队评议决定，并以此作为今后的包工基数。

生产队根据逐丘定工的用工数，把大农活包工到组，把小农活(田间管理活)包工到户，建立严格的包工责任制。

所谓大农活，是指那些需要集体做的和技术性强的农活。这种大农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也就是事前可以大体计算出用工数目的，如犁耙、育秧、撒种、管水、收割、大型水车车水和几盘水车车水、打场、挖塘泥、当年必需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一种是临时的，也就是事前无法计算出用工数目的，如抗旱、排涝、大面积的灭虫等。所谓小型农活是指适宜于社员家庭做的、技术性不强的农活，如间苗、补棵、锄草、积肥、（指个人做的砍青、拾粪等）、追肥、耘田、做田埂、挖田拐、放水烤田、清沟沥水、一盘小水车车水以及防治一般病虫害等。

大农活包工到组的做法是：由生产队根据大农活需要，组成固定的和临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季节和常年包工。在作业小组内，根据每个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有些技术性强、又适合个人做的农活，如养牛、使牛、管水、育秧等，也可单独包给确有技术专长的人负责。如：

耕畜饲养，可以常年固定包给有饲养经验的社员负责。饲养员对生产队实行四包——包膘、包繁殖、包积肥、包耕畜不糟踏庄稼；生产队对饲养员实行两包——包饲草、饲料，包工分。

耕田，可以常年固定包给有使牛经验的社员负责，划定包耕田亩，实行包耕制。

育秧，可以固定包给有经验的社员，从头至尾负责搞好整田，泡种、撒种和秧田管理，保证一定的秧苗任务（主要是稻子秧、山芋秧）。

收打，根据任务大小，组织收打小组，划定地片，包干负责，实行“三统两分”，即统一割、统一运、以作业组或生产队为单位统一设场；分户脱粒，分户过秤。这样做，既利于及

时收打，又能防止瞒产。

抗旱、排涝、大面积的灭虫。根据灾情大小，临时组织劳动力，按照需要进行包工。

小农活包工到户的做法是：根据社员家庭能够承担田间管理农活的能力（承担大农活的社员应少包或不包，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应根据各人担负工作的繁重程度和承担大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承包数），在指定的耕地上，承包一定田亩的田间管理工，这就叫做田间管理责任田。由承包的社员家庭负责做好全部田间管理工作。社员承包的责任田应力求连片，以便管理。群众说："三分种，七分管"。这说明田间管理对增产的作用，也说明田间管理责任制是非常必要的。

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具体做法是：实行常年承包。就是说，社员承包的田间管理责任田，除了在秋收以后，生产队的劳动力有增有减时，需要作必要的调整外，一般不加变动。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使社员多施肥料，多加工，有爱护这块土地、把土地越种越肥的好处；又能使社员充分利用季节空隙，复种瓜菜和粮食；还能加强社员对大农活的监督，因为大农活做的好坏、做得是否及时，对责任田的产量关系很大。缺点是对大农活容易发生争先恐后的现象。

另外有一种分季承包的做法。这就是在播种以后，根据青苗生长情况评定产量，然后把田间管理工包给社员。这一季承包这一块田，下一季承包另一块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对大农活争先恐后的现象。缺点是没有把播种前与播种后的小农活相结合，社员缺乏长期打算，对田地不愿多施肥、多加工。我们认为，采取常年承包的做法好处多，因为对大农活争先恐后的缺点是可用另外办法加以克服的；分季承包的做法，对社员的责任心还不能提到应有的高度，当然也可以试行，因为比繁琐的评工记分办法要好得多。

丙、奖赔

实行全奖全赔。超产则按照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全部奖给社员，既不提成上交大队，也不提成作为生产队的积累（生产队的积累，可从非包产收入中解决，按照六十条的规定，这一部分收入相当大）。超产全奖的具体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实际超产数来计算，譬如一亩地定产三百斤，收获后实产三百四十斤，即超产四十斤，如果大农活占全部用工的百分之四十，则得奖十六斤，小农活占全部用工的百分之六十，则得奖二十四斤。一种是按事先评定的超产数来计算。譬如一亩地定产三百斤，经社员民主评定，预计能够超产四十斤，如果大农活占全部用工的百分之四十，则应得奖十六斤。定产数三百斤加上奖给大农活的超产数十六斤，共计三百一十六斤，就是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社员应当负责完成的产量。收获后，包产部分由生产队上交大队统一分配，奖给大农活的部分由生产队按照大农活的实做工分和社员的劳动成效奖给做大农活的社员，其余不论超产多少，全归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社员所得，从目前试行情况看，后一种办法更为广大社员所拥护，因为这样既能使做大农活的社员得到奖励，又能鼓励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社员加强田间管理，争取多超产，还能减少瞒产现象，同时也便于计算奖赔。

减产赔偿，则应找出减产的原因，分别不同情况，由社员民主讨论处理。如确是因灾减产，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包产指标；如全因大农活做的不好而减产，则由负责大农活的社员赔偿；如全因田间管理搞得不好而减产，则由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社员负责赔偿；如两者都有关系，则共同负责赔偿。一季赔不起的，可以分季赔；有些困难户实在赔不起的，则应酌情减免，总之，以不因赔产而减少社员所必需的口粮为原则。

对于上述做法，我们也注意到在执行中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困难户问题和争先恐后问题，因此当时就提出了一些防止和克服的办法。

在照顾困难户方面，主要有这样几条办法：（1）在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时，包给近田和好做的田，包产指标适当降低一点，使他们也能有产可超；（2）不能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社员，就优先安排他们搞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和零活，如养猪、养羊、养鸭、看场、拾粪等等，使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的收入；（3）收入过少，不能维持生活的，经民主评定，从公益金中给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予救济；（4）由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困难户实行分户帮助。我们考虑这样做的结果，困难户得到的好处更多，因为大农活是统一做的，困难户只搞力所能及的小农活，他们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比之过去并没有增加困难，却得到了上述许多照顾，所以他们的处境比之以往不会更坏而要更好一些。

在防止争先恐后方面，主要有这样几条办法：（1）坚决贯彻大农活包工到组，由作业组统一安排和派工；（2）生产队事先计算出全年大农活的用工数，然后交由能做大农活的社员按照劳动底分分摊出勤任务，保证完成；（3）生产队和作业组，对于大农活的先后次序，应按照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生产需要作出合理的安排。比如用水，应当先灌受旱田，后灌一般田；对于同样旱情的田亩，一般则应先近田、后远田，先高田、后低田。又如收割水稻，应当先黄先割、后黄后割，先割倒稻、后割站稻，先割有水的田、后割没水的田。再如耕田，应当先割先犁、后割后犁；根据墒情，保证及时播种。各生产队对大农活的耕作次序都应由社员民主讨论，制定出犁耙、用水、抢种、抢收等具体办法，作为公约，人人遵守。这样，就可以防止和克服争先恐后的矛盾。

二、几点分析

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是一个刚刚试行的办法，我们深怕出岔子，所以经常从正反两面进行研究，看它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

1．这个办法是不是“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据我们看，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当然，它和过去包工包产的做法是不相同的，但是这种不同没有改变其实质。

我们曾设想，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把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按照产量计算奖赔，这就可能成为包产到户，成为单干。但反过来分析，这种设想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

就以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来说，它只是为了使包产更加落实，使包产任务的完成更有保证。过去包产任务是按照划框定产的办法来推算的，指标没有落实到田，社员也不了解对包产应负什么责任，他们说：“包产一祻柴，队长一人挑”。现在包产任务是按照逐丘定产的办法来计算的，不但包产比较准确，而且社员都能知道自己对包产所应负的责任，他们说：“现在是人人有责，千斤担子众人挑”。道理很明显，一个队的总包产是要由逐丘定产落实才能落实的，总包产任务的完成，是要大家负责才能做到的，这与工业生产一样，一个工厂的生产任务定下以后，必须划分一个工段，一个车间，一部机器的生产任务，必须依靠每个工人的责任心，否则总的生产任务是会落空的。因此，我们认为决不可以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度看成是包产到户，看成是单干。

再就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来说，这是因为这类农活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去做，所以把它一次总包到户，从而划定田间管理责任田。这样，不仅省去了对这些小农活的经常派工和评工记分的麻烦，减少窝工费工现象，而且能使每块田的田间管理都有专人负责。这和纺织工厂按照工人的技术水平固定看多少纱锭，看多少织布机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从此，也就可以理解这种办法在集体所有制中也是可行的。不仅如此，它还有以下两点好处：第一，能使承包田间管理活的社员和做大农活的社员更好地分工合作，互相监督，保证农活质量；第二，能使适宜于做田间管理活的家庭辅助劳力参加生产，改变了以前只有整半劳力才能参加生产的缺陷。

再就按照产量计算奖赔来说，这只是为了使奖赔更加合理，并没有改变包产到队的性质。以往的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是按社员所做的农活多少（工分数）来计算的。这种奖赔方法，只注意农活的数量，不注意农活的质量和劳动的效果，结果助长了社员争工分，不讲质量。现在把大农活包给作业组，把小农活总包到户，再根据产量多少按大小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把产量多少作为计算奖赔的标准，这就改变了上面所说的社员只争工分数量不注意农活质量的毛病。这与煤矿采煤，超产奖励，减产即减低其当日工资的做法也是相似的。

总之，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它并没有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大农活是统一做的，而且小农活也是为了完成总的包产任务而进行劳作的，所以仍然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

２．这个办法是不是会造成两极分化？据我们看，这个办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

我们也曾经设想过：实行这个办法，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工分做得多，超产也多，生活会越过越好；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工分做得少，超产也少，生活会越过越差，结果可能形成两极分化。但反过来分析，这种顾虑也是可以解除的。因为：

第一、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也没有改变产品的统一分配，既然以前包工包产没有发生两极分化，那末，就可理解现在也不会发生两极分化。

第二、社员与社员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固然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工分会做得多些，超产也可能多一些，但是不可能无限度的增加。因为他们所做的工分是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包给的，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承包的田间管理责任田，只要定产恰当，不过于偏低，超产也是有限度的。至于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他们的收入虽然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要少一些，但是不会少于他们以往的收入，因为田间管理工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承包的，而且又有许多关照，如帮助搞副业(养猪、养鸡、养鹅、养鸭等)，包近田、好做的田；同时，产量比一般的田间管理责任田定得低一些，即使超产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可能会少一些，但不会少得太多。

第三，在上述关照以后还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困难户，则从公益金中予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以救济，照着这样办法做下去，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因此，可以肯定说，这个办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当然在试行中，也有一些地方对困难户照顾不够，但并不是这个办法本身有毛病，而是某些干部在执行中的偏差。

３．这个办法是不是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据我们看，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

我们考虑，社员的私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收益的私心，一是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关于对收益的私心问题，社员回答得很清楚，他们说："这种私心过去有，现在也还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私心是暗的，如许多人混工、争工分，不关心农活质量，不关心庄稼生长的好坏，这种私心对生产危害最大。现在的私心是明的，大家想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对生产有很大好处。"对于这种明的私心，只要加以正确引导，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就能使大家把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据我们看，也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触动起来。第一，因为社员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的数量，是按照每户的劳动能力来确定的，不是按人分摊的，同时，田间管理责任田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每年都要根据劳力增减情况进行调整，这样就不会使社员把责任田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田。第二，包责任田的社员只管小农活不管大农活，大农活仍是统一做的。第三，社员对田间管理责任田只有操作权，没有所有权，正如工厂的机器、部队的武器固定给一定专人管理使用一样，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爱护心理，不会增加他们的私有观念。

当然在试行中，也有一些社员要求多包田包好田，干活争先恐后，产量不如数上交，等等，但这是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的结果，并不是由于这个办法助长了农民的私心。问题很明显，试行这个办法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的，发生上述毛病的只是少数，而且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

三、好处

从试行的情况来看，这个办法的主要好处是：责任明确，人人争取超产，避免了单纯争工分，不讲质量，不关心产量的现象，社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出勤率大大提高。原来不参加生产的老年人和十几岁的小孩，现在也下田干活了。社员说：过去干活，队长吹炸了哨子，喊破了喉咙，还是七齐八不齐。尖头滑怪的，推拖躲磨，忠诚老实的出力不讨好。现在干活，不用队长催，好比"水湿麻绳自紧自"，全家男女老少一齐上。

2．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田埂地边都种上了庄稼，缺苗断垅的现象大大减少。社员说："过去人不亲地，地不出粮，肥田变成瘦田，小路踩成了大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人人争取多种多收，超产得奖，所以大家都爱惜土地，一丝一毫也舍不得丢"。

3．做活认真，农活质量显著提高。由于大、小农活有了明确的分工，并且共同对产量负责，这就发挥了彼此之间互相监督的作用，使农活质量有显著提高。社员说：过去犁田不到边堰，今年是堰到边齐。过去栽秧外密里稀，飘秧缺棵很多；今年栽秧满满实实，缺棵都已补上。过去耘田是猫盖屎，草不净，泥不烂；今年耘田，草净泥烂，地也拉得平。

4．积极积肥，基本上解决了大田和自留地用肥的矛盾。自从实行这一办法后，家家户户盖厕所、添粪缸、粪挖窖，积肥量大大增加，并且改变了过去那种"肥死菜园、瘦死大田"的不正常现象。社员说："现在超产归自己，减产要赔偿，哪个还不出劲积肥，多施肥

争取多得超产粮！”

5．加强了对庄稼的看管，减少了鸡猪糟踏和偷青吃青现象。过去鸡猪糟踏庄稼、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但社员不管不问，他们说："庄稼是大家的，摊到自己没多少，何必多管闲事得罪人。"自从承包田间管理责任田以后，社员对庄稼的看管格外用心，不但防止了鸡猪糟踏，而且偷青吃青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6．收打精细，减少了丢失、抛撒现象。过去包产一捆柴，社员对劳动成果不够关心，丢失、抛撒很严重，现在社员承包了责任田，一粒粮食都舍不得丢。今年收打小麦，割了又捡，打了又捶，真正做到地不丢穗，场内不留粒。社员们反映："过去从来没象今年这样收打的干净。过去社员为了多挣工分，只图快、不讲质量，虽有干部检查验收，但还免不了有抛撒丢失。今年不用干部烦神，收打的都很干净。"

7．生产队干部摆脱了琐碎事务，积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过去生产队干部成天忙于派活、催工、评工记分等琐碎事务，很少时间参加生产。现在社员干活不用催，田间管理不用评工记分，大农活也是在作业组内自评自记，用不着队里干部劳神，因此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有一位生产队长说：过去当干部有四多：杂事多、跑路多、误工多、操空心多。现在干部有三多：参加生产多、考虑全面问题的时间多、心情舒畅得多。

此外，这个办法还减少了包费用的手续和项目，节省了生产费用的开支。譬如：肥料（除化学肥料外）只在包工中增加肥料工，由社员自积自用，不需再包费用，不需现金收购，也不需另给奖励；种子由生产队根据大队统一规定的留种标准自选自管自用，耕畜饲草包给饲养员，农具修理费包给农具保管员，实行包干使用，节约归己。这样既加强了生产费用的责任制，又利于严格控制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四、出现的问题

在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过程中，开始由于经验不够，做法不很具体，加之上面交代不清，下面理解不够，特别是有些地方对"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

1．在部分基层干部和社员中一度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些社员把划分责任田误认为是"分田"。有些人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因而有的社员写信给在外的亲属，要他们回来分田，有的社员要求把原来属于自己的田，划给自己耕种。这些错误思想，主要是因为宣传教育不够而产生的，经过反复讲解和发动群众进行讨论以后，已经基本上得到澄清。

2．在农忙季节，部分生产队发生了争先恐后现象。凡是坚决执行了大农活包到作业组统一做的地方，一般都没有争先恐后的问题。有些地方虽然实行了大农活统一做，但采取了小农活和大农活换工的做法，结果产生了对大农活的争先恐后现象。劳力强技术高的社员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劳力弱技术差的社员，为了抢季节，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求人帮助，有的靠人情，有的请吃饭。求不上人的，就贻误了农时。为了克服争先恐后的矛盾，必须坚决把大农活包工到组，必须按照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生产需要做好农活安排，特别是农忙时期的农活安排。

3．对困难户照顾不够。除了大农活没有包工到组的原因以外，还有些生产队不论男女老少，体力强弱，统统按劳动底分划分责任田，结果有些困难户承包的责任田过多，做不了；有

些生产队在划分责任田时，错误地采取了抽签的办法，结果有些远田和难做的田划给了困难户，影响了生产。对这些问题，各地在检查发现后，一般都作了纠正。

4．部分社员有瞒产行为。有的只交包产部分，不交超产部分，做大农活的社员分不到超产粮。有的自收自打，以多报少，不仅不交超产部分，而且包产部分也没有如数交足（据几个生产队的调查，瞒产部分约占包产部分百分之十左右）。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奖赔政策宣传贯彻不够，社员怕吃不到超产粮。二是没有统一收打，由各户自收自打，给瞒产开了方便之门。凡是奖赔政策宣传贯彻得好，又实行了统一收打的地方，就很少有瞒产现象。

5．有一部分干部放松了领导，错误地认为：划分了责任田，用不着干部操心了，因而只顾埋头搞自己的责任田，对全队的生产很少过问。还有些干部自己包的田都比较好，而且产量定得低，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必须在整风中加以解决。

五、今后意见

1．已经试行的地方，继续坚持下去。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要求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同群众商量，及时地加以解决。

2．没有试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秋后是否采取这一办法，由社员讨论决定。在推行时，要求各地注意：第一，只要符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精神，在具体做法上，可以灵活多样，不要强求一律。如田间管理常年包工到户或分季包工到户，奖赔用工分计算或用产量计算，大农活和小农活怎样划分，都要根据当地情况通过群众讨论来确定。第二，必须事先开办短期训练班，抽调公社三级和工作组干部认真研究有关这一办法的文件，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保证这一办法正确执行，特别要防止以下几种偏向：（1）干部包好田近田，困难户包孬田远田；（2）社员要求管理原来自己的田；（3）用抽签的办法划定责任田；（4）干部不负责任，放松五统一。第三 必须在社员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组织他们开展讨论，以澄清可能产生的误解，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3．对于不愿改变原来的包工包产办法的生产队，一方面不勉强他们改变办法，一方面引导他们在原来办法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改进，解决评工记分中的一些问题，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常年的包工，实行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以便更好地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减少天天派工和每晚评工记分的麻烦。

安徽省委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对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学生讲话的一部分

陈　　毅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今年暑期毕业的同学表示祝贺。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很关心你们大学毕业生的。大学学习生活，是你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而要走向新的阶段——参加工作。踏上工作岗位，这是新的学习的开始，新的斗争的开始。过去你们是在学校里学习，现在即将走到工作中、社会中去学习。你们在党和国家培养教育之下，从小学读到了大学毕业，受了十多年的教育，特别是最后四年或五年的高等教育，这是很幸福的。你们应该珍视这一点。

你们在高等学校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经历了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形势中的重大政治变化，在这些斗争中获得了不少知识，在政治思想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你们经过了四年或五年的专业学习，学到了不少专门知识，至少是有了一些基础知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不管是学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艺术的、工业的、农业的或其他专业的，都是学了一种专门知识。我们的党和国家都需要你们。

你们走上工作岗位，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增加新鲜血液。希望你们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埋头苦干，认真负责。你们要服从领导，善于同大家合作，虚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同时，又要发挥青年人的斗争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提出合理的建议，反对不合理的东西。敢于进行民主讨论，以改进工作。不要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也不要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在这里，就你们提出来的几个具体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红与专问题

红与专的关系，就是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个关系，对我们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对青年人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材。一种是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人，他们是以政治工作为其专业的；还有从事其他方面如工业、农业、文学、地质、煤炭等专业人材。党校、团校和其他政治学校是培养政治工作人材的，一般高等院校主要是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使学生成为精通本行业务的专门人材。因此，政治学校是以学习政治为主，专业学校是以学习专业为主。

我们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专业，不能把政治和专业对立起来，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从

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马克思起先是研究法律的，以后又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最后又研究社会主义，他是政治经济学专家，又是哲学专家，又是社会主义学说专家。他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不间断地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才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我们的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例如：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年轻的时候就有很深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情况进行了多年的专门调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多年不间断的专门研究；他对中国革命军事问题也付出了极大精力，作了深入研究和实践；他又亲身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大大地发展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可见毛主席的政治领导，也是以结合专业为基础的。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都是专门搞政治领导的，但是又都是分别熟悉和领导某一专业的，如工业、农业、文教等。梅兰芳作为一个大艺术家，替我们国家争得了光彩。至于他是不是需要熟读政治书籍，那不一定，也用不着。但是只要他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表演艺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的体现。外交人员则是通过外交业务来体现政治的，象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是为外交干部作准备的，在那里的学生就必须学好外国语和有关外交的政治业务，因为外交业务和外国语是他们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外国语和外交业务不及格，怎么能从事外交工作，可见，没有不结合政治的专业，也没有不结合专业的政治。

人们对红与专、政治与业务这两者关系的认识，往往会有两种偏差。一种是以政治学习来代替业务学习，否认专门业务学习的重要性；另一种是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拒绝必要的政治学习，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有害的。而目前，我们应该强调专业学习。专业学校用很多的时间去搞政治、搞劳动，把专业学习放松了是不对的。我们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的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要永远落后。

我这么说，你们也许会说你这个人轻视政治，对政治不关心。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正确的理解。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教学工作中强调政治学习，这是完全必要的。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高等院校，在政治教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广大青年经过几年党的教育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今天有必要强调专业学习，培养大批专家，以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就是表现社会主义政治的。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至于有的人借口专业来抵制党的政治领导，甚至有人利用专业作幌子，作反党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种现象是有的，应该采取防止的措施，但这不是今天的主要危险。我们也不怕。因此，今天应该强调重视专业的学习。一九五三年我在华东工作的时候，那时青年团叫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说明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业务，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而要结合起来。当时我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象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光有技术没有政治不行，光有政治没有技术也不行。

今天我们的国家需要几百万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精通本行业务的专门建设人材。我们的

工业、农业、艺术等院校都是培养各方面的专家的。工业学院就是要培养工业专家，农业大学就是要培养农业专家，煤炭学院就是要培养煤炭专家，舞蹈学校就是要培养舞蹈家。学好专业是一个学生的政治任务，培养出大量专家，就是学校的政治任务。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的政治觉悟越高，就越应该懂得专业学习的重要，就越要刻苦学习。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哪个学校的学生专业学的好，就是那个学校的政治挂帅挂得好。因此，专业学校学生的主要时间和大部分精力应该是用于学习专业知识，不能要求他们向党校的学员那样用主要时间学习政治和具有那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能要求他们对政治理论和各项具体政策（比如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作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学生也应该学习政治，使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能分清大事大非，正确了解国内外的一般形势，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青年团的干部要给他们作些报告，他们也应该用一定时间读读报纸、讨论时事政策，参加党团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时间，都要安排得当，不要侵占他们专业学习时间，而要从各方面保证他们有充分的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

学习专业要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有一股傻劲，对自己的专业要有兴趣，钻进去，搞它十年、八年，搞它一辈子，才能有成绩。古时候的大学问家在学习上都是有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的。孔夫子读书“发奋忘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求学问的精神。

搞专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不容易。搞政治，成为一个政治家也不是容易的，需要精通马列主义著作，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同样需要专心致志，进行辛勤的劳动，付出毕生的精力。要求一个人既要成为精通某一专业的专家，又要成为政治专家，这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样样都学，样样都干，其结果必然样样不专，样样做不好；在政治上是蹩脚货，在技术上也是蹩脚货。目前，在同学中流行“红透专深”的口号，如果红透是指要成为政治家，专深是指要成为业务上的专家，那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大可能同时做到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红透专深”。

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给予纠正。目前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搞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埋头搞业务。我们不能够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有些人因为钻业务的时间需要多些，也有些人对政治的兴趣不浓，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少一些，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在业务上搞出一定的成就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真正的白色专家，只是那些一味与人民为敌，利用专业为反党反革命活动服务的分子。但是，解放以来经过镇压反革命、整风、反右等运动以后，这种人是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不划清界限，到处批判“白专道路”，其结果将会影响一些人学习专业的积极性，放松了对专业的学习，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现在你们要走上工作岗位，如果你们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到了工作岗位以后，你们要认真联系群众，了解生活，继续自己的政治学习，同时不要妨碍人家搞专业，而要用各种办法帮助人家搞好专业；如果你们是从事某一项专业工作的，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就要专心刻苦地搞好你们的专业。当然，搞好专业也不要忽视政治，甚至和领导闹对立，而要关心政治，尊重领导，同时，请求领导上帮助你们在专业上能够有所成就，对人民做出贡献。

（二）关于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

我们高等院校的反右派斗争和思想改造都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广大同学和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更加热爱党和社会主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在运动中也存在着一些做法上的问题。这就是在一些学校中，用简单生硬的方法来处理青年的思想问题。这是不好的。听说现在已经注意了这问题，在许多学校中，同学之间出现了团结进步，共同提高的新气象，他们对自己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

应该认识到，思想改造主要是靠个人的觉悟，要他自己好好考虑，企图用强制的办法、群众的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是不行的。帮助别人进行思想改造，不能损害人家的感情，打击人家的心灵。十八、十九、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热心追求真理，思想比较活跃，这是很大的优点；但另方面，他们的思想还不成熟，有错误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教育问题，要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当然，如果有人思想反动，甚至参加反革命集团，从事反革命活动，那就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除了这种情况，即使也有些人有严重的思想问题，思想顽固一点，也不要急于在两、三个星期内解决问题。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不能要求每个青年在短期内都改造为具有高度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看到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对人们还有深远的影响，对待青年的思想问题，要诚恳地采取耐心教育的态度，不要随便采取简单的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兴旺。

对学生干部来说，你们的思想水平、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也都有待于提高；不能说自己脑子里一点个人主义的东西都没有了。拿我自己来说，我这个人思想就很复杂，有共产主义思想，也有孔夫子、孟夫子思想，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四十年了，也还不能说"红透"了；只能说我的思想中共产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孔夫子、孟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可能还没有完全赶走。所以，对待青年学生，采用简单的、行政处理的办法，想通过几次批判解决思想问题，是一种非马列主义的作法。我希望各高等院校党的、行政的和共青团的工作同志，对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问题，我也要说几句话。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他们和掌握他们家庭命运的人是不同的。一个青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还是工农家庭，是不能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防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党中央领导同志中就有很多人出身中上层家庭，真正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党的领导人。因此，对青年只是看到和一味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这种"唯成分论"是不对的。同时，现在已经解放十二年，和解放初期的情况也不同了。如果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今年二十二岁，解放那一年他才十岁，小小年纪，应该说，剥削阶级家庭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少的。现在的学生都是我们党的、人民的、民族的儿女。如果自己努力，再加上我们教育得好，就都会成为我们的好干部；如果他们自己不努力，我们教育得又不好，即便是工农子弟、干部子弟，也可能变坏。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至于右派分子那又是另外一种人了，他

们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至于对一般学生，尽管他们讲了一些错误的话，作风不够好，也都要很好地进行教育，不应当加以歧视。

现在，凡是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学生，我们也要当成自己的同志来对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年轻，跟着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去搞活动，犯了错误。只要他们今后努力工作。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就完全和其他同志一样，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的。

不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也不论是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青年，一样都是党和国家的儿女，我们老一辈人都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将来能够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希望你们在政治上、专业上都比我们强，也应该比我们强，因为我们年轻时，没有你们这样好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们不会犯错误，错误总是会有的；只是不要把错误隐瞒起来，坚持错误不改。错了就要改，改了就是有前途的。

最后，关于你们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也简单说几句。组织上是会根据国家需要，根据你们的志愿和专业作全面考虑的。你们应该服从分配。我赞成你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你们有人有"四向四不向"的想法是不好的（注："四向四不向"：向上不向下，向大不向小，向城市不向农村，向南方不向北方）。祖国需要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应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你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还不高，专业知识也还不足，在学校中得到的锻炼和学习的知识都还很不够，应该到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和提高。但是，你们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国是一个还有不少文盲的国家，你们的政治水平和专业知识在人民中间还是比较高的，你们不论到工厂、机关，还是到农村，都要有独立工作的信心，敢于负责，大胆工作，也特别要虚心学习，不断求得进步。

（原载《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七期）

毛泽东同志对《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

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基本情况：

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五风”已经基本制止，党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民的生活一般较去年安定，在生产上普遍有了起色。主要表现在：

（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据最近统计，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调整后的公社数（包括已经调整和预定秋后调整的规划数字）为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个，较调整前增加三万零四百七十八个。生产大队为七十万零八千九百一十二个，较前增加二十二万五千零九十八个。生产队为四百五十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四个，增加一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零六个。

（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据最近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二百五十亿元（较原来估算的一百一十一亿元增加一点四倍），已退赔的占平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象个过日子的样子了”

（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加强了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组织生产上的自主权，基本上制止了瞎指挥风，提高了生产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多数地方的生产安排和生产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解决了社员的部分口粮和日常生活需要，也活跃了农村市场。

（五）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绝大多数地方，把原来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对五保户和困难户供给和补助的办法后，好久不见的“争出勤”、“争工分”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劳动效率也显著提高了。

（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据估计，目前参加食堂的户数，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些多数是群众自由结合的合伙食堂和农忙的劳力食堂。

（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由于今年各级领导对于农村粮食情况比较清楚，安排得比较早；群众分户自炊，自已安排生活，加上自留地生产的食粮和瓜菜的补充，因此，农民的口粮标准虽然低，但是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

（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三包一奖”，粮食多产多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原则，一般地比去年执行得好。因而党的政策初步得到群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了秋季生产。

（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责任制加强了，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大大减少了。

（十）在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据各地估计，约有百分之十几的县、社、队由于几年来“五风”较轻，或者纠正较早，生产关系比较

稳定，生产力破坏不大，基本上保持了连年增产或平产的局势。据估计，这类地区，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一般地区，需要三、四年时间。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县、社、队，由于几年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目前粮荒严重，浮肿病、干瘦病还在发展，群众、干部情绪不正常，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二、存在的问题

（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反映：“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粮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多数地方，要求把征购任务定死到生产队，超产粮全归生产队。有的地方提出，超产多的生产队完成了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之后，国家要多购时，用实物交换。但是这些办法，实际执行起来有许多困难。江苏省委对于粮食问题，概括了四大矛盾：一、高产地区要求多吃，低产地区却不能少吃；二、粮区口粮不能少，棉区口粮也不能少；三、多产多吃的政策要兑现，而征购任务不能减；四、农村不能多拿，城市一时少销有限。有的地方，由于国家征购任务不能减少，就照上面的征购数字套产量指标，影响到包产不能落实。许多地方反映，还是顾了国家顾不了农民，多产多留多吃、超产粮、工分粮等等，都有落空的危险。由于粮食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的紧张心理没有消除，所以今年夏收中私分和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早秋作物的现象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发展。

（二）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最近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百分之二、三十，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在今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上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的粮食顶分配口粮。

（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据江苏省委检查，全省现有自留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点七，有些地方还不到百分之四。一部分干部仍然认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搞“自发”，对于恢复自留地的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许多干部对于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是口土同意，一碰到具体问题就发生动摇。在今年夏收分配中，还有一些地方，对该奖的队不敢奖，怕超产队和劳动工分多的社员粮食多了，闹“自发”；对该罚的不敢罚，怕影响农民的口粮。有的生产队，仍然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

（五）在一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个别地方，发现有少数富裕中农带头拉马退社，有的还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所谓“土地还家”。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作法，尽管这种地区并不占多数，表现形式和具体作法也各有不同，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作法。有些地方，集体生产已经搞乱，干部已经躺到。马上恢复为集体生产确有实际困难。

（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在劳动组织方面，还没有解决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正确地结合的问题。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下种以后、

收割以前的占全年农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田间农活包工到户，叫做"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者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在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方面，有的地方采取了单纯的物质刺激的办法。例如规定完成每项农活给多少粮食。结果是粮食多的活，人们抢着干，少的不干；今天有粮食，抢着出勤，明天没有，就不出勤。

（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有的地方，已出现兵对兵、将对将，"父子队"、"兄弟队"等形势的生产队；也有的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分队，但领导上坚持不许，妨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份、干部处分的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据各地统计，去冬今春整社中划为三类的社、队，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部分社、队，都由各级派工作组进行了专门的整顿，其中约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经过整顿以后，出现了新的面貌；百分之三十左右，整得不深不透；百分之十左右的被搞乱了。经过检查，发现在这一部分被整顿的三类社、队中，把有些"五风"泛滥，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当作民主革命不彻底来处理，以致把一些本质好只是思想作风有毛病的干部，也当作阶级敌人和坏分子斗争了。在重划成份中，有的错误地把一部分劳动农民错划为地主、富农。在这些地方，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造成了阶级阵营的混乱。不少地方，几年来对于基层干部撤职、惩办（拔白旗）过多，加上这次处理不当，大大挫伤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特别是对修正草案）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一部分干部对许多界线还划分不清。对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社会主义政策，在执行中表现迟疑。一部分生活特殊化和强迫命令作风比较严重的基层干部，对于六十条表现冷淡，怕六十条和群众见面。少数作了坏事的人，表现惊慌。相当部分干部在作风上，还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对待群众采取恩赐和包办代替错误作法。各地认为，解决这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还要经过一番相当艰巨细致的工作。

（十）群众虽然对于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有的要求很快把六十条变成法律，取消"草案"二字。有的要求多设一些"开封府"，多派几个"监察员"，以便替他们撑腰出气。

三、各地的部署

各省、市、区党委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贯彻实行"六十条"的工作，都根据中央指示，作了具体部署：

（一）普遍对于贯彻实行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且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都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规定。

（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的在八月中旬可以开完，少数灾情严重的地区，计划在秋后再开。此外，各地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要求在一、两年内，把所有县、社、队的主要干部分别轮训一次。

（三）普遍要求，在八、九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分配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

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六十条的主要内容。

（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工作。各地认为全面系统地贯彻“六十条”，彻底改变干部作风，还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时期的突击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有必要对于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作出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要求在两年或三年之内，把农村所有公社和生产大队，分期分批、普遍认真地整顿一次。山西、陕西、湖北等省，计划以去年冬季组织起来的整风工作队为基础，组织一个长期的整风队伍，目前正在着手训练，总结去冬今春整风经验，学习“六十条”，结合进行个别试点，为秋后进行系统地整社工作作准备。

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印

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已经中央原则批准。这个条例草案，在教育部直属的二十六所高等学校，要在全体师生员工中进行讨论，各校要把意见汇集起来送给教育部；同时，在这些学校中，应该试行这个条例草案，以便积累经验。这个条例草案，也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及其所属的一切全日制高等学校，在全体师生员工中进行讨论，并且请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把讨论中的意见汇集起来，送给教育部；至于在这些学校中，是否试行，如何试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自己决定，并且报告中央，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试验之后，将再行修改，成为正式文件公布，现在暂不向高等学校以外公布，不在报刊上发表，也不在外籍师生中进行传达和讨论。

全国解放十二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都有很大的成绩，是旧社会里所梦想不到的。十二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里，把全部高等学校接收过来，这个工作是做得好的。第二个时期，是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这个工作总的说来也是做得好的，教学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发生了一些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的缺点。一九五七年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我国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决定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从此，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从一九五八年起，三年以来，高等教育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主要是：（一）在学校中确立了党的领导。（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的根本制

度。（三）师生的政治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进。（四）教师队伍壮大起来。新教师大批成长。老教师也有进步。（五）一批新专业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取得不少成果。有些科系的教学水平有了提高，（六）数量上发展很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同时也发生了不少缺点。主要的缺点是：（一）数量发展过快。（二）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老教师的团结合作，在很多学校被忽视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简单化的做法，因而影响了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有些学校由于党内民主不够，也影响了一部分党员的积极性。（三）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课程的不适当的大合大改，对生活安排、劳逸结合、设备和仪器的管理、学校的总务工作等等注意不够，以及学校工作中的其它缺点，使有些高等学校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降低了，特别是一部分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降低了。

高等教育中所取得的成绩，是根本的。我们的教育方针，为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具体途径。这是一件关系到长远的将来的大事。所以必须充分估计我们的成绩，并且一定要把这些成绩巩固下来。巩固成绩的办法，绝对不是什么改变我们的教育方针，而是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应该认识，十二年来，特别是三年来，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部分错误的经验。不论成功的经验或者错误的经验，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为了巩固成绩，改正缺点，需要认真总结这些经验，进一步定出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套具体办法，使全体干部和师生充分地认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以保证党的教育方针的真正贯彻。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其意义就在于此。

中央认为，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二）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院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四）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五）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校中党的领导权力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系的总支委员会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的作用。条例草案关于这些问题所作各项具体规定大体是恰当的。条例草案中的各项规定，还会有不很完备，不很恰当的地方，在试行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后，还要作进一步修改。

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必须继续加强，不应该放松和削弱。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做好团结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热情帮助他们进行思想的自我改造。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不但要红，而且要专，并且要善于和教学人员，特别是有经验的老教师合作，领导和使用他们来进行工作，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他们把工作做好。中央要求，高等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和全体师生员工一道，同心同德，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克服自然灾害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继续鼓足干劲，巩固成绩，克服缺点，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个条例草案对全国所有的全日制高等学校来说，是有示范性质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所属的学校，都应该讨论这个文件。但是，这些学校情况是不相同的。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应该根据对所属全日制高等学校的调查研究，分别情况，首先对重点高等学校，然后对其他高等学校，规定出适合情况的具体办法。

中央这个指示，应该在所有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全体党员中进行讨论，并且在全体师生员工中宣读，根据指示的精神对条例草案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在党内党外讨论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必须使师生员工畅所欲言，以达到集思广益，弄清思想，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把教学和其他工作做好的目的。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从略——编者注）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在三年大跃进中，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已经提前完成，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技术力量有了迅速的增加，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工业的地区分布比过去合理，对于地质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工业技术上出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造发明，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巨大进步，同时，在工业建设中加强了党的领导，管理工业的各级党委开始学到了领导工业工作的本领，企业中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职工队伍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些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在总路线指导下，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可以跃进的。三年来的建设工作，使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又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

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工业建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计划指标过高，某些工业部门发展速度过快，使工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新的不平衡更加突出，使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工业和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很不协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力量分散，不能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妨害了某些工业部门当前的正常生产；由于工业生产的任务过重，在一些工业管理部门和工业企业中间不同程度地滋长了浮夸作风和瞎指挥作风，在不少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相当混乱，责任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质量降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很多被破坏了，新的协作关系很多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加重了农业和市场供应的负担。在农业上连续三年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农村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了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的很大减产，这就更加加重了工业上的困难。工业工作中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领导机关来说，特别是就中央的工业领导部门来说，根本原因是，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缺乏统筹全局的观点，在不少问题的考虑和处理上，不从实际出发，没有坚持群

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一句话，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记取。

我国当前工业建设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性的，然而是严重的。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切实地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克服困难，逐步地扭转工业工作中的被动局面，这是全党面前迫不容缓的重大任务。现在，中央就加强工业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改善协作关系和改进企业工作等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八项规定。这些规定的中心在于，加强工业工作的统一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继续前进。中央号召各级党委、一切经济部门、一切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雷厉风行地、不折不扣地把这些规定，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并且在执行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中央相信，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彻底实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工业战线上，只要我们切实地执行中央规定的政策，努力整顿作风，改进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前的困难必定能够比较快地得到克服。

一、切实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为了有系统地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逐步协调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工业的调整，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不应当也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工业的每一步调整工作，都要围绕以下的基本任务：（1）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增加农业的生产资料的生产；（2）加强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增加市场日用品的供应；（3）加强采掘工业和采伐工业的生产能力；（4）满足国防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加强国防工业所必需的新型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在工业的每一步调整工作中，还必须注意增加产品的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

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已经在前三年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补充计划，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初步计算，大体是这样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全国共计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中央认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工业的调整，才能够在比较松动的情况下，掌握主动，加强必须加强的方面，把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调整好，把工业生产的秩序安排好，把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整顿好，扭转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被动局面，逐步发挥在过去三年大发展中增加的工业生产能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一九六〇年春就应当及时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

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末，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降低指标只是调整工作的一个步骤。在指标落实以后，还必须采取正确方法，做一系列艰巨、细致的工作，及时地发现问题，具体地解决问题，才能把调整工作做好。如果不抓紧时机，在两、三年内紧张地从事这样的工作，而认为指标降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和重工业内部的关系就会自然平衡，一切问题就会自然解决，可以放松干劲，或者认为只用一个短时间的突击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

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三年内切实见效。到一九六三年，在工业方面争取煤炭的产量、质量和钢材的品种、质量有较大的增加和提高，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多的增长和提高，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基本上能够利用起来，某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还有所发展；在农业方面，争取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副食品的供应情况有比较大的改善；在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市场、物价、财政、金融的状况有基本的好转，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摆脱粮食进口的被动局面，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好的前进的基础。

二、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

工业的调整工作，牵涉到工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牵涉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是决不可能做好的。

我们对工业的管理，一贯地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今后，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就全国来说，在最近两、三年内，一定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包括中央局）一级，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全局观点出发进行统一安排。就省、市、自治区来说，也必须把过去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根据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本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在加强集中领导的同时，都应当在统一的计划下给下级适当的机动余地。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地区、各级都应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服从中央的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统一指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发挥积极性，抓住问题的关键，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

为了对工业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第一，必须认真改进国家的计划工作。工业计划的指标，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必须认真进行综合平衡，留有余地，并且能够使国家逐步建立起必要的储备。计划中安排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项目，必须有物资的保证，不能留有缺口。计划必须及时下达，力求少变。

第二，国家的工业生产计划，必须坚决执行，保证全面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层层加码。

第三，所有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所有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都

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办事；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项目，一律不得擅自动工建设。

第四，国家规定的物资调出计划，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调出，必须坚决保证完成，不能七折八扣、扣留占用、拖延不调。由国家分配的物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规定使用，不能用来干计划以外的事情。

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积存的一时用不上的物资，必须切实清查，统一调度使用，撤消项目、缩小规模、推迟进度的基本建设单位，多余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也必须统一调度使用。关闭的企业或者车间的设备，以及调整指标后企业多余的设备，必须统一调配。这些物资，属于中央管理企业的，由中央的物资管理部门或者工业主管部门统一调度；属于地方管理企业的，由地方的物资管理部门统一调度。某些属于地方管理的物资，如果需要调出，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调度。

第五，不经过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人数以外增加职工，不得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以外增加工资。

第六，国家统一规定的工业产品的调拨价格和市场价格，任何部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不得擅自变动。

第七，国家规定的现金管理制度，任何部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流动资金，应当由主管机关核定，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批准。

为了保证国家对工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省、市、自治区管理的企业中，凡是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企业，必须由中央或者中央局直接管理。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要企业，已经下放了的，必须收归省、市、自治区和大工业市直接管理。

加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管理工业的权力，可能会给某些部门、某些地方增加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在全局上掌握了主动，局部的困难就比较容易克服。如果让目前存在的权力层层分散、各自为政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无法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而且将给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害，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相反地，从全局出发，把各方面的力量合理地集中起来，用在最必需的方面，我们就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

在当前工业的调整工作中，为了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大量的复杂问题，既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整个工业的生产建设，更要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突破关键，使调整工作一步一步地展开，使问题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

就当前工业生产的全局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紧紧抓住煤炭的数量和质量、钢材的品种和质量。目前煤炭生产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工业的生产，影响到城乡人民的生活；钢材品种不全，质量不高，不仅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困难，而且使许多生产部门急需的设备维修也不能正常进行。如果不集中主要力量使煤炭生产稳步上升，使钢材的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我们就无法改变目前许多企业停工、半停工的状态。

抓住煤炭和钢材这两个主要环节进行调整，不是孤立地突击煤炭和钢材的生产，而是要通过煤炭生产的逐步上升，通过钢材的品种逐步增加和质量逐步提高，带动各行各业的生

产，并且带动备品、配件的制造，维修力量的安排，协作关系的建立，带动整个工业的调整工作。这样，就能够使各行各业按比例地有秩序地逐步向前发展，使整个工业生产活跃起来。

在目前许多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各行各业的生产，都必须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重点，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保证重点企业的需要。这就是说，要把有限的煤炭、生铁、钢材、木材、棉花、烟叶等等原料、材料和燃料，优先供应给那些产品质量高、品种多、物资消耗少的重点企业，而不能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

为了保证那些必须继续生产的企业能够正常进行生产，消除目前大量存在的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现象，凡是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凡是原料、材料、燃料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产品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赔钱而短期内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企业，必须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

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排灌机械、化学肥料、农用药品等，在分配上也应当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在今后若干年内集中使用在某些粮食商品率高的地区或者某些重要的经济作物区。

在基本建设方面，更加必须集中力量，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坚决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使那些急需建设的项目，能够比较快地建设起来，建起一个就能够发挥一个的作用。为此，无论是新建、续建、扩建或者停建的项目，都要由国家有关机关逐项地进行审查。

在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我国工业经过三年的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在工业发展的新的水平上。根据新的比例关系，组织新的平衡。为了组织新的平衡，必须首先注意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并且充分注意目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和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以后工业的每一步发展中，还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我们必须经过国家计划的调节，及时地抓住中心环节，安排适当的比例关系，不断地求得新的平衡，不断地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

在最近两、三年内，吃的和穿的都比较缺乏，除了千方百计地增产粮棉和其他农副产品以外，必须在工业生产中，尽一切可能合理地利用农产品原料，特别是充分利用非农产品原料，增产日用品，减少城乡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难。工业应当努力增产农业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增产中小型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用药品、农用燃料，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部门应当从上述两个方面，来保证国家有必要的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这是一件关系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这是工业战线上当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用最大的努力，使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供应，有所好转，争取在今后两、三年内做到日用品、中小型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的供应有较多的增长。

轻工业和手工业所需要的钢、铁、铜、铝、煤、石油、酸、碱、木、竹等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必须在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中得到妥善的安排。过去主要依靠国外进口的原料、材

料，应当积极设法自己制造。大中型企业的边角废料，主要地应当供应给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单位和其他必需的生产单位使用，不能全部或者大部由本企业使用。同时，应当积极增产全部或者大部用化工原料制造的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和手工业在生产上所必需的三类物资，要由商业部门负责协助解决供应问题，尽可能恢复传统的供应关系。

轻工业和手工业必须首先大量生产为最大多数群众所需要的产品。过去已经改产生产资料因而影响到日用品供应不足的工厂，由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协同商业部门开列名单，提交企业所在地的党委和主管部门，限期恢复原来的生产。所有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都必须注意质量，做到合用、耐用。一切轻工业和手工业的企业，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商品检验制度，保证质量。某些不合质量标准但是还可以使用的产品，由商业部门降价收购，降价销售。凡是质量低劣、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不许出厂销售。凡是产销直接见面的手工业企业，都应当实行包退、包修、包换，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中央制定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行之有效的规定，应当积极执行。手工业的所有制应当合理地进行调整，以便充分地发挥手工业合作社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调离职的手工业技术工人，必须迅速归队，手工业的传统产区，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采用优良的传统生产方法和经营方式，通过合理的传统供销渠道，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各级党委和经济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安排的领导和具体检查。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中央规定了迫切需要增产的四十种轻工业、手工业产品（目录附后）。这些产品，必须列入计划，逐项切实安排。

五、加强经济协作

许多原有的生产和供应的协作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或者被打乱了，许多需要随着大跃进建立起的新的协作关系，又还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这是当前工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不少企业对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没有很好地履行。有些协作关系被片面废除。许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经济联系被中断。许多传统的三类物资的供应渠道被破坏。有些地方在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划地为牢，以行政手段割断了原有的协作关系。许多地区不顾条件地追求自给自足，许多企业盲目发展多种经营，滋长了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作风，甚至以邻为壑。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改变这种情况的必要措施是：

第一，经济协作的组织工作，必须采取分部门、分地区负责的原则。属于一个行业内的协作关系，由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属于一个地区内的行业之间的协作关系，由省、市、自治区经济委员会负责；属于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协作关系，由中央局经济委员会负责；属于大区之间的协作关系，由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

固定的协作关系，应当分别列入各级的经济计划，重要的还应当纳入国家计划。在安排协作关系的时候，应当遵守先全国后地方的原则。

第二，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必须首先以重点企业为中心，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清理和整顿协作关系。原有的协作关系，必须继续保持，不得片面中断。中断了的，应当加以清理，需要恢复的，应当积极恢复。需要建立的，应当迅速建立，并且尽可能固定起来。现有

的协作关系中，即使有不合理的，也不得片面废除。必须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并且有了新的协作关系代替，方可废除。凡是能够固定的协作关系，应当固定下来。

凡是新建的企业，在确定建设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安排好主要的协作关系。

企业可以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承担临时性的协作任务。

协作双方都要认真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协作任务。签订经济合同，按合同办事。违反合同的，应当负责赔偿经济上的损失。

第三，不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三类物资，不可能通过一个渠道供应，需要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可以由工业企业、手工业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相互之间自行挂钩，议订合同；可以由商业部门（包括供销合作社）或者物资管理部门组织生产和供应；还可以由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物资交流，互相调剂。

重要的三类物资，应当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承担协作任务，定点供应。承担协作任务的部门和地区，必须保证完成。

第四，逐步改进物资的分配体制和分配方法。凡是能够定点供应的，实行定点供应；不能实行定点供应的，按地区设立专业公司组织供应；不能实行上述两种办法的，仍然由物资管理部门实行全国统一订货的办法，组织供应。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应当认真研究物资分配体制和分配办法，使产销直接见面，供需衔接得更好。

第五，国营工业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在协作中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企业不能平调公社的物资和劳动力。公社不能随意向企业要东西、要人。企业调公社的东西或者公社调企业的东西都应当算账，应当退赔，现在退赔不了的，要记下账来，以后退赔。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城市人民公社，不能合在一起。已经合在一起的，必须分开。

六、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从“五定”着手，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在今明两年内，所有国营工业企业，都应当切实地进行一次整顿。“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应当普遍讨论，经过试点、逐步推行。领导工业企业的行政主管机关，应当有重点地，实实在在地督促和帮助一个一个企业进行整顿。

企业管理工作的整顿要从“五定”着手，就是把每个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它的人员和机构，它的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定额和来源，它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它的外部协作关系，按照每个企业的情况，逐一核定下来。每个企业在“五定”以后，不许任意变动，特别是产品方向更不准擅自改变。每个企业内部，都应当以“五定”为基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彻底克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的现象，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必须坚决维护，不许侵犯。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企业的人员、物资和资金，除了按照中央的规定或者经过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同意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调动。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在有必要调动企业的人员、物资和资金的时候，应当按照规定办事，不能妨害企业的独立的经济核算。

企业在整顿管理工作的时候，必须针对目前设备损坏的严重情况，切实进行现有设备的维修工作，加强企业维修力量，注意把现在缺少的备品、配件和工具、卡具、量具，很快地

补充起来，并且建立必要的制度，彻底克服在各种形式下损坏设备的现象。

一切企业都必须加强生产第一线的工作。要把一些得力的干部分配到车间和工段，或者其他关系生产的重要岗位上。要把一些脱离了生产岗位的技术熟练工人，调回到生产岗位。某些老企业由于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调出过多，削弱了技术力量，影响了生产的，应当尽可能地给它们调回或者补充必要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应当合理使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并且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应当把一些工业管理机关的领导干部，轮流下放到企业，熟悉情况，学习管理业务，并且加强企业的生产领导工作。

一切企业必须实行"精工简政"，裁减多余的工人，压缩非生产人员，这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管理工作改进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减少职工人数，又是减少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如果全国城镇减少职工一千万人，连同职工家属和其他人员共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一年可以少供应城镇商品粮食七、八十亿斤，生活用煤五、六百万吨，蔬菜至少三十亿斤，减少国家工资支出四十多亿元，所以这是当前减轻城市对农村的压力，调节城乡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一项根本大计，也是加强农业战线的一项重要措施。一切企业都应当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的指示，除了必须保存的技术力量以外，把能够回农村去的职工都动员回乡。在这样做了以后，如果某些企业必须补充若干职工，由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部门调剂解决。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都要下最大决心来处理这个问题，决不能有任何吝惜和犹豫；一定要进行细致的工作，决不能草率从事。

为了使企业能够集中力量做好生产工作，凡是不应当由企业经营的社会服务事业，都应当由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经营。地方政府应当从便利企业职工的生活出发，安排好职工所需要的粮食、付食品、日用品的供应，并且积极办好各项社会服务事业。

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

工业企业的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许多年来，特别是三年大跃进以来，在工业战线上，群众运动中的一切效果良好的正确做法，都必须坚持和发扬。企业的的生产计划和各种规章制度，都要经过群众的反复讨论，并且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贯彻执行。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充分地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做好工作，克服困难。

中央提出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促使干部实行群众路线的重要保证。每个工业企业的党委，应当在干部中反复地进行教育，使这些纪律深入人心，人人遵守。

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和企业领导干部，应当认真行使自己在生产指挥中应有的职权，但是绝对不准滥用权力，不准对群众强迫命令。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必需办和可能办的事情，应当实事求是地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地办；凡是办不到的事，决不能勉强群众去做，以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在某些企业中间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的现象，必须反对，注意不再发生。一切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都应当有利于企业生产有计划、有节奏的正常进行。

要广泛地发扬民主。工业企业的各级干部都要随时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工人群众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生活福利、干部作风等方面，提出建议、进行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必须切实地得到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压制

和损害。在许多问题上，还要特别注意同非党的技术人员商量。要造成条件使工人群众、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敢于提出意见。在不脱产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中间，不许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批判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不要把技术上的不同意见，随便当成思想问题，更不要当做是政治问题。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重要方式，应当使它真正发挥作用，目前许多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的现象，应当改变。

要不断地加强群众的政治工作。把形势和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使群众明确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这是企业的领导应当经常进行的工作。在目前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实事求是地把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群众说清楚，坚定群众的信心，动员群众同心同德，克服困难。

要关心群众生活。在目前生活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要认真解决职工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职工级别的评定，工资形式的确定，奖金的分配等等问题，都要当做极重要的事情来处理，坚决克服平均主义的倾向。同职工的衣、食、住、行和安全生产有关的事情，只要有可能办到的，都要认真去办，并且千方百计地办好；一时实在办不到的，也要向群众说明。对群众生活福利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必须坚决反对。

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应当加强。工会应当把发动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当做自己的重要的任务。

八、加强纪律性

近几年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违反国家计划，不顾国家的政策和法令，随便挪用国家的资金和物资，损害国家财产的现象，相当普遍，并且相当严重，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首先是计划指标过高，任务过重；在下达指标的时候，只给任务，不保证物资的供应；许多工业领导部门的措施不当。除此以外，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和工业企业，不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不按照规定的制度和手续办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各级的和各方面的责任制度废弛，也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在企业的整顿和工业管理机关的整风中间，对于几年来的工作，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加强团结。但是，对于情节十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当分别情况，给以适当处理。

为了保证领导的集中和行动的统一，必须加强经济工作中的纪律性。在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来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工业管理机关，在制定计划、下达任务和组织执行计划的时候，都必须切合实际，必须安排好物资供应和协作关系，这是使工业管理机关和工业企业能够认真遵守纪律的必要条件。

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令、制度，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凡是全国性的问题，任何部门、任何地方，没有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同意，都不能自行处理，更不能擅自制定政策。上级下达的指示，规定的任务，下级都必须认真执行。如果某一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员，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违反了上级的指示、命令，任何人有权提出批评，并且有权越级上告。

中央的工业主管部门或者上级管理机关关于人员的调动和物资的调度的规定，有关单位

都必须坚决执行，不得任意更改。如果在执行中有具体困难，有不同意见，可以一面执行，一面反映，决不允许拒不执行，决不允许阳奉阴违。

国家的财产，必须爱护。对于国家委托管理的企业，应当有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管好。一切浪费、破坏、贪污和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人人有责揭发和反对。

必须向党如实地反映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准虚报成绩，不准隐瞒缺点。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那种不说真话、弄虚作假、讨价还价的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反对。

在今后，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必须分别情况，给以严肃的处理。违法乱纪，胡作非为，造成了国家严重损失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以应得的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要给以刑事处分。

各级党委，都应当加强对工业干部的教育，使大家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遵守纪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做好调整工作，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

附　　录

四十种轻工业、手工业产品目录

1．小型农具
2．食盐
3．火柴
4．电灯泡
5．铁锅
6．瓷器（碗）
7．陶器（盆、碗、缸）
8．菜刀
9．婴儿食品（奶粉、代乳粉）
10．铝制器皿
11．日用玻璃器皿
12．缝衣针．顶针
13．缝纫机
14．剪刀
15．民用染料
16．胶鞋
17．布鞋
18．雨伞
19．草帽
20．搪瓷面盆、口杯
21．保温瓶
22．肥皂、香皂
23．主要西药和医疗器械
24．合成洗涤剂
25．合成脂肪酸
26．聚氯乙烯和增塑剂
27．手电筒和电池
28．民用煤油灯
29．氯化钾、溴素、甘油
30．机制纸、土纸
31．铅笔
32．自行车
33．平板玻璃
34．竹柳编制器
35．日用木器
36．席
37．鞋钉
38．民用锁
39．卷烟、生烟和砖茶
40．饮料酒

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是帮助干部自觉地掌握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成为我们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以便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次轮训干部的必要，还因为近几年来实际工作太忙，领导上没有普遍地系统地向干部进行教育，广大干部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风进行冷静的考虑。这次轮训就是给他们一个读书、思考和总结经验的机会。

一、这次轮训干部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的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

全国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约有十六万三千人，除去年老体弱的以外，参加轮训的干部约有十五万人。对于这些干部，要求从今年十一月份开始到一九六二年年底，分期分批地轮训一遍。轮训时间每期一个半月左右，各地可以分五期六期或者七期训练完毕。至于县委书记以下的干部的训练工作，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确定。

二、训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因此，这一方面的学习，应该多安排些时间。学习材料主要是新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和"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选读）。除了这些材料以外，如有必要，各地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用少量的补充材料。

三、这次训练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这次训练的宗旨，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一定要采取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

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为此，必须注意下列各点：（1）自学为主，每一个参加学习的干部，都应该认真读书和学习文件，写一些学习笔记，并且根据学习材料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党章关于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取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2）为了帮助干部学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向学员作启发报告。（3）学习讨论，以小组漫谈为主要形式，小组会不作记录，不进行重点批判。除了开学、结业和启发报告等以外，一律不开大会，不搞思想检查的典型示范。（4）小组讨论的内容是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和批评，和风细雨，相互帮助，真正作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虚心倾听、探讨研究的态度，即使有的意见是不对的，也应该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讨论，不得采取强制接受意见的压服办法，并且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者修正自己过去的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认真贯彻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5）检查思想应该着重原则问题，不要去涉及生活细节。（6）学习过程中，不作思想政治排队；学习结果时，不写思想总结，不作鉴定，也不交学习笔记。

四、参加轮训的干部，一般可以采取省，地、县三级干部混合编班，编组的办法。可以按工作部门编。也可以不按工作部门编．总之，应该尽可能把相互熟悉的人编在一起。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学习中都应该以平等态度发表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五、在轮训过程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搞得太紧，以便让干部得到适当的休息。每天学习时间(包括开会的时间在内)不要超过六小时，不必每天开小组会，每次小组会力求不超过三小时。在物质条件和学习环境上要给以适当证保。

六、这一次轮训干部，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别直接主办。可以利用党校机构进行训练，也可以另行组织训练班。中央一级机关的干部轮训，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组织进行。中央各部门在地方的直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训练，由所在地区的党委责负组织。军队干部的训练，由军委总政治部另行布置。外事干部的轮训，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协同中央外事小组另行布置。

七、为了保证把这次干部轮训工作做好，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主持，并且挑选一批懂得党的路线政策、作风民主、并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水平的干部，担任具体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根据本决定和自己的具体情况，制订本地区的干部轮训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局。有些地区已经制订的干部轮训计划，凡有不合本决定精神的地方，都应该进行修订。

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专门召开一次干部轮训工作会议，讨论执行本决定的具体办法。

八、这种形式的干部短期轮训，在今后若干年内，每隔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草案。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因为这个条例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草拟出来的，它的内容不但不很完备，而且还会有不够恰当的地方。但是从便于进行讨论，便于广泛地搜集意见着想，现在把这个条例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国营企业中，组织讨论，并且选择若干企业试行。

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过去三年大跃进中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于我国工业的今后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过去三年多，国营工业企业，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引下，根据毛泽东同志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依靠在党委领导下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依靠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主人翁的责任心，依靠群众运动，运用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生产和其他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这些成绩中表现在：

第一，企业的生产有了飞跃发展。许多企业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生产也有很大增长。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进行了艰巨的、光荣的劳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企业的领导干部在熟悉和掌握生产技术和经济业务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第二，企业的技术力量有了迅速的增加。由于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和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大、中、小型各类企业中，都出现许多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的新的创造。无论重工业企业或是轻工业企业都增加了许多新产品。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的方针，对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上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

第四，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思想，经济工作必须和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企业中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发挥了伟大的作用。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改进，职工群众思想解放、意气风发，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提高，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发扬。

所有这些成绩都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向。

应当指出，在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由于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长期埋头于日常事务，对经验教训没有很好地及时地总结，以致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系统的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许多企业，由于领导上还不善于依靠群众、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同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管理上的分工负责，很好地结合起来，以致责任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在不少企业中，瞎指挥、乱操作的现象严重，许多设备受到了损坏；有不少的企业，不计工本，不计赢亏，不讲究经济核算，不坚决维护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独立的经济核算权，让国营企业的全民财产和人力受到侵犯，或者受到其他方面不应有的无代价的调用；许多企业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许多企业的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党委本身的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企业外部的原因，也有企业内部的原因。就企业外部的原因来说，主要是工业领导机关下达的计划指标过高，生产任务过重，而且经常变动；工业管理体制不尽合理；许多原有的协作关系被打乱，许多新的协作关系没有建立；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没有得到确实的保证。就企业内部的原因来说，主要是企业领导干部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没有彻底扫除少数人脱离群众冷冷清清办企业的旧作风，还不善于依靠群众贯彻执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就是根据上面讲的当前存在的问题，根据进一步改进企业管理的要求，本着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的精神而提出的。为了便于大家的讨论，现在把这个条例草案中的要点，作一些简要说明：

第一，条例草案中规定的“五定”，是摸清和核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办法，是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五定”，就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在三年大跃进中，企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现在需要经过“五定”，摸清企业的底，使它能够有条件逐步地做到相对稳定的正常生产，以巩固成绩，争取新的胜利。经过“五定”，企业的主管机关和企业本身在确定指标，提出任务的时候，也就可能更加切合实际。实行“五定”，并且在“五定”的基础上实行“五保”，目的是促进企业更好地依靠群众，实行计划管理，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第二，条例草案十分重视协作问题。现代工业的生产，分工比较细，相互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每个企业都必须取得很多单位的协作，并且很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条例草案的协作这一章中，强调了凡是需要和能够固定的协作关系，都必须固定下来；固定的协作任务要纳入计划；协作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单方面废除。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问题是：原有的协作关系，中断了的，要尽可能迅速恢复；由于条件变化而不能恢复的，要另行安排；不正常、不合理的，也要重新安

排。需要建立的新的协作关系，要迅速建立。一切合理的、必需的协作关系，都应当尽快地固定下来。

第三，条例草案对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但是，这决不是说，要恢复脱离党委领导、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单纯地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一长制”，而是在党委领导下依靠群众、建立一个厂长负责的统一的生产行政的指挥系统。此外，还要在以厂长为首的行政领导下，建立和健全技术责任制、财务责任制和其他的责任制，使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都有专人负责，使各个岗位的职工，人人都有专职，克服和防止责职不明、无人负责的现象。条例草案强调建立一系列的责任制度，是要把集中领导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群众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决不是要退回到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企业的错误的老路上去。

第四，条例草案对企业中的技术管理，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的中心在于：保证设备、工具经常处在良好状态，保证产品的质量符合标准，充分发挥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积极性，正确地进行技术革新。企业中的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必须同严格的技术管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技术工作，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五，条例草案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物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强调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根本原则。不计工本，不计盈亏，是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一切企业都必须依靠群众，厉行勤俭节约，精打细算。除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需要国家给予计划补贴的少数企业以外，一切企业和生产部门，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都不容许发生亏本赔钱的现象。只有做好经济核算，才能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第六，在条例草案中，对职工的工资、奖励、生活福利，专列了一章。条例草案中关于劳动报酬的规定，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应当按照每个人的技术水平，按照每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确定报酬，而不应当按其他标准。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是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的正确原则。在贯彻按劳分配的时候。要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教育，但是，就确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来说，只能是按劳分配。

条例草案规定，工人的工资形式，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根据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有利，实行计时工资制或者计件工资制。企业的性质不同，条件不同，一个企业中各个生产单位和工种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所以不能笼统规定以那种形式为主，而只能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条例草案强调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切实做好生活福利工作。

第七，条例草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党委员会，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企业党委的领导责任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企业的行政领导、依靠群众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布置的任务；讨论和决定企业工作中的各项重大问题；检查督促各级行政领导人员对国家计划、上级指示、企业党委决定执行。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放在调查研究方面，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使领导工作更加符合实际。企业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要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这些规定的目的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党委对企业的集体领导，提高而不

是降低企业党委的领导水平。

第八，条例草案规定了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企业的生产任务，企业的人员、物资和资金，除了按照中央的规定或者经过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同意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改变和调动。在企业的生产能力有余，而当地又能供应生产所需的物资的情况下，可以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不占用国家计划分配的材料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承担地方分配任务。关于企业管理体制的这些规定，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国营工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不受侵犯和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权。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既要求发挥企业本身和行政主管机关的积极姓，又要求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姓，把这两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总起来说，条例草案的各项规定，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促使企业的领导人员正确地指挥生产，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使总路线在我国工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经过三年大跃进，那些曾经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已经废除得比较彻底了，问题是在没有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时地系统地建立起来。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依靠群众制定切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总路线、大跃进的要求的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并且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在我们的企业中，既要有广泛的群众运动，又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把这两方面更好地结合起来。

工业工作是很复杂的工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我们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还总结得很不够，不可能一下就制定出一个很完备的管理工作条例。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以便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总结试行经验以后，使这个条例草案完善起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应当首先结合具体情况；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

各地方党委要责成所有的国营工业企业的党委，把这个指示和条例草案一字不漏地读给全体职工群众听，不容许把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条文略去或者任意纂改。要放手发动职工群众对这个条例草案进行充分讨论，不但容许而且要热忱地欢迎他们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加以比较，把条例修改得更完备、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中旬以前报告中央。

在讨论的同时，中央各工作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若干不同行业的企业，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条例草案的试行。要组织有一定水平的负责干部率领的工作组，协同企业党委，进行试行工作。

这个条例草案的各项规定，原则上适用于一切国营工业企业。如果个别规定不适合于某些企业，可以根据条例草案规定的精神，结合具体情况，适当处理。这个条例草案不仅考虑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也考虑到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进一步改进企业管理的要求。如果某些规定目前还没有条件做到，应当订出规划，逐步实行。

请中央局在十一月下旬以前把各地对条例草案试行的经验和意见，汇集起来，加以研究，报告中央，以便中央对这个条例草案作进一步的修改。

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和河北省的五件材料、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一件材料，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十一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

从今年春季以来，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在农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大有起色。除了一部分遭受严重天灾的地区以外，各地的秋季收成，一般地都超过去年。农村副业和手工业，都有恢复和发展。家畜、家禽，正在

稳定地增长。农民的生活也有改善。总之，农村的情况，今年比去年好。可以肯定，明年的情况将比今年更好。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加强农村工作，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争取一九六二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为此必须，进一步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和党的其他有关政策，并且在实践中使六十条的内容更加完备，更加充实，这是保证农村情况继续好转的根本措施。与此同时，还必须结合秋季分配、秋季征购、冬季生产、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准备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二

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统一农民和干部的认识，发扬他们爱国爱社的热情，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他们发展生产的干劲，促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

这次教育，要结合六十条的规定，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向农民宣传工农联盟，城乡互助，以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意义；要向农民宣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下面的七个问题，在这次教育中，应当着重宣传：

（一）努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困难。现在仍有不少地方，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确实存在很多困难。要教育干部和农民，不要害怕困难，应当战胜困难。办法不是别的，就是艰苦奋斗，努力增产。在革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例如红军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有许多根据地还是很贫瘠的地区，但是却能依靠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这是我们历来的革命传统，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最重要的是有了六十条。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事实，只要认真地实行六十条，生产面貌就很快改变，生产量也随着增加，那个地方的困难就已经渡过，或者快要渡过。这一点，要向农民群众广为宣传。

（二）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要使农民懂得，只有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要用合作化以来的事实，特别是当地的典型例子，向农民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要给农民讲清，这几年来农村工作中出现过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不但造成了群众的损失，也损害了集体经济。不能把这些错误作风，同集体经济，同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混同起来。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三）正确对待家庭副业。家庭副业必不可少，它是集体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六十条关于发展家庭副业的各项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同时又要教育农民，不把全部或者大部力量用在家庭副业上，不要妨害集体生产。集市贸易对于活跃农村经济起着重大的补充作用，应当允许农民从事正当的买卖活动。同时又要教育农民，不要热心于做生意，更不要弃农经商。要使农民懂得，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靠生产，不靠商业。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得利的只是少数人，吃亏的是大多数人。农产品价格过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利，也是损害农

民利益的。

（四）发扬爱国热情，积极完成征购任务。要向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讲清形势，讲清城乡兼顾的道理，讲清保城市也就是保农村的道理，使他们懂得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的重要意义。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愿意多留农产品，自吃，自用，或者在集市上高价出卖；有少数干部片面地只顾农村一头，少顾或者不顾国家。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要使农民和干部明白，如果国家手里没有必要的粮食，城市工矿区和重灾区的供应，就不能保证，很多人就会吃不上饭，国家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对人民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教育干部要有全局观点，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照顾大局。为了保证城市和灾区的需要，国家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长期继续的事情。要使农民和干部明白，依靠进口粮食过活，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设起来，人民也不能从贫困中间翻身。必须努一把力，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做到在中等年成和遭受中小自然灾害的年成都不进口粮食，摆脱目前这种被动局面。

（五）积极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要向农民宣传工农联盟的道理和工农业互相支援的道理，宣传农村面貌根本改变离不开国家工业化的道理，使他们懂得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教育农民服从国家计划，努力增产工业需要的农产品原料，支援工业生产。现在城市工矿区人民的生活，相当困难。他们的生活费用本来就比农民高，他们又没有副业生产，副食品涨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要教育农民积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粮食和副食品支援城市，帮助城市。

（六）厉行节约。节俭过日子，是我国人民历来的优良传统。在目前困难的时候，更应当继续提倡勤俭节约。要教育农民，把粮食保管好，使用好，把生活安排好。在灾区，要教育农民努力生产自救，尽可能不依靠国家供应。在一般地区，特别是在丰产区，要教育农民计划用粮，留有余地。在那些地区，农民的生活应当比去年有所改善，但是不要改善得太多，仍然应当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要备荒，集体和家庭都应当有些储备，准备万一年成不好，再遇到更大的困难。

（七）修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安定的社会秩序，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目前在一些农村中存在的偷盗现象，是损害集体利益，损害农民切身利益，也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要造成一种舆论。把小偷小摸看做不正当行为，人人都有责任加以抵制。对于一贯不好好劳动的惯偷惯窃，要通过群众，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屡教屡犯的，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三

这次教育，要结合农村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不单独开展运动。但是，一定要做到深入普遍，做到家喻户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结合当地情况，编辑一些宣传材料。材料要生动具体，不要空洞抽象，使农民不可捉摸，也不要言过其实，使群众发生误解。

要教育农民群众，必须首先教育农村干部。各地的省委，应当选择适当时间，集中或者分片召集农村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三天到五天的会，学习这个指示和有关的宣传材料，然后再由他们去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

这次教育，要完全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不论是县上召开的干部会议，农村中开的群众会议，都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与会者耳闻目见的、同他们切身有关的事例，把大道理讲清楚。绝对不许开斗争会、“辩论”会，不许进行典型批判，也不要贴大字报。要提倡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以理服人，并且容许别人保留意见。总之，要发扬民主，做到既提高思想，又心情舒畅。

这次教育，只作口头宣传，进行的情况和教育的内容，都不要在报刊发表。

四

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自从农村中反对“五风”以来，有些地方竟把政治宣传也当做多余的事情，一起反掉了。这是很不对的。命令主义和瞎指挥必须反对，但是用正确的方法向农民群众进行正确的宣传教育，却是十分必要的政治工作。没有这项工作，很多农民就会迷失方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过去农村宣传工作中，存在过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现象，有的地方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上，不够全面、不完全正确，没有把共产主义远景的宣传，同当前的实践加以区别，没有把对党团员和少数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觉悟的要求，同对广大农民的要求加以区别。这些缺点，都应当克服。但是，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问题，是在于加强领导，而不是加以取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关部门，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以前，应当研究过去向农民进行政治宣传的经验教训，避免重复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在这次教育进行中间，应当在适当的段落，作一次检查；在明年春季，应当对这次教育作一次总结，并且作出新的布置，使今后农村中的政治宣传工作，能够经常起来。

中共中央批转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

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　　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央主席并报华东局、福建省委：

我于十月二十四日离京南下，二十八日晚安抵龙岩，经过郑州南昌时听取了各该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汇报，到岩后又派工作组在白土后田、邓厝、孟头诸大队及连城新泉北村大队试点，现试点已大体结束，发现了许多问题，取得了不少经验，兹将试点中所发现问题和处理办法报告如下：

一、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但也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思想上有抵触，小队干部和群众也有一部分过去在大队统一分配中占了便宜的人主张维持现状不再改变。这些经过说服经过大多数群众通过，也只好赞成。

二、在体制下放后，对小队规模一般都作了调整，除了原来规模很小的大队（如三四十户）不在分小队外，一般大队所属小队都比以前增多了，如后田大队由原来七个队划为十个队，邓厝大队由四个队划为五个队，新泉北村大队则由十个队划为二十七个队。这是按照五六年初级社规模划的，一般是二十户到三十户左右，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划合理，而体制下放后的大队，多管辖一些小队，在领导上也并无多大困难。但也有许多群众存在越小越好的偏向，这些人认为队小了生产好管理；有些人则因为对现有小队干部不信任，因而要求分队另选别人；也有一部分人企图把小队划小后将来可以进一步实现单干。因此今后我们对小队划分便定了几条原则：首先，确定现有小队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其次，有些小队范围太大，需要划分者，规定小乡村一村一队，大乡村一村数队，但小队应以三十户左右为宜，最少不得少于二十户。再次，应授权公社，各小队划分应经过公社批准，未批准前不得擅自划分，以免引起混乱。

三、小队改划以后，土地调整也有几种情况：如河南密县、福建连城之新泉北村大队原来各小队所领土地一般都按照初级社时期未大变动。因此，这些队的土地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龙岩各公社从公社化以来各队土地都按劳动力多少重新搭配。劳力多的队，搭配土地多，征购任务大，劳力少的队，搭配土地少，征购任务也少。但各队所留口粮却多少一样。因此，过去各队都不要土地，对集体土地也未好好经营，劳力肥料多用于自留地、开荒地上。这是平均主义的必然恶果。现在改由小队分配，各队群众都争要土地，这样土地就不能基本不动，而要重新调整。调整办法，后田大队是以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按人口搭配，百分之四十按劳力搭配，邓厝、孟头等大队则按照初级社时期各队所有土地归还原建制，队与队之间的插花地则根据自愿互利对等交换原则加以调整，这样虽然麻烦一些，但不这样群众争吵不休，很难调解。至于耕畜则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叫做“牛随田走”，中大型农具如犁耙等，则跟牛转移，新式农具仍归大队所有。

四、关于新三包，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各队情况不同，上交多少也不一样。后田大队因为今年晚稻不好，各小队又添置一些农具。因此，规定公积金只抽百分之三，而以三分之一上交大队，三分之二留给小队使用。新泉大队则大小队各抽一半。公益金，后田大队因五保户多（全队共二十五户）困难户也多（共四十户），决定抽百分之四，而以三分之二上交大队，包五保户开支，三分之一留各小队，负责照顾困难户、受灾户。新泉大队全队只有一个五保户，困难户也少，决定公益金只抽百分之一，全交大队，由大队统一照顾。管理费都按百分之二留足，大小队各半分用。

五、体制下放后，小队会计问题，一般都可以一队一个，有些小队无会计人选，则两个队共一个会计，有些大队会计也可以兼一二个小队会计。但需要迅速健全人民公社会计辅导员制度，迅速开办会计训练班。关于过去债务超支户欠款、分空户存款、一般仍由大队负责处理，暂不下放小队，俟小队划分、冬耕生产结束后再分别清理，叫做"新账从新起、旧账以后算"。

六、体制下放后大队有什么权力，做些什么工作？除按照河北所提大队九权之外，大家认为今后大队应负担四个方面工作：第一，是属于政权方面的工作，如分派征购、户口登记、调解纠纷、抚恤、救济、民兵治保、小学教育等；第二，是党与政治工作，如发展党员，开好支部会小组会、干部训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对小队干部工作检查等；第三，是联村社工作，如水利建设、护林防火、封山育林，修桥补路，供应种苗，办好供销社，做好物资配售，处理公益金、五保户等；第四，是办好大队企业，如石灰窑、粉坊、磨坊、油坊、烤坊、采伐木材、水力发电等。

七、关于粮食分配。大家一致重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河北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认为这是当前提高社员出勤率的主要关键。在河南密县、江西丰城试办体制下放时，由于尚未提到粮食分配问题，据说小队干部与群众兴趣不大。而白土、新泉各队讨论这个问题时，群众却异常兴奋。目前各队对粮食分配有两种办法；后田大队采取基本口粮与劳动粮各半分配办法，即以全队可分粮食之半数按人头分配，另一半按社员工分分配。（工分包括出工工分，积肥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军烈属困难户照顾工分等在内）新泉北村大队则采取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相结合办法，即无劳力者每月每人二十斤或二十五斤谷子作为基本口粮，有劳力不发基本口粮，而按各人实做工分分劳动粮，另以一部分作照顾粮，照顾人多劳力少，军烈属、老革命、外出干部、病人、产妇之用，对有劳力不出工者一律不照顾。据新泉工作组计算，实行这种制度后，有些队每个劳动日可得到四、五斤干谷。我认为新泉这种分配办法比后田对半分办法好，既简便合理，又更便于提高社员出勤率，拟广泛推行。某些大队今秋分配就打算扩大劳动粮比例，以便更好调动社员积极性。

八、关于山林问题，后田大队决定，凡有林木的山一律归大队所有，划片分给小队管理，山林收获按山林远近，大队提二、三、四成，其余全归小队。这种有林木的山不应划归小队所有，以免群众因对林权不相信而大量采伐。至于荒山则应完全划归小队所有，并发证立界，以确定所有权。最近乡村的荒山可以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每户三分五分都可以。

以上简报是否有当，望指示。

此致

敬礼

邓子恢

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于岩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23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551
SS号=10273525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